理想国
maginist

A History of China 03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日】鹤间和幸 著 马彪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5495-1146-4

9 787549 511464 >

定价：58.00 元

理想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03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怎样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从司马迁到今天，人们已经探索了两千多年。今天学者对许多秦汉史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异见。我们面前的鹤间和幸著讲谈社版《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提供了与许多中国学者视角有所不同的对中国秦汉史的另一种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子今

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日】鹤间和幸 著　马彪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GOKU NO REKISHI (3) FAASUTO ENPERAA NO ISAN
—SHIN KAN TEIKOKU
(C) Kazuyuki Tsurura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桂版登记号 20-2012-0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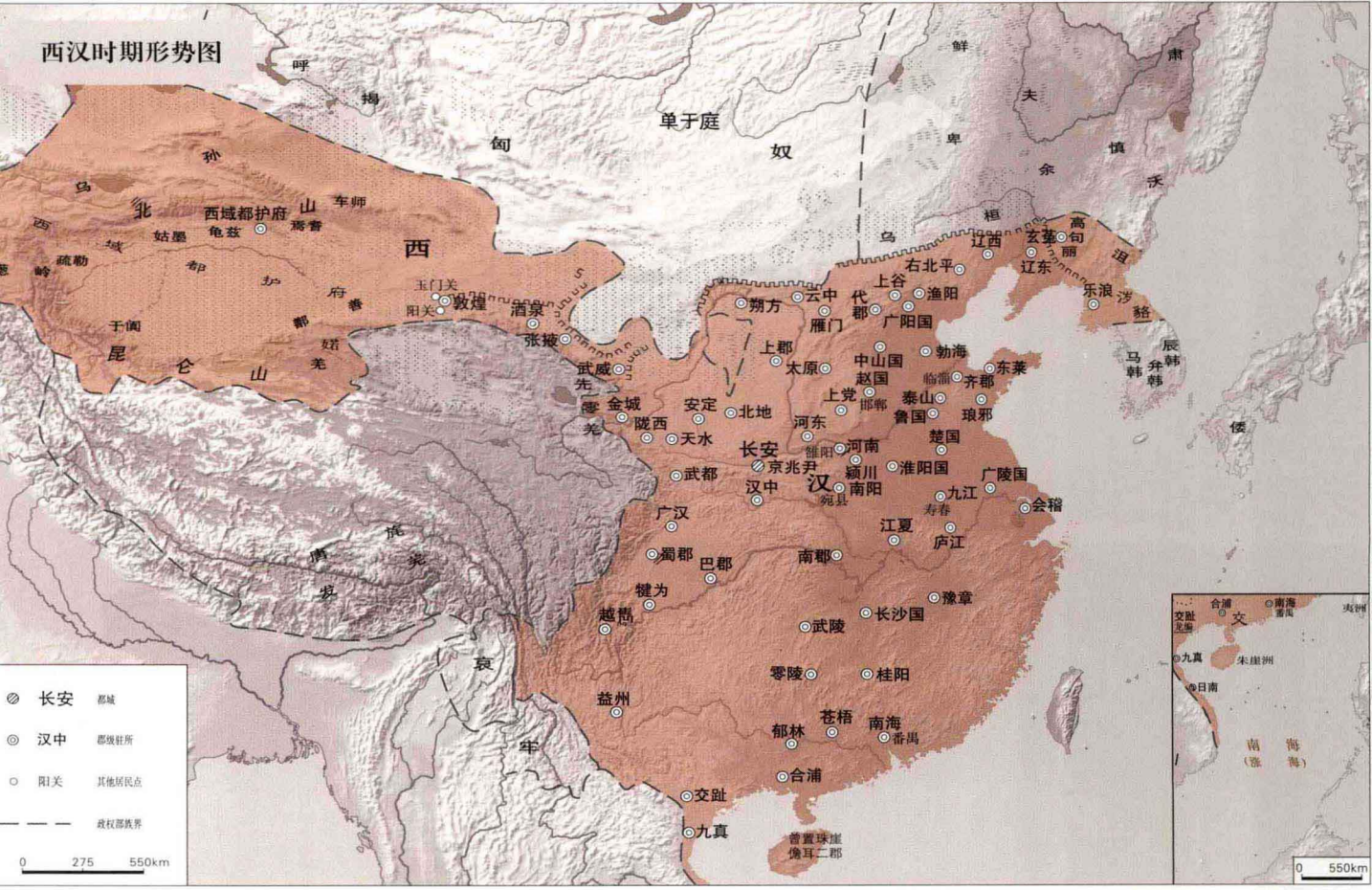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日)鹤间和幸著；马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 03）
ISBN 978-7-5495-1146-4
Ⅰ.①始… Ⅱ.①鹤…②马… Ⅲ.③中国历史-研究-秦汉时代
Ⅳ.①K23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03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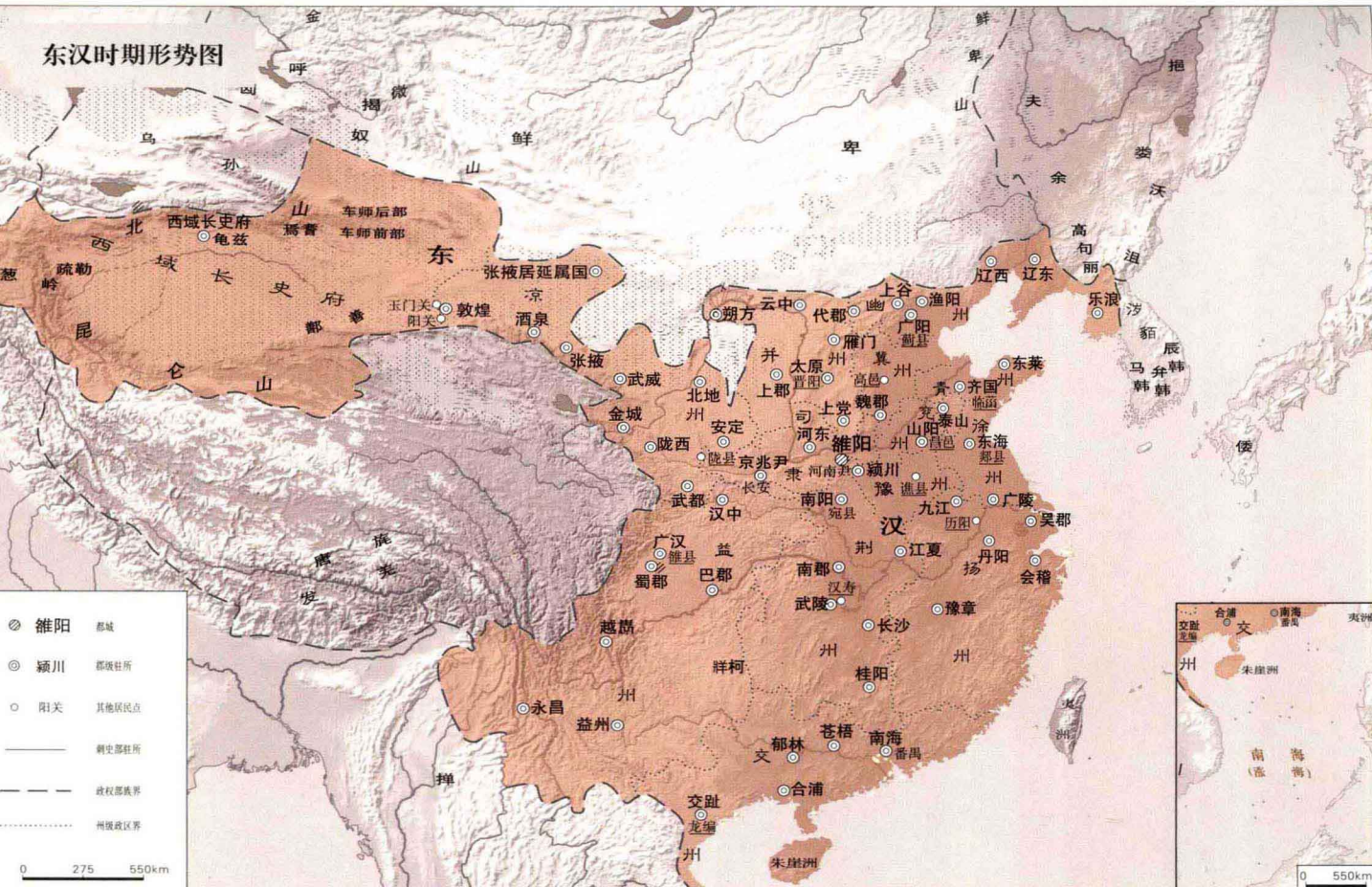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6.75 字数：228千字 图片：170幅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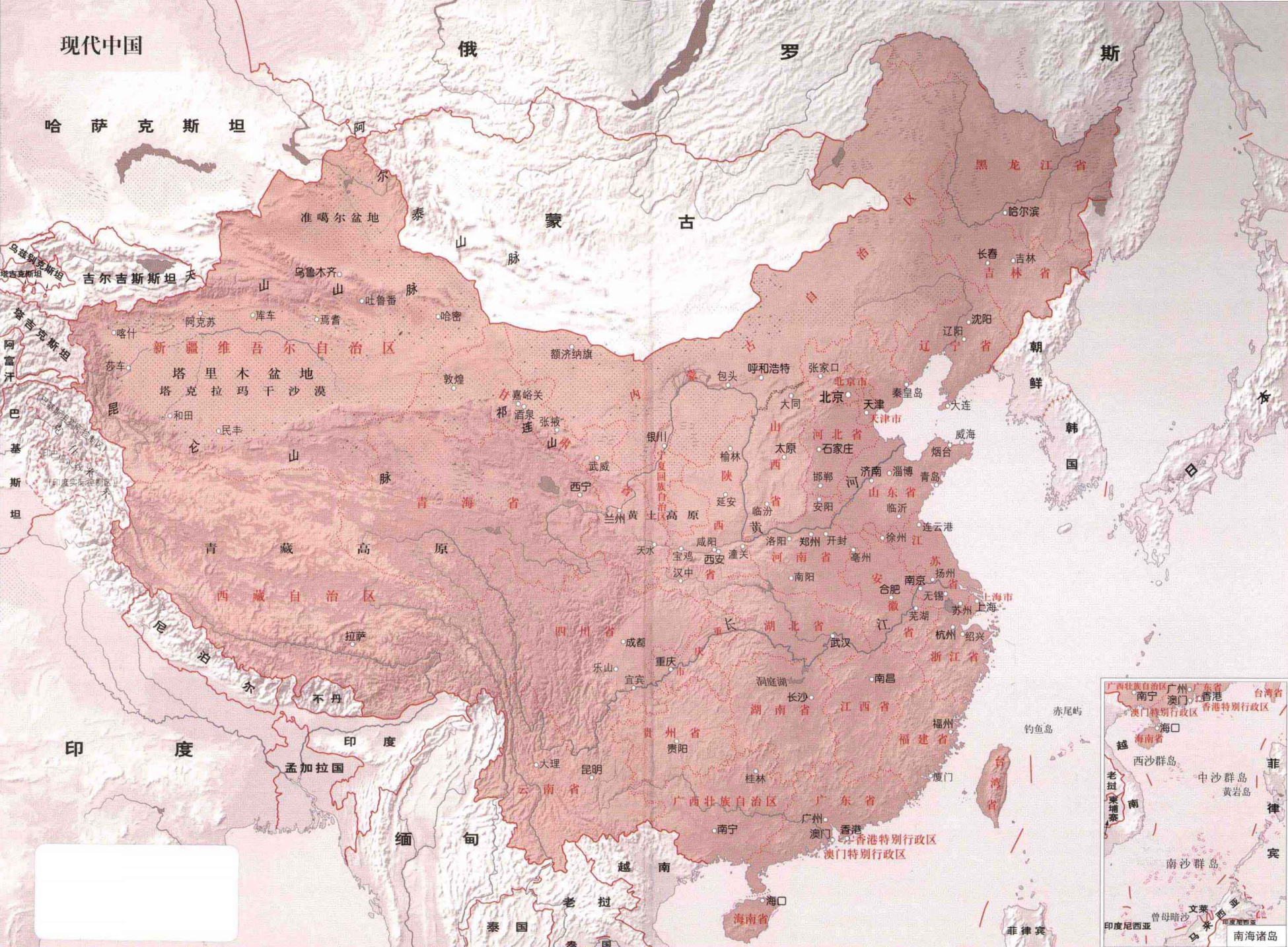


西汉时期形势图

长安 都城
汉中 郡级驻所
阳关 其他居民点
政权部族界
0 275 550km

东汉时期形势图

雒阳 都城
颍川 郡级驻所
阳关 其他居民点
刺史部驻所
政权部族界
州级政区界
0 275 550km


现代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阿尔泰山脉
蒙古
准噶尔盆地
乌鲁木齐
吐鲁番
哈密
阿克苏
库车
焉耆
喀什
莎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里木盆地
塔克拉玛干沙漠
和田
民丰
昆仑山脉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
孟加拉国
不丹
尼泊尔
缅甸
越南
老挝
泰国
青藏高原
西藏自治区
拉萨
青海省
敦煌
嘉峪关
酒泉
张掖
额济纳旗
武威
西宁
兰州
黄土高原
银川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
呼和浩特
张家口
北京市
北京
天津
天津市
秦皇岛
大同
太原
石家庄
河北省
榆林
延安
陕西省
临汾
安阳
邯郸
济南
淄博
青岛
山东省
临沂
连云港
徐州
江苏省
扬州
南京
无锡
上海
上海市
苏州
芜湖
合肥
安徽省
杭州
绍兴
浙江省
洛阳
郑州
开封
亳州
河南省
南阳
咸阳
宝鸡
西安
潼关
天水
汉中
四川省
成都
重庆
乐山
宜宾
长江
湖北省
武汉
洞庭湖
长沙
湖南省
南昌
江西省
贵州省
贵阳
福州
福建省
大理
昆明
云南省
桂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东省
广州
澳门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南宁
海口
海南省
台湾省
赤尾屿
钓鱼岛
菲律宾
黑龙江省
哈尔滨
长春
吉林
吉林省
辽宁省
沈阳
辽阳
大连
威海
烟台
朝鲜
韩国
日本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州
广东省
南宁
澳门
香港
台湾省
澳门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海口
海南省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黄岩岛
南沙群岛
文莱
曾母暗沙
印度尼西亚
南海诸岛

A History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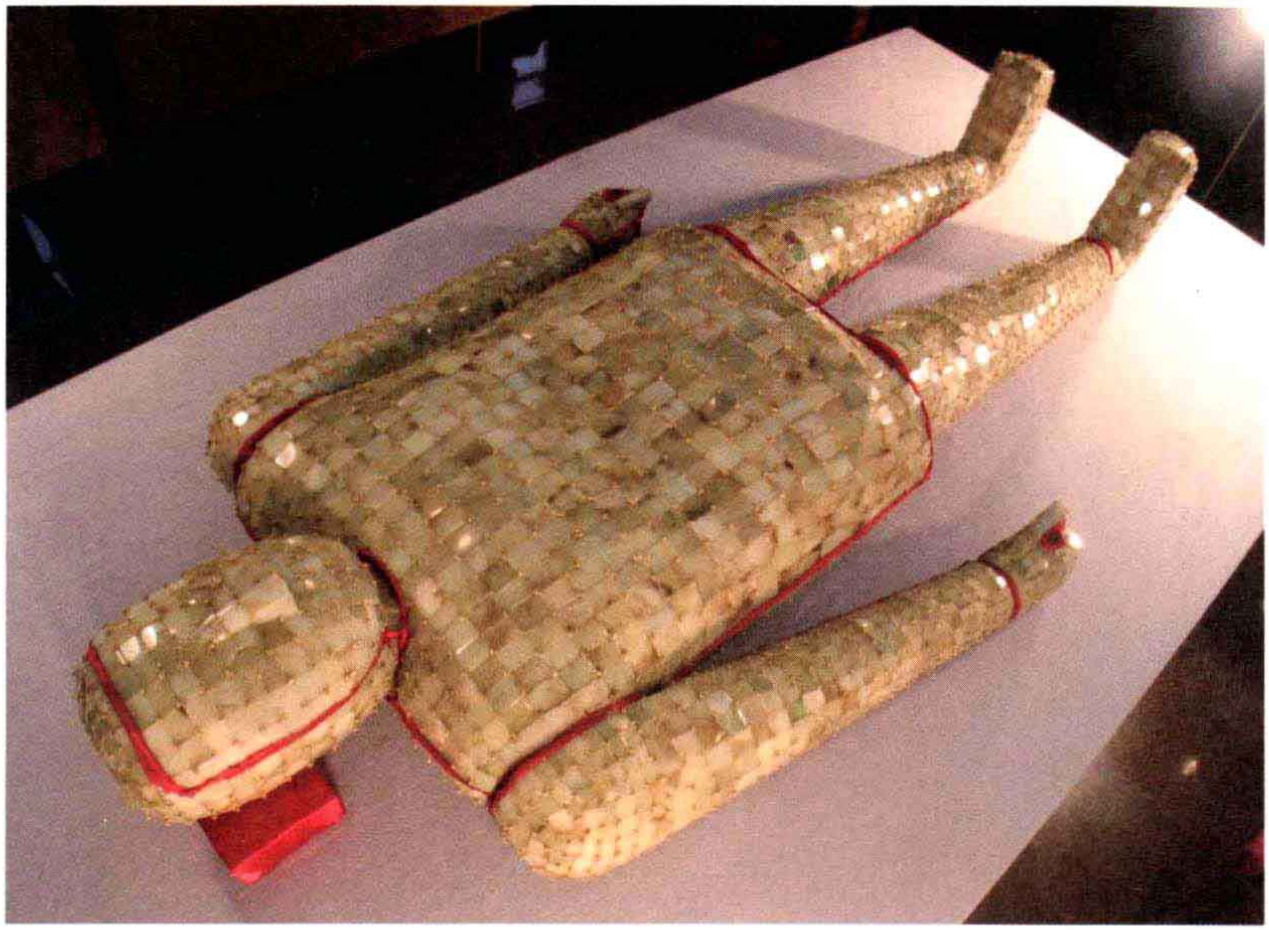
03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王子今



图一

【玉衣的时代】

玉衣是穿着于秦汉王侯遗体上的葬服，是不能脱下来的衣服。在汉代这种将玉札（玉片）用缕（线）连缀覆盖于全身的衣服称为玉匣，为的是防止灵魂跑出尸体。秦始皇、刘邦、吕后、武帝的遗体上应该都覆盖有玉衣。汉代南越王的玉衣已被发现。随着秦汉时期的结束，玉衣的时代也消亡了。

图一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江苏省徐州有刘邦之弟刘交的封国和楚都彭城。那里还有历代楚王的陵墓。至今已发掘的有北洞山（第二代夷王刘郢客）、狮子山（第三代楚王刘戊）、龟山（第六代襄王刘注）、火山（东汉彭城王刘和）等汉墓，年代相当于文帝、景帝、武帝、东汉献帝时期。1984 年在狮子山发现大规模的兵马俑群，后建成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之后在 1991 年又发掘了王陵。金缕玉衣的主人据推测为刘戊，他因参加对汉朝造反的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被迫自杀。这件金缕玉衣由四千多枚于阗产半透明的美丽白玉，以金线连缀而成（徐州市博物馆藏）。

推荐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统一。秦的统一并非只是兼并六国，即后世人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而且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方式实现了中原文化向北边匈奴控制区和岭南越人居住地的扩展。后者的意义尤其重要。有学者称秦的统一是继商周时代“有着广大统治区域的统一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充满了战乱和分裂”的东周时代，实现的“重新统一”（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7页）。当然，秦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已经与商周时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完全不同。秦帝国的建立，版图的规模，行政的力度，控制的效能和文化理念的同一，也与商周时代完全不同。秦的政体又为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完善。

从秦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两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四个多世纪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有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

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和管理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怎样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从司马迁到今天，人们已经探索了两千多年。今天学者对许多秦汉史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异见。我们面前的鹤间和幸著讲谈社版《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提供了与许多中国学者视角有所不同的对中国秦汉史的另一种说明。

鹤间和幸是日本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学者，多有质量优异的论著面世。他的这部《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历史。这部专著虽然更多地侧重于秦与西汉史的论说，但是对于东汉史的分析，依然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亮点。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以后，又有若干有益于说明秦汉历史的新的出土文献面世。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资料的利用，正是鹤间和幸这部著作显著的优异之处。此外，陕西秦汉考古学者近年的工作成绩，如张安世家族墓地的发掘信息，汉长安

城宫殿区的考古收获，甚至“张汤印”的发现，都受到作者的注意，及时作为最新资料用以说明和印证自己的学术论点，体现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站立于学术前沿的立场。书中对于汉长安城周边自然环境的介绍，对于东汉自然灾害影响人文历史的思考，也都反映了作者对生态环境史予以重视的可贵的学术新识，可以给我们有意义的文化启示。

中国古史研究学界久有“汉承秦制”的说法。这一见解较早见于《续汉书·舆服志上》、《舆服志下》和《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前者《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及卷七七四引作“董巴《汉舆服志》”、“董巴《舆服志》”。而《续汉书·五行志一》说，“《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可知“汉承秦制”之说汉末已经通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秦律的承继关系，也鲜明地显现了这一事实。李学勤先生对于秦汉文化的关系是这样表述的：“秦的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统一后，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随后发展为四十六郡。郡县制的普及，形成了与商、周王朝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

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朝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第 12 页，第 382 页）鹤间和幸著《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将汉帝国的历史文化存在视作“始皇帝的遗产”，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符合历史真实。

尽管主要用意在于向一般读者介绍秦汉历史，并不承负在较深层次进行学术攻坚的任务，但是《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依然在若干方面提出了颇为新异的意见。例如，书中写道：据“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通过古代人骨分析得出的结论，“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这样的认识，可能还需要较丰富的资料和较全面的考察的支持。

关注学术成果传播的朋友们都知道译之不易的事实。实际上，自西汉时期起，已经出现了“译官”、“译令”（《汉书》卷

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译长”、“译使”(《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等身份。所谓“译人传辞”(《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已经是作用特殊的文化职任。“译人”这一称谓也成为一种对文化交流负有崇高责任的职业的代号。马彪先生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译本在“信、达、雅”诸要素中“信”的方面应当首先可靠。“达”和“雅”当然是很高的要求,译者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看到成功。特别因译者作为熟悉中国历史学的学者,在译作中也会有自己的学术意识体现。建议读者、特别是有意以此作为学术参考的朋友能够将鹤间和幸教授的原书和马彪教授的译本两相对照,也许会获得更多的阅读收益。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12年1月17日

中文版自序

本书能够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是笔者的荣幸。本来是用日文写给日本人的外国史读物，现在中国的读者要将其作为自己国家历史的史书来阅读了。但是，就我本意的来说并不希望读者是将本书作为一本由外国人写作的中国史，而是将其作为不问国籍的一名研究者所著的中国史书来阅读。

在此研究领域中，笔者作为日本秦汉史学会的一员，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秦汉史研究会的不断交流。在日、中秦汉史学者撰写的论文中是没有国境界线的。对于中国最早实现统一的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者都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基本文献和竹简、木简出土的文字史料，以及考古学资料为依据予以描述的。

然而，所谓历史读物必然要反映著述者的立场。在日本作为从外部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的人们，与在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之中生活的人们，他们观察过去的立场自然不会一样。这也许就是历史认识的差异吧。

本书则是将中国、日本都置于东亚这一大背景之中的。秦汉时期的日本列岛，社会与中国相比的话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当时的事实。“倭”已经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日本列岛当时还是小国分立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小国向汉进行了朝贡。但即便如此，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华的角度出发，视边境地域为“夷狄”的观点并不可取。笔者放弃了华夷思想，从多元文化地域集合体的观点对中国进行了描述。

另外，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视角也是很重要的。对于当时中国与古代罗马之间的关系，我不仅记述了东汉时期罗马使节访问中国的直接交流，也看到二者所共同具有的古代社会的时代特性。对于希腊、罗马的古代与中国的古代，我并没有从民主与专制的所谓二元的对比关系进行描述，而是着重探求了同一时代东、西世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自而完整出现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所具有的真相。我认为从民众创造的国家、帝国的视角描述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在当地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对秦汉时期许多遗址进行了长年的调查。踏访了诸如秦汉的都城、皇帝陵、长城、始皇帝巡行路线，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设施，以及黄土高原、黄河

下游流域的许多遗址，还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调查访问中，我一方面深感文献史料有限，同时又通过亲赴文献所描述的地点进行考察，从而加深了对文献史料的理解。这些成果在本书中可说随处可见。

鹤间和幸

2011 年

前言

超越《史记》、《汉书》

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里耶秦简

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能如此精彩地为这部秦汉史著作开篇，实在是笔者始料未及的。湖南省湘西地区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代简牍。中国的报纸迅速地以诸如“改写秦史”、“二十一世纪最重大发现”一类赞誉之辞予以报道。且不说此事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至少它已入选了2002年中国重大发现之一。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一千一百余枚竹简文书的发现已是振聋发聩，时隔二十七年的2002年6月，不能不说有了更大的发现。

简牍即木札，上面书写有数十万的文字。里耶简牍不仅与兵马俑的价值不同，而且在数量上是睡虎地秦简的三十六倍。可以说发现了足够一部书分量的、重要的、秦代当时的文字史料。

1 里耶古城发掘现场 2002 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的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支秦代简牍。被誉为胜过 1974 年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发现”（《文物天地》2003 年 5 月）

这二十几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离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史料是无法撰写的，仅仅依靠作为基本史料的司马迁的《史记》显然已经很不够了。同样，今后撰述秦汉史时，作为史料的里耶秦简亦绝非可有可无。里耶秦简发现后仅仅半年，《文物》2003 年第一期就异常迅速地登出了《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虽然所刊载的仅仅是部分秦简，但文章根据大量彩色图版对简牍进行了介绍。因此，本书也只是就目前公布的文书内容所进行的写作。中国古代史就是这样，既有趣又艰深。

无论如何，还是先从介绍里耶秦简的概况开始吧。龙山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毗邻以奇岩石林风景而闻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原。在远古沉积于海中的石灰岩隆出海面，受到侵蚀之后最终形成了张家界、武陵原这种喀斯特地貌。由此再往西就是坐落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土家族是人口不过八百零二万（2000 年）的少数民族，自称“毕兹卡”，意思是“土著”，汉译为“土家”。苗族有人口八百九十四万（2000 年），在古代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于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土了秦代文书，可谓意义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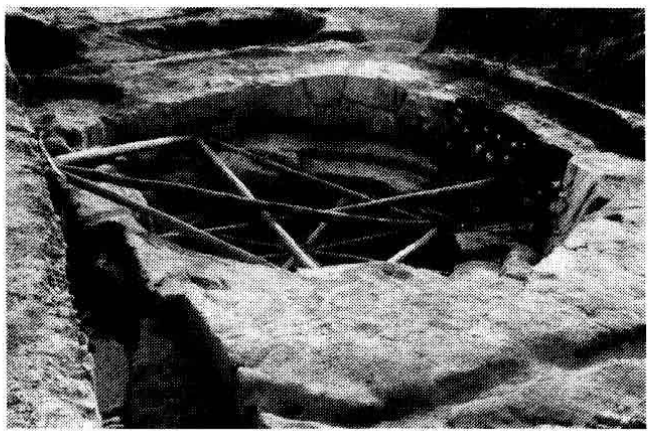
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里耶新发现的简牍可以证明四、五世纪以隐逸诗人著称的陶渊明（又名潜，365—427）所描述的桃源乡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其真实历史背景的。

《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东晋太元（376—396）年间的故事。说一日，武陵渔人乘舟进入一片盛开的桃花林后，弃舟穿过洞穴，到达一个奇异的村庄。这里的村民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祸乱，率妻儿乡人至此与世隔绝的境地，再未出去，于是与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总之，"从前，在秦末战乱中，有家族、村民一同入此边境，那以后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们向渔人询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他们甚至不知由秦至汉、从魏而晋的变化。受到酒菜热情款待的渔人希望再次来访，沿来路返回时一路上处处做了标记。但是，当郡太守闻及此事，遣人寻找所做标记时，却未能再次成行。

陶渊明最后赋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嬴氏即指秦始皇嬴政，由于他搅乱了天的秩序，贤人便纷纷避世隐居。秦末的夏黄公和绮里季等人隐居商山，同样桃源乡的那些人也隐居避世。他们初进山时的踪迹已经湮没，道路也已废弃荒芜了。

这一传说历来被认为是陶渊明虚构的乌托邦。毕竟秦末的战乱云云，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都已是遥远的世界。但是，至少由此可以证明秦的势力的确延伸到了这一带的边境。



2 里耶古城一号井　这里发现了“改写秦史”的大量简牍(《文物天地》2003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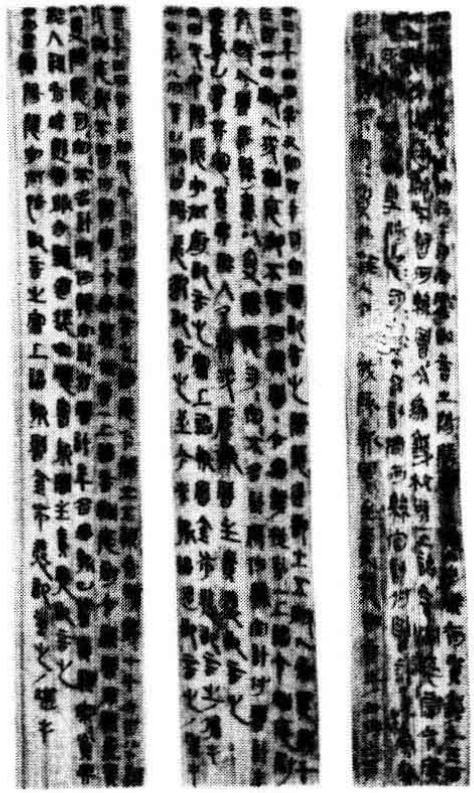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认为桃花源实际并不存在于秦代、不过是假托秦朝言后代之事的观点也是根深蒂固的。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认为,《桃花源记》所云“秦”指的是南朝宋之刘裕时期。然而，此次里耶秦简的发现，却揭示了作为理想之乡传说背景的历史真实性。秦人确实进入过此地的史实，从此有了确凿的证据。

有观点认为《桃花源记》的渔人是从沅水乘舟溯流而上的，从里耶秦简来看，秦人也是从洞庭湖先由沅水溯流而上，再沿酉水上溯，在上游建立了迁陵县。简牍内容就是这个比桃源乡所在地更加偏僻的迁陵县使用的文书，而且仅就其是秦始皇时期的文书而言，这个小地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发生过什么的谜团也终于得以揭晓了。

认为桃花源的村民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原避世于此的观点，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果说秦朝对这里的统治仅限于沿河小盆地一些据点的话，倒不妨认为他们是从这里逃亡，而后固守于山中洞穴的。对于他们来说，由秦转变为汉是闻所未闻的异空间之事。

史料相继出土
超越《史记》、《汉书》

多数世纪性大发现带有偶然性。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偶然挖出奇怪俑头得以发现的。里耶秦简的简牍本来也是埋在一口古井里，由于暴雨造成泥石流才被发现的。然而，秦人究竟为何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呢？最新的考古发现不但为一直被认为纯属虚构的《桃花源记》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重大疑问。



3 里耶秦简 简文所见“三十三年”即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是记录罪犯服劳役刑的账簿（《文物》2003年第一期）

司马迁虽然在秦始皇去世一个世纪后，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这位第一帝的纪年事迹，但他的记录毕竟是根据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中央朝廷所藏史料进行人为取舍的作品，里耶秦简的大批公文则可以说是秦始皇当时的、未经任何人为编纂的史料。重新认识第一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秋，又迎来了另一大发现。湖南长沙市一眼古井出土了汉武帝前期的简牍一万余枚。发掘地点距1996年十四万枚三国吴简的出土地不过百米。长沙走马楼吴简才仅仅整理出一部分，又出土了大量的走马楼汉简。与秦始皇时代的里耶秦简一样，

这也是一批废弃于古井的汉武帝时代的公文。

这些出土史料的内容虽然尚未整理、公布，但是可以说武帝时代也有了超越《史记》、《汉书》的出土史料，它揭示了一个依据出土史料从事研究的时代的到来。显然，对秦汉时代历史的认识，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形成多民族秦汉帝国的四百年

1999 年，北京石景山老山地区发生了西汉诸侯王墓的大规模盗掘事件。墓中发现一具女性人骨，专家分析认为是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可能是诸侯王的王妃。2001 年据该人骨复原的人物面部，有观点认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吉克人相似。她可能是刘姓皇族诸侯王从西域迎娶的胡女王妃。塔吉克族属印欧语系民族。然而，这一结论引起了争议。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头盖骨做了 3D 技术的头部复原。结论是该女子为典型的古代中原地区汉代人物（《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2003 年第十六期，2 月 28 日）。认为墓主是塔吉克人的观点遭到否定。

最近，生命科学有着惊人的发展。根据遗传基因信息可以对人类进行分类。人的所有细胞都含有线粒体，其中细胞核的染色体组 DNA 有三十亿个符号是独立繁殖的，而且仅从母亲那里才能继承的有约一万六千个符号的小型 DNA。近年人类学家分析了世界各地民族的线粒体 DNA 的盐基排序，正在绘制各民族 DNA 的近似表。据说，现代人类诞生于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在

那里多样分化之后，约十万年前其中一支向印欧大陆扩展，欧洲、亚洲人的祖先由此诞生。

4 老山西汉墓复原女性像
墓主可能是西汉燕王王妃，关于她的民族出身问题引起了讨论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分析了山东省临淄西汉遗址出土的五十八具人骨，和东周时期九十二具人骨的线粒体。最终探明了在秦统一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齐民族的情况。当他们将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两千年前西汉末的山东人，以及现代山东人的身体特征进行比较时，得出了意外的结论。即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现代山东人与东亚的日本人、韩国人相近（参见多贺谷昭《根据容貌探求日本人起源》，载于《日本人的久远之旅 1》，NHK 出版，2001 年；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渡来系统弥生人的大陆寻根 ——与山东省合作研究的报告》，2000 年）。

我们常常将中国的世界与那里具有漫长历史之汉民族的历史，以“传统”一词予以固定化的认识。然而，不容忘怀的是：悠久的中国史其实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且经过不断的质的变化才得以形成的。秦汉二王朝的建立者，就分别出自西方和东方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秦，早在始皇帝的六百年之前，就由于其

祖先非子为周朝牧马有功而得到封地。即位于甘肃省东端的清水县、秦安县附近，黄河支流渭水上游的黄土高原之地。而汉朝则来自于刘邦受封的小国，其国都位于陕西省南端，汉水上游的汉中县附近。进一步说，本来的刘邦集团，来自于刘邦的故乡，江苏省西北部的沛县、丰县的地方势力。位于广义的黄河下游东方平原。

小秦、小汉，兼并其他各国而统治天下，创造了大秦、大汉。以如此方式将庞大国家改朝换代的事情毕竟史无前例，我们称之为帝国。或曰秦帝国、汉帝国，或曰秦汉帝国。秦、汉大国形成之前，小秦、小汉是如何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最终壮大秦人、汉人集团的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四百余年的历史！

目 录

推荐序 i
中文版自序 i

前 言 超越《史记》、《汉书》11

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里耶秦简 / 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 史料相继出土 超越《史记》、《汉书》/ 形成多民族秦汉帝国的四百年

第一章 始皇帝的诞生 19

暗杀秦始皇未遂事件 19

地方官吏眼中的秦始皇 / 暗杀秦始皇 / 刺客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 / 史书与画像石的不同描绘 / 史实随着史料的不同而变动 / 一名地方官吏与始皇帝的相遇

战国秦昭王时期 30

拉开帝国时代的大幕 / 所谓“天下”的概念 / 秦王政与吕不韦 / 嫪毐之乱

天下统一 37

李斯的野心 / 贯彻法治与帝王之术的构想 / 统一天下之翌年 / 叛乱事件与侵占船只事件 / 咸阳宫召开御前会议 / 古代的时间感觉 /《史记》未载的天下统一实情

第二章 皇帝制的形成 51

皇皇上帝 51

古代的上天思想 / “皇帝”的称号 / 秦以水德克周之火德 / 三十六郡之谜与帝国的扩张

度量衡、车轨、文字的统一 ……59
谷物计量与武器的制造标准 / 道路交通网的建设与统一车轨 / 习字与撰写文书 / 秦朝的领土面积 / 在征服地的扬威之旅

什么是泰山封禅……68
被歼灭者 / 祭天——祭祀的继承 / 封祭与帝国不灭宣言

对外战争——与新天下的遭遇……73
与蛮夷的战争 / 贸然对匈奴、百越南北同时开战 / 多难的百越征服战 / 河南（鄂尔多斯）与南海三郡 / 战时体制的土木工程 / 巨大的首都与阿房宫

焚书坑儒与不死仙药 ……83
丞相李斯的措施 / 对诸生反体制批判的镇压 / 方士与秦始皇 / 最后的巡行 / 单一法制的天下统治 / 秦始皇的末期

秦始皇的地下帝国 ……91
水银江河、人鱼膏烛台 / 已探明的地宫内部构造 / 天下的军队 / 士兵俑、文官俑显示出的秦帝国拓展

第三章　秦楚汉的三国志 101

陈胜、吴广之乱……101
秦楚汉更迭的历史 /《楚汉春秋》：动乱时期的史料 / 重评历史的珍贵史料 / 六个月的农民起义 / 老百姓缔造国家 / 二世皇帝胡亥 / 叛乱的扩大与评价

秦帝国的灭亡 ……112
继承楚名将血统的项梁 / 项羽的崛起 / 刘邦其人 / 沛公刘邦的叛乱 / 刘邦集团的成员 / 赵高专权与二世之死

楚汉战争 121

项羽与刘邦的对峙 / 鸿门之宴 / 火烧秦都咸阳

西楚霸王项羽 125

十八王联合国体制 / 韩信“争权天下”的劝导 / 逐鹿中原 / 停战协议的制订

楚国崩溃 132

垓下之战 / 虞美人之歌 / 交错纷乱的楚军汉军 / 项羽之死 / 项羽之评价

第四章　刘氏王朝的诞生 141

刘邦的汉帝国 141

《二年律令》的发现 / 汉皇帝的即位 / 强化中央权力的大清洗 / 辅佐皇帝的官僚与诸王 / 封爵之誓 / 诸侯王的叛乱

汉王朝的首都圈建设与法制体系 150

再开发之后的关中据点 / 选择洛阳还是长安 / 汉长安城遗址 / 东亚世界法律的源流 / 始皇帝的严惩主义与刘邦的简约主义 / 模糊的秦律、汉律终有搞清楚的一天

对匈奴外交与高祖之死 161

冒顿单于的权力篡夺 / 神秘人物刘敬的提议 / 高祖刘邦最后的日子

吕太后政权 168

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 / 吕雉与刘邦 / 残虐戚夫人的复仇 / 外戚吕氏的时代 / “皇后之玺”的真伪 / 对吕太后评价的动摇 / 长沙国与南越国 / 长沙马王堆汉墓带来的震撼 / 俨然古代的图书馆与美术馆 / 活跃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越国 / 秦汉与越的文化并存

文帝的时代 182

由代国王成为汉帝国皇帝 / 文帝即位的舞台 / 后世评价颇高的文帝仁政 / 废除凄惨肉刑 / 赐男女爵位与酒宴 / 已经探明爵制的实际与效果

从文帝到景帝 191

中国古代酒类面面观 / 酒宴与肉食的规定 / 不筑坟不损山川 / 吴楚七国之乱 / 梁孝王刘武的奋战 / 周勃、亚夫父子兵马俑

第五章　武帝的时期 I　203

武帝与司马迁 203

武帝生母王夫人与栗姬 / 由十四个皇子中选出的武帝 / 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 / 武帝在位年号 /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 司马谈的忧愤而终 / 司马迁的生卒年 / 二十岁时开阔眼界的旅行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 216

元光三年黄河溃决 / 武帝求河神保佑诗二篇 / 李陵之祸降临 / 李陵之降匈奴 / 宫刑之屈辱

追求神仙世界的古代帝王 225

尊重秦始皇的汉武帝 / 显现神仙岛的离宫 / 秦皇汉武两位相似的古代帝王

武帝时期的历法与审判 231

依照太阳运行的生活节奏 / 太阳与月亮两种周期 / 在正月过新年的新历法 / 酷吏张汤与新出土的汉简文书 / 武帝时期的审判程序

第六章　武帝的时期Ⅱ　241

进入西域与匈奴战争 ……241

丝绸之路 / 与月氏同盟讨伐匈奴 / 从和亲到抗争的汉匈外交 / 与匈奴作战之主角卫青、霍去病 / 张骞带回的乌孙天马

武帝的对外战略 ……250

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 南越王国的灭亡 / 西南夷的世界 / 夜郎隶属于汉、册封滇王 / 西南夷诸部族的生活与风俗 / 出征朝鲜军队的混乱 / 朝鲜半岛的统治据点乐浪郡 / 大宛的汗血马 / 为夺取天马的战争

儒教的时代 ……265

罕见的思想家，孔子引起的共鸣 / 广博的思想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 救助农民、富强国家的政策性建议 / 淮南王与衡山王的谋反事件 / 借儒家之学讽刺武帝

武帝时代的经济与开发 ……273

支撑汉代财政的货币 / 汉代官吏的薪俸 / 稳定国家财政之策 / 盐铁专卖使国家获得巨大利益 / 铁制农具促使生产力飞越发展 / 建造白渠消除盐害 / 武帝时期的关中开发 / 武帝时代的结束 /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第七章　从后宫之窗见到的帝国行踪　289

汉帝国的中枢与后宫 ……289

从《史记》到《汉书》/ 忍受屈辱的李陵　贯彻信义的苏武 / 少年皇帝与霍光政权 /《盐铁论》与专卖制的废止 / 后宫的等级社会 / 后宫与内朝的宫殿配置 / 汉帝国中枢之中央官厅的构成

中国古代的女性.....301

从后宫观察西汉五十年政治中的女性 / 法律优先的夫妇之义 / 成帝猝死之谜 / 世代传颂的王昭君故事 / 历代女性的化妆 / 制服暴龙

从沉睡中苏醒的古代木简.....311

敦煌汉简的记录 / 绿洲国家的生活方式 / 纸未发明以前的书籍 / 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 执掌地方政治的循吏与酷吏

出土文书所述.....320

东海郡的地方行政 / 僮约：奴隶买卖契约 /《汉书·地理志》的宏观世界 / 逐渐清晰的汉帝国全貌 / 西汉十一代皇帝陵 /《汉书·游侠传》的豪杰 / 长安城周边丰饶的自然环境

王莽篡夺汉王朝.....332

意欲保汉的王政君 / 王莽当“假皇帝”的策略 / 西汉至新禅让的闹剧 / 传国之玺：正统继承者的证明 / 秦始皇、武帝与王莽的共同点

新的政治、经济、外交.....340

向往周代政治制度的复古 / 温柔与残忍 / 理想主义的经济政策 / 权威的确认与象征性货币改革 / 儒教主义华夷秩序的开始 / 对王莽新王朝的评价 / 黄河决口时为保坟墓而牺牲民众 / 周边各民族的背叛、造反与政权的崩溃

第八章　民众的世纪　353

记载王朝兴亡的史书.....353

将两个汉朝相互区别的记述 / 地方社会特征形成的时代 /《后汉书》的编纂 / 兴亡全史的陆续编纂 /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王莽政权的灭亡……360

女首领吕母发动的叛乱 / 赤眉之乱的爆发 / 上将军隗嚣的反莽叛乱 / 蜀王公孙述的自立 / 博识文人扬雄的《蜀王本纪》/ 南阳刘氏的举兵 / 光武帝即位的告天仪式

光武帝刘秀的统治……371

汉王室的中兴 / 奴婢解放与行政大改革 / 东汉王朝迁都洛阳 / 洛阳城发掘调查的记录 / 服役刑徒之墓

金印与光武帝以后……378

赐倭之奴国王的蛇纽金印 / 赐金印之光武帝一方的形势 / 光武帝之死与明帝的即位 / 安定的明帝时期 / 白虎观会议对《五经》解释的讨论

匈奴与经营西域……385

与南匈奴的关系 / 北匈奴的毁灭 / 反映对匈边防最前线生活的史料 / 玉门关与阳关：西域外交的门户 / 西域诸国的动向 / 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

王充的科学批判精神……394

谶纬思想——东汉儒教的特征 / 批判儒教神秘主义的《论衡》/ 印度佛教的传来 / 备受关注的东汉佛教遗址

第九章　自然灾害与内乱的世纪　401

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401

侵袭人类生活的大自然 / 水害、旱灾频仍 / 蝗虫的异常发生 / 疫病的流行与医学 / 名医张仲景与华佗 / 张衡的地震仪 / 顺帝时期的凉州地震 / 人口流动与一年一度的户口调查 / 人口的过疏化与过密化

官吏、字典与数学 412

九千字的读写能力 / 官僚实务、儒者素养所必需的算术 / 从丝绸帛书到纸

东汉对西方的外交与罗马的使节 418

班超、班勇与西域的统治 / 游牧骑马民族、西藏山岳民族、绿洲都市国家 / 西境的羌族叛乱 / 倭国王帅升的朝贡使节 / 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敦 / 罗马皇帝派遣使节至洛阳 / 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国 / 汉与罗马交流的丝绸与玻璃

儒教与道教 429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 / 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 应对自然灾害、政治混乱所需的儒教德治 / 道教的创立时期

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436

阉人外戚时期 / 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 / 宦官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势力的抬头 / “河水清”之东汉帝国崩溃征兆 / 党人与宦官的一大抗争 / 从宗教集团到反政府集团 / 黄巾之乱——宣告东汉王朝的灭亡 / 五斗米道宗教集团 / 屈服于曹操的宗教王国

豪族与乡里社会 448

作为支撑王朝阶层的豪族 / 豪族的地域性与阶层性 / 一县平均三乡、一乡十里构成的地方行政组织 / 新出史料中东汉乡里的农民生活 / 墓室壁画所描绘的豪族庄园 / 以此为中世前史的观点

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 457

酷似西汉末的政权交替 / 魏王曹丕所受皇帝玺绶

结　语　秦汉四百四十年的各位始皇帝 460
四百四十年的这个年代 / 争当始皇帝

附　录 463

译注 …… 467
主要人物略传 …… 473
历史关键词解说 …… 479
参考文献 …… 487
历史年表 …… 509

目 录

推荐序 i
中文版自序 i

前 言 超越《史记》、《汉书》11

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里耶秦简 / 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 史料相继出土 超越《史记》、《汉书》/ 形成多民族秦汉帝国的四百年

第一章 始皇帝的诞生 19

暗杀秦始皇未遂事件 19

地方官吏眼中的秦始皇 / 暗杀秦始皇 / 刺客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 / 史书与画像石的不同描绘 / 史实随着史料的不同而变动 / 一名地方官吏与始皇帝的相遇

战国秦昭王时期 30

拉开帝国时代的大幕 / 所谓“天下”的概念 / 秦王政与吕不韦 / 嫪毐之乱

天下统一 37

李斯的野心 / 贯彻法治与帝王之术的构想 / 统一天下之翌年 / 叛乱事件与侵占船只事件 / 咸阳宫召开御前会议 / 古代的时间感觉 /《史记》未载的天下统一实情

第二章 皇帝制的形成 51

皇皇上帝 51

古代的上天思想 / “皇帝”的称号 / 秦以水德克周之火德 / 三十六郡之谜与帝国的扩张

度量衡、车轨、文字的统一 ……59
谷物计量与武器的制造标准 / 道路交通网的建设与统一车轨 / 习字与撰写文书 / 秦朝的领土面积 / 在征服地的扬威之旅

什么是泰山封禅……68
被歼灭者 / 祭天——祭祀的继承 / 封祭与帝国不灭宣言

对外战争——与新天下的遭遇……73
与蛮夷的战争 / 贸然对匈奴、百越南北同时开战 / 多难的百越征服战 / 河南（鄂尔多斯）与南海三郡 / 战时体制的土木工程 / 巨大的首都与阿房宫

焚书坑儒与不死仙药 ……83
丞相李斯的措施 / 对诸生反体制批判的镇压 / 方士与秦始皇 / 最后的巡行 / 单一法制的天下统治 / 秦始皇的末期

秦始皇的地下帝国 ……91
水银江河、人鱼膏烛台 / 已探明的地宫内部构造 / 天下的军队 / 士兵俑、文官俑显示出的秦帝国拓展

第三章　秦楚汉的三国志　101

陈胜、吴广之乱……101
秦楚汉更迭的历史 /《楚汉春秋》：动乱时期的史料 / 重评历史的珍贵史料 / 六个月的农民起义 / 老百姓缔造国家 / 二世皇帝胡亥 / 叛乱的扩大与评价

秦帝国的灭亡 ……112
继承楚名将血统的项梁 / 项羽的崛起 / 刘邦其人 / 沛公刘邦的叛乱 / 刘邦集团的成员 / 赵高专权与二世之死

楚汉战争 121

项羽与刘邦的对峙 / 鸿门之宴 / 火烧秦都咸阳

西楚霸王项羽 125

十八王联合国体制 / 韩信“争权天下”的劝导 / 逐鹿中原 / 停战协议的制订

楚国崩溃 132

垓下之战 / 虞美人之歌 / 交错纷乱的楚军汉军 / 项羽之死 / 项羽之评价

第四章　刘氏王朝的诞生　141

刘邦的汉帝国 141

《二年律令》的发现 / 汉皇帝的即位 / 强化中央权力的大清洗 / 辅佐皇帝的官僚与诸王 / 封爵之誓 / 诸侯王的叛乱

汉王朝的首都圈建设与法制体系 150

再开发之后的关中据点 / 选择洛阳还是长安 / 汉长安城遗址 / 东亚世界法律的源流 / 始皇帝的严惩主义与刘邦的简约主义 / 模糊的秦律、汉律终有搞清楚的一天

对匈奴外交与高祖之死 161

冒顿单于的权力篡夺 / 神秘人物刘敬的提议 / 高祖刘邦最后的日子

吕太后政权 168

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 / 吕雉与刘邦 / 残虐戚夫人的复仇 / 外戚吕氏的时代 / “皇后之玺”的真伪 / 对吕太后评价的动摇 / 长沙国与南越国 / 长沙马王堆汉墓带来的震撼 / 俨然古代的图书馆与美术馆 / 活跃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越国 / 秦汉与越的文化并存

文帝的时代 182

由代国王成为汉帝国皇帝 / 文帝即位的舞台 / 后世评价颇高的文帝仁政 / 废除凄惨肉刑 / 赐男女爵位与酒宴 / 已经探明爵制的实际与效果

从文帝到景帝 191

中国古代酒类面面观 / 酒宴与肉食的规定 / 不筑坟不损山川 / 吴楚七国之乱 / 梁孝王刘武的奋战 / 周勃、亚夫父子兵马俑

第五章　武帝的时期 I　203

武帝与司马迁 203

武帝生母王夫人与栗姬 / 由十四个皇子中选出的武帝 / 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 / 武帝在位年号 /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 司马谈的忧愤而终 / 司马迁的生卒年 / 二十岁时开阔眼界的旅行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 216

元光三年黄河溃决 / 武帝求河神保佑诗二篇 / 李陵之祸降临 / 李陵之降匈奴 / 宫刑之屈辱

追求神仙世界的古代帝王 225

尊重秦始皇的汉武帝 / 显现神仙岛的离宫 / 秦皇汉武两位相似的古代帝王

武帝时期的历法与审判 231

依照太阳运行的生活节奏 / 太阳与月亮两种周期 / 在正月过新年的新历法 / 酷吏张汤与新出土的汉简文书 / 武帝时期的审判程序

第六章　武帝的时期Ⅱ　241

进入西域与匈奴战争 ……241

丝绸之路 / 与月氏同盟讨伐匈奴 / 从和亲到抗争的汉匈外交 / 与匈奴作战之主角卫青、霍去病 / 张骞带回的乌孙天马

武帝的对外战略 ……250

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 南越王国的灭亡 / 西南夷的世界 / 夜郎隶属于汉、册封滇王 / 西南夷诸部族的生活与风俗 / 出征朝鲜军队的混乱 / 朝鲜半岛的统治据点乐浪郡 / 大宛的汗血马 / 为夺取天马的战争

儒教的时代 ……265

罕见的思想家、孔子引起的共鸣 / 广博的思想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 救助农民、富强国家的政策性建议 / 淮南王与衡山王的谋反事件 / 借儒家之学讽刺武帝

武帝时代的经济与开发 ……273

支撑汉代财政的货币 / 汉代官吏的薪俸 / 稳定国家财政之策 / 盐铁专卖使国家获得巨大利益 / 铁制农具促使生产力飞越发展 / 建造白渠消除盐害 / 武帝时期的关中开发 / 武帝时代的结束 /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第七章　从后宫之窗见到的帝国行踪　289

汉帝国的中枢与后宫 ……289

从《史记》到《汉书》/ 忍受屈辱的李陵　贯彻信义的苏武 / 少年皇帝与霍光政权 /《盐铁论》与专卖制的废止 / 后宫的等级社会 / 后宫与内朝的宫殿配置 / 汉帝国中枢之中央官厅的构成

中国古代的女性.....301

从后宫观察西汉五十年政治中的女性 / 法律优先的夫妇之义 / 成帝猝死之谜 / 世代传颂的王昭君故事 / 历代女性的化妆 / 制服暴龙

从沉睡中苏醒的古代木简.....311

敦煌汉简的记录 / 绿洲国家的生活方式 / 纸未发明以前的书籍 / 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 执掌地方政治的循吏与酷吏

出土文书所述.....320

东海郡的地方行政 / 僮约：奴隶买卖契约 /《汉书·地理志》的宏观世界 / 逐渐清晰的汉帝国全貌 / 西汉十一代皇帝陵 /《汉书·游侠传》的豪杰 / 长安城周边丰饶的自然环境

王莽篡夺汉王朝.....332

意欲保汉的王政君 / 王莽当“假皇帝”的策略 / 西汉至新禅让的闹剧 / 传国之玺：正统继承者的证明 / 秦始皇、武帝与王莽的共同点

新的政治、经济、外交.....340

向往周代政治制度的复古 / 温柔与残忍 / 理想主义的经济政策 / 权威的确认与象征性货币改革 / 儒教主义华夷秩序的开始 / 对王莽新王朝的评价 / 黄河决口时为保坟墓而牺牲民众 / 周边各民族的背叛、造反与政权的崩溃

第八章　民众的世纪　353

记载王朝兴亡的史书.....353

将两个汉朝相互区别的记述 / 地方社会特征形成的时代 /《后汉书》的编纂 / 兴亡全史的陆续编纂 /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王莽政权的灭亡.....360

女首领吕母发动的叛乱 / 赤眉之乱的爆发 / 上将军隗嚣的反莽叛乱 / 蜀王公孙述的自立 / 博识文人扬雄的《蜀王本纪》/ 南阳刘氏的举兵 / 光武帝即位的告天仪式

光武帝刘秀的统治.....371

汉王室的中兴 / 奴婢解放与行政大改革 / 东汉王朝迁都洛阳 / 洛阳城发掘调查的记录 / 服役刑徒之墓

金印与光武帝以后.....378

赐倭之奴国王的蛇纽金印 / 赐金印之光武帝一方的形势 / 光武帝之死与明帝的即位 / 安定的明帝时期 / 白虎观会议对《五经》解释的讨论

匈奴与经营西域.....385

与南匈奴的关系 / 北匈奴的毁灭 / 反映对匈边防最前线生活的史料 / 玉门关与阳关：西域外交的门户 / 西域诸国的动向 / 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

王充的科学批判精神.....394

谶纬思想——东汉儒教的特征 / 批判儒教神秘主义的《论衡》/ 印度佛教的传来 / 备受关注的东汉佛教遗址

第九章　自然灾害与内乱的世纪　401

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401

侵袭人类生活的大自然 / 水害、旱灾频仍 / 蝗虫的异常发生 / 疫病的流行与医学 / 名医张仲景与华佗 / 张衡的地震仪 / 顺帝时期的凉州地震 / 人口流动与一年一度的户口调查 / 人口的过疏化与过密化

官吏、字典与数学 412

九千字的读写能力 / 官僚实务、儒者素养所必需的算术 / 从丝绸帛书到纸

东汉对西方的外交与罗马的使节 418

班超、班勇与西域的统治 / 游牧骑马民族、西藏山岳民族、绿洲都市国家 / 西境的羌族叛乱 / 倭国王帅升的朝贡使节 / 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敦 / 罗马皇帝派遣使节至洛阳 / 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国 / 汉与罗马交流的丝绸与玻璃

儒教与道教 429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 / 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 应对自然灾害、政治混乱所需的儒教德治 / 道教的创立时期

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436

阉人外戚时期 / 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 / 宦官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势力的抬头 / “河水清”之东汉帝国崩溃征兆 / 党人与宦官的一大抗争 / 从宗教集团到反政府集团 / 黄巾之乱——宣告东汉王朝的灭亡 / 五斗米道宗教集团 / 屈服于曹操的宗教王国

豪族与乡里社会 448

作为支撑王朝阶层的豪族 / 豪族的地域性与阶层性 / 一县平均三乡、一乡十里构成的地方行政组织 / 新出史料中东汉乡里的农民生活 / 墓室壁画所描绘的豪族庄园 / 以此为中世前史的观点

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 457

酷似西汉末的政权交替 / 魏王曹丕所受皇帝玺绶

结　语　秦汉四百四十年的各位始皇帝 460
四百四十年的这个年代 / 争当始皇帝

附　录 463

译注 …… 467
主要人物略传 …… 473
历史关键词解说 …… 479
参考文献 …… 487
历史年表 …… 509

前言

超越《史记》、《汉书》

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里耶秦简

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能如此精彩地为这部秦汉史著作开篇，实在是笔者始料未及的。湖南省湘西地区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代简牍。中国的报纸迅速地以诸如“改写秦史”、“二十一世纪最重大发现”一类赞誉之辞予以报道。且不说此事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至少它已入选了2002年中国重大发现之一。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一千一百余枚竹简文书的发现已是振聋发聩，时隔二十七年的2002年6月，不能不说有了更大的发现。

简牍即木札，上面书写有数十万的文字。里耶简牍不仅与兵马俑的价值不同，而且在数量上是睡虎地秦简的三十六倍。可以说发现了足够一部书分量的、重要的、秦代当时的文字史料。

1 里耶古城发掘现场　2002 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的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支秦代简牍。被誉为胜过 1974 年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发现”（《文物天地》2003 年 5 月）

这二十几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离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史料是无法撰写的，仅仅依靠作为基本史料的司马迁的《史记》显然已经很不够了。同样，今后撰述秦汉史时，作为史料的里耶秦简亦绝非可有可无。里耶秦简发现后仅仅半年，《文物》2003 年第一期就异常迅速地登出了《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虽然所刊载的仅仅是部分秦简，但文章根据大量彩色图版对简牍进行了介绍。因此，本书也只是就目前公布的文书内容所进行的写作。中国古代史就是这样，既有趣又艰深。

无论如何，还是先从介绍里耶秦简的概况开始吧。龙山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毗邻以奇岩石林风景而闻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原。在远古沉积于海中的石灰岩隆出海面，受到侵蚀之后最终形成了张家界、武陵原这种喀斯特地貌。由此再往西就是坐落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土家族是人口不过八百零二万（2000 年）的少数民族，自称“毕兹卡”，意思是“土著”，汉译为“土家”。苗族有人口八百九十四万（2000 年），在古代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于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土了秦代文书，可谓意义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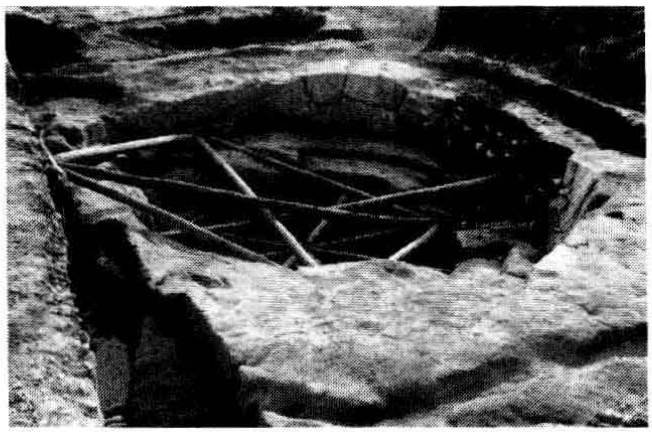
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里耶新发现的简牍可以证明四、五世纪以隐逸诗人著称的陶渊明（又名潜，365—427）所描述的桃源乡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其真实历史背景的。

《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东晋太元（376—396）年间的故事。说一日，武陵渔人乘舟进入一片盛开的桃花林后，弃舟穿过洞穴，到达一个奇异的村庄。这里的村民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祸乱，率妻儿乡人至此与世隔绝的境地，再未出去，于是与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总之，"从前，在秦末战乱中，有家族、村民一同入此边境，那以后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们向渔人询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他们甚至不知由秦至汉、从魏而晋的变化。受到酒菜热情款待的渔人希望再次来访，沿来路返回时一路上处处做了标记。但是，当郡太守闻及此事，遣人寻找所做标记时，却未能再次成行。

陶渊明最后赋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嬴氏即指秦始皇嬴政，由于他搅乱了天的秩序，贤人便纷纷避世隐居。秦末的夏黄公和绮里季等人隐居商山，同样桃源乡的那些人也隐居避世。他们初进山时的踪迹已经湮没，道路也已废弃荒芜了。

这一传说历来被认为是陶渊明虚构的乌托邦。毕竟秦末的战乱云云，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都已是遥远的世界。但是，至少由此可以证明秦的势力的确延伸到了这一带的边境。



2 里耶古城一号井 这里发现了“改写秦史”的大量简牍(《文物天地》2003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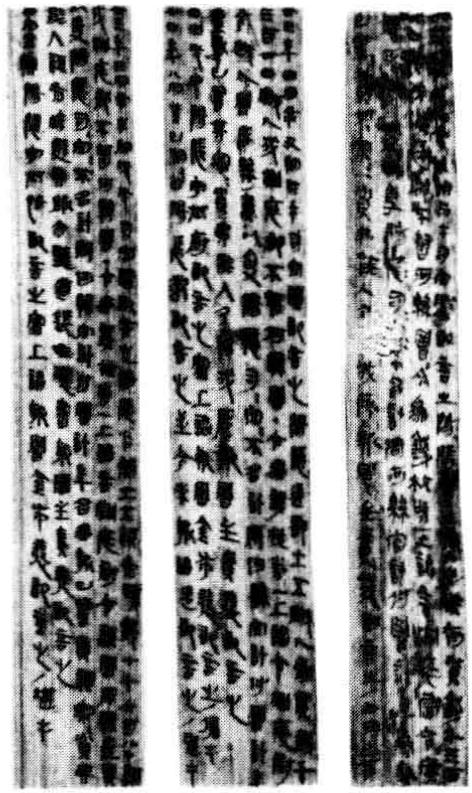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认为桃花源实际并不存在于秦代、不过是假托秦朝言后代之事的观点也是根深蒂固的。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认为,《桃花源记》所云“秦”指的是南朝宋之刘裕时期。然而,此次里耶秦简的发现,却揭示了作为理想之乡传说背景的历史真实性。秦人确实进入过此地的史实,从此有了确凿的证据。

有观点认为《桃花源记》的渔人是从沅水乘舟溯流而上的,从里耶秦简来看,秦人也是从洞庭湖先由沅水溯流而上,再沿酉水上溯,在上游建立了迁陵县。简牍内容就是这个比桃源乡所在地更加偏僻的迁陵县使用的文书,而且仅就其是秦始皇时期的文书而言,这个小地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发生过什么的谜团也终于得以揭晓了。

认为桃花源的村民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原避世于此的观点,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果说秦朝对这里的统治仅限于沿河小盆地一些据点的话,倒不妨认为他们是从这里逃亡,而后固守于山中洞穴的。对于他们来说,由秦转变为汉是闻所未闻的异空间之事。

史料相继出土
超越《史记》、《汉书》

多数世纪性大发现带有偶然性。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偶然挖出奇怪俑头得以发现的。里耶秦简的简牍本来也是埋在一口古井里，由于暴雨造成泥石流才被发现的。然而，秦人究竟为何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呢？最新的考古发现不但为一直被认为纯属虚构的《桃花源记》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重大疑问。



3 里耶秦简 简文所见“三十三年”即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是记录罪犯服劳役刑的账簿（《文物》2003年第一期）

司马迁虽然在秦始皇去世一个世纪后，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这位第一帝的纪年事迹，但他的记录毕竟是根据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中央朝廷所藏史料进行人为取舍的作品，里耶秦简的大批公文则可以说是秦始皇当时的、未经任何人为编纂的史料。重新认识第一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秋，又迎来了另一大发现。湖南长沙市一眼古井出土了汉武帝前期的简牍一万余枚。发掘地点距1996年十四万枚三国吴简的出土地不过百米。长沙走马楼吴简才仅仅整理出一部分，又出土了大量的走马楼汉简。与秦始皇时代的里耶秦简一样，

这也是一批废弃于古井的汉武帝时代的公文。

这些出土史料的内容虽然尚未整理、公布，但是可以说武帝时代也有了超越《史记》、《汉书》的出土史料，它揭示了一个依据出土史料从事研究的时代的到来。显然，对秦汉时代历史的认识，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形成多民族秦汉帝国的四百年

1999 年，北京石景山老山地区发生了西汉诸侯王墓的大规模盗掘事件。墓中发现一具女性人骨，专家分析认为是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可能是诸侯王的王妃。2001 年据该人骨复原的人物面部，有观点认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吉克人相似。她可能是刘姓皇族诸侯王从西域迎娶的胡女王妃。塔吉克族属印欧语系民族。然而，这一结论引起了争议。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头盖骨做了 3D 技术的头部复原。结论是该女子为典型的古代中原地区汉代人物（《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2003 年第十六期，2 月 28 日）。认为墓主是塔吉克人的观点遭到否定。

最近，生命科学有着惊人的发展。根据遗传基因信息可以对人类进行分类。人的所有细胞都含有线粒体，其中细胞核的染色体组 DNA 有三十亿个符号是独立繁殖的，而且仅从母亲那里才能继承的有约一万六千个符号的小型 DNA。近年人类学家分析了世界各地民族的线粒体 DNA 的盐基排序，正在绘制各民族 DNA 的近似表。据说，现代人类诞生于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在

那里多样分化之后，约十万年前其中一支向印欧大陆扩展，欧洲、亚洲人的祖先由此诞生。

4 老山西汉墓复原女性像
墓主可能是西汉燕王王妃，关于她的民族出身问题引起了讨论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分析了山东省临淄西汉遗址出土的五十八具人骨，和东周时期九十二具人骨的线粒体。最终探明了在秦统一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齐民族的情况。当他们将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两千年前西汉末的山东人，以及现代山东人的身体特征进行比较时，得出了意外的结论。即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现代山东人与东亚的日本人、韩国人相近（参见多贺谷昭《根据容貌探求日本人起源》，载于《日本人的久远之旅1》，NHK出版，2001年；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渡来系统弥生人的大陆寻根——与山东省合作研究的报告》，2000年）。

我们常常将中国的世界与那里具有漫长历史之汉民族的历史，以“传统”一词予以固定化的认识。然而，不容忘怀的是：悠久的中国史其实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且经过不断的质的变化才得以形成的。秦汉二王朝的建立者，就分别出自西方和东方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秦，早在始皇帝的六百年之前，就由于其

祖先非子为周朝牧马有功而得到封地。即位于甘肃省东端的清水县、秦安县附近，黄河支流渭水上游的黄土高原之地。而汉朝则来自于刘邦受封的小国，其国都位于陕西省南端，汉水上游的汉中县附近。进一步说，本来的刘邦集团，来自于刘邦的故乡，江苏省西北部的沛县、丰县的地方势力。位于广义的黄河下游东方平原。

小秦、小汉，兼并其他各国而统治天下，创造了大秦、大汉。以如此方式将庞大国家改朝换代的事情毕竟史无前例，我们称之为帝国。或曰秦帝国、汉帝国，或曰秦汉帝国。秦、汉大国形成之前，小秦、小汉是如何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最终壮大秦人、汉人集团的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四百余年的历史！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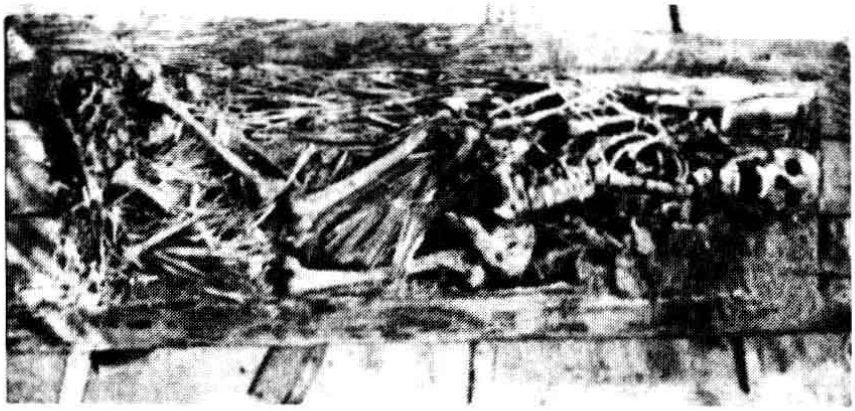
始皇帝的诞生

暗杀秦始皇未遂事件

地方官吏眼中的秦始皇

秦始皇于公元前259年正月，作为秦王子出生于赵国的邯郸。是他结束了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五十年的人生之中，他做了二十五年战国时期秦国的王子，后半生的十二年又以皇帝君临统一的秦帝国。他死于前210年，一个世纪之后，他的事迹被司马迁载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以残存的史书《秦记》的年代记为基础，同时汇集地方上流传的掌故，以及古迹中存留的石刻记录等撰写而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可以通过那些对秦之后的汉代一无所知、生活在秦始皇时期的地方官吏的眼睛审视



5 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　从头到脚陪葬有竹简文书，脚下还有毛笔。头下放置着《编年记》(《云梦睡虎地秦墓》)

这位历史人物了。他们作为秦国的官吏，在地方支撑着秦的政治，又亲身经历了秦统一中国那种改变了其后两千两百年中国历史的动荡时代。他们是《史记》中没有留下名字、埋葬于地下的那些官吏。

为我们保存了云梦秦简的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南郡管辖下的县级官吏，他没有留下姓，我们只知道他叫“喜”。他生于前 262 年，死于始皇三十年的前 217 年。从秦始皇前 246 年即位秦王，直至前 221 年统一中国，在此期间“喜”一直是一位地方官吏。

龙岗秦简出土地云梦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的确是一位县的官吏。“喜”死于秦始皇去世之前，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却亲眼见证了秦始皇的死。

里耶秦简并非出自个人墓葬，是在古井中发现的废弃物，多是些县级官吏书写的文件。在秦始皇统一的时代，是这些官吏在地方上担负着平凡的行政工作。

《史记》列传中围绕秦始皇记载了许多知名人物，像吕不韦、嫪毐、韩非、荆轲、李斯、蒙恬、赵高、徐福、卢生都是历史上的名人。《史记》中刻画的这些人物群像，的确扮演了极富戏剧性的历史角色。与此有所不同，地方官吏留给我们的文字史料虽说并不生动，但仅就其直接面对民众一点，却能使人感受到民众的气息。以秦始皇为主角的中央政治正剧当然也很有趣，不过增加一种地方官吏的视角去观察的话，无疑可以使我们对秦始皇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那毕竟是司马迁也未能涉及的历史记述。

暗杀秦始皇

秦始皇虽是已作古两千二百年的历史人物，但可以说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活到今天。即便在“文革”期间，孔子受到批判的时候，秦始皇仍受到赞扬。毛泽东赋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拥护秦始皇的观点再度活跃。秦始皇究竟是暴君，还是干才君主的争论自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了。

秦始皇是个充满传说色彩的人物，之所以后代产生各式各样脱离史实的演义，是由于他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统一王朝的皇帝至少就有九十八人之多）、建立了统一帝国。但同时这个由西方秦国征服东方六国而诞生的统一帝国，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又被东方势力最终击溃，于是有了暴君与干才君主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然而，传说很难与史实判然划清界限。司马迁自己对于

6 筑　全长 117 厘米，宽 11 厘米。有五根弦，演奏时左手握柄部调节音阶，右手持竹拨子叩打（《湖南考古漫步》）

传说与史实就未能作出自觉的区别。

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在各地树立了赞颂自己的刻石。其中为我们留下了统一战争的回忆，碑文上说："六国之王，虐杀人民……"秦对东方六国，即韩、赵、魏中原三国，以及燕、齐、楚三国发动的战争，从秦国的立场上看是正义的统一战争。但是作为败北的六国，当然认为是秦征服六国战争。被侵略一方的史书随着秦始皇焚书令的实施已经荡然无存，但毕竟还有这样一个事件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

秦始皇的在位期间可分为：十三岁开始的二十五年间秦王时期和最后十二年的皇帝时期。在秦王时期，发生了北方燕国敌对势力对他的暗杀未遂事件。对此事件秦国的历史上仅留有简单的记载：

> 秦王政（即秦始皇）二十年（前 227），燕太子丹唯恐秦军来袭，遣荆轲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此事，杀荆轲，令王翦、辛胜二人攻燕。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被秦歼灭的各国的《世家》中对此都予以了非常冷静地记述。但是，那些记载与其说是叙述暗杀事件的真相，不如说是讲暗杀未遂是如何为秦王攻燕提

供了借口。战争也要求有正当的理由。在战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舆论认为秦迎进了刺客，从结果来看，为的是要惩处背后阴谋的策划者。

刺客荆轲：
风萧萧兮易水寒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奉命执行暗杀的决行一幕，有着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奉太子丹之命后，荆轲将樊於期将军的项上人头和富庶之地督亢的地图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带上秦舞阳出发赴秦。易水岸边送别时，荆轲合着筑的节奏，唱出了那首后人广为流传的诗歌。全体人员白衣素裹为他送行，来到易水边，祭祀道祖神，高渐离为他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起悲歌，送行者无不为之潸然泪下。荆轲又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词的四字句与三字句之间以“兮”衔接，这个“兮”不可忽视，它起着调节呼吸、音调，渲染感情的作用。送行者无不感慨，怒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而去，终无反顾。据说旅行者出发时如果反顾的话，行程中将会发生不吉之事。

为荆轲的短歌更进一步烘托悲情的是筑的伴奏。筑虽是一种弦乐器，但既不用弓拉，也不用指甲弹，而是用拨子击打发音的乐器。是一种便于户外携带的小型乐器。筑在宋代以后既已消

7 筑的演奏　左边的人物右手持拨子演奏筑，中间的人物看上去正在和着乐曲起舞（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 年）

失，自从湖南省长沙王后墓出土了筑的实物之后，其形状才重新得以确认。这种乐器的有五根弦，器身仅仅长 117 厘米，宽 11 厘米，厚 6 厘米。有着像吉他似的柄，左手握柄部调节音阶，右手持竹拨子叩打。江苏省连云港侍其繇墓还出土了击筑歌舞图。

在中国不仅有以弓拉弦，有以指甲弹弦的乐器，还有用棒击弦的乐器。这种乐器称为打弦乐器或击弦乐器，流传至今的有从西方传来的扬琴。古代的筑也是这样的乐器。指拨子可以凌厉地瞬间叩击，较后来的弓弦乐器来说，这种乐器的干脆音色，也许更加余韵悠长。“兮”的歌声与筑的音色交融一体，与荆轲的心境形成完美的共鸣，触动着人们的心弦。

史书与画像石的不同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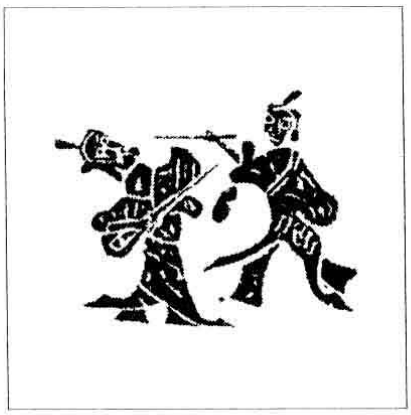
荆轲一行到达咸阳，袭击秦王的情节也随之进入了高潮。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是一种死者祭庙墙壁的石刻。画像石上的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是一种将时间凝固的描绘。让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述的这一场景：

8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描绘了向企图逃脱的秦王政投出匕首的荆轲和伏地颤抖的秦舞阳（山东省武氏祠石室画像石，《石索》）

秦王迎荆轲入咸阳宫，荆轲手持樊於期的人头函，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一到秦王面前秦舞阳恐惧地颤抖起来，群臣颇感怪异。画像石右下方匍匐于地的那人，描绘的就是当时的秦舞阳。荆轲回头笑笑，道歉说："北方蛮夷之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如此。"秦王说："送上地图来！"荆轲奉上地图，秦王展图之最末端时，一把匕首出现在眼前。荆轲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去。匕首并未刺中身体，秦王惊愕立起，衣袖被撕下。所以画像石中间有一截袖子悬在空中。秦王欲拔剑，仓皇之间，利剑无法立即拔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柱而逃。画像的柱子左右，一边是撇下鞋子逃生中的秦王，一边是怒发倒竖的荆轲。

群臣在此紧迫情况下，失去了冷静。按照秦法，即便服侍左右的群臣在殿上也不得携带武器。此时，御前侍医夏无且将手中的药囊掷向荆轲，秦王趁此得以将剑推至背后并拔出，以剑击荆轲。荆轲将匕首投出，却击中柱子。画像石中间的画面描绘了这一瞬间。荆轲最终为左右所杀。

这里，《史记》所载内容与画像石的场景有三处明显的不同：



9 荆轲　画像石描绘了突袭秦王嬴政（左）的荆轲（《南阳汉代画像石》）

第一，画像石中的秦王并没有持剑击伤荆轲，而是用身上所佩玉环正要投向荆轲；这一动作从画像石右侧的秦王右手明显可以看出。第二，秦王左右人等并未被禁止携带武器，画像石左、右两端的士兵都手持武器。第三，作为救急的重要人物侍医夏无且并未在画像石中出场。

史实随着史料的不同而变动

民间关于这起暗杀事件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司马迁的记载与画像石描述的内容应该做不同的解释。以荆轲刺秦王为题材的画像石在各地多有发现，反映了各地的不同传说。历史就是这样，可以从同一个事实剥离开来，在人们的心中得以不断地扩展。这就是历史之所以又是历史剧的缘由。但是，正是由于戏剧性的强烈感染力，所以有必要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后人演绎。虽说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

侍医夏无且曾因营救秦始皇受到赞美，而且一直活到了汉代。司马迁将画像石中所绘民间流传的荆轲故事，和夏无且营救秦始皇一事都收入了《刺客列传》。历史素材中各种出发点不同的史料错综复杂。是谁记述了原始史料，是谁讲述了那些事情，编辑那些原始史料的人又有着怎样的立场呢？可以说，悼念荆轲、从荆轲的角度讲述暗杀秦王事件的是那些被秦国歼灭的六国人。历史记

载中说秦利用这一事件最终灭亡了六国。于是，汉代司马迁既结合新史料描述了秦的统一战争，又以赞颂的口吻将荆轲收入列传。

这种冷静的态度贯穿了整部《史记》，以原始史料讲述事件和人物。同一个事件，如果史料有差异，会出现不同的立场，有时甚至出现了矛盾，也并不加以修正。由此可见，《史记》的文章并非创作，书中虽未一一注明出处，但是作为史料的确是原始材料。

一名地方官吏与始皇帝的相遇

公元前227年，即刺秦王未遂事件那年，一位名叫“喜”的秦南郡地方官吏整三十六岁。他已经失去了父亲，这一年七月甲寅日母亲也去世了。同年，发生在秦咸阳宫的荆轲刺秦王行刺事件具体在哪月、哪日虽然史无记载，但是这年四月二日，秦南郡郡守向所属各县发出了一篇治安文告却有据可查。这份叫做《语书》的文告写在十四支竹简文书上，作为随葬品发现于喜的墓葬中。秦占领了南方楚国领域之后，虽然在那里设置了郡，但并未能对那里实行完全的统治。《语书》的发布如果是在荆轲事件之后的话，在那种就连秦王自身性命都受到威胁的紧张的国际关系下，为了防止被占领地的叛乱，《语书》可以说这是一份旨在强化秦统治力量的文告。

当时，作为地方官吏的喜对于比自己小三岁的三十三岁的秦王，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呢？很可惜我们没有发现能够反映他个人心情方面的文书。不过，喜死的时候，他的墓中陪葬有墓主人作

为地方官吏相关的法律文书竹简。同时还陪葬了一部长达五十枚竹简的《编年记》，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

《编年记》是一种记载墓主人身世的履历书，魏晋时期以后叫做墓志，将死者的经历刻在石头上埋葬于墓中。秦代尚无那样的做法，而是像今天我们写履历书那样，把个人经历按照年号记载竹简上。《编年记》的年号是喜所属秦国的年号，是结合秦国大事所做的记录。其中记载说："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所谓"四十五年"是指秦始皇曾祖父昭王四十五年，即公元前 262 年。秦王政在此后三年的昭王四十八年（前 259），出生于赵国的首都邯郸。喜的出生时刻，在《编年记》中是在记录了秦国攻战大（太）行、野王两地之后的十二月甲午，鸡鸣之时，即凌晨两点。关于秦王政的出生时间，史书上记载曰："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一名官吏却也留下了出生的具体时刻。以不久后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皇帝的人物与一名地方官吏做这样的对比，也是一件趣事。

喜并不是中央派往地方相当于郡县长官或次官等级的长吏，而是出生于地方、在当地被录用的地方官吏。他的职称或叫做"史"，或称为"掾史"。十七岁时他作为成年男子登记了户籍，十九岁那年当上了县史。做这一工作必须能够阅读、书写文字。喜还当过县令史，二十八岁当上了鄢县的狱吏。狱吏的职务仅仅能够读写文字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处理犯罪案件，通晓法律和案例，还必须具有撰述报告书、判决书的能力。

喜在二十九岁那年，即公元前234年曾经从军打仗。从这位地方官吏的生活不难体察到当时战争的紧迫形势。前232年他参加了平阳之战。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秦始皇巡行各地时，喜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秦始皇。本书后面还要提到项羽见到秦始皇的情景，就喜而言，竹简在记述前219年事时写道“今，过安陆”。就是说，作为地方官吏必须保障秦始皇一行在出巡中的安全和道路通畅。所以在迎接皇帝一行时，他自己记述说“现在，皇帝从我眼前通过”。当时四十四岁的喜也许已经不再是地方官吏了。作为生活于秦王时代的喜，我们可以从他见到秦始皇的记述中见到感激的味道。毕竟与项羽所言“我将取而代之”的语气有所不同。喜言及统一后的秦朝虽然仅有一句话、并没有流露出感情色彩，但在“今，过安陆”这仅仅四个字的原文中，还是传递出一种为秦朝供职的欣慰。

与出土史料的淡淡表述有所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第二次出巡的记载可谓丰富多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是分立的，意在将秦王政以及秦始皇的时期与他之前的秦国相互区分。喜的《编年记》却不是这种结构，而是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开始记述到昭王五十六年，而后是孝文王的一年、庄襄王的三年，之后是“今元年（即今上元年）”直至三十年。年表中记述了九十年之间近一个世纪的大事。其中超过半个世纪的五十六年的昭王时期是最值得注意的。秦王政和喜出生的时代，正是秦为成为秦帝国而努力奋斗的时期。

战国秦昭王时期

拉开帝国时代的大幕

昭王亦称昭襄王，因为周朝第四代王也叫昭王，所以称昭襄王为的是便于区别。这里是根据出土史料而称“昭王”的。昭王十九岁那年就即位秦王了。讲述秦汉时期的历史，是无法忽视战国时期昭王治世那五十六年的。秦始皇的治世也只不过三十七年，所以超过半个世纪的确是很长的时间了，可以与汉武帝匹敌。秦昭王时期国家的领土跨越了国境，不断向东扩大。在早于秦始皇出生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帝国，并于公元前 288 年称帝，仅仅两个月就成为与称“东帝”的齐湣王齐名的“西帝”。

在秦始皇之前的这次称帝，不愧为后世之先驱。在皇帝称号诞生之前，已经有此用“帝”号代替“王”号以谋求权威之举。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于惠文王时已经占领了灭亡的蜀国地方（现在的四川省成都平原）。

昭王时期曾经有过大规模杀戮的战争，如斩首两万（楚）、斩首二十四万（韩、魏）、斩首四万（魏）、斩首十五万（魏）、斩首五万（韩），公元前 260 年秦白起攻陷长平时屠杀四十五万人。当时的战争十分惨烈。《白起列传》中记述了那种场面：

秦动员了十五岁以上的所有人员，集结于长平包围了赵国的军队。长达四十六天的包围造成赵军断粮，以致出现人吃人的

10 长平之战遗址　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惨烈。山西省高平市永禄村发现十多个人骨坑，埋葬着一百三十多具二十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尸骨

情况。赵将军赵括被射杀。赵军败降，白起设计活埋了俘虏，仅将二百四十名儿童遣返赵国。秦军亦死者过半，受到重创。

此后，秦继而与韩军作战，斩首四万，并于公元前255年灭周。据统计，东方各国在战争中有近千万人牺牲。秦在东方的占领地设立了河东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以实现统治。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歼灭六国，只是削减与秦国相邻之楚、韩、魏诸国的领地，以便对其实行统治。郡的设置本是为统治占领地所设的据点。

以“问鼎”故事而闻名、作为周天子的象征的九鼎（即由九州收集来的铜鼎，或曰九尊铜鼎），据说也是在此时归于昭王之手的。天下宾客云集而来，昭王时期的秦国一度拥有了君临天下之“帝”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卷末的论赞中，称颂穰侯，即昭王母亲宣太后之弟魏冉的功绩说：秦所以能扩展东方领地，削弱诸侯势力，称帝于天下，使天下人皆向西方叩首，实在是穰侯之功。

所谓“天下”的概念

此“称帝于天下”一语，意味深长。有国境的领域为国，君临国者为王。昭王本来

即位时只是秦国国王。战国时期，王国并列。超越王国之外就是国际世界了，由此出现了天下的概念。当时还没有由一人之手统治天下的意识，但已经出现了超越国境，取得支配诸侯的霸权行为。昭王与齐王二分天下，就是这种的行为。不过，《史记·秦本纪》中有关昭王年代的记载，只是简单地罗列了打胜仗的记录。读者无法从中看到任何戏剧性情节。见不到昭王本人的面孔，只有周围的那些人物。大约能看到辅佐年轻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存在。《史记》用“自治”、“专制”这样的字眼形容她的执政。使人觉得这位女性是既像秦始皇的母后，又像惠帝时吕后的政治榜样。

昭王对领土的扩张，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古代的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史记·秦本纪》之外不仅有对外征战的记载，同时还散见有记述昭王内政的内容。而司马迁只强调了其对外征伐的一面，并没有全面地描述昭王的时代。蜀地郡守李冰实行的岷江治水灌溉，商鞅变法实施的阡陌制，推行耕地按东西（阡）南北（陌）田间道路规划的田制。还有抗击北方匈奴，从陇西至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也是在昭王的时代。秦始皇的政治的原型，即来自对昭王政治的认同。昭王死后葬于芷阳。芷阳即始皇所葬骊山的西麓。昭王生前亲自将自己的墓地选在芷阳，太子和宣太后也分别葬于此。被称为东陵的秦的王族墓葬区，在1986年经过了发掘调查，发现了一些亚字形墓穴和墓室四边都有墓道的大型墓。其中一处无疑是昭王的陵墓。秦始皇的父母也葬于此。始皇在即位之时也依照传统，将东陵的东侧选定为自己的墓地。

昭王那种帝国主义政策的欠账，一直延续至其曾孙秦始皇死后。遭受昭王进攻的楚国、赵国，举国上下对秦的仇恨，可谓代代相传。比起昭王时期的周秦革命，司马迁更重视结束了战国时代的秦始皇之统一大业。从昭王至秦王政，再到秦始皇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在喜的《编年记》有所记载。《编年记》是从昭王元年开始，一直记录到始皇三十年为止的。

秦王政与吕不韦

在公元前251年至前247年的短短五年中，秦国王室连遭不幸。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庄王）相继去世。当时，喜还是孩子，尚未任职；即便那时他出任官职，也不过是地方官吏，不可能了解中央发生的那些非常事件的真相。据《编年记》记载："五十六年后（闰）九月，昭（王）死。""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庄王元年"，"庄王三年，庄王死"，还有"今元年"等等竹简记事的排列。七十五岁的昭王之死，虽说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但是孝文王即位三天猝死，"立即死"短短三字所包含的意思，当时其他国家或秦各地的人们，即便不了解事实，也会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能一下就理解其中的含义吗？孝文王在昭王长期在位期间年龄也在增长，他即位时已经五十三岁，所以也不排除有病死的可能。但是，如果考虑到特意将孝文王的墓地与昭王分开这一点的话，总是令人感到其中有着意在让庄襄王及早即位的谋略。

在此还要谈谈吕不韦这一人物，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

州市）的大商人。他是个行商，不论何种商品，只要低进高出即可。虽说只是行商又并非个体经营者，但看起来他拥有大规模的地域销售网络。他奔走于韩国首都阳翟和赵国首都邯郸之间，两地直线距离就有二百五十公里，从河南省中部直至河北省南端，往来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地区。

价格起伏是根据地域的差异以及时间的差别而产生的。战国时期不仅谷物、盐、铁，还有漆器、丝绸等无论什么都可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商人可以利用南北气候的差别，也可以利用人口密度不同的消费地域性差别。由此，吕不韦蓄积了千金财产。虽说千金之家不比王者之富，却可抵一都会之君。此时，他跨越国界选中了一位可作为投机对象的人物。就这样，商人的智慧被有效地应用于秦国的政治。

昭王的太子死后，次子安国君升为太子，成了昭王的后继者。而安国君的后继者的选择则比较困难。后继者并不一定要按照长幼序列选出，与其是否为嫡子相关。而国君正夫人的地位也未必一成不变。谁受宠谁就成为正夫人，正夫人的儿子就可能成为太子。安国君的正夫人华阳夫人虽受宠爱，但没有儿子。

在邯郸作为质子（人质）的子楚，是安国君的中男（次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子楚的母亲夏姬并不受宠。吕不韦见到子楚时说："此奇货可居！"意思是说，此物价值很高，当认真囤积。出于商人的经验，他即席计算出子楚的价值。囤积一定时间，商品可以增值。但此奇货就得投资千金财产。昭王的寿命、安国君即位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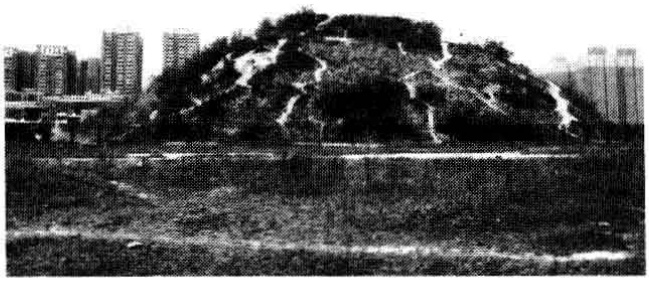
年龄、向华阳夫人的请求、子楚的不幸境遇等，一切情况和可能都在吕不韦的计算之中。就这样，作为“奇货”的结果，不仅是子楚，即便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的出生也包括其中。

子楚初次和与吕不韦同居的舞女会面，就对她就一见钟情。子楚不知此女实际是赵国的豪门之女，而且已身怀吕不韦之子。政出生之后，子楚就将她立为夫人。昭王的军队围攻邯郸时，政刚刚三岁，勉强与父母一起逃至秦军阵营。昭王死后，安国君即位为孝文王。按照约定，子楚当上太子。一切都在吕不韦的策划之中。

孝文王猝死，子楚即位，就是庄襄王。吕不韦当上相国（丞相），封为文信侯，得到洛阳十万户的领地。千金之商实际上成了一都会之君。此后，庄襄王在位三年而亡，十三岁的政成为秦王。即便当时的官吏也要等到十七岁方可任职，作为一国之君掌管国家政务实在过于年轻。母亲以太后之位支持他，吕不韦继续做相国。

嫪毐之乱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富有编制地域国家之间网络组织的才干。在他门下汇集的各国食客有三千人之多。其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集各种思想的大成之作。全书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共计二十余万字。其中以《十二纪》最为重要。《十二纪》是将一年十二个月按四季分类，再根据自然的循环对所有人事进行的记载。吕不韦虽说不上是缜密的谋略家，但他对于昭王之后的秦国政治，却希望按照书中规划去做。后来《汉书·艺文志》把此书归为



11 传说的庄襄王陵　位于西安市以东小丘之上的圆形墓，据说是庄襄王陵，也可能是即位三日猝死的孝文王之陵

《杂家》类。不过，其思想绝不是杂乱无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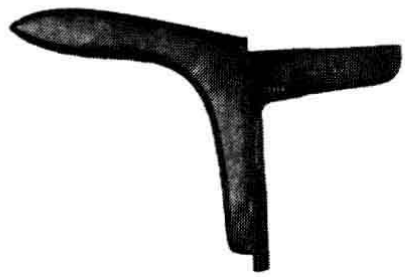
如果吕不韦直至最后仍作为秦王政的智囊的话，秦帝国或许是另一形态也未可知。

《吕氏春秋·贵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认为不是掌握权力的皇帝一人治理天下。作为天子，不可不体察人民的动向，如果人民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对暴君有利。官吏若担负起各种责任、报效君主的话，君主则安泰。书中如此描绘了理想的天子形象和国家形象。认为维持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结构、建立以秦国为中心的联盟国家是可行的。然而，不但吕不韦官场失足，还发生了嫪毐的宫廷之乱。

据《吕不韦传》记载，秦王政即位之后，吕不韦与政的母亲赵太后仍然继续私通，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就将嫪毐献与太后身边。嫪毐实际上是个强壮的男子，剃掉了眉须伪装成宦官。太后与嫪毐私生有二子，嫪毐也凭借太后之力获得了权势，受封山阳之地为长信侯。但是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了嫪毐与太后的关系，事态骤变。

嫪毐伪造秦王御玺和太后印玺，集合步兵、骑兵以及戎翟首长、舍人，策划在雍城的蕲年宫发动政变。秦王事先已经探知此

情，派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先发制人，展开攻击。咸阳的激战之中，数百人被斩首，逃走的嫪毐也很快被捕。经过真相调查，发现此事的幕后与吕不韦有牵连。嫪毐一族被处以死刑，太后幽禁雍城，嫪毐的舍人流放蜀地，吕不韦饮鸩酒自杀。



12 吕不韦所造戈　戈上有相邦（国）吕不韦的名字

像这等近乎内乱的重大事件，在喜的《编年记》中并没有记录。（秦王政）九年的竹简，只记年号，内容空白。与暗杀未遂事件一样，看来秦王并不愿意公布事件真相。因为中央政府若有所动摇，占领地的治安将难以维持。

天下统一

李斯的野心

吕不韦失足及太后幽禁之后，秦王政开始亲政。李斯作为新的智囊人物登上政治舞台。李斯的政治蓝图与吕不韦不同。

李斯是楚国上蔡县（河南省）人，年轻时与喜是同一地方的基层官吏。喜是县吏，李斯比他高一层次，是郡小吏。虽然有郡与县的差别，喜与李斯毕竟是同一层次的地位。但是，一个始终不过是一个地方官吏，一个却由地方官吏高升至秦的丞相，

二人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呢?

李斯与喜之不同就在于：李斯志在将从荀卿（即荀子。本名荀况，尊称荀卿）处所学的帝王之术，不是通过楚王、而是通过秦王付诸实践。荀卿虽以其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主张“性恶论”的儒家思想家而著称，但又非单纯地主张人生来性恶。他认为由于人生来好利欲，所以在乱世必须用礼仪与法来治理社会，使之有秩序。荀卿本人出身于战国末年的赵国，后来曾在楚春申君身边任兰陵令（兰陵县长官）。荀卿通过县的治理实践，总结出帝王之术的思想。

本是一名地方官吏的李斯，入秦之后投奔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一名舍人。舍人，不是什么官吏，只是在主人家侍奉杂事而已。吕不韦欣赏李斯的才能，将其推荐为秦王近旁的郎官。舍人的“舍”是指主人的家，郎官的“郎”是指守卫宫中走廊的近臣官吏。李斯侍奉于秦王近旁，得以阐述帝王之术。他强调：历代秦王从孝公、经昭王，至庄襄王的六世，皆从属于诸侯，如今正是歼灭诸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机会。当时所谓的诸侯虽说是周王所封诸国的君主，但实际上是已经称王的战国君主了。

在吕不韦脑子里是没有“天下统一”这类概念的，他考虑的只是如何继承昭王的帝业而已。秦王采纳了李斯的谋略。李斯被提拔为长史，成为中央官僚制下的一名官员，进而得到客卿的称号。“客”，想来应该是授予外国人的名誉吧！秦王为了实现天下

统一目的，向各国派遣了许多携带大量金玉的密使，让他们去那里进行离间君臣关系的间谍工作。

贯彻法治与帝王之术的构想

进一步使李斯登上中央官僚之首的机会到来了：公元前237年，由于反对排斥外国人的《逐客令》，他的上书得到了秦王的认可。秦一直以来积极使用外国人才，那种精神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平定嫪毐之乱的相国吕平君、吕文君曾是楚国的公子（王子）。诸国王室之间，或依靠姻亲国戚缔结友好关系，或撕毁盟约大动干戈。即便我们了解当时的这种关系，仍不太清楚站在国家的立场起用外国王室究竟出于怎样的意图！“相”有辅助之意，相国即辅助王国的人，即后来的宰相。

秦惠文公的相张仪是主张秦与东方各国连衡的纵横家。他担任着谋划与各国间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官职。他已经不是单纯地受雇于外国人了，而是能够从国际战略的角度使国家强大，正是当时能够使一国得以生存的所需人才。然而，即使那个时代也必定有保守派存在。来自邻国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实际上就是个间谍。韩国派遣他来是企图让秦专注于大型土木工程，以此削弱秦国军事力量。由于此类阴谋层出不断，王族和大臣要求秦王无一例外地驱逐外国宾客。此事牵涉到楚国出身的李斯，出于保身的考虑，他上书秦王表示反对。

从上书中的巧妙论述来看，他不愧出于荀卿的门下。秦王被

他说服。李斯升为廷尉。喜是在公元前235年当上狱吏的，由此，在这位普通的地方法制官吏与最高执法官李斯之间，也就形成了某种衔接关系。地方官吏在犯罪行为发生时，依法执行处罚。如果他们对法律的解释产生疑义的话，可以直接上报中央的廷尉寻求判断。特别是喜所在的秦国占领地区，法治更是得到彻底地贯彻。李斯终于将导师荀卿也未能实施的理念在帝王的眼前予以了实践。

战国时期的最后十年中，正如李斯所构想的那样：各国间的均衡瓦解，出现希望统一的趋势。自从公元前230年韩王安被俘、韩被秦歼灭开始，魏、楚、燕、赵也逐一为秦所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是最东方的齐。于是，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前面提到的公元前227年发生的暗杀秦王的未遂事件，虽说险及秦王性命，但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此后秦一系列统一举措的加速器。廷尉李斯也最终将帝王之术的构想在秦国付诸实现。

看看喜的《编年记》对公元前223年之前秦与各国作战的记事：（秦王政）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仅记年号，内容空白。四十开外的喜对于李斯热烈倡导并实现的天下统一，究竟作何感受，竟是一片空白的无言。但是，无言也是一种信息。何况，二十七年记录了家族成员的出生；二十八年记录了秦始皇的巡幸。

统一天下之翌年

《史记·六国年表》中所载“始皇帝元年”是后来追溯的年号，秦王政即位时是不可

能有“始皇帝元年”的纪年的。《编年记》中所记“今元年”的表达，倒是更反映了当时官吏对秦王政时代的真情实感。那一时期的出土史料使人感到了那种时代的气息，一种紧张的气氛感染着读者。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条目，是从六国最后一位国王齐王被捕记起的。齐王建与相国后胜出兵守卫西部国境，并断绝了与秦的外交往来。当时，秦派遣将军王贲从燕国南部攻齐，活捉了齐王建。接着记述曰：“秦初并天下。”《六国年表》中对这一年的大事有着提纲挈领的记述：“王贲击齐，虏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如果《编年记》中也出现同样记载的话，则无任何疑念可言。

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不仅是秦国，即便就整部中国史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一年十二个月之中，究竟何时秦灭齐国而实现天下统一的呢？对此我们完全无从知晓。当时的秦历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以九月为一年的结束。认为一年的开始不是在春天，而是在冬天（十至十二月）。喜的《编年记》于始皇二十六年是空白，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求证的史料呢？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发现了始皇二十六年的纪年简牍。

里耶秦简的三万六千支简尚未全部公开，虽说仅仅发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却包括了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的纪年简。仅此，意义已经非同凡响。总之，这一史料并非来自中央，而是可以反映周边地方对当时天下统一这一历史事件反应的史料。那

么，地处酉水上游里耶古城的人们，他们对遥远的秦都咸阳所发生的，即秦最终歼灭了山东齐国的事件，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无从知晓。

里耶秦简中记载始皇二十六年木牍共有四块：即三月甲午（十三日）、五月庚子（二十日）、六月癸丑（四日）、八月丙子（二十七日）的记事。记录者是洞庭郡迁陵县的官吏，内容是县的行政文书。

然而，所记内容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想，文书中根本没有记载统一天下的历史事件。秦的官吏们在这一年仅仅专注于本县的行政事务。四篇文书的内容如下：

三月甲午（十三日）的文书是一份由县司马导和县尉乘□（此一字无法释读）二人制订的卒算簿。“司空”是国家、地方官署管理徭役劳动的机构。“卒”是服兵役或因土木工程而征调的服徭役者。“算”是向普通百姓所征收的人头税。另外，由于秦时期实行以钱抵罪的赎金刑，而且可以服劳役可以换算为赎金，所以司空也管理服刑者。

根据上述的喜留给我们的《司空律》竹简文书，其中有服刑一天日薪八钱的规定。比如，八百钱可赎罪的话，劳动一百天可抵罪。秦时戴罪服刑者须从事修筑都城、长城、陵墓等等劳动。如果是役使普通农民的话，还得考虑如何避开农忙季节的问题，但如果是罪犯的话则可以任意驱使。县级官吏负责制订服徭役的劳力名簿。

翌年的二十七年八月壬辰（十九日）的木牍记录了邻县西阳县狱吏启根据名簿提交的所需徭役的申请报告，以及迁陵县守丞（副官）令司空处理此事的内容。如果徭役的内容是执行警备任务的话，那么西阳县一定发生了某种紧急状况。

13 秦始皇

叛乱事件与侵占船只事件

二十六年五月庚子（二十日）的文书，是关于迁陵县下属一个叫启陵乡村庄的记载。当时，县以下的行政单位是乡、里。乡管辖着最基层的里。县官署也设于某乡，设有县官署的乡称为“都乡”。这份文书记录了启陵乡劾姓等十七户人家转为都乡管辖时出现的问题。迁陵县守丞（副官）敦狐命令都乡处理此事。很可能这十七户人家本是一个独处山区的小村落，秦为了控制每一个居民点，就必须将此类村落统统划归乡里制的行政系统。

二十六年六月癸丑（四日）发生的事件更是紧迫，文书记载了越人举城叛乱的情况。这是一份迁陵县下判决之前的确认文书。由于出土文书中有断简，具体内容不得其详。在张家山汉简有称作《贼律》的法律，规定城邑或亭障叛乱者，以谋反罪处以腰斩。处以拦腰斩断的极刑，属于背叛国家罪。越人的“越”看起来虽像是江南山岳民族的首领，但因为这里是对叛乱首领的判决书，

所以“越人”在此是个人名。作为人名的“越人”在三十三年的文书里也曾出现过。那位春秋时期的名医扁鹊也是姓秦，名越人。在迁陵县，比北方战局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县内治安稳定的问题。

根据二十六年八月丙子（二十七日）司空守㮚的报告，发生了以下事件：二月，南郡的竟陵（竟陵）县一姓狼的男子，借用迁陵县公船（官有船）运送故荆州之地的瓦，至今尚未归还公船。迁陵县面临酉水，由此至洞庭湖的水运很发达。从洞庭湖向北，是南郡郡治江陵县东的竟陵县。因为当时楚（避庄襄王子楚名讳，又称荆）已经为秦所灭，所以是从楚故地运送瓦。使用县官署的船搬运物资时，发生了官署之间的借贷问题。狼姓男子是掌管军马的县司马的部下。我们虽不知道二十六年二月狼为何目的而运瓦，但从他的职务来看有可能是出于某种军事目的。

究竟将秦灭齐事件编入四支简牍所见之二十六年三、五、六、八月记事中何处最为合适呢？还是难以作答。这一带是秦灭楚国黔中郡后，作为秦的占领地、新建的洞庭郡。虽说灭楚已经是早在公元前 223 年的事了，但是这里不仅完全没有庆贺天下统一的气氛，倒是在沅水流域依然残存着自占领以来产生的紧张状况。

咸阳宫召开御前会议

地方上的那种紧张状态，在中央同样存在。在中央召开了重要的御前会议。除了中心人物秦王，出席会议的有丞相、御史等人。御史即御史大夫，

按照左右二人制，有右丞相隗状和左丞相王绾二人，还有御史冯劫、廷尉李斯。会上首先传达了秦王的意旨，说秦俘获六国国王有着各种正当的理由：韩王、赵王、魏王、楚王背叛盟约，燕王图谋暗杀，齐王与外国断交。所以，兴兵讨伐了有罪的六位国王。然后，会议采用了“皇帝”的称号。

其间臣下称赞秦王功绩说，“今陛下兴义兵，诛灭残贼，平定天下，海内建立郡县制，统一发布法令，这些都是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秦国一方的逻辑在于：因为六国国王是罪孽深重的暴君，所以为了解救民众进行了正义的战争。

之后，又讨论了是否有必要恢复地方王的问题。丞相王绾等人主张：燕、齐、荆（楚）地处偏远，如不置王的话难以统治。群臣大多赞同此建议，认识到秦刚灭六国，统治旧六国并非易事。但是，这一建议遭到李斯的反对，他认为：如今海内仰仗陛下神灵实现了统一，全国实行了郡县制，用国家赋税对王族、功臣予以赏赐，是很容易统治的。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二十六年咸阳宫召开的御前会议并非战胜国的胜利宣言。歼灭六国之后下一步将怎么做，最初并没有事先的计划。李斯在变化中摸索着，形成了天下统一构想。但是，李斯并不是无视现实的，正因为他了解统一天下的困难，所以才坚持实行郡县制。李斯深知地方的问题不在六国国王，而在于那些民众之中的反秦动向。

古代的时间感觉

张家山汉简也包含有秦始皇时期的文书。张家山汉简是1983年湖北省江陵县西汉墓出土的千余枚竹简，除了汉代法律之外，在称为《奏谳书》的法令文集中有一些秦代的事例，可以作为秦的史料。其中，有一份二十七年二月壬辰（十七日）送至南郡官府的御史文书。御史是地方官署的检察官，他根据中央政府旨意，传达了对某一事件复审的命令。复审的处理一直持续到翌年的二十八年九月，用了四百六十九天，可见是个复杂的事件。

此文书以马、船传送，送信距离五千一百四十六里，按文书的计算：每天行八十五里，行六十天后尚余四十六里。在当时，一里约四百米，若按日行三十四公里计算，总距离为二千零五十八公里。相当于从咸阳至南郡的直线距离四百公里的五个往返的行程。若以马送信，日行八十五里，约三十四公里。由张家山汉简《行书律》可知：若以昼夜邮送的话，日行二百里（约八十公里）。从咸阳至南郡，若使用特快邮件的话，要一个星期；一般邮件的话估计大概需要十至二十天。附带一提的是：汉代的诏书从长安送至敦煌需要五十天。

中央和地方的情报差异，当然有其距离上的原因，不过在此还有必要交代一下古代的时间感觉。地方政府如果在年度末的九月份向中央提交报告文书的话，是无法在十月份的新年度开始之前送到的。所以地方行政的财政决算期是每年的八月，看来就是因为顾及时间差的问题。

中央的意图是通过邮政制度向地方传达的。秦代的《行书律》中规定：对文书的收取、发送日期以及早晚时间必须做记录。命书（诏书）和特快邮件必须立即发送，如有延迟就要受处罚。里耶秦简中所见文书的最后有送信邮人和收取者二人的名字，以及收取时间的记录。当时的记时有：旦夕之别计时法，按食时、日中等计时的十二时制，还有水下四刻、水下八刻、水下尽、水十一刻下等昼夜百刻制。百刻制将一时分为八刻，每刻十四分二十四秒。即便今天，在中国五点一刻也是指五时十五分。《传食律》中规定向传递文书使者提供的饭食有谷物、酱、蔬菜汤（菜羹）等。《仓律》中有如何提供传马饲料的规定。

《史记》未载的天下统一实情

让我们回到上文提到的那桩复审了一年以上的复杂事件。事件发生在二十七年二月之前，在南郡管辖的苍梧县利乡发生了大规模叛乱。地点在湖南省长沙以南、湖南省的南端。西汉武帝时所置苍梧郡的领域实在太远，这里的苍梧不妨视为湖南省最南端的九疑山（现在的九嶷山）地区。传说舜（即虞舜。虞是国名，舜是谥号）在南巡途中，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山。舜是五帝的第四位，曾于尧在位时期执行政务，据说尧死后虽传位于丹朱，但民心归于舜。秦始皇曾打算去九疑山祭祀舜，但没有成功。舜在秦始皇心目中是一位理想的帝王。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张绘于丝绢的地图，其中绘有九疑山

周边的地形。地图上画着九座山峰，旁边记有“帝舜”二字，还有叫做“利里”的村落。叛乱发生的“利乡”也许就在这附近。2007年，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发现了秦汉时期的舜帝陵。陵区位于一个瑶族居住的、名为汉唐坪村的高粱地中，面积达三万二千平方米。

“新黔首”即刚刚臣服于秦的地方民众，政府让他们抓捕叛乱者时，他们带着武器逃亡深山。“义”等人在追捕叛乱者时失败，战死。在事发的苍梧县附近的攸县为镇压这次反叛，曾根据名簿有过三次征发，总算平定了这次叛乱。上述二十七年八月将卒算簿在册的士兵从迁陵县送往酉阳县，看来也可能是用来应付这次事件的。因为三次的名簿混在了一起，所以谁是逃亡者、谁该受到处罚，真相已不得而知。

此时，下达了一道令。“令”与“律”是不同的。成为法律之前的指示称为命令，是用来应付紧急状态的。这道命令措辞十分严厉：“因为刚刚占领荆地，所以那里群盗多发。如果征兵在与群盗遭遇中脱逃，处以临阵畏缩罪。根据《律》的规定，对战场临阵畏缩者处以斩刑。”最后的判决庇护了新黔首，对攸县令处以剃去胡须罪、并服“鬼薪”（上山砍柴）的劳役刑，逃亡者按临阵畏缩者处以斩刑。此时，廷尉应该是李斯，可能就是下达了此道命令。李斯对地方的事态是很清楚的。对此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对《史记》中出现的李斯等中央官僚的举止言论就不得不予以重新认识了。

里耶秦简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二十七年二月庚寅（十五日），

洞庭郡守（郡的长官）礼向所辖各县官吏下达了紧急状况的对策。要求各县动员所有可以征调的士兵和刑徒，将洞庭郡管理的武器运往内史、巴郡、南郡和苍梧。可见，苍梧叛乱已发展到中央近畿地区内史也不得不介入的地步。关于苍梧叛乱，张家山汉简和里耶秦简的记述时间，是如此吻合！

上述情况让我们从地方的角度看到了天下统一的实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联络，在地方的史料中是有所记载的。地方的文书虽然每到年底都要送交中央，但是汇集中央的文件随着秦朝灭亡也都丢失了。司马迁是在那些公文没有保存下来的情况下编纂秦史的。从地方上偶然保留下来的那些公文，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没有的天下统一时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局面。

第二章

皇帝制的形成

皇皇上帝

古代的上天思想

巨大的陵墓中长眠着中国史上第一位皇帝，这就是最初将王号变为皇帝号的始皇帝的陵墓。皇帝的称号诞生于两千两百年前的秦朝，从第一代秦始皇至末代皇帝溥仪，两千一百三十年间有过近五百个皇帝。其中有未满一岁即位的东汉皇帝（殇帝），也有近九十高寿、在位六十年的清代皇帝（乾隆帝）。在中国为何皇帝能够如此长时期地保有权威呢？又为何能有如此多的皇帝世代相承呢？

与清朝末代皇帝作斗争的孙中山在其所著的《三民主义》中对中国古代皇帝制有过如下论述：

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帝。汉唐以来，没有一朝不是争皇帝的。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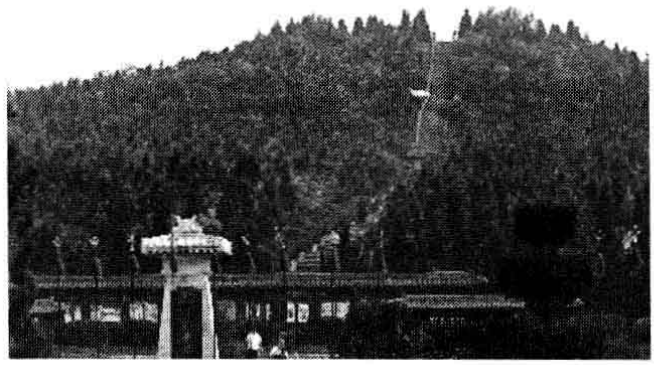
革命家孙中山这里所说的争皇帝的戏剧，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呢？

秦王嬴政击败东方六国诸王，统一全国时（前 221）创立了皇帝称号。这一称号借助了可以主宰上天之“上帝”（天帝）的权威。天的世界本是一个宇宙。古代中国人认为天是覆盖于地上的球体。从地上仰望，天像个半圆屋顶。太阳、月亮、行星都在这个球体上移动。天以北极为中心逆时针旋转，并认为天帝就存在这一中心。称北极近旁小熊星座的 β 星为“帝星”，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形状被想象为天帝御驾的车辕和车厢。位于勺的前端、亦即车厢尾部的 α 星被称为“天枢”。天帝乘此御驾巡视于天极周边。

人们在中国古代放置棺椁的墓室中，发现了这种从地面仰望中的宇宙。墓室的天顶上绘着天体，中心部位是天极和北斗七星。在汉代的壁画中，绘有天的赤道和太阳一年运行所经的黄道。在日本的高松冢古坟壁画中，也描绘着这种受中国天文思想影响的天极。其中，北浦古坟中描绘着一个黄道与天赤道交叉的圆。

天的中心并没有被人格化。由于“神”（spirit）在中国是指

死者的魂，所以也被误解为上帝的“神”（God）。在皇帝称号的产生背景中，有着如此的古代天文思想。从天帝到地上的统治者，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14 秦始皇陵　巨大陵墓的地下长眠着第一位皇帝

“皇帝”的称号

在征服东方六王、统一天下的那一年，秦王开始使用高于诸王地位之上的皇帝称号。关于皇帝称号的产生，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着详细的记载：通过秦王与大臣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的争论，最终采用了皇帝称号。决定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

首先，秦王命令丞相等人议论以往王号、帝号的变迁。讨论的结果：因为秦王之功绩超过上古以来五帝的治世，所以要找一个更加合适的称号。“五帝”指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五位。这五帝并非天上，而是地上的统治者。根据神话时代的传说：这些人死后升天，被称为某帝。秦国的博士从古典书籍中寻出天皇、地皇、泰皇等称号，认为其中数泰皇最为尊贵。泰就是泰一，是地位高于天神、地神的天帝。所以，大臣们建议秦王以此为号。

如果当年这一建议被采纳的话，后来的皇帝就都得叫泰皇了。

但是，大臣的建议遭到秦王的否决，最终决定将泰皇的“皇”与上古帝位的“帝”字合为“皇帝”的称号。此“皇”字本意与“王”字相同，而且作为形容词有光辉之义；说到底秦王中意的是“帝”字，所以又为“帝”找了个修饰语。意味着煌煌上帝的“皇帝”，就这样诞生了！天帝是上天的中心，与之相应，秦王希求建立自己在地上世界中心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采用的“诏”（命令）、“朕”（自称）等称谓为后来历代皇帝制所沿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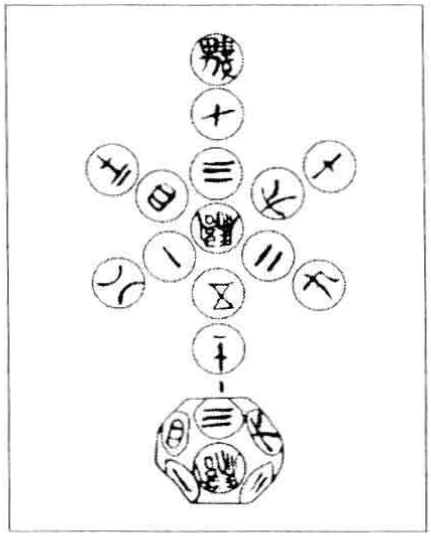
秦以水德克周之火德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的记事中，罗列了统一天下的具体事例：

首先，秦采用了五行的水德。五行是由战国时期齐国邹衍首倡的思想，包括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相克）说。这种观点认为是木、火、土、金、水五种要素的变化导致了宇宙的变化：就像水生木（植物）那样，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再生木，如此循环叫做“相生”；如果像水胜火那样，土胜水，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就叫做“相胜（相克）”。五行，还配以方位、季节、色彩、数字。如木配以东、春、青、八，火配以南、夏、赤、七，土配以中央、土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的十八天，合计七十二天）、黄、五，金配以西、秋、白、九，水配以北、冬、黑、六等。秦胜了属性为火德的周王朝，所以采用了水德。相应地以“冬”、“黑”、“六”作为制度改革的关键词。

数字与五行的关系不太好懂，在古代中国也是将水视为万

物之中最先形成的物质。今天，我们认为地球是由金属（金）、地幔（火）、海洋（水）、土壤（土）、植物（木）组成的，宇宙间最丰富的元素是氢，占地表四分之三的水就是由氢产生的。一至四的生数和六至九的成数之首位数“一”和“六”被认为是水德的数字。



15 十四面骰子（出土于秦始皇陵） 当时的一种玩耍道具，记有一至十二的数字和两个汉字（骄、赍）

由于冬季始于十月，所以秦以十月为年初岁首，衣服、旗帜用黑颜色，数字以六为基数，符节、法冠都是六寸（13.8cm〈1寸＝2.3cm〉）为长度或高度，车辆宽度为六尺（138cm），度量衡的一步也是六尺，驾车的马用六匹。黄河在当时叫做“河”或“河水”，也仿效水德改称“德水”。又因为水德属阴、主刑法，所以执法严厉。

五行思想并非出于秦，而是产生于东方的齐国。但其重视自然循环的思想与《吕氏春秋》月令的思想却是相通的，在这种思想中刑法也被置于自然循环之列。从吕不韦到李斯，秦的智囊人物虽有交替更迭，而那种极端的统治思想却未必有所变化。统一天下的法家思想之中也含有吕不韦的月令思想。

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枚石制的骰子，骰子有十四个面，可以投出从一到十二的数字，而且其中一面写着“骄”字，一面写着“赍”字。投骰子者按照投出的数字走棋子，如遇“赍”字

要受罚饮酒，逢“骄”字则罚对方喝酒。数字在官吏休闲玩耍之中也是如此的重要。这十二乃六的倍数。

三十六郡之谜与帝国的扩张

秦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个郡设置郡守、郡尉和监郡，对黎民百姓改称作“黔首”，召开盛大宴会。允许天下人聚集饮宴以示庆贺，由国家分发美酒佳肴。二十五年（前 222）五月，秦歼灭了除齐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战局已经告一段落时曾有过一次许可庆祝。这次，是因为最终灭齐，实现天下统一而特许庆贺。对此，地方文书对日期和时间都予以详细记录，《秦始皇本纪》的记事却连月份也未提及。

对当时设置的三十六郡，也是很难确认三十六个具体郡名。所谓三十六郡，并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一次性设置的，而是自战国时期的秦国直至秦帝国成立之间逐渐设置的。如果将《史记·秦本纪》和《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汇集的话，可知郡的数字不止三十六个。两千年来关于三十六郡究竟指哪些郡的问题虽然有过各种观点，但是里耶秦简中又出现了谁都不知道的洞庭郡，于是对迄今为止的各家之说就不能不予以否定了。出土资料就是如此无情而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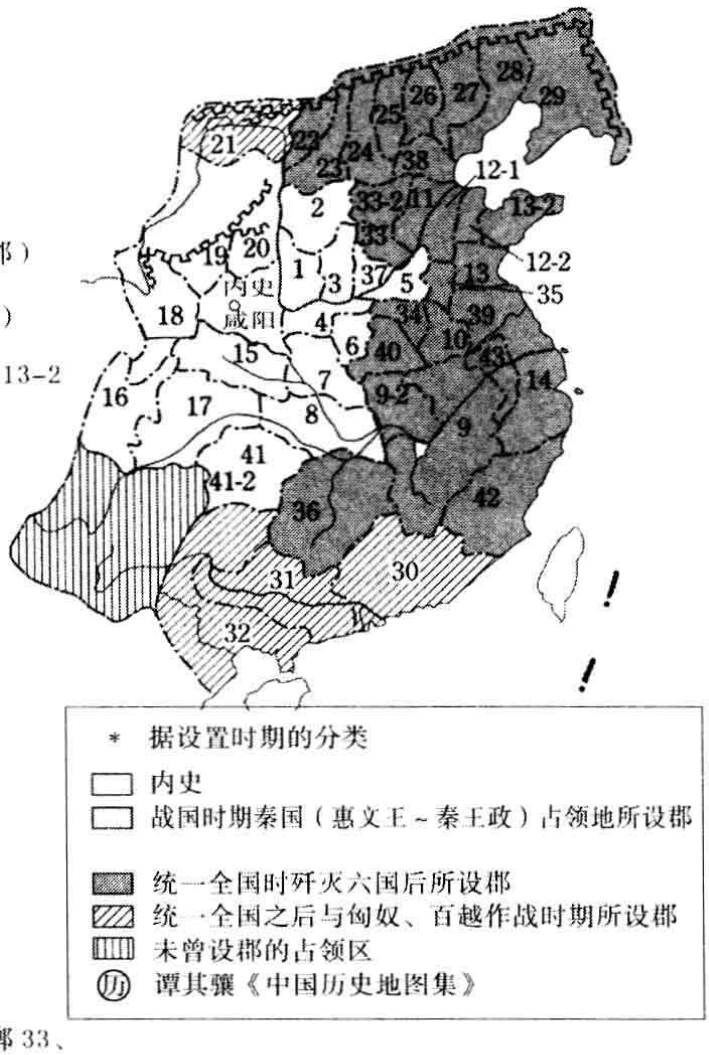
在此，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三十六郡的具体情况。根据成立的不同情况，秦郡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设置于战国时期秦国固有领土的各郡，称为内史。第二类是超越国境，建立于被侵占

* 内史（京畿内）及三十六郡（资料来源：《汉书 · 地理志》）

1 河东
2 太原
3 上党
4 三川（参川，及汉代河南郡）
5 东
6 颍川
7 南阳
8 南
9 九江（㊊分为九江、衡山 9–2）
10 泗水（泗川 · 四川）（汉代沛郡）
11 钜鹿
12 齐（㊊分为济北 12–1、临淄 12–2）
13 琅邪（㊊分为济琅邪 13、胶东 13–2 胶东似当为即墨）
14 会稽
15 汉中
16 蜀
17 巴
18 陇西
19 北地
20 上
21 九原（汉代五原郡）
22 云中
23 雁门
24 代
25 上谷
26 渔阳
27 右北平
28 辽西
29 辽东
30 南海
31 桂林（汉的郁林郡）
32 象（汉的日南郡）
33 邯郸（汉代赵国），㊊分为邯郸 33、恒山 33–2）
34 砀（汉的梁国）
35 薛（汉的鲁国）
36 长沙

* 之外，虽未见于《汉书 · 地理志》，但有可能为秦郡者：

37 河内
38 广阳
39 东海
40 陈（楚）
41 黔中（里耶秦简其地理位置与洞庭郡 41–2 相重合）
42 闽中
43 鄣（汉代）丹阳郡、㊊无载
44 陶（㊊无载）
45 河间（㊊无载）



16 秦的三十六郡示意图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各郡设置守（长官）、尉（军官）、监（监察官）。三十六郡郡名难以厘定

领地区、当然也是沿秦国国境地区所置各郡。第三类是在歼灭六国后，接管的六国各郡。第四类是统一全国之后扩张领土时所设各郡。另外，还有一些超出三十六郡数字之外，不明其所在的郡。

图 16 展示了这些郡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从秦国至秦帝国的整个过程。上述“喜”这个官吏所供职的地区属于第二类，即秦占领地的南郡。加上第二类、第三类，至秦统一之时应该为三十六郡，但最多也就有三十四郡。必须另外找出二郡来。《汉书·地理志》记述了汉郡的出自，其中记为出自秦郡的正好为三十六郡。然而，其中有四个郡却是统一之后建立的第四类郡，如果除去这四个郡的话又有哪四个可以入选三十六郡呢？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一直有争议。从清朝至今的三百年中，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王国维、钱穆、劳榦、谭其骧等众多学者都为此做出了努力。

然而，里耶秦简中洞庭郡的发现，实在出人意料。因为，这使得一直以来作为研究根据的《汉书·地理志》史料的可信性发生了动摇。比如《汉书·地理志》中说：“长沙国，秦郡。”那么，在秦代真的有长沙郡吗？上一章所述苍梧之乱时提到：平定这次动乱的是南郡管辖的一个县。这一地区正是长沙地区，却没有提到长沙郡。另外，在秦昭王时期的公元前 277 年的记录中有攻打楚国巫郡、黔中郡的内容，此二郡为楚郡的郡名，并非秦郡的郡名。占领某一地区之后有时是要改变郡名的，所以黔中郡之名不应当在该地区被占领之后还在沿用。从《晋书》以来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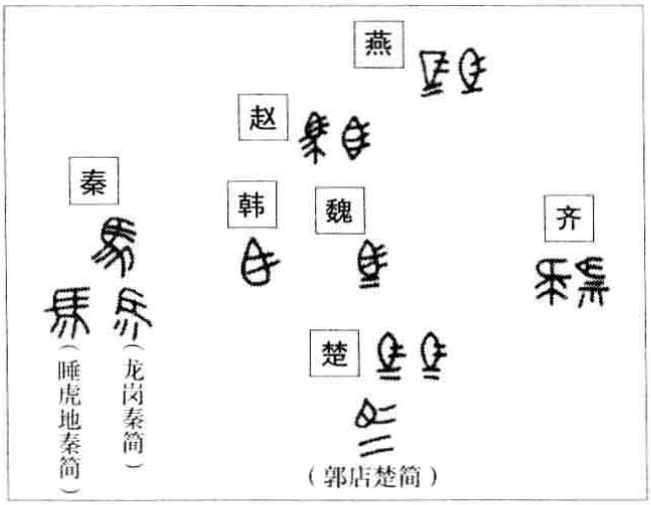
学者为了与三十六郡数字相合，将《汉书·地理志》中没有作为秦郡的黔中郡列入了三十六郡。那么，既然现在已经发现了洞庭郡，就应该把楚国的黔中郡排除了。而且，当时将黔中郡改名为洞庭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度量衡、车轨、文字的统一

谷物计量与武器的制造标准

根据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知秦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车轨的尺寸以及全国的文字。对于此事，无论是什么样的一般读物都会将此作为秦统一大业的首要大事予以叙述。一般认为，战国时期由于七国之间度量衡的单位、车马轨道的宽幅、文字的形状不同，所以很不方便，因此进行了统一。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概而言之，这种改革与一般庶民百姓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因为百姓并非度量衡、车轨、文字的使用者。

这种改革并不是综合七国的制度之后所做的新型规格，而只是将秦国旧有制度作为全国统一标准而已。比如，尺寸长度、石斤两之重、斗升之容积都是把秦国的标准变成统一规制，把小篆、隶书（秦隶）文字作为统一文字而已。而且，统一规格



17 统一文字　各式各样的“马”字：七国的“马”、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楚简中的“马”

也不是在二十六年一次就实施完成的，在秦的占领地区，即秦以外的地区这些规格早已经开始实施了。在实际中使用度量衡、车轨、文字的并不是庶民百姓，而是那些按照规格制作产品的工人和那些按照规格从事管理的官吏。所以，因违反规定而受处罚的是工人和官吏。至于谷物的纳税，即便容器不一致也不必担心会出现什么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度量衡的规格是受到严格管理的。

“喜”留给我们的法律文书，统称秦律。后来，在云梦县龙岗秦墓中也出土了秦律，睡虎地秦简与龙岗秦简合计起来，秦律的量是很大的。张家山汉简中发现了大量的汉律，而且是与秦律年代非常接近的律文，所以与张家山汉简汉律对照的话，更有利于我们对秦律的理解。

秦律《工律》有着“制作同一种器物，其小大、长短、宽度必须相同”以及“县和工室（官营工场）由有关官府校正其衡器的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校正一次”这样的规定。《内史杂》是有关京师所在官府的杂律，其中也有“贮藏谷物的官府需要进行称量的，都应备有衡石的权、斗桶，这些器具不要借给百姓”的严格规定。在有关物品管理的《效律》中也有“秤砣不准确，

18 铜权　权即秤砣、砝码。度量衡的统一即把秦的标准作为天下统一的规格予以实施

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负责人一甲的罚金，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罚一盾的罚金。桶不准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甲，不满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罚一盾”。“秤黄金所用天平砝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均罚一盾的罚金。”度量衡器有误差的话，是要受到处罚的。官吏丢失度量衡器的话，与丢失公文、证书、公印一样要受到处罚。可见其重要性。

度量衡不仅对谷物计量和武器制造极为重要，还涉及土木工程的测量、身高的测定（身高六尺的大人与小孩有区别，小孩不具备法律能力）、伤害罪的伤口测定（如人脸部被牙齿咬伤时，论罪以伤口一寸见方、深半寸为标准）等诸多方面。

道路交通网的建设与统一车轨

车轨即车辙，统一车轨就是统一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从一般意义上说，就像铁道的轨道那样，宽窄不一会很不方便，所以需要统一。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呢？

在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叫做驰道的国有道路。在古代帝国，与波斯帝国的王道、罗马帝国街道一样，秦朝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有这种需要。秦朝首都咸阳连接占领地的郡，以及旧六国郡的道路，都是按照秦的规格铺设的。秦朝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即前220年，据记载：驰道已经连

接了东方的燕、齐，南方的吴、楚，而且一直通到了沿海地区。驰道路面宽幅五十步（约 67.5m），沿途每隔三丈（约 7m）种植一棵青松，外侧以铁锤夯实。

陕西省北部高原丘陵上可以见到夯筑的直道，这是与匈奴作战时为了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的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直道的调查还只是在局部展开，驰道的存在与否尚有待于今后的调查。当车马通过这样的道路时，即使路面夯筑得很结实，也会留下车辙。

秦朝道路的实际状态虽然尚不清楚，但龙岗秦简的秦律中有很多关于交通的内容，从中可以想象出当年道路的大概模样。秦朝的道路网上行驶有六匹马牵引的皇帝御驾，也有两匹马拉的战车和驿传用的车马。道路除了一级路的驰道之外，还有军用的弩道和在路两侧为遮人眼目所筑的侧墙、供皇帝专用的甬道。驰道分为三条车道，中央是天子专用道，皇帝以外的车马走两侧道路。擅自使用驰道的人，将被流放并没收其车马。在驰道与其他道路交叉的地方，就不得不横穿驰道中央道，那是被允许的。即便是夯筑的路面，遇到雨天也会出现泥泞和无法通行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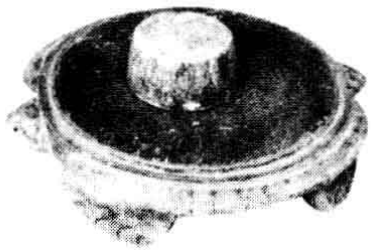
地方官吏须在每年九月修筑自己管辖区内道路，进一步说，铺设于全国大范围的道路网是帝国的生命线，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一条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战国时期，秦国在攻打蜀国时就利用翻越

秦岭山脉的栈道修筑了金牛道，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路宽仅有 1.2 米。

习字与撰写文书

秦朝曾经几次宣布文字统一，却始终未能在全国得到彻底贯彻。官吏使用文字、书写行政文书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事。秦人去地方郡县官府任职的人员是很有限的，由中央任命的只限于郡守（长官）、丞（次官）、尉（军官）这些所谓的“长吏”。实际上的行政人员都是地方上在本地采用的官吏，至于被任用者是否为秦国出身并不构成录用的条件。尽可能地利用他国人才参与秦的地方行政，构成秦帝国的国家基础。刘邦不是秦国人，却当了秦的亭长（负责管理村落的治安）。当然，他应该能读会写。跟从刘邦的曹参是狱掾，任敖是狱吏，与“喜”是同样的职务，也一定能够用秦文字书写的法律，可以用秦文字书写文书。

能够读、写五千字左右的秦文字，与后代科举考试背诵四十三万字的“四书”、“五经”有着明显的差距。当时是在竹简、木牍上用墨和笔写字，字体为隶书。集中精力学习的话，很快就能成为秦的地方官吏。在石头和青铜器上镌刻的文字是由大篆稍加简化的小篆，这样的字有着特殊的读法。秦的文字本不产生于秦国，据说大篆是由周朝太史所创。旧六国的文字相互为兄弟关系，比如经常被人举为例子的各国“马”字，其字形虽有差异，但非常相似（见图 17），若用隶书的“马”相比较的话，应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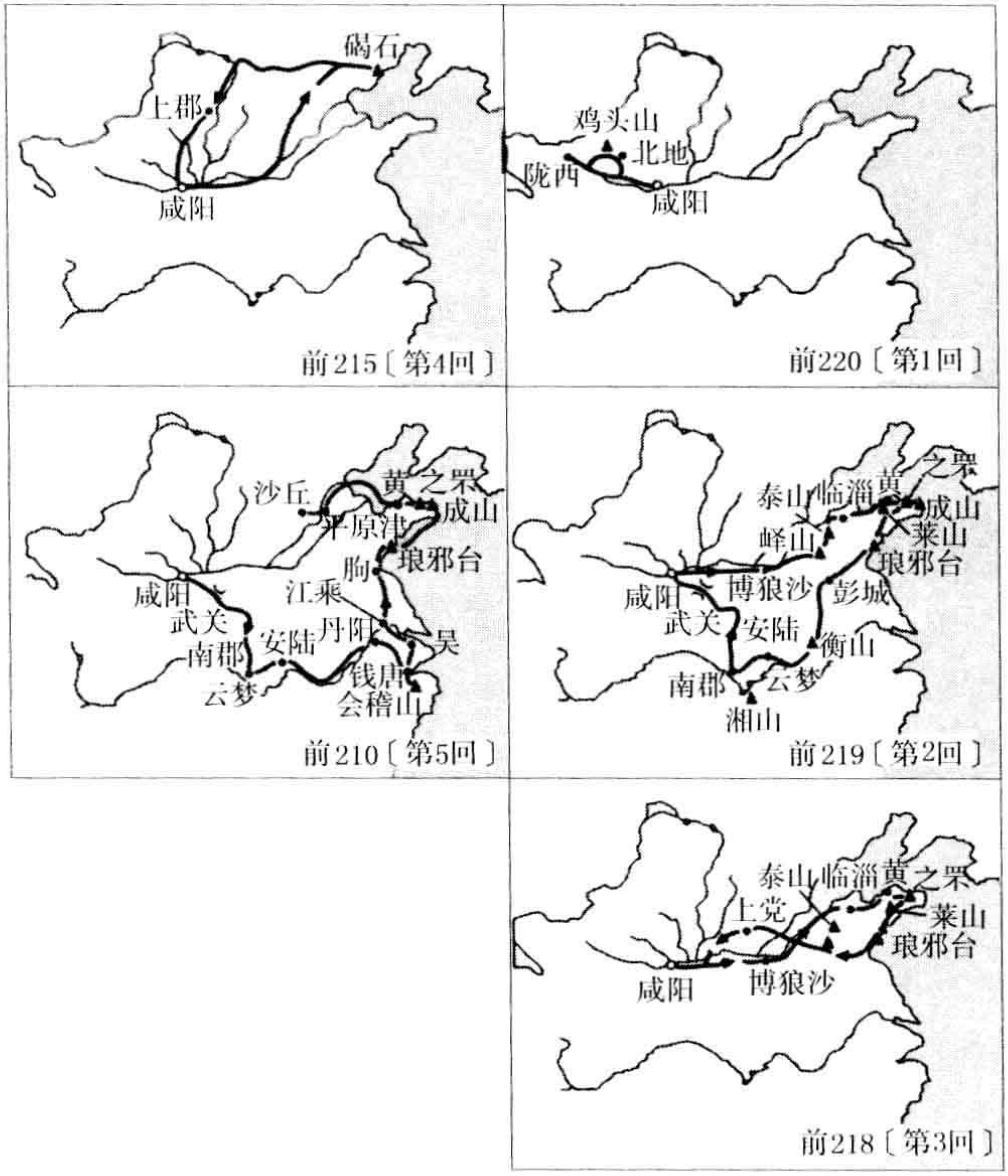
19 石砚　砚题为龟形，施以彩色。以此研墨、书写于竹简、木牍（《秦汉雄风》）

更加相似。若非如此，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文书和人员往来则不可能进行。秦王嬴政读到韩国韩非的书时甚至说，“若能见到此人，我死而无憾”。可见，秦王能够读懂韩国的文字。战国是一个非常能够吸收众人所长、重视交流的时代。

李斯、赵高、秦太史胡毋敬等人分别著有辞书《仓颉篇》、《爰历编》、《博学篇》。苍颉据说是文字的发明者，爰历出自爰书（审判文书）和历法。《仓颉篇》今天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的竹简、木简残片的引文中看到此书的只言片语。若想成为官吏的话，首先要能背诵这本书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四字一句，很方便记忆。如“秦兼天下，海内并厕（秦国统一天下，海内一致服从）”这类词语，背诵的同时也进行了思想教育（《仓颉篇》流传至汉代时，将“秦”改为了“汉”）。又如“薄厚广狭”是反义词的组合，“黫黯深黑”将深黑之义的“黫黯”难字放在一起以便记忆，如此发挥了字典的释义作用。

秦朝的领土面积

嬴政从秦王一变为皇帝，自统一第二年的前220年至他去世的前210年的十年间，他五次巡行全国。平均两年一次的巡行，可谓不同寻常。第二次巡行时，为了在琅邪台建造离宫，嬴政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第



20 秦始皇巡行图 秦始皇自统一后第二年的前 220 年至他去世的前 210 年的十年间，五次巡行全国，在巡行地处理政务

四次巡行时曾逗留于碣石离宫。最长时间的第五次巡行费时七个月，秦始皇本人也死在途中，当时可能本打算离开首都咸阳巡行十个月。不论定都咸阳会付出多少牺牲，去地方巡行能够获得显示权威的政治效果是肯定的。秦朝设置左右丞相，巡行期间首都的政治委托给右丞相，秦始皇则带着左丞相在巡行地处理政务。

21 琅邪台刻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秦始皇巡行乃向征服地区炫耀威信之举。这是在巡行地树立的彰显功绩的刻石

秦故地称为“关中”，即四方设关卡的渭河盆地。地处自然要塞，易守难攻。然而，旧六国位于黄河、长江下游大平原，秦人出六国必须越函谷关、武关而下。关中，乃为四周高原环绕之海拔八百至三百米的较小平原，而东方大平原却是海拔一百米以下的广大土地。如果仅仅封闭在关中，而想要统治那里是很困难的。中央仅仅向地方的发布命令、派遣长吏仍觉得靠不住。李斯实现统一天下的构想中，要求皇帝巡行广大领土，同时登上东方大平原的崇山峻岭，去瞭望从背后环绕六国的东海。

然而，秦的天下可没有今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广大。两千二百年前的秦帝国也就是今天中国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和东北三省之外的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不过现在领土的百分之三十，日本列岛的七倍。当然远不及汉、唐的疆域。

在征服地的扬威之旅

所谓巡行也称巡守、巡幸，目的在于祭祀全国山川和狩猎。不过，秦始皇巡行东方的同时又是一种在征服地炫耀自我威信之举，在那些地方他树立了七尊应该称为彰显碑的刻石。现在仅存有泰山、琅邪台刻石的

残片了，而且已见不到彰显秦始皇功绩的内容，所能见到的只是秦二世追刻的文字。其中并没有站在秦的立场、自我炫耀的主张。出于中央官僚手笔的那些文章，只是在《史记》中有所记载。大臣们将秦始皇的功绩写成四字一句的诗加以讴歌。如：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皇帝神圣，平定天下，不懈治理，夙兴夜寐，为民谋利，专注强盛）。（泰山刻石）

在这些敬慕秦始皇的赞美之词中，不乏引人注目之处：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六国邪恶，贪婪无厌，虐杀不已。皇帝爱民，兴兵讨伐，奋扬武德）……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歼灭强暴，振救人民，平定天下）

宣扬的完全是一种为统一而战、解救六国人民于倒悬的大义名分。任何时代，战争都被冠以正义的名号。在国内面对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秦国人民，在国外面对作为敌对国的旧六国人民，都要主张战争的正义性。秦国一方的正义，当然在敌对国那里是讲不通的。正义战争最终的归结点，即天下的统一。所谓："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琅邪台刻石）

什么是泰山封禅

被歼灭者

作为被征服者，六国一方的正义何在呢？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史记》虽记载了统一之后两次发生的暗杀秦始皇事件，但我们仍无法从中了解六国一方的心情。

荆轲的友人高渐离是个演奏筑的高手，天下统一之后曾为荆轲暗杀秦始皇壮行。荆轲被杀，高渐离因为参与此事所以逃亡，隐姓埋名为人做雇工。一日，听到主人的来客演奏筑，他就信口予以点评。主人叫他也试试，他也就听天由命地从一直小心隐藏的箱子中拿出筑和衣裳开始演奏。在场的听众无不为他的演奏落泪。此事被秦始皇听说了，荆轲的友人高渐离终于被发现。秦始皇怜惜他的才艺，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演奏筑。即便如此，高渐离仍将藏在筑中的铅块，投向秦始皇，却没有击中。结果，高渐离被杀，秦始皇从此再不让其他国家的人接近自己了。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的第三次巡行途中，秦始皇在博浪沙（河南省郑州东北）遭盗贼袭击。所谓“盗贼”是秦国一方的说法，事件的主谋是被秦歼灭的韩国人张良。张良的祖父、父亲都是韩国的丞相，他本人年少时祖国为秦所灭，弟弟被杀甚至未得掩埋。他发誓倾家荡产也要雇用刺客复仇。他的力士将一百二十斤（三十公斤）的铁锤投中秦始皇的副车，暗杀未遂。

张良在秦始皇死后，跟随刘邦投身于颠覆秦帝国的战斗。

祭天——祭祀的继承

从秦始皇巡行的路线来看，他非常执著于对山东的踏访。当时的“山东”，比今天的山东省要广大，是华山以东的意思，在秦的根据地关中以东，泛指东方六国之地。无论如何，就从不知海洋为何物的高原的秦人来说，当他们面临渤海时，有的是一种身处异境的感触。而且由黄河与长江流域结成的广袤平原也与黄土高原地形有着鲜明的反差。广袤无垠的平原上耸立的山东丘陵的山山岭岭，这景致使人产生一种与天际沟通的肃然心情。

秦始皇入山东，特别踏访了旧齐国一直祭祀的名山大川。齐国是统一战争中坚持到最后的大国。作为歼灭齐国的秦，不能放弃齐国传统的祭祀。因为如果放弃祭祀的话，恶鬼的作祟就会降临君主和国家。所以秦始皇必须亲往祭祀，而齐国祭祀并不集中一处，有着号称“八主”、“八神”的八个分散的祭祀地点，仅仅巡视一遍也是非常辛苦的。

所谓“八神”，即天、地、日、月、阴、阳、四季、军神等八种。在天地之间的世界，由于日月循环和阴阳二气交替引起了四季的变化。一旦这种循环受到阻碍，山东地方将黄河泛滥、旱灾频仍，而诸国战乱不已。当时人们认为战争并不是单纯的人事，也是自然循环不畅所引起的。所以将“军神”列入八神并非不可思议之事。来自内陆黄土高原秦国的君主，当他面对碧海时，不

22 泰山之巅 位于山东半岛的泰山虽仅有一千五百四十五米的高度，自古以来却被视为神圣之地，历代帝王在山顶筑坛举行封禅仪式

禁为东方人看重季节循环的思想所倾倒。他三次踏访琅邪台，建筑宫殿并逗留三个月之久。从琅邪台的高台眺望北面的海岸，风景的确非常美丽。

据说封禅的“封”指隆土筑坛祭天，“禅”指筑坛祭地。秦始皇是以祭天地的封禅来表示自己意欲的。在中国有很多山岳，耸立于山东丘陵的泰山虽然仅仅一千五百四十五米，却以其傲然的雄姿，自古以来被视为神圣之地。攀上不过一千五百米的高度，天地之间一览无余。仰望夜空，全身心都能感受到漫天星斗的跳动，俨然一架天然的天象仪。通常于泰山之巅筑坛祭天，在泰山脚下的小小梁父山祭地。

秦始皇即位第三年的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他首先登上峄山，立石镌刻了彰显自己功绩的表彰文。峄山又称邹峄山，虽然仅有四百五十四米高，却是春秋时期邹国北部的一座名山。因山体奇石怪岩络绎连绵，得名峄山。巨大的花岗岩地表，呈现出一派神秘的风貌。穿越岩石缝隙可到达主峰，在那里向南眺望，一览无余。这里建造了春秋邹国的都市。战国末年，早在秦始皇的一百年之前提出易姓革命论的孟子（孟轲）就出生在这里。

“天命不常定，降于有德而去无德者。天视人民所视，天听

人民所听。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君有大过错时则进谏，反复进谏而不听者，就把他换掉。”

这是相当激进的思想。孟子于孔子的大约一百年之后，在鲁国附近的邹地提出这一学说。

封祭与帝国不灭宣言

秦始皇登峄山之后，就召集那里的齐、鲁儒生讨论封禅与祭祀山川的仪式。毕竟秦人不懂东方祭祀的内容。然而，秦始皇认为他们众说纷纭，无所适从，因而斥退了随行儒生。最终，秦始皇清车路，走泰山南麓登顶，立石歌颂自己的统一伟业，并在那里举行了泰山封祭仪式。从泰山南麓登顶的山路，在今天是从红门至中天门，最终到达南天门共一千六百的台阶，然后直抵玉皇顶。之后，秦始皇从北麓下山，在梁父山举行了禅祭仪式。下山途中突遇暴雨，曾避雨大树之下。据说那棵被封为五大夫爵位的松树，一直活到了今天。

泰山举行的仪式，采用了秦太祝在雍城祭祀上帝的祭祀礼仪。总之，由于不了解东方地方的封禅传统和方法，只好使用了秦国祭天仪礼。司马迁记载说因为秦对封禅的仪礼保密，所以没有留下记录。对于祭祀用的牺牲、祭器的种类和数量一概不知。

有关当时封禅的史料，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也只有泰山刻石的残片了。仅仅十个小篆文字，至今还残存于泰山山麓的岱庙。残

23 泰山刻石拓本（岱庙所藏） 仅仅剩下十个小篆文字的残片

存的“（臣李）斯、臣（冯）去疾”和“臣请”等字，应该是李斯、冯去疾的名字。在对秦始皇表彰文的最后，有秦二世欲将父亲功绩流传后世的诏书片断。为秦始皇讴歌的文章虽已不见实物，但其内容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是有记载的。然而，文章完全没有涉及秦始皇本人祭天的内容。看来立石祭天的祭文，与秦始皇的表彰文不同，是写于玉牒、埋在地下的。

后来，西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前110）夏四月，也登泰山、立石山顶，举行封禅祭祀。筑叫做“封”的土堆，边长一丈二尺，高九尺，玉牒就埋在这下面。据说玉牒内容是绝对保密的。封禅之后，秦始皇又巡游海上，寻求仙人。东汉光武帝也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正月丁卯日巡行东方，二月踏访鲁地、泰山，辛卯日登上泰山，举行封祭。始皇帝的遗产如此得到了继承。

秦始皇在泰山曾对天宣称帝国不灭，他自己也相信东方渤海之上存在着长生不死的仙人世界，并企盼自身肉体的不灭。然而，现实中不灭的帝国和肉体毕竟都是不可能的。一场动摇帝国的战争已经逼近。

对外战争——与新天下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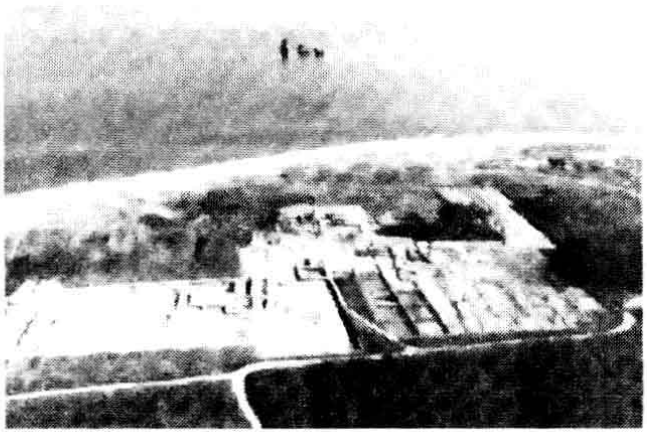
与蛮夷的战争

李斯从廷尉升为丞相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前213年。他目睹了由自己辅佐之帝王生命的结束。后来，他拥立了二世皇帝，自己也在翌年（前208）遭刑法处决，没能看到帝国的灭亡。

秦始皇三十四年，咸阳宫中召开了二十六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御前会议。七十名博士首先敬酒，祝皇帝万寿。仆射周青臣对皇帝的美德大加赞誉：

>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

秦始皇闻此，十分欣慰。只要对周青臣的措辞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他的贺词中有一句八年前的御前会议上没有出现过的“放逐蛮夷”。八年前的所谓“天下”，最多也就是将六国之地予以兼并之后的领土。然而，当时不平定蛮夷就无法统治天下的问题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很明显，秦的敌人已经由六国诸侯转变为蛮夷，时人开始意识到中华与蛮夷的差异了。秦汉时期尚无“中华”一词，其实称为“中夏”会更准确些，不过出于习惯，“中华”



24 碣石宫遗址发掘现场　公元前215年的第四次巡行时秦始皇逗留于濒临渤海湾的碣石宫

一语现在已经作为通行的称谓了。无疑，出席那次御前会议的每一个人和皇帝都在考虑蛮夷的问题。因为这次会议正是在与蛮夷出现战争危机之时召开的。

十五年的秦帝国历史，如果分为六年、六年、三年三个时段的话比较好理解。最初的六年是与战国六国之战结束之后、带引号的“和平时期”，此间秦始皇进行了四次巡行。第二个六年是“对蛮夷战争时期”。此间，巡行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秦始皇进行了第五次巡行，可他却死于巡行途中。最后的三年是秦二世至子婴的“帝国崩溃时期”。

“对蛮夷战争时期”开始以后，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开始了第四次巡行，这次他向北出发，逗留于濒临渤海湾的碣石宫，在碣石门的礁石上篆刻了表彰文。碣石宫地处今辽宁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碣石就是立石的意思，因这一带海岸礁石众多而得名。现在，那里有著名的北戴河避暑胜地和明代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还是孟姜女传说的发祥地，有姜女庙和被认为是她坟墓的礁石。当然，孟姜女的传说不过是北周至唐朝的产物而已。孟姜女的新婚郎君被秦始皇征调服徭役去修长城，她出于担心带上丈夫的冬装来到了长城。没想到丈夫已经死在那里，她痛哭流涕，以致哭倒了长城，城墙下露出许多白骨。孟姜女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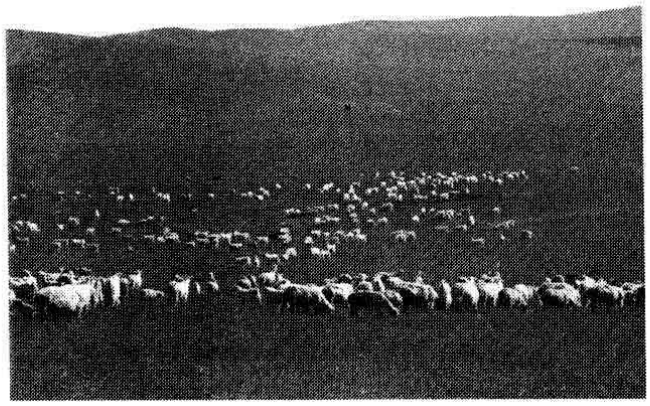
滴有丈夫血迹的遗骨带回故乡，由此被称为贞女。

贸然对匈奴、百越南北同时开战

秦始皇在碣石宫曾让方士们去东海尽头寻找仙人和长生不老之药。但是，结果却出现在了东海的北方：燕人卢生从海上归来，献上了一本《录图书》。书中记载了“亡秦者胡”的预言。汉代人说“胡”实际就是秦二世皇帝胡亥，不过是因为他们已经目睹了秦朝的瓦解，所以才作出如此的解释。在秦代人们所说的“胡”不是西域人，而是指北方游牧民，即匈奴。

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出击匈奴，占领了“河南”（即鄂尔多斯）地区。所谓河南，即西、北、东三面为黄河所包围的土地，因为容易与河南郡、河南省的河南混淆，所以明代以后，自那一地区被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落占据之后，就出现了鄂尔多斯这一地名。鄂尔多斯虽然在今天有着广袤的毛乌素沙漠和库布其沙漠，但在当时是丰美的草原地带，乃匈奴与秦的必争之地。秦本来就企图占据那里，使其成为军马的牧场，动员了三十万军队的战争，用了七年的准备时间才得以开始。秦始皇从北方巡行回到咸阳之后，立刻开始了这一场战役。

不仅如此，翌年的三十三年（前214）秦发兵五十万，在南方开始了对百越的战争。这是一场南北方同时发动的贸然战争。秦在与六国交战时虽然有过同时与人数占多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南北两端，且兵分三十万、五十万同时作战毕竟是失策之举。



25 鄂尔多斯　西、北、东三面为黄河所包围的草原地带，秦与匈奴的必争之地

素有“陆梁”之称的南方地域，是从长江以南至抵南海的山区，乃横跨湖南、江西、广东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之绵延不绝的山岳地区。山区的沿河地带开通道路，分散着大大小小的聚落。

在中国地形图上，这一带为褐色与绿色马赛克式交错地区，在绿色平原和褐色山区生活的两种人交错并存。习惯于北方高原干燥生活的秦人，移居到那里的话是难以适应潮湿高温气候、抵御传染病的。所以，移居那里的多是些脱离户籍的逃亡者、因贫困入赘的卖身奴以及卷入这场战争的商人等。在那里新设置的桂林郡、象郡、南海郡，都派些罪人刑徒去驻守。秦的对手是被称为“百越”的越人，所以这并不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

多难的百越征服战

据《淮南子》的记载：在秦尉屠睢的指挥下，五十万军队被派往南方。“尉”，即郡尉、县尉等军官。能够统帅五十万军的尉应当是郡尉。后来建立南越国的赵佗就是南海郡尉，所以也称“尉佗”。蒙恬伐匈奴的军队也只有三十万，统一之前秦王发动出击楚国总攻击时，先让李信发兵二十万，结果受挫；再由王翦出兵六十万方得以取胜。这次对百越之战的兵力与当年攻楚的兵力大体相当。

与秦对垒的“百越”并非单一的国家，秦要征服的是越人居住的整个地区。所以军队分为镡城、九疑、番禺、南野、余干五处，驻扎了三年之久，即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湖南省的南部、广东省广州、江西省南昌，秦企图以此分布于广大区域的五个据点，统治居住于山岳地区的越人。

秦仅仅靠控制一些据点来维持对百越的统治，可谓困难重重。《淮南子》的还记载说：“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北方人南下最难以适应的是南方潮湿高温气候。司马迁到南方出游时有过切身体验，甚至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东汉王充也说：“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论衡·言毒》）认为嘴里有毒，有着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还说：“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有毒物质的多少与土地的干湿度有关，由于江南草莽川泽多生的蟒蛇等有毒动物，也使北方人感到恐怖。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一则以“毒言”为题的口供记录很耐人寻味。这份法律文书记录的是一起有关南方特有习俗的案子。说的是某里居住的甲等人因为丙口舌有毒，而不肯与丙会餐的案子。根据丙的口供：他的外祖母以前也曾因为口舌有毒论罪被流放，从那以后丙家如有祭祀，甲等人也不出席。里的祭祀时参加的人

也拒绝与丙会餐。看来，在南方高温潮湿气候条件下，才出现了“毒言”这类回避病菌、预防传染的习俗。

河南（鄂尔多斯）与南海三郡

一系列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秦向南海派兵、运送军粮利用的是水利。注入长江中游洞庭湖的湘水和漓水上游之间，相距不过几米，是两条流向相反的河流。如果能将两条河沟通的话，船只即可顺漓水而下，经珠江直抵南海。然而，因为两河床之间有几米的高差，相互沟通并非易事，秦后来设计了一条长约三十四公里的运河，称之为“灵渠”。在湘水的分流上安置水闸，用水闸的开合解决了高低差的问题。从而也确保了沿岸的交通道路。

秦付出极大的牺牲，终于从南海得到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圆玉与方玉，圆的是珍珠）、珊瑚等物产。翡翠是一种硬玉，因为颜色与翡翠鸟相似而得名。翡翠的硬度在6.5至7度左右，质地坚硬。本生成于蛇纹岩之中，经风化剥离而流入河、海。白色居多，含铬者可变为美丽的绿色。在日本仅见于新潟县糸鱼川等地。缅甸翡翠据说是在唐代以后开始采掘的。

秦征服南海之后，西汉武帝继而在那里设置了九郡，直至唐代安南都护府时期，中国的王朝从未间断对东南亚丰富物产的需求。那些物产既是南海贸易圈的产物，同时也成为中国南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与东南亚地区的媒介。

在对匈奴、百越的南北战争中，秦又像曾经提出解放六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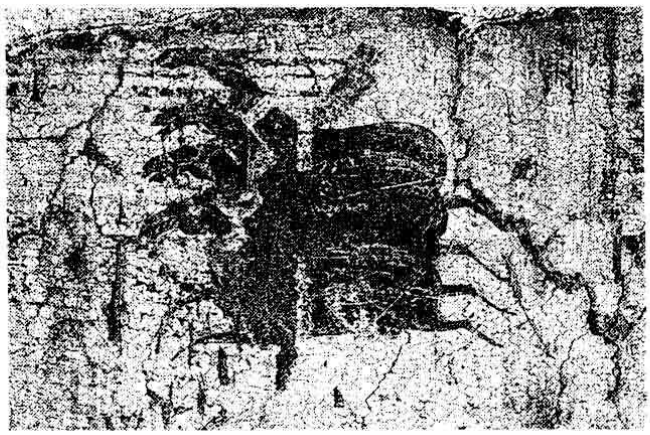
26 灵渠　为连接湘水与漓水而修筑运河，以水门调节水位解决了高低位差的问题，从而确保了通往南海的交通道路

27 南越王墓出土西汉玉雕犀角杯

众的大义名号那样，提出了“放逐蛮夷”这种新的大义口号。如此，在兼并六国之地后，又将河南（鄂尔多斯）、南海三郡纳入了帝国的版图。秦的天下确确实实地得以扩大了。

战时体制的土木工程

为了进行这两场战争，秦始皇三十三（前214）年至三十五（前212）年之间，首都圈与战区的边境地带都实行了战时体制。在北方修筑了环鄂尔多斯地区的长城一线，在南方筑起了要塞据点。上述灵渠也是此临战体制的一个环节。为了迅速地从咸阳向长城派遣军队，还斩山填谷地修筑称为“直道”的军事道路，自北方的九原直通南方的云阳。这一时期，咸阳城还扩建到了渭河南岸，并且修建了阿房宫。在建造自己陵墓的同时，秦始皇向陵区移民三万户，兴建了丽邑，向直道始发点云阳也移民了五万户。自二十六年统一以来，这是大型土木工程建设最为集中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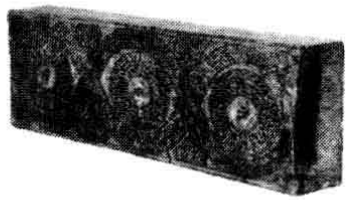


28 壁画车马图　发现于秦都咸阳秦 3 号宫殿遗址中，由于年代久远，秦代绘画实物至今十分罕见

诸如长城、直道、阿房宫、丽邑、云阳、灵渠的建设，都是在新的天下形势下，为实行战时体制所需要的土木建设工程。因此，不能说“秦统一天下而修万里长城”，而应该说“秦统一天下后，在发动对外战争时修万里长城”。由于考古学的调查、发掘还仅仅进行了一部分，所以当时的历史真相尚不明了。

秦在战国昭王时期已经开始修建长城，今天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仍残留着当年长城的夯土堆。秦始皇时期的长城在黄河以北，沿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至今还残存着部分石筑长城遗址。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一万里，约五千公里的长城被称为万里长城。不过，当时的五千公里长城并不都是从零做起的，战国时期各国为防备骑兵战术，纷纷在国境线上修筑长城。秦对赵、燕诸国出于对匈奴战略防御考虑而修筑的北边长城予以了再利用，兼并六国之后秦放弃了内地长城，从“放逐蛮夷”的战略出发而修筑了北方长城。特别修筑了阴山山脉长城，并使其向东与赵、燕长城连为一线。

直道至今在陕西省仍有部分遗址可见。就通直道的地形而言，南部穿越黄土高原的山间地带，北部经鄂尔多斯平原一直北上。全长约九百公里的直线道路，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着功效。



29 龙纹空心砖 咸阳城一号宫殿遗址出土龙纹砖（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巨大的首都与阿房宫

咸阳城自公元前350年战国时期秦孝文公始建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四十个年头。咸阳即“皆为阳”之意，指两类阳地之和的意思。河之北为阳，南为阴；山之南为阳，以北为阴。所以渭河之北与九嵕山之南为咸阳。渭河北侧为咸阳原的阶地，在阶地上修筑了宫殿。至今，那里的还残存有建筑物夯土基础遗址，阶地的断崖上不时可见排水管道、水井、陶器的残片。由此依稀可见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之时，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移居于此的都市情景。当时，为了秦帝国的维持，曾将地方富豪移居首都。汉代继承了此项国策。按照五口之家计算的话，咸阳应是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愧是与推算人口为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的秦帝国相符的巨大都市。东方齐国首都临淄也不过才三十五万人口。不可思议的是咸阳都城竟然未发现城郭的存在。咸阳城南半部为渭河北上所冲毁。

作为首都咸阳城的护卫，秦还建起了十五万人口的丽邑和二十五万人口的云阳这些卫星都市。丽邑还是守护皇帝陵墓的都市。这种帝国首都的构建计划，后来又为西汉朝所继承。秦在二十六年兼灭六国之时，并未立即实施兴建帝国的计划，而是在秦始皇巡行的六年之后，在战争新形势的紧迫情况下开始帝国建设的。

30 秦阿房宫前殿复原建筑

对外战争开始之时，秦因渭河北岸的咸阳城狭小，而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这一动植物园中营造朝宫。渭河北岸水利不便，只好以水井补偿。渭河南岸则水利充沛，乃终南山的充沛水源注入渭河所致。战国时期出于军事优先的考虑，背水建立都城。今天，要建设一个与帝国地位相称的首都。首先，建筑一所南北五十丈（115 米）、堂上可以坐一万人的前殿，堂下可以竖起五丈（11.5 米）大旗。因未竣工，称为阿房宫。所谓前殿就是正殿。

今天在那里仍留有东西一千二百七十米、南北四百二十六米、高十几米的夯土基台遗址。由渭河北侧的咸阳宫渡渭河，阿房宫等宫殿的建造模仿了天体的位置。以渭河比拟银河，在南方与天极相应建造极庙，北面建造营室（天马座、天帝的宫殿）与阁道（王良星座）连接。这一新都市的风貌也在地下予以了再现。

焚书坑儒与不死仙药

丞相李斯的措施

丞相李斯深知此次战争之艰难。与六国之战是外交与战争交错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自有一套运行的原则。如今则是与游牧骑马民族、山岳民族那种生活形态完全不同的异族作战。尤其是与越人的战争，面对的是没有任何国家概念的山岳民族。虽然艰难，但是李斯认为这不失为一次将六国残余势力的视线引向外族的机会。“放逐蛮夷”之战，可说是李斯之统一天下战略的第二阶段。此举的成败，事关统一天下之后是否应当再进行战争的问题。

上述的御前会议上，博士淳于越谴责周青臣阿谀皇帝。李斯则将否定郡县制的淳于越斥为愚儒。“儒”既有温柔也有愚蠢之意，当时所谓“儒”并不仅仅指称那些继承孔子学说的学者，在语气上指愚蠢学者不知其所云的意思。何况，淳于越是被秦最后歼灭之齐国的人士，从弃楚投秦的李斯立场来说，对如今仍拘泥于封建制的齐人甚是反感。丞相李斯掌握着当时地方郡县的详细情报。

里耶秦简包括了秦三十三年（前214）、三十四年（前213）纪年的内容。三十三年四月丙午（六日），洞庭郡官署征发了阳陵县十二名男子，这些人都是因犯罪服徭役的刑徒。罪人每日工钱为八钱，除去伙食费可余六钱；若以赎罪罚金为一千三百四十四

钱折算的话，必须服劳役二百二十四日方可赎罪。秦不把这些罪犯关进牢狱，而是利用他们做各种劳役。让他们拿起工具建造土木工程，拿起武器投身战争。可以想象此时他们是如何从军与百越作战的。

次年八月，据迁陵县的报告：有弩一百六十九件，其中四件运往益阳县，三件运往临沅县，剩余一百六十二件。需要向武器不足的县进行调剂。这些记载虽嫌琐碎，当时这种事无巨细均须记录的情况，反映出即便在边疆地区，郡县制的机能也能充分地得以发挥。

对诸生反体制批判的镇压

李斯以禁止战时扰乱首都秩序学者的言论自由，表达了自己在全国坚决贯彻临战状态的决心。那一为后世广为传播的焚书坑儒事件，即公元前213年发出交出某些特定书籍的焚书令，以及前212年坑杀四百六十名诸生之事。焚书坑儒事件是作为秦始皇暴君形象的证据而众所周知的。正如后世儒生所强调的那样，这并不是法家李斯镇压儒家的政策，李斯的动机在于防止当时秦实行的体制因为受到批判而导致郡县制无法实行。

列于取缔书籍第一位的是史官所撰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当时，被秦所灭六国的史书尚存。像秦赋予统一战争正义性一样，六国也一定会将这场战争记载为侵略战争。第二位是除博士藏书之外所传习的《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一律要交到各地郡官署

统一烧毁。《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虽说不是批判秦的书籍，但由于它们都是在过去的历史之中发现理想政治、讽刺现实的批判工具，所以李斯认为有可能被利用来作为批判体制的工具。当时的书都是写在竹简、木简和帛（丝绢）上的，所以如果焚书令得以彻底实施的话，全国范围火焰熊熊的景象可想而知。

就违反法令的处罚而言，如有聚众性议论《诗》、《书》者处以“弃市”（处以死刑之后，将尸体暴露于街市），厚古非今者将一族处死，官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日之内尚未烧书者，处以黥刑并罚为筑长城劳役。此外，规定医学、卜筮、农业书籍不在禁书之列，学习法令者可以向官吏请教。

坑儒的对象是诸生，即学者。事发原因在于方士，他们因为找不到仙药，转而诽谤秦始皇，构成惑众行为。在对咸阳诸生的审查中，有四百六十名被活埋处死。当时所谓“诸生”指的是寻求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和信奉孔子的儒者。不论此事与儒者是否无关，毕竟秦始皇不再信任方士是坑儒的导火索，而且就所坑对象来说，与其说“坑儒”，不如说“坑诸生”更为确切。将坑儒特定为坑杀儒者的说法，是东汉以后的事了。

方士与秦始皇

秦始皇巡行东方时，开始与方士频繁接触。三十二年（前215）巡行碣石时，曾派燕人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羡门、高誓都是仙人。当时仙人也写作“僊人”，“僊”是人高升的意思。韩终、侯公、石生等方

士也去寻求仙人和仙药（不死之药）。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都是燕人，为方僊道仙人。

《史记·封禅书》曰：仙人、仙药据说藏于渤海之中三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又曰：“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正是一派海市蜃楼景观。

“蜃楼”，即蜃吐气而在海上呈现楼台的现象。《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曰“海旁蜃气象楼台”。现代汉语称为“海市蜃楼”。若按科学的解释：由于空气的温差产生了密度差，从而引起的光折射现象。在日本的富山湾、琵琶湖也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观。景观并非生成于空荡的海面。十至几十公里之外的实际远景，或向上反转、伸缩（春季、初夏出现高位海市蜃楼），或向下反转（冬季出现低位海市蜃楼），重叠显现。

此现象多出现在山东半岛、特别是蓬莱阁北的庙岛群岛，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海域，六月冷水海面之上的空气中，有微风携暖空气浮现时，高密度冷空气中会出现折射，即可见到海市蜃楼。在实际的岛屿之上，反转地出现该岛屿的样子。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到登州（蓬莱）的海市蜃楼。这些现象被人们想象为地上有仙人的存在。

对于人体老化机制，现代医学逐渐予以了解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必定是细胞分裂停止、无法进一步新陈代谢所引起的。一方面平均寿命随着医学的进步而增长，另

一方面人的个体最长寿命在一百二十岁左右，这是从古至今不曾改变的。由遗传基因所导致的人体老化机制，古代与现代是一样的。能够达到最长寿命的人被视为仙人，说寿命可达两三百岁，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谓东汉的冷寿光一百五六十岁，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等方士活到一两百岁，是无稽之谈。了解现实的方士们，致力于探索各种延缓衰老、长生不死的方法。

方士卢生曾向秦始皇讲述如何成为真人的方法。说："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劝说始皇微行外出毋令人知晓，如此可除去身上恶鬼，成为真人。还说人主所居之处若让人臣知之，则有害于精神。自此，因为希望成为真人，秦始皇不称"朕"，自谓"真人"。乃令咸阳周围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所宫观，以复道（上下双层道路）、甬道（侧面有墙遮蔽的道路）相连。

然而，秦始皇被方士激怒了。徐市（徐福）等方士耗资巨万，却一直没能找到仙药。秦始皇得知卢生在享受优厚的待遇同时，却在背地诽谤自己。秦始皇还对长子扶苏很愤怒，因为扶苏了解边远地方的百姓对政治的不满。此时，秦始皇知道不采取严厉措施的话，天下将不会安定。于是，扶苏与蒙恬一同被监禁在了北边的上郡。

最后的巡行

秦始皇在南北战局稍显平稳之时，于三十七年（前210）开始了有生以来最大

一次巡行。上一年连续发生了一些不吉的事件：陨石落于东郡，上面居然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文字；有一持玉璧者留下“今年祖龙死”一句话和玉璧，扬长而去。玉璧正是九年前秦始皇第二次巡行渡长江时所沉的那一块。秦始皇占卜，得“游徙吉”卦。于是向黄河上游榆中移民三万家，且于次年年初十月癸丑日出发巡行。

1993 年湖北省荆州市周家台秦墓出土了一卷写在木牍上的日历，由此可知始皇三十七年十月一日是辛亥日，这个月不是大月（三十日），而是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癸丑日是三号。“游”被理解为离开首都咸阳外出巡行。

第五次巡行，即使最终因自己死在途中而中断，也耗时近一年。出于战争缘故，重开停止四年之久的巡行，而且本人又不能镇守首都，这一切都需要很大决心。仅在首都是不知天下情况的。他让左丞相李斯同行，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批准了少子胡亥本人一同出行的要求。秦始皇的夫人没有一个留下姓名的，只知道他有儿子二十几人。长子是被幽禁的扶苏。末子是胡亥。

与以往四次巡行的路线不同，他首先到了因与百越战争而有所动摇的长江中游，十一月到达云梦，在此祭祀了位于九疑山的舜庙。皇帝亲自到地方是有危险的。乘船顺江而下，出江南，即出今天的浙江省钱塘江，登会稽山，祭祀禹王。史载他在此眺望南海，实际上南海在遥远的南方。战争时期开通的湘水至漓水的水上通路可以抵达南海，毕竟皇帝亲赴那里有所不妥。最

终，秦始皇巡行的南线也未能越过长江流域。对匈奴、百越的战争，并没有明确的胜利宣言，匈奴退回了蒙古高原，百越回归了山岳地带。

单一法制的天下统治

秦始皇在会稽山也留下了歌颂自身的表彰刻石。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收载了这篇刻石文章。文中歌颂了他如何在百越之地移风易俗，其中还提到那里具体的婚俗，如“要隐藏过失，伸张正义；有子寡妇再嫁，为背叛亡夫的不贞行为”。又如“家族内外有别、禁止淫乱的话，则男女关系洁净真诚”。又曰：“夫与他人之妻行不义，若杀之无罪，则男人懂得守义。”还说“若对妻子逃亡改嫁他人、另寻新夫生子不予承认的话，人们将会谨慎淫乱行为”等等。对于那里与北方不同的婚姻习俗试图予以规范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北方秦国早在战国时期的公元前 375 年已经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家庭就是服兵役、纳税的基本单位。商鞅变法时下令：“一家有二男而不分家者，其赋税加倍”，“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以此奖励单婚家庭。

秦国本来也有婚后仍然二世同居的习俗，但在战国时为推行富国强兵之策而实现了单婚家庭化。所以，当秦遇到南方社会婚姻习俗时，就很自然地企图按法律予以统一治理。比如在秦律中可见“即便已婚女子离家出走，年少而未向官署提出结婚申请者，不构成逃亡罪”，“与妻子离婚而未提出申请者受罚”。可见，

国家希望对婚姻予以严格的管理。严格依法治理天下，是李斯提出的方针。

秦始皇北至琅邪台，再次见到徐市（徐福）。徐市唯恐遭到谴责，就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也梦见与人模样的海神作战。问占梦者，博士答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最终在山东半岛的之罘（今芝罘岛）发现，并射杀一条巨鱼。

秦始皇的末期

秦始皇在平原津发病，不明其病名，仅知病得很重。遭此不测，他留遗言给长子扶苏曰：“于咸阳举行葬礼并下葬。”毕竟尚未确立太子，秦始皇内心因此感到不安。胡亥尚且年幼，他考虑正是敢于进谏的扶苏最可信赖。在竹简上写毕遗书，于卷绳结的黏土上封以印玺。主持先帝葬礼就意味着继承皇帝之位。如此重要的遗书，中车府令赵高竟然擅自扣下，没有送达扶苏。

据《史记》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的平台。然而，从出土的日历来看当年七月并没有丙寅日，所以可能七月是到达沙丘的月份，八月丙寅（二十一日）秦始皇死去。这样，与九月葬于骊山在时间可以首尾连贯。

李斯察觉到事态的紧迫：秦始皇死于赵王离宫一事，若为天下人所知，不知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诸如始皇公子之间皇位争夺、天下反乱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于是决定对始皇之

死秘不发丧，棺载于辒辌车中，这样，人们从外面就见不到车内的情况。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架铜车马，称安车或辒辌车。侧面有小窗可推拉开闭，后侧有开闭式车门可以进出。让宦官与棺同乘，所至上食及百官奏事如故。知道实情的人唯有胡亥、赵高、李斯及宦官五六个人。赵高和李斯废弃了始皇的封书，将赐扶苏为公子的遗诏，伪造成赐扶苏、蒙恬死罪的诏书。当时正值暑天，辒辌车中遗体腐臭，乃令人载入一石（三十公斤）鲍鱼（咸鱼），“以乱其臭”。这样解释为车上载有地方特产的话，也就不足为怪了。

始皇如果不死的话，最后应该去匈奴前线进行视察。那条路，从九原走直道（军事道路）回到咸阳。九月，胡亥发丧，登基二世皇帝。秦始皇之死的消息发布全国，其五十年的生涯，三十七年的治世落下了帷幕。

秦始皇的地下帝国

水银江河、人鱼膏烛台

从秦始皇即位开始，用三十七年修造的骊山北麓的皇陵工程终于宣告结束。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负责陵墓的最后工程。这也是他正式继承帝位的一个环节。遗体在发丧之后，送入尚无坟丘的陵墓地下。陵墓以两道城墙环绕：内城东西 580 米，南北 1355 米，外城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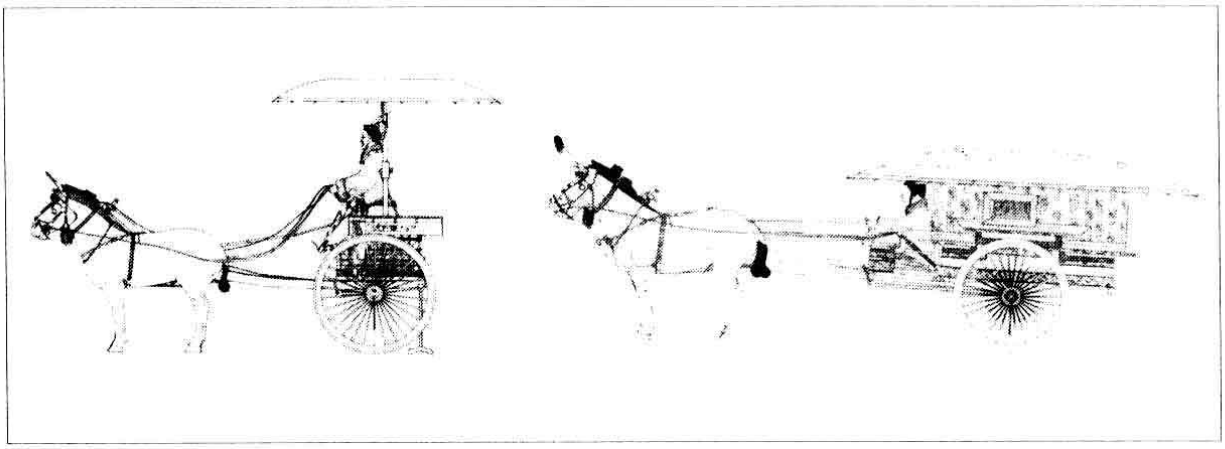
940 米，南北 2165 米，周长 6.2 公里。恰如生前国都的再现。陵区称为陵园。

通往地下三十米墓室有斜面的墓道，相当于十层建筑的地下深度，即使现代建筑也不会有如此深度。放入棺椁之后，在墓室上覆土，墓道门施以封印。地上再建以相当于二十五层建筑的坟丘。

从西安向东北 25 公里，走高速公路去临潼区，即可见到耸立的秦始皇陵。现存坟丘东西 345 米，南北 350 米，高 76 米，站在顶部可眺望北面的渭河、南面的骊山山脉。从南坡下来可知陵墓为双重夯土墙所围绕。所谓夯土是一种夯击黄土造墙的简易建筑方法，干燥之后其硬度不亚于砖墙。在秦代，长城、直道、坟丘、宫殿的基础等大型土木建筑都使用夯筑。

挖掘到三层地下水的深度，将铜水浇注到椁室的木料中，椁室内堆满了从宫中、官署运来的奇器珍怪。令工匠制作机械弩矢，若有盗墓者接近则射之。以水银象征全国百川和江（长江）、河（黄河）、大海，以机械使之流动。天顶上部绘有天文图，下部绘有地理图。以人鱼膏为烛台，使其长久不灭。

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已经是秦始皇死后一百年后的人物。他能否正确记载当年秘密建造的地下宫殿样子就很难说了。地下宫殿尚未发掘，目前不过是从外侧做一些探查。2002 年对秦始皇陵坟丘内部以遥感和地球物理学最尖端技术所做的探查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科研项目的认定，命名为“863 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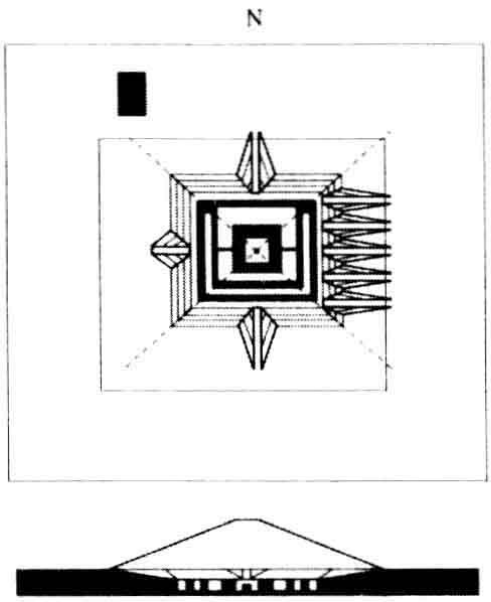
31 一号铜车马侧视图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32 二号铜车马侧视图

已探明的地宫内部构造

2003 年 9 月第一期调查结束，11 月 28 日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在北京汇报了一年来的调查结果。采用了地上发射弹性波（确认地下空间）、脉冲雷达（确认地下埋藏物）、电磁波（根据电传导度的测定确定金属物）、电波（确认地下水）、热红外线（测定地表温度，地下空间温度）等探查地下空间构造的技术，并根据地下释放岩石磁气（根据岩石中磁场方向的扰乱，测定地下人工设施的空间构造）、氡放射线（根据上升气体氡确定地下空间的存在）、重力（根据重力差确定地下空间的存在）、水银、伽马射线（确定岩石裂缝及地下水的存在）获取地下的信息。这些都是在不发掘秦始皇陵地宫情况下，从外侧所做的内部结构探查。

其结果探明：地宫东西一百七十米，南北一百四十五米，呈长方形。墓室：地宫中央深三十米，东西约八十米，南北约五十米，高十五米。秦始皇帝应该葬于此。墓室以周围十六至二十二米的石灰岩覆盖。墓室内既无深水亦无倒塌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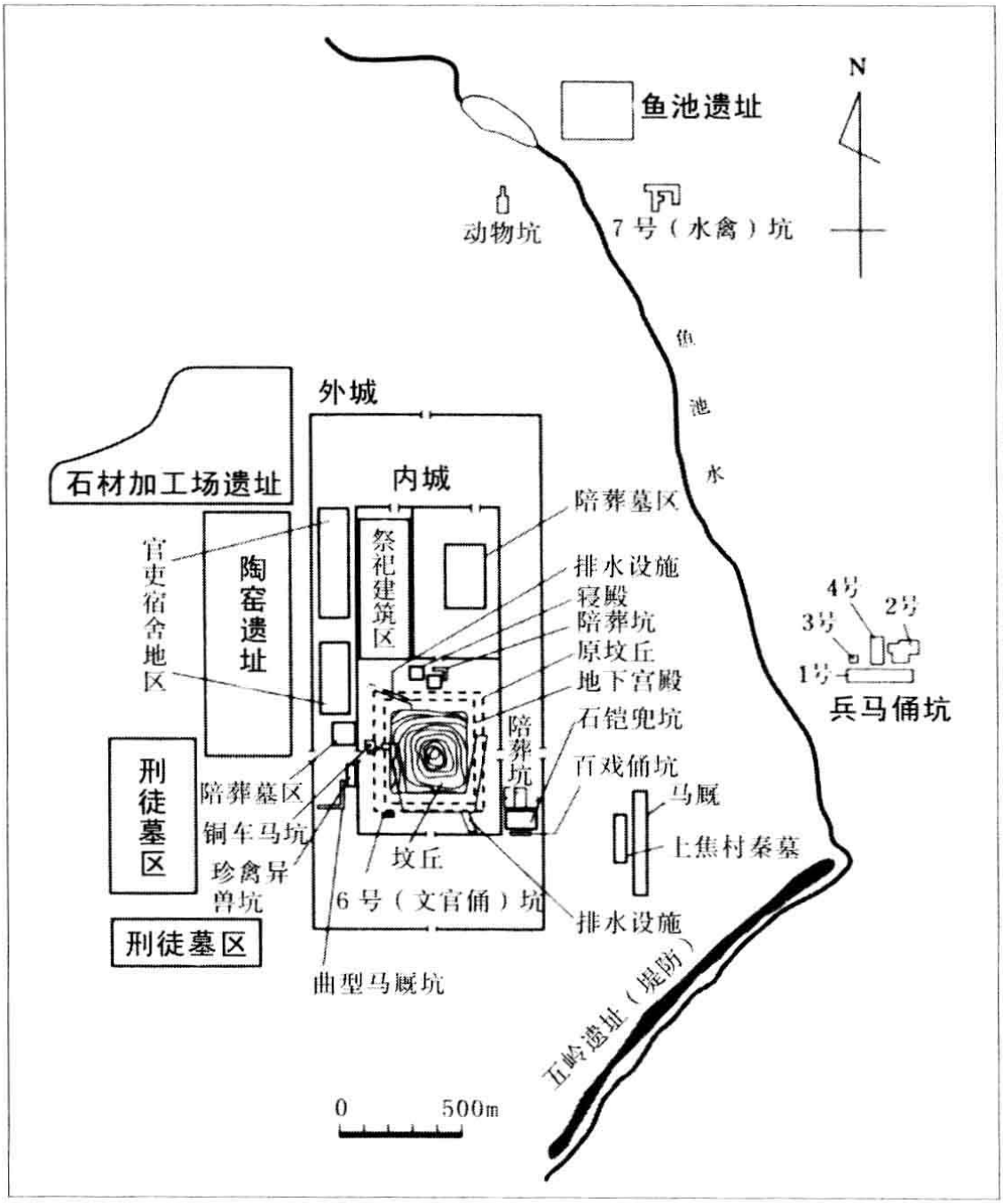
33 秦始皇陵地宫推测图（平面图、侧视图）

即便再长寿也有死的一天。希求实现永生，只有将遗体永久保存一途。若不欲遗体腐败，必须创造阻止蛋白质等有机物分解而造成微生物繁殖的环境。就现代方法而言，或是将遗体进行零下20度的冷冻保存，或使用将福尔马林防腐剂注入血管、腹腔的方法。在古代则使用地下深埋的密闭方法。秦始皇的遗体可谓使用了当时最尖端的保护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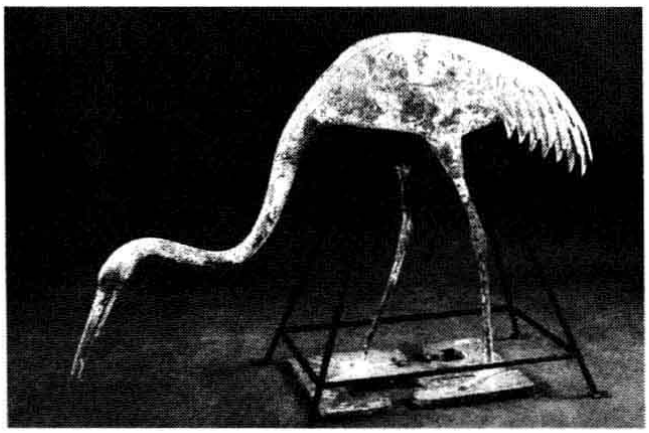
根据迄今为止的勘探调查，已经知道椁室在地下三十米。这样的深度不会受到太多温度变化的影响。一年之中地热温度恒定在十度到十五度之间。椁室周围填充以木炭，木炭有防腐和调节湿度的作用。

汉代墓葬中已发现三具未腐遗体：长沙马王推汉墓女尸、荆州男尸和2002年7月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汉墓身高一米五八的女尸。尸体皮肤状态良好、肌肉仍有弹性，为脂肪蜡化的尸蜡状态。对于现代社会也未能有效利用的冬暖夏凉的地热，古代中国人竟对其原理有着如此的认识，令人惊讶。

如此密封保存尸体，并不是为了让活着的人一睹其容颜。只是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升到地面上来。秦始皇遗体中的灵魂日常生活所需寝殿、休息的便殿、侍候膳食官吏用房都建在地上。陵园


鱼池遗址
N
动物坑
7号（水禽）坑
鱼
池
水
外城
石材加工场遗址
内城
陪葬墓区
官吏宿舍地区
陶窑遗址
祭祀建筑区
排水设施
寝殿
陪葬坑
原坟丘
地下宫殿
石铠兜坑
百戏俑坑
4号
2号
3号
1号
兵马俑坑
陪葬墓区
铜车马坑
珍禽异兽坑
刑徒墓区
刑徒墓区
坟丘
6号（文官俑）坑
排水设施
马厩
上焦村秦墓
曲型马厩坑
五岭遗址（堤防）
0
500m

34 秦始皇陵园平面图



35 青铜鹤　秦始皇陵园出土

的官吏须侍奉每日的饮食。

这所陵园在秦始皇死后的第四年，为项羽军队所毁。据说后来有牧羊童为寻找走失的羊而烧毁地宫，火势之大九十日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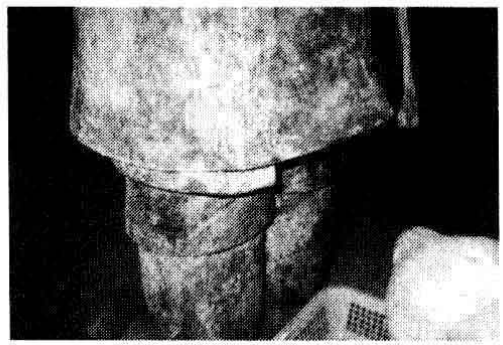
说到古代墓葬，人们每每瞩目于覆盖墓室的坟丘，其实整个陵园都是祭祀秦始皇亡灵的设施。陵园的情况也正在逐渐探明。2000 年夏，在外城东北发现水鸟坑（七号坑）。在地下挖出了一条河流，岸边放置了青铜制鹤六件、天鹅二十件、雁二十件，还有饲养水鸟的官吏俑。还发现有一边演奏乐器、一边饲养水鸟的场景。当时将人工制造的自然景观也带到了地下世界。在地上咸阳都城已成废墟、周边自然环境已被破坏的今天，地下却封存着当时的自然环境，让人十分惊叹。

天下的军队

1974 年在由秦始皇陵向东 1.5 公里处发现守卫秦始皇死后的这座都市的兵马俑坑，据推测士兵俑、军马俑八千个，气势威严。这既可能是秦始皇称帝之后十二年间也可能是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在短时间内制作的。

兵马俑所展示的究竟是秦始皇统一战争的战阵，还是始皇死时咸阳的守军？前者的话，就是六国统一时天下的军队，后者的

36 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总共约八千个兵马俑，从额头的皱纹到面部表情，神态各异、个性十足



37 士兵俑裤脚上的工人名　具有如此精湛的人物表现技艺的匠人，与其说是工人不如说是艺术家

话就是经历了对外战争的军队。笔者认为是后者。兵马俑坑包括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和未完工的四号坑空坑。一号坑是战车、骑兵混编的主力军，二号坑是机动部队，三号坑是指挥部。四号坑因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未完工。

士兵俑的面部像每一俑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各有特征。不论其写实手法，还是数量，如此活生生地描绘古代中国人的作品，不愧旷世之作。额头上的皱纹反映了年龄，表情代表着某种语言，可谓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号坑至三号坑秦始皇兵马俑据说能有八千尊，尚未全部发掘。从已经发掘兵马俑的密度来计算，一号坑约有六千尊，加上二、三号坑的共八千尊。实际上，已经确认的士兵俑的面孔有多少呢？一号坑仅东方最前列三排的轻装战斗服（战袍）俑的

38 士兵俑的面孔 士兵俑中胡须浓重的西部地区出身者，应该来自西域人、北方游牧民等不同民族

二百零四尊得以修复，正在现场展示。另外，包括十一个过洞（夹墙之间的细长土坑）部分，共发掘了一千零八十七尊。加上二、三号坑的士兵俑共一千三百七十九尊。由这些士兵俑可以看出秦俑的面部特征，各有不同。

袁仲一先生将士兵俑的身体特征分为三类：脸颊胖乎乎者为关中出身的秦士兵，圆脸尖下颌者为巴蜀出身的士兵，高颧骨彪悍体型者为陇东（甘肃东部）的士兵。他认为这是秦统一天下时的军队。上述三地在西周时期一是秦国的诞生地的黄土高原，一是秦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此为据点最终统一天下的关中平原，再一个是秦在战国以后的殖民地巴蜀地区（四川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士兵俑的面孔来看，在这些士兵俑中也可以找到被秦所灭的六国人，甚至有匈奴等北方游牧民出身者。

39 削刀、砺石　文官俑腰上挂着修改竹简上文字时使用的削刀、砺石

士兵俑、文官俑显示出的秦帝国拓展

士兵俑的面孔大致分为两类也许更好，即西方面孔与东方面孔。西方面孔，与特定的胡须、发髻的形状相互关联。唇须之外还有络腮胡的兵士，鼻梁高大、颧骨及下颚骨后腮突出、唇厚、发髻较高。络腮胡与下巴胡连为一体者，面孔基本是一样的。大八字胡须与高颧骨之下凹陷形状，很协调地构成了有特征的面孔。两腮收敛、脸颊伸展的脸型应该属于西方人。那些长脸颊、眼睛上挑的盔甲士兵俑和战袍武士俑的脸庞，看似少数民族士兵。不过，秦代的少数民族究竟何指，尚不明确。现在的中国包括汉族在内，可认定的有五十六个民族，所以给民族下概念很困难。不如就说那是西方人所特有的面孔比较妥当。

2000 年秦始皇陵园六号陪葬坑出土了八尊文官俑。文官俑手藏袖中、交叉于身前，头戴长冠，腰挂小刀、砺石。他们在竹简上写字，修改时用小刀削去竹简表面，小刀在砺石上研磨，由此象征文书行政的文官。

文官的最高长官是丞相。自秦王嬴政至秦始皇时期的丞相有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隗状、王绾、李斯、冯去疾、赵高。吕不韦是东方阳翟的商人，昌平君是楚国公子，冯去疾和赵高是赵国出身，李斯是楚国出身。任用秦以外人为高官的情况，很是

耐人寻味。文官俑乃模仿丞相姿态的高级官僚俑。他们的面孔与将军俑非常不同。

这些考古资料比文献史料更显示出秦帝国的拓展情况。秦帝国留下的遗产，看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常识范围。

第三章

秦楚汉的三国志

陈胜、吴广之乱

秦楚汉更迭的历史

《史记》中把各王朝的年代记编纂为《本纪》。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之后是《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可是这三篇本纪所记述的并不是王朝，而是秦始皇（前259—前210）、项羽（前232—前202）、高祖刘邦（前247—前195）三人。司马迁通过三位个性不同的帝王，描述了秦、楚、汉交替的时代，还特别认同项羽在秦和汉之间曾经复兴楚国的君王地位。从秦始皇出生至刘邦去世的六十五年之间，三人同时在世的三十二年正是战国末至秦统一的时期。

秦始皇死后，是秦二世在位的三年（前209—前207）和刘

40 汉刘邦　虽出自项羽之楚，却致力于继承秦帝国（沛县泗水亭）

41 西楚霸王项羽　以霸主统领天下的项羽（徐州市戏马台）

邦与项羽之间楚汉战争的五年（前 206—前 202）。这是左右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重要历史时期。项羽与刘邦的英雄之战固然意义重要，但西楚霸王项羽期待建立的新型国家的计划，更是耐人寻味。一个皇帝之下，并存十八个诸侯王国，基层设置郡县制。秦始皇的郡县制是皇帝直接管辖的。

秦始皇是以帝王君临天下，项羽是以霸主制天下。帝王与霸主之不同，实在意味深长。随着项羽的去世，他的建国计划也化为泡影；不过，刘邦建立的汉朝国家，出自项羽的楚国体制，最终修正了对秦帝国的继承，以所谓“郡国制”的形式坚定地继承了项羽的国家体制。项羽的国家设想往往被人忽略，其实从失败者项羽的立场对那个时期做一番审视是很有必要的。

《楚汉春秋》：动乱时期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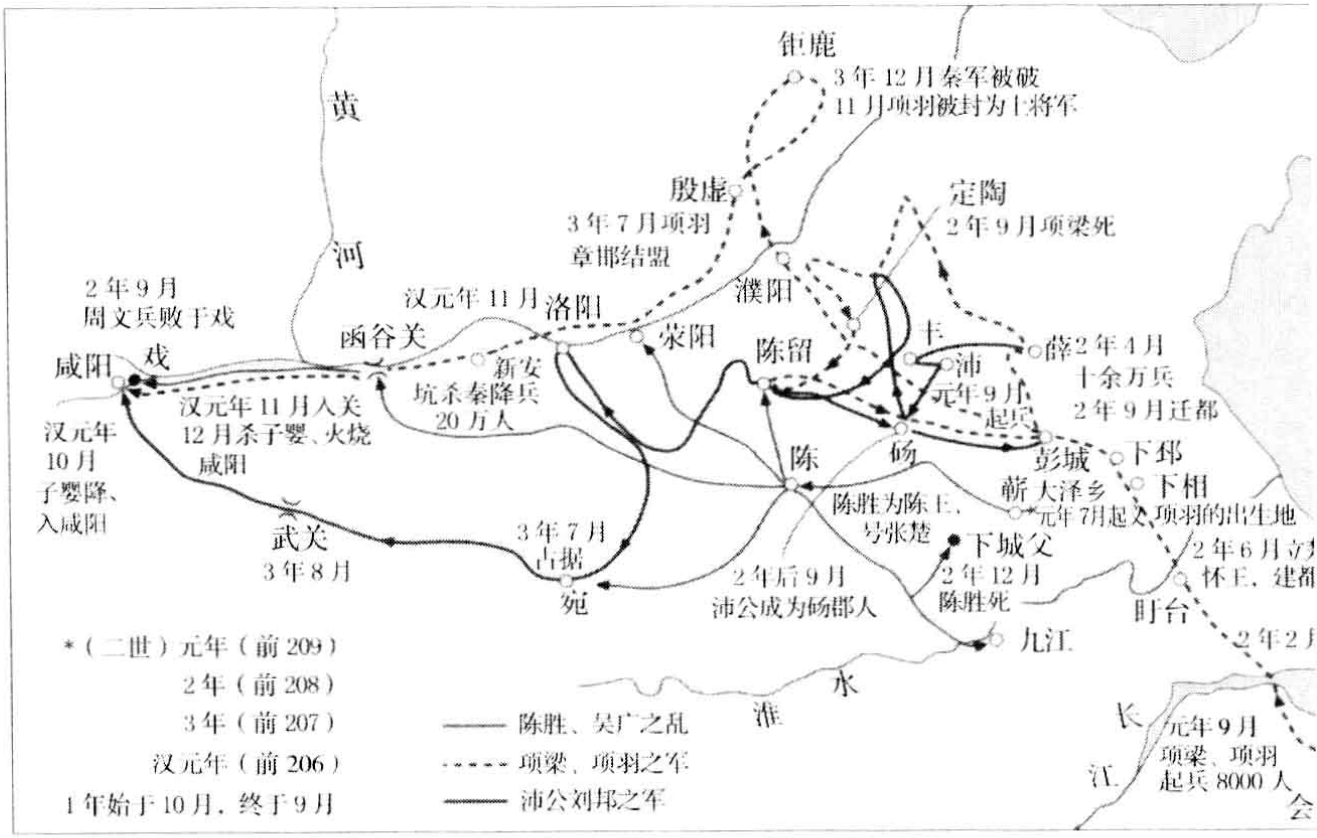
秦始皇死后的秦末至楚汉时期的史料，有《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三种。因为是从一个时代不同立场出发的记述，由此可以按照时代的先后，追溯当时的历史。从《秦始皇本纪》可以读解两代皇帝的时代。《项羽本纪》中从项羽的立场出发，讲述了秦的灭亡与楚汉之争。《高祖本纪》则相反，可以从刘邦的角度阅读秦的灭亡、楚汉之争与汉朝成立的历史。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记载项羽、刘邦功臣的《世家》《列传》中得到具体的补充。

当然，这些记载并非司马迁本人的写作，他编纂《本纪》《列传》的根据来自于陆贾的《楚汉春秋》。此书，今天仅剩下残余的一些逸文了。例如，楚汉战争中项羽以准备煮杀成为人质的刘邦父亲，对刘邦进行威胁。此场面，《项羽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项羽）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汉王答道：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42 楚汉战争略图

项羽的残忍和面对父亲危难全然无动于衷的刘邦的性格跃然纸上。虽说这是人们熟悉的一段记载，但与《楚汉春秋》的逸文相比较的话，可知这一记载并非《项羽本纪》的原文。北宋时期的类书（百科全书）《太平御览》中引用的《楚汉春秋》是这样记述的：

项王为高阁，置太公于上，告汉王曰：

“今不急告下，吾烹太公。”

汉王曰：“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

就细节来看，太公究竟是被置于“高俎”，还是“高阁”？刘邦称对方为“项羽”，还是“项王”？虽说有所不同，但是行文的确酷似。就今天而言，《史记》是抄袭，但是从《史记》是以各种原典史料为基础编纂而成来看的话，又是很正常的。无论如何，正是生于那个动乱之世的陆贾，才能够如此准确地对那个时代做出记载，这本身就非常值得关注。

重评历史的珍贵史料

1999 年湖南省沅陵县西汉初期沅陵吴阳（长沙王吴臣之子）墓中出土了竹简。其中属于占卜书的《日书》中记载“陈胜反攻秦”，“陈以丙午诛军吏”，“楚将军项籍助赵”，“攻秦钜鹿下章邯降项籍，以八月西略秦”。与《史记》记载有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用项羽的字，而是用了名“籍”。

秦二世皇帝元年（前 209）陈胜举兵。陈胜称将军入陈地，建国为“楚”，宣布称王。“陈以丙午诛军吏”是当时珍贵的记录。“陈”不是陈胜的“陈”，而是陈王的“陈”。陈王定在“丙午”吉日诛杀了军吏。这是不见于《史记》的史料。之后的秦二世皇帝三年（前 207），项籍救援遭秦攻击的赵。先是被秦占领的钜鹿投降，其后秦将军章邯投降。如此，八月进入关中。沅陵侯吴阳汉墓出土竹简是西汉第五代文帝（前 180—前 157 在位）以前的文书，比《史记》要早，更接近《楚汉春秋》的文章，非常珍贵。

张家山汉简的出土资料，也据实记录了秦、楚、汉王朝交替

时的社会和国家，引发我们对王朝交替的实际情况的思考。楚汉战争时期，双方势力都希望在自己的旗帜下聚集大量的民众。这也是个如何将众多民众登录户籍的行政问题。从楚、汉户籍中脱离的人称为“亡命”，在户籍登录叫做“占书”。“占”就是自己申报的意思。从楚投降汉的许多民众还没有登录户籍，汉就胜利了。根据这些新的珍贵史料，可以对楚汉战争的历史予以新的评价。

六个月的农民起义

秦始皇死后，打出造反旗号的是旧六国的东方势力，各地出现了赵王、燕王、齐王、魏王、陈王、楚王各种势力。他们以复兴被秦军所灭的战国诸国为目标。其中，直接将矛头指向秦政权的是楚人。本来楚的领域相当广阔，包括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一带。陈胜在那里首先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就是要扩张楚国的意思。

陈胜生前虽然没能见到秦的灭亡，但正是他最先创造“亡秦”（使秦朝灭亡）的势力。以致后来，汉高祖还特意为陈胜安置了三十户的守墓人。正是陈胜开启了亡秦的契机，才有了项羽的楚和刘邦的汉。秦与汉之间有过两个“楚”，先来看看陈胜的“楚”。

秦始皇埋葬于骊山陵的翌年，就出现了震撼秦帝国的、被称为中国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的陈胜、吴广之乱。在中国学术界，曾将“叛乱”称为“农民战争”，一直给予积极的评价。战争并未单纯地作为叛乱结束，而是建立了一个称为“张楚”的政权。

陈胜于秦二世皇帝元年（前 209）七月举兵，十二月战死。

只维持了不满六个月的短命政权。然而，由此发展出的势力对于推翻秦帝国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陈胜，字涉，河南阳城出身；吴广也出身于淮阳、夏阳。陈胜年轻时，曾被人雇用耕地做短工。他曾经对同伴吐露心声说："苟富贵，无相忘。"然而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志向，陈胜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老百姓缔造国家

七月，遣送去今天北京附近渔阳屯守边境的九百人，驻扎在了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淮河以北是平原地带。陈胜、吴广当时是带队的小头目。但是，由于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不可能按时赶到渔阳。如果误期，将被处以斩刑。二人于是商量："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斥责秦二世是小儿子，不该继承秦朝帝位。长子扶苏才应当继承帝位，可是由于他向皇帝进谏而被派到边境，听说被秦二世无辜杀害了。老百姓还不知道扶苏已经被杀。实际上，扶苏是接到伪造的父亲秦始皇的命令，用赐剑自杀的；同时，蒙恬将军也被赐死，饮毒药自杀。另外，楚国将军项燕虽受到楚人广泛爱戴，但到底是死了还是逃亡了，谁也不知道。于是，陈胜、吴广二人借扶苏、项燕的名义带头造反。

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语，表达了他认为王、诸侯、将军、丞相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力量夺取的决心，为农民鼓足了勇气。于是，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郡武官）。进入陈郡城

时已经扩充军力至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的规模。陈胜宣布复兴楚国，自称“陈王”，拼死建立了老百姓的新国家。这已经不再限于单纯的暴动，叛乱者显然已经把建立组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

时代造就了陈胜、吴广。他们本为生存于庞大秦帝国最基层末端的乡里之人，终于超越乡里，建立起了小小的国家。陈胜之举不仅是农民出身的皇帝刘邦的先驱，同时就复兴楚国这一点而言，也为项羽树立了典范。陈胜的一支军队周章（周文）的数十万兵早于项羽、刘邦攻入关中，于秦始皇陵前与秦军展开大战。秦中断了皇陵最后的工程，将武器发给刑徒应战。所谓关中，即以今天西安为中心东西延伸，东有函谷关，西有散关或垄关，北有萧关，南有武关包围的渭河盆地。

使人感到新时代到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的举动。虽说项燕与秦无关，但扶苏却是历尽磨难的秦国的王族。本来是颠覆秦始皇秦朝的叛乱，却又推崇秦始皇长子的举动，反抗秦二世的心情或许出于对扶苏的同情。

二世皇帝胡亥

直至陈胜、吴广举兵叛乱，二世皇帝胡亥一直是作为秦始皇继承人在位的。辅佐他的已经不是丞相李斯，而是郎中令赵高。这个并非出于最高行政机构、而仅仅是守备皇帝私人宫殿的官吏赵高，当时控制着朝廷政治。仅此，已经使人感到秦朝宫廷的危机四伏。二世皇

帝与赵高为了稳住因秦始皇之死造成的帝国动摇，竭尽了全力。由于历史上认为是二世皇帝与赵高造成了秦的灭亡，所以《史记》对此二人的记述很是冷淡。

43 秦二世皇帝陵　碑面阴刻“秦二世皇帝陵”六个隶书大字，为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

提到二世皇帝，人们首先会想到指鹿为马的故事，认为他是个将上贡的鹿误认为马的愚昧君主，其实这是误解。由于日语中“马鹿”是无知、愚蠢的意思，人们总是将其与指鹿为马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其实当时赵高指着上贡来的鹿说是马的时候，二世皇帝就果敢地指出：“丞相，你为何将鹿错认为马呢？”[1]

正是畏惧赵高权势的大臣们在皇帝与丞相之间动摇了，将鹿胡说为马。就这样虽然赵高在秦末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史记》并没有为他立传，而只是将其附载于《李斯列传》之中而已。

秦二世皇帝曾经企图对秦始皇的时代做一个总结。他即位时仅二十一岁，一说十二岁。由于他在即位诏书中有“朕年少，初即位”云云，所以认为他十二岁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就少年胡亥来说，通过进一步赞美秦始皇时期的功绩，可以得到巩固自身权威的效果。

秦二世仿效秦始皇进行了巡行。治安恶化的时期，皇帝亲自到地方上去，不抛头露面地显示了自身的权威。这是秦始皇经常使用的方法。秦二世访问了秦始皇树立了七尊刻石的地方，予以

44 秦诏量铭文　右侧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时的诏书铭文

了追刻。在刻石的表彰文中虽说“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2]，但是毕竟担心将来皇位落于谁手的问题。秦始皇也罢，秦二世也罢，生前都仅仅称“皇帝”。如今秦朝交替到了第二代，对于上一代“皇帝”的字样，按说应该改为“始皇帝”才对。但实际上并未把“皇帝”改写为“始皇帝”，只是附加刻写上了二世皇帝即位时的诏书而已。

二世皇帝曰：“金石上刻写的文字内容是始皇帝的事情，今继承皇帝称号，如果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的话，恐怕人们会误认为这是继承者的事迹，那样将与始皇帝的成功和盛德不符。”[3]

根据秦二世上述指示，丞相李斯等官员提议：不妨将二世皇帝即位时的诏书补刻在刻石上。这一方案被采纳实施了。秦二世带着李斯等人去碣石，以及南方的会稽巡行了一番。现存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的残片，就是秦二世追刻的部分。秦的度量衡器上也刻有秦二世皇帝即位诏书。

秦二世皇帝的各地巡行反而招来地方上的反抗。四月，二世皇帝回到咸阳。将秦始皇遗体埋葬地下之后，又在地上筑起高大坟丘。这一工程刚刚结束，又将劳力紧急投入一度中断的阿房宫建设工程，还动员了五万人守卫咸阳。就在这期间，七月，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叛乱。

叛乱的扩大与评价

以陈胜称陈王为契机，燕、赵、齐、楚、韩、魏也相继称王，旧六国由此复活。当时，纷纷出现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齐王田儋、魏王咎等。但是，十二月，陈胜在下城父之地被御者庄贾杀害。仅仅六个月短命王位也就此结束。此时，秦将军章邯发动反击，秦暂时取得优势。

虽然短短六个月的国家，毕竟也实现了既定的建国目标。据说张楚建都于陈地，那里曾建有过华丽的宫殿。某位陈胜年轻时的雇主访问陈胜宫殿时，曾惊讶地用楚地方言喊道："伙颐！"（表示惊叹）陈胜没有称楚王，仅称陈王，因为他还不是整个楚地的统治者。他派遣将军周文、吕臣等征讨各地，目的在于壮大军事力量，最终复兴楚国的领域。他使用的上柱国、中正、司过等职称都是楚的名称。中正、司过维护陈王，曾严惩违背王令者。陈胜还承认其他自立的国王，实现了与他们的联合。由此，也可窥见日后项羽所建立的楚国。即楚所复兴的并非楚之天下，而是六国联合中的楚国。

对陈胜、吴广作出评价的不是司马迁，而是西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前 200—前 168）。贾谊二十岁成为博士，作为汉文帝年轻的智囊人物，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他汇集的《过秦论》一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论及了秦的过失。书中阐述了秦仅仅存两代、十几年灭亡的原因。并试图由此提出西汉政权的政策方针。当时，西汉朝已经成立二十多年，舆论开始认为有必要逐渐摆脱对秦制度的继承，建立起真正符合统一王朝的皇帝制。

贾谊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陈胜出身贫贱，"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削木为兵，揭竿为旗"，得到了天下百姓的响应，"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说的"山东"并非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华山或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

秦帝国的灭亡

继承楚名将血统的项梁

继陈胜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出身于楚将军家族的项羽，和东方农民出身的刘邦。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此二人都曾见过秦始皇。在此，让我们稍稍退回到秦始皇的时期。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正值秦始皇最后一次巡幸、出访江南的时候，当时秦始皇五十岁，项羽二十岁。项羽与叔父项梁见到秦始皇一行。说是见到，其实也不可能见到真人面孔。当时项羽说了一句："我可以取代他！"项梁急忙捂住他的嘴，说："别胡说，当心要灭族的！"[4]此后，秦始皇北上，病死于沙丘。秦二世皇帝时，项羽发动了灭秦复楚的叛乱。

刘邦本是今天江苏省地方维持村治安的一名亭长，在押送发做劳役的罪人去咸阳的路上，见过秦始皇，当时他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5]凭自己的力量夺得权力的项羽，最多不过希望推翻秦始皇的帝国；刘邦渴求的则是建立秦始皇那样的帝国。二人志向的不同，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有着相当的表达。

项梁之父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国名将项燕。项燕死后第二年，秦将王翦和蒙武俘虏了楚王负刍，灭掉了楚国。可以说，将军项燕之死直接导致了楚的灭亡。因此也可以说项燕是楚国的重要人物。继承这一血统的项梁，本出身于临淮下相，后因杀人事件避仇家，而移居吴地。即今天江苏省苏州太湖之边。项梁的才智在吴地得到了发挥，当国家下达徭役命令或举行葬礼时，他负责在当地征召人选。

项梁由于经常隐身于侄儿项羽背后，所以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曾在栎阳遭到过逮捕。栎阳说起来是秦地的重要都市，位于关中。

项梁为何从故乡下相跑到遥远的、位于今天陕西省的栎阳去呢？他被捕时，曾凭借故乡邻县蕲县的狱掾曹咎给栎阳狱掾司马欣的书信，才得以获救。

狱掾不仅管理监狱，还参与县级审判，是个重要的职务；他们是懂法律、能够起草审判书的知识分子。由此事可见，当时应该已经存在狱吏之间的联络网了。项梁还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很快成为江南地区获得众望的人物。并且还向宾客、弟子传授兵法。

项羽的崛起

陈胜举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项梁耳中。通过两个月对陈胜动向的观察，他带二十四岁的项羽取了会稽守（太守）殷通首级，在江南举兵。很快召集了八千精兵，项梁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副将）。

在江北大多数人知道项梁为楚国名族，所以在那里他的兵力很快壮大至六七万人。向故乡下相进军时，他们尚隶属于陈王（陈胜）的军队；得知陈王遇难消息之后，他将从民间找到楚怀王之孙熊心，立为楚王。当时他很清楚自己家族乃世代为楚王效力的将军地位。

楚怀王（前 329—前 296 在位）名熊槐，因遭秦昭王软禁，病死（前 296）他乡。悲剧本是这样开始的，作为人质滞留于秦国的楚太子，因与秦大夫私斗杀死对方，想逃回楚国，但被秦兵捉回，后在秦国病逝。秦昭王因此十分愤慨，于是欺骗了楚怀王，最终怀王被杀于异国。本来就有怨气的楚人，在被秦灭国之后对秦国就更加反感。所以，立怀王之孙为楚王一事，对于集聚反秦势力、团结人心可以说是最为有效的举措。

终于，项梁的军队与章邯所率秦军发生了正面冲突。章邯的秦军在把陈王的一支军队赶出函谷关之后，曾一度发起攻势。章邯是继战国秦白起、统一秦的蒙恬之后最后的名将。项梁最后 也战死在定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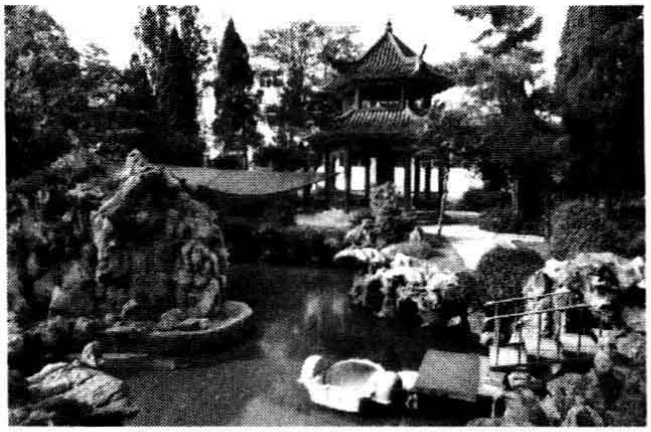
公元前 207 年，在与秦将军章邯战斗中项梁倒下之后，其侄儿项籍（字羽）掌握了指挥权。比起项籍的名来，他的字“羽”

更为人所知。名是出生时父母或亲族命名的，字则是成年的冠礼仪式上，由来宾给起的。所以，字是更适合已成年者的称呼，从对等关系里说称某人的字，更有亲近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刘邦的字是“季”，但人们更熟悉的是他的本名。

项羽军在钜鹿与秦章邯、王离大战，使赵王得救。从此，章邯的秦军转为弱势。章邯与项羽在洹水河畔的殷墟会盟，特意选择了商盘庚以来的首都殷墟遗址。章邯与项羽会面时流下了眼泪。曾经那样为秦勇猛作战的章邯，心怀对赵高政权前途的担忧，投降项羽，被封为雍王。项羽的楚军击败秦军二十余万人，将他们活埋于新安城南。这种封敌军将领为王而活埋其士兵的行为，后来遭到刘邦的谴责。

刘邦其人

再说刘邦，生于沛的丰邑中阳里。就汉代行政而言是沛郡丰县，在秦代则是泗水郡沛县丰邑。身份低得甚至连父母姓名也未能留于史册。刘邦的父亲太公，这只是后来用的尊称，并不是名字。母亲刘媪，即刘婆的意思，本人的姓和名没有留下来。刘邦的“刘”姓是父亲的姓，母亲应当是另外的姓；因为在中国父母、夫妇是避免同姓的。刘邦是秦朝地方基层行政负责治安的亭长。泗水亭位于泗水河畔。《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的身世有着如下的描写：“高祖好饮酒爱女色，常到王媪、武负的酒馆喝酒，醉了就躺在酒馆睡觉。武负、王媪见他醉卧的上方常有龙的形状，感到奇怪。



45 泗水亭　刘邦年轻时结交任侠之士，壮年出任沛县亭长

而且每当高祖来喝酒，这天卖出的酒总要比平常多出几倍。婆婆们至年终就把记账的券折毁销账。”[6]

刘邦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次在他为修筑秦始皇陵押送劳役去骊山陵时，很多人在路上逃跑了，他在路上喝过酒后释放了所有人。当时有一条大蛇当道挡住了他们十几个人，高祖拔剑斩蛇弃之。此时，后边有人赶上他们，说了一番奇妙的话：“方才斩蛇的地方，有一位老婆婆在路上哭，问她为何哭，她说她儿子被杀了，所以哭。又问她儿子为何被杀，她回答说她儿子是白帝之子，化身为蛇挡在路上被赤帝所杀，所以伤心落泪。人们都认为她在说谎，正要打她，老婆婆却忽然不见了。”[7]

当然，这一则故事是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为了确立高祖权威而编造出来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基于五行思想的皇帝观。所谓五行思想，正如上面所见到的，是从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的循环，解释宇宙或王朝变化的理论。对这种循环有着两种读解的方法：一是按照木、火、土、金、水顺序循环的五行相生论，另一是如同水可以胜火那样循环不止的五行相胜理论。汉代人认为自己的王朝属火德，或土德：即否定秦而继承周的木德，按顺序所以是火德；或者认为是属水德的秦胜了火德

的周，所以属土德的汉胜了秦。上面的故事，象征着出身南方（赤）楚的刘邦，击败了西方（白）秦的意思。王朝变换，皇帝更迭。对这种变化的合理性做出理论化阐述的，就是五行思想。

一边是被神化了的刘邦，一边是至死仍作为人的项羽；二者差异在于：作为汉王朝始祖的皇帝刘邦，与始终拒绝做皇帝的项羽之间的不同。

沛公刘邦的叛乱

在陈胜等蜂起的鼓舞之下，刘邦也开始行动了。刘邦的故乡沛县，位于今天江苏省徐州市以北四十公里，在秦代属泗水郡管辖。泗水郡在战国本属于楚的领域，靠近楚的首都寿春。刘邦直至十几年前秦统一之前仍是楚人，只是在秦始皇这十二年中才成为秦基层行政官吏的。那么，楚人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秦统治的呢？随着秦始皇的死亡，萧何、曹参等沛县出身的下级官吏最先行动起来。萧何是沛县负责召集官吏的主吏掾，曹参、任敖是审理沛县判决的狱掾。夏侯婴本来是县里负责接送客人的车夫，后来提升至官吏。他们与上文提到睡虎地秦简的“喜”是同一级别的人物，是能够起草行政文书、通晓法制审判文书的、称为文吏的知识分子。

那些植根于地方社会、曾经效力于秦统一政权基层行政机构的人物，如今跃跃欲试成为抗秦的势力。他们既掌握中央的情报，又熟悉地方的形势。那些郡守、县令等长吏接受中央任命来地方任职，过个两三年就调走，所以无法扎根于地方社会。像

泗水守“壮”、泗水监（郡的监督官）“平”等人物，因为是秦二世皇帝时的地方长吏，所以留下了名字。官吏为了向皇帝表示臣属之意，在公文中姓氏是被省略的。

沛县的下级文吏杀掉沛令（沛县县令），将逃亡在外的刘邦迎接入城。刘邦于是取代长吏成为沛令。本该由中央任命的县令，就这样由民众推选出来了。从此，刘邦在成为汉王之前一直被称为沛公。称县令为某公是楚的制度，所以也可以说他是作为楚国的一员，向秦国发起还击的。沛公刘邦很快就不再做秦皇帝的长吏了。他祭祀黄帝、军神，举起了赤旗，不用说成了对秦造反的象征。

刘邦集团的成员

沛公刘邦的集团中，除了一些下级官吏之外，聚集了各种职业的人物。沛县樊哙是卖狗肉的，同乡周勃是编织养蚕器具的，灌婴是睢阳贩卖丝缯的。还有一些被称为“少年”的年轻人，他们离家出走流落为城市无赖，此时也加入刘邦集团。沛县不过占全国县总数的千分之一，但正是这一县的叛乱集团成员，后来成为取代秦之后所建大帝国的中坚力量。如果仅仅强调农民出身的皇帝刘邦的话，尚不足以描述当时历史的全景。应该说新政权是依靠刘邦周围成员的连带感，以及受此感召的其他地域的人才联手打造的。

刘邦集团多数是由客、中涓、舍人、卒一类人构成的。从《史记》中记录刘邦集团论功行赏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可以

知道一百三十七名高祖功臣在叛乱当时的身份。萧何、王陵、任敖、冷耳、郦食其等人所说以客的身份追随刘邦，但他们对待主人刘邦是有自立立场的。中涓（涓：清扫）、舍人（舍：主人家）、卒（不是士兵、是杂役）这些人则是在主人家做杂役的，与主人有着一种家内奴隶的隶属关系。

曹参、周勃、灌婴、王吸、召欧、孙赤、陈仓、毛泽都是中涓，樊哙、奚涓、傅宽、薛欧、朱轸、周定、单宁、丙倩、唐厉、审食其、周緤、陈遫等是舍人。还有些是卒或低于卒身份的人物：彭祖是打开沛县城门、迎接叛军入城的卒；单父圣、周聚、朱濞也是卒。以上这些从客至卒的人物，或出身于沛县（汉代的沛郡）、或来自邻近的丰邑（刘邦出生地，汉代升格为丰县），他们是追随沛公这一新任县领导的最初一批成员。

赵高专权与二世之死

秦军处于劣势的消息传来，朝廷的情况急转直下。秦二世二年（前208）李斯被处死之后，赵高作为丞相肆意专权。长久支撑秦政治的李斯成为牺牲品之后，随着秦军统帅章邯、王翦将军的败北，可依赖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了。八月，终于发生了赵高之乱。秦朝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朝廷上下惧怕赵高，保持沉默者、昧心称马者居多，直言道鹿者暗中遭处罚。沛公的数万大军终于从武关逼近关中。函谷关是把守关中正面的关口，武关是从南面守卫关中。秦始皇巡行去长江流

46 二世皇帝胡亥墓　希求借赞颂秦始皇来提高自身威信而未能奏效

域时，就是由武关进出的。

秦二世梦见驷马之中外侧的左骖马被白虎咬死。博士为他占梦说：是泾水作祟。泾水是紧靠咸阳宫北侧的河流，郑国渠即引泾水而成，是秦的一条生命线。二世此后斋戒于望夷宫，沉四白马于泾水。这望夷宫成为秦二世死前最后的居所。赵高女婿阎乐时为咸阳令，他诈称山东群盗来袭，闯入望夷宫胁迫秦二世，使这位秦帝国的第二代皇帝无奈自杀。青史记载曰："赵高杀二世。"

始皇帝之后紧接着就是末代皇帝，秦帝国仅仅二代而亡。第三代子婴是胡亥兄长的儿子，他虽即位，但已不称皇帝倒退称王了。此时，赵高表现出意外的冷淡。他说："秦国在始皇君临天下时期称帝，现在六国复兴，秦地缩小，不可徒有帝之空名。依旧称王即可。认为不必在乎是否为帝国。"[8] 此时，项羽已经封秦将军章邯为雍王，由他称王关中西部。所以赵高与沛公刘邦约定二分关中，其中亦有自己称王之意。赵高在二世皇帝的遗体前，摘下玺印佩在自己腰间，本想自己当皇帝，竟无一人追从。

被赵高判罪的李斯曾于监狱中上书，陈述自己的罪状，若即若离地回顾了帝国的形成经过："秦王嬴政时期，秦地方圆不过千里，军力不过四十万步兵，游说诸侯，离间六国，最终擒六国

王，以秦王为天子。此后，领土并非不广阔，却向北至胡貉（貉指匈奴），向南至百越进行扩张。以此显示秦之强大。将度量衡、文字推广至天下，以树秦之名。这样的行为，在今天来看可谓罪恶深重。”[9] 这些话可以说是狱中的一种怨言，其对秦帝国强大与虚弱可谓分析得当。

赵高后来被秦王子婴的宦官韩谈刺杀。子婴也在即位仅一个半月后，与妻子以绳索垂挂颈项，以示臣服，投降了沛公。

楚汉战争

项羽与刘邦的对峙

在秦的国家分崩离析之际，沛公刘邦与大将军项羽在鸿门聚首了。当然，尚未到达汉王与西楚霸王之间会晤的阶段。项羽突破函谷关，最终进入了敌方的关中。不过，此时先行入关的沛公刘邦已屯兵十万于灞水河畔。所以，项羽将四十万军驻扎于鸿门与刘邦对阵。这就是古来有名的鸿门宴发生的历史舞台。鸿门位于秦始皇兵马俑坑正北面的丘陵上，北望渭河。断崖形状正如地名所描述的大（鸿）门。在此，面对守卫咸阳的秦军，项羽与刘邦形成对峙事态。

项羽从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那里得知沛公有意称王关中的情报。如果按照当初诸侯事先的约定，最先入关者可以成为关中

王。由于关中是秦旧地，所以谁能成为关中王，就意味着谁将代替秦的统治。沛公与父老、豪杰相约：除了“法三章”之外将废除一切繁杂的秦法。所谓父老，就是“里”即村落的长老；豪杰，就是有势力者。刘邦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用了慰劳的表达；这与起事沛县时“天下苦秦久矣”的用语是一样的。能得到父老的认可，就能得到其周围子弟的拥护。所谓“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当然，建立国家仅靠“法三章”是无法治理的。但是，这是在沛公集团希望得到尽可能多支持者的动乱年代，那时的口号越是容易理解，就越能获得人心。

就项羽来说，无论对于趁自己救赵之隙抢先入关的沛公，还是对默认此事的怀王都无法容忍。出于愤怒，他从正面攻破函谷关，接着又在戏水河畔布下军阵。戏水虽是一条从骊山流淌出的小河，但水量充沛，足以使四十万人的军队在此得到休息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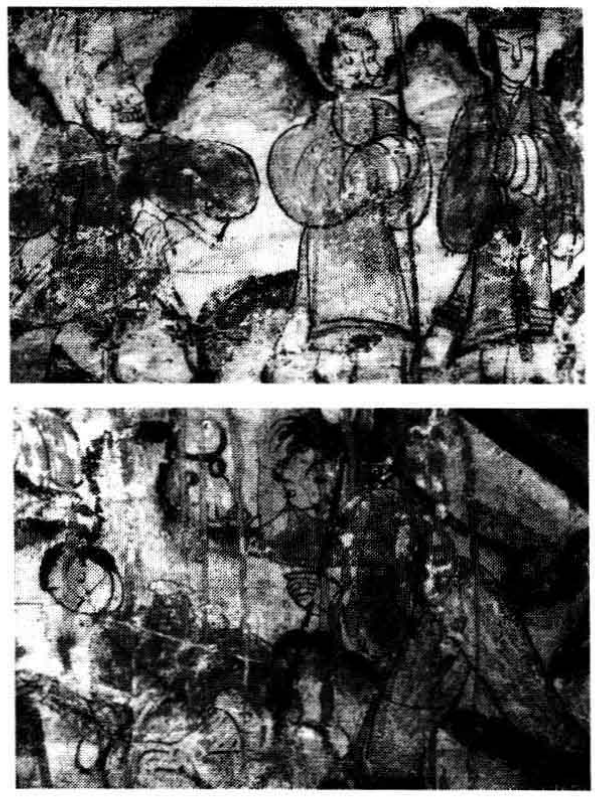
鸿门之宴

项羽的叔父项梁，一向与张良有交情，他将项羽的情况通报给了沛公一方。沛公刘邦为了使项羽息怒，匆匆带百余骑兵拜访了项羽的阵营。

“臣与将军合力而攻秦，将军战于河北，臣战于河南，未尝想能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又见到将军。”[10]

沛公自谦称“臣”，而称项羽“将军”表示了敬意。项羽也

出于谅解之意即席准备了宴会。项羽在鸿门是主人所以与叔父项伯面向东而坐，范增面向南而坐。来访的沛公刘邦作为客人，在项羽右侧面向北而坐，张良面向西坐。项羽与兵马俑同样向东，刘邦是背对兵马俑坑的位置。范增提议让项羽的堂弟项庄舞剑助兴，密令其伺机刺杀沛公。察觉此情的项伯也借口舞剑，以此保护沛公。



47 鸿门宴图（洛阳古墓博物馆藏） 楚汉相争，项羽率军进驻鸿门，谋士范增计划在刘邦前来赴宴时杀之

鸿门宴的这一场景在汉代的画像石和壁画上也能见到。南阳汉画馆所藏画像石中：图右端坐着项羽，刘邦在他对面。中央的项庄一面舞剑，一面准备从刘邦背后进行袭击。图左面张良和项伯在做准备，最左端是范增正在观察现场动态。1957 年洛阳烧沟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中，也发现色彩鲜明的壁画。右侧画着把钩子上挂的肉，串起来正在炉子上烧烤。背景可见山岭，是一幅野外宴会的场景。壁画左侧项羽和刘邦并列着交杯换盏。另外可见项伯、张良、范增等人物，左端是项庄舞剑。但是由于壁画中央看来是方相氏，所以有观点认为这是打鬼图。

最终挺身救驾的是樊哙，他带剑持盾闯入军门，“瞋目视项

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赐樊哙一斗酒和一块彘肩生肉。樊哙立席饮酒，覆盾割肉，吞咽入口。项羽赞赏他的豪迈，再赐酒。樊哙于是为主人做出申明：沛公虽先行入咸阳，但对宫殿财宝毫无所近，且退至灞水河畔等待大王（项羽）的到来。这里描述的大概就是当时所谓舍身救主于危机之中的行动吧。沛公乘如厕的机会离席，又唤出樊哙，一起逃脱。估计沛公已经回到军营，张良告知主人已经回去，并且特意留下白璧、玉斗，献给项羽、范增。计策未得实施的范增很是懊恼，愤怒地用剑击碎了献来的玉斗。

火烧秦都咸阳

数日后项羽进入秦都咸阳。他杀了已经投降沛公的子婴，还放火烧毁宫殿，据《史记》载大火连续三月不灭。后来北魏时期的地理书《水经注》说：项羽盗掘秦始皇陵，用三十万人搬运随葬品，用了三个月还没有搬完。这是夸张的记载。近年，在兵马俑二号坑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盗洞，兵马俑坑天井的棚木也发现火烧后碳化的痕迹。

曾有人企图说服项羽：如果利用关中地利建都的话，可以成就霸业。但是他见咸阳已经化为灰烬，未予以考虑。当时他说了一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11]“衣锦还乡”一语意味深长，意味着项羽放弃秦帝国旧都，选择了自己的故乡。此事象征着项羽今后建立新国家的战略方针。

抢先一步攻入关中的沛公不曾近财物、妇女，而是封闭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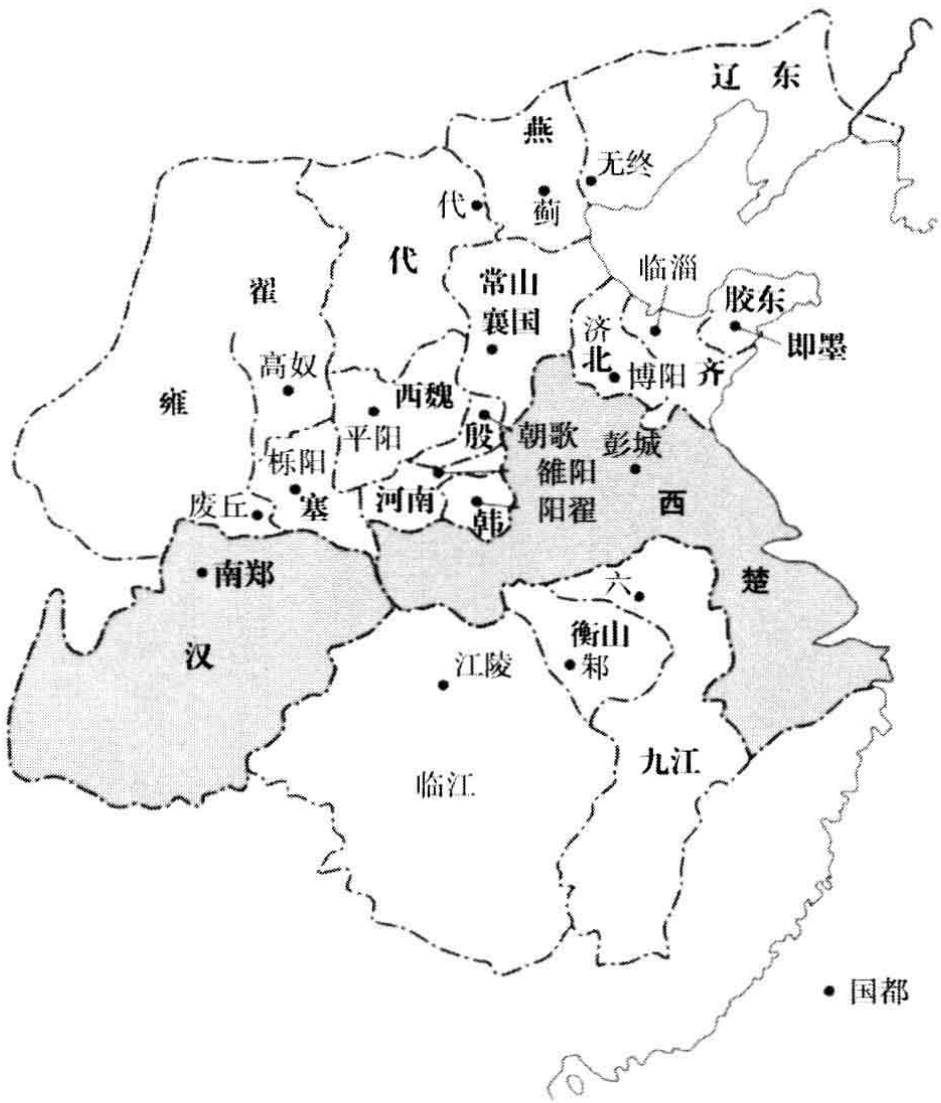
等待项羽的入关。与此相反，项羽却掠夺秦的财宝、妇女，回到了东方。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就秦、楚、汉三者更迭势力的地域基础来看的话，呈现了关中→关东→关中的交替顺序。秦是在关中（渭河盆地）中心建都咸阳，最终以此达成天下一统的。与此不同，楚的势力的目标是以关东（函谷关以东）为基础建立帝国。项羽火烧咸阳宫殿时，尽管有人进言“关中地区四面有山河为屏障，土地肥沃，建都于此可以成就霸业”，可是他仍心系遥远的东方。

西楚霸王项羽

十八王联合国体制

公元前205年一月，秦灭亡后终于建立了以项羽为主导的新型国家体制。这一体制与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秦帝国完全不同。首先，将楚怀王升格为义帝，建都于东方的彭城。项羽本人不称帝，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称王。自身领有西楚之地九个郡，称为西楚霸王。所谓霸王就是位于诸王之上的霸者。项羽将攻入函谷关的诸将十八人分封到各地为王。虽然在秦末混乱时，东方各地旧六国的后裔已纷纷复辟，此时则是将复辟势力已经占有的领地正式分配给他们，立他们这些旧日的王族和诸将为诸王。

旧楚国的领域分为了衡山（吴芮）、临江（共敖）、九江（英布



1 汉王 刘邦（沛公）	7 韩王 韩王成	13 临江 共敖（义帝的柱国）
2 雍王 章邯（秦降将）	8 殷王 司马卬（赵将）	14 辽东 韩广（燕王）
3 塞王 司马欣（秦降将）	9 代王 赵王歇	15 燕 臧荼（燕将）
4 翟王 董翳（秦降将）	10 常山王 张耳（赵相）	16 胶东王 田市（齐王）
5 西魏王 魏王豹	11 九江王 英布（楚将）	17 齐王 田都（齐王）
6 河南王 申阳（楚将）	12 衡山王 吴芮（番君）	18 济北王 田安（齐将）

48 项羽统率的十八王国体制

〈黥布〉)。原战国赵地的常山(张耳)、代(赵王歇)二国，齐的临淄(田都)、济北(田安)、胶东(田市)三国，燕的燕(臧荼)、辽东(韩广)二国，魏的西魏(魏王豹)、殷(司马卬)二国，韩的韩(韩王成)、河南(申阳)二国等。在以上十四国之外，再加上恩赐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建立的雍、塞、翟三国。继十七国的最后是沛公刘邦的汉国，领有巴蜀、汉中之地为王。汉就是汉中的汉，本来是汉江的汉。对刘邦的称呼从此也从沛公变为了汉王。

战争结束了，十八诸侯各自奔赴自己的国都。形式上虽不似国家，但实际上必须实行国家的统治。项羽也进入了西楚国都彭城，即现在江苏省徐州市。这里距项羽故乡的下相县不足一百公里。如上所述，他终于衣锦还乡了。这里距刘邦的沛县也仅有五十公里。战乱平息了，曾被项羽利用一时的义帝(怀王)也被放逐至长沙之南的郴县，那里是邻近九疑山的边地。义帝就这样被抹杀掉了。

西楚霸王所率十八王国的体制，本来可以掌控整体运转的帝位权威却很快出现问题，进而出现齐、越、汉的反抗，开始走向崩溃。汉王刘邦赴命国都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当时随行的项羽给的三万兵以及自愿留下追随汉王的有数万人。从咸阳出发的话仅一百公里，虽说翻越秦岭山脉很近，但毕竟其间有3767米高的太白山等山峰，像屏风似的连绵屏障。刘邦越过秦岭后，烧毁了架筑于山体斜面岩石上的栈道，表面上是防备外敌入侵，其

实也是向项羽表示从此没有向东发展的意向。这是张良的计策。实际上，战乱结束后战士们多希望回归东方故乡，所以这样做有团结人心的意图。

位于汉中上流的这一地区，虽然现在同属于陕西省，但与秦岭北部的寒冷干燥气候迥然不同，这里是温暖湿润的水田地带。从当地汉代墓葬出土了不少陶制的水田明器（冥器）。不过，当时这一地区尚处于未开发地区。数万人如果决心在此建国的话，向南可以控制巴蜀，真有可能建成一个富饶的汉国。

韩信“争权天下”的劝导

是韩信帮助刘邦痛下决心。韩信自幼家贫，既当不上地方官吏，也做不成商人。曾寄食于亭长家受到数月照管，在河边洗丝绵的老太婆还给过他饭吃。无赖少年骂他是身材高大的胆小鬼，给他以“胯下之辱”的典故也是广为人知的。后世人认为他辩解说，当时他是不愿意犯罪才忍辱的。

当初，韩信曾效力于项羽，因为待遇不佳而以中涓身份追随刘邦。后来以上将军统率数万大军。他曾与刘邦同乘一车，刘邦的衣服给他穿，刘邦的食物也与其分享。对此，他十分感恩。萧何对他倍加信赖，甚至称韩信“国士无双”（天下无人与其比肩）。这位韩信劝刘邦说，远离故乡是发配，士兵们都是山东人，都盼着早日回到山东老家，所以军心动摇，不如做出东进的决策，进而夺取天下。[12]

汉王居汉中仅仅四个月，就翻越秦岭控制了当时已被三分而称为“三秦”的关中。翌年，也就是汉二年（前205），出函谷关降伏魏、河南、韩、殷王。汉王此时废除了秦的社稷，建立起汉的社稷祭祀。秦灭亡之后各地郡官府所在地尚残存着秦社稷祭坛，虽不醒目但很重要。“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社、稷连用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可见是重要的祭祀。

汉国虽兴起于汉中、巴蜀一隅，现在要扩张了。所占领的土地不再设国，而是设置郡。例如，俘获殷王时将殷国改置为河内郡。这样河内郡之地就纳入了汉的社稷。不知不觉中汉王已经采纳了秦的统治方法。汉王听说义帝已死，随即下令为义帝发丧，哭吊三天。天下人所立的义帝被项羽杀害了。战争又以新的目的拉开了序幕。

逐鹿中原

汉王的军队与齐、赵一起逼向了项羽的西楚之都的彭城。汉王与项王在二王城展开了激战。楚汉战争正式开始，项羽建立的联合体制崩溃了。所谓楚汉之战实际上是楚人之间的战争。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帝国已经不存在。当年秦始皇捕获了“逐鹿中原”之象征着帝位的“鹿”而统一了天下。现在秦崩溃了，刚刚松弛一下，中原人又开始逐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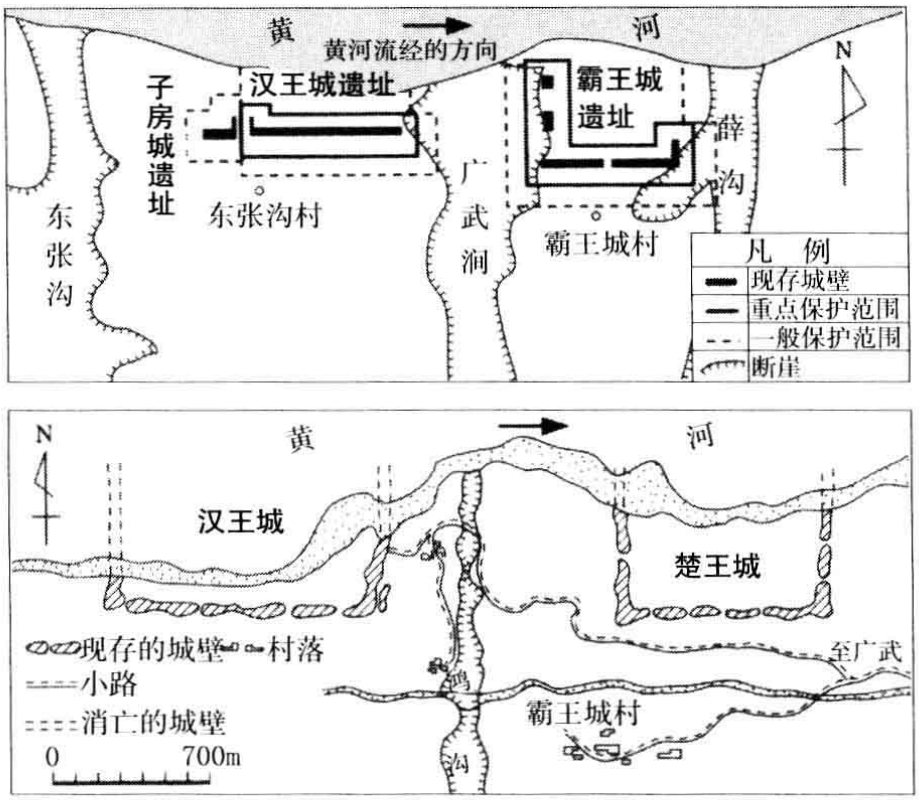
此时的项羽军占据着优势。汉军五十六万之中被杀者十余万人。留在沛县的汉王父母妻子被抓为人质，汉王本人也勉勉强

强得以逃脱。为了能在荥阳得以重振，汉军攻破楚军。

翌年的汉三年（前 204），汉王求和，欲以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地，未能得到项羽同意。当时一直效力于项羽的范增力主对汉军采取强攻。汉王一方则用陈平的离间计使范增离项羽而去，并且死于途中。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臣，曾经是向项梁进言拥立怀王以复兴楚国的人物。鸿门宴上曾建议项羽抓住刺杀沛公的机会。现在劝项羽不要放弃好机会，又未被采纳。与范增相反，虽然陈平放弃项羽、刚刚投降刘邦，却得到信任。由于他熟悉项羽的性格和楚军情况，所以被委以重任，以四万斤黄金为资金，最终达到扰乱楚军的目的。另外，此时救汉军于危难的还有因战胜齐国而称齐王的韩信。韩信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位附汉则汉胜、附楚则楚胜的人物。

停战协议的制订

汉四年（前 203），历经三年的楚汉战争总算缔结了停战条约。双方商定以荥阳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西方为汉、东方为楚。汉王父母妻子得以释放，军中高呼万岁。1972 年曾对所谓的楚汉二王城进行过调查。《文物》1973 年第一期刊载了张驭寰《汉王城、楚王城初步调查》文章。文章的开头引用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毛泽东说楚汉战争中刘邦以十万军战胜项羽的四十万军，从中学到了刘邦的战略。即“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制胜的”。刘邦在广武、荥阳、成皋一带遭到项



49 楚汉二王城城址图　下图根据 1972 年调查，上图根据现在调查所绘

羽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只好等待时机。最终趁项羽军渡氾水河之机一举发动攻击。

“文革”中出版的这份调查记仅仅两页，说不上是学术调查。但是，这张二王城图是被经常引用的。北面是黄河，二王城的北城墙已被冲毁。广武山中部的深沟所分隔出的东西两侧的地形很清楚。汉王城相对大一些，城墙东西长一千二百米；楚王城一千米。然而，遗址没有任何出土文物，称其为二王城仅仅是依据传说定性的。夹着广武山，汉王与项羽之间有过一番对话。项羽欲向汉王独身挑战，曰：“决一雌雄，不要一味使天下民众饱尝战争之苦。”但汉王却笑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13] 还历数项羽

十大罪状以激怒他，说项羽背约让刘邦去做蜀汉王，纵火烧毁咸阳宫殿还盗掘秦始皇陵，子婴已经投降却将其杀害，坑杀秦子弟二十万人，杀害义帝等等。项羽一方放弩射中汉王，未中要害。

在汉王一方熟悉项羽性格的人很多，因为他们本来是项羽一方的人。韩信、英布（黥布）是这种人物，还有叔孙通，本是秦二世的博士，弃秦投奔了项梁，在汉攻打彭城时投降于汉。他们随时都可以向刘邦介绍项羽的为人。

停战以后项羽归东，汉王欲回西方。此时，汉王听从张良、陈平之计追击项羽，与韩信、彭越的部队合流了。

楚国崩溃

垓下之战

成为项羽临终之地的垓下位于淮河以北的平原，在安徽省固镇县东，邻近项燕身亡的蕲县，距陈胜举兵的大泽乡也很近。垓下的“垓”有堤或国境之意。堤，类似于日本的贮水池。

除刘邦之外韩信、彭越、刘贾的部队也都集结到了垓下。韩信兵力三十万，项羽军仅十万兵。出现了与当年鸿门宴时军力对比的相反之势。周殷也于此时背叛项羽，投奔了刘邦。为了迎击，项羽在垓下筑寨。此时，项羽在夜里听到的是重重包围的汉军歌声。正如四面楚歌的故事所述的，汉军人人唱起楚歌。

《项羽本纪》载："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对此有两种解释：一说汉军为欺骗项羽而唱起楚歌，一说投降汉军的楚人唱起了楚歌。总之，项羽听闻此歌声得知楚人多已投降汉军了。

楚汉时期有很多历史情节，成为后代历史剧的题材而广泛流传。比如清代京剧《霸王别姬》（又称《十面埋伏》）就广为人知。"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诗句所描述的项羽与虞姬诀别情节的京剧，甚至成为名角梅兰芳的代表作。1993 年陈凯歌导演还制作了两位演出《霸王别姬》的艺人之间爱憎关系的影片。比起当上皇帝的胜利者刘邦，失败者项羽临终的戏剧性情节更为引人入胜。弱者容易得到同情，但项羽并非弱者，与刘邦相比他是强者。"四面楚歌"所强调的，还是在对决之中项羽的优势仍在继续。项羽曾在荥阳从四面攻击刘邦，刘邦不得不以纪信为替身逃出城。之后，在成皋仍是刘邦遭围困，好容易才得以逃脱。大概正是由于项羽一直处于强势，一旦形势急转直下，那最后的场景才更能唤起同情吧！

虞美人之歌

"楚歌"到底是怎样的歌呢？《史记》中对此没有记载。东汉应劭说楚歌是鸡鸣歌。"鸡鸣"并非鸡鸣叫的声音，是天亮的意思。看来是说这是歌唱天亮的歌。项羽半夜起身，饮酒帐中。因为身边常有虞美人和名为"骓"的骏马陪伴，由此作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全盛时有力能拔（翻越）山、意气盖世之势。可如今事态不由人，骓马不再勇往直前，虞美人呵，我应将你如何安放？”他一连唱了好几遍，虞美人也和着唱。《史记·项羽本纪》虽未记载虞美人当时唱的歌，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楚汉春秋》逸闻，作出了补充。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史记》《楚汉春秋》所记两首歌，是项羽作歌，虞美人和歌。项羽唤虞美人为“若”，虞美人称项羽“大王”，自称“贱妾”。四面楚歌的紧张状况之下，果真能有项羽、虞美人作歌的可能吗？应该说正是情况紧张才有可能如此！高祖在返回故乡沛时，也是饮酒、击筑，咏唱自己作的歌，并让众人合唱共舞。在当时作歌咏唱是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段。

交错纷乱的楚军汉军

西楚霸王项羽占据西楚地域，建都彭城；汉王刘邦的汉是以巴蜀、汉中为领地，都城建在南郑。“西楚”指的是淮河以北，即现在安徽、河南、湖北省一带，其东面的江苏省是东楚，南面的安徽省南部、广西、湖南省则称南楚。所以，所谓楚地指的是从淮河直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域。项羽在移居吴之前出生于下相，所以与沛郡出生的刘邦同属西楚人士。两位楚人在秦这一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彼此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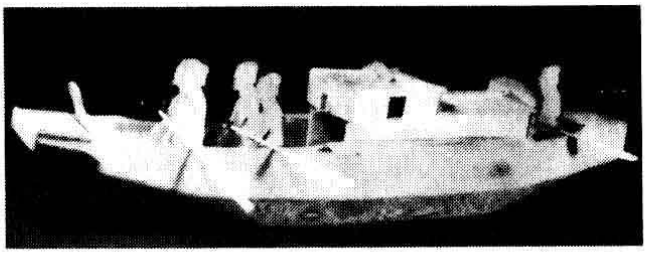
刘邦不再滞留于汉地，越过秦岭山脉进入关中，很快回到

楚地。实际上刘邦与项羽是在楚地争斗，汉地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刘邦之所以没有在汉地建国，并不在于汉水流域或巴蜀出身者占汉军的主流，而是因为军中那些与项羽军同样出身的东方人。刘邦喜欢的是短服、高帽的楚式装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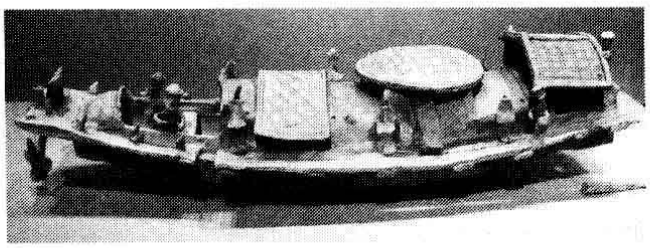
汉与楚之间并无土地的差别。在刘邦军的统治下的是汉人，在项羽统治下就变为楚人。根据时局变化汉与楚之间可以自由转化。本来无所谓汉地与楚地，汉军、楚军之间也是相互交错、彼此出入的。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记载了楚汉战争的五年及西汉初的判决案例。其中楚汉战争时期的记述中，汉国是被置于楚之下的，可见当时始终是楚的时代。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在项羽的楚时期有一名女婢逃亡，到了汉的时期，还没有登录户籍。这名女婢的主人此时找到她，在户籍重新登录后，又把她卖了一万六千钱。女婢年龄四十四岁，关于这笔买卖是否成立出现了争议。判决认为女婢从楚时代进入汉时代后，她已经不再是女婢了。所谓奏谳书，是指将那些以往没有先例的疑难案件，提交中央廷尉审议的文书。虽然官吏的判决是在女婢脸上施黥之后，交给买她的新主人，但也有意见认为该女婢应该是已经解放为庶人了。

追随刘邦的那些人，只要在战争中立功者都得到了爵位。夏侯婴在反秦战争中屡建战功，连续得到过七大夫、五大夫、执帛、执圭等爵位，最后成为汉王的列侯。灌婴也是从七大夫、执



50 中国古代的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南船”之地的楚，指代船的用语本来有很多，后来被“北马”之地的游牧民秦逐渐统一为“船”字



51 中国古代的船（广州博物馆藏）

帛、执圭升为列侯的。七大夫、执帛、执圭等爵位，在汉王即位皇帝以后的二十等爵中是没有的。那只是沛公刘邦时代赏赐他周围人的楚的爵位。刘邦即位皇帝之后，施行的是依据秦爵位制所定立的汉帝国二十等爵。这是由于他战胜项羽之后，希望摆脱楚制的结果。

由此可知并不存在楚汉战争中汉军以楚歌欺骗项羽的事情。汉军本来就为楚地出身的将士所组成。汉军攻打楚军，就相当于攻打自己的故乡。应该说当时汉军唱起楚歌是极为自然的。

在汉代《方言》一书（西汉末扬雄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意为：乘輶轩〈天子使者的车〉收集全国各地词汇）中，还可见到已经失传的东方陈、楚、宋、魏的方言。楚人称“案”（桌）为“槁”；“钥匙”在秦称“钥”，在中原、楚称“键”。有意思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的是秦系统的“钥匙”，在日语汉字中却使用楚语的“键”。

在已消失的东方各国语言中，称“围棋”为“奕”，称“鸡”为“鸊鷉”（陈、楚、宋、魏），称“蝙蝠”为“服翼”、“飞鼠”，称“盾”为“敔”、“干”，称“蝉”为“蜩”（楚）、“螗蜩”（宋、

卫）、“蜮蝈”（陈、郑）。另外，称“多”为“夥”。

船在关东曾称为“舟”、“航”，在楚这所谓“南船”之地有各种指代船的用语：按船的大小可称“舸”、“艖”、“艇”，长而浅的称为“艚”，短而深的称为“艩”，小而浅的称为“桴”。有着丰富地域色彩的各种词汇。后来被“北马”之地的游牧民秦统一称为“船”了。

当然，有些东方词汇一直沿用着。如称“长老”为“父老”（南楚），“箭”为“矢”（江淮）。“蚊”是楚语，在秦、晋曾称为“蝱”。

项羽之死

项羽与八百壮士夜半骑马突出重围。黎明时汉军发五千追击，项羽军渡淮河时尚存百余人，至东城只剩下二十八骑。他对部下这样说：“这是上天要我死，并非作战有误。我起兵至今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最终称霸天下。现在就让我们做最后的决战吧！”[14]

他们来到乌江这一长江渡口。乌江亭长驾船停于岸边，要他赶紧上船。并说：江东方圆上千里土地，数十万民众，在那里称王不也足够吗？亭长的话使项羽想起，当初率江东子弟八千渡长江，如今没能带回一人。即便为王又有何脸面去见江东父老。于是，项羽将爱马送与亭长。徒步持剑与汉军接战。一身是伤，还坚韧作战，最终力尽自杀。五个士兵为了获赏而抢夺项羽尸体。项羽曾做过鲁公，因此葬在了鲁的谷城。

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一人物予以了负面的评价。例如杀秦子婴，未封刘邦为关中王，流放并杀害怀王（义帝）等等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非难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漫长的历史潮流来看，正是项羽杀掉秦子婴才结束了秦王朝。刘邦正是由于遭到项羽轻视、被封于边地为汉王，才发奋杀项羽，建立汉朝的。司马迁认识到项羽的楚政权在秦汉之间意义重大，因此不是把项羽载入列传，而是以《项羽本纪》的形式置于《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之间。

但是，司马迁将其载入《本纪》是因为承认项羽独立的国家体制。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取代秦，仅仅四年（汉元年正月至四年中分天下，再至五年垓下之战），项羽作为西楚霸王建立了分封十八诸侯体制。

《汉书》因为是汉一代的王朝史，所以将项羽的记述从《本纪》降格为《列传》。而且在卷三十一中将陈胜与项籍（名籍、字羽）合传，是将陈胜与项羽作为秦的叛乱者并列的。当然也可以说二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实现了反秦复楚的人物。

项羽自己没有做皇帝，究竟是他当不成还是不想当皇帝呢？看来是他不想当皇帝。一方面将战国楚怀王的子孙立为义帝，一方面自己仅称王，并分立十八个王。亦即一种在封建制之上拥立一个皇帝的独特体制。面对秦郡县制崩溃的现实，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政策选择。

项羽之评价

现代史学家对项羽的评论，不如对刘邦的评论多。张传玺的《项羽评论》发表于1954年，虽说观点比较早但也代表了一个方向(《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1985年)。即认为项羽在反秦斗争中是起到作用的，但是他从贵族立场出发搞天下分封则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真的是这样吗?

杀秦的第三代子婴、火烧首都咸阳、掘秦始皇陵而最终灭秦的是项羽。另一方面刘邦作为西楚霸王项羽麾下的汉王，最终破项羽而当上皇帝，此后继承秦始皇的统一帝国体制。始皇帝的遗产是以项羽为中介，再由刘邦继承下来的。

如此而论，秦、楚、汉本来都是小国。然后从一地之王统治全国，即帝位君临天下。我们将这一中国的天下称为帝国。秦王嬴政当上皇帝，即始皇帝；项羽将楚怀王立为义帝，自己做西楚霸王；汉王刘邦做了诸王之上的皇帝。皇帝刘邦也是把诸王推在前面，当时很难像秦那样实行全国范围的郡县制直接统治。

如同项羽封建十八王，在其上拥立义帝那样，汉一面继承秦的郡县制，一面又导入楚的政体，实现了郡国制。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域范围不过十五个郡。在当时战国时期的残余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统治全国是需要各种政治技术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刘邦是一面与项羽战斗，一面学习并吸收项羽的楚式体制的。

第四章

刘氏王朝的诞生

刘邦的汉帝国

《二年律令》的发现

1983年与刘邦同时代的证言记录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发现了。湖北省荆州市西南城外1.5公里处，张家山147号汉墓的竖穴木椁墓出土了1236支竹简。虽然不知道墓主姓名，但从规模和随葬品来看，墓主是一名地方官吏。在遗体旁随葬的竹制箱子中发现法律、历谱、数学、兵法、医学的竹简文书。历谱就是日历，记录了十七年间每月的朔日（一日）的干支。只要知道朔日的干支，就能知道每日的干支。因为年初始于十月，所以记为："六年十月辛卯、十一月丁亥、十二月丁巳、正月丙戌、二月丙辰、三月丙戌、四月乙卯、五月乙酉、六月甲寅、七月甲申、八月癸丑、九月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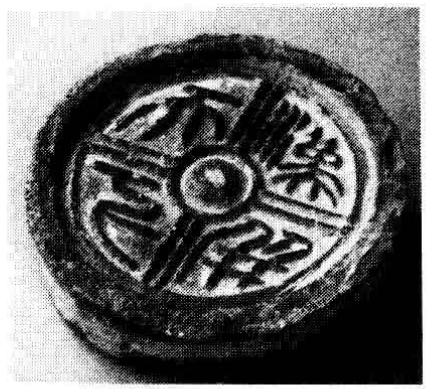
未小。”这是汉六年的所有干支。从五年至十二年是高祖，接下来的元年至七年是惠帝，最后元年、二年是少帝或吕太后的年号。

墓主死于公元前 186 年。因为汉五年（前 202）是刘邦即位皇帝的那一年，所以墓主经历过刘邦做汉皇帝的八年、惠帝的七年、吕太后的两年共计十七年的时间。因为在高祖五年的历书中记有“新降为汉”（新近降为汉），说明此人是在刘邦即位皇帝时成为汉朝官吏的，惠帝元年“病免”，即患病辞官。最后的八年是辞官之后的生活。他留下法律文书中有“二年律令”的标题。下面就让我们从这位无名的地方官吏的证言出发，作一番回顾吧。

汉皇帝的即位

刘邦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前 258），汉十二年（前 195）六十二岁去世。秦二世元年（前 209）他以沛公起兵，汉元年（前 206）称汉王，汉五年（前 202）称皇帝。做了三年沛公、四年汉王、八年皇帝。死后，取其具有最高功绩之意，称其为“高祖”或“高帝”、“高皇帝”。如有《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将秦始帝作为第一代皇帝的话，刘邦是最高皇帝，从这一意义上得出了“高皇帝”的谥号。因为高祖以前称皇帝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所以很有可能因为只承认秦始皇，而称高皇帝的。因为这个“高”与称高祖时的“高”一样，所以这不是庙号，“太祖”是庙号。

高祖当皇帝之后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亲自与匈奴作战被包



52“汉并天下”瓦当 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瓦当。表示的是楚汉战争迎来了天下的统一

围，为平定诸侯叛乱在与淮南王作战时受伤。他当时的目标何在呢？就汉年号的十二年来讲，前面四年是汉王，接下来的八年是皇帝；就建国而言，前者是汉国，后者是汉帝国，前后是不能不予以区别的。但是，即便进入汉帝国时期，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成为了帝国的子民。“帝国”这一名称和秦帝国同样，是我们使用的历史概念。进入汉帝国时期后，汉国仍然存在，而且是与其他诸侯国并存的。总之，进入皇帝时代以后，汉王国依然存活着。

公元前202年正月，与汉王同生共死于楚汉战争的诸侯、将领们，在谷城埋葬项羽之后集结于定陶。定陶位于山东的西端，山东丘陵以西的平原。项羽这一敌人被消灭的同时，西楚霸王的领导地位亦随之丧失。汉王刘邦为了实现对战争中过来的这些人的领导，不能不提高汉王地位。当时汉王与功臣之间有过如此的对话：

> 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
>
> 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史记·高祖本纪》）

汉王推让了三次，不得已，说："既然你们认为我做皇帝对国家有好处，那我就服从吧。"于是刘邦择日在汜水北岸即位当了皇帝。当时连都城都没有，所以即位仪式是在战场上举行的。实在不愧是刘邦式的皇帝即位。

强化中央权力的大清洗

除秦始皇之外使用帝号的，还有项羽拥立的义帝，以及秦末独立的南越文帝、武帝。广州南越王陵墓出土了文帝的印玺。当时已经进入了地方统治者也可以称帝的时代。汉王刘邦虽说是背叛秦而崛起的，但他仍效法秦使用了帝号。以后中华帝国的皇帝的称号，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

众所周知，刘邦与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年在位），同是一介庶民起家的皇帝。明朱元璋是贫农家的第四子，饥荒与疫病爆发中父母双亡，他沦为游方僧，流浪乞讨。这个朱元璋被认为是一千五百年前刘邦的翻版。

这对认识中国皇帝制有着重要的启发。孙文就说：乱世是不问身份的，谁能发挥领导才干，谁就能当皇帝。这可以说是中国权力社会的特征。

就这样刘邦即位为皇帝，西汉政权由此诞生。此时，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基础，汉首先实施了抑制地方诸侯势力的政策。在即位皇帝后的公元前 202 年至前 195 年的短短数年之间，逐渐清

53 文官俑（阳陵陪葬坑出土） 辅佐汉王朝的高级官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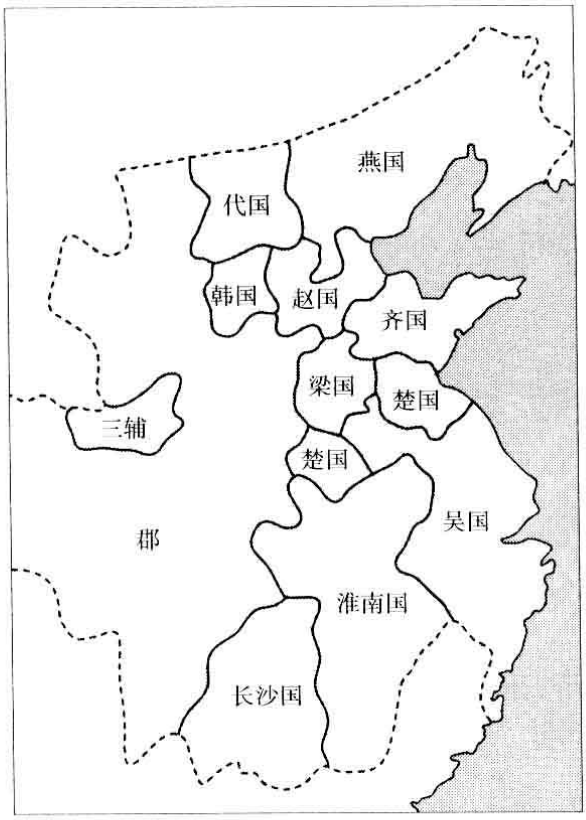
洗了楚汉战争中追随刘邦而且为建立西汉政权建功立业的淮阴侯韩信、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黥布）等人。高祖刘邦在追击英布的战斗中为流矢所中，这次受伤导致了他在公元前 195 年的死亡。进行政治清洗是刘邦晚年的重要事件。

辅佐皇帝的官僚与诸王

刘邦集团的成员，后来有许多成为辅佐汉帝国的高级官僚。王陵本是沛县豪杰，曾经统有数千人。后来他追随汉王，最终当上汉帝国右丞相。审食其也是沛县出身，从吕后成为项羽人质时开始，就作为舍人伺候吕后。他在当上左丞相之后仍然侍奉吕后。

萧何在刘邦以沛公攻入咸阳时，找到并收藏了秦丞相、御史的图书。如此，使这些宝贵资料得以躲过项羽纵火咸阳的浩劫。刘邦做汉王时，就是以这些秦的图书为依据，了解全国地形及人口分布、防御强弱和人民疾苦的。萧何在刘邦为汉王时已经是丞相，汉王与项羽作战时他作为行政官守卫关中，形成坚强的后方支援。不但汉军处于劣势时可以回到关中休整，巴蜀、关中还成为向前线输送军粮的重要补给基地。

此时的汉王刘邦为了取得天下，从巴蜀、汉中的领地出发，



54 汉高祖时期的郡国

为了控制东方诸王的势力范围，他必须得到那些不同于自己部下的、有能力的诸王的协助。地处边地对他至少有两点有利之处：一方面秦的故地关中就在眼前，另一方面正因为是边地，所以得以与六国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刘邦首先歼灭了塞、翟、雍的势力，从而掌握了关中。继而渡黄河，逐一灭河南、殷、西魏、常山、代、九江、临江等诸国，在那里设置了直辖郡。但是，他并没有对所有地域都实行这种直辖的统治，而是对成为盟友的诸王实行了封建制。

常山王张耳是背叛项羽入关中的，刘邦让他取代歇做了赵王；韩国也是在灭掉项羽所封王之后，封给韩王信的。脱离项羽投奔汉王的韩信，是萧何举荐的大将，先封为齐王，进而改封为楚王（前 202 年）。起兵于楚地反秦的刘邦，深知治理楚地的重要性，于是将其委托给了熟悉楚风俗的韩信。

有统率百万大军号称连战连胜的韩信在自己一方，旨在统一天下的刘邦可以说是非常放心的。曾被处以黥刑而投入骊山皇陵数十万刑徒之中的英布，虽加入过项羽的队伍，最终被封为淮南王（前 203 年）。

山东巨野泽渔夫彭越被刘邦任命为将军，因为在垓下之战大破项羽军有功，封为梁王（前202年）。其他还有衡山吴芮，分出临江的一部分来转封为长沙王（前202年）。

刘邦即位皇帝时进言他应该在诸王之上即位皇帝的人有：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异姓诸侯王。吴芮、英布、臧荼是从项羽的十八王倒向刘邦一侧而被封王的。韩信是脱离楚军而加入汉军的功臣。他们都是楚汉战争中追随刘邦的人物。

西汉朝成立时，虽说是皇帝也不得不采取由诸王拥戴的形式。这种从诸侯王中涌现产生名与实都出类拔萃之皇帝权力的过程，不妨说是西汉时期政治史的趋势。而高祖刘邦为了名与实都做到君临天下，就不能不对诸侯王果断地采取大清洗措施。

封爵之誓

汉王刘邦即皇帝位翌年的汉六年（前201）冬十二月，刘邦与功臣签订了“封爵之誓”的契约。汉根据夺取天下的功劳，授予一百三十七位功臣列侯的爵位。所谓列侯，是汉代二十等爵中的最上位，被授予一县大小的封地，并冠以那县的县名，称某侯。

封爵时的誓词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汉书》记“河”为“黄河”，“永宁”为“永存”，意思是一样的。这文章以丹书写于铁券，分为两部分，半分给功臣，半分保存于汉宗庙。

《楚汉春秋》虽已经成为逸书，《太平御览》卷五九八有如下的引文：

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与《史记》、《汉书》的记载有所不同的是最后的八个字，讲的不是“国”而是“汉”的宗庙。

所谓国是功臣们受封为列侯的“国”，“汉”也还是高祖刘邦的“国”。汉王刘邦曾经发誓“即使黄河变成衣带那样狭窄，泰山夷为砥石一样平坦，（我的）汉宗庙也将永葆不息”；功臣们也相应地宣誓“即使黄河变成衣带那样狭窄，泰山夷为砥石一样平坦，（我们被授予的）国土也将子孙万代永世相传”。誓言的契约一剖为二，一个人一个人地宣誓之后，高祖刘邦将一半契约装入黄金内箱，又放入石制外函，收藏于汉的宗庙。所谓汉之宗庙即放置祭祀帝室刘氏祖先牌位的灵庙，高祖刘邦时曾设有父亲太上皇庙，刘邦自己的庙建在陵墓长陵旁边，刘邦掌握的那一半誓言，可能就保存在刘邦死后的灵庙里。

诸侯王的叛乱

即位皇帝之后，刘邦为了抑制异姓王势力，采取了用刘氏宗族王取代异姓王的对策。诸侯王与那些支撑刘邦造反集团的功臣不同，是一批最后追随汉王的将军，与刘邦之间没有结成特别坚实的信赖关系。刘邦

并未立即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而是先处治了那些异姓诸侯。他推出“非刘氏不得王”的方针，将异姓诸侯或废或诛，进行了大清洗。除了位于边地的长沙王吴芮之外，全部消灭干净。名义上肃清诸侯王的理由有：暗杀皇帝、武装叛乱、逃亡国外等等对王朝政府的谋反行为。但其中多属诬告不实之例，而且总能见到些高祖刘邦一方策动的迹象。

早在皇帝即位当年的十月，就爆发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高祖亲自率军逮捕臧荼，另封太尉卢绾为燕王。此时刘氏一族尚未封王。公元前 200 年，韩王信因与匈奴在太原谋反罪，被除掉了封国。赵王张耳之子张敖，因其宾客贯高等人在高祖访问赵国的住处有实施暗杀的嫌疑，被抓到长安审讯。因为他是吕后的女婿才得以无罪赦免，但赵国却改封了高祖的儿子如意，王位被同姓诸侯取代（前 199 年）。

刘邦最感恐惧的是韩信和彭越。他首先对从齐王转封楚王的韩信下手，以擅自调动军队的罪名将他降为淮阴侯（前 201 年）。将楚领地分割东西，封将军刘贾和刘邦弟弟刘交为王。韩信离开之后的齐国封给了刘邦之子刘肥。韩信后来被密告企图袭击吕后和太子，在长乐宫遭到处决，一族都被杀害（前 196 年）。

梁王彭越虽说经常从封地到长安朝廷表示忠诚，但被畏罪逃亡长安的梁太仆密告计划谋反，终被流放蜀地。后来还是以谋反罪，一族被杀（前 197 年）。梁国也由此成为高祖儿子刘恢的封国。彭越的尸体被制成腌肉分发给诸侯王。同年，淮南王

英布也由于被诬告谋反，在汉朝使者来进行调查时，举兵与汉军激战，并于公元前 197 年被诛。高祖儿子刘长受封其国。

公元前 202 年正月进言皇帝即位的诸侯王，除长沙王之外都被逐一肃清了。例外的长沙王吴芮也于同年死去，王位由其子臣所继承。只因身处边境而没有被当做高祖刘邦的敌人。

汉王朝的首都圈建设与法制体系

再开发之后的关中据点

作为肃清非刘姓诸王的结果，高祖子弟的同族的封国已经有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等八国，异姓王国仅剩下长沙王一个。但是，虽说代之以同族人为王，其领地面积却并未变化。诸侯王的土地，大者相当于五六个郡的面积，其中县城达数十座，据说某些国王有着可与皇帝匹敌的宫殿和官僚。中央直辖的郡只有中央京畿内的内史（关中）、三河、东郡、颍川、南阳等与东方诸侯的中间地域，另外包括从江陵至蜀的西南边境，以及云中、陇西等北边地区在内，也不过十五个郡的规模。西汉朝成立时，旧东方六国之地再次成为东方诸侯割据的地方，现在可以说终于被刘氏一族所取代，不过很快又迎来了骨肉争斗的时代。

秦帝国在歼灭东方六国时，一举实现了中央集权。西汉的情况，本来是乘着旧东方六国复兴潮流掀起反秦浪潮的，是在

东方诸王联盟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权。不过，与始终维持诸王联合政权的项羽相比，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汉王刘邦是以边境的汉中（汉水上游之地）、蜀为据点，以极小土地最终形成对东方诸侯包围攻势的。对诸侯王的肃清也必须作为其中的一环予以考虑。

不容忽视的是，在肃清异姓诸侯王的背后，还有一种政策在逐渐付诸实施。刘邦即皇帝位的地点是在东方诸侯之地正中的氾水以北（山东曹县的济阴县），而建都时又效法封建东方诸侯的周公的旧都洛邑，以洛阳为天下首都。但是刘邦又采纳齐人刘敬和张良进言，一面剪除东方异姓诸侯，一面将自己的据点与东方隔开，决定将都城置于秦中（关中），开始了兴建首都圈的事业。这一地区曾汇集了各路倒秦诸将、秦都咸阳被火焚、骊山陵遭盗掘、而化为废墟的地方。刘邦意欲将此地复兴为对抗东方诸侯的地盘。

公元前 198 年刘邦发觉赵王张敖、丞相贯高的阴谋，采取了将楚地昭、屈、景、怀诸氏及齐地田氏迁徙关中的行动。旨在削弱东方六国旧势力地盘，借他们力量对关中实行新一轮的开发。翌年的公元前 197 年十月岁首，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异姓诸侯和楚王刘交（刘邦弟）、齐王刘肥（刘邦子）等同姓诸侯，以及由将军封王的荆（楚）王刘贾等至长安长乐宫来朝。

然而，翌年的公元前 196 年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淮阴

侯韩信被肃清，前195年燕王卢绾逃亡匈奴，燕成为高祖之子刘建的封国。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荆国废，翌年改称吴国，成为高祖刘邦兄刘濞的封国。在此之前韩信遭到肃清时田肯在对高祖的祝辞中说，关中地势便利，对东方诸侯用兵，“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15]。看来，以长安为地盘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压倒东方的态势。

选择洛阳还是长安

高祖曾一度置首都于洛阳。那时洛阳写作“雒阳”。在雒阳南宫召开酒宴。高祖还在考虑项羽的事，说：“我所以有天下者是为什么？项羽之所以失天下又为何？不妨直率地讲来听听。”高起、王陵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傲慢地侮辱人，项羽能体谅人心。”[16]这种对皇帝说话的口气，反映了当时刘邦集团内部那种人际关系尚且存在。但是，仅凭体谅人无法取得天下。陛下占领土地之后，能与功臣分享。项羽妒贤嫉能，不奖励有战功者，所以失天下。高祖于是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强调自己一方有三位杰出人才：谋略有张良，行政有萧何，战术有韩信。

在洛阳仅仅数月，临时首都的使命就结束了。由于大臣多数是山东出身，所以正式建都洛阳的方针得以确立。不过只有娄敬主张还是应该定都关中，高祖则更倾向于在周故都洛邑。娄敬的意见是这样：如今尚处战争创伤的未恢复时期，与建设洛邑的周成王、康王时代不同。如果今后山东发生叛乱，可以防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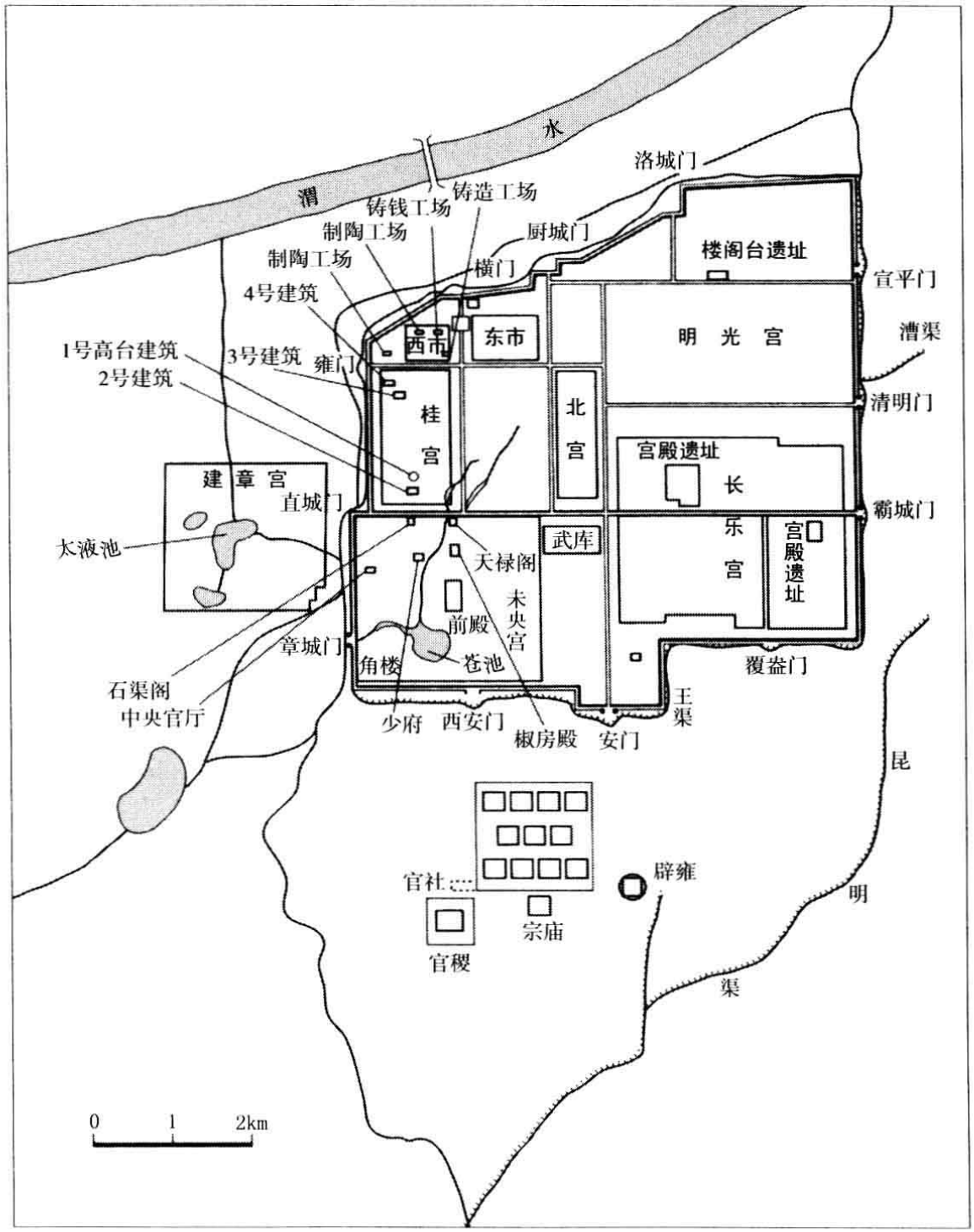
是秦之故地。因为那里是有山、河包围的四塞之地，紧急时可以调集百万民众。丰饶的关中大地向有“天府”之称。

在天下刚刚第二次统一之时，娄敬提出应该首先考虑防备将来东方叛乱的意见，他的这一意见如果不是得到了深受高祖信赖的张良的支持的话，恐怕是不会被采纳的。张良谈到自己观点说：“雒阳虽然北有黄河，南有伊水、洛水，东有成皋，西有崤山、黾池的包围，但是最多不过数百里，实在太小，地力也不佳。四面受敌时无从固守。相比之下关中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陇山与蜀地山脉相夹，沃野千里。东方诸侯安定的话，黄河、渭水的水利可以漕运粮食；若东方之地有变，可以救助。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地牧场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17] 这是张良的意见。与其占据天下之中心，不如优先考虑“金城”（铜铁一样坚固的城墙）、“天府”（天然的仓库）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的因素。

于是，高帝立即决定迁都关中。虽然天下已经到手，但毕竟对东方叛乱不敢掉以轻心，这与秦统一时何等相似！此时秦都咸阳已化为一片战火燃烧后的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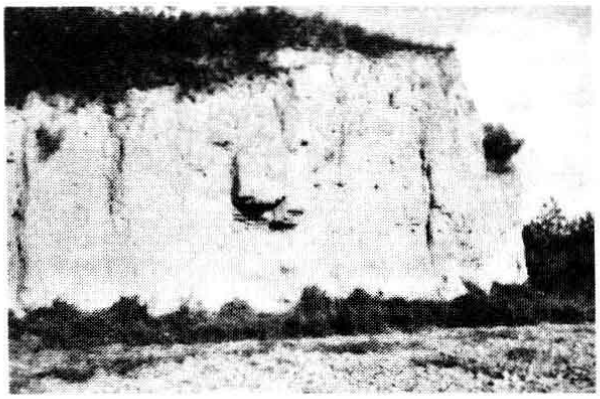
汉长安城遗址

西汉时期的首都长安城，在今天陕西省西安的西北，位于渭水之南。部分夯筑的城墙至今还明显地残留着，城墙周长 25.7 公里。根据《史记》、《汉书》、《三辅黄图》（记载东汉末及三国魏时期三辅〈畿内〉地理的


渭水
洛城门
铸造工场
铸钱工场
制陶工场
厨城门
制陶工场
横门
楼阁台遗址
宣平门
4号建筑
西市
东市
明光宫
漕渠
1号高台建筑
3号建筑
雍门
2号建筑
桂宫
北宫
清明门
宫殿遗址
长乐宫
建章宫
直城门
霸城门
太液池
武库
天禄阁
宫殿遗址
未央宫
前殿
章城门
角楼
苍池
覆盎门
石渠阁
中央官厅
少府
西安门
椒房殿
安门
王渠
昆明渠
官社
辟雍
宗庙
官稷
0
1
2km

55 汉长安城

56 汉长安城的夯土层遗迹



57 汉长安城霸城门　三个门道各宽八米

书籍）等文献史料与考古学的调查、发掘成果的相互印证，汉长安帝都的结构已逐渐搞清楚。根据西汉末年的统计，王朝人口五千九百万，首都长安居住的皇帝、皇族、女官、官僚、商人、市民有二十五万人之众。汉代初期、中期人口则不清楚。

就城内构造来说，南面的大部分是宫殿区，西北角是市场区、北部是一般居住区和街道。宫殿区占据城内大约三分之二的面积，包括未央宫、桂宫、明光宫、北宫等，其间还夹着武器库。

就长安城的建设过程而言，最初是在渭水南的秦咸阳城宫殿区的兴乐宫（汉明光宫）遗迹上开始，建造了未央宫、北宫、武器库、市场，至惠帝时期又建造了围绕这些宫殿的城墙。当时的渭水比今天渭水的位置靠南五公里，紧靠市场的北面，向东北方向流淌。因此，长安城城墙不是完全的正方形，城西北角是沿着渭水河道建造的。长安城中心的未央宫殿区，形状是大约两公里见方的正方形，此宫殿区的中心是未央宫前殿，现在那里还残留着当年利用自然丘陵建造的长方形台基。前殿就是正殿的意思，

是汉代皇帝政务和日常生活的场所。在这一高台的周围，分布许多未央宫殿区的宫殿、官厅。

东亚世界法律的源流

沛公刘邦与咸阳周边各县父老、豪杰约法三章，最终不过是双方之间暂时的条约。当然，所谓三章并不是只有三条的意思，而是贼律、盗律等三篇法律。从汉王对汉的统治，到汉皇帝对帝国的统治，当然需要超出这三章的更多法律。由于萧何将藏于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保存了下来，才得以从秦律中找出新国家所需要的法律。据说秦律来自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秦将“法”改称为“律”，即秦律六篇。萧何又加上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篇合为“九章律”。秦汉时期称基本法为律，律之中既有刑法也混杂以行政法。

在东亚世界存在着超越国境的、称为“律令”的共同法律体系。如同罗马法或日耳曼法予以欧洲社会巨大影响那样，作为中国法代名词的“律令”也在一定时期内，发挥着维持东亚世界国家、社会的法律机能。虽然比不上汉字或儒教的影响力，但对于古代东亚各国的国家建设确是非常重要的。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越南等这些采纳中国律令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国家，都是东亚国家。这是因为如果输入其他外国法律文书，使其适用于本国的话，首先要把法律文章翻译为汉语。所以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东亚世界，才有可能实现法律共有。

运营一个庞大国家组织，官僚要依法行政，社会须依法维持秩序。古代日本就是由于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因而称为律令制国家的。采纳的是当时中国唐代的律令，这是当时中国实际使用的法律。然而，若寻觅中国律令渊源的话，势必追溯至秦汉的律令。

始皇帝的严惩主义与刘邦的简约主义

秦汉时期律令与唐代律令不同，尚未分为所谓刑法的“律”与行政法的“令”。比如唐的“户婚律”中：“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姓结婚是犯罪，处以劳役刑。在姓氏少的中国为了保护姓氏团体的血缘关系，制定了这样的唐律。唐的“户令”中有“诸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的行政法。

秦汉时期虽有“律令”一词，但说“秦律”、“汉律”才正确。刑法和行政法都是以“律”为标准的，“令”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代的律在唐代已经成为死文。法律，随着王朝交替，虽然基本内容有所继承，但总是不断换新装的。秦律被汉律继承，汉律被魏晋律继承。这样的关系在《汉书·刑法志》和《晋书·刑法志》（唐代编纂）有着如下说明：

正史中最先设《刑法志》的是《汉书》，其中首先将秦始皇的严惩主义与高祖刘邦的简约主义做了对比。强调始皇帝专用刑罚从事政治的特点，说他白天从事判决，夜里批阅行政文书。每日要亲自批阅文书一石（约重三十公斤）。尽管如此，结果还是恶人

横行，穿赤服的囚犯塞满道路，收容犯人的牢狱像市场那么多。高祖则不同，他进入秦领地之后仅留下最基本的“三章之法”，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承诺削减烦琐的秦法律。苦于秦政治的民众，十分欢迎刘邦的简约主义，无不为之欣喜。

但是尽管法三章是法律的基础，但仅有贼律（惩罚伤人、杀人者）和盗律是不够的。实际上相国萧何整理秦法，继承其中有益部分，制定了“律九章”。惩罚偷盗者（盗律），惩罚害人、害国者（贼律）。囚律是管理罪犯的，捕律是逮捕犯人的。盗贼以外还有杂律的规定，具律归纳了刑法的体系。萧何不仅继承秦六律，还增设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作成九章律。一面说秦法律烦琐，一面又汇集秦律六篇；汉在简化烦琐的秦律为法三章的同时，又在所继承秦律六篇基础之上加入三篇，合为九章律。

模糊的秦律、汉律终有搞清楚的一天

在唐代之前四百至八百年前的秦汉之律，长期是模糊的。长期以来我们只能见到秦律、汉律逸文片段。然而，现在不同了。通过出土史料我们见到了完全可与世界帝国隋唐律令匹敌的秦汉法律体系。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帝国的确是以法律为基础建造的。

1975 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1983 年发现张家山汉简终于使我们弄清了虚幻的秦汉律的具体内容。1150 支睡虎地秦简中，被命名为《秦律十八种》的律文有：田律（六条）、厩苑律（三

条）、仓律（二十六条）、金布律（十五条）、关市（一条）、工律（五条）、工人程（三条）、均工（二条）、徭律（一条）、司空（十三条）、军爵律（二条）、置吏律（三条）、效律（八条）、传食律（三条）、行书（二条）、内史杂（十一条）、尉杂（二条）、属邦（一条）等，共一百零七条。此外，单独的效律（三十条）以及作为《秦律杂抄》整理出来的十一种、二十七条。即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律、傅律、敦表律、捕盗律、戍律等共二十七条。由于以往我们对秦律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一次发现二十九律，二百七十一条，可谓让人惊叹不已。此外，还有作为《法律答问》这一法律问答集中整理出的一百八十七例，以及题为《封诊式》的案例二十五例。

张家山汉简是247号墓出土的竹简，总数有1236枚，题为《二年律令》的有526枚，末尾一枚简上有“律令二十□种”的字样。因为同时出土的历谱（日历）中记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的年代，所以二年律令乃吕后二年的律令。共有从贼律至史律的二十七律，令只有津关令一种。条文数如下：贼律（四十一条）、盗律（十八）、具律（二十四）、告律（五）、捕律（九）、亡律（十三）、收律（五）、襍律（十四）、钱律（九）、置吏律（十）、均输律（二）、传食律（四）、田律（十三）、市律（三）、行书律（八）、复律（一）、赐律（十八）、户律（二十二）、效律（五）、傅律（八）、置吏律（十八）、爵律（三）、兴律（九）、徭律（六）、金布律（十二）、秩律（十三）、史律（七）等共三百条。算上津关令

58 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台基遗址

（二十）的话，三百二十条。另外，还有称为《奏谳书》的判决记录二百二十七枚，记录了二十多个案例。

迄今，对于汉律只能从《说文解字》《史记》《汉书》和《周礼》郑玄注中引用的逸文和极少的出土资料有所了解。自南宋王应麟《汉制考》中收集汉律二十余条以来，还有许多人收集过。如薛允升《汉律辑存》、杜贵墀《汉律辑证》（1899年）、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浅井虎夫《支那法典编纂沿革》（京都法学界研究丛书第七册，1911年）、沈家本《汉律摭遗》（1911年）、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等。

以上两部出土史料使我们感到了秦汉律的分量。秦汉史研究也因此受到很大冲击。然而，不论睡虎地秦律还是张家山汉律，由于只是偶然残存于秦汉地方官吏墓葬中的材料，所以并非能够展示秦汉律令体系整体的史料。但是，尽管只是一部分，竟有如此的分量，的确令人惊讶。

以往出土史料中发现的汉律逸文极少。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中不过十几条而已。如敦煌汉简中抄录有“畜产相贼杀，参分偿和”一条。意思说：擅自杀害别人家畜，须按该家畜价格的三分之一赔偿。“贼”，擅自加害之意。为何不是全额赔偿，而是三分之一？因为被杀家畜还有市场价值，毛皮、肉、骨都可以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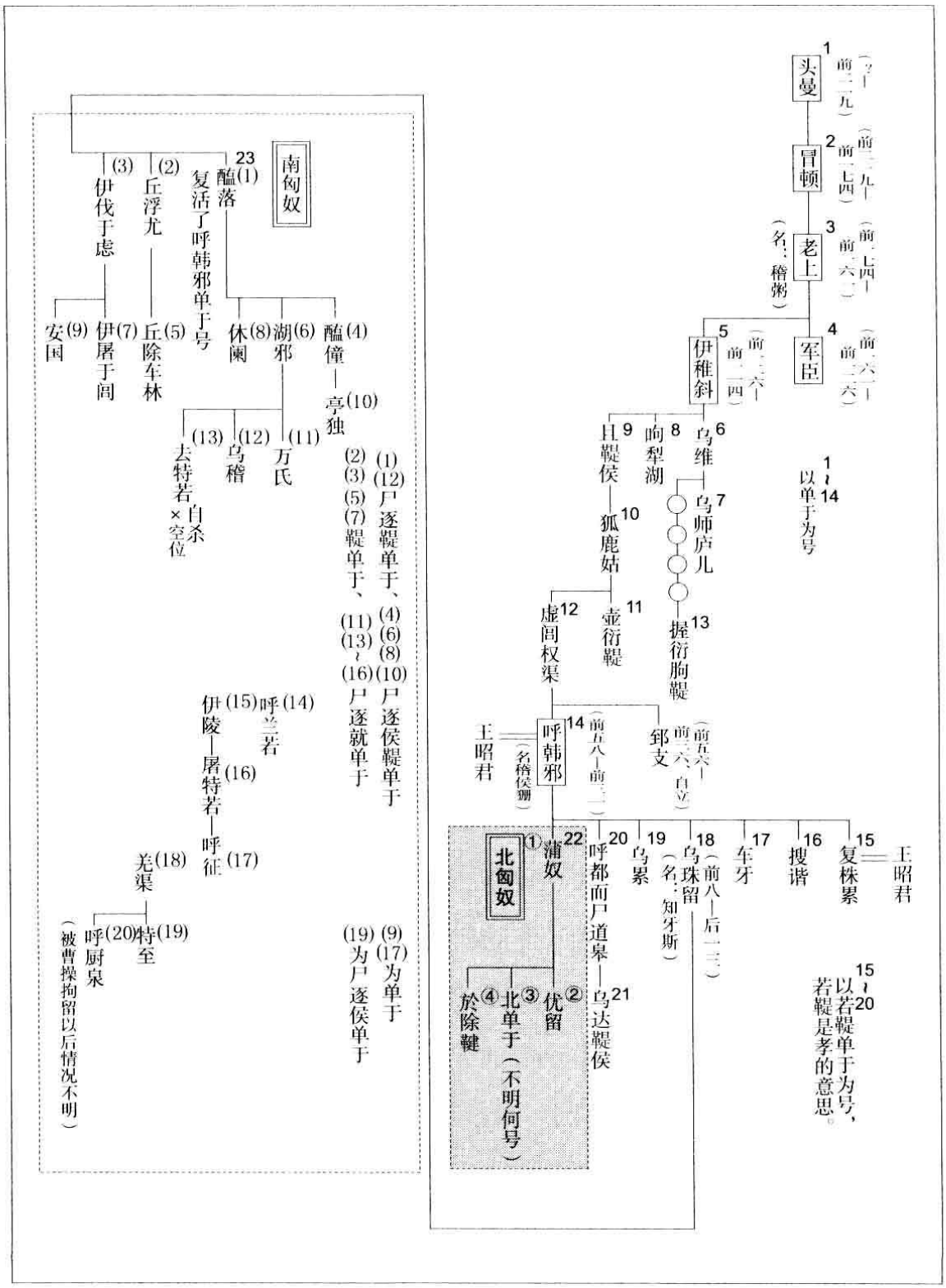
本简后面的内容是“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总之，调停的结果是让杀害别人家畜的少仲，按照价格的三分之一附三千钱，并将死马的骨、肉都交还马的主人。

对匈奴外交与高祖之死

冒顿单于的权力篡夺

北方游牧民匈奴首领冒顿单于行动起来了。冒顿单于是与秦作战的头曼单于的太子，他杀了父亲头曼，自立为单于。冒顿单于缔造了史上最强的游牧骑马帝国，进而对成立伊始的汉帝国的北边构成威胁。的确，蒙古高原上匈奴的行动，与中国的动向是互相连动的。中国爆发内乱了，他们就南下；中国的王朝向北方出击的话，他们就退回草原。“头曼”、“冒顿”、“匈奴”的汉字都是对匈奴语的音译。“头曼”是“万人之长”的意思。

匈奴在与秦交战之后一度退回北方，楚汉战争时他们又趁中国内乱，恢复了黄河的鄂尔多斯。头曼单于为立少子（最小儿子）为继承人而疏远冒顿，将冒顿派到月氏去当人质，然后去袭击月氏。于是月氏要杀冒顿，冒顿果敢地夺取善马得以逃脱。归来之后，他的勇敢受到承认，被任命为统率万骑的将军，后来他杀害父亲的故事流传下来。冒顿做鸣镝箭，命令臣下，凡自己用鸣镝所射之物，你们必须跟着射，有不射者，斩之。先是射自己的



南匈奴
23 醢落 (1)
复活了呼韩邪单于号
(2) 丘浮尤
(3) 伊伐于虑
(4) 醢僮
(5) 丘除车林
(6) 湖邪
(7) 伊屠于闾
(8) 休阑
(9) 安国
(10) 亭独
(11) 万氏
(12) 乌稽
(13) 去特若 自杀 ×空位
(1)(12) 尸逐鞮单于、(4)(6)(8)(10) 尸逐侯鞮单于
(2)(3)(5)(7) 鞮单于、(11)(13)~(16) 尸逐就单于
(14) 呼兰若
(15) 伊陵
(16) 屠特若
(17) 呼征
(18) 羌渠
(19) 特至
(20) 呼厨泉
(被曹操拘留以后情况不明)
(9)(17) 为单于
(19) 为尸逐侯单于
1 头曼 (?—前二一九)
2 冒顿 (前二一九—前一七四)
3 老上 (前一七四—前一六一)
(名：稽粥)
4 军臣 (前一六一—前一二六)
5 伊稚斜 (前一二六—前一一四)
6 乌维
7 乌师庐儿
8 呴犁湖
9 且鞮侯
10 狐鹿姑
11 壶衍鞮
12 虚闾权渠
13 握衍朐鞮
14 呼韩邪 (前五八—前三一)
(名稽侯狦)
王昭君
郅支 (前五六—前三六，自立)
15 复株累
王昭君
16 搜谐
17 车牙
18 乌珠留 (前八—后一三)
(名：知牙斯)
19 乌累
20 呼都而尸道皋
21 乌达鞮侯
22 蒲奴
北匈奴
(1) 优留
(2) 北单于(不明何号)
(3) 於除鞬
(4)
1~14 以单于为号
15~20 以若鞮单于为号，若鞮是孝的意思。

59 匈奴单于谱系图

善马，后来射爱妻，拒绝放箭的人被杀。当他确信臣下都听指挥之后，与父亲一同出外狩猎。最终，他把鸣镝射向头曼，臣下一齐射杀了头曼。如此，他逐渐确认并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冒顿东灭东胡、西攻月氏，向南兼并楼烦王和白羊王的土地，恢复了被蒙恬夺走的土地。南下到达汉帝国国境的河南（鄂尔多斯）。此时冒顿的弓兵部队的人数已超过三十万。

如此强势的游牧帝国单于冒顿，将代王韩王信围困在了马邑。韩王信当时是为防御匈奴，而被封于太原以北为王的。韩王信被围之时要求与冒顿和解，此举引起汉帝国一方的怀疑，于是他与匈奴约定共同攻汉，发动了对汉朝的叛乱。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就此时的匈奴来说，还不能说是北方具有足够攻击力的国家。

韩王信出身于战国韩国的旁系，做韩司徒时追随了沛公的队伍。韩国的地位在中原十分重要。项羽与汉王在那里有过激烈争夺，封过几任韩王。汉王封信为韩王。封韩国人做韩王可说最为妥当的。韩王信作为代王，也成了防御匈奴的北边屏障。

神秘人物刘敬的提议

公元前201年匈奴继续南下，已抵达太原郡的晋阳。高祖（高帝）亲自出征。当时天降大雪，正是冻伤频出的季节。汉派遣步兵三十二万。高祖随先头部队刚刚抵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冒顿的四十万精锐骑兵于平城郊外的白登山包围了七天。如果从双方兵力总数来看的话，一场秦始皇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紧

急状态。即位伊始的汉皇帝遭到匈奴的包围。包围过项羽的刘邦，现在被匈奴包围了。危机最终由单于夫人阏氏从中调解才得以避免。高祖向阏氏送去了丰厚的礼物。我们只知当时用了陈平的计策，至于阏氏究竟有过怎样的活动，未见记载。事关皇帝屈辱，事件始末当属机密。无论如何，对当时匈奴与汉的关系是有必要予以些许重新认识的。

娄敬，被赐姓刘之后，改称刘敬。他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出自齐地，家庭身世不明。他在赴陇西守卫国境途中，身着羊皮衣于洛（雒）阳当面向高祖提出迁都长安建议，在对匈奴外交方面提出认清匈奴战略、反对战争的主张。他敏锐地看出在汉使者到来之前匈奴特意隐藏精锐兵力的战术。两次建议都属少数意见，后者未得到采纳，结果不幸被刘敬言中。

在刘敬的头脑里，外交与内政已经一体化了。匈奴既然已经恢复了对河南（鄂尔多斯）的控制，即便汉建设新都长安，一旦出现南白羊王或楼烦王来袭的紧急事态，七百里的距离，一昼夜即可逼近都城。出于戒备，必须加固围绕首部长安的关中全体防御。秦崩溃后，这里尽管土地肥沃，人口却在减少。即使为了防范北匈奴和东方诸侯的反攻，也不能不恢复关中。于是，他提议首先应该将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以及燕、赵、韩、魏等旧战国各国王族、贵族迁徙关中。建设关中首都圈的构想，就这样从对匈奴外交中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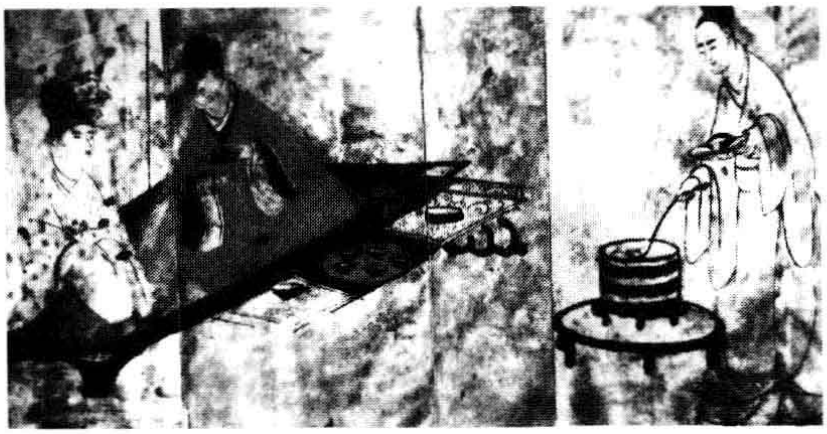
高祖刘邦最后的日子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高祖于长乐宫死去。享年六十二岁。上一年七月，亲征淮南王黥布时中流矢负伤。十一月返回长安后，由于四个月的在外奔波，也使其伤势恶化。诸侯叛乱此起彼伏，汉王朝也面临着一代而终的危机。因为刘邦政权是依靠其与诸侯王、列侯之间信赖关系维持的，所以一旦刘邦死去的话，王朝骤然崩溃的可能性极大。同为编户民（在户籍注册的庶民），只有刘邦一人当上了皇帝，其他人都只是臣下。刘邦之子即便继承其后，父辈的关系能否维系也是没有保证的。高祖死后，四日之内没有发丧。这使人想起秦始皇死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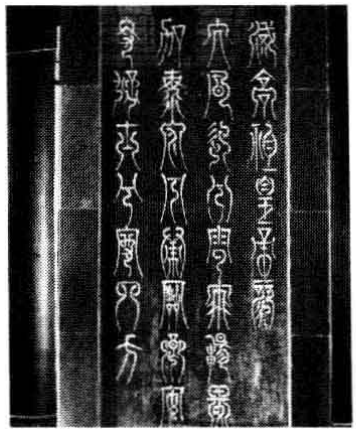
直至高祖临终还在支持他的有樊哙、周勃、郦商、陈平、灌婴、萧何、曹参、张良、王陵等。他们多是沛县出身，从沛公时代起并肩战斗至今。他们与高祖一样，即便当上官僚以后也一直握剑保卫汉王朝。郦商是作为丞相、曹参是作为齐国相国与高祖并肩讨伐黥布的。周勃、樊哙则是作为汉相国讨伐燕王卢绾的。

故乡的力量一直到高祖最后的日子都给他带来勇气。高祖讨伐黥布之后，曾经回到故乡沛县，在沛宫聚集友人、父老子弟，开设酒宴，还教给沛县一百二十多个孩子唱自己作的歌。宴会进入高潮时，高祖一边击筑，一边歌唱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在孩子们的应声和唱中，他跳起舞来，脸颊上热泪滚



60 四川酒宴画像砖　二人一排正坐于席上用膳，从面前的酒樽取酒饮用



61 复原的大风碑　高祖回归故乡沛县，设酒宴唱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沛县歌风台）

动。就高祖心情而言，汉王朝虽然建立，但是他已经痛感守江山之困难。年逾花甲的他终于在故乡人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宴会持续了十天以上。沛县和高祖出生地丰邑都得到了免税的恩典。

高祖的亡骸埋葬在远离故乡的长陵。长陵是高祖的陵墓。汉代皇帝陵从即位的翌年开始建造。就高祖而言，汉王即位时尚未定都长安，所以应该是从汉高祖七年（前 200）迁都长安时起选定陵址，开始动工。至他死去仅仅六年时间。长陵位于秦咸阳宫北侧咸阳原上，隔着渭水位在长安长乐宫的正北。此处对于取代秦而建立汉的高祖来说，是相当合适的位置。长安未央宫前殿建于高土台上，由此也可以远眺长陵。

高祖在沛县时曾对故乡人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史记·高祖本纪》）就心情来说，还是希望葬于故乡。看来对远离故乡之秦都咸阳之地魂魄的归宿有所不安。

在咸阳市窑点乡三义村附近有两处坟丘，现在被认为是长陵的遗址。遗址附近出土了“长陵西神”等瓦当。两处坟丘，大小基本相同。东边一个：东西 150 米，南北 130 米，高 30.7 米；西边一个：东西 153 米，南北 135 米，高 32.8 米。大致呈横长的长方形，顶部平坦。十八世纪清朝陕西巡抚毕沅在所立碑中曰：高祖长陵在东，吕后陵在西。然而，由于成书四世纪的《关中记》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所以还是依据此说为妥。坟丘虽彼此分开，但是在同一陵区夫妇合葬的新葬式。

62 长陵与吕后陵　右手（西）的长陵是汉高祖陵墓。同一陵区内还有吕后陵（左手，东），夫妇并排下葬

长陵东侧并列着的是陪葬墓。据文献记载，萧何、曹参、王陵、周勃等埋葬于死后远离故乡的高祖长陵附近。他们与高祖的关系于死后仍在继续。这里见不到秦始皇与吕不韦、李斯、蒙恬之间的那种关系。另外，皇帝与皇后陵墓规模几乎相当的现象，也是秦始皇陵所没有的。其实，本来秦始皇的皇后是否存在都不清楚。皇帝制度的确是从秦始皇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变化也是明显的。这在陵墓制度上也有所反映。

皇后陵一般比皇帝陵要小。吕后陵与皇帝陵几乎大小相等的现象，就皇帝与皇后陵墓来说无法理解。应该从皇帝陵与皇帝死后掌握政权之太后陵相互并列的角度去考虑。吕太后在高祖

死后，又将儿子惠帝葬于安陵，然后将自己的陵墓建在高祖长陵旁边。显然这并非高祖的意志，而是高祖死后，吕太后掌权时她按照自己的意志、与高祖长陵并列建造的。可以说这是太后显示自身权力的产物。

吕太后政权

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

吕后时如何掌握政权的呢？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唐代的则天武后，即武则天。则天武后是高宗的皇后，而后当上皇帝。为此必须进行从李到武氏的易姓革命。吕后的情况则不同，是从皇后（皇帝之妻）到皇太后（皇帝之母），替幼小皇帝临朝称制（面临朝堂，像皇帝那样称制），掌握政权。所以不称女帝，只称女主。自己不做皇帝而执掌政权，采取了以吕氏王国与刘氏王国并列的形式。为此，她必须背弃高祖刘邦生前“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

高祖亡后，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间的历史，《史记》记载为《吕太后本纪》。不是《吕后本纪》，而是《吕太后本纪》。《汉书》则将其分为《惠帝本纪》和《高后纪》。表示在男性皇帝的惠帝与文帝之间，夹着一个女性皇太后的政权，将其列入《本纪》是承认其具有正统的地位。《史记》没有将幼小的两位少帝列入本纪，而是将代替少帝执政的吕太后作为皇帝予以记载。换言之，

如果不承认吕太后政权的话，汉王朝将无从连续。

吕雉与刘邦

吕雉，后来的吕后、吕太后的父亲吕公，山阳郡单父出身。为逃避仇人报复，移居沛县，寄身于朋友沛县县令那里。此时，吕公与当时的沛县亭长相遇。外来的吕公家来了许多客人，县吏萧何负责收取来宾的礼物，且由此决定座次，让那些送礼不满一千钱的来宾，坐在堂下。当时，与身份高的人会面，必须事先请人代为转交名片。名片称为“谒”，是一块木牌，上面写上姓名和礼物内容。刘邦虽然未持一钱，却写上“贺钱万”，献上一万钱。吕公大惊，迎至门口；见刘邦容貌很有贵人相更是吃惊。吕公会给人相面。让于上座，宴会高潮时吕公拜托刘邦，说希望自己的女儿去伺候你，给你当妻子。母亲吕媪对吕公的决定表示反对，说：“我们总希望女儿嫁给一个贵人并得到宠爱，沛县县令与你交好，你都没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儿子，怎么就嫁给刘邦这么个男人呢？”

《史记·高祖本纪》是如此记载吕雉与刘邦会面故事的。描述了西汉初期的皇帝与皇后，开始时谁也不知未来如何的情况。读起来很有意思，是否属实则不得而知。至少，不知道吕雉父、母名字，所以记为吕公、吕媪。这与仅仅记载刘邦父、母为太公、刘媪是一样的。吕公也因为是吕雉吕太后的父亲，才如此称呼，至于其身世也只知道他出身于单父县而已。

这个吕雉在丈夫刘邦成为皇帝时，也从妻子吕雉摇身变为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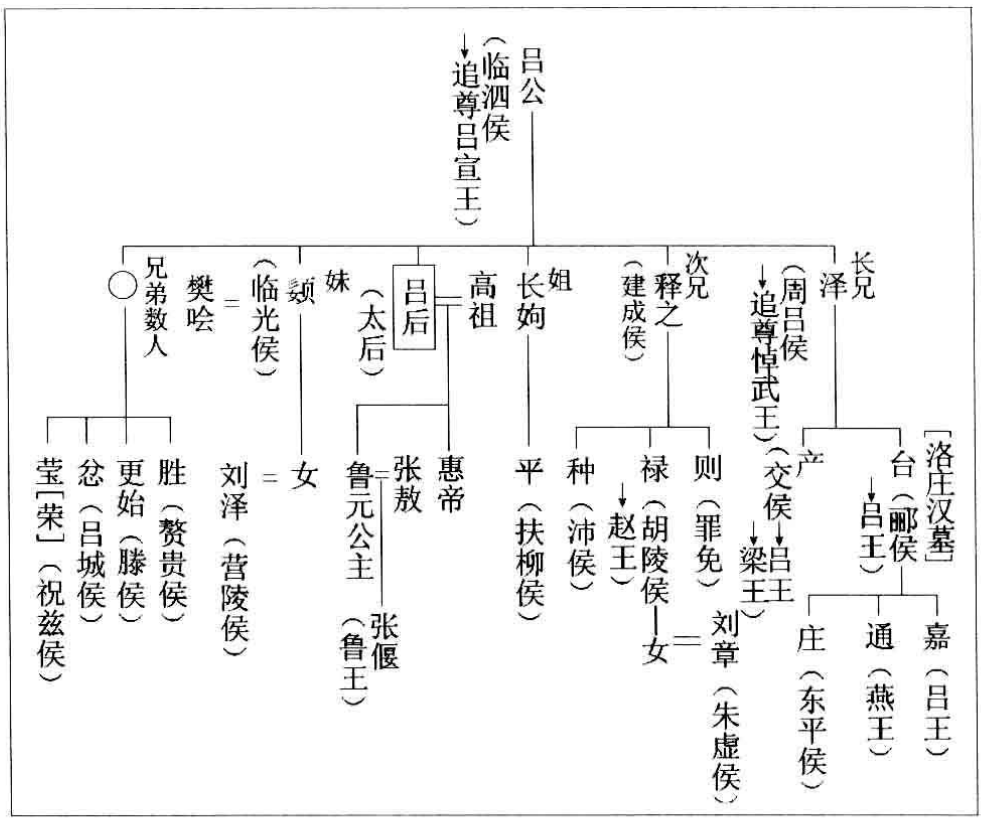
后。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秦始皇的皇后，以及秦二世的皇后的名字及生平事迹都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吕雉就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皇后了。

残虐戚夫人的复仇

高祖死后，他和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成为汉的第二代皇帝，即仅仅十七岁的惠帝。高祖有八个儿子。从年龄上说惠帝是老二，弟弟有戚夫人之子如意、薄夫人之子恒（后来的文帝）。由于戚夫人最为受宠，她的儿子如意也最获疼爱。吕太后毒杀了如意，又砍断戚夫人的手和脚，挖去眼睛，烧掉耳朵，迫其饮哑药不能说话，还像养猪那样让她住在厕所里，起个名字叫“人彘（人猪）”。这段描述吕太后冷酷、残虐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

惠帝的七年政治中，外交上没有作为，内政上也没有诸侯的反叛。代替惠帝执政的是吕太后，较为明显的举措不过是修筑了长安城的城墙。高祖时尚无城墙，还不能说长安是“城”。宫殿虽有围墙，但还远不是都市规模的都城。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当时认为只要守备关中即可，所以没有提出长安城的整体规划。

惠帝时终于建立了市场、仓库。又选择雨水少的春季，征调附近十四万以上的农民，用夯筑法筑起了长安城的围墙。所谓夯筑，就是在两侧夹板之间填土，从上面夯实的简易施工法。黄土土质即使不烧制，也有不渗水的效果。每年一个月的工程，



63 吕氏一族谱系图

进行了将近六年。围墙完工后，第一次展示了都市的威容。即便历经两千两百年之后的现在，长安城城墙的夯土层仍然完好保留着。边长约六公里，周长有二十三公里。之所以呈现出算不上正方形的不规则形状，是因为城墙是后来围起来的。又由于当时的渭水在今天的位置以南，所以沿河一段的西北城墙是斜向延伸的。

外戚吕氏的时代

吕后将自己的孙女、鲁元公主的女儿嫁给惠帝，使其成为皇后。就惠帝来说，是娶了自己亲姐姐的女儿，即外甥女。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近亲结婚。

然而，二人之间并未产子。惠帝与后宫宫女之间却产子很多。吕太后指望皇帝、皇后都是自己的亲属，不能不为二人没有生育太子而焦急。惠帝死后，吕太后在后宫诸子中相继选过二人，幼年即位，太后在背后实行临朝称制。由此随着吕氏一族的封为诸侯，进入外戚吕氏的时代。据说即位的孩子是从宫外送入宫，冒充惠帝儿子的。如此，继惠帝的七年之后，是吕太后的八年。

少帝长大后，知道自己并非皇后之子，且生身母亲被杀。吕太后恐暴露事实真相，谎称少帝患病，令其退位，将其幽禁、杀害。这位即位四年的皇帝甚至没有留下名字（据说名“恭”）。取代他的是刘氏宗族恒山王刘义，改名“弘”。

《史记》明言曰：“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武帝以前的西汉初期尚无年号。先帝死去后，新帝即位等到新年来临，开始按元年、二年计算。惠帝死于年末的九月，所以第二个月，即十月的年初进入元年。按说那应该就是上述那位少帝的元年。但到了第四年少帝被废除，当年五月刘义即位皇帝。本来应该等到十月进入新的元年，但因为是继续太后的临朝称制，所以也继续使用现行的年号。西汉皇帝系谱中如果算上此二人的话，他们应该是第三代、第四代皇帝。张家山汉简中所记“二年律令”的“二年”意思很微妙，既可以说是少帝二年，也可是说是吕太后二年。当然，无论怎么叫法，都是公元前 18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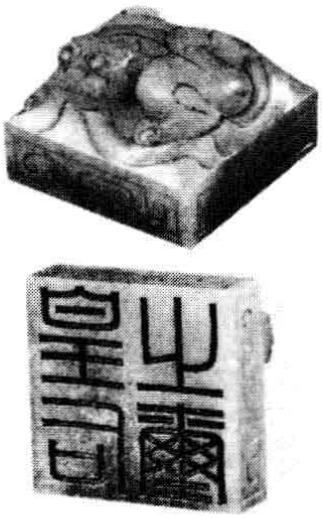
封吕氏为王之事遭到右丞相王陵的强烈反对，认为不能背弃白马之盟。尽管如此，陈平、周勃支持了吕太后。他们虽然受到

王陵“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的斥责，但仍未改变态度。但是，吕氏对封王之事一直很慎重。先是追封已经死去的吕后之兄吕泽为悼武王，其父为吕宣王，都只是个称号而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具律中，有关于吕宣王内外子孙犯罪应当减刑的条文。这是特殊照顾吕氏宗族的内容。继而，分封了沛侯吕种、扶柳侯吕平等列侯，又封了惠帝后宫之子为淮阳王、恒山王等王。最后，终于封自己侄子吕台为吕王，可谓慎重，以自己的吕姓为国名的做法，又不能不说非常大胆。此后，相继诞生了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

1999 年，山东省济南市东的章丘市，发现一座大型汉墓。称为洛庄汉墓的墓葬被认为是吕台的墓。吕王吕台仅数月而亡，王国由其子吕嘉继承。吕太后一手扶植吕王，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一座具有三十三个大型陪葬坑、三辆大型马车、十二匹陪葬马的大型墓葬。

“皇后之玺”的真伪

“文革”中吕太后、吕后受到批判。1968 年出土了“皇后之玺”的玉印。那天，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大队社员孔祥发十四岁的儿子，在放学回家途中从水沟的土中发现了这块白色而光泽的东西，带回了家。父亲孔祥发知道这是文物，将其交到陕西省博物馆（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炉的发现》，《文物》1973 年第五期）。玉玺现在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玉玺呈边长 2.8 厘米的正方形，高 2 厘



64“皇后之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968年发现于吕后陵附近水沟的土中，虽然推定为吕后之物但存在一定疑问（《秦汉雄风》）

米，重33克，印面刻有“皇后之玺”字样。穿绶的印钮为虎形，侧面有云纹。秦波推测：由于玉玺发现于长陵陵邑所在地，本来可能是吕后陵旁边便殿的玉印，赤眉之乱时因便殿被烧而埋入土中，又在吕后陵被盗后混入水沟，最终被发现。

李云鹤（1914—1991），后改名江青，是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随着“文革”开始，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爆发，她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毛泽东曾警告党的干部说：“江青自己想当主席。”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她作为“四人帮”的成员被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在中国，人们无论如何要把江青与古代的吕太后联系起来。而江青本人也对这块玉印很关心。

皇后玉玺的发现，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以上了。发现地所在的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大队已经不存在，现在叫韩家湾乡狼家沟，位于长陵以西1.5公里处。西边是惠帝的安陵，断定这块埋于土中的皇后玉玺为吕后之印，是有疑问的。因为所谓吕太后的皇后时代，仅仅是刘邦即位称皇帝至他去世的八年。而在此后其子惠帝以及孙少帝的十五年中，她一直是皇太后。若以皇太后下葬的话，收入陵庙的按理应该称“太后之玺”。对于为什么称“皇后之玺”，没有人做出解释。太后掌握政治实权的先例，可以追溯到战国秦的时代，秦

始皇帝的曾祖父昭襄王年少即位时，就是楚出身的母亲芈氏宣太后摄政。秦王政二十二岁时发生嫪毐之乱，当时嫪毐曾企图伪造王御玺和太后御玺发兵。秦王政从即王位至带冠佩剑之前，母太后（帝太后）一直参与政治。王御玺与太后御玺，都是有其作用的。按说吕太后也一定应该有太后之玺的。

秦始皇帝母亲称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一同葬在芷阳。高祖与吕后合葬的先例，是在秦始皇、秦二世之前的庄襄王与帝太后。最早实行太后摄政的宣太后，与并非她与丈夫惠文王之间的儿子昭襄王合葬于芷阳。惠帝的张皇后陪葬于安陵，并没有修建坟丘。现在安陵西侧的小坟丘据说是后世建造的。从玉玺发现的位置来看，有可能是这位张皇后之玺。

对吕太后评价的动摇

关于吕太后的评价，自文帝即位以降，至王莽期，再至东汉时期，吕后的名声越来越坏。她死后二百年，在赤眉之乱中，叛乱军掘开吕后陵，暴尸凌辱。然而，虽说是叛乱军，也并非就一定胡乱盗掘皇帝陵的。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载："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皇帝陵等陵墓中穿着玉衣的遗体不腐败，埋葬以后犹如生前状态。这绝不是夸张，在地下深埋密封的椁室中，没有外面空气进入，如果保持一定湿度、气温的话，棺木和尸体就不会产生腐败菌。尸体保存两千年以上虽属罕见，保存一百年、

1 文王吴芮（前202）

2 成王臣（前202–前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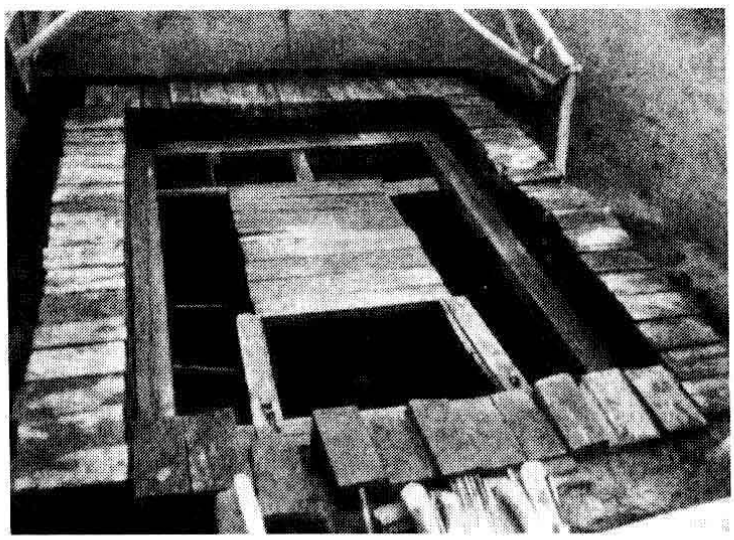
3 哀王回（前194–前187）

4 恭王右（前187–前178）

5 靖王著（前178–前157）

（ ）内为在位期间

65 长沙吴氏王国谱系图　肃清刘氏以外异姓诸侯举措之中，唯一残存的特例



66 吴阳墓的墓室　第二代长沙王吴臣之子的沅陵侯吴阳墓。出土大量竹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二百年应该是可以的。

赤眉军并非偶然发现吕后尸体。他们明显是有目的地盗掘吕后陵的。因为赤眉集团所信仰的城阳景王祠，正是吕太后的仇敌。城阳景王乃高祖的孙子刘章，是位在宴会上公然抨击吕太后一族专朝的人物。那之后，复兴汉王朝的光武帝刘秀，从高祖庙中撤去了吕太后的牌位，而将薄太后作为高太后予以祭祀。薄太后是文帝的母亲薄夫人，是作为慈爱仁厚的人物予以重新评价的。另外，光武帝祭拜了西汉十一个皇帝，其中没有包括两位少帝。

长沙国与南越国

长沙国存在了五代四十六年（前202—前157），由吴氏执掌。是高祖的十个王国之中唯一的异姓诸侯国。亦可称为吴氏王国。先后为文王吴芮、成王臣、哀王回、恭王右、靖王著，共五代相继。至文帝时期，被

67 秦封泥　田字格中的文字“左丞相印”、“右丞相印”。此官职沿用至西汉初期。诸侯王国中也同样设置丞相

刘氏王国所取代。吴芮本是秦代的番阳令，人称“番君”，很有民望。曾率领越人起兵，跟随项羽，封衡山王。项羽死后，追随汉王封为长沙王。吴芮对汉王朝的忠诚，在异姓诸侯王中可谓特例。吴芮墓在三世纪三国时期初被盗掘，传说当时发现容貌似生前的尸体，现在已不知其墓何在。长沙王墓现在虽然尚未发掘，但王后墓已经发掘。

1999 年发掘了长沙王子（第二代王吴臣之子）的沅陵侯吴阳的墓，即虎溪山一号汉墓。墓的地点在与秦里耶古城相连的沅水沿岸。武陵郡虽直辖于汉王朝，但是郡内的沅陵侯国却是吴阳的领地。印章上有“吴阳”的姓名，封泥上也有“沅陵”的字样。吴阳死后没有埋在故乡，而是葬于封为列侯的领地。

他的墓中出土了1336 枚竹简，其中有侯国的行政文书。列侯的领地虽不过县级，但也称为国。文书记录了国内乡（村落）的户数、耕地的面积、课税金额、官吏人数以及距首都长安 3219 里等内容。其中的一个聚落有 134 户、521 人。列侯的收入是以算为单位的人头税和田租的耕地税收。并不全都是列侯的收入，还要向中央政府的汉王朝交纳。墓中甚至出土了《美食方》的食谱，其中从各种动物的屠宰方法到蒸煮烹饪，以及佐料的使用，都有着详细的记载。

长沙马王堆汉墓带来的震撼

不过最令人震撼的还是1972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发现的一具汉代初期五十岁左右女性已经尸蜡化的遗体，竟然没有腐烂。皮下组织仍然保留着弹性。地面上是五六米高的坟丘，地下十六米是椁室。椁室周围用木炭和白黏土紧密包裹，致使椁室未遭腐蚀。内部保持着一定的湿度和温度，提供了遗体保存的良好条件。幸运的是盗掘坑没有挖到墓室。而且遗体裹以二十层薄绢，置于四重棺中，浸泡在含有朱砂成分的液体里，看来也有防腐效果。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使遗体得以保存两千一百年以上。身高一米五四，血型A，遗体解剖结果认为，由于胃中发现有瓜子，可知墓主死于夏天。

四重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的四角有四个小屋，密布着1400件以上的随葬品。遗体头部一侧的小屋里放置着侍女、歌舞的木俑和许多光亮如新的漆器，犹如在慰问死者的灵魂。食案上放置着漆制食器，有耳杯、筷子。其他各屋放满了木俑群和装在竹箱笼、麻袋中的食品、衣服、草药等。还有312枚竹简，是称为遣策（策即简）的随葬品清单。

其中有一幅当时人称为非衣（形状似衣实际不是衣，葬仪用幡的意思）的T字形帛画（描绘于绢上的画，参见图100），堪称汉代或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杰作。长205厘米的画中，以墓主生前的地上世界为中心，对比描绘了等待她的地下世界和天上世界。死时魂与魄分离，魂上升去天的世界，魄舍于地上世界的遗体中。力士托举

68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丞相夫人的遗体　二千一百年前下葬的约五十岁女性遗体，竟然未腐烂，皮下组织尚有弹性（《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

着大地，预备有大量的食物和美酒。在天上世界的入口处两名官吏正在恭候。天的中央是人面蛇身的女神，左右是月亮和太阳，在东方扶桑树的一个大太阳下有八个小太阳。

俨然古代的图书馆与美术馆

这里宛如一个储存时间资料的大容器，封存着两千一百年前的西汉时期。包括三号墓在内的资料情报，这里有着迄今三十年来经过不间断的研究、也未能穷尽的庞大资料。简直可以成立一门包括从历史、考古、文学、哲学、神话学、音乐到医学、农学、天文学等综合科目的马王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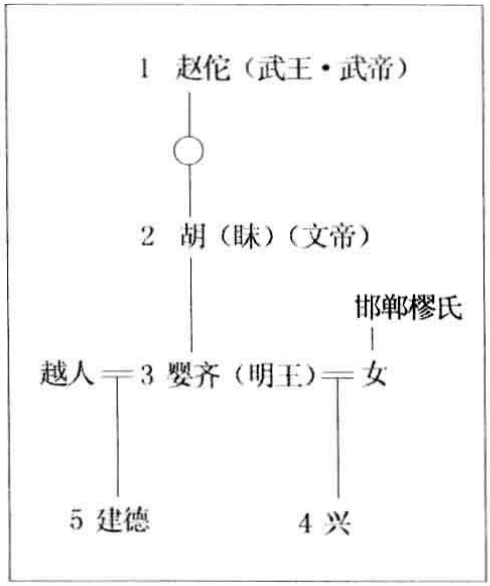
从出土的有绶印章来看，女性墓主叫做“辛追”。同一墓葬中埋葬的一家三人中，遗体保存下来而未遭盗掘的只有一号墓的这位女性。二号墓发现有唐代被盗掘的痕迹。但由于出土了“利苍”玉印和“长沙丞相”、“轪侯之印”两枚铜印，所以即便没有遗体也能判断墓主的身份。根据《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可知，利苍（《汉书》误记为“黎朱苍”）受封于惠帝二年（前 193），为轪侯国七百户列侯，亡于吕后二年（前 186）。与高

祖和吕后的墓是两个方锥形坟丘并排组合不同，利苍与夫人的墓是并排的两个直径二十至二十五米的圆形坟丘。西侧是利苍墓（二号墓），东侧是辛追墓（一号墓），南侧紧靠着的是儿子的三号墓。

从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来看，利苍夫妇的儿子死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从遗址的叠压情况可知，辛追是一家中最后死亡的。实际上这三号墓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资料：文献史料中记载利苍之子利豨世袭轪侯，死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死亡的年份与木牍的记录不同，由于三号墓后来还出土了利豨的印章，墓主应该就是利豨。这里埋藏了如此重要的资料。出土的还有三十种之多的庞大帛书和十二幅帛画。宛如瞬间诞生的古代图书馆和美术馆。

活跃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越国

起兵反抗秦帝国的不仅只有中原。秦在百越之地所置三郡之一南海郡的龙川令赵佗是秦的官吏，他本出身于被秦歼灭的赵国。当中原传来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兵推翻秦的消息时，赵佗在岭南之地建立越国，自立为武王。武王不是谥号，完全是一位勇武君主的生前之号。其领地遍及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相当于今天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虽说武王是中原人，但毫无疑问这是个越人的国家。以后，直至汉武帝时被灭亡，南越国经历了五代共九十三年（前203—前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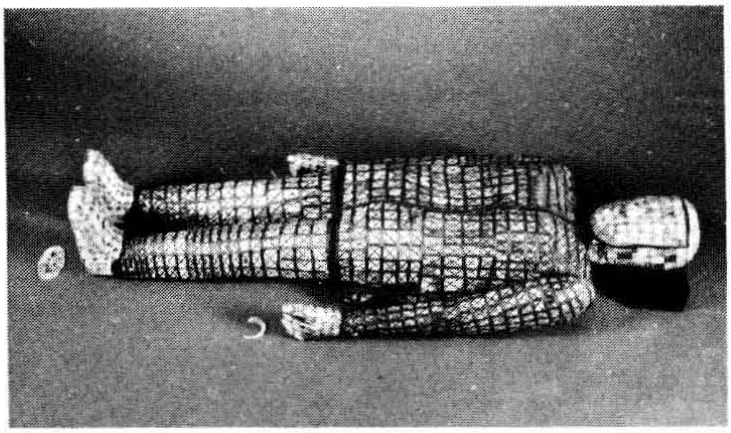


69 南越王国谱系图

高祖曾派遣陆贾承认赵佗为南越王。为的是以此赢得其与长沙国之间国境的安宁。那以后，吕太后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赵佗认为这是长沙国即将攻击南越的策略，因此断绝了与汉的外交关系，并进而由武王升格为南越武帝的称号，比汉更早就称为武帝了。就中国来说，这如同无视汉皇帝（少帝）的权威。南越武帝攻击了长沙国边境上的城镇。吕后派遣将军周灶去平定，经过与酷暑、潮湿、疾病的苦战，不得不以撤退告终。如同丈夫遭匈奴围困一样，吕后也败给了南越。

秦汉与越的文化并存

南越武帝统治逾六十年，在汉武帝统治的第四个年头去世。有四年的时间是两个武帝同时存在。但是，在当时是没有这种认识的。因为南越武帝在汉文帝、景帝时，对外已经放弃帝号了。何况西汉武帝也是个谥号，生前并不称武帝。南越国的首都是番禺，在今天广东省广州市。南越国的威容随着1983年第二代南越文帝赵眛墓葬的发现，得以明了。墓址在市内越秀公园西的象岗的山腰上所建横穴石墓。这种构造在前汉诸侯王墓中是常见的。其文化乃中原与岭南，或曰秦汉与越文化的并存。文帝遗体虽已腐败，但由丝缕玉衣包裹，插着六柄剑，镶嵌大量玉器。穿着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的葬



70 丝缕玉衣　1983 年发现了南越第二代文帝的墓葬。身着丝缕（以红丝线连缀）玉衣的尸体虽已腐烂，陪葬有玉器、剑、玺印（《西汉南越王墓文物特展》）

衣制度。还发现了十九枚印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可能模仿了汉代皇帝的印玺。出土的编钟、石磬等乐器本来也是中原之物。

1995 年，在南越国番禺城内发现了石水池，1997 年又发现了 150 米长的曲水渠。在临近南越官署遗迹之处，还发现了秦的造船场遗址。秦的番禺城与南越番禺城相互重叠。已经探明这就是继承始皇遗产而建国的南越。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夸耀越人文化，并且成为南海贸易的据点。

文帝的时代

由代国王成为汉帝国皇帝

吕太后病逝。吕太后死时赵王吕禄与梁王吕产一面在未央宫守卫少帝，一面各自控制了北军、南军。北军是从属于长安城内北部担任城内警备中尉的军队。南军是从属于守备长安城内西南未央宫殿区周围各门卫尉的军队。中尉、卫尉的军队由两位王统率。吕禄掌握上将军印绶。最高军事统帅太尉周勃进入北军，

对士兵说："跟随吕氏者右袒，跟随刘氏者左袒。""左袒"（即袒露左肩）表示是同伙。此时所有人都袒露了左肩。吕禄已经弃印绶而去。辅佐太尉的朱虚侯刘章发现了逃入未央宫殿内的吕产，将其杀死在郎中府厕所中。其他吕氏族人也相继被杀。

公元前 180 年，在这场混乱之中，大臣们选择代王刘恒做了皇帝。代国在北边，与匈奴邻接，位于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交叉地区。此时二十四岁的高祖之子已经成年，这也是其被选为皇帝的最大理由。代王之母薄姬一族，并没有吕后那样强大的外戚势力也是他被选为皇帝的理由之一。总之，不再重蹈惠帝、吕太后覆辙，是大臣们的决断。汉王朝在高祖之后，高祖的功臣还活着，他们要代表高祖恢复汉王朝。

刘恒走的不是一条由太子即位皇帝的道路，他与母亲去了代国。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做皇帝的。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在渭水的渭桥迎接了代王。渭水流经长安城北，所以在这里架桥。代王要求入长安城内代国邸宅议事。在城内虽不明具体地点，但知建有各诸侯王邸宅，是朝见皇帝时的居住设施。汉的大臣在这里向代王奉上玺印。丞相、太尉以外群臣聚集，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丞相辅佐）张苍、宗正（管理天子亲族）刘郢、典客（接待外交使节）刘揭与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等上书要求代王即位皇帝。太仆（管理天子车马）夏侯婴与刘兴居以天子车马出迎，傍晚迎入未央宫。

文帝即位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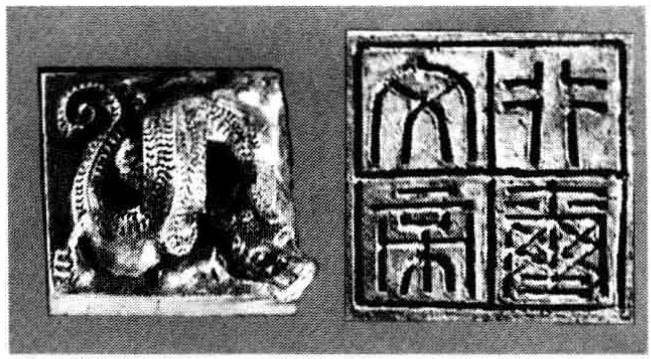
从代国同行而来的代国中尉宋进，被委任为卫将军，统帅南北军。代国郎中令张武就任汉的郎中令。代国在形式上是与汉平行的国。他是以代国之王即位汉国之皇帝的。刘邦是应诸侯请求由汉王走上皇帝殿堂的，刘恒则是受汉大臣之请求，由代王成为皇帝的。高祖刘邦的时代与文帝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未央宫经过近年的发掘，全貌已经清楚（见图 55）。未央宫就是文帝即位舞台。长安城作为汉王朝中枢机构，是东西 2250 米、南北 2050 米，边长大约 2 公里的四方形未央宫宫殿区。在此正方形对角线的几乎中央部位，是未央宫前殿（正殿），主要官署都分散在其西侧。中央官署（三号遗址）、少府（四号遗址）遗址都已发掘。

这一官署的主要官僚就是从这里去渭桥迎接代王，又回到这里的。代王在傍晚落座未央宫前殿，开始下达诏书。吕氏一族威胁刘氏宗庙的危机也就此结束。由于自己的即位，他恩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与酒，允许宴会五日。不仅是与汉地，而且要与天下民众普天同庆自己的即位。

后世评价颇高的文帝仁政

汉王朝的国家制度得到了调整。也由此开始了二十三年的文帝治世。文帝时代有着从元年至十六年的年号，不过在第十六年，即文帝三十八岁那年，有人献上刻有“人主延寿”字样的玉杯，为此翌年改元，



71 文帝行玺 南越文帝墓出土的玺印中有一枚“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西汉南越王墓文物特展》）

又从元年开始直至七年为止。所以前半称“前几年”，后半称“后几年”。居延汉简记有“孝文帝三年”、“前三年十二月”，都是后世的追记。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申”的记录，因为是同时代的文字，所以仅称“十二年”。列侯也是使用汉王朝年号的。

皇帝刘恒谥号“文帝”，被后世作为仁政皇帝予以高度评价。对吕太后时代的评价越低，对文帝的评价就越显得高。与接下来的景帝一同被称为“文景之世”的平稳时代。文景两代合计约四十年。虽比不上刘邦的时代，但文帝实际上也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不愧是一位重视实务的国王型的皇帝。正因为他即位于外戚吕氏一族专权的时代之后不久，而且汉与匈奴、南越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所以极为重视内政。文帝实行了维持王朝发展的农业政策，缩小军备，改革法制。

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的法律。“诽谤”是指毁谤他人，“妖言”是指擅发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现在的损害名誉罪，是指损害个人名誉的犯罪，但在当时法律所维护的是国家、执政者。这不禁使人想到秦始皇时期，认为方士私下诽谤皇帝，盛怒之下以诸生妖言蛊惑黔首罪名，坑杀四百六十人的事件。

文帝为了及时、准确地调动中央、地方军力，制作了铜虎符、

72 秦代阳陵铜虎符　将青铜虎形器纵向剖割，一半在皇帝手中，一半在郡署，双方一致时才能调动地方军力（《华夏之路》）

竹使符。铜虎符即将青铜虎形器纵向剖割，一半在皇帝，一半在郡署，双方一致时才能调动地方军力。竹使符即竹形的契符，也是双方一致时才可以征调地方郡的人力。

废除凄惨肉刑

文帝废止了肉刑。身体刑包括剃髭、断发、鞭打等，其中称为肉刑者，即那些损伤身体致使不可能恢复的刑罚。文帝前元十三年（前 167）的一起事件成了废止肉刑的缘由。齐国名医淳于意，许多人由于没能受到他的诊断而抱怨，并因此直接向皇帝提出了陈诉。审判结果是对淳于意予以肉刑处罚、并收监在长安。从“长安狱丞”封泥可知长安有长安狱。淳于意在赴长安服刑时曾抱怨自己仅有五个女儿，到此时一个也派不上用场。当时幼女缇萦哭啼着与父亲同往长安，并上书表示愿意自己替父服刑。当时，幼女的话感动了文帝：

>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史记·孝文本纪》）

文帝下诏废除了三种肉刑。三种肉刑即黥（刺青）、劓（割

73 汉代金饼　将黄金所制扁平圆形物称为金饼。1999 年在西安市北郊出土了 219 枚金饼，约一斤重 227.6—254.4 克

鼻）、刖（断足）之刑，腐刑（损害性器的宫刑）被保留下来了。根据《具律》可知，黥、劓刑可以用金一斤（一寸见方的体积，约二百五十克，值一万钱），刖、腐刑可以金一斤四两（一斤等于十六两）赎罪。淳于意被判以何种肉刑不明，只知其幼女认为赎金相当于一个女婢的价值。

具体而言，当时实行了哪些肉刑呢？肉刑是与劳动刑一并实施的。“城旦舂”刑是男子筑城、女子舂米的劳役，“鬼薪白粲”刑是为了供奉宗庙而入山伐薪、舂米做饭的劳动，“隶臣妾”是奴婢劳动，“司寇”是从事国境警备。

以肉刑损伤身体，为的是将受刑者公示于社会。当时的罪人并不隔离在牢狱里，而是让其混在一般庶民中劳动。因而，有必要表明受刑者的身份。比如在脸上施黥，断足、割鼻等。例如汉代《贼律》中规定：单方伤害他人者，施黥并罚以城旦舂。又规定奴婢殴打庶人以上身份的人话，脸颊施黥并交还其主人。

根据《具律》，罪当黥刑者，如果已经施行过黥刑的话，就施以劓刑；已经施过劓刑者，就断其左趾；已经断其左趾的，就断其右趾；已经断其右趾的，就施以腐刑。

文帝时期废除了黥、劓、刖之刑，改为剃头发、戴足枷、鞭打之刑。虽然不损伤身体，仅凭剃头发、戴足枷也可对其身份一

目了然。头发、鞭打的外伤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恢复。在景帝阳陵的刑徒墓地曾发现大量戴着手铐脚镣的遗骨。

赐男女爵位与酒宴

文帝即位时一律赐予天下民众每人一级爵位。赐予的不是军爵而是民爵，这种做法开始于秦始皇时期。秦统一的翌年为了庆贺统一曾实行过赐予爵位。秦始皇在统一的前一年，当时已经歼灭了五国，只剩下齐一国，为此曾召开过天下的宴会。文帝此时的赐爵则融合了二者，赐男子爵位，女子按每百户赐予牛和酒，允许召开五天的宴会。将爵位与酒宴相结合了。在西汉的五十四次赐爵中，有二十三次是伴随着这样的酒宴的。

所谓爵本是指青铜器的酒器，有鸟嘴状细长的嘴、鸟尾形的三足和把手。这种温酒（酿造酒）器是依据君主赐予大臣身份制作的。因此，所谓公侯伯子男的周代五等身份，也被称为爵。这种爵位从战国时期开始，可以授予一般庶民了。战争中被驱赶参战的庶民，斩敌兵首一级可以得到一级爵位的褒赏。“首级”指的是首数，计算爵位时也说“一级”。有了爵位就可以得到土地或宅地，所以民众争相谋求爵位。

汉代爵位称为二十等爵制，从第一级的公士开始，依次为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然后是第八级的公乘，接下来是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最后是第二十爵的彻侯。

彻侯之“彻”，在武帝以后，因为回避刘彻名讳，改为列侯。从这些爵位名称，便可知道其起源与军事有关。公士是一般战士，上造是乘上（造，即至）战车之意，簪袅本意来自战马的佩饰。不更是战车右边的身份，大夫是乘于左边的身份，官大夫掌管车马，公大夫统率随从战车的步兵，公乘是乘公车之意。

从秦始皇以来，国家在喜庆之际对男子一律授爵。这不是到处撒钱。那时一代皇帝充其量搞一、二次授爵。但景帝搞了八次，武帝五次，宣帝十三次，元帝八次，成帝六次，多了起来。西汉、东汉前后四百二十年间，共进行过九十次授爵。另外，还实行着军爵等按照个人功绩赐爵的办法。同时，对于编户民只要对国家纳税、服徭役，就一律赐予民爵。

这种民爵是逐级加算的。遇到二次赐爵机会的话，就可以升为第二级的上造，四次受爵则成为不更。民爵的取得与个人努力无关，只是根据某一皇帝在位多少年来提升自己的爵位。授爵的年龄大致到五十六岁为止，而且爵位是可以终身保有，也可以由孩子世袭。女子虽得不到赐爵，但并不意味着她们被排除于爵制以外，无论如何她们是随丈夫爵位的。

已经探明爵制的实际与效果

例如惠帝即位时出生的男子，经过文景帝四十年，他有七次得到赐爵的机会，所以他可以升为第七级的公大夫。由于赐爵年龄的下限在十五至十七岁之间，四十年之后到了五十五岁的年龄。

如果此人是一家的继承人的话，结婚前他有一次获得赐爵的机会，合计起来他可以升到第八级的公乘。一般庶民的爵位，大致限于公乘。直至公乘都称为民爵，与此以上的官爵不同。官吏可以获得相应的官爵。

据认为汉代二十等爵制的前身是秦代二十等爵，究竟本来是不是二十等并不清楚。二年律令的《户律》记有从公士到彻侯的二十等级，所以西汉初年已经存在二十等爵了。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使我们清楚了文帝以前，以及秦至西汉初年爵制的实际状况。睡虎地秦简有《军爵律》，二年律令中有《爵律》这样的记载："将他人爵伪造为自己的爵、以此减免罪责的，或减免（将他人爵伪造为自己的爵）人者，都要黥为城旦舂。"[18]

爵位具有减轻罪责的效果，《具律》是决定律令原则的，依此可知：上造以上的爵位可以为本人和妻子减罪。当然妻子杀伤丈夫时，不可用丈夫的爵位减罪。仅就减罪而言，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

《傅律》规定：爵位的级别越高，免除劳役的年龄越下移，老年授杖的年龄也越低。有着优待老人的意义。虽然老年人与军功无关，但是凡健康的编户民，在有生之年都可以累计爵位。《贼律》规定：爵位低者殴打爵位高者，罚金四两。依此，爵制还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从军爵与民爵两方来考虑爵位制度的话，年龄长幼

与爵位的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功劳者经常可以得到爵位，例如抓到相当于死罪的犯人的话，可以获得爵位。这种授予功劳者的爵位，也是超出年龄序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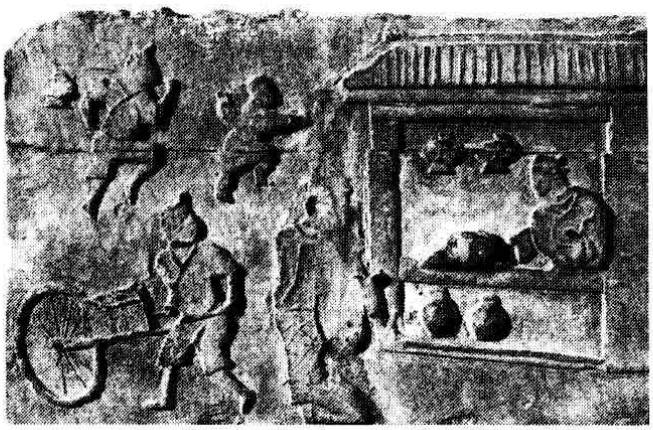
西嶋定生从汉代二十等爵制分析中国古代帝国形成与构造的研究，认为与周代五等爵不同，秦汉爵制的秩序是包括庶民的、维持专制君主皇帝与庶民之间的个别人身统治的制度。他列举西汉、东汉四百二十年间作为国际大事的九十次皇帝赐予民爵的事例，进而分析了与民爵赐予相关的出土史料十四枚居延汉简的，并从魏郡邺县出身的十几人在西汉末的二十年间曾获八次赐爵的具体事例，得出庶民所获民爵的上限止于第八级公乘的结论。

他还从这一事例指出当时爵位的等级一般是根据累计额授予的，而且乡里酒宴是按照爵位等级的不同决定位次的。西嶋的研究方法在于，他将正史文献与偶然残存下来的边地出土史料进行缜密对比之后，发现了中央政策是如何在地方上得以贯彻的实际状况，并由此提出以共同体为中介的、“个别人身支配”的理论体系。

从文帝到景帝

中国古代酒类面面观

2000 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郊外西汉墓中，发现了中国古代酿酒。出土时盛在青铜器中的大约二十六公斤酒，呈淡黄色，残存的酒精



75 四川酒馆画像砖　街上的酒馆与客人。古代中国是用黏黍、糯米酿酒的文化圈

成分为0.1%。不仅可以说是在一定温度下得以保存，应该说在地下墓室中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就中国古代酒的发现而言，酒的酵母菌最早发现于河北省藁城县代西村的商代遗址。作为液体酒，战国中山王墓的两个青铜器中残留的翡翠色液体，原本是将酒盛在叫做“尊”的青铜储酒器中陪葬的，居然没有蒸发而保存了下来，实可谓珍稀。

现在，中国酒既有叫做白酒的蒸馏酒，又有叫做黄酒或老酒的酿造酒。据说白酒是从元代才有的，本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酒。浙江、江苏、山东、山西等地制造的黄酒，在北方用黏黍、黏粟，南方用黏米为原料酿造而成。古代中国就整体来说，属于用谷类酿酒的文化圈。不过，黄酒与长年储存下来的古酒、中国古代的酿酒都不同。现在仍有用粟、稻米造的酒，在陕西、山西等地称为米酒，四川等地称为醪糟（即浊酒），与黄酒是有区别的。制造方法很简单，几天即可制成，通常温一下之后饮用。这些米酒虽说被后代出现的黄酒、白酒掩盖了，但其中残留着中国古代酒的特征。

成书于六世纪的《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种麴和三十一种造酒的方法。当时专用于酿酒用的麴，都是用小麦制

造的饼麴（带有糖化菌种的饼状谷物），散麴（表面带有黄色麴霉的散状谷物）则用来制作酱和醋。使用酒精发酵力强的饼麴酿造的酒度数也高。在汉代麴与糵（散麴）是不分的，都用作酿酒的麴。做法是在蒸过的谷物中撒上麴，加水使其糖化，然后靠自然酵母的力量发酵生成酒精。随着发酵时间的不同，酒的度数有着强弱的不同。“醴”是一夜制成的甜酒，“酤”是一夜酿成的酒，“酎”是三次重复酿造的厚重酒，“醪”是未经过滤的浊酒。另外，稻米酒称为“上尊”，稷酒称为“中尊”，粟酒称为“下尊”。能饮一石（十斗，约十九升）的算是酒量大者。

酒宴与肉食的规定

当时的酒由于酵素还在发酵的原因，很容易发酸变质。每年稻、粟收获之后的旧历八月，天气凉爽了，人们开始酿造新酒。上述文帝即位时正值闰九月。国家宗庙祭祀用的酒，如果发酸变质的话，要追究主管大臣“太常”的责任。汉代民众饮酒是受限制的，法律严格规定“诸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罚金四两”，即禁止三人以上的宴会饮酒。居延汉简所记武帝以后的情况也是“禁沽酒群饮者”。群饮仅在国家喜庆的日子才被允许，而且日期是指定的。五日之内盛大的宴会也是被允许的。上述女子按每百户赐予牛、酒，允许宴会五日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百户”指的是叫做“里”的村落，在这里可以烹饪牛肉、用赐予的酒举办宴会。妻子按照法律是随丈夫爵位的，所以不论男女按爵位序列入席，参加宴会。

76 东汉画像砖上的集市场景

汉代人们食用各种肉类：除牛、猪、羊、鸡之外，还有鹿、犬、狗（仔犬）、鸭、雁、兔、雉、鹤等。汉代的烹饪基本上是蒸、烤、煮、干几种。今天中国烹饪中以铁锅和油进行炒、炸为主的方法，是从宋代铁锅与强火力焦炭普及之后才开始的。

汉墓中经常陪葬灶的明器。画像石上也经常描绘烹饪的场面：将肉吊在钩上保存，锅灶上放着蒸器等。肉的烹饪中有一种叫做“羹”的汤，既有只放肉的羹，也有加入蔬菜的羹。还有只用牛头煮的羹。“脯”是干肉，“炙”是烤肉，“炮”是整烤，“脍”是生肉。调料有盐、酱（以豆、肉、鱼为原料，加入盐、麴、香辣佐料制成）、醋、姜、花椒、豆豉等。所谓五日盛大宴会，大概吃的也是牛羹（肉汤）、牛逢羹（加入蔬菜的汤）、牛炙（烤肉）、牛脍（醋拌肉丝）、牛腊（干肉）等。

不筑坟不损山川

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于未央宫。文帝生前亲自立下不修坟丘、不损霸陵山川的遗言。霸陵，即刘邦当年先项羽一步入关中安营扎寨的霸上（灞水河畔）之地的丘陵。灞水与浐水之间夹着的丘陵叫做白鹿原。在长安城正西架设的灞桥是交通要道。2000年汉代灞桥建筑遗址得到发掘。灞水对岸是骊山，靠近秦始皇陵。文帝是汉高祖的

中子，没有在咸阳原建造陵墓，而且是在吕后和吕氏一族政权崩溃之后来自地方的皇帝，与长陵、吕后陵、安陵（惠帝陵）保持一定距离。陵墓地的选定也是一种政治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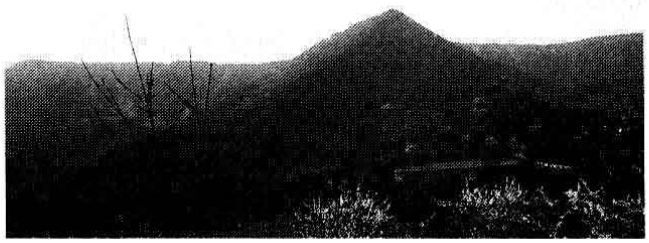
走在白鹿原上也很难找到霸陵。汉代皇帝陵的长陵、安陵是筑有坟丘的，从首都长安城也能望得见。白鹿原上可以见到两个大坟丘，但都不是文帝的陵墓。文帝母亲薄太后在文帝死后两年下葬，吕后当年与长陵并列修造了自己的陵墓，为了与此对等，薄太后也修了个巨大的坟丘。

文帝的窦皇后也在霸陵之南造了坟丘。窦皇后是景帝母亲，景帝死后六年合葬于霸陵。说是合葬，其实是霸陵东南两公里处至今残留的一个东西 137 米、南北 143 米、高 19.5 米的坟丘。薄太后、窦皇后陵墓都是在文帝死后营造的，并不是文帝的意思。

文帝认为厚葬会扰乱庶民的生活。天下万物有生亦有死。死乃天地道理，自然之事。因此，陵墓建设断不可有损于山川。纵深挖掘墓穴，将切断地下水脉，破坏山川地理。所以利用霸陵的自然丘陵斜面，营造了称为崖墓的横穴式墓葬。咸阳原耸立的汉皇帝陵有着许多被盗掘的传说，却没听说过霸陵在过去曾被盗过。霸陵的新式营造方式，也被地方诸侯王墓采用了。

吴楚七国之乱

秦始皇死后七十年的公元前 141 年，西汉第六代皇帝景帝被埋葬在了阳陵。阳陵并非陵园那样的墓葬地，若将其视为陵邑这种都市的话，它的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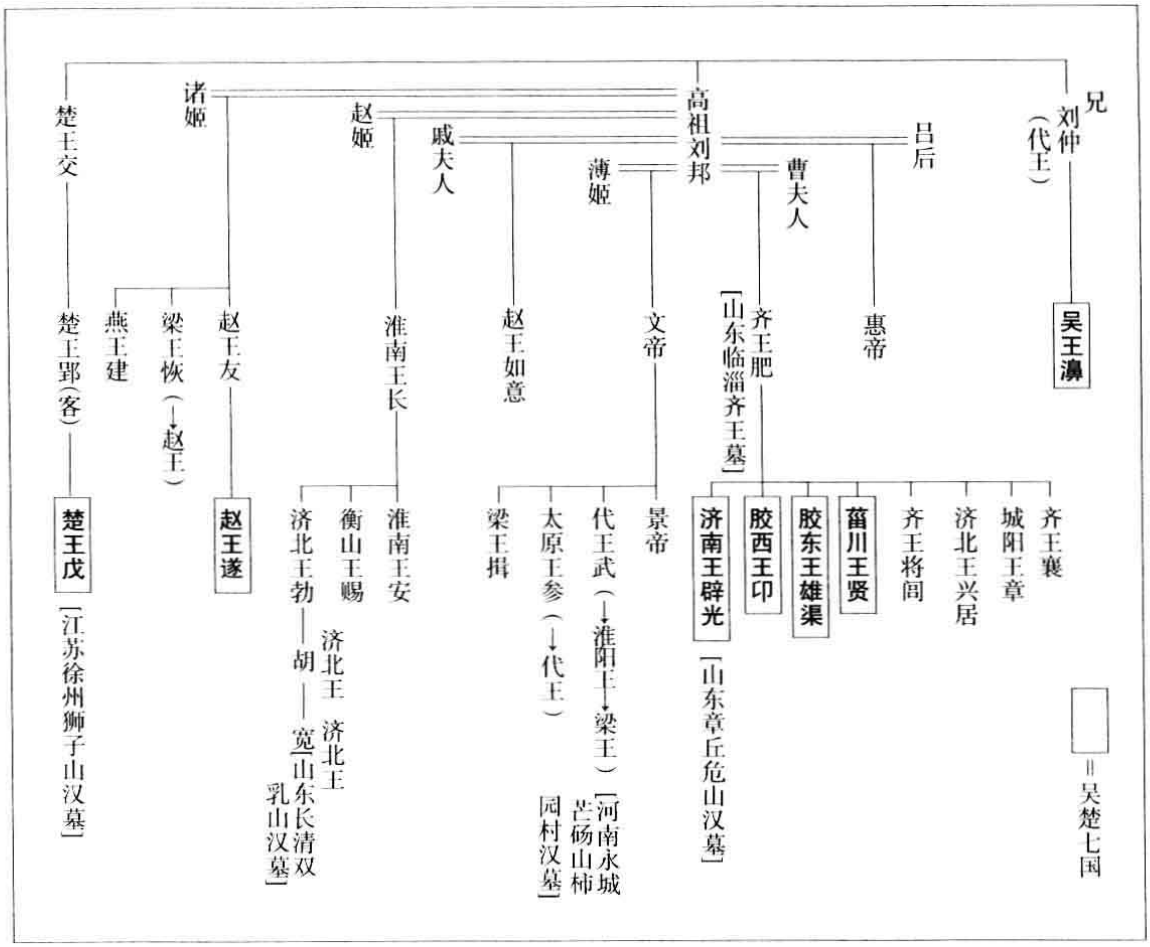


77 霸陵　文帝认为修筑奢侈陵墓有碍人民生活，仅利用自然山丘的斜面筑造了横穴式墓穴

史开始于公元前157年景帝即位之时。西汉十一座皇帝陵之中，现在明确保存全貌的是阳陵。由此可以见到什么是以帝陵为中心的陵园与陵邑复合的古代都市的模样。1999年，继武帝茂陵博物馆之后，在阳陵遗址现场开设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景帝之治十六年的历史，由陵园都市得到了再现。

文帝的中子刘启，由于受到母亲窦皇后宠爱顺利地成为了太子，即帝位。然而，此后很快就发生了长达三个月之久动摇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七个刘氏王国的反乱。可以说这是一场内战，即有名的所谓吴楚七国之乱。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印、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七王，其中除吴王是高祖兄子之外，都与景帝一样，是高祖之孙，互为从兄第。因为胶西、济南、淄川、胶东四王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子，所以如果称其为吴、楚、赵、齐四国之东方诸国之乱的话更容易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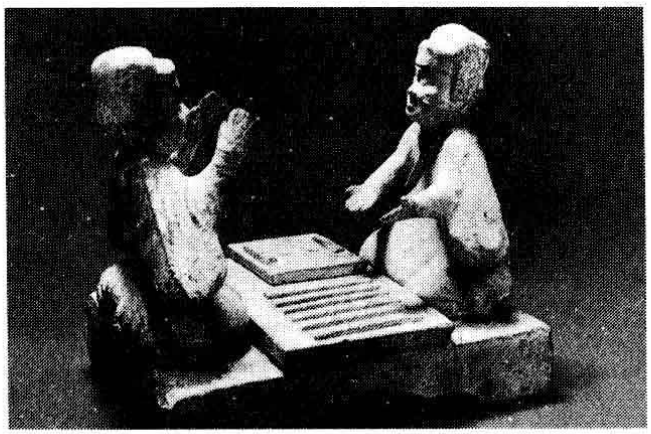
吴国占五十三城（县）、楚四十余城、齐本有七十余城，仅此就有一百六十三城以上，占有全国百分之十以上的领土。虽说已经从秦变为了汉，但是秦与东方六国的对立结构至此仍然存在。反乱军首先向介乎汉与东方诸国之间的梁发起进攻，杀数万人。



78 吴楚七国之乱关系图

吴楚之乱的主导者吴王刘濞自称东帝，看来是模仿了战国时期秦为西帝、齐为东帝的称号。同为刘氏，却使汉帝与吴王形成对峙。就汉一方来看，东南方向是鬼门。虽说吴王对皇帝朝见应当行藩臣之礼，但就现实经济实力而言，他们对汉中央政府并非居劣势。会稽郡、豫章郡等三郡的领土具有江南富庶的资源。尤其是海盐、铜山资源直接促成了吴的繁荣。而且由于召集了来自北方的亡命者，所以也不乏人力资源。铜是货币的铸造材料，吴地当时已在流通不法货币。

吴太子在与汉皇太子（景帝）饮酒对弈六博棋时发生口角，



79 六博俑　二人兴致勃勃地对弈汉代六博游戏

被皇太子以博局（六博盘）投击致死。吴王见到太子遗体被送回，以同为刘氏为何不能葬于长安为由，将遗体送了回去。如此细小的摩擦竟成为日后景帝与吴王冲突的伏笔。吴王由此称病不出席朝见之礼。

梁孝王刘武的奋战

吴王已经六十二岁，在刘氏王国诸王中有着长老资格，不顾年事已高而亲自率军。征发了年龄十四岁至六十二岁之间国内的男子，集合二十余万人。进而，吴王发信给诸侯，不仅限于六王，还向淮南王、衡山王、卢江王、长沙国王子（已在文帝时除国）共计十人发出信件。声称其目的并非要推翻汉王朝，只是要清除削减诸侯王国领地、排除危及汉社稷的贼臣晁错。拥有精兵五十万的吴王，强调可以联合南越三十余万兵力，并结成了对长安的包围网：计划南面从汉中、蜀，正面从临晋关，北面委托胡王入肃关攻破长安。首先迎战吴楚联军的是梁孝王刘武，使乱军不得西进，吴王的战略未得实现。刘武作为景帝的同母弟受到信赖，也很受母亲窦皇后宠爱。梁国也是泰山以西拥有四十余城土地的富庶大国，持有弩、弓、矛等数十万件兵器，财力达百巨万（一亿）钱。梁孝王被允许使用天子旗帜，而且狩猎时可以与天子一样统率千乘

车辆和一万骑兵。

80 章丘危山汉墓兵马俑坑全景

梁国的王墓、王后墓群以及寝殿遗址已经在河南省永城市被发现。横穴式崖墓形制，从墓道经过甬道下到墓室，即以回廊围起的主室。保安山一号墓墓主推定为梁孝王。柿园汉墓推定为孝王王妃墓。陪葬的骑兵俑、女官俑是裸体俑，酷似于其兄弟景帝下葬之阳陵的陪葬俑。梁孝王入朝时可以与兄弟景帝同乘一车去上林苑狩猎，可见关系亲密。

周勃、亚夫父子兵马俑

中央派遣的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的军队也抑制了吴楚军。与吴军以步兵为主体不同，汉军是以骑兵为主体的。就机动性而言，骑兵显然更有利。

周亚夫之父周勃，曾以涓人身份追随高祖，是一位从庶民升为太尉、丞相，步入上层的人物。作为丞相在高祖亡后他为朝廷排除吕氏一族，还策划了文帝即位。其子周亚夫先后供职于文帝、景帝，此时又挽救了汉王朝的危机。高祖临终时遗言："大臣之中周勃可以为太尉捍卫刘氏王朝。"[19] 文帝临终曰："周亚夫为将军可以信赖。"[20] 捍卫汉王朝的二人之墓，据《水经注》记载在长陵附近，现在已经发现了推测为二人的墓葬。

周亚夫最后与景帝的关系有所恶化。周亚夫之子为了给父亲购买殉葬用的物品，从称作"尚方"的制作皇帝御物的国营工场，

81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咸阳博物馆藏） 比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得早，与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杨家湾汉墓形制很小

82 西汉官俑

购入了甲和盾五百套。也许是考虑到用武器陪葬适合将军的身份吧，但由于是购入武器，所以被疑谋反。周亚夫辩解说购入的是“葬器”。汉代的明器一般是模型。用武器的话的确会引起误解。而且廷尉官说，“即便不反于地上，也是要在地下谋反”，追究不休。由此使人联想到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大量石制铠甲，以及兵马俑坑的实用武器。

早于此的有 1965 年在杨家湾汉墓四号墓南出土的兵马俑。在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的九年前，已经发现了汉代兵马俑。说是高祖的陪葬墓，实际是文景时期的墓葬。杨家湾汉墓兵马俑属于周勃、周亚夫列侯一级的陪葬品。骑兵俑 5800 件、步兵俑 1800 件之外还有战车、舞乐俑。合计近 3000 件。与秦始皇兵马俑的不同在于形制很小，而且骑兵俑是骑马的姿势。秦兵马俑的骑兵俑不仅与实物同样大小，而且马与牵马骑兵是分开的。杨

家湾骑兵俑则不同，只是将兵俑的上半身另外组合在马俑的背上，骑兵的下半身是画在马俑身体上的。

阳陵陪葬坑的兵马俑与杨家湾的陪葬品又有所不同。兵士、骑兵俑是裸体而且没有手臂，骑在马上的骑兵的下半身与马体是分开的。而所有这些差异的唯一原因又在于需要给俑穿上绢衣。秦的兵马俑是用黏土做成铠甲、战斗服，再施以彩绘。杨家湾也是同样的做法。阳陵陪葬坑则是每个俑都身着绢衣。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许多实用绢服，也发现很多身着绢衣的木俑。

第五章

武帝的时期 I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武帝与司马迁

武帝生母王夫人与栗姬

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生于景帝元年（前156）。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于景帝中五年（前145）出生于龙门。后来，一位是皇帝，另一位是太史令。当然，并非二人的出生决定了汉的将来。

父亲景帝死后埋葬于阳陵，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皇帝。太子刘彻应当也是参加过阳陵葬礼的。汉王刘邦在动乱时代是凭借自身实力登上皇位的，但是从第二代以后能否当上太子成为继承皇位的条件。为此，首先要具备母亲能得到宠爱、且当上皇后的条件。即使当上了皇后，若被废黜的话，其儿子还是不能成为太子。刘彻并不是一开始就当上太子的。

83 女性骑马俑（阳陵陪葬坑出土）

景帝的薄皇后没有生子。皇后是文帝母亲薄太后家族的女儿。因此，栗姬之子刘荣首先当上了太子。栗姬出于东方齐国栗氏。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嫖曾试图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那将是堂兄妹的近亲结婚，然而由于长公主（皇帝之姐）已经出嫁，所以不存在母方近亲结婚的问题。但是遭到拒绝，栗姬也由此被长公主疏远了。

后皇太子刘荣被废，王夫人成为皇后，其子胶东王刘彻当上皇太子。胶东王国是吴楚七国之乱的一国，位于今天山东省青岛附近，面临东海。胶东王从这里被招至遥远的长安，相反刘荣去长江中游的江陵做了临江王。

王皇后陵的坟丘位于阳陵东北，虽说比阳陵稍小，但又比其他的陪葬墓大一些。坟丘边长 154 米，与皇帝陵同样四周围以正方形的夯筑土墙（边长 347.5 米至 350 米），有四个门。

王皇后陵比吕后陵还大，是皇后陵中最大的。作为武帝母亲的陵墓，是可以理解的。从阳陵顶上向东北望去，有一个六十米四方的小坟丘，据说是没能当上皇后的栗姬墓。似乎传递着一种儿子刘荣被废皇太子之后，无望郁闷而死之栗姬的心情。

输给武帝的临江王刘荣，最后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罪而被迫自杀。他被孤独地埋葬在长安南的蓝田，除了受到当地民众

的同情之外，现在连知道其埋葬地点的人都很少。

由十四个皇子中选出的武帝

王夫人得以入宫，仰仗了她母亲臧儿之力。汉代的女性很强悍。臧儿与王仲生有一男二女，丈夫死后她改嫁田氏，又生二男，即田蚡、田胜兄弟。田蚡在武帝时曾当过丞相。臧儿与王仲生的长女已经嫁给金王孙，但由于占卜说将来此女当富贵，臧儿就让她离婚并把她送入太子（景帝）宫殿。她生有三女一男，其中的男孩就是刘彻。臧儿和长女都有离婚的经历，而且都不在乎改嫁，长女后成为太子夫人，当上皇后。阳陵南区的陪葬坑，位于王皇后陵的正南。从女官俑和女性骑马俑可以想象出当年皇后周围的情景。

就皇帝制而言，刘彻已不必像三代前的曾祖父刘邦那样，需要为当皇帝而进行努力了。在众多夫人中选出一人做皇后，其子为太子继承皇位；或者在众多王子中选拔出太子，由其母做皇后。在五个夫人的十四个皇子中被选中的是刘彻，其他十三人只做到王，刘彻一人从王摇身变为皇帝。《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将五个夫人称为“五宗”，记述了这十三个王的传记。

在同为刘姓皇帝之子的情况下，同母兄弟之间有着所谓“宗亲”的同族意识，异母兄弟则是相互争夺帝位的敌人。对于刘氏同姓诸侯王也是这样，不能仅从父系而应该从母系的角度去认识。王氏的武帝就是这样战胜栗氏刘荣的。追溯历史来看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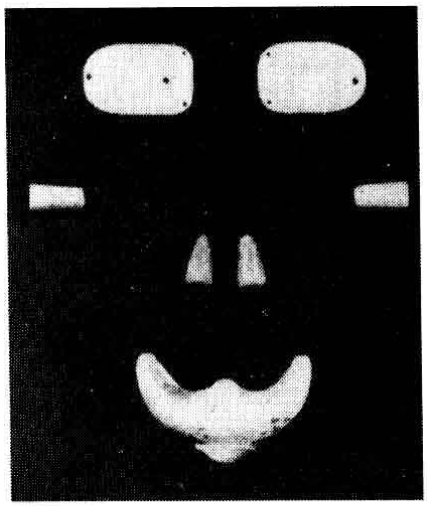
秦王政也是，他父亲庄襄王在二十多个兄弟中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极低，要不是吕不韦的策划，就不可能有日后的秦始皇。

不仅限于乱世，在治世也同样如此，可以说一个皇帝诞生的背后自有某种竞争机制在起作用。吴楚七国诸王的情况亦不例外，细看刘氏内部关系，吴王濞与楚王戊因为与高祖是兄弟关系虽然可以另当别论，然而赵王遂是被吕后所杀赵王友（父亲是刘邦，母亲不知为何人）的儿子，胶西王印、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四王的父亲是齐王刘肥，而刘肥的母亲是刘邦当上皇帝之前的“外妇”（妾）曹氏。吕后之子惠帝死后，薄氏之子文帝（父亲刘邦）和窦氏之子景帝、梁孝王刘武（父亲都是文帝）等虽然维系着汉的刘氏，但是就父系刘氏同族之间的信赖感而言却很淡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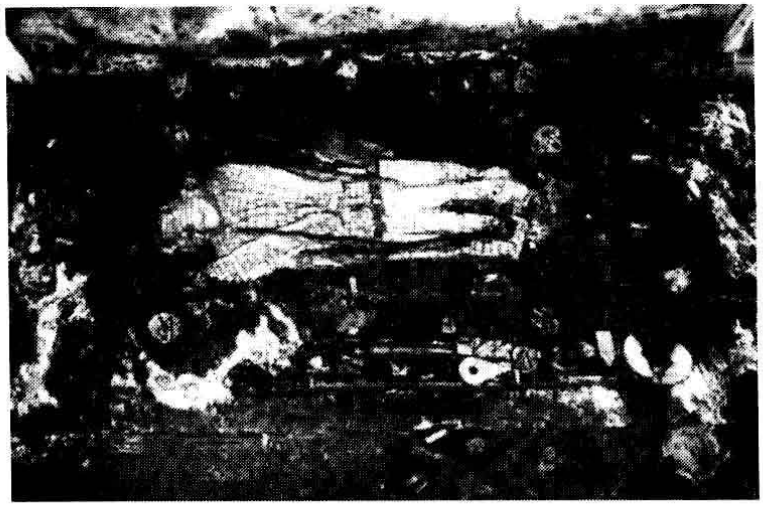
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

以玉衣裹尸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前154—前113年在位），如果其母贾氏被立为皇后的话，也许有机会继承景帝皇位。他是与武帝异母的十三兄弟之一。与同母兄赵王彭祖专心于政治不同，他每日沉湎于酒色、音乐，据说在王宫中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与妻子窦绾的陵墓，于1968年被发现。因为墓葬在河北满城县，所以被命名为满城汉墓。

1971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了“文革”期间出土文物两千余件，其中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尤其引人注目。由金丝2498



84 玉七穴塞 （满城汉墓 1 号坑出土） 遗体裹以玉衣之前，为了防止体内灵魂逃逸，眼耳口鼻七穴以玉塞堵（《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85 金缕玉衣 满城汉墓 1 号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其他随葬品的状况。周围排列着玉器。玉衣中的遗体已经腐朽（《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根（夫人窦绾 2160 根）缀合玉片制成的玉衣包裹着遗体，但是遗体还是腐朽无存了。为了防止体内灵魂逃逸，眼、耳、口、鼻、生殖器、肛门等九窍（身体之九穴）以玉塞堵，然后合体地穿上玉衣。金丝纯度为 96%、直径在 0.5 毫米以下，使用黄金 1100 克。由头部、上衣、下衣、手套、鞋等各部位组合而成。为了让玉能够覆盖全身，由细小玉片组合而成，仅手套的右手就有玉片 112 片、左手有 113 片，可见玉片之细小。与丝绸相比，人们更相信玉的力量。

中山靖王与代王、长沙王、济川王入朝长安时，在宴会上听着音乐突然流下泪来。武帝问其缘由，答曰：“中央派来的官吏监视太严厉。”虽说是诸侯王国，其上级官吏也是由中央派遣的。武帝死时应该也是穿这种玉衣的。据说武帝裹尸用的是绘有蛟龙的

金缕玉衣。《后汉书·礼仪志》载：从皇帝金缕玉衣开始，其下是诸侯王、列侯、公主等的银缕玉衣，还有长公主的铜缕玉衣各种等级。后来，又发现了汉代各地诸侯王、列侯的玉衣，包括残片。

长安工房中生产的东园秘器（葬仪用品）中就有玉衣，在汉代称为“玉匣”，是作为下葬仪式的赠品的。以此裹尸可以防止尸体腐烂。如前所述，吕后陵墓在赤眉之乱时被盗掘，当时已经埋葬了二百年的尸体还栩栩如生。

三国魏的曹丕在公元 221 年禁止了这种玉匣的使用，玉衣的时代就此终结。

武帝在位年号

武帝时期开始使用年号。前面已经谈到，在武帝之前的君主，从即位开始虽记年数，但没有年号。从武帝开始使用年号，而且一代之中使用了很多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共计十一个年号，令人眼花缭乱。从建元到元封，每六年改元一次（三十六年间）；从太初到征和，每四年改元一次（十六年间）；最后的后元年仅两年而终。各年号加起来总共为五十四年，比武帝在位年数少一年。

出土宝鼎那一年定年号为“元鼎”，据说此前的“建元”、“元光”、“元狩”等年号都是追加的，但也有意见认为由于出土了记有“建元”年号的青铜器，所以是从“建元”开始有了年号（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改元的契机有如：泰山封

禅那年改为“元封”，改订历法那年改为“太初”，因旱灾对天祈雨那年改为“天汉”，征讨夷狄取得天下和平时改为“征和”。

年号虽然繁琐，但对于处理史料来说，根据年号很容易换算为西历。史料中像“今何年”一类的记载，如果改朝换代的话，就无从知道是哪代皇帝的纪年。但是像出土资料中“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的记录，很容易可以断定是西汉宣帝的年号，即公元前 62 年。不过，像“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的记录，就得先将七月一日（朔）是“辛卯”日的年份从历谱中查出来，才能判断是高祖十年（前 197）的“十年”。从武帝开始的古代一世使用多个元号的制度，直至十四世纪的明代才最终为一世一元的制度所取代。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司马谈在汉武帝一朝的前半期，直至元封元年（前 110）任职太史令。任职约三十年之久，是其子司马迁任太史令九年所无法相比的。《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编纂的，而且不妨说司马谈的作用更大些。“太史”，是汉王朝执掌宗庙、礼仪之官太常的下属史官；“令”，即长官，俸禄为六百石，相当于地方上县级长官的级别。

《张家山汉简》中有叫做《史律》的法律条文。其中记载了成为史（记录）、卜（占卜）、祝（祝词）等官吏的资格条件。太常之下的太史、太卜、太祝是并列的，可见记录、占卜、祈祷三者

关系紧密。“史”须能够读写五千字和八种字体（东汉的《说文解字》举出秦“八体”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中或许包括了先秦的文字）。“卜”必须能够读写三千字的隶书和三千字的占卜书体，并且要求有九分之七以上的占卜准确率。“祝”须考试验证是否具备掌握七千字以上文例的能力。太史、太卜、太祝就是掌管其官职的负责人。各部长官称“令”，如太史令。

“太常”是中央最高机关九卿之一。“宗庙”是祭祀刘氏汉王朝历代皇帝亡灵的建筑物，其中供奉着牌位。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皇帝的遗体安葬在长陵、安陵、霸陵、阳陵的地下。同时，祭祀他们亡灵的庙多设置在长安城内，不过景帝庙是置于陵墓近旁的。其庙称为德阳宫，位于陵墓南面稍偏东的位置，距陵墓不过四百米。现在那里还残留有罗经石（“罗经”即罗盘，刻有指示方位的十字）。

陵园内的寝殿须每日奉食四次，庙中每年有二十五次祭祀。宗庙祭祀时有音乐、有祝词，还要奉献作为牺牲的动物，也进行占卜。这些都是太常所属太乐、太祝、太宰、太卜的工作。演奏、祝词、奉献牺牲、进行占卜都是宗庙不可或缺的。太史的职务也与上述各执掌并列，负责记录宗庙祭祀。太医看起来好像与此无关，其实中国古代医学与巫是合为一体的。他们在皇帝临终时负责宣告死亡，最后葬于陵墓。

陵邑亦属太常管辖，博士也设置于太常之下。宗庙礼仪需要

博士的学问。司马谈也是因为这种工作关系，带着司马迁移居茂陵邑的。

司马谈的忧愤而终

司马谈在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也就是秦始皇以来首次封禅泰山的祭祀时，被留在洛阳没能前往泰山。本来太史一职只是负责长安周围宗庙祭祀的。然而，如今是在远离首都的泰山祭祀天地，此乃汉朝以来史无前例的，司马谈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是，俸禄仅仅六百石的太史心有余而力不足。《太史公自序》曰："司马谈发愤且卒"，表现出其懊悔之深。临终前司马谈唤司马迁前来，执其手而洒泪。

司马谈很为自己祖先代代做周朝史官感到自豪，也为那以后不再做史官感到遗憾。至战国时期其祖先甚至成为武官，其中司马错在秦惠王时曾作为将军灭亡蜀国。司马靳与将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四十万。还有当官吏的，如司马昌是秦始皇时管理制铁的官。司马无泽在汉时任长安城市场的负责人。司马谈之父司马喜被封五大夫爵位，虽不知其任何职，但在未央宫殿区内的中央官厅遗址，出土了"司马喜章"（司马喜印章）的文字封泥。如果此人就是司马谈之父司马喜，那么可以推测他曾是长安的官吏。司马谈不希望自己儿子去做行政官吏，而是希望他能继承自己掌管祭祀的太史之职。

行政官职任期为一年，但祭祀之职则不然。对于汉代历代

86 司马喜的封泥（汉长安城未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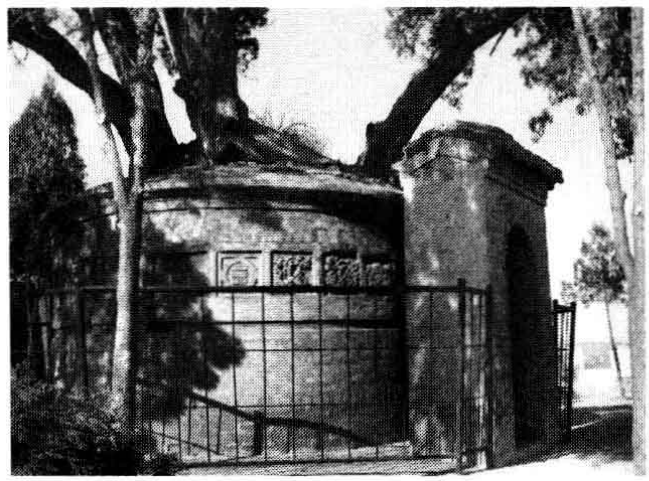
皇帝来说，仅仅以宗庙祭祀是不够的，从“五帝”至夏、商、周、秦与历代王朝的祭祀都要实行，这对体现汉王朝的正统性是十分必要的。武帝的泰山封禅所继承的就是一千年的皇统。在太史来说，是以一千年、一百年为时间单位进行思考的。

司马谈曾对儿子叹息道：“自周之王道、礼乐废弃，孔子《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此后近四百年诸侯纷争，史官的记录未能得以整理。捕获麒麟乃不祥之兆。如今海内（天下）统一的时代，趁各种记录尚未遗失，希望你也当上太史，完成我的遗愿。”[21] 司马迁俯首流泪发誓继承父业。

司马迁的生卒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东向可以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

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此处下层是12公里的



87 司马迁墓　陕西省韩城市有司马迁祠和墓，实际上他并未安葬于此

黄河，河宽不过 50 米，很是狭窄。由于有激流，即便是大鱼也很难越过这里，是传说中越过去就可以化为龙的地方。冬天，人们可以从冰面上穿过这条河，此处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河东是山西省，河西是陕西省。传说夏代禹王曾在这儿修整黄河，故有“禹门”之称。司马迁在十岁赴西安之前，一直居住于此。

司马迁准确的生卒年份不明。《史记》记述了那么多人物的传记，而且在最后一卷即第一百三十卷还写有自传《太史公自序》，却没有写上自己的生卒年份。自传中的线索有两条：一是“父（司马谈）卒三岁而迁（自身）为太史令”，一是“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由于司马谈亡于公元前 110 年，所以第三年的元封三年（前 108）他当上太史令，此后第五年应该是太初元年（前 104）。

仅凭此史料虽然无法知道他的年龄，但唐代的《史记》注释者见到了有趣的相关史料：一是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用的《博物志》（晋人张华著）中有“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的记载，是司马迁出任太史令的就职令，是一条今本《博物志》所不见的珍贵史料。由此可以推定他出生于由元封三年上溯二十八年的公元前 135 年。

另一条史料是比司马贞稍晚的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对

“太初元年”所加的注释中说：“迁四十二岁。”由此，可推出司马迁出生于前 145 年。二者之间相差十年。按照后一种说法，他当上太史令时三十八岁。按公元前 145 年观点的话，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一岁，按公元前 135 年观点的话，则小二十一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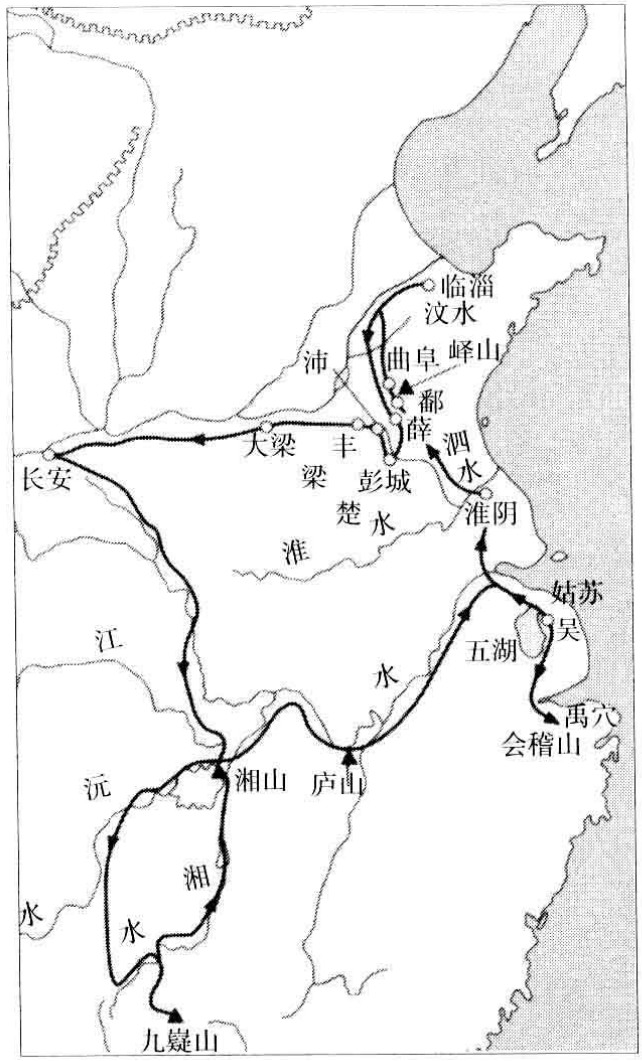
二十岁时开阔眼界的旅行

司马迁与汉武帝二人最初见面，严格地说是司马迁第一次意识到武帝在自己面前，是父亲司马谈出任太史令、移居西安之时。武帝即位是在景帝后三年（前 141）、即他十六岁的时候，按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 145 年的观点，司马迁此时比汉武帝小十一岁，应该是五岁，所以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当在此之后。建元二年（前 139）设置茂陵陵邑，太史公司马谈父子移居此地。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古文是相对汉代隶书这种今文而言的先秦文字，即因秦始皇焚书令而消失的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也就是现在我们在战国时期楚墓、中山王陵见到的出土文字。

武帝时期的古文不是出土文字，而是秦下焚书令时隐藏于民间、当时又陆续发现的书籍。武帝异母兄弟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得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鲁国、河间国都曾经是被秦灭亡的东方之地。下达焚书令时，东方那些用齐国、燕、赵等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尚书》《诗经》被没收了。

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分为甲乙两种版本。据说甲种稍早一些，相当于高祖至吕后时期，乙种

乃文帝时期的各种抄写本。因为都是汉代的隶书，所以都是今文。1993年在郭店楚墓发现的竹简《老子》有甲乙丙三种，是用战国时期楚文字写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即便作为汉代人，学习古文也是有必要的。



88 司马迁旅行路线

司马迁不可能一下就当上太史令。他首先必须成为“史”（史官）。根据上述《史律》的要求，只有能够读写包括隶书在内的八书体，才有资格成为“史”。“八书”就是秦的各种文字，因为其中有秦大篆，所以“史”的资格考试要求具备阅读古文文献的能力。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为的是继承父职，成为史官。按照《史律》规定：史和卜等职官之子十七岁开始学习文字，称为“学童”（学生）。学习三年之后的当年八月，可以在太史、太卜、太祝那里接受考试。要成为地方郡的“史”的话，学童须在太守那里接受考试。

司马迁到武帝身边工作之前，曾于二十岁时游历了全国。因为没有那时他已经做官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那是一次自由之

旅、伤感之旅。但是，从《史律》来看，至少当时他已经具有了“史”的身份。不过，因为还没有成为太史，所以还只是作为“史”的一次扩展见闻的游历。看来此次游历相当程度上有着已经身为太史令的父亲的意志在起作用。而且，由于已经学了《尚书》和《春秋》，所以他有着去看看夏、商、周、春秋历史舞台的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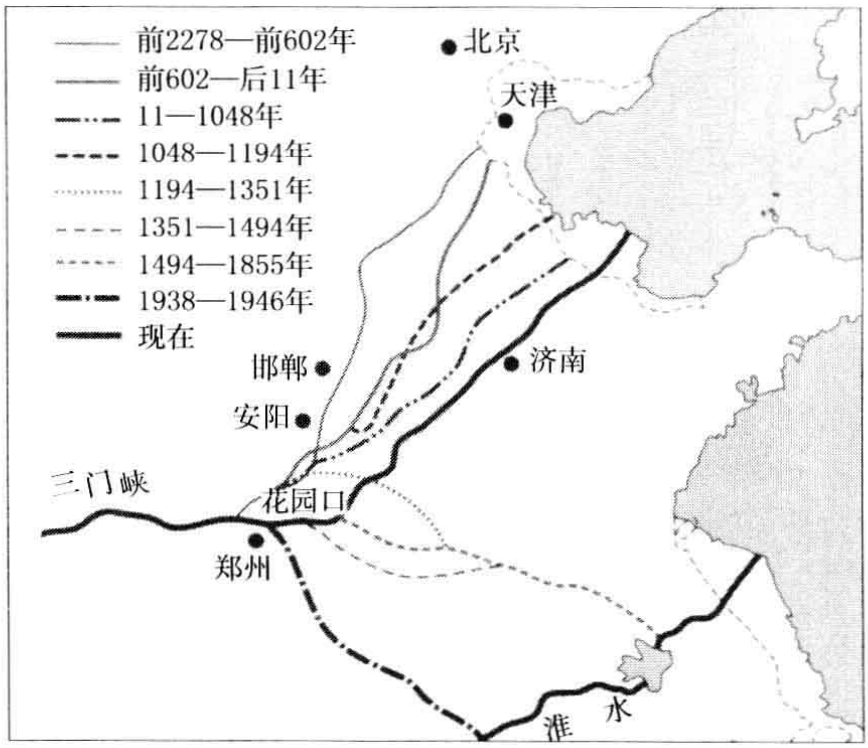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先至长江、溯湘水去九疑山踏访了舜庙。之后，又顺长江直下去会稽山探访了禹陵。然后，访问齐旧都临淄和鲁的曲阜，感受孔子遗风。经梁、楚之地回到长安。司马迁的游历路线与秦始皇第二次、第五次巡行路线是重叠的，不禁使人联想到秦始皇的出巡。

司马迁回到首都，由史升为郎中。“郎中”，本意是通晓文字、侍奉于天子宫中廊下任警护的官职，在武帝身边任职。西汉时期的高级官僚首先从郎做起。郎中司马迁从此对武帝这一皇帝开始了分外细致的观察。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

元光三年黄河溃决

河水（黄河）全长 9400 里，江水（长江）仅 2660 里。汉代人认为河水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因为他们不像今天我们这样了解长江的源头。现在的黄河全长为 5464 公里。长江是 6300 公里，乃中国第一大河流。



89 黄河下游变动图

秦汉时期，黄河称“河”或“河水”。唐代开始被称为“黄河”，宋代以降成为定名。在此权且以后起名“黄河”来叙述“河水”。黄河在文帝时曾一度在酸枣决坏，又在金堤决口，但很快被堵上，没有遭受大的灾害。当时的黄河与今天的河道不同。今天的黄河并不流经汉代经常决口的地方。现在黄河河道，本是一条叫做济水的另一条河流。“河、江、淮、济”即黄河、长江、淮水（3240 里）、济水（1840 里）四大河流，又称“四渎”。其中最长的是黄河。

汉代的黄河，准确地说是从公元前 602 年至公元 11 年之间的黄河，流淌于今天的黄河以北，河口在天津附近。流经黄土高原裹挟以大量泥沙的黄河反复肆虐。上游持续降雨的话，就会急剧涨水，从而造成下游地上河的堤防不堪重负。在海拔一百米

以下的东方大平原，一旦决口，黄河就不断地改道。

这一黄河在武帝曾经决口。元光三年（前 132）五月，濮阳的瓠子一带堤防决口。“瓠”即瓢，因河道在此弯曲而得此地名。涨水时，这里的堤坝受到激流的强大压力。河水注入了巨野泽，湖水又溢出，进而涌入淮水、泗水，使“四渎”之三条河流相互连通。水害受灾区扩展至十六个郡。武帝急忙派遣汲黯、郑当时，动员了十万人企图修复决口，但为时已晚。

武帝由于异父兄弟丞相田蚡的观点而产生了犹豫。武侯田蚡作为列侯，他的封邑在当时黄河决口之处的下游北岸，因为决口的黄水从南面流过，所以没有受灾。田蚡说，江水、河水决口乃属天意，以人力勉强阻塞的话是逆天。[22] 在他这种怪异理由的影响下，武帝在位的二十余年、准确地说是二十三年之间，对决堤之事置之不理。这期间，黄河下游南岸的梁、楚之地，饱受水患之苦。虽然并非年年有洪水，但干旱、洪水轮番肆虐，造成谷物绝收。

可以说二十三年之间，对武帝来说，他认为治水是没有必要的。由于张骞西域远征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所以每年都要派遣卫青、霍去病的军队与匈奴作战。治水和战争都需要人力。这样的时候受灾地就成为牺牲品，对匈奴的战争被放在了优先地位。

司马迁在二十岁旅行的归途中，曾经踏访过梁地受灾地区。第二次是作为郎中与武帝同行的。武帝在对匈奴战争告一段落之后的元鼎四年（前 113）开始出巡。这也是有意效法秦始皇的

行动。元封元年（前 110），举行了泰山封禅。翌年发生旱灾。武帝派汲仁、郭昌动员数万人修复了决口的瓠子。武帝自己在从山东半岛的万里沙祭祀归来的途中，第一次亲眼见到决口现场的情况。武帝在此停留了二日，沉白马、玉璧于黄河，让同行的群臣自将军以下，都亲自负薪填堵决口。当时武帝曾赋诗二篇。

武帝求河神保佑诗二篇

司马迁在此前一年失去了父亲司马谈。深感父亲懊悔的司马迁，记录下了武帝的瓠子诗，后来又据此编纂了《史记》八书之一的《河渠书》。司马迁也曾在现场亲身负薪。“薪”本是各种树枝，此时与土一起被用来堵漏，或被编成筐用来盛石、土。对于二十三年间不治黄河决口的批判，蕴藏在司马迁所撰《河渠书》的论赞之中：“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其中“悲瓠子之诗”的“悲”字，表达了司马迁强烈的感情。作为史官在记述事实的同时，还能够以一字评价事件，这是学自《春秋》的笔法。

“瓠子之诗”特意做了两篇。项羽曾咏于垓下，刘邦在故乡吟咏。皇帝如此公然吐露肺腑之言是罕见的。听众是那些一道同行的臣下。第一篇感叹洪水骇人的样子，说由于封禅外出才首次闻知事态，为自己辩解并请求河伯（黄河河神）的解救：“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

意思是说：“瓠子决口如何是好，溢水泛滥白光灿灿，村落淹没于河中。”

90 1933 年黄河决口时的河南滑县

瓠子之诗就是这样开头的。黄河洪水的威力的确令人难以想象。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省长垣县（今濮阳西南 70 公里）黄河决口时的照片，古代洪水的样子也浮现在了眼前。照片中堤防决口，黄河正在向东岸这边溢出。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说：修复工程必须进行，我们不得已将山土削平。巨野泽亦泛滥，只有鱼儿在跳跃。五月开始的洪水，一直延续至初冬。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意思是说：“溢水涌出河床流淌，形态似蛟龙（蛟，即水之灵，引发洪水之龙）蜿蜒远去。回到原来的河床去吧，若非由于封禅之仪，是难得知外面的形势。”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意思是说：“河神因何如此不停止泛滥，执意使我等痛苦？水漫啮桑街，淮水、泗水亦满溢，已经长久不复返，水流缓缓慢慢。”

第二篇很短。讲薪荆不足，责任在于当地卫人焚烧了树木，只好砍竹林之竹，制作笼筐作土囊阻塞缺口，辩解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91 宣房宫　据说这就是堤防上所建祈祷治水的宣房宫遗址

“宣房塞兮万福来。”这是最后一句，意思是在堤防之上造宣房宫以求安宁。司马迁将此诗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传达了武帝的心情。我们虽说不知武帝何等相貌，却能从这些记载中读出古代帝王的心情。

2004 年笔者曾站在宣房宫旧址的高台上，眺望西汉时期的黄河古河道。在绵延黄河留下的黄土大地上，仅存这一抔渺小的土丘。这曾是宫殿的基础，当地人说这就是宣房宫的遗址。近旁的发掘现场出土了木材，地下是黄土高原常见的黄色粉状土壤，这是黄河河床的遗址。

李陵之祸降临

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三年之后，成为太史令。“史”的官职虽说是世袭的，但太史令并未世袭化。升职应该是对他作为郎中任职评价的结果。然而，自认为作为太史令也很顺利的司马迁在天汉三年（前 98）因李陵之祸被逮捕入狱。《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虽然文中使用了第三人称的“太史公”，其实是作为史官在叙述自身罹祸的笔法。“缧绁”指的是捆绑犯人的黑色绳索。因

92 李广骑射图壁画砖（敦煌市博物馆藏） 敦煌市西晋墓壁画（《中国文物精粹》1997 年）

卷入李陵事件而遭受宫刑，不亚于父亲不得参与泰山封禅愤愤而死的灾祸。

李陵出身于陇西郡成纪县（六盘山以西，天水以北），乃秦代抓捕太子丹之李信将军的子孙，李氏一族虽经过秦汉之间的改朝换代，仍作为武将延续发展。祖父李广是文、景、武三代守卫北部边境的名将，广为人知。匈奴人很害怕他的战略，士兵都愿意追随他。李广在景帝时曾以百骑遭遇匈奴千骑人，匈奴认为是小股部队的诱饵，予以警惕。骑兵急于逃跑时，李广做出英明判断："如果逃的话尚未回到本队，必已全军覆灭。留下来让敌人觉得我们是诱饵。"于是李广面对匈奴阵营，下马解鞍，示以信心十足、果敢进攻之状。匈奴军一方反而认为是伏兵，唯恐中计而撤退。

司马迁在《李广列传》中因李氏的"李"字，使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句成语。意思在于表明：桃、李虽不会说话，但人们都来观赏其花朵，树下自然就形成了小路。其孙李陵身上也有着李广的影子。

在 1990 年出土的甘肃省敦煌市西晋墓墓室的壁画砖上，绘有李陵祖父李广形象的彩绘。画砖上画的是西汉名将军李广骑马向后方张弓射箭的姿势。李广在年过六十之前，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战果累累，人很高，有着猿一样的长臂，擅长骑射。

李陵之降匈奴

李陵受到武帝的高度信任，年轻时就任监督骑兵的职务。曾率八百骑兵深入匈奴领地两千余里，侦查了沙漠环抱的地形之后，由居延要塞安全返回。“居延”是对匈战线的最前沿基地，出自祁连山北流至沙漠的额济纳河就注入居延泽。额济纳河是现在蒙语地名，当时的汉语名叫弱水。300 公里长的大河滋润着沙漠。汉代的弱水，本是长达 2100 里的羌谷水，以发源于羌人领地的祁连山而得名。这里被认为是与匈奴作战的理想战场。武帝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在居延城筑起叫做“遮虏障”的要塞，并在张掖郡以北的居延县、酒泉郡以北的休屠县屯驻了十八万军队。

李陵就任骑督尉，这次他率领了来自长江流域不熟悉骑术的五千士兵，这些丹阳郡、淮北楚国出身的士兵，曾在酒泉、张掖郡驻屯并接受训练。天汉二年（前 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在祁连山攻击匈奴右贤王。匈奴单于在蒙古高原中央设置据点，称东西方为左右，分三部统治。尤其重视西方，以单于太子为右贤王。

李陵的任务是对抗八万匈奴，保护李广利的本部队伍。他盲动地率领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纵深挺进草原千余里，目的在于阻断匈奴的军队。杀伤匈奴一万余人之后，武器用尽，人员减半。

八日之间且退且战，在距居延百余里的地方，道路断绝、粮食殆尽、援兵未至，李陵最终投降匈奴。据说此时李陵说“无

颜面对陛下”。生还的士兵只有四百余人，李陵则受到匈奴的优厚待遇，并娶匈奴女为妻。汉得知此事，将李陵母亲、妻子处以死刑。名门李氏名声扫地。

宫刑之屈辱

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进行了辩护。司马迁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史官司马迁在个人书信中有着直率的真情吐露。这篇长文不见于《史记》，但被收入《汉书·司马迁传》。《文选》也将其作为《报任少卿书一首》予以收录。这是司马迁死后问世的，作为汉代书信的实例故而非常珍贵。信中用任安的字，称其为“少卿足下”，而以“仆”自称。信中称武帝为“上”。

>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是如此超脱利害关系地为李陵辩护的，却被判罪：

>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以欺君之罪受到腐刑(宫刑)。但这不是实刑，仅是赎刑。缴纳与刑罚相当的黄金即可免除肉刑。汉代具律(总则)

规定：腐刑的赎罪金额为金一斤四两（一万二千五百钱）。但是，如后面将要提到的，这虽说仅相当司马迁两个月的工资，但即便如此他也难以筹措，“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汉书·司马迁传》中收录了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感慨道：

> 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蚕室”是指养蚕的密闭暗室，此处比喻宫刑的行刑室。司马迁在不通风、不透光的密室，忍受了切除生殖器的屈辱。

这一事件曾造成他编纂黄帝至武帝记录工作的暂时中断。司马迁在四十八岁遭受腐刑，也因此得到了处理宫中文书、诏敕的中书令一职。这使他比起做太史令时期，更有机会深入到武帝的生活空间。总之，所谓太史公书最终是作为中书令时完成的。

追求神仙世界的古代帝王

尊重秦始皇的汉武帝

武帝也像秦始皇那样崇拜神仙。武帝从做胶东王时期开始，就与东方结缘。武帝专注于祭天、求神。作为天中心的天帝被称为“泰一”。仰望

天空，天是以北极星为中心而旋转的。这个中心里有天极星，天极星里有泰一。泰一乃所有秩序的源泉。祭祀泰一要尽可能地登上接近天的地方。泰山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扶助泰一的有上天五帝。五帝以颜色区分为白帝、青帝、赤帝、黄帝、黑帝，秦代在秦旧都雍城祭祀五帝。五年一次去泰山祭祀，三年一次在雍城祭祀五帝。首都长安近郊也搞过泰一祭祀。

循环不已的天时是永恒的。认为生命来自于天地的人，自然想要益寿延年，接近天的时间。当时一方面相信有一种死后升天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人，同时又希望尽可能地延长现实中的生命。方士相信地上的那一边存在着这种人，称之为“僊人”。“僊人”即升天之人，也写为“仙人”。方士相信在东海上浮着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那里住着安期生、羡门等仙人。

武帝身边与当年秦始皇一样，也围着各色方士。李少君善于食物疗法，所以强调祭灶。吹嘘由丹砂制成的黄金食器有着长生的效果。在茂陵附近曾经出土过贴金箔的漆器耳杯。少翁据说曾将武帝的王夫人灵魂招回。栾大出东海去寻求仙人。申公告之若登泰山封禅，可以作为仙人升天。丁公说秦始皇登泰山时，由于风雨的阻挡而未能举行封禅。武帝不仅重视秦始皇，还相信黄帝的传说，希望模仿黄帝。传说黄帝在泰山举行封禅，用首山之铜铸鼎，于明廷与神灵相会，百余岁乘龙升天。还与诸侯一起讨伐了发动反乱的蚩尤。武帝希求接近黄帝，相信黄帝拥有万能之力。

《黄帝内经》（医学）、《黄帝五家历》（历法）、《黄帝杂子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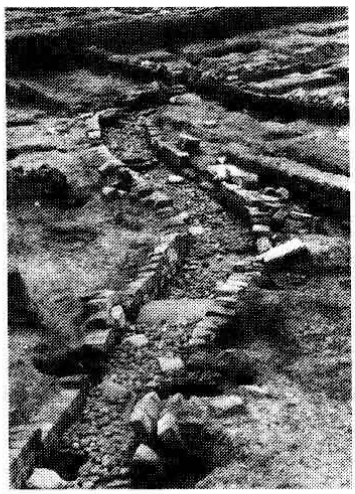
（天文）、《黄帝杂子步》（神仙）等都是以黄帝权威冠名的汉代书籍。《黄帝四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道家书籍，今天已经失传。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除《老子》之外，另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书，有人怀疑这也许就是传说的《黄帝四经》。传说黄帝作了十二音律。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律管，就是用来调节乐器音程的。以九寸长的竹管作为定五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基本音阶“宫”以及十二绝对音阶基础音“黄钟”的标准乐器。

显现神仙岛的离宫

武帝曾祭祀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位于西安北方陕西黄陵的桥山，高九百四十四米，现在仍保存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有柏树八万二千株以上。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信仰保持至今。1958 年建“黄帝陵”，碑文乃历史学家郭沫若所题。陵的前方就是称为汉武仙台的高台。若对后世的黄帝信仰追根溯源的话，武帝之信奉黄帝意义重大。

另外，甘泉宫也是在这与黄帝有缘的明廷之地建造的武帝离宫。位于现在陕西省淳化县北的铁王乡梁武帝村。如“甘泉宫”名字所示，这是武帝避暑的地方。此处有一千八百米高的甘泉山，秦始皇时期所修军事道路“直道”的起点就在这里。武帝继续利用了这块与秦始皇也有缘分的土地。这是一个兼作夏季避暑地的离宫，宫中里绘有泰一像，武帝曾在此祭天。甘泉宫中筑有益延寿观，为的是仿效黄帝能益寿延年。这里出土了“益延寿观”

93 黄帝陵的汉武仙台
黄帝被信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94 南越国御苑遗址　发现了水底铺石的曲渠(《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文字瓦当。还有一种月中有玉兔、蟾蜍花纹的瓦当，应该是此离宫所特有的吧。武帝有一段时间不在长安，而在此离宫办公，郡国汇报会计工作的使节被招到这里，诸侯王也在此聚会。

长安城西城墙外筑有建安宫，太液池中浮着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将远在东海的未知世界再现于长安。神明台上设有承露盘。朝露中含有植物所带的滋养成分，中国古代人们喜欢将莲叶等所带的朝露作为长寿补药饮用。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个用玉杯结露的承露盘。羽人(仙人)与承接莲花露造型的灯台组合的话，可以想见当年的形状。来到现在太液池苗圃用地，可见到小型贮水池中约八米高的称作渐台的高台遗址。前殿遗址东西200米、南北320米。宫殿内部庭园的全貌虽不清楚，但从南越王御苑遗址可以对当时庭园景观有个大致的了解。贮水池与模仿江河的曲渠现存长度有150米

左右。渠宽 1.4 米，边缘以红砂石垒砌而成，渠底部也以石铺设而成，而且是考虑到如何调节水流而设计的。从贮水池引水还巧妙地使用了暗渠，为了使渠水不致溢出或断流，水渠的出水口设计的比入水口大。有些地段的渠底部设计成凹凸不平的形状，为的是能够显现水势缓急的变化。

95 羽人莲花灯　用来承接莲花露（《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

在一处像黄河湾那样的形状处，有一个或为湖泊或为中州的遗址。这里出土了几百只甲鱼的遗骸。还加设有桥梁、散步道，是在曲水周围散步的区域。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据说设计有用机械驱动水银流淌的百川江河与大海，也许在散步时可以置身于永不停息、循环往复的江河之间，可以借此祈求长寿不老吧。不过建造这一庭园的南越，后来被武帝的军队灭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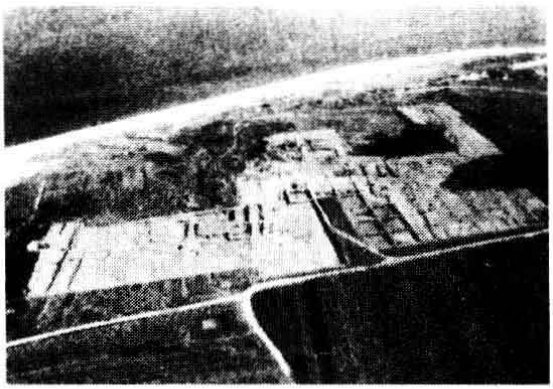
秦皇汉武两位相似的古代帝王

武帝实际上在海岸也建有离宫。1982 年以后在面临渤海，辽宁、河北二省交界地区，发现了秦汉离宫群遗址。绵延 50 公里之间发掘了 17 个遗址。与直径 52 厘米的秦代夔纹大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直径 20 厘米的小型汉代“千秋万岁”瓦当。明代长城至今尚存的山海关、如今仍作为避暑胜地而闻名的北戴河，现在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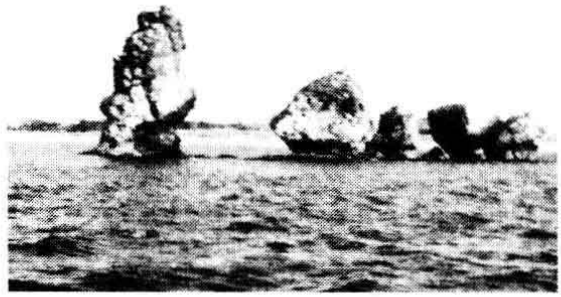
辖于保留着秦始皇名的秦皇岛市。从北京向正东200公里就是渤海沿岸。说是海，其实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有庙岛列岛环抱的、类似内海的海域。黄河就日夜不休地流入渤海。《庄子·天地篇》记载了谆芒与苑风相逢于东海之滨的寓言。苑风问谆芒在大海做什么？谆芒回答：大海注水而不溢，取水而不干，所以欲游大海。[23] 武帝也相信无垠的大海之中，有超越时间的仙人。

历史上有过所谓以碣石地名著称的地方。碣石是高耸礁石的意思。其地点也接近于黄河的入海口。与现在的黄河相比，汉代黄河靠北，上溯至春秋以前的话，则北至天津附近。碣石面向南，一直向南可达渤海的中心，还有碣石是孟姜女坟的传说。秦始皇、汉武帝时曾经像大门一样矗立着，现在西侧的礁石已经很大程度地崩塌了。礁石对岸的石碑地遗址发掘出高层离宫建筑遗址。在台阶、排水设施之外还发现了浴池和厕所。为了防止来自海潮的湿气，房间的地板下都铺以木炭。

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巡行的秦始皇曾访问过这里。那之后一百年过去的公元前110年，武帝又追随秦始皇足迹来到这里。秦的离宫在一百年之后已破旧不堪，因此进行了增修改建。后世常以“秦皇汉武”并称，是一种强调秦始皇与汉武帝共同点的说法。无论如何，这两位古代帝王的确在行为上很相似。武帝也与秦始皇一样，从这所离宫眺望大海，寻求神仙世界，毕竟这与在首都的小型庭园眺望神山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96 碣石宫　临海朝南所建海岸离宫的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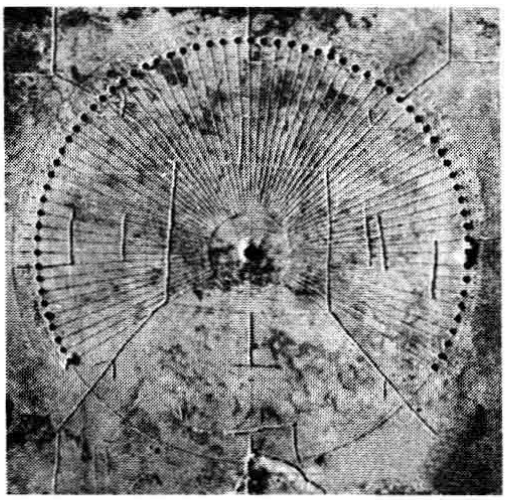
97 姜女石　位于碣石海岸，传说这是孟姜女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武帝时期的历法与审判

依照太阳运行的生活节奏

武帝在位的前半期，一直是在秦始皇时期的时间中生活着，使用的是颛顼历。这一历法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然而，大麦、小麦的情况就不同了，是秋天播种之后，经历冬季后在春天收获。冬天是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期。春小麦的味道就不及冬小麦。

秦灭亡之后，秦历又延续了一百年，此时终于迎来了转机。元封七年一月一日，即十干、十二支的甲子，正与那年的冬至日相合。所谓冬至与夏至都是容易进行观测的。今天的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正午时分太阳的高度是一年中最低的位置。如果在地上树立一垂直棒的话，棒的影子是一年中最长的，这是阳



98 日晷　汉代的石制计时器。在中心孔中插上棒针，以针的影子落在四周六十九个刻度的位置计算时刻（《华夏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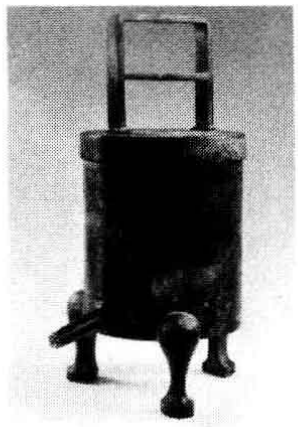
气开始胜于阴气的起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个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汉代的称为日晷的石制计时器。“晷”，即日影。呼和浩特的位置是北纬 41 度、东经 112 度，处于汉代北边长城的位置；如果是北纬 34 度、东经 109 度的长安（西安）的日晷的话，刻度则有必要进行调整。然而，当时没有标准时间，各地各自以太阳为准计算时间，所以各地使用同样的刻度也无所谓。这个日晷的中央插着棒针，均等地刻着六十九个刻度。

汉代使用一天百刻制，一刻相当于今天的十五分钟弱（十四分二十四秒）。现代汉语中“一刻”即十五分钟。像日晷所刻一个白天长六十九刻度时制的同时，还有一天十二时制的存在，这种计时法从秦代已经开始了。从“夜半”（上午零点）起，每两个小时为一个单位，接下来是“鸡鸣”（两点）、“平旦”（四点）、“日出”（六点）、“食时”（八点）、“隅中”（也称“东中”，十点）、“日中”（十二点）、“日昳”（十四点）、“餔时”（也称“下餔”，十六时）、“日入”（十八时）、“黄昏”（又称“昏时”，二十时）、“人定”（二十二时）。如此组成一百刻。从“平旦”（拂晓）的第一刻开始，直至黄昏的六十九刻结束。太阳计时器的刻度结束之后的夜间时间，是继续“黄昏”六十九刻之后的时间，即从夜

漏第一刻开始直至“鸡鸣”之间的夜漏三十一刻。

所谓“夜漏”，即夜间代替太阳计时器的滴水计时器（又称为漏刻）。茂陵附近发现了高30厘米、直径10厘米的小型汉代漏壶。水从细小的水嘴流出，以浮标下沉时浮标上的刻度表示时间。



99 铜漏壶（茂陵博物馆藏） 夜间无法使用日晷，所以使用滴水计时器

但是，百姓的生活时间，并不需要这种百刻制。他们只是按照太阳的运行，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只有官员有必要在收发文件时登记时刻。向官署传递文件时不能迟到，所以必须记录收与发的时刻。特别是太史令等官吏，在观察天体时也必须准确地记录时刻。

太阳与月亮两种周期

周王朝以十一月一日为新年的开始，因为他们将十一月的冬至作为出发点。阴历的冬至在十一月份。冬至日刚巧在一日是很罕见的，更何况又正当十干、十二支第一天的甲子日。从阳气开始超越阴气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最适合的日子。

中国古代的人们按照太阳与月亮的运行制订历法。然而，太阳与月亮的运行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太阳运行的话，不会错过季节的变化。但是，若按照每月29.53天出现一次盈亏计月的话，即必须交替地设定二十九日的小月和三十日的大月。而且即便以小月六个月、大月六个月设定的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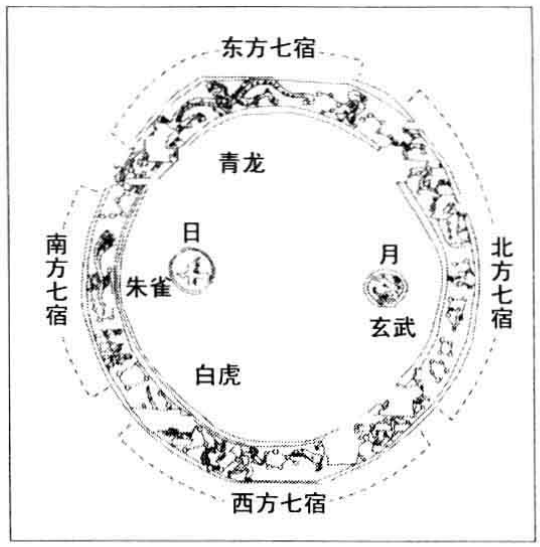
100 马王堆帛画（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盖棺的绢盖。绘有太阳、月亮、动物等种种图案

个月也只有三百五十四天，这就出现十一天的差。三年下来就是一个月。因此，细致计算的话，十九年之中就要设置七次闰月。

像我们今天只依据太阳运行的一元化理论，则完全无视月亮盈亏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人们却巧妙地利用了太阳与月亮两种循环。

想想长沙马王堆帛画所绘的天上世界，在西（左）方画着银白色的月牙，在东（右）方画着红太阳。月亮与太阳是对等的，东西对置只画了两组太阳和月亮。所画的或许是反射西沉的太阳、出于东方的满月，或许是东方的朝阳与西日映照下的月牙。如果是后者的话，朝阳与傍晚月牙有时间差，是一种象征性的图案。朝阳之中有八个太阳正在等待着。西方的月牙中按说应该有西日与之重合而生辉，所以有十个太阳。巡回一周为一旬（十天）。

在反射太阳光的月牙以外，可见兔与蟾蜍。月亮表面黑色的部分，是称为“海”的黑色玄武石低地。自古以来其形状没有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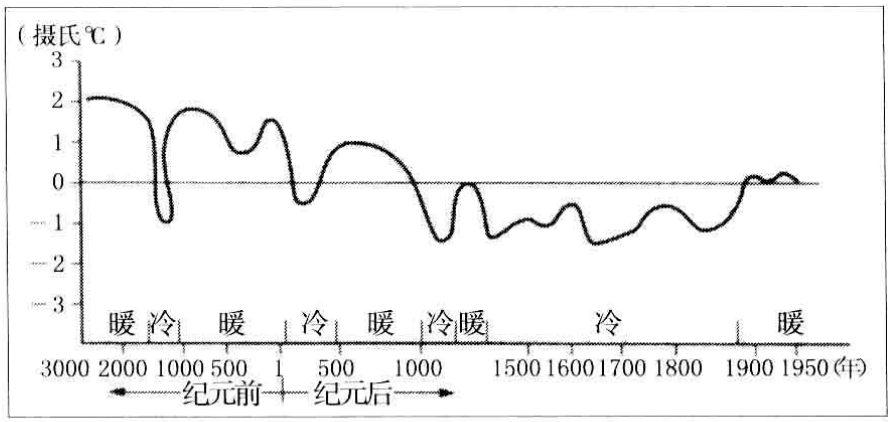


101 天文图　墓室天顶上北有满月，南有太阳，同心圆赤道上绘有二十八星宿（《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

化，中国古代人们把“海”的圆点比作兔子耳朵。蟾蜍体型大，且表面有带状纹路和圆形的隆起，以此比拟月表面的环形山。饶有兴味的是，实际月亮表面浓淡相间的模样正与帛画所绘月亮构图一致。

实际上地球虽然围绕太阳旋转，但相反让地球停止，太阳旋转一年的话，那条轨道称为“黄道”，而将地球赤道投影在天球上的话，叫做天的赤道。西安交通大学西汉晚期壁画墓的天顶上，北方是满月、南方是太阳，在二重同心圆的赤道上画着二十八星宿（星座）。由于赤道上星宿是固定的，所以也是天文观测的基准。东西南北各七个，合为二十八个。壁画中它们被分别图像化。

引进中国古代传统的日本龟虎古坟的天文图中，绘有黄道与赤道交差的形状。古代壁画中科学与神话两种世界同在。黄道与赤道以及赤道上的星宿，在观测五星移动时，有着类似坐标轴的性质。“五星”是指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镇星（土星）等五颗行星。人们试图根据其复杂的运行，预测地上世界的战争、洪水、干旱、饥馑等灾害。《史记·天官书》对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是最为反映其职务的一篇。



102 气候变迁图 气候变化引起环境变化，也引起各地特产的变化。历史研究中有必要重视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

在正月过新年的新历法

比如岁星（木星），在五星中的亮度仅次于太白星（金星）。天明时出于东方，黄昏时落于西方，极其便于观测。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每十二年（实际是 11.86 年）绕天一周，于是有了十二年一个周期的时间意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效力于越王勾践的计然，他认为："岁星在金（西）有丰收，在水（北）有歉收，在木（东）有饥馑，在火（南）有旱灾。六年丰收，之后六年旱灾，十二年遇一次大饥荒。旱灾时买船，洪水时买车。从天文中寻找商机，是商人的智慧。"[24] 天文现象与粮食资源的关系，即便现代科学也不能说有了十分清楚的解释。年平均气温仅仅下降一至二度的话，稻谷、小麦就会减产。而气温下降的原因又取决于太阳的活动，古人观点中也有其一番道理。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天文学、气候学家竺可桢（1890—1974）曾发表题为《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一期）的论文，提醒人们有必要从自然环境变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学。《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各地特产说：

“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其中所记桔、漆、桑、竹等亚热带植物产地比今天要靠北，可见西汉时期比现在温暖。“渭川”即流经首都长安以北的渭水，“陈”、“夏”位于黄河下游，北纬 34 至 35 度之间的东西一线，现在那里已经见不到“竹”和“漆”了。

秦汉王朝交替之后，历法并没有变化。秦代以十月一日为元旦的历法一直在沿用。冬十月是一年的开始。到了武帝的后半期，逐渐从秦制的束缚下得以解脱，制订了新的历法。太初历诞生了。据传夏王朝以正月元旦为一年的开始，所以改为从正月开始新的一年（太初元年〈前 104〉）。太史令司马迁也参与策划了这次改历。太初历使用于公元前 104 年至公元 86 年的一百九十年间。闰月是插在一年之中，而不是置于年末的。

与此同时，汉规定颜色崇尚黄色，数字崇尚五。因为秦尚黑色和数字六，由此从秦的黑色时代转为了黄色的时代。黄色是黄土的颜色，也是黄帝的颜色。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起于《五帝本纪》、终于《今上本纪》的。其中五帝中最早的是黄帝，黄帝的“黄”正是黄土的黄色。

酷吏张汤与新出土的汉简文书

张汤是武帝时期官至廷尉、御史大夫的高层官僚，但他最终没能陪葬于茂陵，而是静静被埋葬在了故乡的土地。最后他不

103 张汤印（《文物》2004年第五期）

得已自杀，所遗财产不过五百金。西汉初年物价高涨期，一匹马的价格是一百金，五百金也就是购买五匹马的金额。尽管如此，昆弟诸子还是希望厚葬张汤，张汤母亲劝止曰："身为天子大臣，被诬陷而死的人怎能厚葬呢？"于是以牛车载棺，下葬时连放置随葬品的椁室也没有。就这样，一名由刀笔之吏进身为高官的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2002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发掘了一个小型土洞墓，正是张汤墓。墓中出土了两枚两面印，刻有"张汤、张君信印"、"张汤、臣汤"。墓虽已遭盗掘，但还是出土了铜镜和武帝时的五铢钱。正如《史记·酷吏列传》所记，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墓葬。如前言中所述，2003年秋，湖南省长沙市古井中出土了一万余枚武帝前期的简牍，这些都是张汤时代的地方文书。其中发现的所谓"爰书"，是事件的审讯文书。西安与长沙虽说相距遥远，张汤与这类文件却关系紧密。

武帝时期的审判程序

张汤父亲是长安县丞（副官），居住长安。在张汤幼年时，有一次他留守在家。父亲外出归来时，发现肉被老鼠偷吃了。气愤之下打了张汤一顿鞭子。张汤从鼠洞抓到老鼠并查获到吃剩下的残肉。于是弹劾鼠罪、处以鞭笞，并且撰写了投诉鼠罪的爰书。他提审获得的鼠、肉，实行了讯（审讯）、鞫（量刑）、论（判决）、报（呈报）等程序，

最后在堂下处以磔刑。可以说张汤是在效仿作县丞的父亲办案，父亲见到他起草的文书，惊叹其文辞不输老练的狱吏。后来因为他的能力受到赏识，当上了长安县吏。这一典故不仅是记载小孩子的游戏，还反映了武帝时期裁判程序。

爰书的“爰”有“易”即变更的意思，由受害人、嫌疑人、证人的口供变更形成的文书，即供述书。反复核实爰书内容与当事人证言有无出入之后，方可定罪。睡虎地秦简中有爰书的案例集。下面一例是其书写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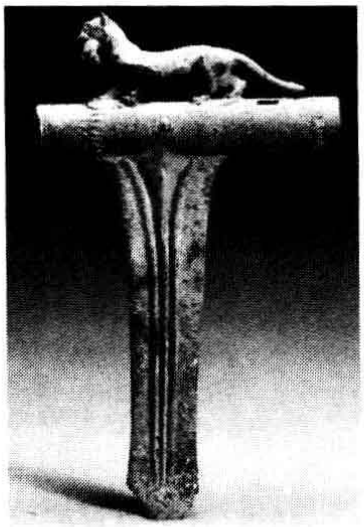
某里士五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丙不孝，谒杀，敢告。”（某里士伍甲控告说：“甲的亲生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请求处以死刑，谨告。”）

张汤撰写的爰书的内容虽已不知其详，但根据上述格式类推的话，作为受害人张汤控告老鼠的状文应该是这样的：

杜县某里张汤告曰：“同居鼠盗汤家肉，谒杀，敢告。”

龙岗秦简中有一则鞫的文书，是传达对死者免罪的内容：

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已经死亡，无须承担城旦之刑。所犯罪过也已赎免。）



104 西汉滇国豹衔鼠穿銎铜戈 （云南省博物馆藏）

就张汤的判决来说，虽说是鼠，不过盗肉而已，处以磔刑是否太严厉了呢？但是从张家山汉简《盗律》“五人以上的集团群盗行为处以磔刑”来看，张汤判决未必没有根据。张汤成为实际的官吏以后，也确实在处理重大事件上崭露头角。由于他在处理陈皇后的卫子夫（皇后）诅咒事件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事件时的严格执法，深得武帝信赖。不过，他对诸王和官僚的严厉处罚，最终又都返还到了自己的身上。

第六章

武帝的时期 Ⅱ

领土扩张

进入西域与匈奴战争

丝绸之路

武帝时期去往西域的道路是由一位名叫张骞的人开通的。《史记·大宛列传》称此事为“张骞凿空”。《汉书·西域传》也说，武帝“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所谓“西域之迹”即“西域之道”的意思。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诸国。他率领百人至三百人的编队，手持表示武帝亲任特使的节，携带着黄金、丝绸。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了“丝绸之路”和“东西交流之路”。武帝时期张骞的使命并非东西交流，而是一次对匈奴战略性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行动。

就中国来说，从陆地延伸所向的西方曾是个幻想中的世界。

105 汉代骆驼陶俑　早在唐之前七百年，与西域的交通道路已经开辟，人们骑着骆驼来往于此（《三秦瑰宝》，陕西人民出版社）

许多中国没有的物产从骆驼背上运载而来。玉石、葡萄、苜蓿、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毒药，使用于毒箭）、乌孙和大宛的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即极大改变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佛教。汉代首都长安、洛阳虽比不上唐的长安，但也充满了西域文化的馨香。

北有天山山脉（北山）、南有昆仑山脉（南山）、西面是帕米尔高原（葱岭），东西六千余里（约两千四百公里）、南北千余里（四百公里）的广大地域就是汉代人们所称的西域。这一广大的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个由冰川末期冰河融化、爆发形成洪水之后形成的内陆湖，堆积着大面积的沙土。在此后的干燥期，又由沙尘暴堆积起沙丘纵列的沙漠。由于山岳地带有着二百至三百毫米的年降雨量，与冰河融水合流形成了干旱沙漠之中河川流淌的世界。

在武帝茂陵的东邻是昭帝的平陵，2002 年，在其附近的陪葬坑出土了骆驼的骨头。汉代骆驼骨的出土尚属首次。唐代长安的西域商人十分活跃的情况是经常被提到的，唐三彩塑造有西域胡商牵引骆驼以及驼背上满载物资场景。

但是，早在唐兴起的七百年之前，实际上与西域的交通道路已经开辟，人们骑着骆驼来往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之间。后来，西域诸国曾频繁地向汉朝献上骆驼。西安东郊外河坡出土

的彩绘汉代骆驼陶俑非常珍贵。驼峰小而尖、间隔较宽，接近野生骆驼的形象。

与月氏同盟讨伐匈奴

张骞曾有效地利用马和骆驼完成了他的西域之旅。敦煌莫高窟 323 窟绘有张骞出使的场景。这是一幅唐代初期的想象图。在一幅图中按照时间、空间流动的远近法，描绘了五个场面。武帝先是在甘泉宫礼拜两座金人，然后武帝亲自乘马为张骞送行。金人本是匈奴祭天用的，辗转到了武帝手中。张骞一行三人持节乘马越过山梁，到达大夏国之城。一行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变小，最后抵达大夏。

建元二年（前 139），张骞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西域的漫长旅行。这是一次旨在联合月氏共同对匈奴作战的外交出使。他率领一百人，以胡人甘父为向导。月氏已经移居遥远的西方。在匈奴头曼单于的时代，太子冒顿曾作为人质被送至月氏，那时月氏势力强大出乎想象。月氏在战国时代被称为禺氏，从“禺氏玉”的存在来看，禺氏玉的交易应该很繁荣。但是，他们不久被匈奴赶出了祁连山山脉沿线的交通要塞。月氏被匈奴老上单于击败，甚至蒙受月氏王颅骨被作为饮酒器的屈辱。虽然一种说法认为被用作小便器，但还是被作为饮酒器的观点比较稳妥。无论如何，带着对匈奴的怨恨，月氏迁徙去了西方。迁徙之后的月氏称为大月氏，他们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山地，进入所谓西土耳其斯坦，经过伊犁地方，在妫水（阿姆河）北岸设立王庭（首都）。处于北有康居、南

106 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莫高窟 323 窟） 绘有出发去西域的张骞和为其送行的武帝的唐代初期的图。从右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予以了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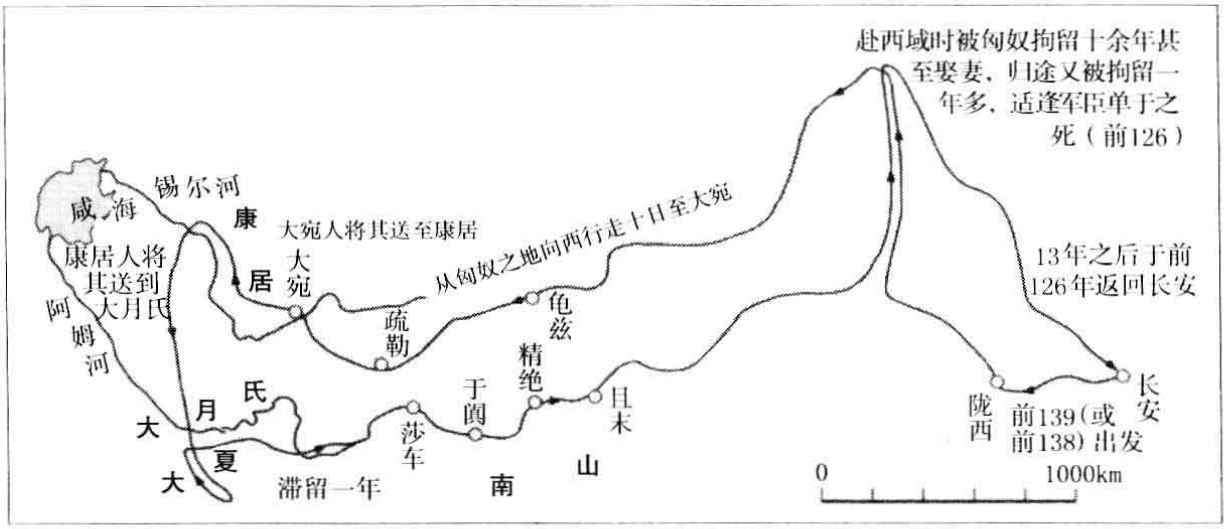
有大夏、西有安息、东有大宛围绕之地。大月氏当时能让大夏从属于己，可见其仍保持着相当的势力。张骞的目的地就是那里。

有一部分月氏人留了下来，为了便于区别称之为小月氏。河西走廊从此归由匈奴统治。河西走廊东部为匈奴休屠王领地，西部为浑邪王领地。今天所称祁连山的名字，就是匈奴人命名的，是“天”的意思。张骞很快被匈奴人抓获，滞留了十几年，甚至娶妻生子。这是张骞的无为期。但是，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在此期间却日趋紧张。

从和亲到抗争的汉匈外交

张骞滞留于匈奴之地期间，元光二年（前133）爆发了促使汉匈关系恶化的事件。在此之前，文帝与老上稽粥单于之间，通过一段时间的和亲，直至景帝时期双关系都很平稳。但是在文帝前元四年（前176），汉朝寄给单于一封长度为一尺一寸的简牍书信，信是这样开头的：“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此时单于根据已经亡命匈奴成为单于谋士的燕人中行说的谋略，以一尺二寸简牍予以回信。虽然一寸仅长2.3厘米，但是因为汉朝皇帝诏书通例为一尺一寸，所以一尺二寸意在超越汉制。

回信开头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强调自己超过生于天地日月之宇宙之皇帝权威。直称“汉皇帝”也是史无前例之事。我们使用的“汉帝国”也是当时没有的历史学用语。刘邦虽然当过“汉王”，但在即位皇帝以后，皇



107 张骞西域行程图

帝统治的领域并不仅限于“汉”，而是“天下”。所谓“国”说到底不过是王的领域，皇帝的领域是超越“国”的。这里刘邦首次被中国以外者称为“汉皇帝”。

此时，汉与匈奴结成的是一种兄弟般的邻国间对等的外交关系。虽说并未明确谁是兄长，但现实中是匈奴占据优势。双方以约定不侵塞（长城）为前提，汉不但要送公主（皇帝女儿）给匈奴，每年还要通过关市赠送一定数额的糯粟、糵、黄金、帛、生丝、真绵等。关市，是设于国境关卡的市场，汉代《津关令》规定，禁止携带黄金制品越塞。汉与匈奴之间没有自由贸易。

至军臣单于之世，适逢武帝即位，双方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事态急转直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在国境边上的马邑城（山西省大同市西南一百公里的朔县）埋伏下三十余万兵力，伪装触犯禁令向境外运输物资的模样，诱至单于十万匈奴骑兵。但是单于在接近马邑时只见草原遍布家畜，而不见有人放牧，感到其中有诈。武帝的策略因此失败，匈奴从此放弃和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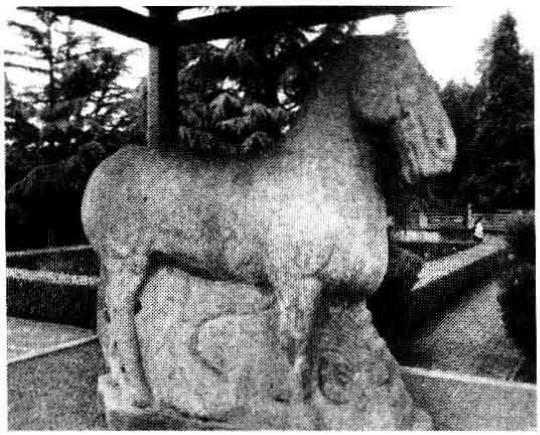
此间张骞逃离匈奴，经数十日到达大宛。从大宛得到向导、翻译经康居，最终抵达目的地大月氏。然而，此时大月氏已经获得一片新天地，甚至使大夏服属于己，安居乐业，已无向匈奴报复之心。《大宛列传》曰："不能得月氏要领。"今天日常生活中"不得要领"一词，用来形容不明道理之意。而这里若理解为"月氏所言乃不明要领"的话，语气过轻。张骞持皇帝之节，是带着外交使命感的。与月氏的友好关系虽得以建立，但形成对匈奴包围网之军事同盟的要领没有得到理解。

也许因为对与大月氏结盟不再抱希望的消息传到了汉朝廷，汉正式向匈奴派遣了远征军。率队的是两位青年将军。

与匈奴作战之主角
卫青、霍去病

武帝茂陵东边的陪葬墓群中，在最靠近茂陵的地方并列着的是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二人的墓。从茂陵顶上可以望见这两座坟丘。现在这里已成为茂陵博物馆。卫青、霍去病分别是武帝卫皇后的弟弟与外甥（姐姐卫少儿之子），与武帝有着姻亲关系。维系二人关系的卫皇后陵墓虽没有找到，但这舅甥二人由于在对匈战争中的卓越战功，作为臣下死后得以埋葬在最高级别的位置。

就造型来看，卫青的坟丘像蒙古高原的庐山（窴颜山），霍去病的坟丘像西方的祁连山。特意造成与一般方形坟或圆形坟不同的墓，选择了体现二人与匈奴作战激烈的场所的形状。霍去病墓



108 霍去病墓前的石像　表现了马踏匈奴兵的瞬间场景

前并排伫立着两尊巨大人像，石像雕刻虽然素朴，却让人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霍去病十八岁就加入舅父的军队而崭露头角，二十岁升为将军，但是仅留下四年的功绩就于二十四岁英年早逝。为纪念霍去病雕刻的一座座石像，一定各有其不同的意思。只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搞不懂石像所讲述的故事。

马踏匈奴兵石像表现了生着络腮胡的匈奴兵与马头对峙的一瞬间，象征着与匈奴连续作战的青年将军的形象。驱使的马，伏卧的马、猪、牛等家畜表现的应该是从匈奴民那里夺取的战利品吧。虎、熊大概是在战地捕获的猛兽。遭受猛兽袭击的羊、与熊搏斗的人物、奇妙的石人，描述的都应该是霍去病在草原上的遭遇吧。

从元光六年（前 129）至元狩四年（前 119）的十年间，卫青七次、霍去病六次出长城远征。因为其中有三次是共同作战，所以二人合起来总共进行了十次大规模远征。匈奴与汉的国境线，即是秦始皇时期的长城。维持这绵延万里的长城很是困难。中间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已经沦为匈奴领地，长城也在此被切断。匈奴如果由此处进攻长安的话，并非难事。武帝出兵的目的，一是收复河南，复兴秦始皇时期完整的长城；二是将匈奴包围、牵制，确保沿长城一线向西直至祁连山的河西走廊的畅通，以

维持与西域的外交。其结果，卫青收复河南、建立朔方郡，霍去病为确保河西走廊建立大功。

如果冷静地看待汉与匈奴战争的话，这是一种位于长城两侧双方之间反反复复的残酷杀戮与掠夺。匈奴不断以一万至两万规模的骑兵袭击边境各郡，长城附近居民经常因此数百、数千地被杀。汉一方也曾派遣一至五万人的骑兵和十万人规模的步兵出击塞外。汉军轻易就取得斩首匈奴兵一万至七万的功绩，掠夺匈奴家畜数十万至百余万。当然，汉军也有数千人战死。

张骞带回的乌孙天马

张骞在归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元朔二年（前127）军臣单于死去，其弟伊稚斜单于即位。张骞乘着单于更迭期的混乱，终于归国。百余人一行出发至今已经十三年，归国时仅余张骞与堂邑父二人。此事在卫青第三次远征的翌年（元朔三年，即前126）。由于卫青的这次远征，汉收复了秦始皇以来河南（鄂尔多斯），设置朔方郡，并恢复了秦始皇时期的万里长城。基于汉取得的优势，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

然而，新单于刚一即位，纷争马上又开始了。元朔五年（前124），张骞带着自己曾经在匈奴的生活经验，参加了大将军卫青的第四次远征。进入缺水的草原，张骞的智慧就发挥了作用。他被封为博望侯并非由于出使西域而在于此次所立的军功。两年之后的他参加了第五次远征，这次却因为没能如期完成集结，被

处以斩刑。虽经赎罪免于死刑，但也因此失去了博望侯的爵位。张骞的命运受着那个时代的反复摆弄。十次远征之后，匈奴势力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在匈奴旧地，统治西部的浑邪王降伏，此前休屠王已为浑邪王所杀。

霍去病死后翌年的元鼎元年（前116），张骞作为使节再赴西域。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联合乌孙。就武帝而言，不能依靠大月氏的话，联合乌孙也可以。他听信张骞的主张，给了他三百士兵。投入了上一次三倍的力量。

由于匈奴西部势力的丧失，张骞这次没有在途中被抓，就达到了乌孙。然而，还是不得“要领”。这次仅仅两年之后张骞归国。他带回了乌孙使者数十人和数十匹马。在汉朝引入大宛马之前，乌孙的马曾被视为天马。通过与匈奴战争的经历，汉朝很希望能得到比匈奴马更快、更有耐久力的良种马。比起结盟，武帝当时对马表示出了更大的兴趣。

武帝的对外战略

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太史令司马迁曾将天文与战争相结合。武帝元光至元狩年间（前124—前117）两次出现像蚩尤旗帜形状的彗星，据说占据了天空的一半。“蚩尤”是被黄帝打败的一位“军神”。京师的

109 蚩尤画像石 （武氏祠东汉画像石《隶释》）

军队出击四方，诛杀夷狄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北方对匈奴的战争最为激烈，同时在南、东、西各方国境也爆发了战争。灭亡南越时荧惑星（火星）留于斗宿，攻打朝鲜时有星悬于天河入口，远征大宛时有星阻塞招摇星。秦始皇的战争不过是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的南北战争；武帝却鲁莽地在东、南、西、北四面发动战争，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呢？

建立南越的赵佗，在建元四年（前 137）死去。早于汉武帝称“武帝”的南越王的六十七年的统治结束了。继位的第二代王是他的孙子胡，第三代王是婴齐，接下来是兴，至第五代建德为武帝军队所灭。南越九十三年的历史向我们叙述着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三世纪吴国孙权已经发掘了婴齐的陵墓，此事在《南越志》有记载：出土有珠襦、玉匣三、金印三十六、铜剑三（刻有“纯钩”、“干将”、“莫邪”的名剑），印刻有“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还有刻有“天子”字样的。所谓“发掘”，在古代就是盗墓的意思，出土文物也没有传下来。也许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但是，1983 年南越王赵胡的陵墓被发现，说明上述情况并非传说。遗骸虽已腐朽，但出土文物与赵婴齐同样，有玉衣和六柄剑，还发现了金印和玉印。其中刻有“文帝行玺”的 3.1 厘米见方的龙钮金印，和 2.3 厘米见方刻有“帝印”的蟠龙纽玉印，证

明《史记·南越列传》所记其在国内称帝号，在与汉外交中使用王号的情况的确属实。

赵佗曾经未向汉报告就擅自称帝号，汉文帝曾派陆贾去问罪。赵佗做了书面道歉，开头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自称。称自己为“蛮夷”，对汉文帝像汉官吏一样不称姓，但称“臣某”。还说“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为自己进行辩解。当然可以说这是外交文书，但也表达了南越王的感情。最后又辩解曰：“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这种曲折的情感也表现于他对国内的命令之中：“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

言语中表示自己是与汉皇帝并列的英雄、贤人，不得已放弃仿效皇帝的车马制度。然而，这仅是他在陆贾面前的演技而已。其实赵佗是将内政与外交巧妙地予以区别对待的老奸巨猾的政治家。他是一位既经历过秦始皇时代，又与高祖、吕后、文帝有过交锋，熟悉秦汉政治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位赵佗，在武帝即位后不久死去了。

南越王国的灭亡

年轻的赵胡曾受到闽越王郢的国境侵犯，为了解决纠纷他只好直接请汉武帝出面。武帝发挥了册封者的权威。当藩臣之间发生纠纷之时，作为天子

的汉皇帝起着从中调停的作用。皇帝，对外君临以天子之号；作为天子，则应该具有跨越国境维持国际世界秩序的权威。武帝在做出南越是遵守对汉合约、没有过错的判断之后，出兵讨伐闽越。闽越王的弟弟先下手杀兄投降了。最终，赵胡将太子婴齐作为质子送到汉，表示了南越对汉感恩之心。

婴齐在长安亲眼目睹了汉帝国的广大，不久赵胡病逝，婴齐归国继位做了第三代南越王（明王）。婴齐对汉武帝权威之盛已深有感触，回到南越国之后他隐藏了先代武帝（赵佗）、文帝（赵胡）的玺印。出土的文帝行玺正是其中一枚。汉武帝生前还只是称皇帝，不称武帝；叫做“文帝”的却已经有了“汉文帝”、“南越文帝”两个。婴齐逗留长安时已娶邯郸樛氏之女，生子“兴”。

《史记·南越列传》称此女人为“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意思，但那时指的是中原人。赵佗本来也是“中国人”。他作为“中国人”进入越人之中，建立起国家称为南越。婴齐与越人妻子之间生了长子赵建德。两个儿子赵兴与赵建德的待遇，与南越的命运息息相关。太子赵兴作为第四代王即位，其“中国人”母亲成了太后。王与太后都是“中国派”，三年一度对汉的朝贡势必实施。另一方面，丞相吕嘉是长老，受到越人极大信赖。吕嘉拥立具有越人血统的赵建德而引发内乱。于是，赵建德成为第五代南越王。

元鼎五年（前112）秋，武帝派出军队，调遣罪人（《汉书》记载为“粤人”）与江淮以南楼船（船舱设有大楼的军船）十万兵。

这不禁使人想起一百年前秦始皇向百越发兵五十万的情景，赵佗当时也在那支军队之中。其子孙如今要在这里迎击汉的军队了。当年秦始皇军队分五路发动进攻，汉武帝也是兵分五路，直指南越首都番禺。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戈船将军归义侯与下厉将军越侯分别出漓水、苍梧，驰义侯率巴蜀罪人与夜郎军顺牂牁江直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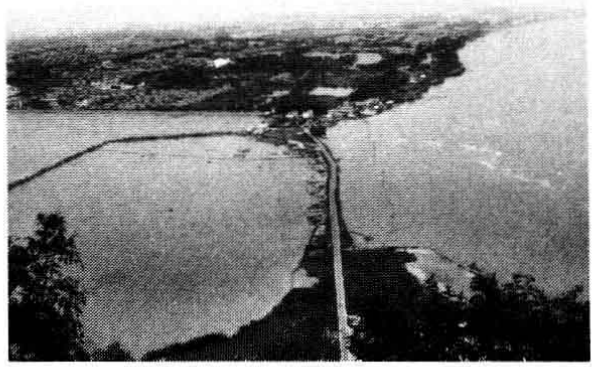
然而，五军未能在约定地点如期会合。杨仆的军队首先到达，率领罪人、没有战斗意志的路博德军不过千人。路博德和杨仆急于邀功，进攻守城的建德、吕嘉，并纵火烧城。建德、吕嘉逃亡。路博德曾以赐汉侯印的手段招降对方，推进战事。投降者有知道建德、吕嘉所在的，于是抓获二人。就这样，元鼎六年（前111），历经五世共九十三年的南越灭亡了，那里曾经立有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

西南夷的世界

云南地方冬暖夏凉。由于憧憬此地，战国时期的楚，与后来的秦、汉都曾经南下。古代的西南诸民族世界，是以散见于高原地带的一种叫做坝子的小盆地为生存环境的。四周环山，平地绵延的水田、绿色的内海（洲）那种美丽风土，是从四川省南部的西昌至云南省的昆明，进而至大理都可以见到的这一地域的共同风貌。

司马迁在汉灭南越的元鼎六年（前111），作为郎中曾经到过西南夷。当时的西南夷，相当于今天的贵州省和云南省，与中原相

110 云南风景　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水田与湖水相连的魅力风土。冬暖夏凉的云南之地为古代各族所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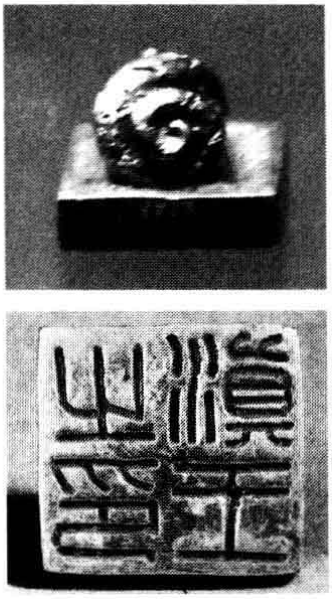


111 滇池　位于昆明的湖，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的面积。位于海拔 1886 米的高原

对，被视为蛮夷的居住之地。横跨两省的云贵高原，在两千米的高地上分布着小型的盆地。只有沿河川的道路连通着孤立的盆地。

这一年武帝的军队出巴蜀（四川省）南下，逐一攻占了从邛（四川省乐山市西北）、笮（四川省乐山市西南）至昆明（云南省大理附近）的地区。司马迁曾随从这一支军队至此，翌年就返回了首都。在汉之前，秦已经夺取了楚的巴郡和黔中郡，进而挺进西南，由常頞修造了五尺道。虽然仅有五尺（约一米二十厘米）宽的狭窄道路，总算连通了云南。后来，汉军进入这里，其实与张骞带回的大夏情报有关。张骞在大夏得知那里的蜀布（苎麻的纺织品）和邛竹杖是经身毒（北印度）运至大夏的，所以汉认为如果能够确保蜀至北印度的通道的话，将有利于对匈奴的战争。为此，曾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对滇地做过事前调查。

“滇”至今仍是云南省的简称。省会昆明还有叫做“滇池”的湖，此湖位于海拔 1886 米高地。面积 300 平方公里，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最大水深处十米，仅相当于琵琶湖的十分之一。



112 滇王之印　边长 2.3 厘米的蛇钮金印

封”的西汉蛇钮银印。是授予朱卢地方首长的上等爵位。汉代没有“执封”的爵位，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是战国楚或楚汉时期的印章（吉开将人《印中所见南越世界——岭南古玺印考》上中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一三六、一三七、一三九，1998—2000 年）。蛇钮的孔中穿有印绶。滇王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汉赐金印的，印绶是否挂于项上呢？

西南夷诸部族的生活与风俗

据传说滇王是从楚移居此地的。楚威王（前 339—前 329 在位）时，王族出身的将军庄蹻沿长江溯流而上，控制了巴、黔中以西，一直进军至滇池。他见湖周围的平原土地丰润，就停了下来。又因巴与黔中为秦所占领而封闭了回归的道路，加上当时正值秦昭襄王（前 306—前 251 在位）时期，不得已他在滇地称王，依从了那里的风俗。这样形成的滇王，现在向汉投降了。

司马迁进入此地之后，才首次以文字形式记录了当地的历史，即《史记·西南夷列传》。其中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隶属于汉的历史。他们自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自身的历史。但是，仅仅是文字的记载非历史的全貌。滇国的富庶及其历史通过青铜制的贮贝器盖上的立体画像展现了出来。现在我们在博物馆观看 3D（三维）立体画像的静止画面或动画的机会增多了，那不过是利用人

曾问汉的使节汉与夜郎哪个大，后来此成语用来揶揄那些不自量力的鲁莽之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询问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其实说"滇王自大"也很贴切，可能是因为语感好听，最终定型为了"夜郎自大"。

这个据说在西南夷最大的夜郎，是位于牂牁江流域的国家。夜郎凭借牂牁江与南越相互连接，也依赖于南越，所以随着南越的灭亡，夜郎王也就隶属于汉了。夜郎王被册封，并被授予了印章。位于贵州省的夜郎也成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2000 年，在贵州省西北部海拔 1800 米的高原的赫章县可乐镇，发掘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 112 座。葬式是头顶部戴以铜釜、铜鼓的特殊埋葬方式（套头葬）。被葬者佩戴青铜簪、手镯、玉饰，还有青铜及铁制的戈和剑。夜郎王印尚未找到，发现了一枚仅 1.2 厘米见方的印章上刻有"敬事"二个汉字，反映了汉与夜郎的关系。

元封二年（前 109）在巴蜀紧急召集的武帝军队，从夜郎好容易进军至滇。在军队到达之前滇王就轻易地投降了。汉在赐予滇王王印的同时，建立了益州郡。在西南夷被授以王印的只有夜郎与滇国。滇王的小型金印，已于 1956 年在位于滇池畔的石寨山墓葬发现，是边长仅仅 2.3 厘米，相当于汉代一寸四方的蛇钮金印。汉根据册封对象所居地方的动物制作印钮。对北方、西方的游牧民，用骆驼、或羊作印钮，而对南方王国的国王则用蛇用作印钮。

1984 年，在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也发现了刻有"朱卢执

又深又广的水源造成江水逆流而上的水势，由此得名“滇”，也叫做昆明池。武帝为了准备战争还特意在长安城西南造了一个昆明湖，为的是在那里训练水军。云南省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正相当于日本列岛面积的总和。

从云南省向东是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横贯中国的最南端。用当时的名称说，这里是西南夷与越地。从西南夷至越地横向移动，顺着牂牁江直下即可到达。这条古代只有一个名字的河流，现在的名称却是分段叫的。从滇池之南的南盘江，顺流下至红河、浔江，然后由西江注入广州湾。古代蜀地商人就是从牂牁江乘船而下，至南越番禺经商的。其中有一种叫做枸酱的蜀地食品，很受南越人的欢迎。枸酱就是用胡椒科的蒟制成的酱。今天粤菜的甜味型，也许与古代越人喜爱的这种调料有关。

蜀商人自由往来于南中国地方，还将印度也划入了自己的活动范围。西南夷处于北有中国、南接东南亚世界的重要地理位置。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河、伊洛瓦底江这些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南向流淌的大川大河，都发源于云南和自藏高原。中国的澜沧江和怒江流入东南亚之后，改名为湄公河和萨尔温河。

夜郎隶属于汉、册封滇王

武帝的军队由牂牁江从东至西逆流而上。歼灭南越之后，又进攻了牂牁江沿岸的夜郎。就是“夜郎自大”成语所言的夜郎国。其国王不知汉有多大，

左右眼视差创造的科学的虚构画像。但是滇人作品却是实像。

贮贝器是收藏宝贝的容器。从南海运来的贝壳是被作为货币使用的。不仅在滇池畔的石寨山，在接近星云湖，即昆明南一百公里处的江川县李家山也发掘了滇国的墓葬，出土了许多贮贝器。可见到许多诸如祭祀、战争、农耕、纺织、贡纳、音乐、舞蹈、畜牧（羊水牛猪）、狩猎等题材的场面。尽管是静止的画像，因为表现了一个又一个动物、人物的瞬间动作，圆盘状的台座为舞台，恰然有一种戏剧般的动人力量。

将鹿追得走投无路的两个骑兵、牵着水牛或马的牧童、盘绕在柱上的蛇以及凝视此场面的人物、斩得敌兵首级的骑兵、两手两足并用的织布女性、头顶谷物送往仓库的人群、笑容满面跳舞演奏的人群等等，都是单凭一幅幅文献史料勾勒不出的历史形象。

《史记》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的发型为魋（椎）结型和编发型。魋结型就是将头发在头上结成木槌的形状，编发型就是将头发编成下垂的细细的小辫子。夜郎或滇国为前者，西部昆明用后者的发型。上述夜郎墓葬出土的青铜簪子应该就是用于魋结的吧。的确，从贮贝器的人物来看，不论何种身份者基本都是魋结型束发。但也有一部分是编发型的人，看来他们来自滇以外的其他部族。这些不仅仅是装饰，其中必有着某种故事原委。具有如此丰富自我表现文化的滇人，最终投降了汉帝国。

出征朝鲜军队的混乱

武帝的军队越过了秦始皇长城东段的辽东。就汉的立场而言，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杀害辽东都尉事件是一个借口。在西南滇国投降的那一年，在遥远的东北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在碣石的对面是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延伸下去是朝鲜半岛。高祖时期燕王卢绾入匈奴时，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去朝鲜半岛称王。他们渡过浿水（现在的鸭绿江或清川江）在朝鲜之地建立了王险城，在现在的平壤附近。他们使周边的真番、临屯隶属于自己，作为外臣与汉保持着外交关系。那以后过了一百年，到了第三代右渠统治时期。右渠不再追随汉，也不理睬汉使者涉何的说服。因此，涉何杀了送行的朝鲜副王。朝鲜方面认为这一事件是一切纷争的开始，派兵击杀辽东都尉涉何。

汉招募罪人充当攻打朝鲜的士兵，曾出任南越战争楼船将军的杨仆，这次又出征朝鲜。他率兵五万，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左将军荀彘的军队则从辽东半岛发起攻击。这场战争进展的优势在处于迎击态势的朝鲜一方。《史记·朝鲜列传》清楚地记述了侵略军一方的混乱状态。司马迁对这次战争毋宁说是持批判的态度。无论如何，杨仆军与荀彘军的海陆两军的协同作战根本就没有形成。攻打王险城的杨仆的部队被分割，自己狼狈地逃往了山中；荀彘军被浿水阻挡，甚至没能接近王险城。后来，两军终于重整旗鼓同时向王险城发动进攻，然而数月攻而不下。杨仆、荀彘各自急于单独征服朝鲜，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最终，荀彘拘捕了杨仆才算独自统率了全体部队。

113 描述战争场面的贮贝器 在收藏宝贝的贮贝器盖上，立体地表现了滇国的历史（《晋宁石寨山》）

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大臣刺杀了朝鲜王右渠、率众投降。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得以设置。但是，本来应有功的荀彘却因妒贤嫉能、拘捕盟军将军杨仆之举，以违背战略计划罪被宣判弃市。杨仆也由于未等待荀彘军到达就擅自出击，而造成士兵大量伤亡罪被判以诛杀，终因赎罪被贬为庶民身份。汉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呢？作为汉王朝要让夷狄各国以外臣身份隶属于己，自有其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目的。为此，也有必要使朝鲜降伏。但是，至少战场二将军急于争夺眼前军功、士兵又是为着赎罪目的而参战这两项，就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丧失了攻打朝鲜的战斗意志。

朝鲜半岛的统治
据点乐浪郡

朝鲜王右渠对汉抗战的王险城，陷落之后设置了乐浪郡，自设郡至公元313年的四百二十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王朝统治朝鲜的据点。乐浪郡遗址受到关注始于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东西700米、南北600米的土城，位于大同江的南岸，城南面的丘陵地带发现了1400多座墓葬。从朝鲜总督时期的19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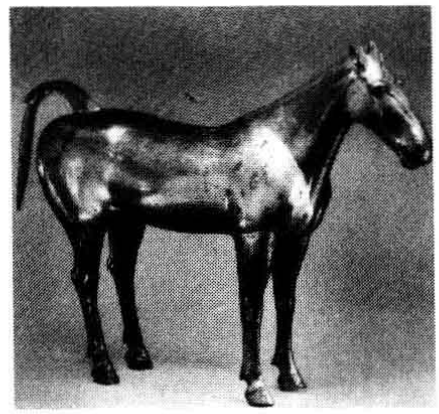
开始，先后发掘了王旰墓、彩篋冢、王光墓等多处墓葬，在日本出版了发掘报告。王旰的身份，从木印可知是郡的五官掾，即太守的属官；王光的身份从木印看，是乐浪太守的掾（地方官属官）。

随葬品多是作为太守副官的地方官吏的日用品。出土了漆器的化妆用具、叫做“式占天地盘”的占卜工具、官吏必备的文具（笔、砚、砚水壶、木简、刀削）等。在称为“彩篋”的竹制箱子上，有漆绘的鲜明的人物模样。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但从黄肠题凑（黄芯方形木材〈黄肠木〉，以两端〈题〉露出形式垒积〈凑〉组合的墓室），显示出其身份的显贵。土城在1935至1937年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领导发掘，由于出土有“乐浪富贵”文字瓦当和封泥，而确定为乐浪郡遗址。遗址向我们传达武帝使乐浪郡投降的信息。

武帝的军队并未驻屯于此，这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西域。

大宛的汗血马

在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中有一座所谓“羊头冢”，其形状的确像羊头的长方形坟丘。因为此墓周围有三十八个陪葬坑，所以说这虽只是一个无名冢，但又一定是一位有相当级别的人物墓葬。1981年发掘了其中一个陪葬坑，出土了刻有“阳信家”字样的青铜器。“阳信”是武帝姐姐阳信公主，原来称平阳公主，是曹寿的妻子，乃景帝与王皇后的长女。曹寿死后，成为卫青的妻子，改称阳信长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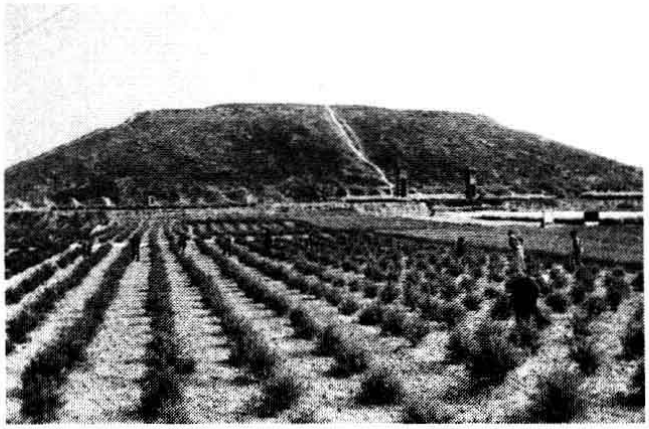


114 鎏金铜马 身长 76 厘米，高 62 厘米，重 24.3 公斤。青铜马体通身镀金

在古代，皇帝女儿称为公主，皇帝姐姐称长公主。阳信长公主改嫁给了自己侍女卫媪的儿子卫青。姐姐卫子夫本来也是出自阳信长公主家的歌姬。武帝对其一见倾心，收入宫中，继陈皇后成为皇后。无名墓的墓主正是这位阳信长公主。此陪葬坑出土了鎏金铜马。出土的青铜鎏金马至今仍不失熠熠生辉之感。马高 62 厘米，身长 76 厘米，重 24.3 公斤。虽比与实物同大的秦始皇兵马俑要小，却给人以金光夺目的印象。

武帝派往大宛的使者带回来的就是金马。出土的鎏金马是中空，而且是青铜包金的。使节与千金一同带回的金马，也许就是这样的。大宛的情报已经通过张骞有所掌握。其位置就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国首都塔什干附近、流入咸海的锡尔河上游，距长安一万里的遥远之地。是个生长稻、麦，盛产葡萄酒的地方，无论如何那里的名马深得武帝的喜欢。他喜爱乌孙马，还为其取名“天马”，但认为大宛马堪称极品，甚至将乌孙马改称“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据说大宛马流出血汗，即所谓“汗血马”。

马的皮膜有许多汗腺，比其他动物易出汗。马的优良、差劣是由其速度和耐久力决定的。视其前肢肌肉、肩部斜度、深广的胸部、膝盖的大小、腹部紧绷度、背肌腰肌等体型和行走特征，判断其是否为良马。鎏金马与秦骑马俑相比的话，明显是进化的



115 李夫人墓　坟丘分上下两段，称英陵。“英”有重叠之意。其他的陪葬墓都在茂陵以东，唯有此墓在西北

优质马。倾斜的肩线很长，腹部紧绷、马蹄角度锋锐、马尾高翘。如果作为战马的能力提高的话，军事上就占据优势。一万里的距离也不成问题。

为夺取天马的战争

当时，有谣言称：大宛将良种马藏于贰师城不予汉朝。大宛拒绝了汉使者的请求，汉使者怒骂之，砸毁金马而去。既然可以将金马弃之而去，可见那不是黄金制品。大宛贵人认为遭到蔑视，于是杀汉使，夺其财货。仅此，就轻易地发动了战争。与任命卫皇后弟弟卫青为大将军一样，此时任命武帝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目的很明确，这是一场仅仅为了夺取贰师城天马的战争。

由属国训练而成的六千骑兵驱赶着来自各地的无赖少年数万人出兵了。战争开始于太初元年（前 104）。但是，远征一度失败。士兵没有战斗意志，粮食也供应不足，饱受饥饿之苦，而且兵力不足。军队退回敦煌时，武帝不许他们入关。一年多后，事态转变，又开始了第二次出兵。六万士兵、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运送粮食的驴、骡、骆驼也以万为单位计算。大军压向小国大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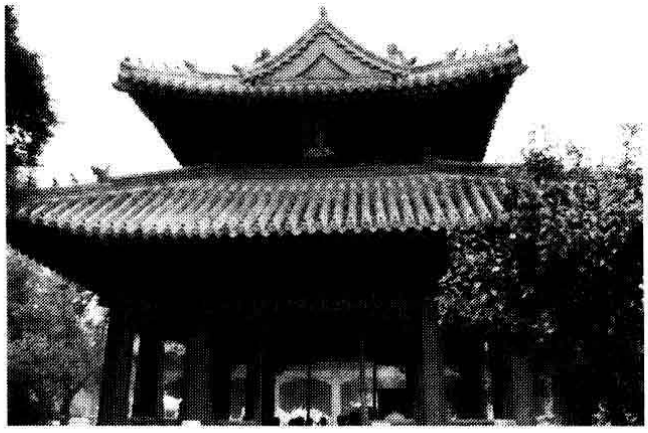
大汉王朝意气用事，包围大宛城，断绝了绿洲都市的水源。大

宛贵人杀了自己的国王，答应交出“善马”。李广利也答应了请求，战争由此结束。汉军接受了“善马”数十匹，中级马雌雄三千余匹。汉王朝扶植了对汉怀好意的大宛王，结束了为时四年的战争。

儒教的时代

罕见的思想家，孔子引起的共鸣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了《孔子世家》一篇。所谓“世家”记述的是吴、齐、燕等王国的历史，所以将孔子个人列入世家有其特殊的意义。就汉代司马迁来看，孔子（前 551—前 479）的时代是五百年前的过去。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已听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正是继承过去全盛时代的机会！”[25] 实际上五百年只是个概数。从孔子之死至司马谈之死，其间不过三百七十年而已。周公旦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辅佐武王讨伐商纣，武王亡后又辅助年幼的成王执政，是公元前一千年的人物，所以实际是在九百年前。“五百年”前的孔子与“一千年”前的周公子一样，在汉代人看来都是理想的人物。也许称为“圣人”更好。汉代人将孔子予以理想化，以此成为后代儒教历史的起点。可以说在武帝统治时期，儒教进入了支持汉王朝政治的时代。司马谈曾论述了六家的学问。“六家”指的是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西汉初期的儒家



116 杏坛　据说是山东省曲阜孔庙中的孔子曾经讲学的地方

不过是一家学问而已。司马谈其实更倾心于道家。但是，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儒家压制道家等其他学问，与政治结合了起来。

司马迁二十岁旅行时造访了鲁国。那里有祭祀孔子的庙堂，祭祀的礼器一应俱全。诸生定期在孔子故居学礼。司马迁为那种光景所感，一时流连忘返。孔子以布衣（庶民穿着的麻衣）身份能使其学问流传十数代，是位罕见的思想家。由此，司马迁发现了将孔子作为世家予以记述的意义。被秦始皇毁灭的东方齐鲁国的学问，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封杀的称为儒教的学问，在一个世纪之后与汉王朝权力相结合，恢复了权威。

《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言行录。《史记·孔子世家》则是孔子的传记，记述了其从出生至死亡七十二岁的人生。这是司马迁汇集了《春秋左氏传》等著作内容撰写的传记。

广博的思想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父亲叔梁纥与颜氏之女野合而生孔子。据记载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因出生时头部中央有凹陷，故取名“丘”。孔子本名为孔丘，字仲尼，尼丘来自孔子出生的曲阜南部的山名。家虽贫，幼时学习经书的学识使他成为

117 孔子墓　位于曲阜孔林（孔子一族的墓地）的中心，立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

了鲁国季氏的官吏。他掌管财务很公平，管理家畜则牲畜增殖。然而，他离开鲁国，在齐遭到排斥，从宋、卫逃脱，受苦于陈、蔡。生平曾向七十多位君主请求官职，均未得到厚遇。因为感叹鲁国政治的混乱，孔子最终回到鲁国，召集门人，专心传授学问。据说孔子叹息周代礼乐的衰退，致力于礼乐的重建，所以他纠正诗（《诗经》）、书（《尚书》或《书经》）中的错误、复兴礼乐，写成《春秋》，倾心于易（《易经》）而作系辞传。孔子所传授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再加上乐的话，就是六艺。

直至景帝时期，儒者没有显著的地位。在武帝时代才迈出了走向儒教国家道路的第一步。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建元元年（前 140）设置五经博士。但是《史记》未见此记载，实际情况不明。由博士传授儒家的教科书，一个博士并不能精通所有五经或六艺，因为儒学已经形成为庞大的学问体系。

儒家主张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有别之说，因此儒家的学问被选中为维护帝国体制的学问。的确，从祭祀、葬礼直至封禅、外交，礼都不可或缺。但解说礼的秩序的仅是六艺之中的《礼》，儒家学问并不限于此。《诗》是讽刺政治的，《书》是称赞先王事迹的，《易》的革命思想是讲自然和社会变化的，《春秋》

118 四川的讲学画像石　作为维持汉帝国体系学问的儒学，由博士向弟子口头传授（《巴蜀汉代画像集》）

旨在以史为鉴，《乐》乃宗庙祭祀所必备的。儒家有着如此广博的思想体系。

汉代的儒家之所以能够被封为儒教，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广泛性。由此，形成了各个专门领域。进行各专门领域传授的，专治《尚书》有伏生（文帝时期人物，以下同），《诗》有申培公（高祖）、辕固生（文帝）、韩婴（文帝—武帝）、王臧、赵绾，《春秋》有董仲舒（景帝—武帝）、胡母生（景帝）、公孙弘（武帝），《礼》（《礼记》）有高堂生，《易》有田生等人传授。博士弟子是从全国召集来的优秀人才，包括数百名的贤良方正、文学之士。

在武帝时代这些学者并不仅限于成为博士，正像孔子那样，作为丞相等高官积极从政。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期的博士时向弟子口授过《春秋》，后来做了武帝两个兄弟所在江都国、胶西国的丞相。他以《春秋公羊学》和灾异学为理论基础，提供政策性建议。建元六年（前 135）地方上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首都也发生了高祖长陵陵园便殿的火灾。武帝因此向董仲舒咨询，董说此乃天意。孔子出生的鲁国定公、哀公时代的宫殿也曾屡屡失火，是鲁国违反礼而建庙、建宫殿所致，同时也暗示了鲁国有乱臣季氏。董仲舒是将过去的历史与武帝时代进行相互对照。

救助农民、富强国家的政策性建议

作为儒家的理想时代是五帝及夏商周三代。政治的基础是满足民众的温饱，在此基础之上开始发展经济。董仲舒以井田制为理想：即按“井”字形状平均地划分出九块耕地，由八个家族各持一块私田，剩余的一块作为公田。这是一种实现平等、公有的土地制度。由于自秦以来允许土地买卖，造成了贫富差别悬殊。这种情况被看做是战国以来实施富国强兵政策、掠夺民力的结果，受到了批判。虽然秦的政治至汉朝得到继承，但如今的汉则试图通过儒家予以改变。贫困者承受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一年的国境警备兵役，或一年的首都警备任务，此外还要负担一个月的郡县劳役。田租、口赋（人头税）负担也很重。耕种豪族土地的小农，收获的十分之五都被掠夺了。

典型的农民家庭是一家五口，有百亩之田。一百亩土地是100平方步至240平方步的面积。“一步”的长度相当于左右脚之间一步的步幅，大约1.3米，由此可以想象出长24步、宽10步的面积。农民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种植收获谷物，储存足够生活需要的谷物之后，把剩余部分卖给国家换取钱币。人头税是要用钱交纳的。衣料等生活用品也需要用钱从市场购买。董仲舒为了救助这些农民，提出了限制土地所有的“名田”政策。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曾向文侯提出了土地与富国的政策，其中详细讲述了农民的家庭收支情况。以他的计算方法换过来考虑现在汉代农民的情况的话，一家五口，百亩之田。谷物在

119 粟　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粟

北方是粟或小米，在南方生产的是水稻，虽不好一概而论，但是如果以一亩收获一石半计算的话，则是一百五十石。实际上很多农民没有百亩之田。首先要交纳收获物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作为田租。余下的一百四十五石之中，一家口粮如以每人每月消费一石半计算的话，五人一年需要九十石，换算起来仅剩余五十五石。以此换钱，按一石三十钱的话，可以换得一千六百五十钱。人头税是成年人一年一百二十钱，三至十四岁儿童一年二十三钱的口赋，一家三个成人、两个孩子的话，每年须缴纳四百零六钱。结果，剩余一千二百四十四钱。乡里的祭祀费用须出资三百钱，衣服每人每年三百钱的话，五人需一千五百钱，至此已经出现五百五十六钱的赤字。如此吃紧的生活，每年还要受到气候、灾害的左右，将难以维持。

淮南王与衡山王的谋反事件

元朔六年（前 123）发生了一起打击武帝的事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数千人受到处罚。这是一起在与匈奴战争正式爆发时的内乱。甚至董仲舒曾经供职的江都王和胶东王也试图响应。吴楚七国之乱未必不会再度发生，所以必须及早处置。

刘安为高祖之孙，乃淮水河畔的淮南王。父亲刘长本是拥

有四郡领域的大国王，因谋反罪王国被一分为三，刘安继承的是其中的淮南国。他身边集结的食客编纂了《淮南子》这部被称为杂家的著作，书中特别以道家为中心汇集了各种思想。这位淮南王因为太子的一些琐碎事件，被中央削减了领地，还不断地被中央怀疑为有谋反的企图。

严厉制裁谋反的法律，是中央为了抑制诸侯国所设立的。张家山汉简《贼律》规定：谋划反乱的“谋反”，不仅本人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同产（同母兄弟）不问年龄一律弃市。刘安的反乱并未实施。其王后、太子被捕，数千人连坐。详细提供谋反经过的证词的人是在刘安身边供职的伍被。他供认准备了进攻长安的武器，还企图伪造皇帝玺印和高官印章。博士出身的丞相公孙弘也是治《春秋》学的，他严厉处置了这一事件。最终，淮南国灭亡，改置为九江郡。

借儒家之学讽刺武帝

董仲舒被东汉人称为“儒者之宗”。儒学不是书桌上的学问，就像孔子当年那样，儒家总有着关心现实政治的意识。但是，一旦对现实绝望的话，就归而从事学问。董仲舒也是如此。

儒家参与政治方式也各有不同，像司马相如是作为诗人参与政治的。他创作了《大人赋》《子虚赋》等，以诗的形式讽刺现实。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表现形态。司马相如还批判了武帝攻打南夷、侵略北狄的行动。司马相如本人出身于蜀郡成都，

对自己家乡成为战争牺牲品感同身受。巴蜀即现在的四川省，战国时期的秦国征服这里以来，不断得到开发。与贫穷的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之家，就是秦在攻破赵国之后，被迁徙至蜀、最终成功发展为制铁巨富的，拥有奴隶上千人。司马相如以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讽刺了发动西南夷战争的武帝。可以借儒家学问讽刺皇帝的汉王朝体制，应该说是还一种健全的体制。司马相如的文章采取了自己作为使者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下面将对话内容择其要摘引如下：

蜀父老曰："天子与夷狄的关系，国交勿绝而已。如今，巴蜀、广汉人人为牺牲，为开辟通往夜郎的道路已经劳苦三年尚未完成，民已疲惫。如今要关注西南夷，可又为的是什么呢？"[26]

使者（我）曰："《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若有未得沐浴天子恩德者的话，乃天子之耻。四面都已德化，愿西夷、南夷也能够接受天子的爵位。民虽困苦，王业却不能不继续。"[27]

蜀父老叹息曰："汉的恩德很伟大，百姓虽已怠倦，我们自己努力吧。"[28]

文章讽刺了汉天子的无义战争，坦率地表达了蜀地人民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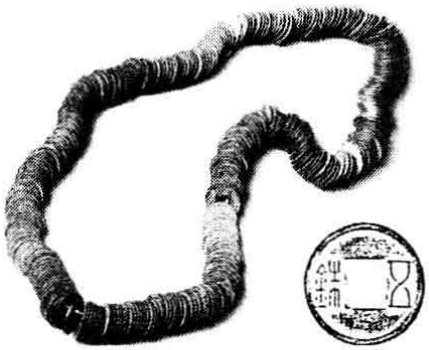
武帝时代的经济与开发

支撑汉代财政的货币

武帝时期的人口数虽不清楚，但一百年之后西汉末是5959万人、1223万户。为了维持这样的帝国，官僚制当然是必要的，同时财政制度又是至关重要的。汉对匈奴战争动员了几十万兵力，为此需要庞大的军粮、武器、奖赏支出等临时费用。由于在通常国家体制运营的财政支出之外，附加了军事财政，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勉强得以维持。

汉代是明显的货币经济时代。延续秦始皇时代的半两钱，汉代也实行货币财政。方孔圆形的秦青铜货币，在汉代仍然继续发行。吕后时期的八铢半两钱、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虽说都延续了秦半两钱的面额和形状，但重量是不一样的。半两的“两”与“铢”的关系，由于一两为二十四铢，半两就是十二铢（7.8克）。八铢、四铢的重量与面额有差异。文帝时期民间私人铸造货币是被允许的，景帝时期再次受到禁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在现代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货币铸造并非特别困难之事。从实际的货币即可知其铸造过程：用黏土制成铸模，加热熔化铜、锡后，灌入模子即可。形状、字面都很简单。有些时期只要能流通使用，谁都可以制造货币。吴国或邓通个人铸造的货币就曾是通用货币。

为了发展货币经济，国家大量铸造货币并非易事。武帝元狩



120 五铢钱 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发行的五铢钱，面额与重量（青铜）一致，一直到唐代高祖时期，沿用了七百年

三年（前120）发行三铢钱，元狩四年发行五铢钱，使面额与重量一致。从武帝时期开始使用的五铢钱，后来一直到唐代高祖时期，沿用了七百年。元狩五年开始至平帝元始年间，共铸造货币二百八十亿万钱。每年发行二亿二千万钱的货币量。

汉代官吏的薪俸

汉代的基本税收是人头税，当时叫做算赋。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课税一算即为一百二十钱。按这一年龄层有一千万人计算的话，是十二亿钱的收入；两千万的话，就是二十四亿；三千万的话就是三十六亿。但是卫青、霍去病发给士兵的奖金就要二十亿至一百亿，所以仅支付此一项就根本不够。

就前汉末的官吏数来说，从最高的一万石丞相，直至不满一百石的佐吏，共计十二万人。汉代官吏的等级是以谷物换算薪俸的“石”来表示的。西汉初期的《秩律》（张家山汉简）中有两千、一千、八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石的递减顺序。两千石是中央政府各官厅长官的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太仆、少府、奉常、郎中令等九卿的等级，地方上是郡太守的等级。一千石在中央是上述长官以下的官吏，在地方是大县的县令。县令根据县规模的大小，从一千石至六百

石不等：长安、洛阳、成都县为一千石，咸阳、长陵、江陵县为八百石，安陵、荥阳县为六百石。一百石以上是中央任命的长吏，一百石以下是地方采用的少吏。

官吏的等级以“石”表示。“石”既可以用作容量的“斛”，也可以用作重量单位，不易分辨。金属等固定形态物用“权（秤砣）”计量，液体、粉末等非固定形态物用“升”计量。谷物的话，两种计量都可以。秦始皇每日批阅审判文书的定额是一石的重量，一石是一百二十斤，约三十公斤。文书是竹简，所以只能用重量单位计算。

司马迁一年的薪俸是六百石，月工资相当于七十斛谷物的价格。一斛是十斗、一百升的容量。一斗相当于日本的一升，一斛是十升，一百合。用货币换算，按一斛七十、八十钱的话，合四千九百至五千六百钱。每月七十斛，十二个月是八百四十斛，相当于六百石的重量。太史在《秩律》中的确是六百石之职，武帝时仍没有变化。司马迁这样六百石的官吏，如果有五万人的话，一年薪俸的支出额就得二亿五千万钱。仅此一项就超出了一年的货币发行量。

稳定国家财政之策

物价是变动的。谷物价格受着丰产、欠产的左右，直接影响到农民和城市市民的生活。一石谷物数十钱的价格，发生饥馑时上涨至数百钱至数千钱，有时甚至上万钱；丰年则相反，一石甚至降至数钱的价格。

秦始皇三十一年上升至一千六百钱的价格，楚汉战争的农业停滞时期，进而攀升至一万钱。文帝时又落到数十钱的水平。

为了安定国家财政，必须抑制谷物价格的上下波动。治粟都尉桑弘羊掌管国家财政。他本是洛阳商人之子，他把商人的计算能力很好地运用于管理国家财政。元封元年（前 110）他提出了在地方县设置均输官、中央设置平准官的财政方案。顾名思义，“均输”旨在物资流通的平均化，“平准”旨在物价的稳定化。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发生地域性饥荒或灾害时，既有物资缺乏的地方，也有充裕的地方。商人们介乎于这些地域之间，低买高卖，获取利益。

后来，元帝时期，谷物连年歉收，京师一石为二百余钱，边地城市四百钱，关东五百钱，地域性差价明显。商人们观察时机，关注物价的升降，由此盈利。低价时买进，高价时待价而沽。与此古代自由经济相反，国家采取了行动，向物资不足地区运送物资，物价高涨时抛出物资以便降低物价。此乃安定国家财政的政策。

盐铁专卖使国家获得巨大利益

在此之前御史大夫张汤已经形成了盐铁专卖的基本构想，并于元狩四年（前 119）提出了方案。国家独占、专卖生活必需品的盐铁，保持稳定的价格，作为财政来源。实施此项政策时，借助了两位大商人的智慧。起用南阳制铁商孔仅、齐地盐商东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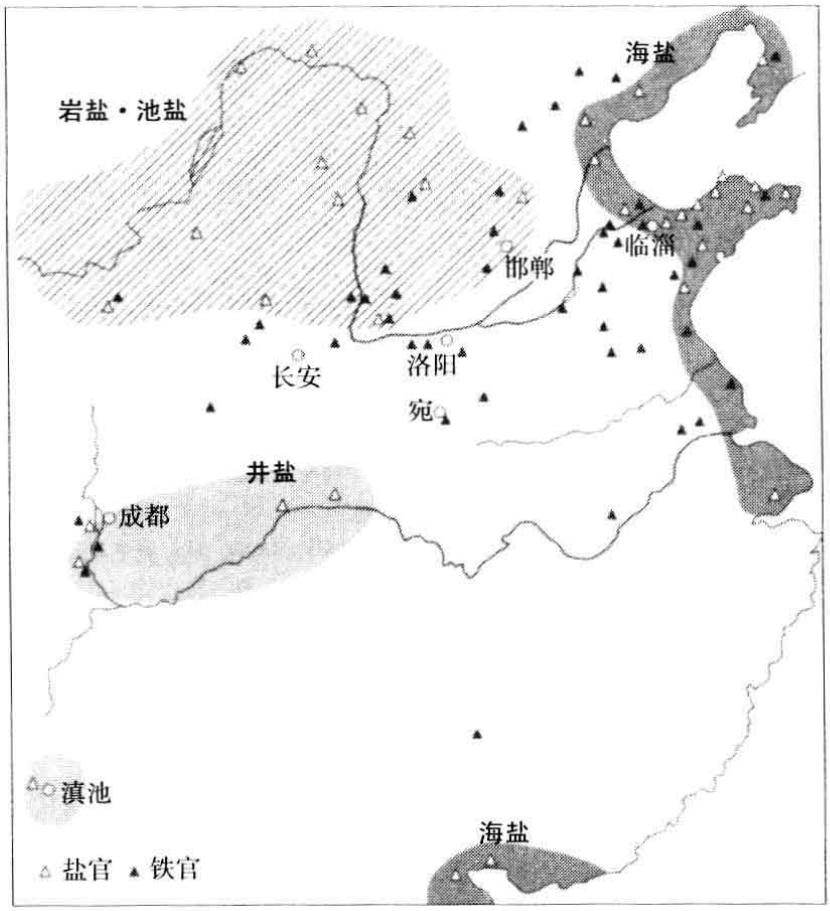
咸阳作为大农丞。孔仅、东郭咸阳以自身的经验为指导，在全国设置盐铁官后，又设置了酒榷官。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不久，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取代孔仅掌管盐铁。

人的身体中出于对体液的调节，必须摄取盐分。在古代盐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和保存料，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万能的作用。生的鱼类和贝类很快会腐败，撒上盐的话，不取掉水分也可以短期保存，如果再将其干燥或发酵的话，还可以长期保存。蔬菜用盐腌制后，冬天也可以食用。动物的肉在取出内脏后撒上盐，可以挂在钩子上干燥保存。汉代画像石就画有兔、猪、鱼吊在厨房里的场景。

盐、大豆、谷物、鱼、肉类发酵的话，可以制成各种酱，创造出多彩的味道。盐在各地都可以生产，如沿海的海盐、内陆的池盐、岩盐等。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将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山西（不是今天的山西省，而是太行山以西）分开来看的话，黄河下游的山东产海盐，山西产池盐、岩盐，另外岭南（广东）和沙北（北方沙漠地带）也产盐。

与日本列岛单纯地依赖于海盐不同，中国大陆自古代起就品尝着各种食盐的味道。岩盐在地下经长时间结晶化过程，盐化钾的纯度很高，海盐虽纯度低，但矿物质多。盐化钾越多越甜，盐化镁越多越苦，盐的味道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三十六处盐官之中，有十六处设在渤海、黄海沿岸的海盐区。为了结晶出盐，或将海水放入锅中直接煮沸，或仅靠日光和



121 全国盐官、铁官分布图

风力使水分蒸发。齐地生产海盐，在内陆的巴蜀有四处盐官生产井盐。将溶解有岩盐的高浓度地下水汲出、贮水、在锅中煮沸，使之结晶。四川画像砖上描绘了这样的工艺流程。

此外，在内陆也有井盐、岩盐的分布。现在尤为人知的有山西省运城县的解池。盐商腰缠万金。有时候国家向他们出租煮盐工具让他们生产，而国家实行专卖获取巨大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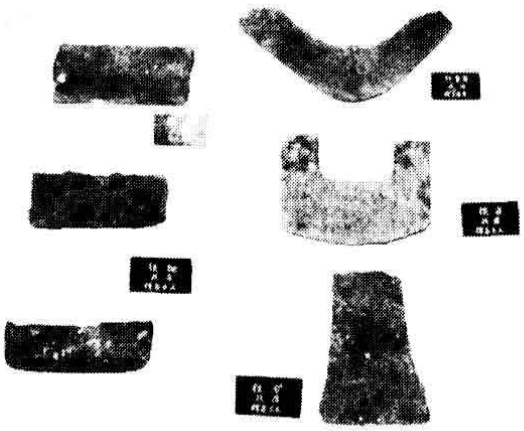
铁制农具促使生产力飞越发展

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出现了需要1100度至1300度高温熔解铁矿石的铸铁工艺。铸铁适用于农具，促进了生产力飞速发

展。战国中期以降，铁农具在富裕层得到广泛使用，到了汉代已经在一般农民中得以普及。战国时期遗址出土了锹、镰、斧等农具，汉代制铁遗址也已经发现。战国时期民营制铁业主赵的卓氏、齐的程氏很有名，卓氏、程郑、孔氏都是靠铁业致富。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以一或二头牛牵引铁犁耕作的牛耕法。犁的三角形的掘土犁先和推土的犁铲用铸铁制成，犁的本体（由牛牵引的长柄、手扶的犁柄、垂直立着的犁柱、在地面上滑动的犁床等）因为是木制的所以腐蚀殆尽，但出土了犁先和犁铲。

铁的生产中首先需要通过木炭的燃烧从铁矿石（酸化铁）还原出一氧化碳。为了燃烧木炭还需要大量运送空气的风箱和冶炼炉。四十八处铁官都设在具备铁矿石和木炭的地方。其分布为：山东丘陵周边地方有十二处，沿太行山脉南北有七处，太原至洛阳、颍川、南阳有十一处，从关中到垄西、汉中有五处，蜀地有三处、长江下游有四处，桂阳一处。

专卖制实施之后，博士徐偃去地方巡视风俗时，曾伪造敕命，令胶东国和鲁国制盐，并使用风箱铸铁。从张汤开始，伪造敕命相当于死罪会受到弹劾。当时，年轻的终军以能辩博学出任武帝近臣的谒者给事中（皇帝身边掌管文书及人员出入之官职）。终军认为徐偃的行为很不实际，于是有了以下的诘问："胶东国和鲁国的盐铁都由周边各郡供给，本无任何不便可言，你是经过对人口、耕地面积认真调查之后得出有必要从事盐铁生产的结论吗？再者，春耕时期要制作农具，秋天又是必须向火炉加火的



122 铁制农具（河南博物馆藏） V字形器具套在犁先上起到深翻土地的作用。U字形器具是套在木锹头上的耕具

时期，这些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吗？”[29] 据此，他认定徐偃有罪。在这样的争论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冶铁业的实际形态。

酒也是居家及乡里祭祀所不可缺少的。禁止酒的私营之后，酒的走私横行一时。霍光儿子霍禹被揭发在他家私自造酒，以致酒缸被砸毁。赵广汉的食客也在长安市场上私卖酒。

建造白渠消除盐害

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上奏请求凿渠引泾水以利灌溉，于是开始施工。地点就在公元前246年秦嬴政即位秦王伊始，让郑国凿渠的地方。从郑国渠到白渠的建设，其间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秦始皇的遗产在武帝时期得以继承。

回忆起来，当年负责灌渠施工的是邻国韩国的水工郑国。其实他本是韩国派来的间谍，旨在使秦的国力从军事转向土木工程，以便达到削弱来自秦侵略威胁的目的。从中山流入平原的泾水在瓠口形成了葫芦形的弯曲河道，从这里引泾水沿北山向东至洛水，修筑了全长三百里、约一百二十公里的水渠。间谍身份暴露之后，秦王命他做完工程。含有大量黄土高原泥土的河水，可以不间断地向农作物供给锰、钾等无机物。还可以冲走地表的盐分，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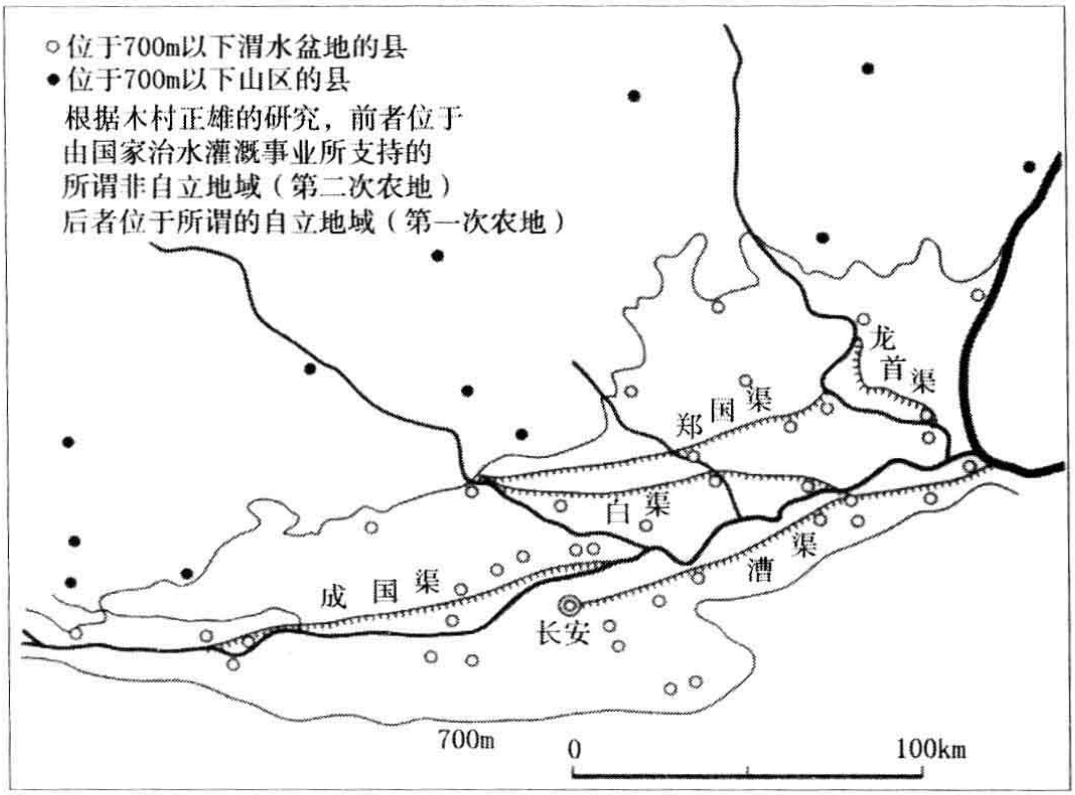
123 徐州牛耕画像石

泥土堆积，防止土壤水分的蒸发，其效果很是可观。以四万余顷（约七百二十八平方公里）土地与约一百二十公里的郑国渠的长度相换算的话，宽幅六公里的土地得到了灌溉，产量高达每亩一钟（六斛四斗，约 49.7 升）。

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秦始皇的遗产已经无法原样继承了，出现了泥沙和盐分的问题。黄河下游由于没有倾斜度，泥沙堆积于河床，而泾水由于有倾斜，所以河床被侵蚀而不断地加深。泾水的引水口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由于河床变低而丧失了机能。引水口必须溯流向上改在与耕地高度相当的地方。另外，露出地表的盐分暂时可以依靠灌溉水冲刷，长此以往的话反而诱使地下水位上升，盐害会变得更加严重。所谓盐害，指的是由于干燥土壤的水分剧烈蒸发，造成土壤中的钙、钠盐分浮出地表，形成结晶的现象。置之不顾的话，将导致农作物枯死。

白渠建成之后，农民对其流经区域的丰饶歌颂道：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
举锹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124 郑国渠和白渠　与秦始皇遗产郑国渠并行，赵白公上奏凿渠而动工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但是，渠水从谷口县至栎阳县全长二百里，灌溉面积四千五百顷，还是不及郑国渠。

武帝时期的关中开发

郑国渠与白渠现在作为泾惠渠仍在使用。笔者在1985年、1998年、1999年对那里的遗址作过调查。在三原县龙桥的郑国渠古道上架有清代的桥和现代的桥，在泾惠渠水坝有历代渠首（取水口）遗址。如今还可以见到郑国渠渠首的断面，三限闸（三叉分开的水闸）是白

渠向北中南三方分流的地点。郑国渠的灌溉地是沿渭北平原北边，向东西扩展的地域。在海拔492米至380米倾斜地带上开凿了水渠。白渠流经的地域比郑国渠的位置要低。在东西主干渠两侧，南北向又分出支渠，扩展为更加细小的灌溉网。秦始皇时期的智慧确实在这里得到了继承。

更早些时期的龙首渠，也是为治理盐害的水利而建造的灌溉工程，由庄熊罴提案修造的。临晋县人民希望引洛水灌溉重泉县以东的万余顷恶地。只要有水，每亩产量可达十石。当时动员了十万人力。将洛水引至临晋县，必须穿过土质疏松易于崩塌的商颜山。人们挖十米的井，采取从地下横向连接的井渠方式。与中亚的基什岛坎儿井（qanat）一样。由于施工时挖出了“龙首（可能是恐龙化石）”而起名龙首渠。此渠现在作为洛惠渠仍在使用。1950年大兴水利，反而诱发地下水位的上升，加重了盐害。20世纪70年代设置了排水系统，让灌溉水流入排水沟，控制了地下水位的上升，创造出新的方法。

武帝时期，就这样推动了包括首都圈在内的关中地区的开发。秦王时期出于对付东方六国的战略开凿了郑国渠，武帝时期是在对抗匈奴的战略中纳入关中开发规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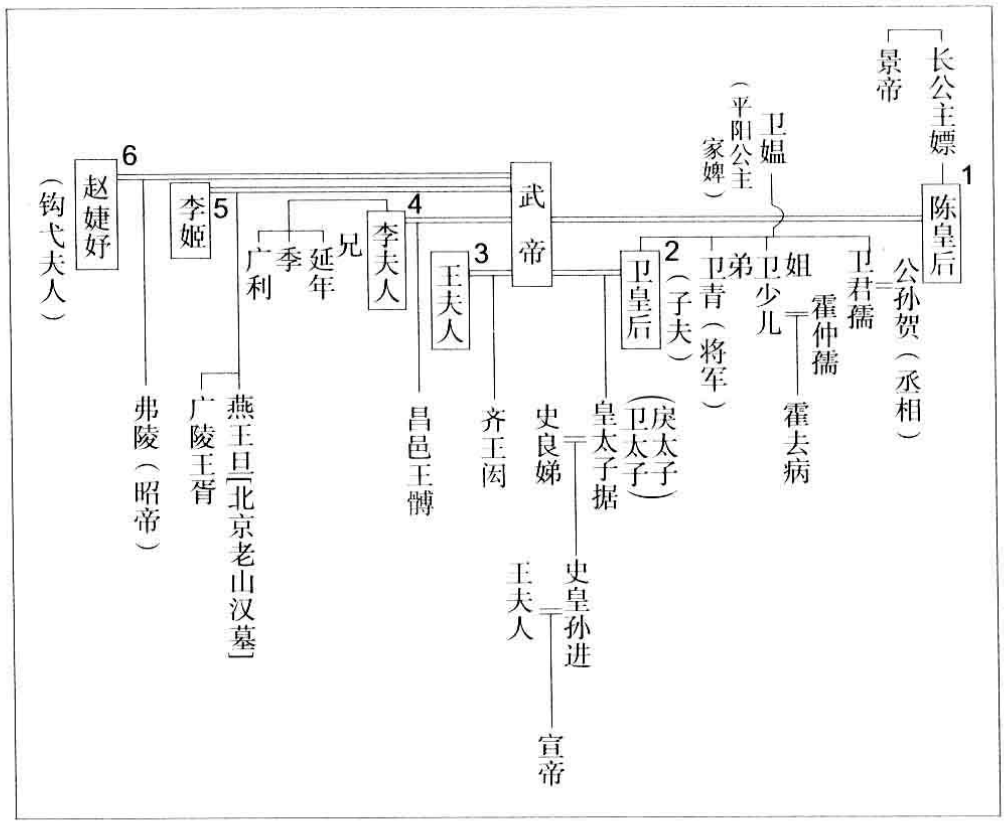
武帝时代的结束

武帝在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于长安以西的五柞宫。这是一座因五棵柞树并立而得名的离宫。武帝在未央宫前殿出殡，三月下葬于茂陵，

125 茂陵　边长 230 米，高 46.5 米，在西汉十一陵中格外壮观

十六岁即位后在位五十四年，终年七十一岁。他是秦始皇以降在位期间首次超过了三十七年的皇帝。较五十岁的秦始皇而言，其追求长寿的实践应该说是成功的吧。五十四年之间，武帝的臣下已有许多长眠于茂陵的陪葬墓。如卫青、霍去病是也。为武帝效力而未能进入陪葬墓区的人也很多。张汤、张骞被埋葬在了故乡。张骞的墓在汉中。

武帝之子除了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三王之外，还有太子据（又称卫太子、戾太子），以及与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髆。征和二年（前 91）暴发的巫蛊事件，迫使卫皇后与其子太子据自杀。所谓巫蛊，指的是把虫放入容器，使其互食，用剩余者诅咒于人，以期达到杀人目的的方法。据说使者江充在太子宫殿中挖出了蛊。受这一事件牵连，死者数万。卫皇后的墓在长安城南，未能进入茂陵。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得宠，但未当上皇后就去世了。茂陵周围没有皇后陵，仅有李夫人墓孤单单地立在那里，其子也英年早逝。武帝六十之后丧失太子，最终的继位者是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之子。武帝六十三岁所生此子，八岁即位，成为昭帝。



126 武帝系谱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司马迁也未葬于茂陵陪葬区。而且司马迁的死与其生年都不十分清楚。不过，他死于武帝死亡前后是肯定的。有人说在武帝末年，也有人说在昭帝初年，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史记》既没有记载武帝之死，当然也没有记司马迁自己的死。司马迁完成了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著作，书名本为《太史公书》，《史记》是魏晋以后的名称。当时的书籍是写在竹简、木简、绢帛上的。《史记》不称“卷”而称“篇”，所以应该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

此书的分量可以从一枚竹简的长度和文字数来判断。汉代竹简的长度基本上是一尺，即二十三厘米，一般用于书写公文。

二尺二寸，即五十六厘米长的简用于书籍；三尺，即六十八厘米简用于律令文书。所以从一束简的长度可以知道其文书大概的内容。1972 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现了两座西汉墓。一号墓出土了约七千五百枚竹简，二号墓三十二枚竹简。二号墓出土了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的历谱，两墓都出土了钱币，不是五铢钱（元狩四年）而是三铢钱（元狩三年〈前 120〉），证明是武帝初年的墓葬。一号墓出土的竹简长 27.5 厘米，宽 0.5 至 0.7 厘米，厚约 1 至 2 毫米，长度相当于汉的一尺二寸。是由三道编绳编联的简册。

这些竹简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史记·孙子列传》记载了两位兵法家孙子。一位是春秋时期的齐人孙武，另一位是孙武的子孙、战国时期的孙膑。一般说的“孙子”多指孙武。孙武效力于吴王阖闾，官至将军，著有兵法十三篇。孙膑效力于齐威王，攻魏时有功。长期以来虽然有着一种否认两位“孙子”存在的观点，但是作为现在《孙子》十三篇的原型的、汉代两部兵法书的竹简都已经发现了。武帝时期，主父偃在论述反战论时曾引用兵法“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一句，就是《孙子》第十三篇《用间》中“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一句。

此事例也为我们认识同时代的《史记》提供了参考。比照孙子竹简的话，二十七厘米有余的竹简一行以书写三十五字估算的话，《史记》一百三十篇相当于一万五千枚的分量。据说武帝时，

东方朔上奏了三千枚的简牍。其文书由两个人抱来，武帝看一遍就花了两个月。《史记》的分量是其五倍，一共有两部，正本埋藏于名山，副本收藏在首都。

竹简本原始《史记》在将来出土之前是无法见到的。本书的叙述至此始终是离不开《史记》的，而欲知武帝以后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依赖于《汉书》。

武帝在位超过了半个世纪，如同谥号“武”所示，他在位期间在四方边境不断地挑起战争。他本人甚至亲率十八万骑兵巡视北边长城，是一位极富行动力的君主。秦始皇时期只不过进行了与匈奴、百越的南北两次战争。武帝的战争目的却是在东西南北全面地扩张领土。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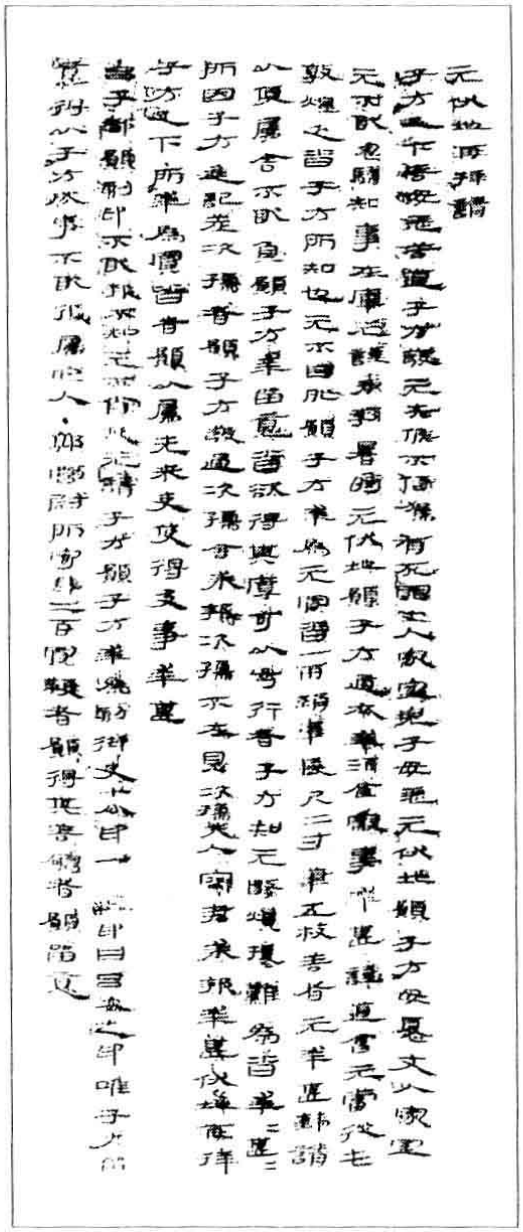
从后宫之窗见到的帝国行踪

汉帝国的中枢与后宫

从《史记》到《汉书》

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记》中，有着本不可能出现的武帝和司马迁死后的一些内容。司马迁的《史记》仅仅记述至武帝太初年间，这一时期之后的内容是司马迁之后的人们补写进去的。因为《史记》仅记述至西汉王朝半途，所以有些人总想把武帝以后的历史续写上。即使这样还是有人不满足，而写了《史记》的续编。刘向、刘歆父子，以及扬雄等人的续篇一直写到西汉末的哀帝、平帝。然而，他们写的续篇都不能令人满意。况且还有个如何评价篡夺西汉政权的王莽新王朝的问题。

东汉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从此可以将西汉作为一个王朝



127 敦煌悬泉置发现的帛书私人信件
元致子方的信。开头说："元伏地再拜请子方足下"，要求购买沓和笔（《文物》2000年第五期）

予以总体性记述了。光武帝时的班彪撰述了《后传》六十五篇。进而，东汉明帝任用班彪之子班固为兰台史之官，令其撰写了西汉王朝史书《汉书》一百篇。书中用十二《本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总括了西汉高祖至王莽之间十二世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如同《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著作一样，《汉书》也是班彪、班固父子的著作。班固在父亲死后，继承其遗志续写《汉书》。班固也像司马迁一样有过下狱的经历，罪名是私修国史。以个人名义编纂《春秋》那样的史书，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对西汉一代的评价，必须站在东汉王朝的立场予以总结。兰台令不过一百石之职，比太史令地位低得多。

如此，我们要了解武帝以后的西汉王朝史的话，就必须依靠《汉书》。然而，《汉书》有着《史记》所没有一大缺点。即班固是依照五经，即儒学思想进行记述的。作为中国王朝第一部、第二部正史的《史记》、《汉书》，

因为同是纪传体，所以可用来进行比较之处很多。但是，《史记》是旨在以《春秋》笔法记述，所以与五经体系的儒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与此不同，《汉书》则是在五经体系之中进行记述的。班固本人就说他是以五经为纬（横线），帝纪为经（纵线）的。《汉书》的“书”也就是五经《尚书》的“书”。

对于司马迁生前被匈奴捕获、在他死后仍然活着的两位人物，《汉书》作出了相互对照的评价。一位是司马迁曾为其辩护的李陵，一位是司马迁并未提及的苏武。

忍受屈辱的李陵
贯彻信义的苏武

天汉元年（前100），苏武作为武帝使者被派往匈奴。翌年，李陵投降匈奴，并娶单于女儿为妻。李陵本人也着胡服、结匈奴式发型，成为匈奴人。不仅服从匈奴的习俗，他还当上了右校王，受到单于优待。相比之下，苏武据说牵涉到匈奴领地汉人的反乱事件，但并未降伏，直至最后坚守汉的使命。《汉书》卷五十四将此二人收入了同一列传。认为李陵被捕而投降匈奴是可耻的行为。苏武未屈服于单于，被幽禁于穴窖、没有饭食。据说苏武被流放于北海无人之地，仍持汉皇帝信节牧羊。苏武的信义得到《汉书》的赞扬。

匈奴一方掩盖了苏武的消息。苏武还活着的消息，直到昭帝时期才偶然传到汉朝。昭帝在上林苑狩猎时，捕捉到一只大雁，发现雁爪上系有帛书的书信，信中写着苏武尚在人间的消息。因

为这一故事，“雁书”后来成为了书信的代名词。当时还没有进入纸的时代，仍处于竹帛、也就是竹简和帛书的时代。竹简或木简不仅重而且体积大，帛书由于是丝织的质地、轻便还可折叠。就书信来说，帛书更具优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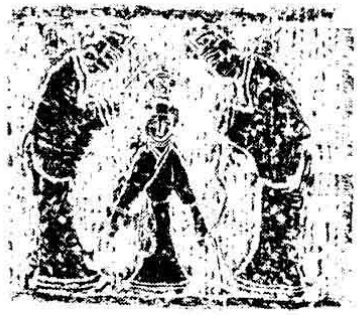
敦煌出土了帛书私人信件。奥利尔·斯坦因发现的两件之外，1979 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火台又出土了一件，1990 年在悬泉置也有发现。悬泉置发现的信件，长 34.5 厘米，宽 11 厘米，呈折叠形状。所谓书信，是写在纸上的；书简，则是竹简。此外还有帛书，内容是请对方帮助购买家乡的鞋和笔云云。

投降匈奴的汉人很多。匈奴虽得到了汉的丝绸、谷物的物品，但从活人那里可以得到汉的情报，还可以感受汉文化。如此，超越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对立，匈奴的社会和国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匈奴一方也有许多希望投降汉朝的人。此时匈奴与汉之间已经不再是以长城划界的关系了。

少年皇帝与霍光政权

从武帝之死（前 87）至王莽建立新王朝（公元 8 年）的九十五年又是怎样的时代呢？武帝有意识效法了秦始皇，建立了将秦帝国大大扩充了的汉帝国。武帝的帝国是按照如下顺序被继承下来的：首先，是昭帝十四年（八岁即位，在位十四年，二十一岁死去〈以下同〉）、宣帝二十五年（十八岁、二十五年、四十三岁）、元帝十六年（二十七岁、十六年、四十三岁）、成帝二十六年（二十岁、

二十六年、四十五岁）的顺序；进而是哀帝六年（二十岁、六年、二十五岁）、平帝五年（九岁、五年、十四岁）等短命皇帝的在位；最后，被外戚王氏切断，刘氏王朝的前半段结束。



128 山东周公画像石
功勋卓著而未即王位，仅是辅佐兄武王之子成王（中）实行善政的周公（左）和召公（右）

首先继承武帝的是八岁即位的少主，即少年皇帝昭帝。支持他的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仅一年死去），还有左将军上官桀。他们的墓都矗立在茂陵的陪葬墓区。

霍光是霍去病将军的异母弟。武帝曾赐霍光一幅画，是让画工描绘的周公旦背负着幼年成王、朝见诸侯的场景。山东东汉画像石上也可见到这一场面。当时霍光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是武帝希望自己起到周公旦的作用。因为自己毕竟不具有周公旦那样王叔的亲戚身份。武帝死后，八岁的太子继承皇位，霍光登上了前台。八岁皇帝的皇后是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六岁的女儿。由于霍光的长女是上官安的妻子，所以皇后是他的外孙女。对霍光来说，昭帝是他孙子的辈分，虽然不是很近，又确实有着与皇后的亲戚关系。

霍光身高七尺三寸（167厘米），矮小而皮肤白皙，对行戴冠礼时八尺二寸（188.6厘米）的昭帝须仰视。霍光下颚及两鬓蓄以浓厚的胡子。汉代男性一般没有秦代男性那么喜欢蓄胡须，多只限于蓄口胡而已。与兵马俑士兵的胡须相比，汉代士兵、官吏

的胡须较为雅致。霍光为人很具威严。昭帝二十一岁英年早逝，立昌邑王刘贺为帝。

武帝之孙刘贺虽暂时取得了皇帝的玺印，但仅仅三日之后就以性格淫乱为理由被废了，另立宣帝，霍光将小女儿送进宣帝的后宫，成为霍皇后，终于确保了自己的外戚地位。

此时被立为皇帝的宣帝即幼时遭巫蛊之祸入狱的武帝曾孙、亦即戾太子之孙。宣帝，名病已，这实在是一个表达其幼年不幸的名字，所以后来改为“询”。若不是御史大夫丙吉的庇护，他是走不上皇帝道路的。

十八岁的刘病已从长安尚冠里被招入未央宫。由于他不具太子身份，不可能直接成为皇帝，所以首先在形式上封阳武侯，取得列侯的爵位。然后，接受群臣献上的皇帝玺绶，登级帝位。当时支撑刘氏王朝渡过危机的官僚，都得到了褒赏。也许是为了亲自确认与武帝的直系关系，宣帝将武帝庙定为世宗庙，还在武帝巡行过的郡国建庙。曾供职于武帝、昭帝、宣帝的霍光，成为了刘氏王朝的救世主。立皇太子时，赐予庶民家继承人一级爵位，诸侯王黄金一百至一千斤不等，列侯八十七人分别获得黄金二十斤。

霍光的墓在武帝茂陵陪葬区靠东边的位置，距由他保护过的昭帝的平陵也较近。这样的位置看来也反映了他的地位。

与霍光同时保护昭帝的顾命大臣还有金日磾。汉代金姓很罕见。他本是匈奴休屠王之子，匈奴浑邪王杀了他父亲降汉时，他

也被抓而成为饲养汉马的奴隶。当时虽然仅十四岁，作为匈奴的孩子，骑马已经很熟练了。儿时的他就骑着羊拉弓射鸟、射鼠；稍微长大后可以轻松地射狐、兔，这样一个游牧民的孩子深得武帝喜爱。由于其亡父休屠王在祭天时曾使用金人，所以武帝赐予他金姓。这样一位匈奴人却得以在武帝茂陵拥有与卫青、霍去病并列的墓地。

《盐铁论》与专卖制的废止

元始六年（前81）昭帝曾向地方的“贤良”、“文学”询问民众都有哪些疾苦。当时，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作为政府一方，与“贤良”、“文学”等地方知识分子之间围绕专卖制的是非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贤良”、“文学”总共六十余人，来自全国各地。后来宣帝时期的桓宽将争论的情况汇集为《盐铁论》，这是一种以对话的形式记录双方对各种问题所提观点的文章。

“文学”们抨击了国家与人民争夺商业利益的做法，主张停止国家的盐铁专卖、均输（向物资不足地域输送物资，以保持物价平稳的政策）。御史大夫一方则指出正是来自专卖制、均输法的物质利益保证了对匈奴战争的费用，采取了正面对立的态度。其结果，仅仅废止了酒专卖制（即“榷酤”），允许民间从事酒的买卖。一升（约日本的一合）酒的价格为四钱，卖酒者必须申报营业额。“贤良”、“文学”背后有霍光的支持。最早提出盐铁论建议的是杜延年。他是在霍光掌握政权的形势下，能够控制政治均衡

的人物，他上奏的上官桀谋反事件，是由霍光处理的。对掌握内朝权力的霍光，外朝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予以了反抗。强权皇帝的时代结束了，少年皇帝周围的官僚也就强硬起来了。

武帝时代的丞相即使登上了最高位置，也都一个一个死于任期之内。田蚡（薨）、公孙弘（薨）、李蔡（有罪自杀）、庄青翟（为避汉明帝讳，《汉书》改“庄”为“严”，有罪自杀）、赵周（下狱死）、石庆（薨）、公孙贺（下狱死）、刘屈氂（下狱腰斩），不断发生异常事态。公孙贺因儿子诅咒武帝罪，而连坐死于狱中。刘屈氂因有人告发其夫人诅咒武帝，被腰斩于长安东市。

后宫的等级社会

皇后的“后”是“后土”，即大地的意思。与“皇帝”这来自上天权威的称号相对，“皇后”是来自大地的称号。皇帝称号虽开始于秦始皇，但那时还没有皇后的称号。不仅如此，就连秦始皇夫人的存在，在史书中也没有记载，以致成为一大历史疑团。所以皇后的称号，晚于皇帝而产生于汉代。

西汉武帝、元帝时期，在号称“掖庭三千”的后宫，众多女性之中皇后仅仅一人，其他都统称“夫人”。后宫女性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且其特点在于这一金字塔是一座伴随着皇帝之死、仅限于一代就崩溃的建筑。十三岁至二十岁的女性中容姿端丽者被集中至此。后宫崩溃之后的女性，进入死亡皇帝的园陵侍奉，死后葬于皇帝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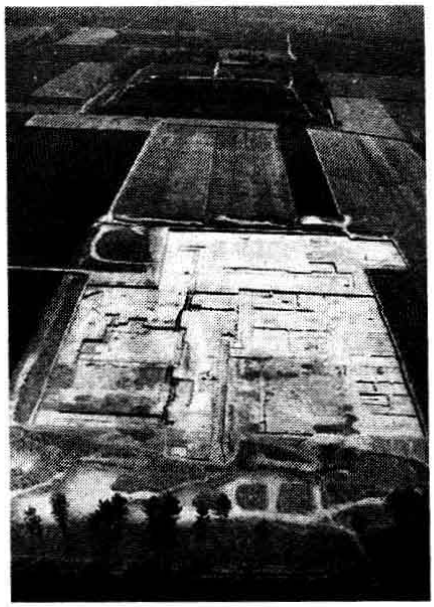
地位高的女官葬于陵园司马门内侧。也有被允许回归民间再嫁的。皇帝死后留下来的只有皇帝母亲的皇太后，如果祖母活着的话还有太皇太后。如同皇帝称“帝”一样，皇太后的“皇”字省去但称“太后”的情况很多。她们死后，被合葬于已亡皇帝的陵墓。虽说是合葬，但并不是埋入同一墓室，而是在皇帝陵旁另筑新坟下葬。

后宫与内朝的宫殿配置

后宫亦称“后庭”，位于皇帝正殿的未央宫后（北）方（参见图 55）。共包括八个区域，皇后居住于椒房殿，称为“中宫”。椒房的“椒”即花椒，以其叶和果实有香味，而将其涂于宫殿墙壁，燃烧还可取暖。据说由于花椒结的果实很多，象征子孙繁荣，所以很适合皇后住所。

前殿的高台（南北 400 米，东西 200 米）北面最高，有 15 米，南面是缓坡的斜面。皇帝居于此处的“宣室”、“温室”、“清凉”各殿。皇帝在前殿面朝南从事政务，向后观望的话，映入眼帘的正是后宫的位置。椒房殿遗址称为未央宫二号址，位于未央宫前殿以北三百六十米处。如今尚能见到散乱的铺地砖。

椒房殿的正殿建于东西 50 米、南北 30 米的夯土地基之上。再现此建筑物的话应该是这样：皇帝从南边跨度为 23.5 米的门阙进入宫殿。这是一处出入都要经过严格检查的场所。建筑物本身由立柱与墙壁围筑而成，建筑周围环以方砖铺地的回廊，屋顶瓦上可见“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的文字瓦当。屋檐下有小



129 椒房殿遗址　皇帝正殿未央宫前殿后方是所谓的后宫，后宫正中是皇后居住的椒房殿（《汉长安城未央宫》）

鹅卵石铺成的散水。东侧有一眼深约八米的水井，给水排水设备完善。排水沟流入北侧的水渠。正殿以外，在北侧还有附属建筑。

皇后以外的其他夫人住在掖庭殿。宫殿之中有称为“舍”的建筑，婕妤（女官名）居增成舍，昭仪（女官名）居昭阳舍。即便升格至皇后，也会由于各种情况遭到冷落，能否得到皇帝宠爱是决定身份高低升降的关键。景帝的皇后，先是薄皇后，后来是取而代之的王皇后，武帝的皇后也是从陈皇后变为卫皇后，宣帝也是从许皇后、到霍皇后、又到王皇后。围绕着唯一的皇后位子进行着争斗。被废黜的皇后从后宫宫殿被赶出，移居未到央宫殿区北面的杜宫或北宫。唐代颜师古认为北宫在未央宫之北，据此制作了长安城宫殿位置图，然而根据近年的调查，得知是在东北边，予以了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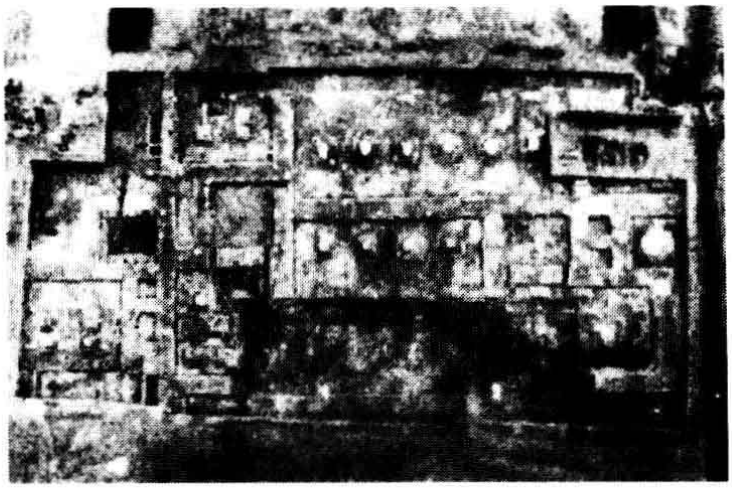
随着皇帝的死去，皇后从后宫移居长乐宫殿区内的长信宫，称为皇太后（太后）。长乐宫殿区的中央由连接直城门与霸城门的东西向 45 至 60 米宽的干道分割开来。东边霸城门附近的城墙是长安城中夯土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宫殿区内发现了三座大型建筑遗址。太后的居住的正殿在霸城门附近。遗址东西长 116 米，南北长 197 米，南北排列着三处建筑。由于位于未央宫的

东方，所以称未央宫为“西宫”，称太后的住所或太后为“东宫”。“后宫”、“东宫”的名称都表示了其与未央宫前殿的位置关系。上官太后和元太后都住在东宫。太后掌实权时期，汉的传国玺也收藏在此。

汉帝国中枢之中央官厅的构成

未央宫前殿西侧分布着中央官厅，这里是汉帝国的中枢机关。距未央宫前殿和后宫最近的是掌管帝室财政的少府。西汉时期，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是完全分开的，其比率也是对等的。帝室财政的财源来自山海、湖沼等自然资源的税收、市场的税收以及儿童人头税的口赋等。由于盐、铁也是自然资源，本是少府的税收来源，可是武帝实施专卖制以后，移交给了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皇帝、皇室、后宫的女性的生活费也从少府收入中支出。

在椒房殿以西 350 米处发掘了少府官厅遗址（未央宫四号遗址）。遗址东西长 110 米，南北长 58 米，散乱着大型砖、柱础石以及五角形给水、排水管。出土的 112 枚封泥中有多枚“汤官饮监章”。“汤官”是负责供应饼、果实等饮食的职官，因其隶属于少府，所以将这里定性为少府遗址。不仅限于文书，食物装入器皿封印时也要在结扣上封以黏土、盖章。如此封印的黏土块叫做封泥，由于开封时不能解开结扣，所以必须剪断细绳。少府所属职官除汤官之外，还有尚书（文书）、中书谒者（上奏文书）、符节（符契）等文书行政管理，太医（医生）、太官（御膳）、导



130 少府遗址全景　汉帝国中央官厅中掌管帝室财政的机关是少府。东西长 110 米，南北长 58 米的遗址散乱着柱础石、砖、排水管（《汉长安城未央宫》）

官（选米）、胞人（厨房）、御府（皇帝衣服）等一般生活管理，乐府（音乐）、左弋（狩猎）等祭祀狩猎管理，若卢（兵器）、考工室（器械）、左右司空（土木）、东织·西织（织物）、东园匠（随葬器物）、尚方（御物制作）等器物制造与建筑，都水（水利）、上林苑的池监（池塘管理）、钩盾（御苑）、均官（物价调节）等自然资源与物价管理，还有永巷（掖庭）管理后宫，黄门（宦官）、中黄门负责后宫与前殿的联络。黄门是涂成黄颜色的宫城门，也用来称呼出入此门宦官的官职。在皇帝正殿与后宫近旁的少府，是有着多方面执掌的重要机关。武帝死后，大司马霍光于军事权力之外，通过掌握尚书控制内朝，凌驾于外朝诸官厅之上。

少府西侧的未央宫殿区内分布着外朝的中央官厅。未央宫三号遗址在接近西城墙的位置。1986 年这里发现了五万七千枚骨签，是从武帝时期至西汉末年遗物。或是骨制的货签，或是弓两端用来挂弦的部件。长 5.7 至 7.2 厘米，宽 2.1 至 3.2 厘米，厚 0.2 至 0.4 厘米的小型物件。使用牛骨为材料，上面刻有武器的种类、规格、官营制造工厂名，记录了从地方向中央供应的内

容。其中包括有弩弦强二十石（约六百公斤）、射程距离三百五十四步（约四百八十米）的强杀伤力武器。以大量强杀伤力武器保卫权力的中枢机关。外朝中央官厅是以丞相（行政）、御史大夫（副丞相）、大司农（原为治粟内史，掌管财政）、廷尉（审判）、大鸿胪（原为典客、外交）等为主的机关。在失去武帝那样强权皇帝的昭帝时期，外朝的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与控制内朝的霍光形成对立。

131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的骨签　使用牛骨为材料，刻有武器的种类、规格、制造工厂名。也有观点认为是骨质货签的

中国古代的女性

从后宫观察西汉五十年政治中的女性

八岁昭帝的皇后是年仅六岁的上官皇后。昭帝二十一岁去世后，昌邑王刘贺即位，上官皇后十九岁就当上了皇太后，又由于昌邑王旋即被废和宣帝的即位，她一下成了太皇太后。从皇后到皇太后，又到太皇太后历经四十七年没有被废。她是上官安与霍光的女儿所生，是得以从后宫观察西汉政治的少有女性。元帝建昭二年（前 37）五十二岁时去世，被合葬于昭帝的平陵。

皇后之下的夫人中居最高位者，在武帝时叫婕妤，下面是婬

132 灰陶加彩女子立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温柔的姿态使人欣赏到汉代女性之美

娥、傛华、充依，此后的元帝时期又在婕妤之上加了昭仪。再下面的女官称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涓，即清纯）、共和、娛灵、保林、良使、夜者。高祖的戚夫人（戚姬）、薄姬，文帝的慎夫人，武帝的陈皇后、卫皇后之外还有李夫人、王夫人、赵婕妤等等，其中成为皇太子的是赵婕妤的儿子，即昭帝。成帝的班婕妤是从少使升为婕妤的。元帝的冯昭仪从长使数月之间成为美人，又升为婕妤、昭仪的。

侍奉于中央官厅或宫殿的女性称为“宫人”，以区别于皇帝掖庭的女性。赵飞燕是从长安的宫人进入后宫的，这位赵飞燕在当上皇后时，侍候在她身边有官婢曹晓、道房、张弃等。

法律优先的夫妇之义

做一名官僚的妻子可免除死罪。孔子后裔、成帝时期廷尉孔光救了淳于长的小妻（妾）。围绕这一判决他的判断与中央官僚的顶尖人物发生了正面冲突。

淳于长在大逆罪被发现之前，已经与小妻迺始等六人断绝关系，由其改嫁了。按丞相和大司空的主张，法律适用于犯罪发生的时点，所以犯罪时的妻子应该连坐。大逆罪规定父母、妻子、同产不论年龄一律弃市。然而，孔光以儒教解释法律，

认为夫妇是由“义”结成的，如果没有了“义”可以分离。淳于长在没有触犯大逆罪之前，已经与迺始断绝关系并由其改嫁，这意味着夫妇间纯粹的“义”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判其妻死罪是不正确的。皇帝认可了孔光的判断。

侍中卫尉淳于长，是作为卫尉统辖长安城内各宫殿的警卫兵，作为侍中他往来于皇帝与后宫之间。由于他谋划了被废许皇后以“左皇后”复起的事件，被判为大逆罪，死于狱中。淳于长当初由于拥立身份低微的赵飞燕为皇后，停止了耗费巨资的昌陵陵邑的徙民（向陵邑移民）计划等功绩得到赏识，升为中央高官。但是，淳于长权力增长之后身边养了许多妻妾，不断受到淫乱的非议。淳于长与许皇后的姐姐私通，甚至将她作为自己的小妻。被废的许皇后曾通过姐姐赠与淳于长大量金钱，请求他向皇帝疏通恢复原来的身份。

成帝猝死之谜

绥和二年（前 7）三月丙戌，四十五岁的成帝死于未央宫。《汉书》卷八《孔光传》载曰“上暴崩”，即猝死。《汉书·外戚传》载：“帝素强，无疾病”，采取了对其猝死存疑的记录手法。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一方面是左将军孔光与赵皇后（飞燕），以及由二人拥立的太子定陶王；一方面是元太后与王莽联合的势力。成帝在夜里还好好的，撰写了任命孔光为丞相、封其为博山侯的赞辞，并亲手交给了孔光本人。到了乡晨（黎明前）就不能自己穿衣，甚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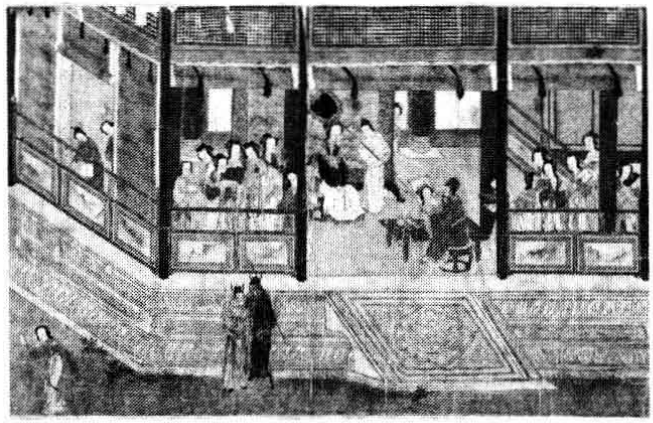
不出话了。昼漏上十刻（约早晨四点半）死亡。民间马上怀疑此事为赵飞燕妹妹赵昭仪所为。成帝死后，皇太后（元后）让大司马王莽调查成帝猝死事件时，赵昭仪自杀。

赵飞燕本是侍奉于长安官厅的宫人，是从阳阿主家来的女子。她侍奉于阳阿主家时，学习了歌舞。号称“飞燕”，顾名思义，形容她轻快的舞姿。成帝微服路过阳阿主家门前时，偶见飞燕的身姿，于是先后召她与妹妹一起入宫为婕妤。由于这种经历，成帝欲立其为皇后时，遭到皇太后的反对。然而，借助淳于长的力量，她终于当上了成帝的皇后。虽然没有生子，仍然受宠十数年。

世代传颂的王昭君故事

《昭君出塞》是由现代作家曹禺撰写脚本的京剧剧目。西汉元帝时期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的故事，自古以来震撼着无数人的心弦。唐代的李白、白居易都曾咏唱过王昭君。大江朝纲（十世纪的日本学者）的七言律诗中也吟咏过王昭君，它不但被收入日本的《今昔物语》，还成为雅乐、能的演出曲目。王昭君的形象在金代宫索然《名妃出塞图》（由阿部收藏）、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卷》有所描绘。在日本也有菱田春草《绢本着色王昭君图》（山形县善宝寺、财团法人致道博物馆）、安田靫彦（足立美术馆藏）的绘画。

这位如此受人爱戴的女性的故事，在此不必重复讲述。这里只想对王昭君在汉代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后来又是如何被传



133 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中画师为王昭君写像一节

说化的问题稍作分析。关于王昭君的故事最基本的史料出自《汉书》卷九《元帝纪》的以下记载：

竟宁元年（前33）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仪，既伏其辜，德（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竟"通假"境"，取国境安宁之意），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檺为阏氏。"

这位王檺，南郡秭归县出身，字昭君。被元帝后宫选中，未得皇帝宠爱，嫁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皇后阏氏。然而，它还不是人们所最为关心的。

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积极请求迎娶汉氏女性，愿为汉婿。元帝将后宫良家女王嫱（即檺）、字昭君，赐予单于，单于大喜。其后，王昭君取得宁胡阏氏之号，生儿伊屠智牙师，即后来的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即位二十八年，建始二年（前31）去世。呼韩邪单于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即位之后，以王昭君为妻。生有二女，长女叫须卜居次，次女叫当于居次。"须卜"、"当于"各为其丈夫的氏族名。

从以上《汉书》的记载虽然看不出王昭君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后宫、进入匈奴之地的。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汉与匈奴之

间以后宫女性为中介达成了姻戚关系。而且由此可知，尽管王昭君并非汉刘氏女儿，但由于是刘氏皇帝的后宫，所以作为与汉氏（汉室）的正式婚姻关系是被认可的。王昭君入匈奴之后，亲身实践了匈奴人娶父亲遗孀后母（非生身母）为妻的婚姻制度，成为单于父子两代的妻子。

王昭君如此非凡的生活经历后来被传说化了。《西京杂记》记载了元帝后宫为宫女画肖像的画工。安陵县陈敞、新丰县刘白、龚宽比起画人物更擅长画牛马、飞鸟。杜县阳望、樊育能够巧妙地运用绘画色彩。最为出众的是不论美丑老幼，都能逼真地画出模特人物肖像的杜陵县画工毛延寿。这里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画工的名字，他们都居住于长安周边地区。

据说在高祖被匈奴包围时，陈平就曾让画工画了美女，悄悄送给单于阏氏。对阏氏说汉有如此的美人，高祖打算将她献给单于，以解眼前之围。阏氏唯恐失宠，就对单于说汉天子有神灵，想得到汉的土地是不可能的，试图让单于放弃对汉的兴趣。

远嫁北方游牧民并非开始于王昭君。皇帝以及刘氏诸侯的女儿称为公主，在此之前已经有武帝侄儿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宗室女儿，江都翁主）刘细君出嫁为乌孙王昆莫的妃子，号称乌孙公主。乌孙与匈奴同为游牧民，本来与大月氏都居于敦煌附近，汉为了抑制匈奴，有必要与乌孙联手。乌孙以一千匹马作为彩礼送来，汉将细君嫁给乌孙为妻。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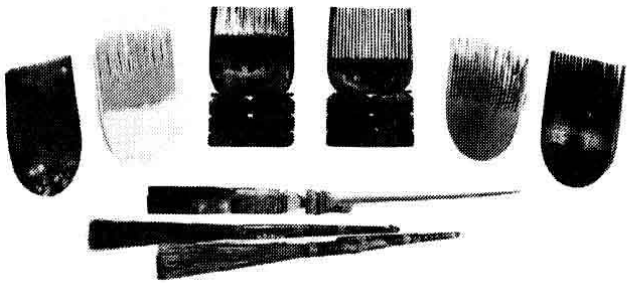
历代女性的化妆

如果考察中国古代历代女性化妆方法的话，对其因地域、时代喜好而流行的特点会有明显的感受。汉代宫中女性的化妆与唐代女性显然不同。

唐代宫中女性的化妆极为细致。其顺序是：一、面部全部抹铅粉铺粉底，二、两颊涂上圆形胭脂红，三、描眉，四、额头贴花钿（花纹发饰），五、靨（酒窝）中点红点，六、鬓角描出斜红（新月形红色），七、涂口红。唐代女性化妆的模样在西安、敦煌莫高窟、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壁画以及唐三彩上都可以见到。若追溯唐代这种华丽化妆源头的话，汉代女性化妆的特征就浮现了出来。

伏羲、女娲的人面蛇身男神、女神模样多见于历代绘画。较早者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画中的女娲像（无伏羲）、洛阳卜千秋西汉墓壁画、四川省崇庆县出土东汉画像石、南阳东汉画像石、徐州东汉画像石的伏羲、女娲像，下至唐代有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饶有兴味的是，从这些女性的化妆和服装可知，虽然是神话上的同一人物，却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汉画像石由于色彩脱落，不清楚面部化妆的样子。马王堆、洛阳汉墓所见人物的化妆方式很清楚。马王堆帛画中间最上方的太阳与月亮之间，绘有一女性。其服装上下相连，宽袖深衣，头发从后面一直垂到下半身，脸部没有化妆。洛阳汉墓的女性身着汉代一般的深衣，盘着发髻，两颊上隐约涂红，口红仅涂于唇中央部分。



134 化妆工具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梳子齿密度一厘米的距离内有三齿的称为“梳”，六至七齿的叫做“篦”，十二至十三齿的为“箆”（《汉代文物大展图录》）

再看唐代的女娲，反映出吐鲁番的地域性，明显是一种西域风格鲜艳花哨的化妆。身着敞胸上衣与裙子的女娲，不仅有花钿、浓厚的圆形颊红、嘴唇涂满口红，而且眼睛周围也抹上红色。

汉代女性的化妆，当初是继承战国以来传统的化妆方法，以米粉为白色底粉，涂以油脂、丹砂的口红，不剃眉而描眉黛。但是在与西域交往之后出现了变化，吸收了游牧民族女性习惯。传入汉代的游牧民族女性化妆法，是使用颊红和胡粉。

《史记·匈奴列传》的《正义》所引《西河故事（或旧事）》中留下了汉军使匈奴人失去祁连山、焉支山之后悲怆的匈奴歌谣：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祁连山丧失了，六畜（牛马羊猪狗鸡）不再增加；焉支山麓是红花生长的地方，失去了那里，匈奴女性从此无法化妆。据说北方游牧民将花绞成汁，然后干燥为红粉，混以羊等动物油脂做成胭脂，涂于妇人面部。有趣的是“胭脂”又写作“焉支”、“燕支”，与匈奴单于夫人的称谓“阏氏”的发音相同。再说“胡

粉”，东汉《释名》解释曰：“胡粉，胡糊（稠粥）也，脂和以涂面也。”与汉族传统的白色米粉不同，混合以油脂而有黏性。与胭脂同样在寒冷干燥气候条件下，有着保护皮肤的作用。

制服暴龙

武帝以后，黄河下游屡屡泛滥。决堤的河段从武帝时期的瓠子，进而向下游移动。仅以宣房宫阻塞，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关于黄河洪水，现代人常提到河南开封附近的河段，而汉代比这里更为下游的河南省濮阳县一带，是屡遭洪水泛滥的地域。黄河在广大平原地区缓缓流淌，使得泥沙沉淀，河流阻塞。今天黄河虽已不再流经这里，但现在的地表仍是黄河留下的泥沙。

上文提及2004年3月笔者做过实地调查。从那红色沙漠似的古代黄河故道，再次感受到黄河的巨大。提到沙漠会使人联想到白沙，而过去黄河沉淀的泥沙是黄土，所以变成了红沙。在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墓葬，发现被葬者周围有用蛤贝排列出的龙和虎，作为中国最早的龙曾成为一时的话题。新石器时代的黄河，虽然在比这里更为偏西的地方流淌，但又使人感到这是暴龙黄河的象征。

黄河泛滥的最大原因正如“一石水而六斗沙”所形容的那样，黄河水中五分之三是泥土，水流越缓慢、堆积的泥沙越多，于是河床变浅，造成地上河。西汉末年贾让在上奏中提到遮害亭附近金堤的样子。“金堤”是以石与土构筑而成，形容它是一

座像金子一样坚固的堤防。一丈（10尺，2.3米）高的堤防，东面低处的堤防高达四至五丈（9.2至11.5米）。这一带的黄河的河床比民房还高，在地上河的地区筑建的堤防再高，也是有限度的。

关于治理黄河洪水的对策，朝廷内部由于对立意见的相互冲突而迟迟不能定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筑堤阻塞黄河激流，尽快让河水流入渤海；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寻找大禹治水的旧道，决开堤防分流河水，排除人为力量，任凭河水自然流动。为了修筑堤防每年要增加一亿钱的费用开支。如果决开堤防，对决堤之处置之不理是最容易的办法。但是那样的话，广大平原将成为贮水池，所以牺牲部分地区、使广大地区得救的政策是行得通的。

建始五年（前28）馆陶、东郡的金堤决口，造成四郡三十二县的地区受灾。平原地区如果发洪水，陆地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河堤使者王延世以装满石头的“蛇笼”用两船夹载投下，三十六天筑成堤防。这一年改元为河平元年（前28）。河南省内黄县至今还可见到汉代金堤遗址。

鸿嘉四年（前17），渤海、清河、信都各郡内的黄河再次泛滥。当时朝廷任其自然的意见占据上风，对决口之处未做阻塞处理。丞相史孙禁的意见是应该让堤防决口、使水从馆陶向北流，河堤都尉许商表示反对。还有意见认为应该遵从天意，任凭水势自由，最终无所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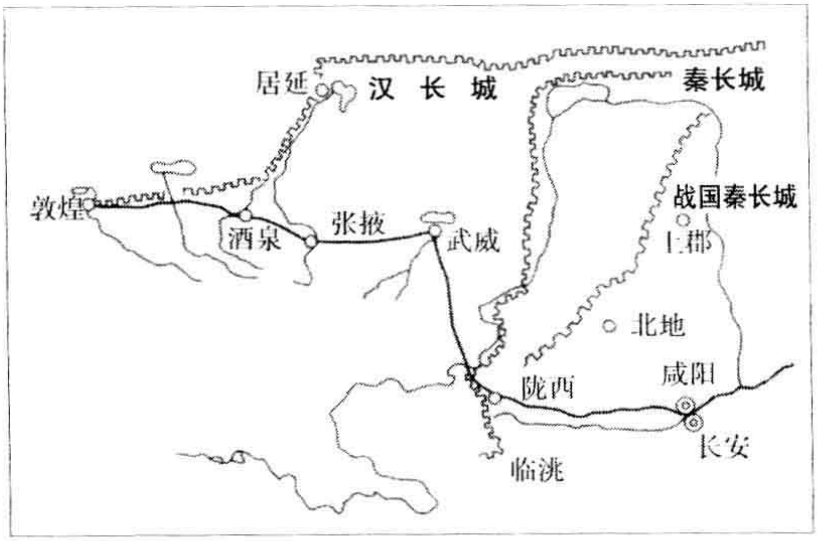
哀帝时待诏贾让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策。为了保住一部分地区，在决口时修复堤防的办法乃暂时性的下策。中策是考虑到百年之后的利益，多修渠道以减弱黄河水势，造水闸、兴修水利的办法。而考虑到千年之后的最上策，是在黎阳县的遮害亭决开黄河，让黄河向北流，以消除洪水危害。

从沉睡中苏醒的古代木简

敦煌汉简的记录

敦煌郡设置于武帝后元元年（前 88，一说：元鼎六年〈前 111〉），即武帝死的前一年，他晚年的最后时期。匈奴势力被排挤出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最西端得以设置大规模的绿洲据点。说到敦煌地名的由来："敦"，大也；"煌"，盛也。这的确是一座向西域显示汉王朝威严的都市。汉在敦煌设置了六个县，敦煌郡人口在西汉末为 38,335 人。这是一片为沙漠所环抱的巨大绿洲。

在敦煌有阳关、玉门关两所关卡。出自山岳地带向北流淌的小型河流，在平原地区广泛分散形成了敦煌绿洲。沙鸣山、莫高窟千佛洞处于靠近山岳的地方。再往西是阳关，这里今天依然可见到汉代的烽火台遗址。而从敦煌向北十公里、横穿沙漠的话，可见疏勒河向东西方向流淌，那里有汉代万里长城和玉门关遗址。玉门关是通往北方的门户。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敦煌的两



135 秦汉长城图

个关卡尚未建立。他是从陇西郡的萧关出发的。敦煌莫高窟第323窟所描绘的唐代“张骞出使西域”图（参见图106）中宛若从敦煌出关的样子，画得并不正确。

最初在敦煌沙漠发现木简的是奥利尔·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的第二次探险来到敦煌时，他发现了708（或704）枚木简，1913年至1915年的第三次探险时，发现了166枚。实物现存大英博物馆，沙畹、马伯乐、罗振玉、王国维、劳榦、迈克尔·鲁惟一、大庭脩等学者都对这批简进行过释读和研究。后来，1979年在马圈湾烽火台遗址又发现木简一千二百余枚。

1990年至1992年又从悬泉置的邮驿遗址的灰坑里发现二万三千枚庞大数量的木简。此前敦煌木简一直停留在一千枚左右，而不及居延出土的汉简，至此一下子接近了居延汉简的数量。敦煌悬泉置汉简的特征并不仅在于其数量。与长城沿线城塞历来出土的汉简不同，这批驿传设施出土的木简，当然在内容上有其不同之处。在驿传线上遗留下来的木简，是汉与西域的外

交记录。

敦煌作为与西域交通的门户，实际的活跃期是在武帝之后。敦煌通往西域的道路，有沿南山（昆仑山脉）以北的南道，也有沿北山（天山山脉）以南的北道两条。即所谓的西域南道与北道。

以天山山脉为中心来看的话，相对于天山北麓的草原之路而言，这两条道都位于天山南麓。从南道东端数起，顺序有鄯善（楼兰）、且末、精绝（尼雅）、于阗（和田）、莎车（叶尔羌）等城市；在北道，由东开始依次为：车师前国（交河）、渠犁、乌垒、龟兹（库车）、温宿、姑墨、疏勒（喀什葛尔）等。此外，还有一些离开道路的绿洲，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绿洲，数量在三十六国或五十国左右。这些可以知道名字的绿洲城市，大多分散在沙漠中距离湖泊、水源二三百公里范围内，近者相互间不足五十公里。

绿洲国家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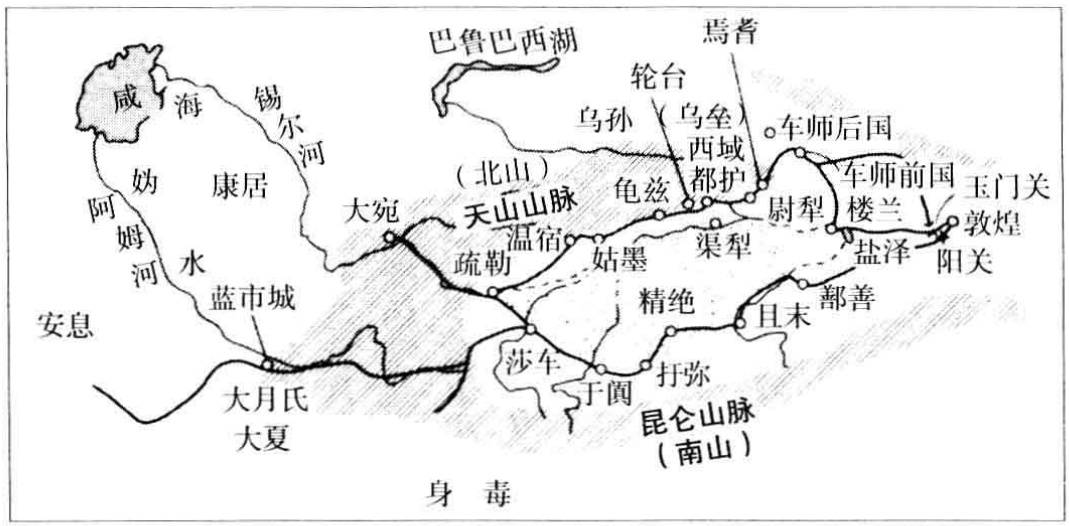
绿洲之间是沙漠，骑骆驼相互往来。城市就是国，其规模小的有一千多人口的且末、戎卢、渠犁，两千多人口的蒲类、渠勒、尉头，三千多人口的精绝等国。在绿洲超过一万人口的就算大国了。鄯善一万四千，莎车一万六千，疏勒一万八千，于阗一万九千，姑墨二万四千，焉耆三万二千，龟兹八万一千。同是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的西方则很不同：大宛三十万、大月氏四十万、康居六十万、乌孙

六十三万人。隶属大宛等国的城市有七十余座，在康居以春秋的王城为中心：向北行九千一百余里是夏的王城，向南骑马跑七天是冬的王城。都是由多个绿洲组成的国家。

大小各异的绿洲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且末的士兵仅仅三百二十人，精绝不过五百人。龟兹这一等级的国家有二万一千人的兵力。多数国家无法单独与汉抗争。尤其是那些位于交通要道的国家，独立自主是很危险的。他们的生存方式要么追随匈奴，要么追随汉这样的大国，或者相互间酝酿横向联合。与汉朝缔结外交关系的话，须向汉朝派遣王族、贵人为使者进贡，并且派遣王子作为质子。相反，作为回礼得到印绶以及黄金、丝绸等赏赐品而归国。

王族、贵人使者的一行中也夹杂有商人，好处在于可以与汉朝做贸易。由于使者往来的路上有危险，所以归国时有汉的使者同行保护。汉为了维系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往来，确保南北道安全就显得十分重要，要负责支给隶属国使节的口粮，还要应对他们出兵的要求。况且汉朝本身也要确保轮台、渠犁屯田士兵的军粮，还要让对方派出做向导的翻译人员。西域没有一种全域通用的语言，需要有能够讲汉语和西域诸国语言的翻译。因此在各国设置了“译长”。就汉朝来说经营西域固然是个负担，但让西域隶属于己的政治意义又十分重大。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在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所在地距阳关二千百三十八里，由此迎来西汉统治西域的重要转换期。长



136 西域绿洲城市图

官称西域都护，可以从敦煌以西的这个据点控制西域。“都”为统辖之意；“护”为守护的意思。郑吉是第一任西域都护。在敦煌悬泉置出土了廷尉寄给西域都护的“西书”（从西方送来的文书）通过驿站收发的记录。还有命令甘延寿在敦煌郡迎接西域天马的诏书。

往来于东西的外交使节提供饭食的记录中，有鄯善（旧称楼兰）王的使者，派往大宛的汉使者，大月氏、乌孙的使者。一次由汉使者带回来的疏勒国王子所赠的三头骆驼累得不能行走了。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文件也已经发现。还发现了一份有关大宛贵人乌莫塞献上的一头骆驼死于悬泉置的记录。还有一份允许乌孙、莎车王四名使者、十七个贵人献上的六头骆驼，康居王、姑墨王献上的骆驼入关的记录。骆驼在西域对汉外交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东西往来的交通工具，也是献给汉朝的十分重要的贡品。也许是考虑到了减轻运输途中喂养的工作量，所以献上的数量不多，因为献上数头之后在长安饲养繁殖应该更为合算

吧。另外，护送于阗王一行一千零七十四人的使者通过这里的记录、护送精绝王诸国客人四百七十人的记录都很有价值。还有一份文书记录了收发西域都护寄给卫尉属官紧急书信的内容。

纸未发明以前的书籍

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图书，都是西方书籍样式。即将纸页从中间一折两面重合起来，在书脊涂上糨糊制成的那种书籍。但是到图书馆的书库去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不同形式的书籍。所谓的“和书”，“汉籍”与西方书籍相反，纸页是向外侧折叠重合、然后用线缀合的，又称线装书。这是从中国传来的书籍形式。然而，这些都是用纸张装订的书籍，其实从书籍的历史来看的话，还有更早的书籍，在纸发明、普及之前的书籍是用线绳将木简或竹简编联制成的。

1985 年 9 月笔者曾到过甘肃省的敦煌。这里的沙漠之中浮现着绿洲城市，当飞机降落时可以从飞机上看到：沙漠的白沙与街道的绿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年降雨量仅十几毫米的极度干燥地区，南面祁连山脉的雪水就是生命的源泉。仅在泉水附近或河畔地区才能形成聚落。一旦水源干涸，人们就不得不为了寻水而举家迁徙。

从敦煌出发乘越野车横穿沙漠，到达汉代玉门关遗址。夯筑的关卡土墙遗址保存至今。由此出关就是西域的世界，就中原汉族人而言这是最后的要塞。他们憧憬的和田玉就是由此关卡进口的，所以叫做“玉门关”。北边很近处，汉长城在沙漠上直线

延伸出去。与在北京见惯的明代砖长城不同，这里是以土层与苇秆层交互层垒而成的素朴的古代长城，是防范北方游牧民匈奴入侵的防卫设施。这里一旦拂去沙土，你会发现数不尽的古代图书和木简。

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1941 年 12 月 25 日日本军占领香港的前一年，1930 年在敦煌东北的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万余枚木简，为了逃避战火被运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由于这里原是对匈奴最前线基地的居延城，所以称这批简为居延汉简，是与敦煌汉简比肩的重要的汉代木简文书。台湾学者后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得到一份外交文书。这是一份将十四箱木简作为贵重书籍寄存于此的重要证明信。直至 1965 年的二十五年中，一直没有开封地保存在那里。从近两千年沉睡中醒来的古代木简，这次又睡进了外国的图书馆。

回到台湾的居延木简在中研院台湾研究者手中，得到了科学的研究。木札上墨写的文字多有退色、难以辨认之处，近年研究者们成功地利用红外线成像仪予以了用肉眼或放大镜所无法做到的解读。他们还将木简文字与画像输入电脑，以便自由地进行检索。

中国古代史研究仅凭文献并非不能进行，研究秦汉史的话如果仔细地阅读《史记》、《汉书》就可以写出大量的论文。问题是这些由国家正式编纂的所谓史料，由于是按照一定目的编辑的，

137 敦煌悬泉汉简

所以有许多删节的地方。王朝内部权力之争是由正统地位一方予以记录的，对于民众反乱也是从讨伐逆臣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在木简中可以见到许多民众的名字。虽说文书本身是政府机关的文件，但毕竟由于没有经过史书的过滤，所以能够活生生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气氛。那些出于边境防卫被征发的民众的生活在木简上都有着具体的反映。一枚木简经红外线成像仪扫描之后，一直无法释读的士兵生活浮现而出。现代技术就这样使得那些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执掌地方政治的循吏与酷吏

另一方面从木简中我们也看到了对内地地方郡太守的评价。从中央派往地方者，如果三年赴任期内有成绩的话，就将得到评价。他们之中既有被民众认为宽厚、清廉而受到仰慕的官吏，也有以严厉统治著称者。处于两个极端的循吏与酷吏掌管着汉代的地方政治。

颍川太守黄霸因其任职地方人口增长，多出孝子、贞妇，没有重大犯罪而荣获天下第一的评价。他先后在任八年。南阳太守召信臣亲赴阡陌（耕地中东西向的田间小道），指导农业。在

郡内开水源引水，建水闸、堤防数十处，灌溉农田三万顷。为了防止水争，他还独创性地将均水契约刻石立于田埂。官吏、农民甚至称其为“召父”，可见其受到爱戴的程度。元帝末年他升任少府高官之后，废止了黄门艺人和太官的温室蔬菜栽培，由此节约了宫廷费用数千万钱，在中央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酷吏中有一位东海郡下邳县出身的严延年。这是一位曾在霍光拥立宣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过异议的人物。他曾出任涿郡太守。此地的大姓（豪族）西高氏、东高氏的势力极强，当地人称“宁可背叛二千石（郡太守），不能背叛豪族大家”。当地宾客做盗贼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旦受到官吏追捕就逃至高府。严延年到任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他令掾史赵绣调查高氏，掌握了其死罪的证据。赵绣起草了轻重两份弹劾报告藏于怀中，看着严延年脸色递上了那份轻的，严延年事先已经掌握了情况，让他从怀中掏出了那份从重处罚的报告。当日审判，次日清晨在市场处以死刑。诛杀两高氏各有数十人，郡中百姓无不震恐。

循吏黄霸与酷吏严延年所在的颍川与河南出乎意外地互相比邻。严延年对黄霸所受褒奖甚为不满。从东海郡老家来探访严延年的母亲，偶然见到处罚的刑场十分吃惊，认为他过于残酷。倒是严母因其贤母形象受到称赞，严延年兄弟五人都做了大官，人们称呼严母为“万石严妪”，称赞她养育了五位二千石太守。就在东海郡发现了相关内容的贵重文书。

出土文书所述

东海郡的地方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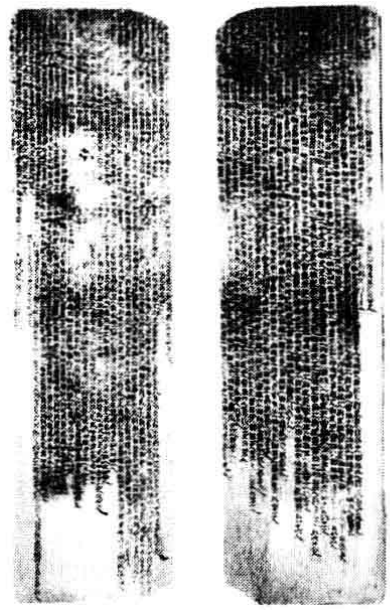
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出土了二十四枚木牍与一百三十三枚竹简。内容是西汉末期东海郡官署文书的副本。

这些文书除一枚木牍之外，都出土于六号墓。墓主是一位叫做师饶的人物，职务是成帝的时期东海郡的功曹史。出土文书包括该郡年统计文书的集簿、官吏名簿、所辖县官吏名籍以及不在者名籍，还有永始四年（前13）的武器库登记簿、赠钱名籍、神龟占、博局占，元延元年（前12）历谱，元延三年（前10）五月历谱、衣服疏（随葬品目录）、名谒，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赋等，可谓丰富多彩。墓主担负着东海郡基层政治的重要职务。由于是在地方被提拔的官吏，所以比那些从中央任命来的太守等长官更植根于地方社会，更注视地方社会的动向。

东海郡太守每到年度末要做一年的行政报告。从出土文书来看，全郡包括三十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东海郡东西551里，南北488里，占地大约方圆五百里，即方圆二百公里左右的面积。人口1,397,343人，266,290户。一年增加了42,752人，11,662户。男女比例为51：49，男性较多，年龄人口统计为：六岁以下占18.79%，八十岁以上占2.4%，九十岁以上0.8%。这份文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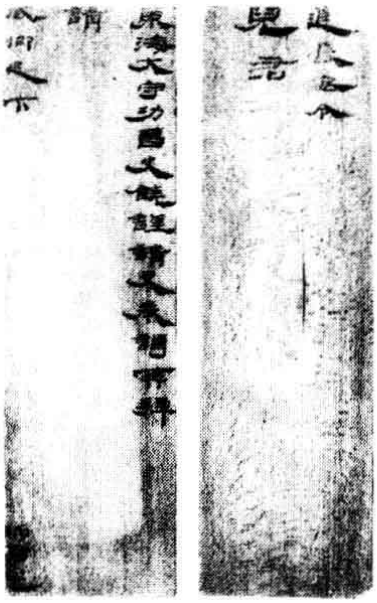
了解两千年前中国大致人口金字塔结构的珍贵统计数值。

男女比例自古以来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六岁以下的比率由于幼儿的高死亡率而偏低，八十岁以上的长寿年龄的比率出乎意料地高。1999 年中国五十岁（周岁）以下为 30%，日本 2000 年也超过 20%。日本 1999 年九十岁以上占 0.005%，所以 0.8% 是相当高的了。当时的九十岁以上年龄层应当是于公元前 100 年，即武帝强盛期出生的一代。



138 尹湾简牍　包括有东海郡各县官吏名簿、统计文书、武器库登记簿、历谱等形式多样的文书（《尹湾汉墓简牍》）

东海郡有三十八个县和十八个侯国。这一地区的行政由 2203 个官吏承担。各县在县令（一千石）或县长（四百石。一万户以上的县长官为“令”，以下的为“长”）之下有丞（二百石）、尉（二百石）等长吏，此外还有令史、狱吏、官啬夫、乡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亭长等掾史。县长吏中是没有东海郡出身人士的，这关系到本籍官僚任用的原则。出土文书中有名簿。盐官、铁官的长、丞中也是没有东海郡出身人士的。这是出于保证公平的考虑。郡的一年的收入是 266,642,506 钱，支出为 145,834,391 钱；谷物的年收获量为 506,637 石 2 斗 2.33 升，年支出为 412,581 石 4 斗数升。郡的财政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谷物收入。



139 尹湾简牍名谒　古代的名片（《尹湾汉墓简牍》）

一枚木牍正面写："进长安令儿君。"背面写："东海太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请。威卿足下。师君兄。"这是一张古代的名片。看来是地方官吏师饶（字君兄）向长安令儿君有何请求，希望会面。虽有首都长安，同时也有长安县。地方官吏必须每年一次去长安报告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东海太守委托功曹史师饶去中央时，拜访侍谒者徐中孙、中郎王中宾、丞相史后中子。当然，递上名片是要附带礼物的，这是当时的习惯。师饶还与东海郡周边的郡太守或国丞相进行交际，元延二年（前11）上半年他去楚国出差，下半年去琅邪郡出差。郡功曹也负责对郡外的外交事务。

僮约：奴隶买卖契约

蜀郡王子渊去煎山出差时，途中停留寡妇杨惠家中。其家有奴隶名为便了，王子渊让他买酒来。他却拒绝说："主人买便了时，契约只写明守墓冢，没有约定替别人家的男子买酒！"子渊大怒道："这僮奴是打算卖吗？"杨惠要王子渊当即立约，便了亦正襟危坐。王子渊所撰约文如下："（宣帝）神爵三年（前59）正月十五日，资中县男子王子渊，向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她亡夫时属下的络腮胡奴仆便了，决定卖价一万五千钱。家奴应当听从各种驱使，不得有二言。"[30]

这一篇韵文是前一世纪王褒所撰。遗憾的是《汉书·王褒传》中没有收入此文。我们只能在七世纪《艺文类聚》的逸文中见到。宇都宫清吉《僮约研究》（载于《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对原文进行了细致的校勘，是将此幽默作品翻译为口语的出色研究。

《僮约》的王子渊就是作者王褒本人，王褒，字子渊。当时的宣帝自养育于掖庭宫开始有机会学习学问，学了《诗》《论语》《孝经》。继位皇帝之后，在宫中也聚集学者。神爵、五凤年间（前61—前54）连年丰收，外交安定。宣帝也借瑞祥渲染时代的繁荣，让文人在宫中作诗。“神爵”即祥瑞雀。宣传当时出现了五色鸟、黑黍子、白虎、河鱼、甘露、黄龙、凤凰。王褒曾为益州刺史作诗，并在雅乐伴奏下吟唱。王褒的才华被宣帝知道了，宣帝让他发表了圣主得贤臣的颂歌。自此，他在宫中创作了许多诗篇。

《僮约》的文章接下来写道，买卖契约一旦生效，王子渊可以任意使用便了。宇都宫氏以轻快的语气作了口语化的翻译：

> 清早起床，洒水扫地。吃饭以后，洗净餐具。在家中制作碓碾，捆扫帚，劈木柴。在庄园挥锄掘井、疏浚沟渠，修筑水塘，疏通水渠。去空场上平整土地，准备打谷工具。

以这种语调，一口气足足列举了“百役”。其中所见，与其说是奴隶劳动的悲惨，不如说蜀地的丰饶。作物有麦、粟、豆、芋；蔬菜有瓜、茄子、葱、紫苏、韭、生姜；家畜有猪、马、牛、驴、

羊；水塘有鱼、鹅、野鸭、家鸭，还栽种蒲、蔺草等水草；果园有桃、李、梨、柿、柘桑。手工业制品去市场上贩卖，并且购买。来客人的话，提壶去买酒。准备烹饪所需蔬菜、肉类。去园内拔韭菜，切碎紫苏、干肉蒸芋头。精脍鲜鱼，烹炖团鱼，烧水煮茶。

便了的饭食只能吃豆饭，喝清水，不得饮酒。想喝美酒的话，仅可以用嘴唇沾一沾。屋后有树，应当砍来造船，以便从资中县顺流下至江州（现在的重庆），也可以溯流上至煎县。还要选购妇女用的“脂泽”（胭脂粉），去小市贩卖。利用水利扩大活动范围。

如此，《僮约》通过王褒（字子渊）之口叙述了益州（四川省）的富庶丰饶。这也许是王褒在地方时，为益州刺史写的作品。从契约所云“神爵三年”可知，这是通过蜀地庄园劳动奴隶的形象对宣帝时期的繁荣景象进行描述。

《汉书·地理志》的宏观世界

《汉书·地理志》所见全国各郡国的人口统计，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地方郡国向中央汇报的数据。东海郡358,414户、1,559,357口人的数字，与尹湾汉墓的数字合算可知，十年之间增长了92,124户、162,014口人。人口增长率为10%。包括自然出生人口与周边郡国的流入人口。全国总计12,233,062户，59,594,978口人。从现在算起正好是两千年前的正确人口统计。因为秦的人口统计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这是统一帝国最早的记录。

西汉末年全国共有103个郡国、1587个县（包括邑〈皇后、

公主的食封〉、道〈边境的郡〉、侯国）。县之中一定有县城，以县城为中心的范围构成县的领域，平均十五个县设一郡国。实际上既有三十八县的东海郡、三十七县的沛郡、三十六县的南阳郡和西河郡这样的大郡，也有仅三县的玄菟郡和泗水郡、四县的赵国和真定国、五县的合浦郡和日南郡、六县的敦煌郡和南海郡等小郡。边境人口稀少，县也少。武帝时扩张而成的帝国，就是依靠全国1587个县为据点传达中央命令进行控制的。

1954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了编制中国历史地图的计划。以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为核心，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先在内部发行，而后在1982年全八卷正式出版（参见吉开将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论理——历史地理与疆域观》，《史朋》第36号、2003年）。按照各个王朝确定一个一个县的位置并标在地图上，进行了细致的工作。

这是清代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图》的现代版。其中第二册是“秦、西汉、东汉时期”。笔者也在1976年参考考古资料制作了私家版《汉代郡县地图》。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秦地图》、《汉舆地图》。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引用过《秦地图》。

刘邦进入秦都咸阳时，曾在秦丞相府得图书。其中包括有地图，刘邦由此了解了秦领域的势力分布。武帝时为了在分封诸侯王时确认其领地，曾要求御史呈上《舆地图》。这些地图今天已经失传了。地图本是政治性的工具，历史地图也反映了对过去历史的评价。

逐渐清晰的汉帝国全貌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作为秦汉地图是水平最高、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地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前言也涉及的几点：第一，并未反映出西汉二百年行政区划的变迁，而只是西汉末年行政地图。第二，如何标定国境线的问题。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越南的日南郡、西南夷的益州郡之外侧当时是否有明确的国境线，西域都护府统辖之下的西域诸国是否应该涂以同样颜色等等。这些都是关系汉帝国构造的重要问题。

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除中央的司隶校尉之外，全国设置十三个州，由刺史管辖。当时刺史的秩禄仅六百石，不及二千石的郡守。成帝时终于升为二千石，与之对等。秦郡尚不满五十个，汉代郡国数已经超过了一百，因郡国过多而设置州。刺史负责巡视各郡国，督察太守的不轨行为。

所谓“州”，是以夏禹贡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与周的九州（冀、兖、青、扬、荆、豫、幽、并州）为理想的。在冀、兖、青、并、徐、扬、荆、豫、凉之外，加以益、幽、朔方、交阯四州，为十三州。传统的九州之地，至武帝时已成为加上周边扩张地域之后的形状。现在河南省的简称为“豫”，河北省简称为“冀”就是古代豫州、冀州名字的残存。青州（山东省）、徐州（江苏省）、扬州（江苏省）、荆州（湖北省）等地名，在由郡县制转变为州县制的隋代以后还作为地名残留着，其位置与汉代州是重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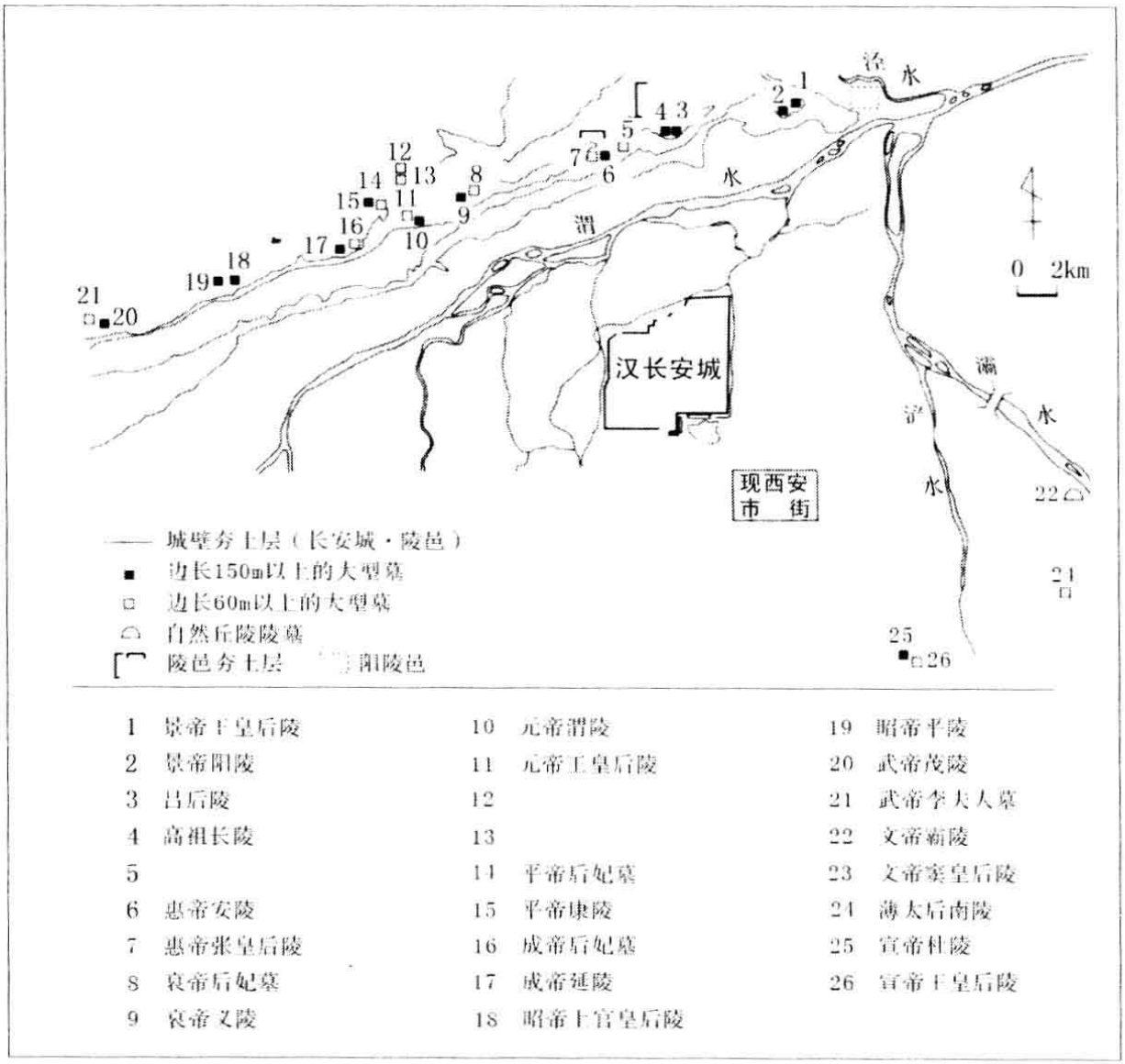
所谓“五服”（甸、侯、绥、要、荒服）是基于华夷思想的儒教地理观念。从中央向周边夷狄世界扩展开来：“甸”是天子周边生产谷物田园地带的可以参加祭祀之地，“侯”是诸侯国，“绥”是由王者政治安抚之地，“要”是甚至可以束缚其腰身的蛮夷隶属之地，“荒服”是荒芜远方的戎翟之地。《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国相当于甸、侯之地，是从中央向远方扩展的顺序：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三辅是畿内，以此为中心向右旋转、涡流状扩展开、由内向外排列。这种郡国的配置是秦始皇帝国所没有的。

出土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地方郡国的微观视角，正史则是对汇集于中央的行政文书进行整理之后，从宏观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帝国的形象。两者合参，第一次让我们看到汉帝国的全貌。

西汉十一代皇帝陵

西汉末年的元始二年（公元2）的长安人口，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为246,200人，长安自建立二百年以来，作为汉帝国首都的人口达到了近二十五万的大都市。虽然看起来比唐代长安的一百万人口要少，但是如果将实际上长安周边卫星城市合计的话，是一座超过唐代长安的大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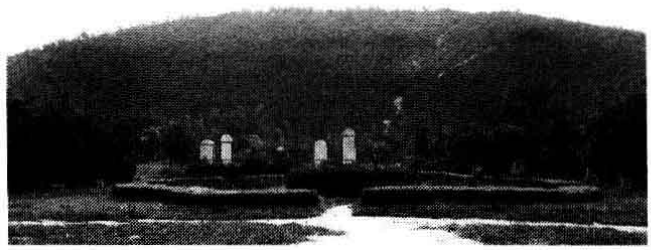
西汉十一座皇帝陵都建在长安周围。在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的九代皇陵，东西三十五公里排列开来。在渭水南岸，西安（长安）东南的白鹿原上是文帝霸陵，杜陵原是宣帝杜陵、地面至今仍可见巨大的坟丘。西汉时期的特征是在陵墓旁建立城市。高



140 西汉皇帝陵与陵邑图　西汉九代皇帝陵并排修造于长安近郊的咸阳原上

祖刘邦至宣帝建了七个陵邑。陵邑始于公元前231年的秦始皇陵附近所建的丽邑。由居住空间体现皇帝威信的、特异的都市传统，持续存在了二百年。共设置了高祖的长陵邑、惠帝的安陵邑、文帝霸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宣帝杜陵邑等七座陵邑。

新皇帝即位翌年开始建造陵墓，死后完工。陵邑则在皇帝



141 宣帝杜陵　坟丘东南是已经发掘的寝殿、便殿等祭祀建筑

活着时候建成，像是在向当今皇帝宣誓忠诚似的，那里已开始居住人口，通常将地方的财主、豪杰迁移至此。从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殿高台基址上，不仅可以放眼望见陵墓，还可见陵邑的残垣断壁。

对于那些远离东方故乡迁徙陵邑人们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据《地理志》载：长陵人口 179,469 人，茂陵 277,277 人。西汉末茂陵人口已超过首都长安，也许是因为武帝的威信吧！长安与长陵、茂陵人口合计 702,946 人。所余五个陵邑没有人口统计数字，假设相当于长陵的 17 万人口的话，五陵邑就是 85 万，长安与七陵邑人口合计 155 万，是超过 100 万的大都市。长安与渭水北岸之间以渭水桥相连，霸陵邑与霸陵桥相连，为的是便于皇帝频繁地去陵墓和陵庙祭祀。当然，陵邑的居民也往来于陵邑之间。

陵邑本是地方民众移居的场所，所以相当热闹。所谓“五陵（渭水北之五陵邑）少年”指的是居住于陵邑都市群的无赖少年。如此人口集中的都市群，孕育了经营商业成功的富豪。大都市的消费商品有如：酒、酱、肉、谷物、薪、漆器、铜器、木器、铁器，胭脂红、丹砂、帛（白丝绢）、麻布、绫绢、皮革、麴、枣、粟、盐、豉（豆的发酵食品）、蔬菜等丰富多彩。在长安经营丹的王君房，经营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成为富豪。

《汉书·游侠传》的豪杰

另一方面，大都市的任侠也在暗中活动。武帝的郭解、西汉末的原涉都是作为豪杰收入《汉书·游侠传》的。郭解很贫穷，就作为移居茂陵条件的财富三百万钱而论，无论如何相差甚远。但是，由于他的权势仅凭别金就能收到千余万，所以作为这样一位人物他也被命令移居。他不仅具有替人报仇、仲裁怨仇、藏匿逃犯的侠义之心，还私造铸币、盗墓掘坟，恶行不绝。最终因杀人，以大逆不道罪处刑。

原涉，祖父一辈作为豪杰迁徙茂陵，父亲作为南阳太守死时，县民送上的奠仪千万余钱，一概拒收。但是，为在茂陵造大墓，原涉买土地开墓道。叔父被杀时，报仇之后逃亡、隐匿一年，遇赦而还。当时，报仇这种复仇行为是得到社会认同的。他还不忘施舍穷人。一次偶然路过一无力为死人出殡的人家，原涉见其窘困，虽说是外人也伸手援助：在木牍具体写下死者用的衣被、棺木、饭含（死者口含之玉），让宾客速去市场购买。都会生活的葬礼看来是很费钱的。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遣策，是棺内随葬品的目录。

元帝时，以上的陵邑制被废止。永光元年（前43）将一直在太常管辖范围进行统一管理的陵邑，分属于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之下。

秦咸阳城因为利用了咸阳原的丘陵，排水虽较方便但灌溉与生活用水很不方便，一直依赖井水。汉武帝以后终于修建了成国渠，咸阳原下的耕地灌溉得到改善。渭水以南地域则与此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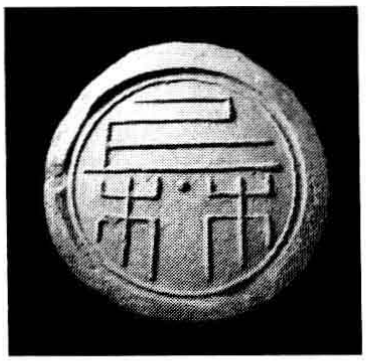
像丰水、沣水、浐水、灞水等从终南山向北流淌的河流很多，具备了丰富而可利用的水资源条件。

在长安城东南，即后来建设唐长安城的区域，有汉代的乐游苑、宜春苑；再向南是东西向扩展开的上林苑。上林苑中饲养了许多动物，是皇帝狩猎场所，还栽培着从地方献上的三千种果树、花草，据说曾有离宫三十六所。当时，在长安城南面广泛分布着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葱郁森林。其间不仅河水流淌，还在上林苑修造了巨大的昆明池。来自昆明池的引水环绕于长安城周围（漕渠、王渠），又进入城中（明渠）。想来，作为城内的给水排水沟渠发挥了其有效的作用。

长安城周边丰饶的自然环境

武帝时有一位叫做东方朔的滑稽家很有名。所谓“滑稽”并非“怪异”的意思。意思是能言善辩，具有像酒从“稽”器流出那样流畅的辩才。他曾将自己的意见写满三千枚简牍，由两名男劳力抬着送到武帝那里，武帝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读完。当武帝要扩大上林苑并建筑围墙时，东方朔也上谏提出上林苑已拥有广大土地不应再扩大的主张。

终南山将南面的长江、淮水与北面的黄河、渭水划分开来。关中是一块特别丰饶的地区，汉离开东方的三河地区，在泾水、渭水之南建都。这里不愧为“天下陆海”的丰饶土地，秦抑制西戎、兼并山东诸国正是由于以此作为根据地。玉石、银、铜、铁、豫樟、



142 上林瓦当　刻有“上林”文字的瓦当。上林苑中饲养、栽培着大量动植物

檀、柘桑之外，这里培育着丰富的杭稻（粳米）、梨、栗、桑、麻、竹箭（大小竹类），种植着姜、芋。如东方朔所说，西汉的终南山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但是，现在那样的风景早已不见了。因为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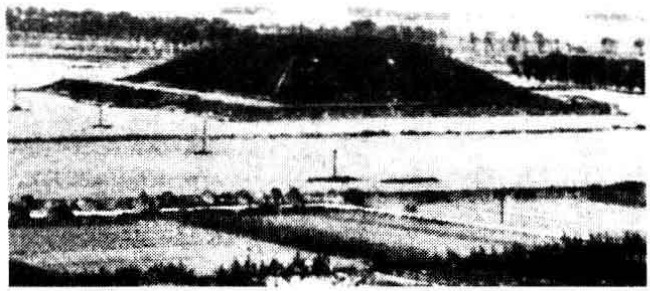
当我在考察长安县斗门镇昆明池中所立牵牛、织女两座汉代石像时，对当地农民至今仍对石像热心崇拜的举动深感惊讶。同时也使我考虑到从这巨大池塘向长安城开凿漕渠的意义。两个石人像在池中东西各置一方，据说象征着天河。两米多高异样的巨大石像，与汉代画像石所绘牵牛、织女形象实在相去甚远，倒不如说与都江堰所见东汉李冰石像类似，都具有测量昆明池贮水量的水位计作用。如此贮量的昆明池水作为首都长安城生活用水的水源十分重要。长安周边水利与自然环境的实际状态，不仅通过文献，通过考古学资料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王莽篡夺汉王朝

意欲保汉的王政君

居延汉简等汉简中可以见到庶民女性的名字。一个字的名很多，两个字的名也能见到。尤其喜欢使用“弟（妹的意思）”、“足”、“君”、“待”、“南”、

“女”、“宪”；二字则多见“女足”、“君来”、“君至”、“王女”、“自予”。其中甚至有“恶女”这样的名字。



143 元后陵　元帝皇后王政君的陵墓。王政君曾一直抵制侄儿王莽篡夺汉王朝的野心

在细君、王昭君之外，还有一位以“君”为名的女性，也牵动了西汉后期的政治。她就是王政君。王政君家有四姐妹：长女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与男子一样同辈分之间共用“君”字。王莽，字“巨君”，可见男子也使用“君”字。细君、王昭君出嫁匈奴，政君则十八岁入后宫，成为皇后。侍奉过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代皇帝，直至八十四岁之前的六十余年间，她都身处西汉末年的政治中枢。虽说没有王政君，就没有其侄儿王莽，但并不是说二人是携手合作的关系。王政君始终是要捍卫汉王朝，王莽则是准备向汉王朝夺权的。这二位相差二十六岁的姑姑与侄儿间的斗争，左右着西汉王朝的方向。

王政君的故乡是魏郡元成县委粟里，位于下游的黄河之滨。近旁曾经有过名为“沙麓”的山冈，顾名思义是一座由黄河泥沙堆积而成的沙丘。春秋时期这座沙丘崩塌时，有预言称此地将会有“圣女”出现。元帝即位时，王政君二十四岁成为皇后。元帝死后，她儿子成帝时她被称为皇太后，年四十。其后，哀帝、平帝时她作为太皇太后支持着皇帝。到了九岁即位的平帝与后来

孺子时期，她已年逾七十还亲自下发诏敕。尽管是女性下诏，亦自称为“朕”。

王政君的兄弟也身居高位。长兄王凤增封五千户，被授予大将军领尚书事官职。外戚以大司马大将军居军事最高职位，而且兼掌尚书参与国政的独裁权力开始于西汉昭帝时的霍光。王凤以舅父掌握着政治实权。

近年发现了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全国发布的四时月令。元始五年（公元 5）平帝去世，两岁的孺子（刘婴）即位，以安汉公王莽为摄皇帝。四时月令不是写于木简，而是写在灰墙上向民众传达的。实物发现于敦煌悬泉置。这一文字资料的确极为珍贵。共五十条，根据季节的不同诏条数有增有减，六月、十二月仅仅一条，一月有十一条，可知是从整部月令中经过取舍，选择出的一部分。由于元始五年（公元 5）这一年气候不调，特意选择了这五十条。诏条最后的附记中记述了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下此诏书的经过。实际上，此时的王政君已经不再过问王莽的所作所为了。

王莽当“假皇帝”的策略

元寿二年（前 1），西汉哀帝仅仅在位六年，二十五岁夭折。这次机会使王莽得以回到政治的前台。王莽是以大司马领尚书事居于政治中枢的。哀帝死后，作为继承人选中了他的从弟中山孝王刘兴的儿子刘衎，仅九岁，所以实际政治归王政君与王莽掌控。此时王莽号称“安

汉公”，的确是取其安定汉王室之意，一面扶植幼年刘氏皇帝，一面经营自身地位。虽说是偶然，平帝元始元年正如“元始”名称所示，恰好是公元一年。

王莽是以自身比拟伊尹、周公。伊尹辅佐殷王、周公辅佐周王，被称为“阿衡”、“太宰”。伊尹为取得汤王的重视，以鼎、俎烹饪，用加调料的例子讲述王道。汤王死后，嫡孙太甲继位，愚蠢而暴虐，伊尹将其流放三年，自己代行政治。周公旦乃武王弟，作为幼小成王的叔父，执政七年。王莽合二者称谓为“宰衡”，进而实行了流放皇帝、取代幼主、摄行政治的步骤。

“摄行”就是代为执行的意思。伊尹、周公都是由于君主蒙昧、幼小而代行政治。但“摄行”是有期限的，三年、七年过后，又归还了王位。王莽在十四岁的平帝死后，选择了恰如周成王的两岁的孺子婴，拥立为太子。孺子成人之后，本应该交还政权。

当时，王莽巧妙地利用了“谶纬”这种预言，实行了不借民意而借天意的策略。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得一上圆下方形白石，上面有朱砂题字曰“安汉公（王）莽为皇帝”。此事不是传到王莽那里，而是先传到王政君的耳朵里，她斥责此为欺天下之物。在王政君的压力之下，下诏天下将“为皇帝”被解释为“摄行皇帝之事”。这总算是对王莽的一种抵制。“为”字既可以读作“成为”，也可以读作“为了”。解释为“为了皇帝”就不是成为皇帝了。王莽也因此首先称“假皇帝”而实行了摄政。所谓“假皇帝”就是“临时皇帝”，即近似“皇帝”。让臣下称其为“摄皇帝”，

说到底是皇帝汉室的辅佐者。没有当上皇帝，而是代替幼小皇太子执行统治。这一年改元为“居摄”元年（公元6）。由于没有皇帝，所以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代为皇帝下诏。

西汉至新禅让的闹剧

接下来出现了一位齐郡临淄人辛当梦见过的、叫做“翁”的天公使者。他传达了上帝旨意：汉的火德衰微，天命殆尽，安汉公应当成为真天子。又有名叫哀章的人做了两个铜箱子，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说其中有赤帝之子汉高皇帝所书谁应该成为真天子的内容。哀章于黄昏时分身穿天子服装，扮成高庙神灵的样子。王莽拜受铜匮。王莽通过这种以《周礼》、谶纬为理论武器的方式，举行了皇帝即位仪式，取“新都侯（南阳郡新野县都乡）的“新”为国号，改元始建国元年（公元9）。他亲自执幼小孺子之手，流泪抽泣曰：“如今，我独自受到来自皇天威命的迫使，并不得意！”接着，让孺子从殿上下来，向他北面称臣，揭开了禅让剧的帷幕。

西汉朝向新朝的王朝交替被认为是一种“禅让”。中国王朝的交替从来就有着武力行为的“放伐”，与非武力行为的“禅让”两种形式。夏、商、周、秦、汉（西汉）之间连续的王朝交替都采取了武力革命（天命革新之意），王莽首次以禅让形式成功实现了王朝的交替。作为外戚，一方面不间断地保持了与西汉刘氏王室的结合关系，一方面由安汉公假皇帝，进而成为真皇帝，巧

妙地通过非武力形式完成了王朝的交替。“假”与“真”的称呼本不是用于皇帝的。汉王刘邦时期，萧何为丞相，曹参为假左丞相。秦曾经以“左”为上，但汉则相反以“右”为上。萧何为右丞相，是真丞相；曹参为左丞相，是假丞相。战乱时期，左丞相曹参只是名义上的丞相。王莽为假皇帝时，孺子为真皇帝。为了从假皇帝变为真皇帝，所以必须使真皇帝禅让。

王莽在暗中坚决地镇压了反对势力。居摄元年（公元6）安众侯刘崇等作为刘氏一族，以百余人攻打南阳宛而失败。翌年，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叫做刘信的人物为天子，发动了针对假皇帝王莽的十万人反乱，被镇压。翟义提出了激烈的口号：“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平帝是否死于鸩毒（浸泡毒鸟鸩羽的毒酒），当然很难确认。《汉书·平帝纪》仅记载“帝崩于未央宫”，翟义所言不知有何根据。

传国之玺：
正统继承者的证明

王莽被说成与秦始皇一样有着豺狼般的嗓音。这种说法来自于形容秦始皇豺声而虎狼之心的表达。王莽身高七尺七寸（约一百七十七厘米），不是特别高。不过，他以虎一般的大嘴呼喊、自信地凝视人时，对人有一种威迫感。

高祖刘邦从秦王子婴那里接受了秦始皇的玺印，后来在汉代皇帝中代代相传，称为“传国之玺”。哀帝之后，因为孺子尚未即位，所以收藏于长乐宫中。

144 皇帝信玺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一般政务用皇帝行玺，对诸侯王用皇帝之玺，军事事务用皇帝信玺

汉代皇帝有七个玉印：官吏的印称为“印”或“章”，只有皇帝、皇后的印称为“玺”。七印之中有三个是刻有“皇帝”字样的玺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有三个是刻有“天子”字样的玺印（“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另一个是“传国之玺”。皇帝即位时，在先帝的棺前，或高祖庙前接受“传国之玺”，以表示自己是正统继承人。

皇帝玺印用于国内政务各端（行玺）、对诸侯王（之玺）、军事；天子玺印用于外交（行玺）、天地祭祀（之玺）、军事（行玺）。王莽的目标是秦汉以来代代继承的“传国之玺”。认为只要正当地得到“传国之玺”，皇帝与天子玺自然会到手。

但是，姑母太后王政君掌管“传国之玺”，拒绝交出。她气势汹汹地斥责了侄儿王莽：“我一族蒙汉家之力而富贵，无以报恩，还要乘机夺取其国。如此人渣，狗猪不食其余。我乃汉家老寡妇，欲与此玺一起埋葬，必不可得！”作为女性语言，上面这些话可谓痛骂。王政君最终还是不得已，将汉传国玺，投之于地，最终归于王莽之手。

王莽执意要姑母王政君与汉划清界限，拆毁了元帝庙，改称王政君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八十四岁死去，被合葬于元帝渭陵。说是合葬，只是将坟丘并排而葬。今天，在175

米见方的渭陵西北，邻接着 90 米见方的元后陵。王莽无论如何希望使姑母与汉皇帝割断关系，甚至在两陵之间设计了一道沟，可见其用心执著。

秦始皇、武帝与王莽的共同点

2001 年在长安城桂宫宫殿区西北角、雍门附近的四号遗址，发现一枚玉牒（玉牌）的残片。是仅长 13.8 厘米、宽 9.4 厘米、厚 2.7 厘米的小型物。残留的二十九字中可见“万岁壱纪”（壱，同“壹”，“一纪”为五百年大变，三纪为一千五百年）、“作民父母”、“退佞（佞为佞之误）人奸轨”、“延寿，长壮不老”、“封亶泰山，新室昌”等残字。从末尾“新室昌”可知这是王莽新王朝的玉牒，为泰山封禅所制。王莽也希望继秦始皇、汉武帝之后，封禅泰山。由此可见这位意欲从外戚变为皇帝的人物的历史。

后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在祭祀天地时，有祝文曰：“天地之神，将黎元（人民）嘱托刘秀，为人父母，秀不敢当。”其中亦有“为人父母”一句。所以王莽玉牒残字的原文也应该是天地之神承认王莽作为地上人民父母、进行统治之意。光武帝的祝文在表示谦虚之后，曰：“人称‘王莽篡夺皇位，秀发奋而兴义兵，诛杀乱贼，平定天下，海内人人蒙其恩。上乘天之心，下受元元（人民）仰慕’。”

作为刘秀打倒对象的王莽所提出的“退佞人奸轨”，是赞扬屏退佞人奸轨（政治混乱者）建立新王朝文章的残字。玉牒中的

145 王莽玉牒的残片（长安城桂宫内 4 号宫殿遗址出土）从末尾“新室昌”可知是王莽为泰山封禅所制（《考古》2002 年第 1 期）

“延寿，长壮不老”是祈求个人延年益寿的。一边祈祷人的长寿，一边通过泰山封禅祈求新室的繁荣，祈愿个人、国家的永存。

王莽建立了夹在东西汉刘氏王朝之间仅仅十五年（公元 9—23 年）的王朝。作为西汉末外戚势力，通过禅让实现王朝交替，成为皇帝。他希望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去泰山封禅并非不可思议。然而，迄今未见王莽实际去过泰山封禅的记载。王朝交替的混乱告一段落之后，他改元天凤元年（公元 14），虽有巡行东方的意志，但没能成行。实际上举行过泰山封禅的，是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此后至唐代无人封禅，然后是唐高宗、玄宗以及宋真宗又继续进行。并不是所有皇帝都去泰山封禅的。

新的政治、经济、外交

向往周代政治制度的复古

皇帝王莽否定了秦汉，意欲彻底回到周代制度。实际上周王朝已经在二百五十六年之前为秦所灭。“周”分为西周、东周，时间很长。被理想化的只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西周时期。回到一千年前的时代已不可能。

实际上，王莽是企图实现《周礼》《礼记》王制篇所描述之理想的周代政治制度。他肃清汉制，建立周制就是改革。即便是王朝交替，如此极端的改革在中国史上亦可谓空前绝后。王莽因何如此痴迷周制呢?

周武王时期有八百诸侯，文王时有一千诸侯隶属于周、向周朝贡。秦铲除诸侯，实现郡县，因此二世而亡。汉高祖论功行赏，建立诸侯王、列侯数百国，但数字逐渐消减，所剩无几。王莽谋求复兴周代封建制，建议施行周的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与四等级封地制。官僚名称也都改换为羲和（大司农）、作士（大理）、秩宗（太常）、典乐（大鸿胪）、共工（少府）、予虞（水衡都尉）、大尹（郡太守）、宰（县令）等一类独特的名称。

王莽又依照《禹贡》（关于夏禹所定九州之地地理、物产、贡物的书籍）将全国划为九州，诸侯之数定为一千八百，为的是与周文王时数字相合。另外，还效法周代的二都制，以长安为西都，以洛阳为东都。长安更名“常安”，洛阳易名“宜阳”。按照与都城的距离，划分为近郡、内郡、边郡。全国125郡、2203县的名称，虽非全部但多加改变。地名本来即便王朝交替，也是继续不变的。如此任意更换地名，应该是在显示其彻底脱离秦汉的意志吧!就制度改革来说，虽然很是激进，但官吏、民众由于难于记忆而陷入混乱。郡名也更改为敦德（汉的敦煌，以下同）、西海（金城）、就新（益州）、新中（汉中）、淮平（临淮）、河平（平原）、迎河（渤海）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王莽的故乡

魏郡元城县虽改为魏城元城，但几乎没什么变化。

王莽将王朝继汉火德之后定为土德。颜色崇尚黄色，也是祖先黄帝的黄，数字以土德的“五”为成数。还将汉崇尚的红色作为低级官服的颜色，官吏印章一律用五个字。如“含涯宰之印”（京都大谷大学藏龟钮铜印）即含涯县长官（宰）之印，为了合于五字之规，而加入“之”字。

温柔与残忍

尽管如此，这些措施也并不都是纸上谈兵的改革，命令是实实在在地传达到地方的。王莽政治改革的诏书，确实传达到了远方的敦煌，是有据可稽的。在敦煌发现了以下两枚木简的残片：

（上部残缺）以时过可不冒哉。牧监之部，其勉于考绩。（以下残缺）

（上部残缺）获断金之利焉。始建国四年五月己丑下。

公元12年王莽下命令曰：州牧（刺史）与监协作，努力于政务。“断金”一词出自《易经》，是戮力同心，力可断金的意思。在中国今天还有猜字谜的游戏，如“半甜半辣为何字？”谜底是“辞”字。如果问“何谓获断金之利”的话，则是一个政治字谜：“因为‘断金之利’的‘断’通‘卯’，‘利’通‘刀’，所以与‘金’组合的话即‘劉’字。因此，只要团结就能够结束刘氏。”

王莽与在王政君左右掌握政权极尽权势的叔、伯相比，由于早年丧父，具有生活态度严谨的气质。王莽将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时，将得到的两万斤黄金和两亿铜钱的高额彩礼，全都分发给了女儿的侍女和族中贫困者。还收养了兄长的孤儿，对周围的人极富同情心。

但是，他又有连儿子也不宽容而任意斩杀的残酷的另一面。王莽之子王宇反对王莽为隔绝平帝（中山王）之母卫姬及其一族而不许他们入京师的做法。王莽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不希望外戚势力受到威胁。他将王宇下狱，王宇饮毒药自杀；王宇怀孕中的妻子，产子之后被杀。王莽正色地认为即便是自家孩子，办了蠢事也不可宽赦，周公不是亲自杀了造反的兄弟管叔鲜和蔡叔度吗？此事件发生于他当上皇帝之前。

王莽是与秦始皇、高祖刘邦、武帝等人物不同类型的皇帝。但是，因受其个性所害，仅一代皇帝的王朝很快终结了。

理想主义的经济政策

王莽的经济政策无论如何是在追求平均主义。由于以往土地、奴婢的自由买卖，造成大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压迫。哀帝时期实行了“限田”，规定土地所有的最大限额为三十顷（三千亩），占有奴碑的数量也要与爵位相应，而且最多不得超过二百人。王莽进一步将天下耕地称为“王田”、奴婢称为“私属”，都禁止买卖。所谓“王田”见于《诗经·小雅》的王土思想，是对“溥（普）天之下，莫非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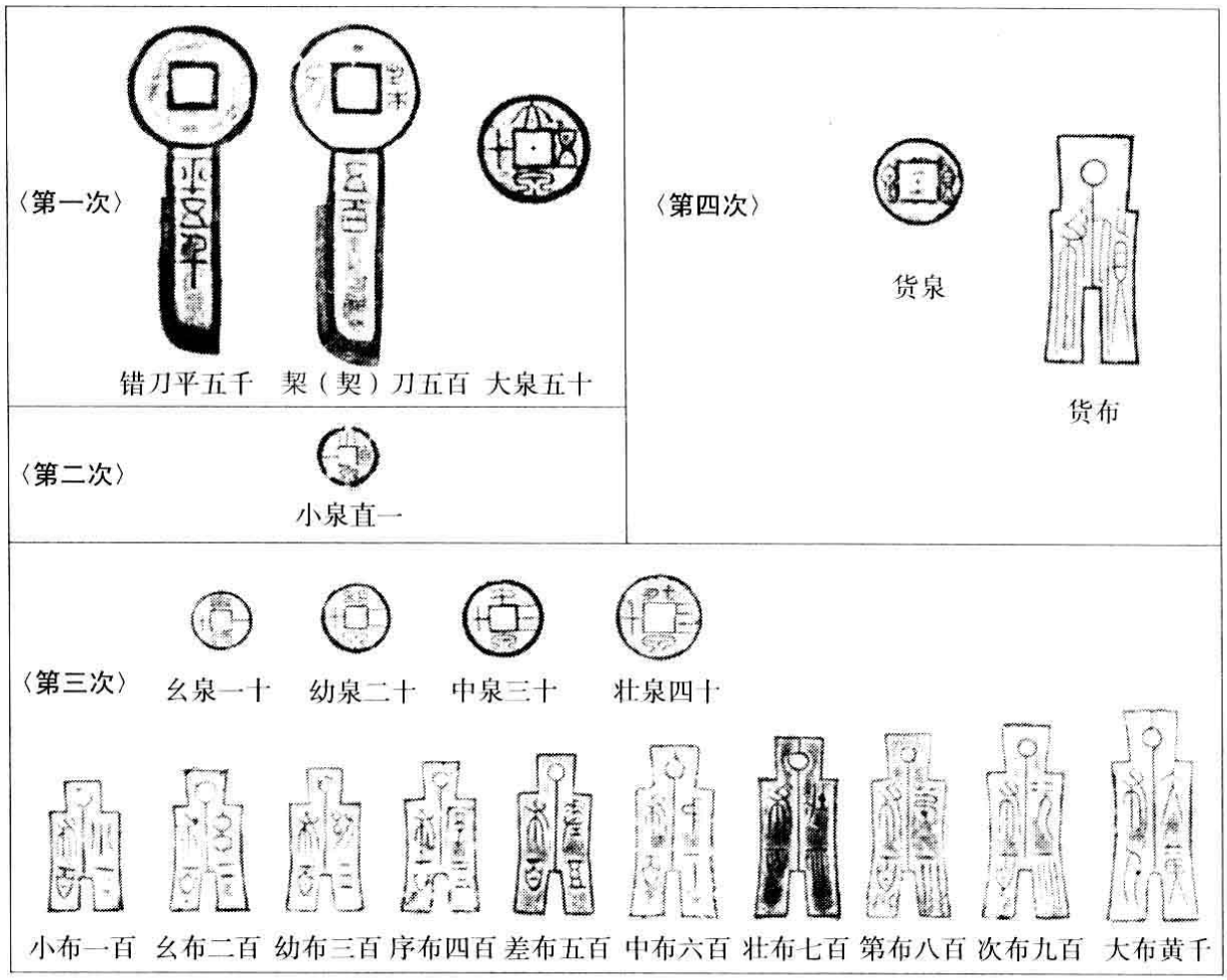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烈反映。“王田”即这里所说的“王土”，换言之即皇帝的土地。

另外，他还希望以《孟子》等所见“井田”制度来限制土地所有。孟子提倡的井田制，是将耕地九等分为“田”字形，中央一块作为“公田”，其他土地分给八家，每家一百亩作为“私田”。如今，一夫一妻的家庭，成年男子劳动力虽然不足八人，却占有超过一井以上的土地。凡属这种情况的，都须将超出一井的土地分给宗族、相邻的里、乡里，应该让那些无地农民因为这一制度的实施，得到土地。实施井田制，为的是实现土地所有的均等化。一方面是儒教古代经典的极其理想主义的制度，一方面又沿袭了西汉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政策。

另外，还实行了所谓“六筦”、或称“六斡”的经济统制政策，即六项国家统制政策。“筦”、“斡”是管理的意思，即将盐、酒、铁、山川等资源，以及货币制造、五均赊贷（市场买卖）归于国家直接统治的措施。既沿袭了西汉武帝时对盐铁酒的专卖制和平准、均输法，又依据了《周礼》等经典著作的政策。

权威的确认与象征性货币改革

王莽时期的货币制度，在短短七年中进行了四次改革，共计发行三十七种货币，措施极为复杂。王莽重视《周礼》的理念，复活了战国的刀币、布钱的货币形式，制造了圆形与刀形结合的非常独特的货币，还发行了与实际价值不符的高面额货币。货币



146 王莽的货币改革　复活刀钱、布钱等战国旧货币，创造了圆形与方形连接的独特货币形式，短时间内反复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

铸造伴随着年号制度、统一度量衡的措施，成为用来表现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手段，而不一定是满足经济需求的产物。王莽在其从摄政到以新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过程中，好像随时都在确认自我权威似的，一次一次地铸造新货币。当时，王莽每天见到的是西汉朝的五铢钱。他经常是既愿意接受五铢钱、又对五铢钱越来越排斥，也许这正象征着他夺取政权的心态。

第一次货币改革是在他摄政时期的居摄二年（公元 7）发行了面额五千钱的高额货币“错刀”、五百钱的“契刀”以及五十

钱货币的“大泉五十”等三种货币，以此与现行的五铢钱并行使用四种货币。“大泉五十”是效仿周景王时“大钱”而造的，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实重虽仅仅是五铢钱的2.4倍，却相当于五十枚五铢钱的。第二次货币改革是在他即位皇帝、建立新朝的当年，即始建国元年（公元9），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宣布停止使用五铢钱、错刀、契刀，仅仅流通“小钱”（币文：“小泉直一”）和业已发行的“大泉五十”。

儒教主义华夷秩序的开始

王莽时期制造的王氏作镜铭方格规矩镜的铭文曰：

王氏作镜服四夷，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毋极。

王氏造此镜曰：若使四方夷狄服属，则新国家繁荣、人民休息。消灭周边民族的话便可复兴天下，无论何时都能保证五谷丰登。那样，永远可以亲族为重，永远幸福。

这是王莽新政权讴歌自身威德广及天下四方的吉祥用语。所谓“四夷”实际是指北方匈奴、西方西羌、东方东夷诸国、南方蛮夷。王莽对世界的认识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中华色彩。还在他作为平帝太傅、安汉公时，越裳氏献上白雉，黄支国献上生犀，东夷王也渡海献来特产，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改为单字姓“知”

147 方格规矩镜　铭文开头曰“新有善铜出丹阳”

入朝，西域的良愿等也献上土地表示臣服。在此土地上特意设置了西海郡，与东海、南海、北海并列。儒教主义的华夷秩序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王莽作为皇帝即位后，以彻底的中华思想为基本原则推进外交。王莽的中华思想体现为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理念，认为天下存在二王不合古代经典，于是改诸侯为“公”，四夷的王改称“侯”，如此逐一降格。然而，对那些已经在西汉时被册封为“王”的周边诸民族，特意在始建国元年（公元 9）收回他们的汉印绶。改授予新室印绶、降格为“侯”的做法，引起周边诸民族反对，陷入极大的混乱。

具体而言，对东北高句丽方面，因其拒绝了向匈奴出兵的要求而予以攻击，王莽在始建国四年（公元 12）布告天下，改“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强制实行了屈辱性的降格册封。高句丽对此十分愤慨，东北各民族亦纷纷叛离王莽。对北方匈奴单于方面，将西汉授予的旧印中“玺”字降为“印”字，授予“新匈奴单于章”。当单于希望要回旧印时，使者还故意敲碎旧印，匈奴对此非常愤怒。匈奴要求授予与西汉同样的玺印时，王莽甚至将“匈奴单于”的称号改为“降奴服于”。

王莽向西域各国也派遣了使者，同样将西汉授予的王印收回，更换以侯印予以降格。最终导致了西域各民族对王莽的叛

离。将西南地方的钩町王也降格为侯，钩町王邯对此很是怨恨，竟被牂柯大尹（太守）周钦杀害，于是发生邯弟为兄复仇杀害周钦的事件，引起西南各族对王莽政权的反乱。王莽派出巴、蜀、犍为各郡士兵和天水、陇西郡骑兵十万人镇压，但由于边境军粮运输的困难，数万人饿死。如此，周边民族的叛离不仅招致边境治安的恶化，还很快形成与内乱的遥相呼应之势。

对王莽新王朝的评价

对于夹在西汉与东汉之间短短十五年的王莽新王朝，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王莽政权诞生之际，天下人屈从于他；王莽政权垮台了，又都翻脸斥责其为篡夺汉政权。扬雄就曾写过《剧秦美新》这类对王莽的赞辞，批判同样十五年的短命秦王朝，歌颂新王朝。关于“秦”与“新”的不同，如果从各自与周的关系上考虑的话是很清楚的，一个是灭周的“秦”，一个是以周为理想的“新”。

《汉书》也像《史记》那样，以编纂者自身的《叙传》结束全书。紧排在《叙传》之前的《王莽传》分为上中下篇，虽说是列传，但从其编年体记述体裁以及大部头的分量而言，俨然一部“新”王朝的兴亡史、类似于本纪的著述。《王莽传》上篇描述了王莽作为西汉末外戚势力，直至称帝的初始元年（公元 8）如何以禅让方式完成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篇描述了王莽建立“新”王朝的始建国元年（公元 9）至天凤三年（公元 16）的王朝政策，下篇叙述了天凤四年以后七年间王莽政权垮台的经过。

班固认为“秦”与“新”走过的道路虽不同，但归宿是一致的。他是从“汉”的立场分析“秦”与“新”的。篡夺汉室的贼臣王莽是与夏桀王、殷纣王匹敌的亡国人物。秦始皇焚烧儒家书籍贯彻了自己的路线，王莽则是企图以儒家书籍掩饰自己的恶行。始皇帝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但仍然活在王莽以及批判王莽的那些人的心中。班固用颜色比喻王莽的时代为中间色的紫色，认为既接近汉王朝的赤色、也接近黑色。

《后汉书》由于是以推翻新王朝为前提叙述建立东汉王朝之合理性的史书，所以对王莽的评价也是一边倒地予以抨击。王莽的确由于过分急于实现儒教国家而导致了失败。尽管受到恶评，王莽的政治理想对后世王朝也的确是有影响的。继王莽之后东汉王朝虽然对王莽政权持否定态度，但实际上在实现儒教国家的意义上又受到其极大的影响。另外，作为中华帝国希望严厉地确立与周边各民族的国际关系秩序方面，王莽也成为后来外交关系的范本。如果从整体中国史的长河而言，这绝不是一个特殊的王朝，而应具有中国古代帝国的一席之地。王莽政权的改革是对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官学化进程中设想的儒教国家结构的最初尝试。

黄河决口时为保坟墓而牺牲民众

王莽当上皇帝第三年的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在下游的魏都决口。至此自春秋以来六百年流淌的河道，从濮阳大幅度向东改变，成为平行流淌于今天的黄河以北的河道。作为一直

居住于黄河下游的众多百姓来说，这是一次重大事件。与武帝时一样，王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任其泛滥。总之，任凭黄河向东泛滥的话，王莽祖先的坟墓将免遭洪水侵害。这以后的一千年之间黄河河道没有变动。下一次黄河改道是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再度从濮阳向北流淌。王朝的存在短则十几年，长不过二三百年，而黄河作为自然现象影响却如此巨大。

王莽时期围绕着如何治理黄河有过讨论，出现了各种意见。令人吃惊的是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的讨论竟然没有变化。长水校尉关并的意见，是不要让人居住于低洼而经常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那里应该作为洪水泛滥时的泄洪区。大司马史张戎认为“一石水泥六斗”的黄河泥沙是洪水泛滥的元凶。就是说一石的十分之六是泥沙，或者说用今天一升的瓶子装十瓶黄河水的话，其中有六瓶是沉淀的泥沙。就一瓶计算的话其中十分之六是泥沙。现在，三门峡附近黄河泥沙的最大量每立方米高达七百四十六公斤。春夏季节由于水量少、水流弱、泥沙堆积河底使得河床变浅，一旦水量增加就会造成河堤决口。

张戎主张不用堤坝阻塞，让黄河顺其自然地流淌。大司空掾王横主张应该让黄河水回归大禹时期的河道，沿西部山地流向东北。他曾提到《周谱》中“定王五年河徙”的记载。这样的书今天已经失传，应该是周王年谱（年代记）吧。周定王五年的公元前602年，自大禹时期以来的黄河河床出现移动后，直至如今经过六百年又发生移动。他提到的周定王就是楚庄王问鼎之轻重时

期的周王。结果是议论纷纷，任何方案也没有付诸实施。

流淌了六百年之久的黄河旧河道并没有立即消失。现在的黄河冲至下游的泥沙中有四分之三、计十二亿吨流入大海，另外四分之一的四亿吨沉淀于河底。假设当时泥沙的量比今天少的话，毕竟是六百年间黄色泥沙的堆积，当时的堤坝还残存了下来。黄河改道之后，淹没于新河道地域的居民失去了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地域的人口密度很高，仅东郡、平原郡在西汉末的人口就达二百三十二万。黄河河道的变迁是一种象征。王莽政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墓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和财产。改革与现实之间是如此不协调。

周边各民族的背叛、造反与政权的崩溃

所谓“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王莽篡弒，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是史书用来行形容一个王朝崩溃时的套话。如果把“新”换为“秦”，“王莽”换为“秦二世”的话，意思仍可通。所谓“昔秦失其守，豪杰并起”就是将当时比作秦末的一种表述。

王莽政权崩溃的原因还在于过急、过激的经济政策招致人们的不满，屈辱的外交政策引起的怨恨。

最终导致王莽新政权崩溃的导火索是内乱的发生。周边各族发生反叛，与此联动着出现了边境地区人民的不满。北边边境为了准备对外战争，从内地向黄河北端的五原郡北假地区征发

人口开垦屯田，让他们提供军粮。并州、平州的民众为了躲避征发，纷纷逃亡。天凤元年（公元 14）边境发生连续不断的大饥荒。翌年，粮食价格飞涨，威胁着边境二十万驻军的生活。五原、代郡出现了数千人规模的盗贼集团。边境内外如此不安定的形势影响到了内地，天凤四年（公元 17），临淮的瓜田仪、琅邪的吕母、新市的王匡、王凤等举兵反乱。王莽对其实施了镇压，向天下发出紧急治安命令。敦煌汉简中有天凤四年的册书，上面说："命令（没有明记内容，年代为估算）下达至地方县、道官（边境少数民族地方的县）、国、邑十天之后尚未执行者论处。"关于王莽政权的最终结束，将在下一章叙述。

第八章

民众的世纪

记载王朝兴亡的史书

将两个汉朝相互区别的记述

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刘氏政权中兴，夺回了被王氏篡夺的政权。所谓“中兴”，与“再兴”、“复兴”不同，不是复活失去的朝代，而是将本来相互接续的朝代再次注入活力的意思。宣帝时已经有过汉王朝的中兴。王莽并没有绝灭了刘氏政权。这是光武帝刘秀等人的认识。

220年东汉献帝禅让帝位于曹丕，刘氏王朝结束。此二百年的历史不妨分为两段看待。正好在公元100年划界的话，即一世纪与二世纪的历史。一世纪我们以民众为焦点。就像秦王朝当初被陈胜、吴广的农民反叛所瓦解一样，王莽新政权也在

赤眉农民的叛乱中倒台了。从民众、农民的角度来看王朝的话，我们已逐渐认清巨大专制帝国的脆弱和强大。二世纪的焦点在于自然灾害，这个世纪自然灾害频仍。这一因素似乎又与东汉政权、社会内部的内乱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当时人们是如何面对自然界的呢？

秦始皇的帝国的确是为后来西汉二百年，以及新王朝所继承了。其后的东汉二百年也绝不仅仅是民众反叛与自然灾害的黑暗时期。二世纪幼帝的连续即位，出现了围绕皇帝形成的宦官、官僚、外戚之间的紧张状态。强权皇帝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人们踏踏实实地在国家、社会之中坚强地生活着。这还是一个科学、宗教正面出现的时代。

“后汉”相对于“前汉”，“东汉”相对于“西汉”，都是将两个王朝相互区别的称呼。就时间前后而言，称“前汉”、“后汉”；就王朝首都位置（西长安与东洛阳）来说，称“西汉”、“东汉”。但当时的人们对前汉也称“汉”，后汉也称“汉”，因为二者是连续的，所以有所谓“中兴”之说，由此进而将汉朝延长了二百年。二百年时间相当长，所以不能说这是个不安定的时代。

西汉帝国的二百年间，以皇帝为顶点的专制统一帝国得以定型。形成了由那些臣属于皇帝的官僚对众多农民进行个别人头统治的古代政治体制。到了东汉，可以说这种政治体制得到继承，并进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介乎皇帝与农民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地方豪族阶层。

地方社会特征形成的时代

东汉建立之时，因为以皇帝刘秀“帝乡”南阳为中心形成了豪族集团，所以也有观点称东汉王朝为豪族联合政权。但是毕竟东汉政治的基础还是西汉后期以来时代潮流的延续，专制统治的官僚体制更加强化，在制度上继续采取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形态。比如，掌管高度机密上奏文书的尚书官僚，在东汉时期已经直属于皇帝，有时还能控制内朝的权力中枢；另一方面外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却变成为单纯的政务执行机关。

就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而言，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有105个郡、国，其下设置1180个县、邑、道、侯国。虽说是105个郡国，仅仅有二十个国、六个属国（统治边境少数民族的行政机关），其余的都是郡，实质上是郡县制。不过，作为地方统治，在郡国这类小区域行政划分之上，根据需要还设置了区域更加广大的“州”。除中央设置司隶校尉之外，其他地域分为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等十二州，向那里派遣十二名刺史监察郡国。

刺史在灵帝时改称为州牧。虽说是对设置于西汉武帝时刺史的复活，但并不像西汉那样仅仅是去地方做监察巡视，而是在地方设立固定的治所，由上计官负责向中央报告。他们发挥了监督地方官是否有不法行为以及是否与地方豪族不法勾结的作用，所以很受重视。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是一个“地方的时代”。所谓“地方的时代”的意思，是说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受到地方

行政组织充实化的支持，进入了与中国全体的统一性、均一性相比，地方社会特征更加凸显的时代。

《后汉书》的编纂

在中国古代人的历史意识中，出现过两个东汉史。从东汉时期人的观点来看，的确东汉王朝是对汉王朝的“中兴”。在抨击王莽政权的暴虐的同时，自己继承了汉王朝的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对在东汉灭亡以后的人们来说，他们都十分重视从东汉禅让而来的三国魏的地位，认为东汉传国二百年气数已尽，与曹氏的政权交替乃必然趋势所致。所以他们讲述的是包括幼主即位、外戚与宦官时期、黄巾之乱、周边民族之侵略的整部东汉王朝的兴亡史。

“后汉”王朝的名称，是东汉以后出现的。东汉人是不说“后汉”的。说到底中兴的是“汉”王朝。首先，《汉书》中编纂前代王朝“汉”的历史，为的是主张自身王朝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东汉人也已经着手编纂当代史了。本来，所谓历史并不一定等那个时代结束之后再作回顾。有的史书就是对当今时代从头开始记述的。青壮年写自己的历史，是为将来的自己而写的；老年人写自己的历史，为的是留给子孙去回顾；子孙写祖先的历史，是写与当今不同的过去时代。如果说《史记》是汉王朝青壮年历史的话，《汉书》则是汉王朝祖先的历史。《后汉书》与这两部史书都不同，是由许多人竞相记述的。这不仅是一个富于魅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在汉权威丧失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一种

恢复过去汉的权威的想法驱使下，人们编纂了《后汉书》。

班固等人已经编纂了光武帝的《世祖本纪》以及光武帝功臣的《列传》。王朝虽在继续，但一个皇帝的统治已经结束。以此为基础在二世纪荀悦编纂了名为《汉纪》的史书。《东观汉记》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东观”是与“兰台”（汉代宫中图书馆）同样性质的、作为史书编纂场所的洛阳的宫殿。此书曾与《史记》《汉书》并列称为的“三史”，可见其受到信赖的程度。在东观编纂的《汉纪》，说到底是中兴之后光武帝以降刘氏汉王朝的现代史。

兴亡全史的陆续编纂

新的汉王朝消灭之后，与前汉相对的后汉王朝完成了从兴到亡的全过程。所以它的兴亡全史也不断得到编纂。从三国时期到西晋，进而到南朝宋之间三世纪至五世纪的这段时间。王朝更替频繁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这是个胡、汉南北王朝对立的时代，所以正统性以及华夷秩序受到重视。门阀贵族也需要从汉代那里寻找系谱。由此形成了回顾四百年汉朝历史的风潮。三国吴人谢承的《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是最早的私家撰著的东汉史。今天虽然仅可见到此书的逸文，但该书得到的评价很高。因为此书主要是反映吴国时代的历史，所以书中的列传比之北方洛阳一带的人物，更偏重于记载江南人物。该书还有一个特征，是将与隔海保持密切关系的东夷之地也编入了列传。另一方面，在三国时期，北方的魏已经

有官撰本王沈的《魏书》、私撰本鱼豢的《魏略》这类当代史的编纂，其中以东汉向魏禅让的形式记述了东汉的灭亡过程。

进入西晋之后，有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张璠《后汉纪》三十卷等陆续编纂成书。以上的《后汉书》都是仿效《史记》、《汉书》的纪传体史书，与此不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是从光武帝至汉献帝的编年体东汉史。此书记事自东汉灭亡至三国为结束，旨在对东汉时期重新作出总结。然而，这七家或八家史书在后代都散失了，《后汉纪》之外只能见到《七家后汉书》（清人汪文台对七种《后汉书》逸文的辑佚）。

在混乱的时代这些作者执拗地要从东汉历史中发掘出使得儒教思想得以定型、使统一王朝延续二百年的东汉国家的兴亡之因与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中描绘了拒绝贿赂、坚守朴素生活、为民众实行公平政治、亲身实践孝道的清廉官吏，散财救济乡里穷人而获称赞的豪族生活方式，国家对地方豪族过激行为的抑制，救济贫民的组织机能等等内容。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最后成书的是公元五世纪再度进入分裂期的、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汉书》。范晔虽不是史官，但在以《东观汉记》为依据的同时，广泛采集了各家后汉书撰成十本纪、八十列传。

列传中完整记述了周边夷狄各民族隶属中华帝国的历史。南朝宋的时期对于北朝胡族国家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了作者编纂过去历史的动力。原书的《志》没有完成，而且纪传以外的部分均已散失。所以在北宋时期人们加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合为一百三十卷，即今本《后汉书》。

《纪》、《传》部分附有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第二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解，《志》部分附有梁刘昭的注。李贤的墓在陕西省乾县乾陵的陪葬区被发掘，墓中发现许多壁画。高宗虽立李贤为皇太子，武则天厌恶其才能，以阴谋暗杀罪将他流放，三十岁英年早逝。死后名誉被恢复，谥号为章怀太子。因为喜好学问，所以《后汉书》注释中留下了他的名字，注释中也表现了注者自身的想法。如李贤注《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初造寿陵事时，加入了以下注释：

> 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今循旧制也。

光武帝陵墓在其死后称原陵，生前对皇帝陵一般忌讳言死，故曰“寿陵”。西汉文帝朴素地葬于自然山丘而不建坟丘，因而免遭赤眉掘墓。光武帝也希望造那样的陵墓。寿陵的“寿”即长寿的意思。李贤要说的是：并非以此祈求长寿（那样的话与造陵墓之举将有矛盾），是希望面临死亡也能获得生命的永恒长久。

李贤本人在兄长死后，也有成为唐皇帝的可能性。当时他是以怎样心情进行注释的呢？所谓注释，为的是有助于理解原文，但有时也像这样可以读出注释者的心情，耐人寻味。

范晔《后汉书》被认为水平不及《史记》、《汉书》。唐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范晔《后汉书》不具备《史记》、《汉书》那种委婉的叙述之妙以及作为史书的厚重。"比如叙述刘秀族兄刘玄时，不顾他复兴东汉、即位更始帝的事实，不为他立本纪而将刘秀作为本纪的开篇，把刘玄记入列传。这完全继承了以《世祖本纪》开篇表示尊崇光武帝的《东观汉记》的观点。而且，在列传中把本来具有任侠之风的刘玄描写成为"更始即帝位，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的脆弱人物。

王莽政权的灭亡

女首领吕母发动的叛乱

反对王莽的农民动乱，是从今天山东半岛开始的。青州、徐州北部遭受大饥荒，盗贼屡屡出没，治安情况极度恶化。在赤眉之乱前此地爆发了吕母的叛乱，吕母是女性叛乱首领。她出身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市西）。赤眉之乱首领樊崇也是琅邪郡（今山东青岛南）人，由赤眉拥立为皇帝的刘盆子是太山式县（今山东曲阜东北）出身。这些山东农民的反抗势力，都把目标对准西方的长安。他们在与

南阳刘氏豪族的反莽势力抗衡的同时，最终取得击垮王莽政权的成功。

在这一地区强烈反莽情绪的背后，有着成阳景王祠信仰的影响。成阳景王，即西汉高祖刘邦之孙，是封于齐国的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刘章是一位向吕后献上《耕田之歌》讽刺吕氏一族专权的、有骨气的人物。歌中写道栽种禾苗，须铲除杂草。所谓“杂草”指的是非刘氏的吕氏一族。吕太后死后，他与周勃一起制裁了吕氏一族势力，因为有功被文帝封为成阳王。不幸的是此后两年他就去世了。

成阳国在今天山东省莒县一带。刘章的子孙分封于山东各地，所以在山东各地造有成阳景王祠。特别是从非刘氏的王莽取得政权之后，在人们心中外戚王氏与吕氏是同样令人抵触的。越是有反莽情绪，就越是思念成阳景王。很快，发生了山东半岛刘氏拥立新天子之举。赤眉军中的齐巫就经常击鼓起舞、祭祀成阳景王。

天凤元年（14）吕母的儿子因触犯轻罪被处死。吕母就制定了向县宰（王莽时期的县长官）的复仇计划。当时报仇、复仇行为是社会上所认同的。由于身为女性、吕母单独复仇难以获得成功，所以她聚集那些具有任侠之心、愿为主人效劳的宾客，又以数百万家产为资金，酿造美酒，购买刀剑、衣服。那些都市无赖青年来买酒，手头没钱，吕母便赊给他们，还将衣服发给穷人。吕母的财产数年之内耗尽，青年们为之深深感动，便集结了数十甚至上百人，很快又招来亡命者几千人。所谓“亡

148 巫女俑（广州博物馆藏）
赤眉军中有巫女起舞祭祀成阳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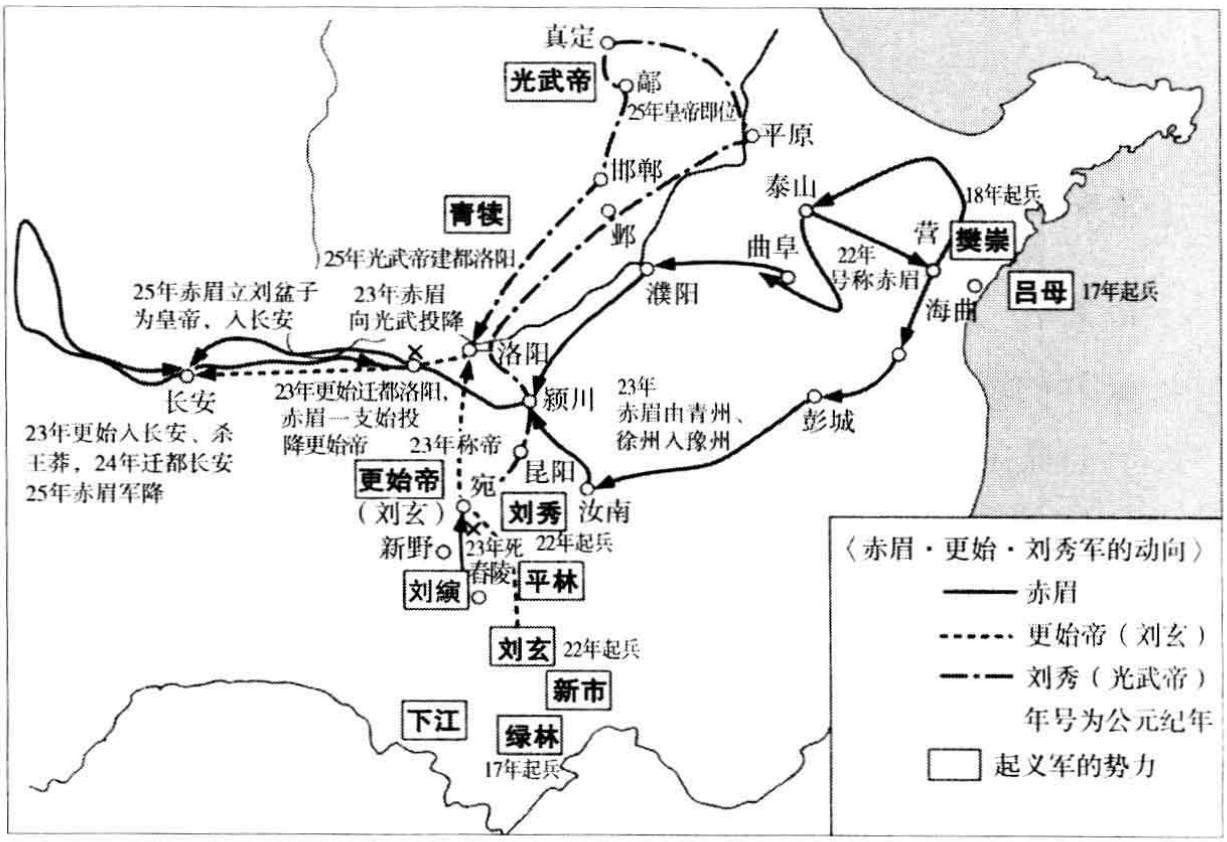
命”，即脱离本籍逃亡者。吕母号称将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于公元 17 年攻打海曲县，抓到县宰。县宰乞求饶命，吕母取其首级，祭奠于儿子墓前。复仇之后吕母虽然病死，但这一集团并未解散，加入了赤眉等军的农民叛乱之中。

赤眉之乱的爆发

天凤五年（18）在与吕母同郡的樊崇率领之下，山东农民起兵造反。一段时间曾隶属于洛阳的更始帝集团，很快分道扬镳，一路直奔长安，公元 25 年攻入长安城。赤眉之乱最初只有一百人的势力，但由于山东一带的饥民不断聚集，一年之间扩大至上万人。这一集团为了与王莽军相区别，将眉毛涂成红色，因而被称为“赤眉”。“赤”是汉王朝崇尚的颜色，士兵们以铠甲或战袍区分敌我，军中设置“巫”，使其击鼓、起舞，祭祀成阳景王祠。巫还负责传达应该即位天子的景王的指示。

樊崇说到底只是赤眉的“帅”。他们希望独自拥立一名刘氏皇帝。于是寻找景王的子孙，竟有七十多人。诸侯王刘氏子弟封县，为列侯。高祖以来已经过二百年，在地方上的刘氏子孙要多少有多少。

于是他们只好在其中血缘关系最近的三人中抽签决定，结果最为年少的十五岁的刘盆子得符中选。但是，当时他一副披发



149 赤眉与刘氏叛乱图

裸足、身着破衣、恐惧欲泣的样子。尽管抽得天命之符，却没有领导权的皇帝就这样诞生，并由此导致了今后的混乱。

更始元年（23）王莽的新王朝灭亡。公元 25 年刘盆子即位皇帝，年号“建世”。赤眉政权从叛乱开始一直以建立王朝为目标，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进入长安的赤眉军于公元 26 年放火烧毁长安城，盗掘了西汉皇帝陵甚至发生了凌辱吕后尸体的事件，也许可以理解为出于感怀城阳景王刘章的泄愤之举吧。公元 27 年赤眉军遭遇困境逃往山东，途中投降了刘秀。居延汉简发现了记有“建世二年”（26 年）赤眉政权年号的木简。

上将军隗嚣的反莽叛乱

当反抗王莽政权的势力在中原开始起兵之时，西方陇蜀地区的豪族也挺身而起。陇蜀的“陇”是甘肃天水地区，这里爆发了以隗嚣为核心的地方豪族的反乱。“蜀”即四川省西部，那里王莽政权的蜀郡地方长官公孙述，也向中央打出反旗。与中原西汉刘氏政权子孙打出反击王氏旗号起兵遥相呼应，西方的刘氏以外的地方豪族势力也在同一时期内建立起两汉交替之际的地方政权。陇、蜀与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之间分别以河西走廊和蜀的栈道衔接。一旦首都出现不安定局势，这里具有可以阻断交通、实行独立的地理优势。而且，独立之后陇地已经开辟了与西域的交通，又有素称“沃野千里（千里绵延的肥沃平原）”、“天府（天然资源的宝库）”蜀地在经济上的支援。

隗嚣出身于天水郡成纪县（甘肃省秦安），即秦族起源的高原地区。王莽末年的地皇四年、更始元年（23）他以上将军名义起兵反莽，势力很快扩大到了河西走廊。虽然隗嚣曾一时隶属于更始帝和光武帝，但最终拒绝了光武帝催促他入朝的要求，继续保持着独立；而且与另一地方独立政权的公孙述联手合作。隗嚣集团集结了十六姓的三十一名将领，特别是在隗氏之外还有天水、陇西一带西部边境强大豪族也加入到了他的集团。

居延汉简中发现了“复汉元年十一月”的年号简。《后汉书》中可见隗嚣政权独自的“汉复元年”年号。这是在政权所在地发现的贵重的当时史料。《后汉书》的“汉复”（汉朝复兴）看来有

必要根据居延汉简订正为“复汉”（复兴汉朝）。

蜀王公孙述的自立

公孙述的先祖在武帝时以吏二千石高官，迁徙右扶风茂陵县。王莽天凤中（14—19）他出任导江（蜀郡）卒正（太守），在临邛也作为有才能的官吏受到好评。但是，当各地爆发反莽动乱时，公孙述也将举兵于汉中的宗成迎入成都。不过，他见到宗成等进入成都后的掠夺及暴行之后，下决心守卫成都。当时他对成都县的豪族说：

> 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弛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

非刘氏的公孙述在社会对刘氏政权复兴抱以极大希望的时候，宣称在真君主到来之前要保卫蜀都不受盗贼侵犯。当初，更始二年（24）时他就自立为蜀王，定国号“成家”，立年号为“龙兴元年”。“成家”即成都之家的意思。后来在四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成汉”国也建立于此。“成汉”是对汉怀旧的国名，“成家”则意在建立与汉不同的国家。他废止汉的五铢钱，铸造了中国最早的铁钱。

蜀地有丰富的盐铜铁银资源。平原地区水运发达。即便东方发生动乱，这里北面阻断褒斜谷的栈道，东面闭锁巴地扞关

的话，就可以独立于这方圆数千里的平原。早于三国时期刘备，蜀地就独立于此与中原隔绝的。汉王刘邦虽也当过蜀汉王，但那是以汉中为据点，并未顾及蜀地。自立为蜀王之举，自公元前316年战国秦灭蜀王、建立蜀郡三百余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博识文人扬雄的《蜀王本纪》

在此之前成都出身的扬雄曾任职于西汉成帝、哀帝、平帝，也效力于王莽。作为研究方言语源著作《方言》的作者，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乃著名的汉代一流文人。他博览群书，还仿效故乡先人司马相如，擅长作赋。他的《蜀都赋》赞美了蜀地的丰饶的千里沃土，在《蜀王本纪》中讲述了蜀的历史。《蜀王本纪》一书早已散失，可以确认的仅仅有二十六条逸文。

扬雄编纂了三百年之前的蜀王的历史。他是从与《史记》秦本纪、高祖本纪以下的汉本纪相抗衡的立场出发撰写的。回顾了既非秦亦非汉的国家历史。扬雄的祖先在武帝时偶然去过蜀地。祖先辗转留下一些很早以前的、有关蜀的史迹和传说资料。说蜀人在湔山之庙祭祀古代蜀的鱼凫，听到杜鹃啼鸣就怀念望帝杜宇。成都城郭内有蜀王妻子之墓，在岷江治水的秦李冰造的石犀也在城内，是用来祈祷治水的。古蜀有蚕业、柏灌、鱼凫连续的三代时期。当时望帝杜宇出现于郫地，进而楚有一支称为鳖灵的势力进入郫地，由于治水王朝得以禅让。于是，开明王朝始称蜀王。

寄托于动物的王朝传说，可以在现实的历史中得到还原。后来，蜀王迁徙成都，再后来为秦惠王所灭。在蜀地1986年三星堆遗址、2000年大型船棺遗址、2001年金沙遗址的陆续发现，也使我们通过考古成果对古蜀的历史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汉末年在蜀人的心底应该还是有着那些被秦灭亡之前的传说和史迹的。公孙述宣告独立时，应该也想起了这些古蜀的传说吧！

这个政权还比较安定。在东汉政权建立的公元25年之后，还存在了十二年。与存在十一年的隗嚣政权（23—34）一同，作为与东汉帝国领域接壤的地域性政权得以维持。光武帝的东汉政权是以消灭这两个政权为目标的。只是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两政权的结盟很是强大，前来攻打的光武帝军遭其顽强的抵抗。建武九年（33）隗嚣死后，后继的儿子隗纯投降东汉，隗嚣政权就此终结。公孙述则与诸将领共同奋战，在建武十二年（36）吴汉攻打成都时战死，蜀地最终纳入东汉政权的统治。

南阳刘氏的举兵

光武帝刘秀出身于南阳郡蔡阳县东——接近河南省省境的地方。这里位于河南省以南阳市为中心南阳盆地的南端，是北有伏牛山山脉将其与洛阳、郑州的大都市隔开，西有武当山、东有桐柏山、南面为湖北丘陵所环绕的南北一百四十公里、东西二百公里的地区。沿盆地东端有汉水南流，白河、唐河等多条支流注入汉水。这里是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而且有水利之便。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最受注目的

时期，就是东汉政权建立之际。

响应刘秀举兵的功臣大半都是南阳出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汉政权可以说是由南阳豪族集团支撑的。云台二十八将以及功臣三十二人中有十三位是南阳出身。另外，还有所谓“河南（洛阳）帝城多近臣，南乡（南阳）帝乡多近亲”的说法。“帝城”、“帝乡”都是极为罕见的说法。西汉高祖以关中为基础，刘秀则是以南阳治天下。

山东地方农民拥立了西汉刘氏王室后裔刘盆子。在南阳，西汉刘氏的子孙已经植根于地方并且豪族化了，他们自己组成反莽军。所谓南阳豪族刘氏指刘秀、其兄刘縯（伯升），以及族兄刘玄（圣公、更始帝）。

从刘秀上溯九代的祖先即高祖刘邦。景帝子刘发封为长沙王。长沙国是南方之国，本来一直是分封给非刘氏的，但这里最终也成为刘氏的封国。刘发之子刘买被封为春陵侯（零陵郡泠道县）。元帝时刘买孙刘仁被转封于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根据其初封地名被称为春陵乡。皇族刘氏作为诸侯王分散于地方，进而又作为列侯分散于县。二百年过去，像刘秀这样的旁系刘氏多数已经植根于地方。史称刘秀美须眉，大口高鼻（“隆准”），额头前突。“隆准”的描写虽不禁使人想起刘邦，但他勤于农业却又与刘邦之兄相似。在性格方面，其兄刘伯升好任侠，与刘邦相似。

南阳这个地方在秦末是罪犯的流放地，还强制迁徙来大量

的移民。此地在西汉时期得以飞速地开发。南阳的中心城市宛的孔氏，就是在秦灭魏国时被迁徙至南阳的。他后来经营制铁业，拥有黄金千斤财富。宛，乃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工商业者辈出之地。

南阳一带汉墓墓室的石壁上有着粗狂笔触的雕刻画像。南阳画像石传达着南阳的丰饶与活力，描述了车骑连贯出行的场景、兴致勃勃的舞乐与六博的场面、狩猎、斗兽、神话等丰富多彩的题材。

光武帝即位的告天仪式

刘秀并没有从王莽那里直接夺取政权。而是在赤眉农民叛乱与刘玄集团之后掌握政权的。刘秀、其兄刘縯是响应以赤眉之乱发端的各地以农民为主导的反乱而举兵的。先是刘秀的本家刘玄当上天子，他没有效法秦始皇，而是称为更始帝。像刘邦即位时那样，在淯水河畔设坛、在臣下面前登上帝位。年号为“更始元年”。

但是，这个新皇帝与刘邦不同，他害羞流汗，举手而不能讲话。倒是民众造反集团很有能量，与强悍的领导权威相比，利用西汉刘氏血统产生了更有效的凝聚力量。他们的势力最终攻入长安，杀王莽，灭亡了新王朝。

支撑更始帝集团的将军们是山东人。最初，在南阳的宛建都，后来迁都洛阳。王莽首级被送至等待于宛的更始帝这里，更始帝将其枭首示众于宛城市街。但是，更始帝最终为赤眉军

所杀。在这天下混乱之时，刘秀镇压河北地方各势力之后，于建武元年（25）登基称帝。他代替更始帝镇压了各地势力，最终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以来的传国之玺被汉王朝所接受继承。玺印刻有“受天之命，皇帝昌寿”八字。当然，玺印没有传到今天。但这枚玺印的传承经历很有意思。当王莽强行从元后那里夺取此玺印时，曾因摔在地上而缺了纽螭（龙的一种）一角。后来又从更始帝转到刘盆子手中，最后辗转归于光武帝。政权不是从王莽直接转移至光武帝，先是从王莽转到更始帝。可以说在这期间南阳刘氏政权得以诞生。

然后玺印又由更始帝转到赤眉刘盆子（山东刘氏），是一种在刘氏之间的交替，最后权力又回到结束了农民叛乱的刘秀，亦即南阳刘氏手中。

光武帝即位时举行了告天仪式，告天曰：

> 王莽篡弒窃位，秀（刘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

从光武帝一方来看，第一敌人是王莽，其后是各种农民反叛势力。史书中“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的记述，正象征了他的反叛性格。

光武帝刘秀的统治

汉王室的中兴

光武帝统治的三十三年间（建武元年〈25〉—中元二年〈57〉），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恢复两汉交替的混乱局面上。镇压西北隗嚣和蜀公孙述的势力，从而恢复统一已经是建武十二年（36）的事了。外交方面对那些业已背叛的边境各国再度寻求和亲、逐渐恢复关系已经是即位三十年之后的建武三十年（54）了。秦始皇的经历也是做了二十五年秦王、十二年皇帝；刘邦做汉王四年，当皇帝八年；刘秀做皇帝也是战乱中的皇帝。

确保了内外安定之后，光武帝在建武三十二年（56）首次进行了东方巡狩。他是在效法秦始皇、汉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祭祀，报告了统一天下之事，改年号为“中元”。虽然公元25年是东汉开始的年份，实际上完成统一却是三十年后的中元元年（56）。总之，光武帝刚刚完成统一，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这一年的正月，东海、沛、楚、济南、淮阳、赵等国内诸王来朝祝贺统一。六月刘秀行幸至长安，祭祀西汉始祖高祖的长陵，报告中兴汉王室事宜。并在洛阳南营造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设施，在北郊筑方坛祭地，还没有忘记向全国颁布图谶之书。赋予汉室中兴以正统性的、称为“图谶”的预言书籍，在完成统一之后得到了公认。

统一的各项政策依次得以贯彻实行。建武六年（30）减轻田租，恢复了三十分之一的课税制；翌年废止郡兵，实行兵制改革；建武十年（34）修复西汉以来决口的黄河堤防；建武十五年（39）调查全国耕地面积和人口，还绘制了全国舆地图；翌年恢复了西汉五铢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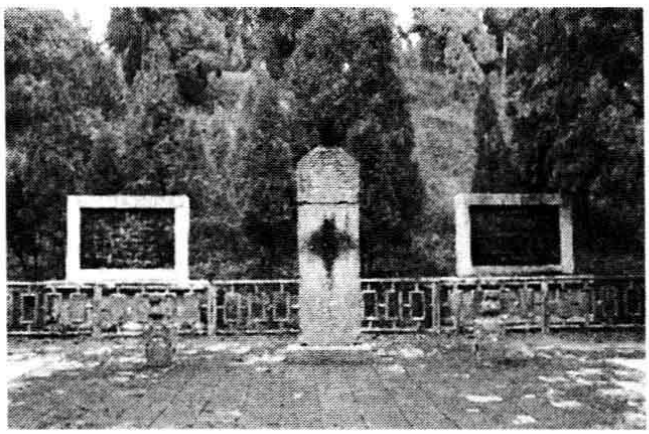
奴婢解放与行政大改革

光武帝曾频繁地解放奴婢，为的是救济那些在王莽末年动乱中因受掠夺而沦为奴婢的人们。王莽时期奴婢是可以拉到市场上买卖的。建武六年（30）根据旧王朝法律不再适用的原则，解放了王莽时期的奴婢。建武七年（31）解放了青州（山东省）、徐州（江苏省）地区的奴婢，建武十一年（35）废止了杀害奴婢罪轻于杀害良民罪以及奴婢伤害一般良民弃市处以死刑的法律。意在改善奴婢地位在法律上低于良民的现状。建武十二年（36）解放了陇（甘肃）、蜀（四川）两地奴婢，建武十三、十四年解放了益州（四川省）、凉州（甘肃）因被掠夺而沦为奴婢者。

光武帝果断实行了财政制度大改革。西汉时期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是分开运作的，少府是管理帝室财政与宫廷的重要职权部门，现在将其降格至仅仅掌管宫廷杂务。

建武六年（30）光武帝又果断改革了日趋复杂的官僚机构。东汉内外文武官僚7567人，相关属吏145,419人，官吏合计152,986人，光武帝命令中央司隶校尉和各州牧（刺史）所辖官

吏一律裁员。西汉末103个郡国、1587个县（包括邑、道、侯国）之中10个郡、400余（478）县被废除。郡国的废止率是0.87%，县的废止率达到30%。



150 原陵　光武帝陵墓原陵位于黄河南岸

县的废除在表面上看是行政改革，但细看被废县的分布的情况，都是那些在两汉交替期混乱中因失去中央权力支持而已经不复存在的都市（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2003年）。即北方的废止率为36%（南方为7%），而且在北方县中新县（战国以后新设的）的废止率为百分之47%（起源于春秋时期邑的旧县为13%）。

郡都尉、关都尉等军事要职也在此时被取消。郡都尉本是不让太守掌握军权而设的军官，建武六年（30）被废止，由太守掌管。但是，同时取消了“都试”这种对郡内士兵的战斗训练，翌年解散了郡的军队。

这样做并非授予太守以军事权，而是统一之后的东汉王朝所实行的内地军缩政策，并将缩减的部分用于强化边境军力。内地关卡所设关都尉也被废止。

东汉王朝迁都洛阳

建武元年（25）十月，光武帝建都洛阳。以后直至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避关东

之乱、再度迁都长安的十世、一百六十五年间，洛阳一直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最初，有人提出应该迁都西汉长安的强烈意见。杜笃著《论都》指出建都长安可得关中有四方山河环抱的防卫优势，反对迁都洛阳。但是，班固在《两都赋》中通过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比较，论述了后者的优越地位。认为长安闭函谷关则为秦岭山、九疑山、泾水、渭水合围之“西僻”之地，可以专注于防御。洛阳位于天下四渎、五岳之中心，以其内外无隔壁昭示天下，主张洛阳才是最适宜天下王者的首都。文章采用了“西都宾客”与“东都主人”问答的形式，的确构思巧妙。通过虚构人物表达意见，效仿了司马相如的手法。“西都宾客”踏访已然化为废墟的长安，根据故老的叙述，对长安的样子做了如下华美辞藻的堆砌：

>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

他以如此语调描绘了长安的优势，“华实之毛”即草木茂盛的肥田沃土，“防御之阻”是指周围天然屏障的关中险要地形：

> 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

继周、秦之后仍定都长安的汉，来自地方豪杰和全国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商人之中，有三种人（豪杰、高官、富豪这些选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人物）被迁徙至七个陵邑。如此强干弱枝构成的长安，终于立于万国之上：

>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不仅有人才，各类物产聚集长安。从越南（九真）、拔汗那（大宛）、印度（黄支）、叙利亚（条枝）经陆路、海路运输而至。形式上是“西都宾客”的讲述，实际都是班固的话。西都的华美、豪奢，正如司马相如的讽刺口吻一样，赞美奢侈的文章中，可以读出讽刺的意味：

>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事。

在长安的上林苑举行了盛大的狩猎、军事演习，为的是向夷狄炫耀威信。“东都主人”并未与西都对抗地夸耀洛阳的华美。洛阳与长安具有不同的性质，是像车轮辐辏（辐条）那样的天下中心，王者不分内外。与位于天下之西北、区别内外的关中长安相比，虽说同为汉都，性质却完全不同。

洛阳城发掘调查的记录

东汉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东十五公里，处南临洛水、北望邙山之地。这里曾经是西周建立成周城的地方。自古称“洛邑”、“洛阳”，汉代厌恶“洛”字的三点水，改为“雒”，是因为受汉朝正朔为火德、厌恶水德的五行思想的影响（不过本书仍使用了习惯用法的“洛”字）。洛阳城自东汉以后，又作为魏、西晋、北魏的首都延续使用着。城墙、城门等主要部分都被后代所沿袭。“汉魏洛阳城”的叫法是对四朝首都洛阳的总称。

1954 年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主，研究者们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夯筑城墙的南侧因洛水冲刷而流失，仅残留下北、东、西三面。《续汉书·郡国志》（现在《后汉书》的《志》是利用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合成的）注释中引用的《帝王世记》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形状为纵向较长、称为“九六城”的长方形。城墙全长推算为十三公里。

从部分发掘的情况可以推定，城内共有十二座城门，分别为东三、西三、南四、北二的分布；由各门进入城内的道路呈东南西北交叉状。宫殿分为南宫、北宫的南北对置格局，中间空地面积很大。建武元年（25）十月，光武帝最初入洛阳时的宫殿是南宫，最后他也死在这里。北宫是明帝时营造的，完工于永平八年（65）。北宫的德阳殿是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大型建筑，元旦的朝贺大会时百官在此集会。此外，在城内北宫东面有永安宫，北宫西北是称为涤龙园的御苑。东北角有太仓（国家粮库）和武器库，

南宫东南是官厅街，南宫的西北是称为金市的市场。据说在这市场上，京师游侠还出售过从顺帝陵墓盗掘的御物。城南造有辟雍、太学、灵台（天文台）。与唐长安城那种井然有序的皇城、宫城、里坊制的布局不同，东汉洛阳城宫殿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的结构，延续了西汉长安城特征。

151 刑具　秦朝的铁钳和铁栓，打制石料的刑徒所戴的刑具

服役刑徒之墓

洛阳北郊外，因黄河的流淌造成了巨大的河岸台地丘陵。这一带丘陵称为邙山，这里建造有除献帝以外（献帝陵墓在河南焦作）的东汉皇帝十一陵墓。光武帝原陵地处可以望见黄河的位置。由于没有出土文物，所以东汉皇帝陵的判断十分困难，就连原陵的性质也有不同说法。章帝时曾打算像西汉那样，为原陵和明帝显节陵修造陵邑（守灵都市），但出于继承光武帝、明帝以来节俭方针的考虑而取消了计划。因此，东汉皇帝陵与西汉皇帝陵相比，普遍简约素朴。不筑陵园围墙，仅设寝殿、庙、陵园管理官舍等。但是皇帝亲率诸侯王、外戚宗族妇女、郡国的上计吏以及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的侍子（人质）前往陵墓行上陵之礼，已经成为东汉重要的政治行为。

1964 年在洛阳城南 2.5 公里处，发现 522 座在首都洛阳服役刑徒的墓穴。墓形是长 1.8 至 2.3 米、宽 0.4 至 0.5 米的长方形

竖穴，都是已经腐朽的木棺葬。虽有个别墓中发现五铢钱，但普遍的是只放入两块墓砖。上面写有死者姓名、出身郡县、刑罚名称，例如“南阳宛、髡钳、陈便、永初元年五月廿五日物故死在此下”。是说带铁枷锁、受剃头髡刑的南阳郡宛县出身的刑徒陈便，于107年埋葬于此。

金印与光武帝以后

赐倭之奴国王的蛇纽金印

建武中元二年（57）正月，倭之奴国王使者来朝贡。使者自称大夫，说其国在倭国极南界。光武帝赐予印绶。小国使者特意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贡，得到印绶。接见使节的光武帝，翌月便在南宫前殿走完了自己六十二年的人生道路。倭之百余国之一的小国国王与大帝国皇帝的组合、相遇，对倭来说是重大的事件。然而就大帝国皇帝而言，也是意味着统治的最终结束。

关于赐倭之奴国使者印绶的内容虽然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载，但是在福冈县志贺岛、现在是海水环围的连陆小岛，于江户时代天明四年（1784），从耕地中发现了一枚仅2.35厘米见方、重109克的小型金印。印的上部开有一可以穿过称为“绶”的绳纽的小孔，这部分称为“纽”。此印称为“蛇纽金印”。印面阴刻“汉委奴国王”五字。这枚非常有名的国宝印，现在福冈市博物

馆展出。《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曰“光武赐以印绶”，由此得以实物的证明。但是，由于过于奇妙的一致，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怀疑其为伪印。

阴刻的 2.3 厘米见方的确是汉代的规格。2.3 厘米正是汉代的一寸规格。阴刻（文字部分凹陷）与我们印章的阳刻（文字部分凸起）不同，是竹简、木简时代印章的特点。在纸文书上盖红章的时代，与现在一样是在文字部分着以朱红，进行阳刻。秦汉时期的文书封印，是在绳纽捆绑处封以黏土，在黏土上盖章施印。为的是防止擅自开封。封印文字是凸起的，所以用阴刻印章才有效果。

1956 年在上文曾提及的中国云南省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一枚同样为 2.3 厘米四方的蛇纽金印。刻有“滇王之印”四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武帝“赐滇王王印”，与实际出土印一致。这两枚蛇纽金印的所有者、倭之奴国王与滇王之间虽并无直接关系，但若以汉帝国为媒介来看这两枚天各一方的印章的话，又可以见到其中的深刻联系。汉代金印是授予具有最高等级官位或爵位者的。金的价值是授予那些对刘氏王朝有功劳者的最高奖赏。汉代用大量的黄金进行赏赐。“汉委奴国王”印含金 95%、银 4.5%，还有若干铜的成分。虽没有达到二十四开金（百分之百纯金），但也接近二十三开金（95.8%）纯度的光泽，很是珍贵。109 克的重量虽不足当时的半斤，但所刻文字证明了当时有过周边小国向刘氏王朝朝贡之事。比起一斤的金块，这枚金印虽不足

半斤但以高纯度金所刻五个文字、蛇纽以及印绶下赐远来使者的意义显然十分重大。

赐金印之光武帝一方的形势

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司空、将军等高官被授予金印紫绶。官印仅在任期之内才能持有，爵或印因为是对个人功劳的奖赏所以不必归还。对诸侯王授金玺绿绶，列侯、关内侯授金印紫绶。被授予金印紫绶的外国有：西域的蒙奇、兜勒，南方的叶调、掸。西南的白狼、蛮夷王唐等。同样是金印也有印钮形状上的区别。与诸侯王、列侯的龟形不同，外国国王多授予骆驼、羊、蛇等有地方特色的印钮。

“汉委奴国王”文字这第一个“汉”字意义重大。册封为“东夷倭奴国王”，作为“汉委（倭）奴国王”。由于东夷国王的朝贡，光武帝承认其为汉的王国。然而，虽说是汉的国王，并不是隶属于汉帝国之倭奴国的意思。外国隶属国称为“外臣”。奴国的使者仅须数年一次，带上贡品参加正月朝会即可。所谓“汉国”名称仅用于匈奴、倭国。同样是光武帝时期，乐浪郡的使者苏马諟被封为“汉廉斯邑君”。郡外的蛮夷张游也是被封为“归汉里君”。传世印章中亦有“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骆驼纽铜印、“汉匈奴破虏长”印、“汉归义胡长”骆驼纽铜印、“汉夷邑长”等。“汉”字是“远方来汉之朝贡国”的意思。其国并不隶属于汉，而是与汉保持一定距离的国家。“倭”有三十多国，在向汉派遣使节的国

152“汉匈奴破虏将军司马”铜印

家中，奴国即其中之一。

东汉光武帝的统治虽长达三十三年，但绝不是一贯持续安定的统一政权。公孙述建立的独立于汉的“成家”政权长达十二年之久，隗嚣政权宣言“复汉”，即“复兴汉王朝”。刘秀中兴了汉家政权。所谓“汉”，就是凭借以高祖刘邦庙为首的宗庙所守护的“家”。刘秀修理高祖庙举行祭祀，祭祀了西汉皇帝的十一陵。还在新都洛阳建立高祖庙，供奉了从高祖至平帝十一位皇帝的神主（牌位）。

倭之奴国使节来访的前一年，吕太后的牌位从高祖庙特意被撤除了。因为吕太后违背高祖“非刘姓不王”的誓约，将一族封王。既是出于保卫汉家宗庙的目的，也有主张自己政权正统性的意义。比起倭之奴国一方来，对于宣称继“汉”中兴的光武帝一方来说，赐予冠以“汉”字金印之举的意义也是极大的。

光武帝之死与明帝的即位

光武帝去世的当日，第四子太子刘庄即位皇帝。西汉皇帝之死与新皇帝即位之间，有数日的空白期。但是，东汉在大丧的灵柩前举行即位仪式。葬礼时官僚们穿着白色单衣的葬礼服，脱帽戴白色头巾。然后，暂时退场，更换吉礼服装。皇帝之位一天也不空缺。

这是中兴的王朝的做法，意在不允许王朝再度中断。光武帝的遗体已经停放在正殿两根大柱中间的梓木灵柩之中。“梓”（梓

树或野梧桐）的心材呈红褐色，具有很强的耐久性，常用于皇帝的棺木。“梓棺”特指天子之棺。棺中遗体已沐浴完毕，以赤绢盖身之后穿上金缕玉衣，口中含玉。为了防腐，还使用冰块。负责沟通先帝与皇太子的是太尉。在南郊向天报告“光武”的谥号，在灵柩前宣读策文之后，授予皇太子传国之玺，群臣山呼“万岁”。即位仪式就如此简单。

光武帝的遗体于三月丁卯葬于原陵。翌年永平元年（58）元旦，新皇帝明帝上光武帝原陵，在陵墓举行了以往一直在宫中举行的元会。即公卿、百官、诸侯王、郡国计吏（报告财政的官吏）以及皇族、外戚来朝廷参加的朝贺仪式。此时将仪式移到了先帝陵墓举行，郡国计吏向先帝灵魂报告谷物价格、风俗变化的情况。所谓“古不墓祭”之礼，从秦始皇陵造寝殿开始崩溃，汉代予以延续。现在首次汇集皇帝以下百官在先帝陵举行大规模礼仪。此时已经不见倭使节的身影。

安定的明帝时期

明帝时期与此前的光武帝时期，在国内都维持了外戚不曾介入政治的安定局面，也未实行过任何改元，永平年号一直沿用了十八年。明帝继光武帝之后实行了巡狩。从改元第二年的永平二年（59）向西巡行开始，他先进入西汉古都长安，祭祀高祖陵，进而造访了从高祖至平帝的十一座皇帝陵，所谓“十一陵”是排除了惠帝之后的两位少帝的，以此再次确定了自己继承先世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出于政治需要，

对被赤眉军破坏、盗掘的部分西汉陵墓予以了修缮和保护。

永平十三年（70）将作谒者王吴和王景仅一年就完成了汴河的治水改造工程。在王莽时期大幅改道的黄河以西，有一条叫做汴河的支流。西汉平帝黄河在此决口之后，一直没有治理，以致常有洪水泛滥。王景是从琅邪徙至乐浪郡移民的后代，擅长水利技术，并开发了称为“堰流法”的新方法。“堰”即用于调整水流的堰，“堰流”就是使阻塞的水流恢复畅通的意思。

王景从荥阳至渤海湾河口的千余里（约五百公里）河道，每隔十里设一水闸，用来分流。在不强行阻碍河流水势的情况下，使其流势逐渐减弱最终流入大海。如果汴河治水顺利成功的话，本流的黄河亦可安定。黄河直至唐末没有大的决口，进入安定时期。明帝曾想起当年武帝时期的瓠子决口和治水。像武帝那样他也亲赴现场，巡狩至黄河南岸的荥阳（今郑州市西北），将该流域的耕地贷与贫苦农民，采取禁止豪族占有的措施，成功实现了这一人口密度最大地区的治水灌溉。《后汉书》中没有《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那样的水利史专篇，可能与当时黄河较为安定有关吧。

白虎观会议对《五经》解释的讨论

西汉宣帝时曾招集儒者在石渠阁讨论过《五经》。其后，由于对《五经》的解释趋于细分化，章帝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招集数十名儒者，围绕《五经》文本的异同、经文的解释，展开

了历时一个月以上的热烈讨论。参加者不仅有太常官以下的博士、诸生、诸儒，还有宿卫官的五官中郎将、负责传达皇帝诏书的大夫、议郎等人。程序是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传达章帝的提问，侍中淳于恭将讨论的论争点上奏，最后由皇帝作出判断。章帝继光武帝、明帝二代之后，四岁为太子，十九岁即位，自幼宽容而好儒学，作为皇帝亲自积极地参加儒学讨论。有关白虎观会议讨论的情况，班固在《白虎通德论》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上围绕“天子”与“皇帝”的称号有过争论。提问曰：“为何天子是爵号呢？”即所谓“爵位”是皇帝赐予臣下的，而列侯以下至公士有二十等爵位。为何授予爵位的“皇帝”自己又是“天子”这一爵位呢？认为“天子”乃“爵号”的说法是今文学派的观点。周代称为“王”，汉代称“皇帝”，为何一定要把“天子”这一爵位纳入地上世界的爵制秩序中呢？古文学派一方以《春秋左氏传》为依据，主张“天子”是对夷狄使用的称号，“天子”不是爵号。由于秦始皇过于接近天，所以汉代皇帝作为“天子”强调与天保持着一定距离。争论是要解决两个称号之间的矛盾。与天上的“上帝”相匹敌的秦始皇的确跟与上帝画有界限的汉代的天子是矛盾的。于是这成了汉代儒者重要的争论点。

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对皇帝与天的距离有着各种说明。“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即皇帝说到底是生于天地的实际存在。讨论中引用了许多当时盛行的纬书。用“纬”解释“经”。引用解释《孝经》的《孝经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

之天子”，认为效法天之斗极（天极）的天子乃诸侯的中心。又引《孝经》的纬书《孝经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希望提高自己观点的权威性。

又一个提问是：“为何又称天子，又称帝王呢？”对此，解释曰：“接上称天子者，明显是以爵事奉上天；接下称帝王者，明显是对天下提倡至尊之号，以便号令臣下也。”也就是说，天所赐的爵位就是天子。这也是《孝经钩命决》的解释。提出了与左氏学主张中华内部称“皇帝”、对待夷狄称“天子”、本有两个称号的观点不同的另外一种合理的解释。“天子”的称号在作为民之父母所以位于民之上的同时，又有其与民并列之“皇帝”形象。

章帝告诫皇族不可奢侈。对饥荒时出现的流民发给他们返乡路费，允许他们在亭内免费住宿。对于那些申报过、自己没有户籍的流民也授予爵位。章帝还亲自与骑兵一同轻装巡行，视察民众生活。对死罪以下的罪犯各减刑一等，还认可其可以纳绢赎罪。

匈奴与经营西域

与南匈奴的关系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日逐王比自立为匈奴的南单于（醯落尸逐鞮单于）。他向东汉派遣使节自称臣下，隶属于汉。东汉一方也于建武二十六年（50）在南单于送子来作为人质时，允许他居

住云中，而且赐予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武器）、什器等。又从河东郡调发干饭（干燥米）二万五千石、牛羊三万六千头支援南单于。当时对西域各国的一年的经费总计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对南匈奴一年的经费总计竟有一亿九十余钱。这数字显示了东汉朝对南匈奴是何等的厚遇。

这一年所设使匈奴中郎将是担负保护南匈奴部族任务的官职。东汉皇帝与南单于是相当于君主与客臣的关系，即比君臣关系高一档次的近乎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可以说匈奴自身继续保持独立的礼、法，在与东汉的外交关系上隶属于汉。南单于在祭祀天神（天）的同时合祭汉皇帝。

1977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的东汉末匈奴墓葬，反映了东汉以后匈奴与汉文化融合的情况。墓室中出土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骆驼纽铜印。此印与1953年新疆沙雅县出土的羊纽铜印“汉归义羌长”属于同类。对北方、西方游牧民族赐予适合当地风土之骆驼、羊钮印章，实行中原王朝的册封。印文冠以“汉匈奴”、“亲汉”一类汉朝的词语表达，与赐予东方倭国的蛇钮金印“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印（魏赐邪马台国卑弥乎使节印）的印文是同样的称号。

该墓葬为夯土坟丘（高6.2米，直径23米），拱券形砖墓室中出土有五铢钱、铜镜、陶灶明器等。无论墓葬形式，还是出土文物都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从铜印推测墓主当为南匈奴诸部族的一名部族长。陕西省也出土过“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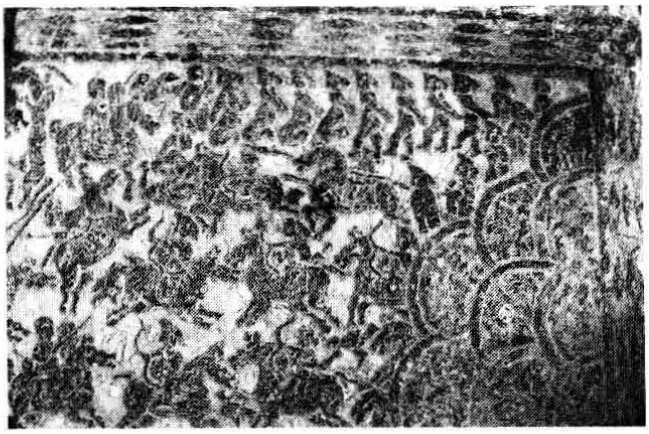
钮石印，传世品中也有完全同文的驼钮铜印（京都大谷大学藏）。也应当是东汉皇帝赐予匈奴一部族王之印。

北匈奴的毁灭

另一方面，分立的北匈奴也在光武帝时期前来要求和亲（建武二十七年〈51〉）。东汉政府出于对刚刚隶属之南匈奴关系的重视，避开了与南北两匈奴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此后，北匈奴在与南匈奴交战时，有时也侵犯东汉边境以窥测东汉朝的反应。章帝元和二年（85）南匈奴伊屠於闾鞮单于在琢邪山大破北匈奴王。当时，武威太守孟言上言，认为应该答应北匈奴积极的和亲要求，归还俘虏。围绕这一外交判断，东汉政府内部以太尉（军事长官）郑弘、司空（副丞相）第五伦为代表的对北匈奴强硬派，与以司徒（丞相）桓虞、太仆（掌天子车马）袁安为代表的和亲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

章帝最终决定，一方面归还俘虏表示宽怀，一方面对捕获敌兵的南匈奴论功行赏，犒劳南匈奴的忠信。东汉对北匈奴的外交情况多见于记载。此后的和帝永元三年（91）虽然派遣了要求北匈奴臣属的使节，但最终采纳了南匈奴应该消灭北匈奴的上书，南匈奴与东汉的联合军共同袭击了北匈奴，斩首八千，俘虏数千，北匈奴遭到毁灭性打击，并于翌年为窦宪所灭。北匈奴王族以下五百人被俘，其单于于翌年的 92 年逃遁，不知去向。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塞，从西汉以来一直是对



153 汉代画像石“胡汉战争图”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匈奴的战略基地。这里出土的所谓居延汉简中有着直至光武帝建武初年的木简，尤以光武帝建武年号简居多，是生动反映边境军事、士兵生活的史料。

1974 年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的十七枚木简，是建武初年有关塞举狼烟的规定。建武初年统治河西五郡的窦融，于建武五年（29）臣属于光武帝。简文是根据匈奴兵人数、入侵路线施放狼烟的种类和次数方面的详细规定。狼烟的种类有烽（在笼中装满燃料点火挂起）、表（旗语）、鼓、烟、苣火（火炬）、积薪（柴火）等六种，白天举烽、表、烟。黑暗的夜间举苣火。规定兵力不足千人时烧一山之薪，千人以上的话点二山之薪，千人以上且进攻亭障的话点燃三山之薪。

反映对匈边防最前线生活的史料

1973 年—1974 年出土的题为“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的册书，共三十五枚，四十七行，是一份有关甲渠候粟君（“粟”当做“栗”）向一名叫寇恩的人贷出牛、谷物引起诉讼事件的调查文书。

建武三年（27）十二月壬日居延县都乡啬夫宫（调查人员）

根据甲渠候栗君的上诉，按照县的命令调查了寇恩（被告）。下面是栗君的诉状、十二月十九日做成之寇恩的供词确认记录，以及宫对此事的结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县下发至甲渠候官的文书中记曰：栗君由于起诉不当，而适用于“政不直者法（诬告）”。

根据诉讼，栗君为了在张掖郡觻得县出售五千条鱼，以八岁黄毛牛一头（相当于谷物六十石的价格）、谷物二十七石雇用寇恩，与寇恩约定卖鱼须得四十万钱。出发时栗君因黄牛有些消瘦，建议带上黑毛五岁牛（亦值六十石），所以寇恩带上黑牛出发。但是，栗君认为黑牛是借给对方的，寇恩却认为黑牛是自己工钱。

寇恩在觻得县将鱼卖掉后，因为没有达到约定的四十万钱，所以将黑牛卖得的三十二万钱交给了栗君的妻子“业”。虽然还差八万钱，但寇恩用“业”的车装载了相当于一万五千六百钱的货物踏上归途。途中寇恩又购入大麦二石值六千钱，肉十斤值三千钱交给“业”。所以，此时已经还款二万四千六百钱。

此外，寇恩儿子寇钦用时三个月十天（一百日）为栗君捕鱼，按一日二斗（0.2石）日薪计算，一百天合二十石，值八万钱（一石四千钱），可以偿清负债。又因为从觻得县至居延归途二十天的费用尚未计算，所以结论是寇恩不必归还牛和谷物。

宫所做的裁断，是栗君的牛、谷物不必归还，因为寇恩的货物、卖于业的肉、谷物，以及钦的工钱加在一起，已经还清欠款了。这一史料活生生地向我们传达了防范匈奴最前线民众的具体生活。此外，在居延还发现了反映实际战斗的建武年间的木简。

匈奴骑兵侵入居延城塞，掠夺了汉的武器、烧毁城塞的情况都被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

玉门关与阳关：西域外交的门户

东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史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从光武帝至安帝之间，建交与断交反反复复。光武帝、章帝、安帝时期消极的西域外交与明帝、和帝、顺帝时期积极的外交相互交替。东汉朝转为消极外交后，作为结果造成了北方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可以说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与对匈奴的外交是紧密相关的。敦煌西郊外的两个关卡玉门关与阳关，是东汉朝与西域外交的出入口。关门的开启与闭锁完全取决于西域各国、匈奴、东汉朝之间势力对比的形势。

西汉末期多达五十五国的西域诸国，在东汉复兴时虽然派遣使节来寻求隶属，但都被光武帝以刚刚恢复统一需要充实内政为理由拒绝了。六十五年之后再度恢复与西域的外交，已经到了汉明帝的时期。永平年间（58—75）进攻匈奴时夺取了伊吾（现在的哈密地区），在此设置宜禾都尉，开垦屯田。伊吾在敦煌之北，是一块位于天山山脉东端的肥田沃土，生产谷物，也栽种桑、麻、葡萄。这是一块汉朝与匈奴相互争夺的地域，对于东汉控制西域有着重要意义。此时，恢复了与西域的外交关系，永建四年（129）于阗诸国送来人质。经营西域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职官，也在明帝永平十七年（74）得以设置。

伴随着明帝的去世，焉耆、龟兹国攻打了都护，匈奴、车师也包围了戊己校尉。建初元年（76）酒泉太守段彭虽在交河城击溃车师，但章帝不欲使国家疲惫，停止了伊吾的屯田，于是这一地区被匈奴占领。和帝时由于西域都护班超的努力，终于迎来五十余国全体隶属东汉朝的时期。永元元年（89），窦宪击破匈奴，攻打伊吾。永元三年治理西域的班超出任西域都护，进驻龟兹，戊己校尉也得以恢复。永元六年班超攻破焉耆，西域五十余国至此全部隶属于汉。

西域诸国的动向

伴随着和帝之死，西域发起反击，安帝永初元年（107）都护府被攻击之后，终于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也于永初元年（107）废止。代之而起的是北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但是，到了顺帝时班超之子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攻破车师、焉耆之后，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内属。以前放弃的伊吾沃土又得以恢复，重新开始屯田。后来，灵帝率臣下去东汉王朝始祖光武帝原陵，举行祭祀上陵之礼时，参加者除诸侯王、外戚妇女、郡国计吏之外，还有匈奴单于与西域三十六国的来宾。由此可见，作为东汉王朝是如何重视与匈奴、西域外交关系的。

西域诸国中以沿西域南道的于阗、鄯善二国为强国。于阗甚至使从精绝到疏勒的十三国都臣属于己。作为通往西域进出口的敦煌出土了东汉时期木简，其中有顺帝永和二年（137）的年号简。

敦煌太守裴岑在这一年率郡兵三千人与匈奴作战，取得对呼衍王的胜利。记载此事的石碑，十八世纪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被发现。西域诸国地域内也有东汉时期的遗迹。

1959 年在民丰县北一百五十公里处的沙漠的尼雅遗址，发现一座东汉夫妇合葬墓，在木棺中出土了两具木乃伊尸体。棺内随葬品中有各种色彩鲜艳的丝绸和棉布。还出土了“万世如意文”、“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吉祥文字及瑞兽模样的锦和棉布的蜡染纺织物。一件男用袍保存状况完好，可谓精品。还出土了棉袜、刺绣镜袋、香粉袋等。现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遗址也有东汉墓葬，出土了东汉的丝绸、五铢钱等。织绣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永昌”等吉祥用语的丝绢绸，代表了当时纺织技术的先进水平。

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

从长安至西域入口敦煌的道路即河西走廊，那里自西汉以来设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诸郡。这一带也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址。武威出土了刺绣丝织物。1969 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发现东汉后期的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二百余件随葬品中青铜车、马、武士俑近百件。三十九匹马、十四辆车、十七个骑兵俑、二十八个奴婢构成的一支部队，很像东汉对西域作战的一支军队。

光武帝时期，当中原忙于再统一的同时，边境纷争也此起彼伏。最初出现动向的是西边的西羌。西羌的先零联合各部族攻打

金城、陇西郡（34 年），翌年为陇西太守马援所镇压。不久，在越南交趾的征侧、征贰姊妹出于对太守苏定实行法治的反抗起兵（40 年），九真、日南、合浦郡各部族起兵响应，攻占六十五城，称王自立，势力壮大。东汉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郡兵万余人，最终予以平定。然而，很快在西南又发生了夷渠帅栋蚕率姑复、连然、滇池、昆明各部族的叛乱（42 年），益州太守繁胜、武威将军刘尚迎战，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

东胡的乌桓与匈奴兵联合侵犯边境，派遣到南方的伏波将军马援的三千骑兵出击了五阮关（45 年）。在南方武陵蛮相单程袭击了郡县官府（47 年），此时刚刚被派到西南的武威将军刘尚应战而大败。两年之后，伏波将军马援再次上阵，最终迫使相单程投降。马援在西边、北边、南边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反映了当时东汉活跃外交的情况。

与南匈奴的和平（48 年）是迎来光武帝末年与东夷诸国（夫余、高句丽、倭）和平外交以及明帝统治西域的转折点。出敦煌关卡向北追逐匈奴，占领天山山脉东端夷吾卢地，设置宜禾都尉，实施屯田（73 年），于阗各国送王子来做人质寻求臣属。翌年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对西域的经营正式启动。

王充的科学批判精神

谶纬思想——东汉儒教的特征

东汉时期的儒者竞相学习图谶之书（预言之书）。图谶之书编纂于西汉哀帝年间，光武帝本人笃信图谶。作为东汉时期儒教的一个特征，图谶之书亦即谶纬思想受到重视。与经书的“经”（纵线）相对、对经书进行辅助说明的，由于起着“纬”（横线）的作用，所以称为纬书。还有所谓“谶纬”的叫法，是对解释经书之“纬”与预言之“谶”的总称。

最早出于政治目的利用谶纬的是王莽。王莽毒杀平帝、立两岁幼主刘婴而自己摄政时，据说淘浚水井时出了一个上圆下方白石，上有朱砂书写“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的符命。光武帝也是利用谶纬建立政权的信奉者。在他尚未中兴汉朝之前，据说已经出现强华献上的“赤伏符”等图谶之书，还出现了所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预言。

此后，谶纬思想超出单纯的预言作用，对东汉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建初四年（79）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上，与会者大量引用纬书解释经书，展开议论。

西汉根据瑞祥、灾异读解天神上帝意志的思想业已存在。以往儒家所回避的“怪力乱神”，现在得到积极的解释，可以说产生了新的思想潮流。东汉儒者中的虽有桓谭、王充（27—101）、

张衡那样批判谶纬思想的人，但应该看到谶纬思想的出现，是儒教已经进入了与皇权结合、作为支持皇帝制意识形态新阶段的产物。

所谓“皇帝”在秦代被法家解释为“煌煌上帝”，即与上帝是同样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的解释：皇帝一方面有等同的上帝之德，一方面又是上帝之子的“天子”。在这种新儒教皇帝观之中，起到理论整合性作用的是谶纬思想。对于既与上帝相等又是上帝之子的矛盾，从经书与纬书两方面做出了说明。皇帝为何能成为皇帝呢？因为体现上帝意志的天命是通过图谶下达的，正是根据这种图谶，皇帝得以正当化。所谓“天子”是显示其与上帝关系的称号，所谓“皇帝”是反映其作为地上世界统治者权力的称号。在纬书《孝经纬》中所作的解释是“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的解释，讲的就是皇帝权力的两面性。

批判儒教神秘主义的《论衡》

出现于西汉末、兴盛于东汉时期的谶纬思想，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最终因其预言色彩过重，在隋文帝时遭到禁止，隋炀帝进而予以严厉取缔，多数书被焚烧。因此，这些书现在基本亡佚，我们能见到只是清朝考据学者的辑佚而已。

对这种儒教神秘主义倾向提出反驳的是王充，在此略加叙述。王充，会稽上虞人。学于洛阳太学，师从班彪。因家贫，无

力买书，就去书店站着阅读，靠背诵通晓百家之书，著有《论衡》三十卷。所谓“论衡”即论及各种思想予以衡量比较的意思。他主张所谓“天”说到底是自然物体，反驳了当时天人感应、谶纬思想认为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观点。

《论衡·自然篇》是对自然进行论述的篇章。指出：天者，普遍施气于万物之中，以谷充饥而以丝麻御寒。气变化而引起自然灾害是当然的，这并不是天意在警告人类。天既无口、目，亦无意志，乃无为之物。在《实知篇》还对谶纬预言予以严厉批驳，曰：都说孔子预言“亡秦者，胡也”（出于《易经》的纬书《易纬》）果然，二世胡亥灭亡了天下。其实这是后人的伪造。

其独到的科学批判精神，唯物论思想被当时主流意识视为异端，但是作为东汉儒教的一个分支是值得注目的。王充的思想绝非脱离时代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科学技术、道家、道教自然哲学的影响。

印度佛教的传来

印度佛教经由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关于从西域传来的时期，我们所知仅限于传说，不但不准确，而且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认为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国王的使节伊存口传《浮屠经》（《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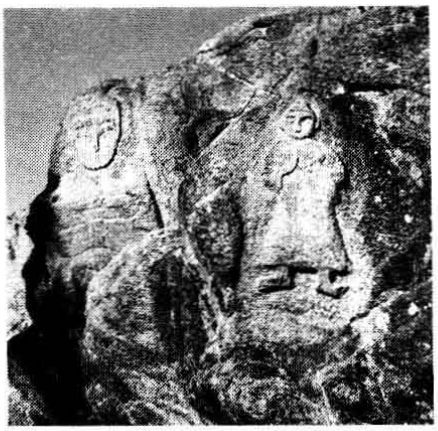
光武帝有十一个儿子。他与许美人之间所生楚王刘英在诸王之中封国最贫穷狭小。与历代楚国一样以彭城（现在的江苏省徐

州市）为国都。异母兄弟明帝即位后，因为二人关系最密切而受到优待。晚年的刘英热衷黄老之学同时祭祀浮屠。所谓“浮屠”与“佛陀”发音相通。同时信仰黄帝、老子和西方的佛陀。作为刘英是将自身置于无为自然之中，一面祈祷自身长寿，一面祭祀西方的浮屠。明帝有时发出死罪减刑的诏令时，刘英认为自己身处藩国，没能支持天子就是罪过，为了赎罪向朝廷献上了丝绸。明帝表示理解他的心意，退还丝绸要他去帮助那些在家（优婆塞）或出家（桑门）的信徒。可见，明帝是知道浮屠的情况的。西域传来的不仅有物质的，也有浮屠这种信仰。

154 明代丁云鹏《白马驮经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汉明帝时曾派遣蔡愔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两年后，天竺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至中国，并创置白马寺。此图即绘白马驮经故事，完成于天启乙丑（公元 1625 年），为丁氏晚年作品

然而，刘英很不得志。永平十三年（70）因为谋反的理由失去了王位。诉讼起因于一名男子的告发。刘英被判定为制造预言图书，有谋反情绪。楚国被废除，刘英被流放。从连坐者数千人的数字反观的话，与楚国面积相比，刘英的人际关系网具有相当的范围。

关于西域天竺国（印度）的浮屠（佛教）在袁宏《后汉纪》有如下的说明：“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



155 **摩崖石佛**　发现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作为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

156 **麻浩崖墓佛像**（四川乐山）　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

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即便公元一世纪的浮屠信仰并非如此，佛教已经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东汉社会却是肯定的。关于天竺佛道在明帝（57—75 年在位）时传入中国的情况，《后汉纪》记载有以下的文字：

> 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然而，这一佛教东来的传说并非史实，应该只是后世的创作吧。

备受关注的东汉佛教遗址

近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发现的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东西十七米、高八米范围的岩石壁面上，有着如同东汉画像石那样的、各种题材的雕刻。饶有兴味的是一方岩壁的画像上既有中国的西王母、官僚形象，又有佛的立像、坐像、涅槃像和佛教故事（舍身用自己的肉喂食饥饿的虎子）。

在面临东海最东边发现这一处与中国本土道教尚未分化、或曰合体的东汉时期佛教遗迹，就其意义而言应该更加受到的重视。在当时人认为老子进入夷狄成了浮屠，即有所谓“老子化胡说”。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对外来宗教尚不能予以客观认识的话，也无足为怪。但另一方面，佛教没有受到抵制、得以在中国传教。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将新来的佛教与道教同时予以信奉，应该也与此有关。四川省乐山麻浩崖墓中也发现有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有关东汉时期的佛教，希望今后能根据更多新遗迹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第九章

自然灾害与内乱的世纪

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

侵袭人类生活的大自然

东汉二百年中，从公元一世纪末的九十年代直至进入二世纪，的确是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以东汉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与西汉相比的话，西汉 214 年中的灾害年份仅 32 年（15%），东汉 195 年中却有 119 年（61%），可谓频发。自然灾害与政治上的不安定（宦官、外戚势力的崛起、党锢之争、黄巾之乱）、周边民族入侵似乎在相互呼应，极大地动摇着东汉帝国。

“天灾”被视作“天”（上帝）意志的反映，皇帝感到自身的政治责任，于是罢免官僚，负责任地对受灾百姓采取各种各样的救助。而且，灾害或天地怪异的现象发生之后，那些曾经指责

皇帝过失的贤良、方正、极言直谏之士就会被推荐为中央大臣级别的公卿，或地方郡国的长官。这是一个与自然保持着相当紧张关系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仅有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大自然赐予丰厚恩惠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灾害。人类正是在这样大自然的两面性之间，坚强地生存着。正是因为身处“负自然”的时期，人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智慧，对秦汉四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

二世纪是从自然环境解读时代的时期。气候学家竺可桢指出，从东汉时期年平均气温开始下降，一直持续至六世纪。文献中有着东汉洛阳晚春时节竟然降霜、下雪的记录。

一旦发生灾害，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就要向中央汇报。灾害引起饥荒，农民流亡，盗贼丛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地方的领导官员将受到批评。如果是大范围灾害的话，会造成大规模灾民的流亡，从而动摇王朝国家的体制。这就需要即刻作出具体应对，例如向灾区派出医生、发放粮食、免除租税，特别是在出现死亡的情况下，要收敛遗体、支付丧葬费和棺材等。对于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还会开放御苑等公田（国有土地）允许其耕种。旱灾时朝廷在名山举行祈祷，不仅对灾民实行直接性救济，同时还采取精简行政机构、赦免罪犯、禁止酒的贩卖等措施，推出保证社会安定的政策。

水害、旱灾频仍

就水害、旱灾而言，事先建设堤防、灌溉渠道、陂（贮水池）、塘（坡地贮水池）等完备的治水设施，是一种防灾对策。西汉时期建造的各种设施由于在两汉更替之际已经荒废，所以此时需要予以重整。在西汉以来的六十年间洪水不断的黄河下游、济水流域，数十个县城、水闸被淹，沿堤岸的农民处于无法耕种的状态。特别是该流域南侧的豫州（河南）、兖州（山东）受灾情况尤为严重。和帝永元十年（98）、安帝元初二年（115）都曾下诏修复业已荒废的旧有堤防、渠道。小规模渠道、贮水池属于区域性局部灌溉，由郡太守管辖。如南阳太守杜诗修“陂池”、汝南太守邓晨造“塘”、庐江太守王景建“芍陂”，起到开发地方水利的作用。平原的贮水池因为可以截贮洪水，所以是防止水灾的设施。

如果整理一下东汉时期增多的各种灾害记录的话，可见几点特征。特别是安帝统治时期（106—125）的二十年，水害、旱灾、地震灾害频仍，对应政策也非常详细。又由于当时外交处于劣势，在国内得以专心应付灾害。当时由于西域都护受到西域诸国的袭击而废止，西域被放弃，进入北匈奴取代东汉统率西域诸国时期。当时的太尉（军事）、司徒（民政）、司空（土木）三公，因为对天地灾异发生有责任而被罢免。正在安帝即位的永初元年（107），太尉徐防因灾异被罢免，由此开始了对三公的罢免。

日食这种太阳暂时失去光辉的天文现象，被认为与臣下侵害君主地位有关。仅仅几分钟的现象，根据发生的方位被视作反乱、

皇帝死、诸侯王死、外戚与太后专制的前兆。即使在首都无法观测的话也无妨，全国各地设有完整的观测网。观察结果显示在196年之中，共有72次关于日食的记录。频度高达每2.7年一次。

特别从安帝永初七年（113）至永宁元年（120）的八年之中，连续观测到日食。洛阳的史官实际上仅观测到四次，其他是来自于辽东（元初三年）、张掖（元初五年）、酒泉（永宁元年）的报告。在天球上，太阳与月亮的移动轨道为黄道和白道，二者间的交叉倾角大约五度。太阳每年两次在距交叉点极近处经过，但是即便太阳与月亮在黄经一致的情况下，只要黄纬相差一度三十四分四十九秒以上的话，也不会发生日食现象。就是这一微妙的不定期差异现象，被认为与人事的意外有关。

蝗虫的异常发生

水害与旱灾交互侵袭。如果黄土高原连续降雨会发生洪水，不降雨则会出现旱灾。一年之中，春天旱灾，秋天水害的情况也有发生。辽阔地域中气候条件差异很大。旱灾使作物停止发育，并引起病虫害。东汉时期有很多关于蝗虫、螟虫灾害的记载。高温影响之下，蝗虫大量繁殖，在夏天爆发。与历年相比羽翼长大、飞行距离延长的蝗虫，突然数以亿计地出现，成群地移动之时将粮食作物掠食殆尽。

对气候变动十分敏感的蝗虫的生态是不可思议的。安帝永初四年（110）至元初二年（115）连续六年爆发大规模蝗灾。永初五年全国范围，元初二年波及二十个郡国的范围。从受灾郡国数可知

蝗虫发生的规模。谷物被食尽，饿死者频出。献帝兴平元年（194）曹操在濮阳攻打吕布时，双方对阵之前发生蝗灾，粮食殆尽，蝗虫迫使两军退却。旱灾数月，无雨，粮价高涨，一石竟至五十万钱。

虽说因条件突发的蝗灾是自然灾害，但环境又与人的行为有关。黄河下游流域作为麦作物产区得到开发，人口也大量增长。《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献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蝗虫的大群出现与天下的大乱有着如此的因果关系。

疫病的流行与医学

安帝元初六年（119）四月，会稽郡大范围流行疾病。光禄大夫被派往疫区，有太医同行进行治疗。政府提供病死者的棺木材料。延光四年（125）冬，京师疾病大流行。桓帝元嘉元年（151）正月，京师再度爆发疫病，光禄大夫带着医药人员巡回治疗。当时，在南方的九江、庐江，疾病已经持续流行了两个月之久。如此，进入公元二世纪时，传染病频频流行，仅有记录可查的就有十一次。王朝采取的措施是向疫区送医、送药。流行疾病的名称虽然没有留下记载，但一般认为可能是伤寒菌造成的传染病。其中流行于冬季至早春的有九例，占大半比例。平均十年流行一次。这是二世纪以前所没有的情况。

张仲景（150—219）所在的南阳，二百人以上的宗族在不足十年之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而死者竟占十分之七，他为此深受震撼。所谓"伤寒"是说受到四季中最为严酷之冬寒所

伤害的情况。经一段潜伏期之后，于春夏发病。总之，是一种传染性的急性热病。此病须在病菌从人体表面进入体内之前投药治疗。临床症状为恶寒、头痛、发烧，体内症状为腹部肿胀、便秘、舌苔、口渴、脉沉等。

在东汉末年混乱时期的疫病流行之中，张仲景根据汉代及此之前的医学知识，参考民间处方，写成《伤寒杂病论》。其中记录了三百多个处方。但此书随着东汉的灭亡散失了。此书后来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在宋代的十一世纪得到刊行。

名医张仲景与华佗

在不了解病毒感染的远古时期，人们所见到的是因为发烧而一个接一个地发病的患者，无论如何要予以临床处置。就本质而言，疫病与自然灾害一样，也是由于阴阳不调而产生的。阴阳之中一方缺失的话，造成平衡失调，对此可通过让患者发汗、吐、泻的办法予以康复。服用药物可促进康复，为了发汗而让患者一日三次服用煎药。

东汉屡屡流行传染病的原因，一是由于干旱与水灾造成粮食匮乏，以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二是为寻求粮食而出现的大范围人口流动也造成疫病的大流行。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张仲景虽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的事迹在《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上都没有记载，《伤寒论》自序中有些散见的内容，但也不明确。据说他曾任长沙太守，但也有人否定这一说法。后来他被尊为“医圣”，现在南阳有他的

墓碑（立于晋咸和五年〈330〉）和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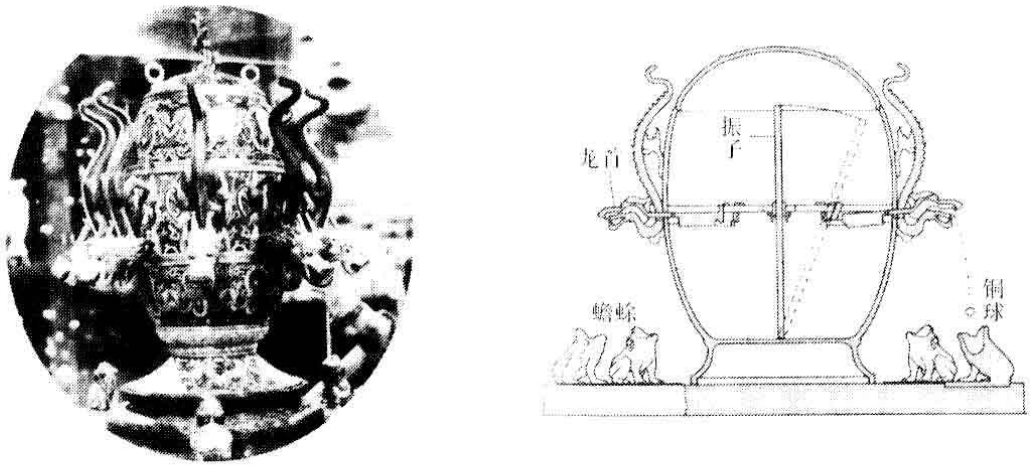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与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相关的医学处方书籍。其中记载了“治伤寒遂风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治百病膏药方”等三十余例处方，还有药物近百种，以及病状、投药方法、服用时间、禁忌、针灸穴位等，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医学水平。

沛国人华佗也是东汉时期的名医。他不应政治招聘，一生从事民间医学。内科、妇科、小儿科、针灸科兼通，尤其擅长外科，曾实行过全身麻醉的外科手术。据说还做过接合肠胃、切除肿瘤的大手术。他还重视疾病的预防，发明了称为“五禽戏”的，模仿虎、鹿、熊、猴、鸟动作的健康体操。

张衡的地震仪

顺帝永和三年（138）二月乙亥，金城郡、陇西郡发生地震，二郡出现山崩地陷的情况。这次甘肃出现的地震，在洛阳也有震感。四月朝廷派光禄大夫视察地震灾区，凡因房屋倒塌压死的七岁以上者，支付每人二千钱救济金。全家死亡者，由官府收容遗体，举行葬礼。还实行了免除租税等措施。

在此之前的阳嘉元年（132）制成的张衡候风地动仪测出了地震的方位。当时京师学者曾感到奇怪，数日之后陇西通过驿传，报来地震消息，证实的确在这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此仪器为铜制，直径八尺（约一百八十四厘米），形似酒樽。内部中央倒立



157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复原模型 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其结构图　一旦发生地震，中央的振摆会出现摇摆，带动周围的一条龙将口中球吐落至蟾蜍的口中。由此可知地震的方位及时间（《华夏之路》）

一振摆，周围设置八组机械装置。在外部装有与机械相连接的八条龙，龙头面向外侧且各含一铜球。龙下坐有八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地震，中间的震摆就会出现摆动，牵动周围的某一条龙，于是那条龙嘴中的球落到蟾蜍口中。由此可以测知地震的方位和时间。这台仪器虽然没能流传下来，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有复原模型。

这种利用震摆的地震仪原理与今天的地震仪是一样的。如果是迅速左右摇晃的话，中心的震摆并不移动。地动仪本体与地面连动，震摆向震源方向摆动，最先感知左右摇晃方向的龙指示了震源的方向。现在，为了观测东西、南北、上下三种形式的摆动，将三个震摆的地震仪组合使用。看来一台地动仪就可以用来观测到各种类型大地的晃动。

顺帝时期的凉州地震

张衡（78—139）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科学家。他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召南），官职与司马迁一样是掌管天文、历史的太史令。除了地动仪，他还发明了浑天仪。“浑天仪”与现在的天球仪类似，是表示天空星座的器械。以漏壶的滴水转动齿轮，使器械以天球的固定轴为中心旋转，而且旋转的速度等于地球公转的速度，如此正确地表示星座的变化。张衡还首次阐明了月食的原因。

顺帝汉安二年（143）发生了更大范围的地震。波及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各郡，山谷崩裂，建筑倒塌。凉州（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从九月至翌年四月共发生十八次地震。光禄大夫被派往灾区。在中国，黄河、长江下游流域的东方平原一带地震很少。西方高原地带因为活断层多，所以地震频发。印度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持续碰撞，使得西藏高原受到挤压，以致东西向扩展从而造成地震。

东汉时期的确有着许多地震的记录，但这并不意味当时一定为地震频发的活动周期。凉州位于祁连山北麓，地处河西走廊，此地成为汉的领域是武帝以后的事。使人感觉地震多发，与地动仪发明之后首都天文台的严密观测、以及地震多发地带纳入东汉领域、受害情况认真上报中央等有关。

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包括天文现象在内的自然灾异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所以天文观测未必是单纯对自然现象的测定，已经

成为了当时儒家所关心的对象。东汉大儒郑玄也撰有《乾象历》、《天文七政论》等著作，蔡邕对天文学也很感兴趣。

人口流动与一年一度的户口调查

根据记录可知，从西汉末至东汉一、二世纪的二百年间，曾进行过十次户口统计。但是，户口资料并不就是现实人口的真实反映。地方官管辖郡县的贫困、病死、流亡所造成的户口减少，都是与其个人工作政绩相关的，所以浮夸虚报常有发生。地方官为了隐瞒灾害、盗贼、流亡情况，虚报垦田数和户口数。对地方官吏的考课是根据数字进行评估的，如丹阳太守李忠被评为垦田数增加的天下第一。关于人口数变化的原因，当时人东汉蔡邕已经有所认识：一世纪前半期的锐减是王莽政治所造成的，进入二世纪之后仍未能恢复到西汉的水平，是受到了与西羌、匈奴的周边民族进行战争的影响。

东汉时期每年八月实行户口调查，将户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爵位、出生地等登记做成户籍。西汉末公元2年（元始二年）的户口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户数12,233,000，口数59,594,978；半个世纪后的建武中元二年（57）锐减为4,279,634户（以公元2年为100的话，减少了34%）、21,007,820人（减少了35%）。以后逐渐恢复，至明帝永平十八年（75）恢复至5,860,000户（恢复到48%）、34,125,021人（56%），章帝章和二年（88）7,456,784户（61%）、43,356,367人（72%），进入二世

纪后的和帝元兴元年（105）9,237,112户（75%）、53,256,229人（90%），人口已经恢复至西汉末的90%。东汉人口变化的特征在于，两汉交替的动乱时期锐减，随着政治的恢复，进入二世纪后又恢复到原有水平。

人口的过疏化与过密化

人口增减、密度的地域差，在全国统计资料虽看不出来，但是这在东汉社会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崔寔在《政论》中指出，与青、徐、兖、冀州东方地狭人口密集相反，关中、西北的凉州、幽州附近地旷人稀，所以应该予以积极地开发。作为旧都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关中，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业已荒废；东汉将首都东迁之后，防卫能力削弱，遭受周边民族的入侵，与西汉相比出现人口过疏化的情况。三辅的总人口从2,436,360（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锐减至523,869，仅为过去的22%（东汉永和五年〈140〉）。

而在东方各州以及华北平原出现的人口过密化，使黄河、洛水的洪水受灾人数增加。建武十年（34）济水泛滥淹没了数十个县，永兴元年（153）黄河泛滥造成以冀州为中心的数十万户受灾，155年洛水与南阳发洪水时，收容、埋葬溺死者遗体，七十岁以上的死者每人支付两千钱。

江南人口出现增长是一个新的倾向。西汉末江南七郡国的人口为250万，后汉时期大幅增至620万，导致了后汉时期江南经

济发展增长速度的迅速提高。会稽郡的山阴（今浙江绍兴）是东汉青铜镜的一大产地，大量生产与北方长安、洛阳所产西汉镜不同的、独特的神兽镜和画像镜。在陶瓷器方面也是，会稽郡上虞和宁波等地生产了与以往灰釉陶不同的、近乎青瓷的瓷器。

官吏、字典与数学

九千字的读写能力

东汉时期对以往的字典与数学进行了总结，出现了《说文解字》和《九章算术》。字典与数学书籍都是为官僚预备的。读、写、计算能力是汉代官吏所必备的。

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是现存最早的汉字字典。共15卷，收录9353个汉字，和帝永光十二年（100）完稿。建光元年（121）由其子许冲献给安帝。此字典的体裁是以540个部首（始于“一”，终于“亥”）顺序排列，按照“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进行分类，解释字义。

西汉初期成为“史”（记录官）的标准是能够读、写五千以上的汉字，东汉的官吏标准是能够读、写九千字。出于行政上的需要，文字数在不断增加。例如《说文解字》中与“马”相关的字多达一百二十个。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虽然不需要，但就管理马的官吏来说又是必须掌握的。描述马的年龄、颜色、动作使用

各种不同的文字。一岁马称“馬”，二岁马称“駒”，三岁称“騬”，八岁马称“馱”。

三岁之前是调教军马的时期，八岁是速跑能力、耐久力处于巅峰的年龄。马身长（体高）六尺称为“驕”，七尺称“騋”。五尺六寸或五尺九寸以上、且齿未平的马禁止输出关外。因为马食草须用牙齿研磨嚼碎，所以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年龄。直至八岁牙齿中央还是凹陷的，十岁之后牙齿基本磨平。所以规定齿平之前的成年马，不得拿到国境关卡之外进行交易。马的行走和跑步方式是判断马是否优秀的标准，所以特别受到注意。“驟”、“騤”形容快走，“驅”形容快跑，“馳”形容疾奔的状态。颜色也多种多样，黑色系列的马毛有“驪”（深黑）、“騩”（浅黑），黄色系列有“驃”（黄里透白），白色系列有“駱”，杂色系列有“騅”（青与黑的杂毛）等。

当时的官僚被称为“刀笔之吏”，竹简、木简是用来书写文书的材料，随身携带修改文字的小刀。他们必须具备至少能够读写九千文字所谓“隶书”这种官吏文字的能力。为此就出现了对字典的需求。虽然已经出土秦代字典的残片，但完整的字典还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字典。

《说文解字》对“辠”字的解释为：“犯法也。从辛从自”，从意思和字形上做出说明。又说：“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可知由于“辠”与“皇”类似，所以秦改为“罪”字。我们今天字典里的惯用词，汉代人是这样做解释的。

官僚实务、儒者素养所必需的算术

官吏必须具备数学知识。东汉中期编纂了《九章算术》这部数学书。虽说作者不明，但内容是先秦至汉代的数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全部共分为九章，举出了246个算术题与解答。除了比例、体积计算之外，还有联立二次方程式，几何学虽略逊于古希腊数学，算术、代数的确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题中涉及许多汉代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

例如有的设问是有关官吏为进行土木工程测量土地的，曰：

> 今有穿渠上广一丈八尺、下广三尺六寸、深一丈八尺、袤（长）五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尺。问积几何？

这是一则修造长十二公里灌溉水渠时，计算容积的算术题。由上边长十八尺，下边长三尺六寸，高十八尺求出梯形的面积，再乘以长度，得一百零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五尺六寸。进而又问："秋程（秋季工程）人功三百尺，问用徒几何？"

答案：由于一个人的劳动量是三百平方尺，以前面的容积除以三百，就得三万三千五百八十二人。这是该土木工程所需劳动力。可见，数学是官吏必备的行政计算能力。而且东汉儒者郑玄在通晓儒家经典的同时，看来也精通《九章算术》，亦可知数学也被视为儒者素质的。总之，算术不仅限于官僚的实务知识。

里耶秦简中有"九九表"，居延出土汉简中有《算数书》、《九九

述》，张家山汉简中也有《算数书》，其中加减乘除的计算，以及税收、价格、面积计算方面的内容，有些是与《九章算术》相通的，这些都是重新考虑以往《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年观点的贵重文书。下面是一道比例计算例题，从中可见西汉、东汉的不同：

> 今甲持五百六十钱，乙持三百五十钱，丙持一百八十钱。此三人出关时，缴纳了关税一百钱。问各自纳税多少钱？答案：甲出五十一钱一百九分零四十一，乙出三十二钱一百九分零一十二，丙出一十六钱一百九分零五十六。[31]

西汉初《算数书》的例题更有意思：

> 狐、狸、犬出关，被征收了一百一十一钱的租税。犬对狸，狸对狐曰："你的皮是我的一倍，应当多出一倍租税。"问应该出多少？答案曰："犬出十五钱七分之六，狸出三十一钱七分之五，狐出六十三钱七分之三。"[32]

像是在阅读伊索寓言一样，从快乐中学习了数学。不知不觉这也成为了儒学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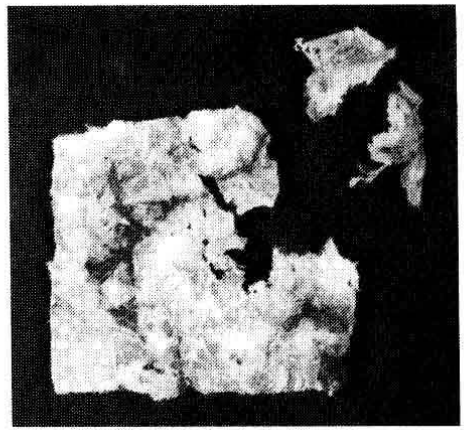
从丝绸帛书到纸

怀抱成捆竹简的官吏，最了解帛书的易于书写与轻便。“纸”本来指的是供书写用的丝绸，丝绸除了作为衣料之外还用于绘画、写字。马王堆西汉墓女性不仅用丝绸裹尸，同时还陪葬有帛画、帛书。“帛”既容易着墨，又有轻便、可以折叠等优点，但是由于用一根根丝线织成，所以价格昂贵。但竹简很便宜，且大量存在，也容易修改，所以成为普遍的书写用材料，缺点是体积大而笨重。因此，需要设计新型的纸。不使用动物纤维的纺织材料，而是用抄漉植物纤维的方法。所谓抄漉，就是将纤维放在臼中碾碎后，溶于水，再用帘子迅速将纤维浆捞起的简单工序，使之干燥以后便成为纸。如果没有丝绸纸的话，也许就没有抄漉麻纤维纸的发明。

作为新型纸的发明者而被记录下名字的，是东汉的宦官蔡伦。他是和帝的中常侍，作为尚书令总监帝室御用器物的制作。蔡伦设计了利用树皮、碎麻、破布、渔网造纸的方法。与丝绸相比麻是很便宜的衣料，可回收旧麻衣料来造纸。元兴元年（105）他向和帝献上这种纸之后，新型纸得以推广使用，天下人称之为“蔡侯纸”。麻即便在今天也还是用于水墨画的材料。

但是，纸的考古资料证明蔡伦并不是最初的发明者。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外的灞桥西汉墓发现了淡黄色的古纸片，是作为铜镜的垫衬物使用的。这一所谓“灞桥纸”一时间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纸。但是后来中国轻工业部造纸局指出这不是纸，而只是一种纺织物。究竟是“纺织”还是“抄漉”，仔细观察的话

是不难予以区别的，因为纵横规则交叉的纤维与不规则的纤维组合是不一样的。



158 扶风纸　1978 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发现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可知在被认为纸的发明者蔡伦以前的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了麻纸

1973 年—1974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居延的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了两张麻纸，从同一地点出土木简的年号（宣帝甘露二年〈前 52〉）可知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遗物。1978 年在陕西省扶风县也发现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1979 年在甘肃省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西汉中后期的麻纸。1986 年以来持续发掘的西汉文帝时期的汉墓中，在死者胸前的位置上发现了长 5.6 厘米、宽 2.6 厘米浅黄色纸。上面以黑色细线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地区，也发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纸，上面写有六七行文字。就写有文字的纸而言，这是最早的。

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在蔡伦以前的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了麻纸。但是毕竟还没有到达可以取代竹简、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地步。从东汉画像石所描绘的授课场景来看，学生还是手持简册，在做笔记。不过，很快从二世纪后半期开始，纸作为书写材料便逐渐开始普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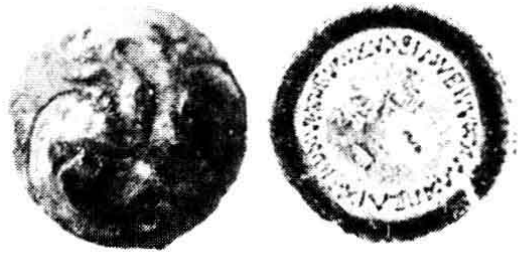
东汉对西方的外交与罗马的使节

班超、班勇与西域的统治

东汉帝国二百年的外交，为了显示作为中华帝国的威严，实行了作为天子向周边民族首长或王予以册封的制度。但是，国内的政治却未必安定。正如东汉三位皇帝的谥号所表现的那样，明帝、和帝、顺帝时东汉王朝处于外交优势高峰是受到承认的。其他时期则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反复不断。明帝的“明”是“照临四方”，和帝的“和”是“不刚不柔”，顺帝的“顺”是“慈和遍服”的意思，使用的都是对外交予以高度评价的词语。

明帝永平十七年（74）设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恢复了西汉末以来对西域的统治，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破焉耆，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进而，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制服焉耆，使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服属。这几个时期都是东汉王朝对西域各国取得优势的顶点。使西域安定的政治力量，又是以围绕着西域统治问题、东汉在与匈奴较量之中占据军事优势为前提的。进而，牵涉到东汉王朝与周边世界的整体关系。东汉的外交可以说是以此三个时期为高峰而展开的。

东汉时期的外交是由二千石的大鸿胪执掌的。与周边的外交其实又是对国内诸侯政策的一种延伸。总之，在诸侯王与蛮夷诸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国境意识，只是用“华夷”这种柔和的概



159 于阗货币（和田出土《华夏之路》）

念予以区别。大鸿胪的执掌是当国内外诸王入朝时，在首都郊外举行迎宾仪礼，授予王号时负责颁发印绶。从这一角度来说，对国内诸侯与四方夷狄是等同对待的。

东汉时期的二世纪初，全国设置一百零五个郡国。其中二十个诸侯王国是受分封的刘氏王族。东汉继承了西汉初期的郡国体制。明帝是东海王，安帝是清河王之子，顺帝从皇太子一度跌落为济阴王，质帝乃渤海王之子，桓帝是河间王之孙、灵帝是其曾孙，献帝是陈留王。

游牧骑马民族
西藏山岳民族
绿洲都市国家

东汉诸侯国几乎都设置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册封的王去世的话，朝廷派遣中郎将为吊唁使者，去册封王位后继人。周边各国的使者携带本国特产来京师朝贡的做法，本来是仅限于国内郡国的制度。现在，正月朝贺时与国内诸侯王一同，国外诸王使节也参列其中。东汉皇帝认为自己作为天子，是对内君临诸夏、对外君临百蛮的帝王。

尽管天子的理念如此，在与周边各民族的现实关系中，纷争却从未间断过。在力量关系之下，周边民族一旦不得不归属东汉王朝的话，就被封为四夷国王、率众（率民众归属）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等各等级的封号，授予相应的印绶。匈奴单于、日南

徼外的叶调王、西羌的麻奴被授予的金印，与倭奴国王金印是同等的。蛮夷、夷狄王之地与诸侯王、郡县之地没有明确的国境，这意味着蛮夷之地很容易被纳入东汉的郡县统治之中。

广汉郡、蜀郡、犍为郡、张掖郡、辽东郡等周边郡均设置属国都尉，管辖蛮夷的投降者。属国都尉之下，是相当于一般的县的“道”，负责当地的行政事务。还特意在南匈奴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西河郡美稷县），乌桓设置护乌桓校尉（上谷郡宁县），在西羌设置护羌校尉（陇西郡令居县），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官，特别是对北边、西边的匈奴、乌桓、西羌、西域诸国，东汉朝经常不得不采取军事举措。在究竟采取和平对策还是军事强硬对策的问题上，大臣们之间从来争论不休。屯田虽说是一项确保长期军事警备的措施，但实际上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之后，还是无法保障该边郡或州的军费供应，往往造成中央财政的窘迫。

就东汉帝国来说，最为重要的边境，首先是不得不倾国力予以应对的北边游牧骑马民族（匈奴、乌桓、鲜卑）和西边的西藏山岳民族（西羌）之地，其次是绿洲都市国家群（西域）和华南、西南各族（南蛮、西南夷）之地。由于与东亚沿海（东夷）各国保持了比较安定的外交关系，所以对东汉帝国的影响不是很大。从以东汉帝国为中心的各民族的动向中，不难看出各方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

西境的羌族叛乱

在今天青海省一带居住着东汉时期的游牧民的羌族，他们在正史中是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域、南匈奴之外单独立传的。东汉王朝十分重视与西羌的关系。

《说文解字》对“羌”字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牧羊的西方游牧民族就是羌族。羌族在东汉初期曾进入陕西省、甘肃省一带，而与汉族杂居。分为参狼羌、烧当羌、钟羌、牢羌、先零羌、虔人种羌、全无种羌、沈氐种羌、陇西种羌、白马羌、当煎羌等许多种族，仅从爰剑种分支出的子孙就多达五十种，其中有八九种在东汉边境或兴或亡，反复不定。

永初元年（107），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在被东汉征发、前往酒泉郡途中，逃亡而发生叛乱。直至元初五年（118），经十二年反叛虽被镇压，十数年间用于镇压的军费竟达二百四十余亿钱，国库为之空虚。在成为战场的边境，民众死亡不计其数。并州（山西省一带）、凉州地区疲惫不堪。在1942年出土于青海省乐都县的赵宽碑中，记载了当时的状况。赵宽是西汉赵充国的孙子，任护羌校尉假司马，在第五山战役中的“大军败绩”被尖锐地记载了下来。

永和五年（140），羌族再度反叛，这一次他们攻打了金城、武都郡，动乱延续了十年之久。史载十年间耗军费八十余亿，士卒白骨遍野。继而，延熹二年（159）又发生了第三次羌族叛乱，最终被破羌将军段颎所镇压。羌族对东汉的反抗总计长达

五六十年，造成巨大的损失。

东汉政府对羌战争的方法，是由护羌校尉、破羌将军指挥内服以后居于内地的羌族自身，或羌胡兵去作战。隶属于东汉的部族长等被封以“归义侯”、“破羌侯”、“羌侯”、“羌王”。烧当羌的嫡子麻奴率三千余户归降时，安帝授予金印紫绶以及金银、彩缯。在新疆沙雅发现了“汉归义羌长”的西汉羊钮铜印，中国王朝用这种牧羊民族的象征作为册封时的印绶。“归义羌长”应该是授予隶属于东汉的羌族某一种族的首长（渠帅、大豪）的爵号。传世的封泥中也可见“汉青羌邑长”的称号（《封泥汇编》）。他们在黄巾之乱时也起兵响应，也反映了东汉后期的内乱与周边民族入侵之间的联动关系。

倭国王帅升的朝贡使节

安帝永初元年（107）冬十月，相隔五十年之后倭国又派出使节。《后汉书》本纪中载：“倭国遣使奉献。”《东夷传》载曰：倭国王帅升等献上生口一百六十人。二世纪初倭国使节再次到来。这一年殇帝不到一岁而亡，安帝刚刚即位。同时发生羌族的叛乱，西域诸国也发起反击，袭击了都护，西域的统治又告中断。当时日本列岛是各部落国家乱立的时期，为了寻求东汉帝国的权威庇护，各国竞相朝贡。

在此之后的桓帝、灵帝统治时期（164—189）倭国出现大乱，在持续的相互抗争之中，一段时期内处于没有首领的状态，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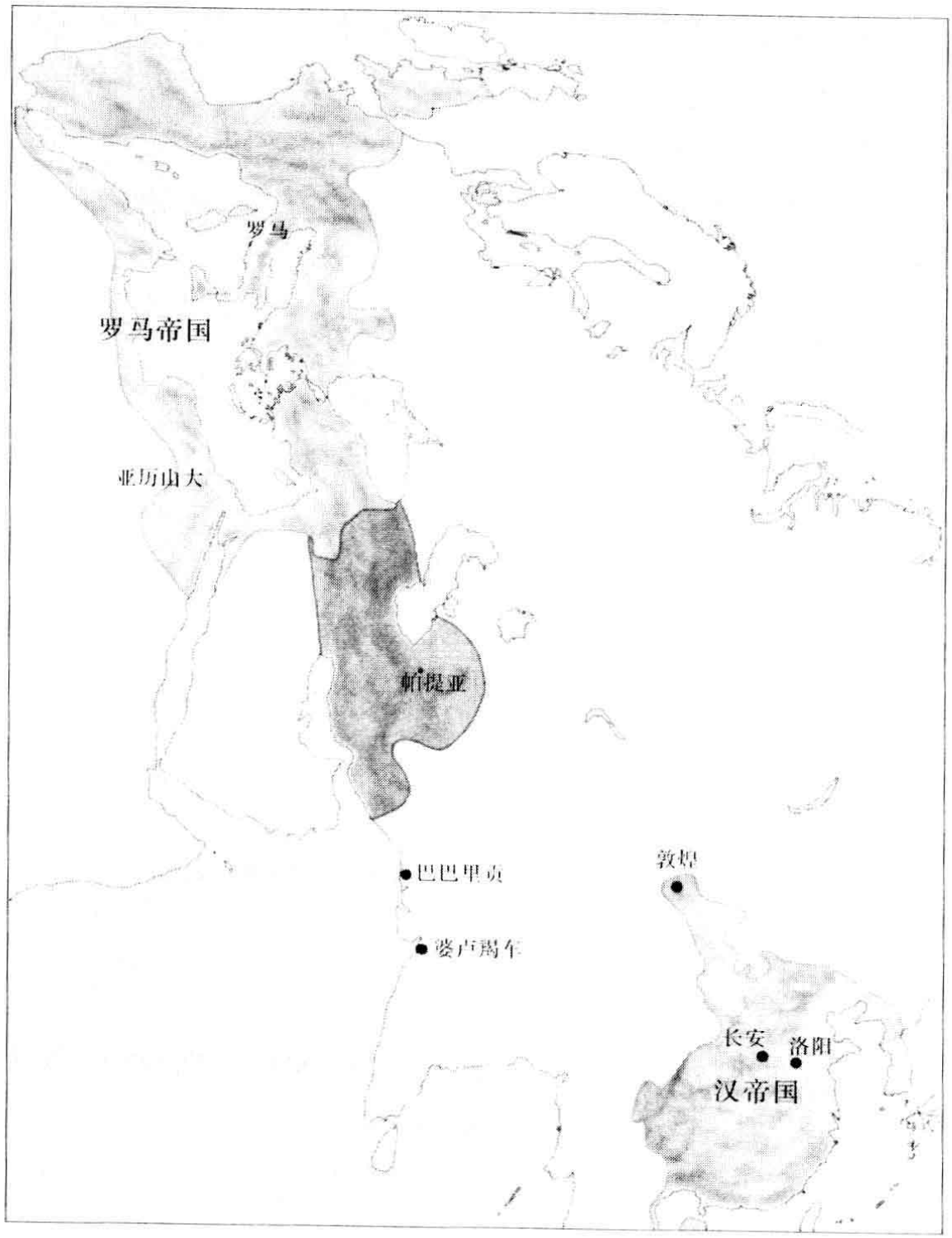
是一名叫做卑弥呼的女子受到拥戴之前的阶段。这些动乱与南匈奴、乌桓、鲜卑、板楯蛮反抗东汉帝国的行动是相互联系的。

刚一进入安帝的后半期，中国东北边境的朝贡关系开始动摇，出现了军事上的不安局势。安帝永初五年（111），每年来朝贡的夫余王率七八千骑兵，攻打乐浪郡，杀伤官吏、民众。安帝元初五年（118），高句丽王宫也从朝贡转为敌对关系，与濊貊联手攻打了玄菟郡。建光元年（121）幽州刺史、玄菟太守、辽东太守的联合军杀了濊貊的首领，于是高句丽王的两千兵力焚烧玄菟太郡、辽东郡，杀伤两千余人。进而，桓帝、灵帝末期，东汉王朝出现内部政治混乱，乐浪郡也无力控制东夷各民族，后汉帝国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实行册封所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开始动摇。

延熹四年（161）来朝贡的夫余也于永康元年（167）以两万兵攻打玄菟郡，迎击的玄菟太守公孙域斩首千余人。1932 年从西汉之后的乐浪郡遗址东南的墓葬群出土了“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的两面刻字木印与鼻钮木印“王光私印”，可知这是乐浪太守属官王光的印章。

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敦

在塞琉古王朝叙利亚领域的东方，希腊族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约前 250—前 139）与伊朗族系的游牧民族安息王国（约前 250—后 226）独立。安息的始祖叫做阿萨息斯，在中国根据这一发音记录为“安息”。安息是正好与秦汉四百年同时存在于西亚的大国，而且对



160 汉通向罗马的道路　汉长安、洛阳与罗马的联结

罗马与东汉之间的联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是在公元前27年，中国乃西汉时期。被称为“罗马和平”的从奥古斯都到“五贤帝”的两百年，正相当于西汉末至东汉的时期。东汉时期汉朝人第一次知道有罗马的存在。“五贤帝”时期的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托尼乌斯·披乌斯、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161—180年在位）的最后一位就是后面将提到的大秦王安敦。

汉朝与罗马相比较的话，较准确地说，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东汉与帝政罗马相对应。而且，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之间隔着塞琉古叙利亚王国，在东汉与帝政罗马之间有帕提亚帝国。

东汉时期已经知道西域最西面有一个大秦国。西域都护班超的部下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97）曾从安息（曾经的叙利亚，此时已经被纳入罗马帝国）去条支，入海。他之所以打消了去罗马的念头，是因为船人告诉他：大海广大，顺风的话要三个月，逆风的话要两年，口粮得备足三年的量。甘英闻此作罢。大秦之地在数千里的西方，拥有四百余城，城郭为石头城，有发达的邮亭交通制度，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因为与中国类似，所以称为“大秦”。他们使用金银货币，与天竺也进行着海上交易。

“大秦”这一国名意思是规模很大的秦国。虽然秦已经灭亡，西域人仍然继续称中国为“秦”。“秦”就是China一词的来源。“汉”是现实中王朝的名字，“秦”则是地域名称。西域人将与“秦”（中国）匹敌的西方大国称为“大秦”。

罗马皇帝派遣使节至洛阳

一世纪居住于埃及的希腊生意人所著《厄里特里亚航海记》，是一部商业指南手册。希腊语“厄里特里亚海”就是“红海”，指的是从阿拉伯海至波斯湾、再至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这是一本反映罗马与印度间繁荣贸易活动的书籍，东汉王朝也是通过海域与西方交流的。

二世纪罗马地理学者托勒密绘制过一幅世界地图，从十五世纪的复写本中我们还可以见到这幅地图的面貌。在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前，这一直是最富权威的地图。这幅地图所绘从阿拉伯半岛至东亚的部分颇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罗马人对东方是做如何想象的。波斯湾、印度洋、锡兰岛、印度支那半岛，直至世界的最东端，绘有古代的中国。在称为“支那”的地域上，南面有巨大的海湾（斯纳斯·马格努素），两条大河注入这一地域。在隔着山脉的北方是称为“赛力克”的广大地域。图上画出了根据“秦”命名的“支那如姆”（支那诸地域）与表示丝绸产地之意的“赛力克·雷格”（赛力克之地）的两个“中国”。

桓帝延熹九年（166），东汉国内在党锢事件中出现动荡。就在这一年罗马帝国的使节访问了东汉。《后汉书》本纪曰：“大秦国王，遣使奉献。”《西域传》曰：“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遣使节，从越南日南郡之外，携带象牙、犀角、玳瑁而来。日南郡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南海国家的外交窗口、南海贸易的大门、东南亚

的南海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天竺）的使节也在西域通道受阻的时期，曾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从日南入汉。

无论如何，进入公元二世纪之后，汉与罗马终于由海路缔结了直接的交往，东西两个帝国的皇帝第一次有了接触。所谓“一通”的意思与张骞的“凿空”同样，都是予以划时代评价的用语。

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国

象牙、犀角、玳瑁并非地中海性气候罗马帝国的物产。象牙尤其是非洲象或是印度象的牙可以用来雕刻酒杯。犀角的纤维质地柔软、角的尖端部碾成粉末可制作解热剂，其形状亦可利用来做装饰容器。玳瑁是生活于赤道近海的海龟，其十三片有斑点的甲壳即所谓的“鳖甲”。由于薄厚不均，加热之后重叠在一起，可以加工成为装饰品。这些都是非洲东海岸、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南海所产物品。近处，在海南岛的珠崖也出产犀、玳瑁。黄支国就曾献上过犀。这些都是从所谓拜占庭罗马的东罗马派出的使节，献上的贡品。所谓“徼”，与“关徼”并称，指的都是帝国国境的关卡和城塞。说是国境，其实是为防备匈奴在北方修筑的长城一线，即便严格也不过是像其他交通道路那样，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关徼”予以管理而已。按照汉代法律，徼外人侵入行盗的话处以“腰斩”的严厉刑罚。在最南端越南设置的日南郡的海港，也要检查从海上来访的使节，其作用犹如内地的敦煌。

敦煌木简也不见有纯粹商人往来的记录，说到底汉代仅允许

161 希腊铅币（甘肃省平凉出土） 东汉王朝也通过海上与西方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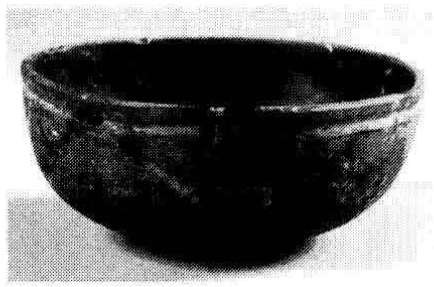
162 罗马货币 马可·奥勒留银币

政治使节入境。商人们若不是冒充大秦使节的话，即便是加入使团中，也只能以使节身份进入汉朝首都。以《后汉书》的史料来看，如果认为大秦来的使节的终点不是日南郡而是洛阳的话，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已经在湄公河三角洲地的吴哥发现了铸有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肖像和名字的货币，可以证明罗马与东汉的确有过接触。把罗马皇帝的肖像刻在大理石或货币上，以便在帝国内得到认同，提高权威。中国的皇帝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反而提高威信。此乃文化上的不同。

汉与罗马交流的丝绸与玻璃

据说中国产的丝绸驮在骆驼背上被远道运抵罗马。唐代骆驼的唐三彩很多见，但汉代骆驼的形象至今基本不清楚。西安东郊出土的彩色陶制骆驼，是接近野生骆驼的朴素形象。但是，这种骆驼队是不可能行进至罗马境内的。

另一方面，罗马产的玻璃也通过南海海路传到中国。1954年在广州市横枝岗出土了玻璃碗，是西汉时期的文物。碗内侧半透明并罩有一层蓝紫色，外侧玻璃中混入了石灰的成分，因化学



163 玻璃碗（广州市横枝岗出土，广州博物馆藏） 材料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

反应出现了表面银化。经过 X 光照射的材料分析，其石灰成分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在罗马前一世纪已经广泛使用玻璃吹制法。中国虽然已经有了玻璃制品，但不是石灰玻璃，而是用模子浇筑而成的铅玻璃或硅酸钾玻璃，看上去有一种玉制品的厚重感。罗马玻璃的素材又轻又薄，看来在中国很受爱戴。1987 年在洛阳东郊出土了罗马玻璃瓶。可见当时罗马制品已经传到东汉的首都洛阳。

然而，这些玻璃制品并非直接从罗马运至中国，并非是通过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联结了汉与罗马，并非说汉的首都长安或洛阳已经与罗马之间进行了长距离贸易。

儒教与道教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

儒学在东汉并不是单纯的学问，而是作为儒术被有效地运用于国家行政。进而，作为所谓“儒教”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维持社会、国家秩序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东汉国家虽然是依靠法（法律）行使机能而运营的，但是在社会规范上儒学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儒教国家。

作为学问的儒学，是信奉孔子教导的思想。官吏是将其作为

164 熹平石经　召集全国的著名儒者对西汉以来的经书加以校对刻成石碑（《华夏之路》）

治民方针，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的。这种学问与东汉的国家利害难舍难分地结合在一起。东汉儒学自身作为传授解释古典的家学也得到发展。甚至皇帝也亲自到洛阳北宫的白虎观或南宫的云台，直接聆听儒者讲授《春秋左氏传》《尚书》《诗经》等。

洛阳城南的太学，即当时的“国立大学”（建于建武五年〈29〉），由“五经博士”在讲堂开设课程，有时还在皇帝面前围绕经义进行讨论。太学的学生据说在桓帝时达到了三万人。博士所教授的是世代相传的家学，光武帝时候设立了十四名“五经博士”。《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经》有齐诗、鲁诗、韩诗，《礼记》有大小戴氏，《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名博士。博士之下招收弟子，弟子学习导师所传儒学。朝廷特意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儒者，在首都就任博士。

博士的学问继承的是各自的家学，那些在长期竞争中传授而形成的西汉以来的经书，也逐渐出现文字上的谬误。由博士做成甲乙两科，竞相对经文作出订正时，为了能让自家学说得到引用，甚至出现竞相行贿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蔡邕、李巡等人校订了经籍的文字，熹平四年（175）灵帝下令在太学讲堂

前面东侧，树立了刻有五经正本原文的石经碑。这一前后费时九年的经碑，被称为“熹平石经”，即所谓国定儒教经典。原碑已经佚失，现仅存宋代以来出土的石经残石。宋代洪适《隶释》收录有这些文字。近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了残石和石碑的基石。1925 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现存上海博物馆，1929 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目前保存于西安的碑林。另外，在章帝建初四年（79）效仿西汉宣帝石渠阁，在白虎殿召集儒者历时数月讨论了经书的异同。

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进而，作为儒学鼻祖的孔子，也在出生地曲阜受到国家的隆重祭奠，永寿三年（157）皇帝敕命重修孔子墓。今天在曲阜城北仍然有孔氏一族大面积的墓地孔林。章帝于元和二年（85）亲赴鲁地祭奠孔子，赐孔子直系褒成侯以及孔氏一族男女锦帛。山东曲阜孔庙中有一块“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建于永兴元年（153），由碑文可知鲁国相乙瑛曾设置百石的卒史管理祭祀及礼器出纳之事。还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历代鲁国地方官僚都负责祭祀孔子。

孔子第十九代子孙东汉孔宙的墓前有一块延熹七年（164）所立孔宙兄弟孔彪、孔褒碑，孔子子孙的孔氏一族都受到厚遇，安葬于称为“孔林”宗族墓地。光和元年（178）汉在鸿都门建立学校，绘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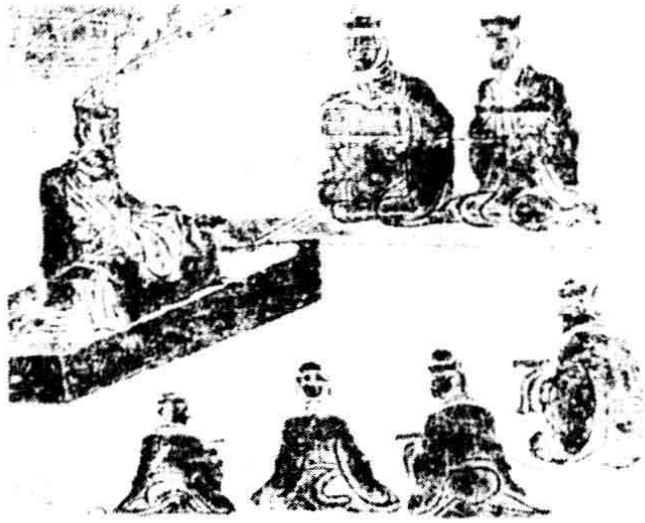
的护乌桓校尉东汉墓中，在孔子之后顺序绘有颜渊、子张、子贡、子路、子游、子夏、闵子骞、曾子、子有等十七弟子像。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已经成为此时学校师生关系的典范。

所谓“儒教”的思想在东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可谓渗透于国家、乡里社会直至家族。它支持着皇帝权威，成为了官吏行政上的基础理论。而且不论是就乡里地缘共同体，还是对宗族、家族血缘集团而言，都已经成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这是一个从王朝更替时的战乱到重新统一，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自然灾害频仍、皇帝政治的不稳定与政治斗争等等政治社会动荡之中，都需要儒教德治的时代。

应对自然灾害、政治混乱所需的儒教德治

居于地方行政领导地位的官僚，是根据其行政上实际工作能力被任用为基层官吏的，任用的标准其实就是儒教的知识和素养。例如为《春秋左氏传》作训解（《春秋左氏传解》）的服虔，将《左氏传》应用于汉代政治成为九江太守、著有《五经异义》的沛国洨县令许慎。丹阳太守李忠为了改变越人婚姻习俗，建立学校。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沘阳县长鲍昱处理因杀人罪被收监的县人赵某时，出于怜悯其上有年逾七十父母、又身为独生子，若处以死罪的话将断子绝孙，故允许其新婚妻子入狱住宿一夜而有身孕。当时的法治中也贯彻了儒教的精神。

在东汉官吏选举中有所谓贤良方正、直言、至孝、有道、孝



165 东汉画像石　为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的画像石，其画面为学习经学的人捧着竹简在听讲经人讲解经书

廉、明经、茂才等科目，其中孝廉（孝敬父母、清廉的政治）、至孝、明经（儒教经典知识）等都是儒教的人物评价标准。意思是将这样的人通过乡举里选，即根据乡里舆论选举。虽是上古儒教的理想，但实际上并非乡举里选，郡国一级的地方官是随中央高级官僚一同被选出、推荐出来的。

史书中举出了许多具有儒教品格的人物，作为供人学习的榜样。种暠在父亲死后将三千万财散发给贫穷者。南阳富人樊重出于共同体利益克制自己的行为受到称赞。他耻于与何氏兄弟为财产而陷于诉讼之争，拿出二顷耕地和解，而且平日贷出数百万金钱，在遗言中明确记下要烧毁契约。在产生这种美谈的背景下，不乏以抑制自己过度的经济利益为美德的儒教思想的影响。

会稽郡的上虞县一位十四岁少女曹娥，为父亲溺水而亡深感悲伤，因无力掩埋遗体以不孝自责而投河自杀。该事件发生不久，正值度尚就任县长。度尚称颂少女的孝行，将曹娥改葬并于墓前立表彰碑。孝行并不仅限于家族心情，官吏也一样，父亲死后特意辞职归乡服丧三年的具体行动是受到赞赏的。相反，若有不孝行为的话，则会被视为犯罪受到处罚。杀死侵辱父亲的人

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这是儒教主义的法律。在民间复仇行为是被公然容忍的，因此也有造成秩序混乱的情况。

孝行受到表彰、不孝受到惩罚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乡里、家族内秩序因战乱、自然灾害等贫困、流民化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崩溃。诸如杀子、卖子，妻子被掠夺变卖为奴婢，甚至出现饥荒时人吃人的现象等。如长沙曾出现衣食困乏的人家多杀食亲生子女的事件，长沙太守宋度为此严厉斥责了负责乡里教化的三老。东汉是一个于自然灾害、政治动乱之中需要儒教统治的时代。

道教的创立时期

东汉延熹年间（158—166），皇帝曾信奉黄老之学，祭祀黄帝（升仙后成为帝王）与老子，排挤其他祭祀。延熹八年（165）的一年间甚至三次祭祀老子，出现狂热局面。儒教是以其将乡里社会、国家的集团秩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形态，得到强权国家的保护而发展的。与此不同，道教产生于旨在对个人予以延命救济的神仙思想，是由被称为“方士（道士）”的民间社会组织者予以推进普及的。因此，尽管皇帝在宫中祭祀黄老君，东汉仍不乏英年早逝的皇帝。在此情况下，甚至出现桓帝亲自祈祷长生的情况。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以及在东汉后半期社会不安的局势下，道教在地方社会民众之中得以快速蔓延。

西汉末的建平四年（前3），京师以及地方郡国欢歌起舞祭祀西王母，狂热地传递符书，将其贴在身上以求不死。王莽末

期道士西门君惠曾预言刘秀将成为皇帝。在儒教的秩序体制无法治理社会混乱时，道教作为支持民众政治行为的观念意识就显示出优势。其中最为显著者当为作为道教流派于东汉后期掀起宗教叛乱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东汉画像砖描绘了许多反映当时信仰的场景。其中描绘了人死后升天的世界：西王母神坐在龙虎的座位上，周围有玉兔、蟾蜍在舂制不老不死的仙药。近处有一条九尾狐，羽化的先人一边饮酒，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弈六博棋，并且骑马周天驰走。这就是东汉人想象的上天世界。

东汉青铜镜图案也与西汉不同，表现不老不死思想的铭文很多。方格规矩四神镜的铭文曰：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徘徊名山取芝草。

铭文表达了不老不死的心愿。东晋葛洪（283—363）在所著《抱朴子》中讲述了用铜镜调制仙药的方法，以及铜镜所具有的防止邪气上身的威力。铜镜在当时不单纯是简单的化妆工具。

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也有许多与道教相关的随葬品。在陕西省户县发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写有七十九字的两幅朱书咒符的陶器明器。上面写着天帝使者为了阳嘉二年（133）八月死去的曹伯鲁一家除恶的内容。是用来保佑与亡故墓主死路相距万里之遗属生路（子孙繁荣）的器物。咒符象征着天帝对现世人间的保护。作为天帝使者的证据，是随身携带的一枚“黄神地越之印”。同墓中出土的陶瓶上，也同样朱书有因太阳之精德而获

百福的内容。每一则文书最后，都使用了“如律令”这种官府文书的体裁。

纵观东汉时期中国道教史全过程，虽说尚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已经确立了正式的宗教教义，但是东汉时期确实已经存在有宗教教团和道教习俗了。所以，不妨说这是道教创始的时期。

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闯入外戚时期

从东汉时期十四位皇帝的即位年龄和寿命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5—88）、和帝（88—105）、殇帝（105—106）、安帝（106—125）、顺帝（125—144）、冲帝（144—145）、质帝（145—146）、桓帝（146—167）、灵帝（168—189）、少帝（189）、献帝（189—220）之中，十岁以下即位者有和帝十岁，殇帝不满一岁（百余日），冲帝两岁，质帝八岁；十五岁以下者有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可以说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一个幼主即位不断的时代。

就皇帝寿命来看，一世纪的皇帝如光武帝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三岁，和帝二十七岁；二世纪的皇帝除安帝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桓帝三十六岁，灵帝三十四岁之外，十岁以下最引人注意的是殇帝不到一岁、冲帝两岁、质帝九岁。幼帝

即位而且短命。光武帝有十个儿子，明帝九个，章帝八个，相比之下其他皇帝的儿子显得极端得少。和帝两个儿子，安帝一个，顺帝一个，灵帝两个，质帝、桓帝无子。

幼年皇帝即位，意味着在其背后母亲以皇太后临朝的道路被打通，结果往往出现外戚左右政治的局面。光武帝阴皇后和明帝马皇后没有形成外戚势力，一是因为二人自身年事已高，再者是因为她们都对西汉时期外戚的弊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自律。但是，到了第三代章帝以降，外戚势力逐渐抬头，于是二世纪幼年皇帝即位之后，正可谓是进入了外戚的时代。

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

东汉的临朝皇后有章帝窦皇后、和帝邓皇后、安帝阎皇后、顺帝梁皇后、桓帝窦皇后、灵帝何皇后等六人，都是在皇帝死后拥立幼帝，与自己一族共同掌握政治实权的。窦皇后在章帝死后，以皇太后身份摄政，其兄弟窦宪、窦景极为横暴。邓皇后在和帝死后，与兄邓骘拥立了清河王之子即位皇帝，自己作为邓皇太后持续实行了十七年的摄政统治。拥立了冲帝、质帝、桓帝三代幼年皇帝的梁皇太后，其外戚梁冀掌握政权。当时，群臣给皇帝的上奏都特意预备两份，一份交给皇太后，一份作为形式呈给幼帝。

由于皇帝的儿子很少，所以屡屡出现皇帝系统断绝、外戚势力交替掌权的局面。东汉皇帝中有四位皇帝是因为前代皇帝的直系断绝后而另立的。

东汉的皇后与西汉相比，有一些不同。自明帝母亲阴后定谥号“烈”之后，东汉的皇后也像皇帝一样有了谥号。例如明帝马皇后谥号“德”，被称为“明德马皇后”。东汉皇后不像西汉那样多出身低微，而是多由名门女子中选出。

后宫的掖庭宫中，从十三岁以上姿色端丽良家子女中选来，自采女、宫人、美人、贵人，以及位于顶点的皇后，形成为数千人的女官组织。她们的衣食、化妆费用，对国家来说就是一项庞大的负担。

《后汉书·宦者列传》从春秋时期开始叙述宦官的历史，并且记述了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成为政治问题的情况。列传从非难的角度，从东汉王朝重用宦官写到最终为宦官养子曹操所灭。而且按照列传的评论所言：夏商周三代以女色招灾，秦以暴虐政治亡国，西汉因外戚而断绝，东汉以宦官而倾国。与《史记》仅在《佞幸列传》中记载了个别人受到皇帝宠信的情况相比，东汉时期宦官存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宦官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势力的抬头

秦代的赵高、西汉文帝时的赵谈、武帝时的李延寿、元帝时的史游都是作为宦官受到重用的。特别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后宫官吏一律用去势之人，永平年间（58—75）中规定了四中常侍、十小黄门的定员。东汉时期作为侍奉后宫官吏的宦官，由此被制度化了。宦官的作用显著发挥于幼主即位之后，在皇太后掌实权

的异常的皇帝政治状况之下，在与外戚势力竞争之中，几乎是与外戚相互促进而强大起来。平时是官僚代皇帝执行统治，但皇太后在幼年皇帝背后避开一般官僚下诏敕时，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的宦官就掌握了发言权。

和帝时期邓太后掌握实权，其兄大将军邓骘以外戚专政。宦官中常侍郑众发起反抗，将其势力扳倒，成为宦官掌握实权的开始。有时宦官具有拥立皇帝的势力，甚至受封为诸侯，就任九卿高级官位。他们还特意立养子以继承爵位，其兄弟、弟子出任地方太守、县令，势力扩展至全国。单超弟是河东太守，单超弟之子是济阴太守，徐璜弟是河内太守，左悺弟是陈留太守，具瑗兄是沛相（丞相）等等，仅宦官的兄弟就占据了如此多的地方要职。

据说灵帝时中常侍的一族无道，成为张角叛乱的原因。中常侍侯览夺取宅地三百八十一处、耕地一百一十八顷，还兴建带高楼池苑的宅邸，甚至捣毁他人房屋、坟墓，营造自己的墓穴。如此，与清流豪族相对比，宦官被称为浊流豪族。以皇帝中心形成了官僚、外戚、宦官的三者势力，三种关系之中东汉宦官巧妙地掌握着实权。

宦官掌握实权实行暴政受到非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宦官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的确，中国古代有作为刑罚的宫刑，但是东汉的宦官却是自愿去势、进入皇帝内宫为臣的。秦时的赵高，与其兄弟一同因父亲的罪行而连坐、被施以宫刑，由秦王政（秦始皇）提拔为中车府令。西汉李延年以受腐刑之身在宫中管理猎

犬，因其妹李夫人受宠而取悦于上。这些都是以受刑之躯在宫中做杂役，与东汉的宦官明显不同。从皇帝、皇后的立场来看，与受刑罪人一样身体残缺的东汉宦官，本来就如同家内奴隶那样是可以自由地、可信赖地任意驱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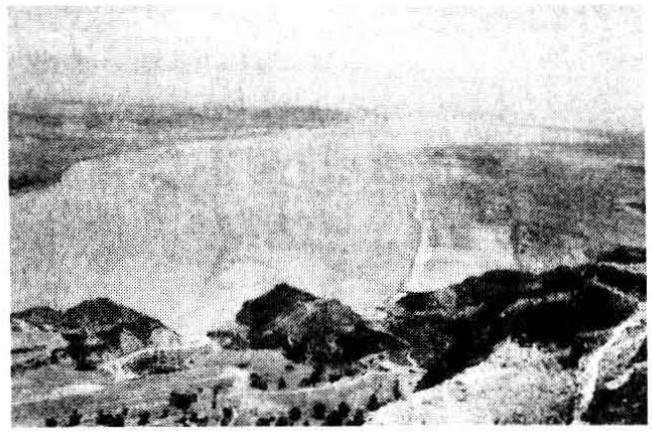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既有发明纸张的蔡伦，也有在野而不问政争的有“清忠”之称的赵祐。如果将身体伤残的异常性抛开的话，是不应将所有宦者一律视为恶人的。应该注意的是宦者势力抬头的政治状况。东汉时期与后代唐、明并列，都是宦者政治抬头的时期。

“河水清”之东汉帝国崩溃征兆

桓帝延熹八年（165）四月，济阴、东郡、济北的河水变得清澈，翌年，延熹九年四月河水沿岸的济阴、东郡、济北、平原各郡的河水变得清澈。《后汉书·桓帝纪》记曰：“河水清。”“河水”即后代的黄河，黄色的混浊程度逐渐增加，河水从唐代开始有了“黄河”的名称，以前不称之为“黄河”，曾称之为“大河”。东汉时期的黄河河床的位置比现在靠北。“河水清”是说黄河水暂时变得清澈了。

这并非什么奇迹发生，也不是说黄色混浊的黄河变得透明清澈了。其中游还是含有黄土激流奔腾，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流淌于海拔一百米以下的大平原。从夏末至秋季涨水时河水含有大量泥沙而变为红色，冬季至春季的枯水期，河口几乎断流，泥沙

沉于河底，变得相对清澈。在上游的黄土高原一旦出现枯水或干旱，地表黄土流失，直接进入河水的黄土量减少，混浊程度便降低。当时人认为自然的变异与人事变异是相互结合的。



166 **黄河清**　含有黄土的激流，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泥沙沉积于河底

那一年，桓、灵帝时期的政界发生了一大事件，即党锢事件。“党人”本来是指志同道合之人，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成为被批判的网罗党徒的政敌组织名称。最早的党人之争发生在甘陵县这个地方。这个县出身的两位人物，一位是河南尹房植，一位是桓帝即位之前的师傅、后来得到提拔的周福，双方的宾客各自联络党徒相互非难攻击。其后，于中央政界批判宦官势力的官僚，反被宦官统称为“党人”。这一党人与宦官的政争之中，党人方面牺牲了许多人才。二十余年中牺牲者不仅限于中央官界，而且波及全国郡县，成为东汉政治史上一大污点。虽然黄巾起义爆发，党争总算结束，但东汉政权自身崩溃的进程却加速了。

党人与宦官的一大抗争

延熹九年（166）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禁，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作为党人被捕。事件的起因在于，李膺在做河南尹时，风角（古代占卜之法）师张成与宦官颇有交往，曾事先占知特赦之日而指使其子杀人，

李膺严厉处理了此事件，判处张成死刑。对此怀恨在心的张成弟子上书告发李膺等勾结太学游学者以及地方郡学生诽谤朝廷。桓帝闻此大怒，下令悬赏逮捕全国的“党人”。于是李膺、陈寔等二百余人被捕。翌年六月尚书霍谞、窦武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被逮捕者虽然得以返回故乡，但他们名字都被记录于中央府库，被终身禁锢（不得任官）。

但是，舆论是支持党人的。随着宫廷宦官势力的扩大，清流派名士作为在野势力受到赞誉。而且定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人物序列。窦武、陈蕃位于“三君”，李膺名在“八俊”。“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的传记，都收入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其后，桓帝死去，建宁元年（168）年仅十一岁的灵帝即位，陈蕃作为太傅、窦武作为大将军、胡广作为司徒回归官界。但是，很快中常侍曹节族杀了陈蕃、窦武和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建宁二年（169），中常侍侯览暗示役人逮捕前任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并将他们杀害于狱中，死者百余人。

当时朝廷发出了在全国逮捕党人的诏书，很多人此时被视为党人。而且即便有恩赦的机会，党人也是被排除在外的。进而太学生千余人被逮捕，与党人关系深厚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都被免职而且终身禁锢。但是，黄巾之乱爆发时党人被释放，那是因为唯恐黄巾乱军与党人相互结合。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党锢之

禁。被杀者的遗体和被处以流放的人都被遣送回乡了。

如此，东汉末期席卷全国的宦官浊流势力与清流势力的抗争，虽然是一个时期的现象，但毕竟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就川胜义雄的观点而言，六朝时期贵族制的源流正在此清流派势力之中。清流派地方豪族，抑制了自身本来作为领主的阶级立场，维持并企图再造当时趋于崩溃的乡里共同体。

从宗教集团到反政府集团

二世纪后半期的桓帝（146—167 年在位）、灵帝（168—189 年在位）的统治期间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加剧的时期。干旱、洪涝、饥荒、蝗虫、地震等灾害频发，京师、九江、庐江等地方传染病蔓延，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政府实行了向病人送医送药、向灾区供应粮食，以及减免田租、赋、人头税（算）的救灾措施。当时，清河郡刘氏、陈留郡李坚、扶风裴优等自称“天子”、“皇帝”，长平陈景称“黄帝之子”，南顿管伯称“真人”，蜀李伯称“太初皇帝”，渤海盖登称“太上皇帝”等，只是些单独势力的举兵，都被东汉政府按刑罚论处。乘国内的混乱，周边的羌、鲜卑族也开始侵扰边境郡县。

中平元年（184）二元，东方钜鹿人张角号称“天师（黄天）”，组织了太平道，统率三十六万民众。因为起兵时人人以黄头巾包头作为友军的标志，世称“黄巾贼”。安平、甘陵等地民众也以抓捕诸侯王的行动予以响应。反政府势力通过地域间的连带性，得以迅速扩展。

张角所率太平道集团也可与张陵的五斗米道作对比，与以往的反叛集团都有所不同，应该说是一种宗教集团。张角自称“大贤良师”，组织了信奉黄老道的集团，召集弟子。最受民众欢迎的是他对病人的咒术救济。“师”手持九节杖向病人施行咒术，让病人忏悔罪孽、饮符水。病人得以治愈者被认为信仰笃实，未得治愈者被认为尚有不信之心。由于张角是在混乱之中有组织地布教活动，所以发展到信徒数十万人。这种宗教集团拿起武器，成了反政府的反叛集团。

黄巾之乱——宣告东汉王朝的灭亡

张角既是一个宗教集团的教主，同时又号称“天公将军”，与其弟“地公将军”张宝和“人公将军”张梁一起作为军事指挥者。基层组织是称为“方”的军团，“大方”由约一万人、“小方”由六七千人的士兵组成，由“渠师”统率。张角发起反乱时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在所有郡、州官署的大门上都用白粉写上“甲子”二字（甲子之年的意思）。“苍天”指汉王朝，“黄天”将取而代之。若按正式的五行相生说的顺序，取代火德（赤）东汉王朝的，应该是土德的王朝，但这是无视此说的口号。

这里明确提出了打倒王朝的目标。“天师”是与号称“天子”的皇帝相匹敌的称号，看来是希望建立教主君临天下的宗教王国吧。江苏高邮的东汉遗址出土的符箓中，有“天地神师”的用语，

所以“天师”应该是侍奉“天帝”的“神师”的意思。长安三里村出土的陶瓶上也朱书有“天帝使者”字样，可见“神师”又是为“天帝”所差遣的使者。

反乱爆发的第二个月，朝廷在首都释放了党人，这是因为中常侍宦官吕强担心党人与黄巾势力连手，所以征得灵帝同意后采取了这一措施。东汉政府应对反叛势力的态度很慎重。一方面任命何进为大将军在洛阳待命，另一方面在分布于全国的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个关卡设置都尉官，以加强警备。

以太平道宗教集团为中心形成的反叛集团，在黄巾的旗帜下，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颍川、南阳、汝南、广阳的黄巾，葛陂的黄巾，益州马相黄巾，青、徐州的黄巾等各地的反叛集团。特别是张角亲自统率的冀州黄巾击败董卓、庐植的官军，给东汉政府相当大的威胁。但是，在张角死后这些集团就不一定都守太平道宗教的约束，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松弛了，逐渐成为了掠夺性集团。结果，各集团被曹操的军队所镇压。反叛虽然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崩溃，但其自身又在没能建立起新体制的情况下瓦解了。

五斗米道宗教集团

沛国丰县（江苏省）人张陵于二世纪前半期的顺帝时（126—144）入蜀，在鹤鸣山（一说鹄鸣山，四川省崇庆县）开道场，作符书。因入道者须每

人出米五斗，因此又被称为“米贼”，一般称此集团为“五斗米道”。因为是宗教集团，所以对其教主人物或集团的描述多带有传说色彩。

张陵（后世又称张道陵）死后，其信仰在灵帝光和年间（178—184）为儿子张衡、进而为孙子张鲁所传授，逐渐形成为宗教组织集团。张鲁最初曾追随益州牧（长官）刘焉，刘焉死后他于兴平元年（194）以汉中为中心统率了五斗米集团，号称“师君”。

这一集团经常被用来与张角的太平道作比较，甚至有“东方太平道张角，汉中五斗米道张陵”的说法。加入五斗米道者被称为“鬼卒”，信仰深者被授予“祭酒”称号，“祭酒”之下聚集着很多信徒，规模大的集团就称“治头大祭酒”。加入时信徒先作为病人坐于称为“净室”的道场之中，反省自身的过失。“奸令”、“祭酒”以《老子》五千言为课本进行指导，教育信徒如何不说谎地在生病时坦白自己的罪过。“鬼吏”驱病的祈祷方法是将病人名字写成三份，一份置于接近天的山顶、一份埋之地下、一份沉之于水，称之“三官手书”。

另外，还开设有亭传一类的交通设施“义舍”。义舍中常备有米、肉等粮食，路过的人可以按照自己必要的分量自由食用。多取者被告知会遭报应，要求人们自我克制。犯法者被给予三次悔改的机会，此后再犯要受到惩罚。春夏季禁止杀伤动物，禁止饮酒。

167 曹操（明《历代古人像赞》）

屈服于曹操的宗教王国

张鲁集团从190年开始，于汉中、蜀地方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势力，结果在215年向曹操的军队投降了。当时张鲁将存放宝物的仓库和作为国家财产封印，交给了曹操。曹操对张鲁予以客人的厚遇，张鲁的儿子被封为列侯，曹操还让自己的儿子与张鲁女儿结婚。最终，宗教领袖向政治权力屈服了。

五斗米道的集团特征，在于它有一个在“师君”之下依序为“治头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鬼卒”的独特的阶层组织和集团原理，对组织成员又是以独特的规矩进行管理。“史”或“卒”的用语虽然本来都是现存政治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名称，但“鬼吏”、“鬼卒”等却是完全不同的宗教集团官吏，显示了其成员的特色。在东汉末混乱时期，乡里的社会秩序趋于崩溃，这是代之而起的宗教纽带。这一集团既非地缘集团，亦非血缘集团。从现实各社会集团被驱除出来的人们，由一种信仰结合在一起，以交纳五斗米的条件就可以加入到这个组织之中。

这个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期、并在某些特定地域吸收众多的信徒，形成势力，是因为在东汉后期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很容易接纳那些从乡里社会被排斥的人员的松散的组织。它没有严格的戒律，却能为那些迫于混乱而不得已背井离乡、流浪的人们提供粮食和治疗。可以说这是一个与乡里社会

长老秩序不同的、独特的共同体。研究者称其为“宗教王国”或“五斗米道王国”。

豪族与乡里社会

作为支撑王朝阶层的豪族

在地方社会具有社会势力的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豪族。文献中称为“大族”、“大姓”、“豪族”、“著姓”、“豪宗”、“豪右”、“豪强”、“大豪”、“姓族”、“右姓”、“名族”、“显姓”、“豪侠”、“大侠”。与光武帝同样出身于南阳的义弟樊宏一族就是在南阳郡湖阳县被称为“乡里著姓”或“南阳旧姓”的地方名族。他们所以被称为豪族的理由，首先在于樊氏已经形成为一个紧密的同族集团，经济上樊宏的父亲樊重已经在农业和商业上经营致富。他一方面实行陂池灌溉开垦耕地三百余亩，一方面靠栽培梓漆积蓄巨万财货。而且还将积蓄散施给宗族、乡里的贫穷者。樊氏一族被称为“名族”，还在于一族中列侯、高官辈出，他们不仅仅是地方豪族，而且还是支撑王朝阶层的一员。

东汉刺史每年八月都要出巡所辖郡国，视察地方官的执政是否有过失。此时，他们的评定标准是所谓的“六条问事”。所举六种事项都不存在的话，就可以认为没有过失。

其中第一条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

寡。”即豪族是否超过限度地占有耕地和宅地，以强凌弱。第六条曰：“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二千石的郡太守是否与当地豪族通过贿赂，使公平政治受到损害。这两条都是旨在杜绝与地方豪族勾结、并限制豪族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

那些彻底追查弹劾豪族不法行为的地方官，被收入了《后汉书·酷史列传》。如东郡阳平令李章，在赴任时的致敬宴席上，就对在县境内修筑坞壁、组织非法武装的清河大姓赵纲下手，夺下他的刀当场将他杀死。北海相董宣到任，以当地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公孙丹新造居宅，因为卜工占卦说施工现场会出现死者，公孙丹就令其子杀道上行人，置尸体于屋内。董宣严厉追查此事，杀了公孙丹父子，还将为二人喊冤而闯入官府的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悉数杀掉。

另如黄昌为陈相时，彭氏造起高楼临道，彭氏夫人登楼台而观望黄昌，黄昌不快，就将其抓起来杀了。虽说这都是些特殊事例，但可以从中见到当时地方官与豪族的对立关系。东汉的仲长统很关注东汉末期的混乱，他为我们留下一部评论时事的著作《昌言》（合乎于理的言论之意）。《昌言》中激烈抨击了豪族势力的奢侈，以及他们有超过王侯的富裕、强于郡县长官的势力。

豪族的地域性与阶层性

若从郡太守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豪族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域特别受到重视。如包

括首都洛阳在内的河南周边，产生东汉刘氏政权的南阳所在的豫州，还有黄河北部的冀州。河南被称为“帝城”而多“近臣”，南阳号称“帝乡”而多“近亲”，这些“近臣”、“近亲”的土地、宅地多数超过限度。就东汉全境而言，是较偏重于被称为“关东”的北方地域的，这些地域不屈于豪族势力的地方官政绩也特别受到称赞。河南尹羊涉固执地拒绝“豪右”的请托，南阳太守赵戒纠察、弹劾“豪杰”而救济普通“吏人”。那些作为中央帝室、外戚、宦官、高级官吏亲族，在地方上彰显自己的势力或成为强大的豪族。对廉洁的地方官来说如何对付这些豪族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西汉时期的三辅作为畿内，居住了许多来自地方移民的豪族。洛阳迁都后的东汉时期，三辅与西面的凉州、北面的并州边境连接，军事上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巴蜀、江南之地，不像北方黄河流域那么频繁遭受自然灾害，所以比较安定，豪族阶层一般也支持地方政治，很少抵抗的。蜀郡太守第五伦因为蜀地肥沃、部下掾史多资产之家，而改为起用贫而有志者为部下。在巴蜀之中的巴郡，豪族中有些是汉化的异族，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到一些与内地不同的兴趣特点。

豪族的这些地域性特征，对于考虑东汉国家与豪族关系是很重要的。若从王朝国家施政方针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东汉政府对在那些西汉以来当地豪族势力过于强大的地域不得不予以抑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当地豪族支持中央集权地方政治的地

域，又必须与其保持合作关系。

郡太守、丞，县令、县长与丞、尉等这些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与掾以下的在地方录用的官吏不同，他们必须回避在原籍任职，为的是保证地方政治的公平性。当时有所谓“三互法”，其中规定禁止郡太守与任官所在地豪族联姻。山阳太守史弼娶在山阳郡任官的巨野县薛氏女为妻，因而自己提出申请转任为平原相。

但实际上，地方长官与当地豪族的结合又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地方郡太守级别的长官，有自己任用属官的权力。中央高官也是一样，这种属官任用权称为“辟召”。“辟”或“召”都是“招”的意思。当时，在辟召者与被辟召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人际关系，这不是长官任职期间暂时的关系，而是作为“故吏”（原来的官吏）一直得以维持的私人关系。可见，豪族并非与国家对立地存在，豪族之中产生了中央官僚。

一县平均三乡、一乡十里构成的地方行政组织

东汉时代某一时期的文武官，即全国高级官僚的总数为 7567 人，作为属官的下级官僚为 145,419 人，合计 52,986 人。可以说是这些官僚支撑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这里不谈中央，只看一看地方郡县政治的情况。地方上长官级的官僚，即郡长官的太守、次官丞，县长官的令（大县长官）、长（小县长官），次官丞、尉等都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而且为了防止他们与地方社会结合，在原籍地任官的情况是被避免的。但是，科级以下

官吏不论郡、县都是在郡内或县内范围采用本地出身的人士的。

所谓科级以下，指的是郡、县的属吏（掾史），由他们掌管着实际的地方行政事务。比如，会稽郡在东汉初据说拥有五百人以上的属吏，在中央的河内尹更是拥有属吏达927人。在属吏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主簿、功曹、督邮。下面是一首在当时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歌谣：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范孟博是汝南太守，南阳出身的太守宗资仅在文件上签字划圈。岑公孝是南阳太守，弘农出身的太守成瑨仅仅坐在那里说大话）

这歌谣即是说在汝南、南阳二郡，汝南太守宗资将政务委托功曹范滂（字孟博），南阳太守成瑨依赖功曹岑晊（字公孝）。以精明的功曹与无能的太守作比较，极具讽刺意味。

县以下又有“乡里”行政组织，直接管理人民。“乡”的数字在永兴元年（153）全国是三千六百八十二个，一县平均三乡。设置的官员有指导民众道德教化的“三老”、负责征发徭役、课税的“有秩”、负责治安的“游徼”等乡官。作为制度一乡由十“里”构成，由一百家组成社会的末端“里”这种行政村中，设置“里魁”进行管理。

特别能够反映乡里社会实际情况的，是东汉时期在地方上颇为流行的石刻资料。秦汉时期留下的石刻超过二百件，其中有九成是东汉的资料，而且多为二世纪中后期桓帝、灵帝期的作品。墓碑中记载了墓主在当地的同族，或墓主任郡太守时故吏的姓名和出身籍贯。后者反映了郡中地方社会豪族的真实情况。另外，那些地方长官的功德碑也为我们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资料的宝贵资料。增渊龙夫曾注意到，巴郡太守张纳碑碑阴所记五十九位巴郡掾吏以下基层官僚的姓中，有一大半与《华阳国志·巴志》所见大姓是一致的。由此，他认为地方统治与来自土著豪族自律秩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新出史料中东汉乡里的农民生活

1966 年，在四川省郫县犀浦附近发现一座东汉墓葬，一块记载二十户农民财产目录（土地、奴婢、房屋、牛）的簿书碑被用作了东汉墓穴的墓门。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时期四川地方乡里社会的情况。例如记有“田三十亩，质六万”，“奴立（人名）……并五人，直二十万”、“舍（房屋）六区，直四十四万三千”、“牛一头，直万五千”等内容。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少的仅八亩（1 亩相当于 4.5 公亩），多者达二百六十亩，相差甚远。就一亩的价格而言，占地少者家的土地为五百钱，多者两万钱。反映了土地肥沃程度、生产能力优劣的不均衡的状况。在土地买卖方面，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买卖文书。

168 河南偃师出土“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卷”

1973年，在河南省偃师县发现东汉时期的石券（石刻的证书），内容是为减轻父老一职负担而进行土地共同买卖的约定，是反映当时乡里具体实况的贵重史料。长一米五十四厘米，宽八十厘米，厚十二厘米。表面阴刻有十二行、二百一十三字的隶书。内容为章帝建初二年（77）正月十五日，在负责选出侍廷里“父老”的一种叫做“僤”的组织，召开了由二十五位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决定由里的治所制作石券，刻记以下约定：

> 永平十五年（72）六月，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可作为“客田”借与那些担任父老职务者，允许他们收获田上谷物。那些购买此土地时没有出钱者，可将自己的耕地直接交与父老。僤的成员死亡时，由其子孙中的户主继承权利。僤的全体成员都应该出资，若无法出资时须将耕地出赁所得费用充当。在所记二十五人姓名中，有于氏十名、左氏二名、僤氏三名、尹氏三名、锜氏三名、周氏三名以及另外一名。在他们之间轮流产生父老一职。[33]

由此可见，指导里民众的父老一职，在东汉时期是由里中有一定资产的阶层中产生的。在这里维持稳定秩序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乡里社会民间的条约。

墓室壁画所描绘的豪族庄园

东汉豪族向中央输送一族的高官，在地方他们独占郡县政府中实务官吏的职位，从而控制着地方政治的实权。其经济基础就是他们自己进行大土地经营的庄园。“庄园”一词就是别墅和田园，虽然多见于唐代以后，但是像官僚、豪族在都市周边的农村广占土地、围圈起来役使奴婢和雇佣佃农劳作的事例在汉代已经出现。就像皇帝、诸侯王在全国围圈禁苑那样，豪族也在田野占有庄园。东汉的梁冀在其占有的园囿中，修造山川、森林、溪谷等景观，以再现自然地形，其中还放养着许多珍禽异兽。当然，这只是极尽奢侈的特殊事例。一般的庄园多在以往郡县城郭周边的未开垦的山川薮泽地带圈围而成。

东汉仲长统曾论及秦汉时期的三度乱世（秦末、王莽、东汉末），认为扰乱编户齐民（登录于户籍的平民）之世的是豪族的兼并。他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话虽有夸张，但反映了庄园不断扩大的状况。

东汉墓葬墓室的彩色壁画屡有发现，从中也能够见到地方豪族庄园的场面。1971 年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掘的桓帝、灵帝时期东汉墓葬墓室南墙上，具体描绘了有青山、树木环绕的

庄园全貌。中央是围以坞壁的住宅和马厩，南面饲养着牛、羊、鸡。右上方山麓的耕地中两头牛在拉犁耕作。住宅左面可见采桑叶的情景，左下方是车库的位置。“坞壁”即自家建立的用以防卫建于郡县城外田野中豪族据点的防护墙壁。与同墓室东墙所绘宁城县城的构造对照来看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什么叫做庄园了。这座墓葬的墓主是担任北方边境防御的高级官僚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所绘是他历任的郡县以及故乡的庄园。

以此为中世前史的观点

1958 年山西省平陆县枣园村发现的东汉早期墓葬，也可见到豪族庄园由坞壁圈围，赤足农民执鞭催二牛牵犁耕地、一边翻土一边播种的情景。东汉墓葬还有画像石、画像砖上雕有纹饰和图画，以及砖表面刻有浮雕的情况，有的是一块一块分离的，也有的是全体组合成一幅豪族庄园模样的。农耕、制盐、酿造、养鱼、狩猎等庄园经营都活生生地被描绘了出来。

在东汉墓葬随葬的明器中，有很多水田、旱田、贮水池灌溉的模型。温暖多雨地区栽种水稻。陕西省勉县东汉墓的明器中，可见在分布着坐坡的旱地上，由贮水池经水渠引水灌溉、以及不规整区划的水田在收获之后变为养鱼场的图案。

东汉时期庄园多种经营并举，看来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根据这种现象虽然有学者将其视为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相关联的中国中世前史，但是当时豪族庄园的扩大是否已经

成为全国普遍社会现象，尚无法断言，认为庄园的存在就是中世的判断必须慎重。何况古代也可以有庄园，史料上所见“豪族跋扈”的表达，反映的就是不同于对编户齐民实行个别的人身控制这一体制的社会现象。

崔寔，涿郡安平县出身，曾任桓帝郎官，著有名为《政论》的政治评论性著述，在当时就受到赞赏。他明确指出东汉王朝衰退期的社会不稳定现象的篇章，对了解东汉时期社会变动情形有重要价值。后来他还编纂了东汉的史书，出任五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附近）太守时，在地方行政方面也发挥了自身才干。为了那些没有冬衣的穷人，他变卖剩余物资制造纺织工具，并且亲自传授纺织成衣的技术。

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

酷似西汉末的政权交替

“经四百年之间，闭四门，听外难，群异并贼，官有孽臣，州有兵乱，五七弱，暴渐之效也。”《春秋命历序》纬书是这样说的。

所谓“五七”即五乘以七，指三百五十年，被解释为东汉从顺帝开始衰退。二世纪中期这一预言曾广泛蔓延。当时有意见认为汉朝到了四百年的时候，将有弱小君主闭门听外难之灾，所以要从现在开始改革制度、力戒奢侈，以便渡过四百年之难。顺帝

也表示同意。随着天变地异的频频出现，人们对刘氏王朝能否存续四百年深感不安，于是有了这种纬书的产生。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成为现实是在东汉最后的献帝时期。灭亡东汉朝的人被认为是冠以“贼臣”或“国之大贼”恶名的董卓。他被比喻为相当于夺取西汉刘氏政权的王莽。

与董卓对抗的是发起“义兵”打出复兴汉室旗帜的袁绍，而最后使东汉最后的皇帝献帝禅让、实现改朝换代的是曹操之子曹丕等人。这最后一幕与以往秦末之乱以及两汉交替混乱期的政权交替何其相似。秦始皇与项羽、刘邦，王莽与更始帝刘玄、刘秀的三者对立模式，在董卓、袁绍、曹操之间又一次得以重现。

董卓与王莽不同，他并没有自立王朝，而是废了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后即位仅五个月的皇太子辩（少帝），同年九月拥立八岁的陈留王刘协作为献帝，杀皇太后何氏。翌年的初平元年（190）二月迁都长安，放火烧毁洛阳的宫殿、庙宇、人家，之后董卓部下吕布盗掘洛阳皇帝陵和高级官僚墓葬，掠夺财宝。至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部下吕布所杀，短时期内掌握过东汉王朝最后的实权。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为小钱，将洛阳、长安的铜人、钟锯、飞廉、铜马等铜制品捣毁作为铸造货币的材料。但因小钱既无轮廓又无文字，十分粗糙，终于招致混乱，引起物价飞涨。

反抗董卓的行动与秦始皇、王莽时期同样，也是兴起于山东（关东）各郡。袁绍，汝南郡汝阳名族出身，曾与灵帝外戚何进

合谋一举清除宦官势力，屠杀二千余人。董卓拥立献帝后，袁绍与从弟袁术一起，联合了地方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各个势力，成为讨伐董卓的盟主，率领同盟军攻打董卓。因此，董卓杀害了在都城的袁绍一族的高官及其家族，埋于青城门外和东都门内。其后，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之战一决雄雌，结果袁绍大败。

魏王曹丕所受皇帝玺绶

延康元年（220）献帝将帝位让给魏王曹丕，自己甘愿去当山阳公。“公”位于诸侯王之上。曹丕在繁阳故城筑坛登基，接受了皇帝玺绶。禅让做法效仿了刘邦的皇帝即位。历史又在重演。这就是东汉二百年、刘氏政权四百年的最后一幕。其后，成为山阳公的献帝又生存了十四年，直至青龙二年（234）卒，最后以汉天子之礼埋葬于禅陵。就魏来说，他是禅让的汉皇帝，所以特意在以禅陵为名的陵墓予以厚葬。地点与洛阳东汉皇帝陵分开，单独、寂静地设置在了山阳公的封地（今河南焦作）。

刘氏做皇帝的传统，并未因其四百年历史的终结而中断。三世纪初在蜀地建立汉国的刘备是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子孙，他有效地利用了祖先的权威。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在1968年得到发掘，是一位遗体以金缕玉衣装裹的人物。无论如何，汉王室的出身成为了证明蜀汉权力的根据。

四世纪初，进而继承汉谱系的是北方的匈奴。匈奴刘渊称

汉王自立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初期，而五胡十六国之中最初的“成汉”国是巴人李雄在蜀地创建的。并非汉刘氏子孙的刘渊继承汉统的根据在于西汉文帝以降汉与匈奴所缔结的兄弟关系，以及元帝时后宫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的姻戚关系。

建元二年（480）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涨水，冲击山麓，出现长六七丈的崩塌。其下出现千余根柱子，皆十围，长者一丈（十尺），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谁都不认识。一名叫江淹的人去求问王俭，王俭只说：“你不熟悉隶书，此乃秦汉时的柱子。”（《南齐书》）五世纪的人已经没有机会接触秦汉时期的文字隶书了。汉文化虽被继承下来，却没有了接触汉代实际文字的机会。

结语　秦汉四百四十年的各位始皇帝

四百四十年的这个时代

秦统一的时期（前221—前206）仅仅十五年，与西汉（前202—公元8）、东汉（公元25—220）合计的话大约四百四十年。如果将这四百四十年作为一个时代来看的话，这究竟是怎样的时代呢？本卷的题目就是答案。四百四十年绝非安定的时代。其间有过项羽、刘邦楚汉抗争时期（前206—前202）的五年，也有王莽“新”时期（公元8—23）的十五年以及其后的混乱时期。可以说这是动荡

的四百四十年!

由于四百四十年是个不完整的数字，所以说到秦汉的时代史，不妨概言之为四百年史。就连隋唐史也不过三百年，明史或清史都不足三百年，所以秦朝二代皇帝的时期与以秦为动力的刘氏二十四代皇帝时期，虽说有过暂时的中断但最终延续了四百年，可谓令人震惊。将这一时代作一总结的话，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最初对秦汉这一时代做出总结的，并不是现代的历史学者。汉代人已经将秦汉史作为当时的现代史进行过总结了。现代的我们是将秦汉史作为古代史看待的，但在汉代人来看，上古（不言“古代”）时代是殷周，现代史是秦汉时期。西汉的司马迁记述了从夏殷周三代至秦汉的《本纪》，当然重点记述了作为现代史的秦汉部分。

计算一下《史记》从《夏本纪》至《今上（武帝）本纪》共十一本纪的字数的话，《秦本纪》以下占 76%。东汉班固也说司马迁书“详于秦汉”。进行历史分期并非起于近代历史学，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由于历史分期是从现在回顾过去的概念，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已。

越是远离“汉”的时期，当然对秦汉作为过去时代的记忆也就越发淡薄。但是，正如我们的历史学一样，并不在于要将过去的时代据实掌握。说到底首先还是要从过去汲取对现在有用之处。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

争当始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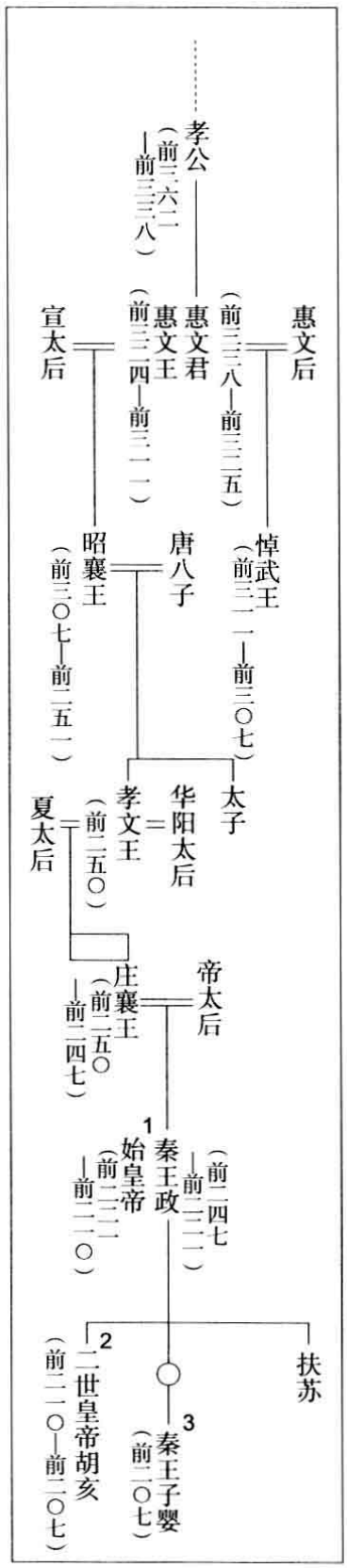
东汉灭亡之后四百年的唐代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626—649 年在位），以巩固了统一国家基础的名君而闻名。他统治的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这位太宗曾问萧瑀：“朕欲使社稷（国家）长久，应该如何去做？”萧瑀回答得很明确：“夏殷周三代所以能长久保持天下，原因在于封建诸侯以为藩屏之固。秦设置郡守、县令，二代而亡；汉对诸王子弟分封授国，得以延续四百年。但是，此后的魏、晋废止封建。封建之法，效果明显。”[34]

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实行了封建。“封建”一词并非对欧洲中世社会 feudalism 的翻译，而是中国的传统制度。是在皇帝直接统治的郡县之外，由诸侯、列侯分治领地的制度。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独立性说到底是具有维护中央集权机能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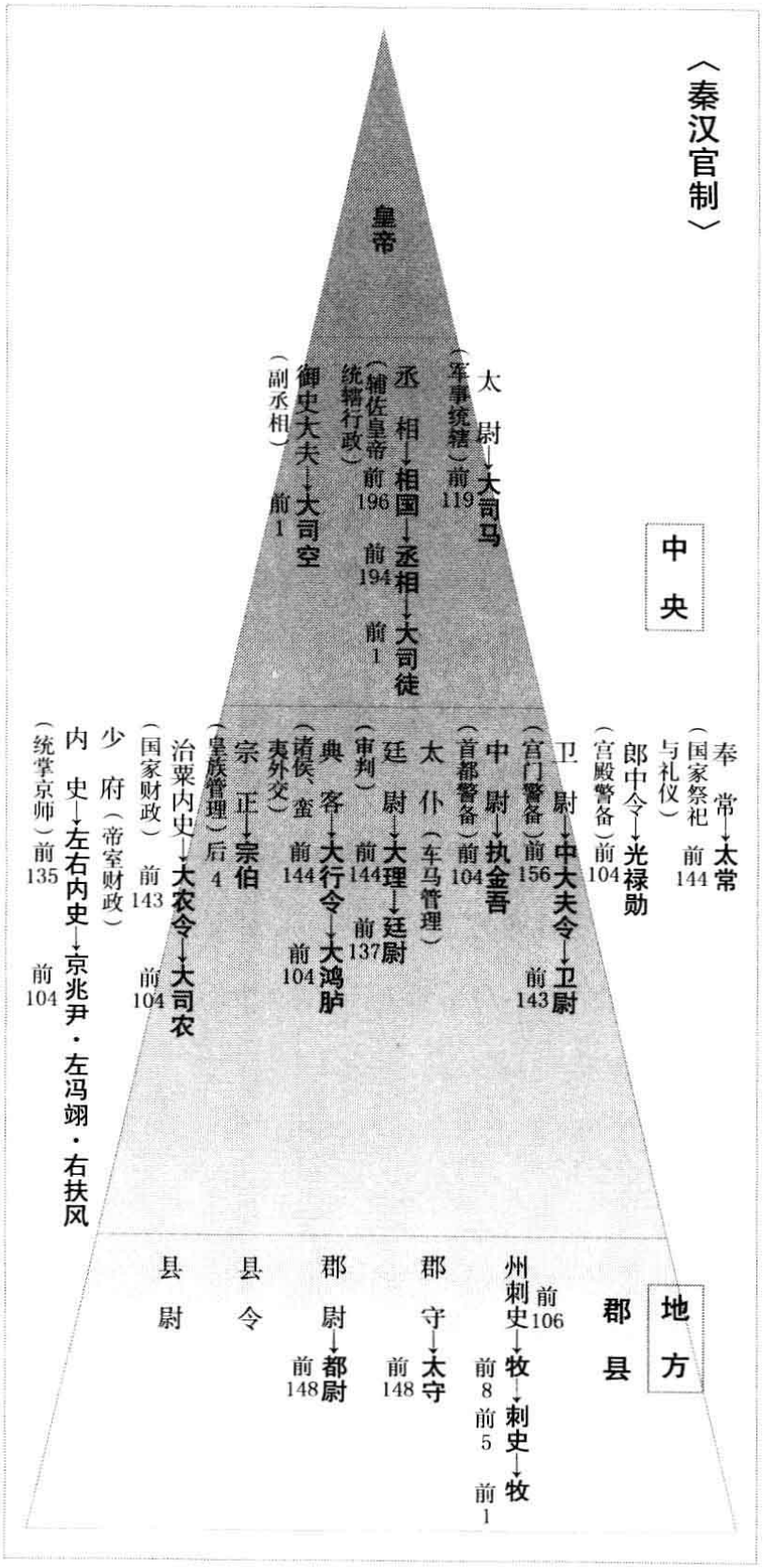
秦郡县虽说短命，汉以郡县、封建并行却持续了四百年之久。正是因为经常有着不致陷入秦短命局面的制动措施，秦汉时代才得以延续四百四十年之久。这样的结论应该不会错。本卷的题目之所以叫做《始皇帝的遗产》，理由正在于此。正是由于继承了始皇帝正负两方面的遗产，才有了随后汉代四百年的历史。而且，在继承始皇帝正负遗产的同时，刘邦、武帝、王莽、光武帝等都在争当始皇帝。西楚霸王项羽虽说没能当上皇帝，但也不妨算作其中的一员。

想成为始皇帝的不仅仅秦始皇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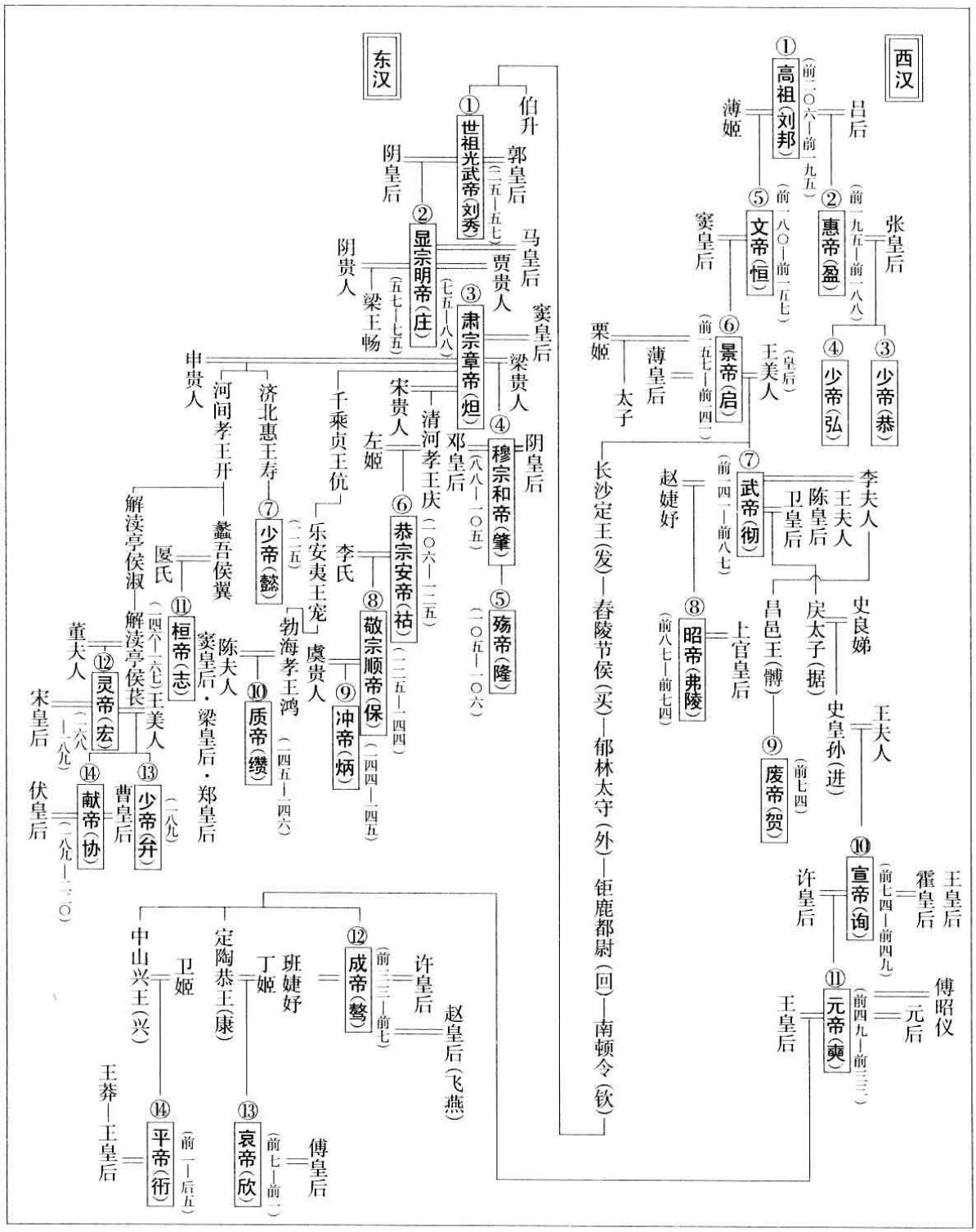
附录



169 秦皇帝系图（括号内为在位年）



170 秦汉官制（细笔画字：秦至西汉初期；粗笔画字：西汉中后期）



171 两汉皇帝系图（括号内为在位年）

译注

[1] 原文是："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2] 原文是："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3] 原文是："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4] 原文是："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5] 原文是："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6] 原文是："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7] 原文是："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

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8] 原文是：“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9] 原文是：“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出自《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十七。

[10] 原文是：“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11] 原文是：“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12] 原文是：“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出自《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13] 原文是：“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14] 原文是：“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15] 原文是："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16] 原文是："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17] 原文是："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出自《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第十。

[18]《二年律令·爵律》有云："诸诈伪自爵、爵免、免人者，皆黥为城旦舂。"出自《张家山汉简》第394简。

[19] 原文是："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20] 原文是："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出自《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21] 原文是："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出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2] 原文是："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出自《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23] 原文是："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出自《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24] 原文是："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

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25] 原文是："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出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6] 原文是："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27] 原文是："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 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28] 原文是："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原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 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29] 原文是："又诘偃：'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余，而吏不能也？ 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俗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已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 出自《汉书》卷六十四《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30] "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 出自王褒《僮约》。

[31] 原文是："今有甲持钱五百六十，乙持钱三百五十，丙持钱一百八十，凡三人俱出关，关税百钱。欲以钱数多少衰出之，问各几何？答曰：甲出五十一钱一百九分钱之四十一；乙出三十二钱一百九分钱之一十二；丙出一十六钱一百九分钱之五十六。"出自《九章算术》卷三。

[32] 原文是："狐、狸、犬出关，租百一十钱。犬谓狸、狸谓狐，尔皮倍我，出租当倍哉。问出各几何？得曰：犬出十五钱七分六，狸出三十一钱分五，狐出六十三钱分三。"出自《张家山汉墓竹简·算数书》。

[33] 河南堰师出土《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券文如下："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廼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锜中都、周平、周兰、□□、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锜初卿、左伯文□、王思、锜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出自《张家山汉墓竹简》。

[34] 原文是："帝问瑀：'朕欲长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长久者，类封建诸侯以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绝。汉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废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纳之，始议封建。"出自《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萧瑀列传》第二十六。

主要人物略传

始皇帝（前 259—前 210，前 247—前 210 在位）

秦王嬴政，生于赵都邯郸，父庄襄王即位后，成为秦王。在他五十岁死之前的统治期间，前半期的二十六年做秦王，后半期的十二年作为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君临天下。一方面作为结束战国时期混乱、实现统一的君主受到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因其歼灭东方六国，实行强权、焚书坑儒、修筑长城而牺牲民众，被认为是苛刻的暴君，一直是位有争议的君主。1974 年兵马俑坑、1975 年睡虎地秦简、2002 年里耶秦简等秦始皇生前第一手史料的发现，无疑有助于纠正被后代歪曲的事实，探明真相。

项羽（前 232 年—前 202 年）

出身于战国时期楚将军名门，与叔父项梁一起响应陈胜、吴广之乱，举兵反秦。生于下相县（江苏省徐州东）。项梁曾为避仇家渡长江，移居会稽吴地（江苏省苏州），并在此起兵。项梁死后，项羽指挥军队。比刘邦军，项羽军更加勇往直前，八千兵很快扩展至十万、四十万，三年后晚刘邦一步攻入关中。其坑杀秦败兵四十万、杀秦子婴、焚烧咸阳、盗掘秦始皇陵等残暴行为常被后代用来与刘邦的沉着行动进行对比。项羽在秦灭亡之前的三年，拥立楚怀王，利用其权威当了上将军；在灭秦之后又将怀王架空为义帝，以分封十八王的形式，自称西楚霸王取得领导地位。但是，项羽杀义帝，联合体制很快崩溃。楚与汉王刘邦之间虽暂时订立停战协定，最后在垓下之败于汉军，自刎于乌江。

刘邦（前 247—前 195，前 206—前 195 在位）

西汉第一代皇帝，庙号高祖，谥号高皇帝。在今江苏省沛县出生，响应陈胜、吴广之乱，于沛县起兵。灭秦之前称沛公（沛县之长），其后与西楚霸王项羽作战时称汉王（蜀汉之王）。战胜项羽之后，即位皇帝，后来称为高祖。其后七年间，利用旧咸阳之地建都长安，将旧战国六国贵族、豪族十余万人迁徙关中，由此缔造了汉

帝国的基础。陈胜、吴广之乱中即位的冒顿单于所领匈奴势力呈现优势时，发生了一连七日围困高祖于白登山的事件。从即位为皇帝至死，一直处于内外不安定的情况之中。与项羽不同，刘邦周围的萧何、曹参、周勃、韩信、陈平等众多人才，曾几度助其挽救危机。

吕不韦（？—前 235）

战国后期活跃于东方都市之间的大商人。偶遇在邯郸作为人质的子楚，由此策划使子楚在孝文王之后继位秦王，即庄襄王。直至秦王政时期，吕不韦成为连续辅佐两代秦王的相邦（丞相）掌握实权。最终因牵涉嫪毐事件失足，自杀。吕不韦死后，秦王政开始亲政，转而起用李斯为智囊人物。由于当年吕不韦曾将身怀自己孩子的邯郸女嫁给子楚，所以有着秦王政实为吕不韦之子的传说。

白起（？—前 257）

出生于咸阳西的郿县，作为将军攻打过韩、魏、赵、楚各国，在攻陷楚都郢之后被封为武安君，成为秦最高军事将领的国尉。在公元前 260 年的长平之战中，坑杀敌军四十万。昭襄王五十年，因不出仕获咎，以自杀的悲剧结束了一生。

王翦

出生于咸阳东北的频阳县。子王贲、孙王离三代为秦将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王政先是信任年轻将军李信，以二十万军攻楚，结果失败；最终依老将军王翦所言，以六十万军破楚。作为秦国全部六十万军首领，为了避免秦王生疑还特意要求以美田作为报酬。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二十公里处的到贤乡永和村据传有王翦墓。

商鞅（？—前 338）

卫公子商鞅效力于秦孝公，于公元前 359 年、前 350 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第一次变法规定，以五家或十家为一组，实行连坐责任制，有男子二人以上者必须分家，按照军功授予爵位。第二次变法规定，禁止父子兄弟同居，实行县制，划定土地界限，统一度量衡。商鞅变法促进了战国国家的中央集权，也为后来秦汉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意义为后人所重视。

孟姜女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明代长城的东端是山海关，其东北方向有几座被称为孟姜女

庙或姜女坟的礁石。由于秦长城位于距此遥远的北方，而且秦时尚不曾有孟姜女的故事，所以这一故事及其遗迹一直被认为是后世的创作。但是，近年在这一带的海岸发现了与秦碣石宫有关的大型离宫遗址，这就为后世传说提供了进一步解释的背景材料。

蒙恬（？—前 210）

秦将军。祖先为东方齐国人。从祖父蒙骜开始，蒙家三代效力于秦。蒙恬在秦统一之后率三十万军与匈奴作战，并且修筑长城，防御关塞颇有功绩。但是秦二世时，在赵高等人策划下与其弟被迫一同自杀。陕西省绥德县城西有传说的蒙恬墓。

扶苏（？—前 210）

秦始皇长子。在秦始皇欲坑儒时曾因进谏惹怒秦始皇，被遣往上郡（陕西省北部）监视蒙恬。秦始皇死后，根据赵高、李斯伪造的诏书，与蒙恬一起被问以死罪。陕西省绥德县城西有传说的扶苏墓。

赵佗

本为中原出身，秦时参加百越远征军，出任新设置之南海郡、龙川令。秦末，乘中原混乱，于番禺（广州）置首都，在越地建立南越国，成为第一代王。一面对西汉王朝称臣、保持册封关系，一面在国内自称武帝。1983 年发掘了赵佗孙、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墓。赵佗的国家最终为武帝所灭，维持了五代九十三年之后宣告结束。

二世皇帝胡亥（前 209—前 207 在位）

秦的第二代皇帝，称二世皇帝。他继续了阿房宫、驰道的工程，结果由于过度劳役的负担引发了陈胜、吴广的农民反乱。后来，被宦官赵高逼迫自杀。西安大雁塔东南有传说的胡亥墓。

文帝（前 180—前 157）

高祖与薄皇后之子。吕太后死后，由于外戚吕氏一族反乱，代王刘恒被迎立为皇帝。实行废止肉刑、田租，解禁山泽资源，开仓放粮救济贫民等善政。对于匈奴入侵也用和亲之策予以解决，迎来国内的安定期。根据遗言进行薄葬，是西汉皇帝中唯一埋葬于自然山陵——霸陵的皇帝。

景帝（前 157—前 141）

文帝与窦皇后之子。虽因削减同姓刘氏诸侯王领地，招致吴楚七国之乱，但为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平定，化解危机。下达许可诸侯分封的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势力，迎来安定。文景父子二帝的四十年左右安定期，被称为“文景之治”。

武帝（前 141—前 87 在位）

景帝与王皇后之子，于西汉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之后即位，大大改变了继承秦制的西汉前期的制度。内政方面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均输平准法，设五经博士将儒学官学化，治理了黄河水患；对外通过与匈奴的战争，控制了河套、河西走廊，征服了南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北部，从而巩固了内外强大的帝国体制。继秦始皇之后再次行泰山封禅仪式，改秦以来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为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以此表明西汉帝国进入了新时代。

张骞（？—前 114）

出于武帝对匈奴的战略，为了与同匈奴有世仇的月氏结为同盟，张骞作为百余人外交使团的团长踏上了征程。途中滞留匈奴十余年，甚至娶妻成家，但仍经由大宛、康居终于到达大月氏（西迁之后的月氏）。但是，此时大月氏已经失去向匈奴复仇的志向。虽然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历经十三年后归来时，他为汉朝带来了西域各国的许多情报。

成帝（前 33—前 7 在位）

元帝与王皇后（王莽的姑母、元后）之子。因黄河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致力于灾民、流民的救灾。但同时又恢复了元帝废止的陵邑徙民。在初陵（延陵）之外又开始建造第二个陵墓（昌陵），还准备起陵邑，终因内外形势的不安定而被迫中止。统治期间外戚王氏势力抬头，很快导致了王莽政权的诞生。刘向谏言厚葬的背景中也有其对外戚王氏势力的危机感。

王昭君

王昭君，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据《汉书》《后汉书》载，她于西汉元帝（前 49—前 33 在位）入宫，前 3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求“和亲”时，自愿远嫁匈奴单于。单于死后按照匈奴习俗，王昭君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产有两个女儿。到了晋朝，由于在汉族来看嫁给匈奴为妾是屈辱之事，所以出现王昭

君结婚时服毒自杀的传说。后来在元曲《汉宫秋》中也被改为王昭君在国境投河自杀的情节。昭君墓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传说胡人墓地草是白的，唯昭君墓地草是绿的，故名“青冢”。

王莽（前 45—公元 23）

建立了介于两汉刘氏汉王朝之间，仅不满十五年的新王朝。王莽能取代刘氏王朝当上皇帝，得力于成为元帝皇后的姑母王政君。她在平帝幼小时掌握实权，委国政于王莽。王莽与秦始皇、刘邦不同，是以禅让形式当上皇帝的。作为外戚在与刘氏王室结合的同时，从安汉公经假皇帝（辅佐皇帝的地位），最终成为皇帝。毒杀十四岁的平帝，在两岁的孺子婴面前举行君臣关系交替仪式。实行了基于《周礼》的政治改革，希望将汉代制度改变为周代的理想制度。

光武帝（25—57 在位）

即复兴西汉刘氏、建立东汉朝的刘秀。与赤眉农民反乱相呼应，于南阳举兵，虽然刘氏本家刘玄即位更始帝并推翻王莽政权，但刘秀最终吸收赤眉集团，控制河北各股势力建立了新政权。统治期间实行了收拾两汉之际混乱局面的各项政策（减轻田租、修复黄河堤防、解放奴婢、简化财政与官僚制度）。

明帝（57—75 在位）

东汉第二代皇帝刘庄。其统治犹如能够照耀天下四方一样的明亮，而得到“明帝”谥号。光武帝第四子，母阴皇后。好儒学，尤能遵守光武帝制度，甚至亲自处理刑狱，法令为之严明。积极对待光武帝时一度中断的对西域的经营，派遣窦固、班超征讨北匈奴。据说梦见金人而从西域传来佛教。

和帝（88—105 在位）

东汉第四代皇帝刘肇。其统治刚柔兼济，得到“和帝”谥号。母梁贵人死后，作为窦太后之子被养育成人。章帝死时，窦太后立十岁刘肇为帝，以母后摄政。二十七岁去世，在位期间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对外招致匈奴等周边民族的入侵。东汉帝国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的平稳统治期，在和帝以后进入外戚、宦官势力专权的混乱时期。

王充（27—90）

东汉思想家，著有评论诸家思想的著作《论衡》。学于洛阳太学时，拜班彪为师。强调天的自然属性，批判了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预言）思想。

张仲景

南阳郡人，名机。东汉末著名医学家。其事迹不见于《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仅散见于《伤寒论》自序，不明。有观点说他曾官至长沙太守，也有史家提出反驳。所著《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知识。后来此书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被后世尊成为“医圣”，今天在南阳还有墓碑（建于晋咸和五年〈330〉）和祠堂。

班固（32—92）

东汉右扶风安陵县（陕西省咸阳县东）人。著有《汉书》一百卷。起初，父班彪见《史记》绝笔于武帝期，执笔《后传》数十篇，中途死去。为了成就父亲遗志，班固专心著述。此举被明帝误解，班固被投入牢狱，著作亦被没收。经弟班超的辨明，得以释放。以后作为掌管后宫秘书、文书的兰台令史，继续编纂《汉书》。妹班昭亦以学者著称，班固在完稿之前的六十一岁死后，班昭继续撰写并予以完成。

班昭

东汉学者。班彪女，班固妹，曹世叔妻。继承班固遗志，完成了《汉书》的《表》和《天文志》的部分。受和帝之命，入宫承担对皇后、贵人的教育，被称为曹大家。所著《女箴》七篇，归纳了女性生活之道七条。侍奉丈夫十分谨慎，端庄少语，服从舅、姑，与丈夫之妹和睦相处。

李冰

在都江堰的外江发现了两尊石人。石人位于东汉时期岷江洪水经常泛滥的地点，可能是洪水时为泥沙所掩埋。石人模拟战国秦时治水成功的蜀守李冰形象，具有祈祷意义，同时还兼有水位测量仪的作用。李冰石人的题刻中，除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号之外，还有“造三神石人”的字样，可知此为其中的两尊。

历史关键词解说

睡虎地秦简

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墓中发现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枚竹简。以往关于秦代法律的研究，已经认为这是一个严格的法治主义国家，此次又一举出土了大量的秦律条文。内容除“田律”（农耕生产）、“厩苑律”、“仓律”、“金布律”之外，还包含“法律答问”（问答集）、“封诊式”（审判文书）等。

龙岗秦简

1989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龙岗的秦墓中，发现了秦统一之后关于禁苑（御苑）、驰道（道路交通）、牛羊马牧场管理法律的竹简一百五十枚。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后，宝贵的秦朝史料。

邯郸

从公元前 386 起直至前 222 年为秦所灭之前，战国赵的国都。在河北省邯郸市西南四公里处有一座古城。由宫城（赵王城）与郭城两部分组成，整体东西 3.2 公里，南北 4.8 公里。秦王政出生于此。母亲是这里出身，是一座与秦始皇因缘深厚的都市。

大篆、小篆

东汉时期的字典《说文解字》中提到秦书八体中字体。“大篆”、“小篆”、“刻符”（符契上所刻文字）、“虫书”（帛幡上所书文字）、“摹印”（印玺上所刻文字）、“署书”（门上所书文字）、“殳书”（殳等武器上所刻文字）、“隶书”（官吏将墨写于竹、木简上的篆书简化之后的文字）之中“大小篆”的篆书是青铜器、铁器等金属上刻写的文字，统一之前的篆书称为“大篆”，秦始皇统一时以大篆为基础新造的字称为“小篆”。小篆可见于秦始皇的刻石及度量衡器。

咸阳

战国时期作为秦都，公元前350年由孝公营造于渭水北岸。公元前221年统一后，地方豪富十二万户被迁移至此，作为统一帝国的首都，以在渭水南岸建造阿房宫等予以扩充。现在由于渭水河床的北上，咸阳南部被冲毁，北部丘陵上残存有宫殿遗址基台。

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的统一度量衡，在青铜、铁、石制的权以及青铜、陶制的量上所刻始皇二十六年诏书中有所记述。从实物度量衡器可知，一斤约重250克，一升约为198立方厘米。

阿房宫

散见于西安西郊约十五公里的阿房村一带的夯土建筑遗址。被称为“始皇上天台”的遗址，呈周围31米、高20米的圆形。据最新考古报告，最大的前殿遗址已发现面积26万平方米，东西1270米、南北426米的长方形台基，遗址区内有村落。2002年开始的正式调查显示，前殿北侧是夯土墙，南侧为缓坡。南面一部分由圆瓦、板瓦组合而成的屋顶瓦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阿房宫是否被项羽烧毁的真伪之谜正在揭晓。

秦长城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214年，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进，命蒙恬率三十万兵在战国秦、赵、燕北方长城的基础上所建造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一万余里（约五千公里），称为万里长城。今天在宁夏、内蒙古自治区、河北残存的秦长城遗址，比明长城的位置靠北，用石垒或夯土的简易工法建造。秦长城遗址尚未进行全面调查。特别是在沿贺兰山脉一带，究竟有无长城意见尚有分歧。

百越

中国长江以南的华南居住着各种越人，总称为百越。秦统一后攻打百越，前214年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居住山岳的越人展开游击战，使得进攻的水军五十万秦军饱受困扰。

徐福传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巡行中踏访琅邪时，召见了齐人徐市（即徐福），秦始皇让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东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最终失败。《史记》的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了徐福带三千人到达平原广泽、在那里称王的传说。徐福最后到的地方后世认为是亶州或倭（日本）。因此日本各地有许多有关徐福的传说，和歌山县新宫市有徐福墓，三重县熊野市有徐福祠和墓，在九州注入有明湾的筑后川河口（佐贺）上陆的地浮盃、筑后平野有祭祀徐福的金立神社。

坑儒

坑埋儒生的地点在西安市临潼区西南十公里处的韩峪乡洪庆堡，称为坑儒谷。东汉出现传说曰：当时以骊山山麓温暖的温泉、山谷冬天瓜秧生芽为由，欺骗诸生去考察，乘机放箭坑埋。唐代称此地为愍儒乡。

方士

战国以后在沿海燕、齐一带出现了传授神仙术的人，叫做“方士”。“方”即处方的“方”，也就是“术”。《史记·封禅书》载，燕地宋毋忌、正伯侨、羡门高等人有“术”，可将灵魂取出，即留下肉体。

巡狩

也叫巡行、巡幸。秦始皇在统一天下翌年的公元前220至死去的公元前210年，前后五次率臣下巡视地方。除第一次去西方巡视秦故地之外，其他四次都是去战国东方六国旧地。这是上古帝王通过祭祀天下山川，在地方显示皇帝权威的举措。途中在峄山、泰山、琅邪、之罘、东观、碣石、会稽七处树立了彰显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刻石。

匈奴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战国时期其国境隔着长城与秦、赵、燕三国相连。秦统一之后头曼单于在与蒙恬军的战斗中失去了鄂尔多斯地区，后来杀父自立为单于的冒顿单于随着秦帝国的崩溃又收复了失地，征服北方民族，进入鼎盛期，进而与西汉朝形成对立之势。甚至使西汉高祖刘邦在平城（山西省大同市）遭到冒顿精兵四十万的围困。

鄂尔多斯

古时称为“河南”（不是现在的河南省），指黄河流经最北的河道以南地区。因为黄河在此处出现巨大弯曲，致使此地西、北、东都包围在河床之中，又称“河套”。自明末以后此地为蒙古鄂尔多斯部族所占，得名“鄂尔多斯”。

函谷关

河南灵宝县西南的关卡。秦时设置，西汉武帝时向东移至新安县。是通向秦汉两王朝据点“关中”的重要关口。

灞河

流经西安市东的河流。因秦穆公霸业得名。河上架有灞桥，是咸阳、长安出发去东方时，人们依依惜别的地方。汉代过往人等须在此接受检查。刘邦的军队也是由此进入秦都咸阳的。

关中

陕西省渭河两岸的广大盆地。由东函谷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等四关所围要塞之地，由此得名“关中”。其中心是现在的西安，这里曾是周、秦、西汉、隋、唐的古代都城。

夯筑

于夹板之间将土层状夯实的建筑施工法。中国古代广泛应用于长城、墙壁、墓葬、道路、住房等建筑。由于夯实干燥后的黄土十分坚固，夯筑的汉代长城、长安城城墙、陵墓等古代遗迹虽历经两千年，至今仍然存在。

寿陵

生前所建下葬之前的陵墓。赵肃侯即位十五年开始修筑“寿陵”（《史记·赵世家》），汉代皇帝即位翌年将作大匠为了确保陵地而开始施工。汉代寿陵也称“初陵”。下葬之后命名为“长陵”（西汉高祖）、“茂陵”（西汉武帝）等。

徙民

秦汉曾实施向秦咸阳、汉长安、西汉陵邑（守陵都市）、北方边境都市强制移民的政策。这些移民被称为“徙民”。既有一般民众迁移，也有地方豪族的迁徙。目的

在于开发、建设首都圈以及加强边境的防御。

张家山汉简

1983 年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西汉墓发现的一千余枚竹简，除西汉吕后二年的《二年律令》之外称为《奏谳书》的法令集是记录了秦、楚（项羽）、汉（刘邦）交替的混乱时期各种事件及处理方法的珍贵史料。

帛画

在帛（丝绢）上绘的画，或作为葬礼的幡旗，或用于棺木的披盖。曾出土于湖南省长沙战国楚墓，在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内棺上也各发现一件，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也出土了同类帛画。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呈 T 字形，长 205 厘米。上部的左右是月亮、太阳，中间配有蛇身女神表示天界。帛画中央部看来是墓主的老妇人扶杖而立，男女五人侍奉两侧。下部表示地下世界，力士立于大鱼之上，双手托起大地。整体构图表现了墓主升天的场景，形象地反映了汉代人的世界观。

太史令

掌管天文、历法的官职，也有作为尊称的情况。官位为六百石，可以说是个中级官吏。司马谈、司迁父子两人曾任此职。司马迁任太史令时根据史官的天文记录，曾致力于新历法“太初历”的制作。后因为远征匈奴成为俘虏的李陵辩护而被处以宫刑，尽管如此还完成了从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的史书。

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西南民族的看法，《史记》列传中还有北方的《匈奴列传》、南方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东方的《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记述了夜郎等南夷诸国在武帝时期臣服于汉的历史。由于西南夷有着巴蜀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致使这里成为开拓交通道路的军事对象。

夜郎

位于今天的贵州省，从汉王朝来看是西南夷最大国。临牂牁江，以水运与南越相联结。西汉武帝时，为走牂牁江直下攻打南越，曾以夜郎据点，让其参加攻越。战争结束后因惧怕成为汉军的矛头所向而入朝。夜郎侯曾向汉使者询问自国与汉哪个大，后来成为不自量力的典故。

居延汉简

在汉对匈奴战略的前线基地的居延城所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1930 年—1931 年由瑞士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以及后来 1973 年—1974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分别发现一万一千枚（旧居延汉简）和一万九千枚（新居延汉简）汉代木简。都是边境城塞、关卡、狼烟台中的诏书，官厅之间的文书，法律、账簿、勤务记录等官方文书。

敦煌汉简

1907 年英国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探险时，于敦煌汉代遗址发现 708（一说 704）枚木简，流亡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在出版的《流沙坠简》（1914 年）中对其内容进行了考证，此后至今敦煌木简不断被发现。

太阳黑子观测

《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下："成帝河平元年（前 28）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观测到在太阳中央有铜钱大的黑点。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屡屡观测到太阳黑子，比西方九世纪初的观测早得多。哥白尼在 1607 年观察到此现象时，误认为是水星通过太阳。

南阳

建立东汉政权的刘秀（光武帝）一族及其功臣的故乡。南阳，北面有伏牛山脉将其与洛阳相隔，是在西面武当山、东面桐柏山、南面湖北丘陵环绕下的盆地。现在的河南省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水资源丰沛的重要之地。南阳豪族与东汉政权的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里还是东汉画像石的大宝库。

金印

江户时期在北九州的志贺岛发现了 2.35 厘米见方的蛇钮金印，阴刻"汉委奴国王"印文。1981 年江苏省出土了东汉广陵王的龟钮金印。二者的制作方法与刻字都很相似。广陵王刘荆在公元 58 年去世，两方印仅差一年，关于《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金印的真伪之争至此基本解决。

《厄里特里亚航海记》

公元一世纪居住于埃及的希腊生意人所著《厄里特里亚航海记》，是一部红海、

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指南。从埃及驶向印度洋沿岸港口的船只，装载着罗马货币、葡萄酒、玻璃、珊瑚等，归途的船上装载了胡椒、象牙和中国的丝绸。

邙山

1952 年 10 月毛泽东登上郑州市西北郊黄河岸边的邙山山顶视察了黄河。邙山从洛阳至郑州东西约七十公里，沿黄河连绵不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为五百米，从断崖上俯瞰奔腾的黄河堪称绝景。洛阳北的邙山上，长眠着包括东汉、北魏皇帝在内的两万五千名英雄豪杰。郑州市西断崖上仍残存着仅仅相隔八百米沟壑的项羽与刘邦的楚汉二城遗址。

画像石与画像砖

西汉中期以后建造横穴式石室墓时，墓室的石墙或砖墙上的装饰图案上有各种动物、人物像和故事神话，叫做画像石或画像砖。在山东省、江苏省徐州、河南省南阳、四川省、陕西省北部都曾大量出土。画像的题材丰富多彩，描绘有当时人们的农业、狩猎、盐业生产、贵族宴会、游戏、舞蹈、天体星座、西王母、羽人神话、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故事等等。

白马

传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曾派使节去西域寻求佛法。在月氏遇到两位印度僧侣，一同回到中国。当时用白马驮着经典和佛像到达洛阳。翌年，建寺庙取名白马寺。位于现在洛阳市东郊。

参考文献

秦汉史概论书

（1）日比野丈夫、米田贤次郎、大庭脩共著，《秦汉帝国》，《东洋历史》三，人物往来社，1966 年。

（2）植村清二，《万里长城》，《大世界史》三，文艺春秋，1967 年。

（3）《长城与丝绸之路》，《人物中国的历史》四，集英社，1981 年。

（4）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图说中国的历史》二，讲谈社，1977 年。

（5）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的历史》二，讲谈社，1974 年。

（6）西嶋定生《秦汉帝国　中国古代帝国的兴亡》，讲谈社学术文库，1997 年。

（7）西嶋定生《东亚史论集》第二卷《秦汉帝国的时代》，岩波书店，2002 年。

（8）平势隆郎、尾形勇《中华文明的诞生》，《世界的历史》二，中央公论社，1998 年。

◆（5）是最为充实易读的概论，（6）是（5）的订补版，（7）是作者增加了用语人名事典之后的新版。（8）包括两部分，后半部分从秦汉至三国时期。

另外，汉语的秦汉史有以下这些：

（9）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 1947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10）劳榦《秦汉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52 年。

（11）钱穆《秦汉史》，台北东大图书，1957 年。

（1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13）《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14）林剑鸣《秦汉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5）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英文原版的中文翻译）。

秦汉史研究

（16）镰田重雄《汉代史研究》，川田书房，1949 年。

（17）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弘文堂，1955 年。

（18）栗原朋信《秦汉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 年。

（19）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秦汉帝国成立过程的社会史研究》，弘文堂 1960 年；新版，岩波书店，1996 年。
（20）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 二十等爵制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61 年。
（21）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特别是其成立的基础条件》，不昧堂书店，1965 年；新订版，比较文化研究所，2003 年。
（22）浜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的研究》上下，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 年。
（23）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东洋史研究会，1968 年。
（24）楠山修作《中国古代史论集》，精兴社，1976 年。
（25）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 年。
（26）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创文社，1977 年。
（27）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岩波书店，1979 年。
（28）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社会论》，青木书店，1986 年。
（29）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 年。
（30）越智重明《战国秦汉史研究 1》，中国书店，1988 年。
（31）浅野裕一《黄老道的成立与展开》，创文社，1992 年。
（32）越智重明《战国秦汉史研究 2》，中国书店，1993 年。
（33）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构造——专制国家与意识形态》，校仓书房，1994 年。
（34）鹤间和幸《探索秦汉帝国》（世界史剧本），山川出版社，1996 年。
（35）多田狷介《汉魏晋史的研究》，汲古书院，1999 年。
（36）李开元《汉帝国的成立与刘邦集团》，汲古书院，2000 年。
（37）五井直弘《汉代的豪族社会与国家》，名著刊行会，2001 年。
（38）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 年。
（39）好并隆司《前汉政治史研究》，研文出版，2004 年。

◆ 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就中国史上第一个专制帝国的形成过程、构造一直有着热烈的讨论。讨论涉及家族、豪族、乡里共同体、县、叛乱集团等等。

政治制度

（40）（宋）王应麟《汉制考》。
（41）徐复《秦会要订补》，群联出版社 1955 年，中华书局，1959 年。
（42）（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中华书局，1955 年。
（43）（宋）徐天麟《东汉会要》，中华书局，1955 年。

（44）（清）孙星衍《汉官六种》，台北中华书局，1966 年。
（45）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 年。
（4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1974 年。
（47）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凤凰出版社，1978 年。
（48）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下，齐鲁书社，1984 年。
（4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0）福井重雅《汉代官吏登用制度研究》，创文社，1988 年。
（51）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
（52）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
（53）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第一章　第二章

秦史

（54）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55）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 年。
（56）林剑鸣《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1993 年。
（57）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年。
（58）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始皇帝

（59）杨宽《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
（60）镰田重雄《秦的始皇帝》，河出书房新社，1962 年。
（61）A. 科特雷尔著 / 日比野丈夫监译、田岛淳译《秦始皇帝》，河出书房新社，1985 年，新装版 1998 年。
（62）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
（63）吉川忠夫《秦的始皇帝》，集英社，1986 年；讲谈社学术文库，2002 年。
（64）李福泉《千古一帝秦始皇历史之谜》，湖南出版，1991 年。
（65）籾山明《秦的始皇帝》，白帝社，1994 年。
（66）NHK 取材班《始皇帝》，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4 年。
（67）陈舜臣《秦的始皇帝》，尚文社立邦，1995 年，文春文库，2003 年。
（68）鹤间和幸《秦的始皇帝 传说与史实之间》，吉川弘文馆，2001 年。

秦竹简史料

（6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线装本），1977 年。

（7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平装本），1978 年。

（7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

（7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

（73）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 年。

（74）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 年。

◆以上秦竹简史料的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图版、释文可供参考。

秦竹简研究

（75）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 年。

（76）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 年。

（77）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创文社，1998 年。

（78）松崎常子《睡虎地秦简》，明德出版社，2000 年。

（79）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80）吴子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 年。

（81）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82）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78）是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的日语翻译，睡虎地秦简除法律文书之外，尚有所谓《日书》这种独特的占卜文书。（76）、（77）、（80）、（82）都是有关《日书》方面的，特别是（77）由《日书》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国家。

始皇帝陵与兵马俑坑

（83）陕西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共编、田边昭三日语版监修《秦始皇陵兵马俑》，平凡社，1983 年。

（8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编《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 1974—1984》上下，文物出版社，1988 年。

（85）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86）袁仲一主编《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文汇出版社，1994 年。

（87）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 年。

（88）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89）今泉恂之介《兵马俑与始皇帝》，新潮选书，1995 年。

（90）樋口隆康《发掘始皇帝》，学生社，1996 年。

（91）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 年。
（92）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铜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 年。
（93）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9 年
（94）《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99 年。
（9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 年。
（96）鹤间和幸《始皇帝的地下帝国》，讲谈社，2001 年。
（97）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98）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99）鹤间和幸《始皇帝陵与兵马俑》，讲谈社学术文库，2004 年。

◆（84）是关于一号坑最为详细的报告，有详细图版，很实用。（85）、（97）是考古学者围绕兵马俑发掘的研究专著。（86）是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通力合作的辞典，分门别类非常便于使用。（91）、（92）是铜车马的发掘报告。（94）是大型图录。（95）是关于石铠甲坑、百戏俑坑的详细报告，还概括了以往陵园全部的发掘成果，囊括了最新的内容。

咸阳城

（100）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1）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 年。
（102）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03）陕西考古研究所编著《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

◆（100）、（101）是基于考古学成果的研究专著，（102）是包括咸阳之前秦都市的研究，（103）是咸阳宫、咸阳城的正式报告。

秦汉陶文·封泥·印章

（104）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中国书店，1990 年。
（105）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的封泥》，二玄社，1998 年。
（106）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 年。
（107）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 年。
（108）《秦官印封泥聚》，文雅堂，2000 年。
（109）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104）收集传世封泥 846 枚。陈介祺的收藏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106）收录了兵马俑、瓦的陶器上印文。1983 年以后西安市西北的秦代章台遗址出土了逾千枚的秦封泥，一度作为古董流入市场，是秦官僚制方面的宝贵史料。出土时隐藏于秦竹简的背面，是了解秦官僚制度的重要发现。现收藏于西北大学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北京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可参考（107）、（108）。

第三章

刘邦与项羽、吕后

（110）河地重造《汉高祖》，人物往来社，1966 年。

（111）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80 年。

（112）安作章、孟祥才《刘邦列传》，齐鲁书社，1988 年。

（113）永田英正《项羽》，新人物往来社，1981 年版，后来的 PHP 文库，2003 年。

（114）堀敏一《汉代刘邦 话说汉帝国成立史》，研文出版，2004 年。

◆（111）是历史小说，其他都是历史研究者的著作，对比阅读更有趣味。

第四章

张家山汉简与汉律研究

（115）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创文社，1982 年。

（116）《江陵张家山汉简——中国古代的审判记录》，中国历史与地理研究会，1996 年。

（117）富谷至《秦汉刑法制度研究》，同朋舍，1998 年。

（118）《张家山汉墓竹简 [247 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 年。

（119）池田雄一编《奏谳书——中国古代的裁判记录》，刀水书房，2002 年。

（120）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 年。

◆（115）、（117）是根据对睡虎地秦简和木简文书汉律条文所作的法制史研究，从（118）江陵张家山汉简图版出版开始，汉律研究正式开始。（116）、（119）是对在此之前公布的《奏谳书》这种审判文书的部分释读、解释。关于汉律佚文的辑佚很多，（120）是代表之作，评点本的出版尤为方便。

长安

（121）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东洋文库论丛二十之一、二，1933 年。

（122）王双怀、淡懿诚、贾云等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23）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 年。
（124）佐藤武敏《长安》，近藤出版社，1971 年，讲谈社学术文库，2004 年。
（125）武伯纶编著《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 年。
（127）西安市地方志馆、张永禄主编《汉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未央宫——1980 ～ 1989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
（129）史念海《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陕西师范大学，1998 年。
（130）《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与汉唐长安城》，亚洲游学二〇，勉诚出版，2000 年。
（131）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21）不仅限于长安，而且包括了对皇帝陵等西安周边遗址进行早期调查的古典著作。足立于 1906 年至 1910 年曾受清朝政府聘请在西安执教，1935 年已有汉语译本，（121）是新译。（124）是古都长安的通史，（128）是未央宫发掘报告，（129）、（130）是对长安自然环境的研究。

都市集落・交通史研究

（133）古贺登《汉长安城与阡陌、县乡亭里制度》，雄山阁，1980 年。
（134）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
（135）堀敏一《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汲古书院，1996 年。
（136）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37）佐原康夫《汉代都市结构研究》，汲古书院，2002 年。
（138）五井直弘《中国古代的城郭都市与地域支配》，名著刊行会，2002 年。
（139）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汲古书院，2002 年。

皇帝陵

（140）杨宽著，西嶋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合译《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学生社，1981 年。
（14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42）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43）刘庆柱，李毓芳著，来村多加史译《前汉皇帝陵研究》，学生社，1991 年。
（1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杜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 年。
（145）陕西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中国汉阳陵彩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 年。
（146）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47）焦南峰主编《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 年。
（148）马永赢，王保平《走近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149）王学理《汉景帝与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40）是日文版。（141）是中文版论及汉代皇陵于中国史上地位的著作。（142）是中文版。（143）是日文版的依据考古调查的论述。（144）西汉杜陵园遗址的发掘报告。（145）、（147）、（148）、（149）介绍了西汉景帝陵随葬的彩俑。（146）是对长安皇帝陵的总体研究。

马王堆汉墓

（150）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 年。
（151）文物出版社编辑《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 年。
（152）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年。
（15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54）《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55）《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5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全三册，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57）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58）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 年。
（159）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湖南美术出版社，1983 年。
（160）工藤元男、藤田胜久译注《马王堆汉墓帛书 战国纵横家书》，朋友书店，1993 年。
（161）刘晓路《中国帛书与楚汉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62）陈松长《马王堆帛书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
（163）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

第五章　第六章

司马迁与《史记》

（164）武田泰淳《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日本评论社，1943年，讲谈社文库，1972年。
（165）冈崎文夫《司马迁》，弘文堂，1958年。
（166）大岛利一《司马迁——《史记》的成立》，清水书院，1972年。
（167）宫崎市定《话说史记》岩波新书，1979年，岩波文库，1996年。
（168）Edouard Chavannes, *Les Memoires historiqueade Sema Ts'ien*, 4 tomes, *1895—1905*，岩村忍译《司马迁与史记》，新潮选书，1974年。
（169）加地伸行《史记 司马迁的世界》，讲谈社现代新书，1978年。
（170）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
（171）李长之、和田司武译《司马迁》，德间文库，1988年。
（172）池田英雄《史记学五十年——日中《史记》研究动向》，（1945—1995），明德出版社，1995年。
（173）小仓芳彦《入门史记的时代》，筑摩学艺文库，1996年。
（174）佐藤武敏《司马迁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175）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176）藤田胜久《司马迁与他所处的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177）伊藤德男《史记的构成与太史公的呼声》，山川出版社，2001年。
（178）藤田胜久《司马迁之旅》，中公新书，2003年。

◆日本的司马迁研究可以说开始于（164）。（170）是多角的探讨。（174）是对司马迁人物的研究，（175）是从司马迁所依据文本的角度对《史记》构成结构所作的研究。（178）是以司马迁旅行为题，近年的实地调查成果。研究司马迁的论著很多，（172）是目录。

史记的文本与译注

（179）龙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全10册，东方文化学院，1932—1934年，再版，1956—1960年。
（180）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全9卷，1957—1970年。
（181）《史记》，全10册，中华书局，1959年。
（182）小竹文夫、小竹武夫译注《史记》，全2册，世界文学大系，筑摩书房，1962年，筑摩学艺文库，1995年。

经济・财政

（183）加藤繁译注《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岩波书店，1942 年。
（184）吉田虎雄《两汉租税研究》，大阪屋号书房，1942 年，大安，1966 年。
（185）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 年。
（186）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与税法》，东洋史研究会，1967 年。
（187）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中文大学，1971 年。
（188）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 年。
（189）影山刚《中国古代的商工业与专卖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 年。
（190）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研究》，汲古书院，1993 年。
（191）重近启树《秦汉税制体系研究》，汲古书院，1999 年。
（192）山田胜芳《货币的中国古代史》，朝日新闻社，2000 年。

武帝

（193）吉川幸次郎《汉武帝》，岩波新书，1949 年。
（194）张纬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195）影山刚《汉武帝》，教育社历史新书 1979 年。
（196）福岛吉彦《汉武帝》，集英社，1987 年。
（197）林剑鸣《汉武帝》，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98）王志杰《汉武帝与茂陵》，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93）、（196）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195）、（197）是史学研究者的汉武帝研究。与秦始皇进行比较的研究很少。（198）是茂陵博物馆馆长的著作，介绍了茂陵附近的出土文物。

黄河・水利

（199）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年。
（200）郑肇经《中国之水利》，人人文库，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年。
（201）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　1946—1955 治理黄河图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202）黄耀能《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六国出版社，1978 年。
（203）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
（204）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中下，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1987 年、1989 年。
（205）黄河水利史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 年。

（206）张骅《大秦一统 秦郑国渠》，三秦出版社，2003 年。

西域·丝绸之路·匈奴

（207）梅原末治《蒙古诺颜乌拉（Noin—ūla）发现的遗物》，东洋文库 1960 年。
（208）《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68 年。
（209）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下（《白鸟库吉全集》）第 6、7 卷，岩波书店，1970—71 年）。
（210）护雅夫编《东西文明的交流 1 汉与罗马》，平凡社，1970 年。
（211）护雅夫《古代游牧帝国》，中公新书，1976 年。
（212）中岛敦《李陵》，筑摩书房，1948 年。
（213）护雅夫《李陵》，中央公论社，1974 年，中公文库，1992 年。
（214）富谷至《戈壁滩上的男子汉——李陵与苏武》，白帝社，1994 年。
（215）泽田勋《匈奴》，东方书店，1996 年。
（216）加藤谦一《匈奴“帝国”》，第一书房，1998 年。
（217）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 年。
（218）林梅村《汉唐与西域关系史》，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21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220）小谷仲男《大月氏》，东方书店，1999 年。
（221）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 年。

诸侯王墓

（2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1981 年。
（223）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2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225）河南省商丘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 年。
（226）《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 年。
（227）郑绍宗《满城汉墓》，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228）徐湖平主编《泗水王陵出土汉木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年。

◆（222）、（223）、（224）、（225）、（226）是汉代诸侯王墓的发掘报告，在皇帝陵未发掘的情况下，尤有参考价值。

盐铁专卖

（22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 1962 年。
（230）曾我部静雄译《盐铁论》，岩波文库，1934 年。
（231）山田胜美《盐铁论》，明德出版社，1967 年。
（232）佐藤武敏译注《盐铁论 汉代经济论争》，平凡社，1970 年。

长城

（233）青木富太郎《万里长城》，近藤出版社，1972 年。
（234）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235）谢和耐、罗哲文等著，日比野丈夫监译，田岛淳译《万里长城》，河出书房新社，1984 年。
（236）罗哲文、赵洛《万里长城》，北京外文出版社，1987 年。
（237）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年。
（238）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39）《长城辞典》，文汇出版社，1999 年。
（240）路宗元主编《齐长城》，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 年。
（241）来村多加史《万里长城 攻防三千年史》，讲谈社现代新书，2003 年。
（242）阪仓笃秀《长城的中国史》，讲谈社选书企划 2004 年。
（243）马建华、张力华《长城》，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年。

◆秦汉是长城研究的重要时代，（237）是对战国、秦汉长城的调查记录。

周边诸民族

云南

（244）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 年。
（245）玉溪地区行政公署编《云南李家山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46）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年。
（247）张增祺《晋宁石寨山》，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 年。
（248）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 年。
（249）张增祺《滇文化》，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250）云南省文化厅、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南文物之光 滇王国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251）黄懿陆《滇国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244）、（245）是发掘成果的体现，（249）、（250）、（251）开辟了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不同的滇文化、历史的研究新领域。

南越

（25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 年。
（253）张荣芳《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54）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1999 年。
（255）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集 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广州出版社，2001 年。

乐浪

（256）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编《乐浪》，刀江书院，1930 年。
（257）驹井和爱《乐浪郡治址》，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965 年。
（258）驹井和爱《乐浪 汉文化的残像》，中公新书，1972 年。

夜郎

（259）朱俊明《夜郎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
（260）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夜郎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
（261）贵州省毕节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可乐考古与夜郎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 年。
（262）唐文元、刘卫国《夜郎文化寻踪》，台北世潮出版，2003 年。

第七章

班固《汉书》

（263）《汉书》全 10 册，中华书局，1962 年。
（264）（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 年。
（265）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年。
（266）魏连科编《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 年。

（267）陈家麟、王仁康编《汉书地名索引》，中华书局，1990 年。
（268）小竹武夫译《汉书》，上中下，筑摩书房，1977 年—1979 年。
（269）狩野直祯、西肋常记译注《汉书郊祀志》，东洋文库，平凡社，1987 年。
（270）富谷至、吉川忠夫译注《汉书五行志》，东洋文库，平凡社，1986 年。
（271）永田英正、梅原郁译注《汉书食货·地理·沟洫志》，东洋文库，平凡社 1988 年。

简牍资料

（272）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 年。
（273）劳榦《居延汉简 图版之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21，1957 年。
（274）劳榦《居延汉简 释文之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21 之 40，1960 年。
（2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 年。
（27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秦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年。
（27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秦简 甲渠候官》上下，中华书局，1994 年。
（27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上下，中华书局，1991 年。
（279）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 年。
（280）《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5 年。
（281）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 年。
（282）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编《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283）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置月令诏条》，中华书局 2001 年。

简牍研究与入门

（284）森鹿三《东洋学研究 居延汉简编》，同朋社，1975 年。
（285）大庭脩《木简》，学生社，1979 年。
（286）大庭脩《木简学入门》，讲谈社学术文库，1984 年。
（257）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88）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同朋社出版，1989 年。

（289）大庭脩《汉简研究》，同朋社出版，1992 年。
（290）大庭脩《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关西大学出版社，1993 年。
（291）富谷至《古代中国的刑罚》，中公新书，1995 年。
（292）大庭脩编《木简——来自古代的信息》，大修馆书店，1998 年。
（293）籾山明《汉帝国与边境社会 长城风景》，中公新书，1999 年。
（294）大庭脩《汉简的基础研究》，思文阁出版，1999 年。
（295）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296）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297）马今洪《简帛：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298）富谷至《木简竹简叙述的中国古代》，岩波书店，2003 年。
（299）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 年。
（300）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年。

王莽

（301）沈展如《新莽全史》，正中书局，1977 年。
（302）周桂钿《王莽评传——复古改革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303）东晋次《王莽》，白帝社，2003 年。
（304）影山刚《王莽的酒专卖制与六筦制》，（自家出版），1990 年。

思想·儒教

（305）金谷治《秦汉思想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0 年。
（306）狩野直喜《两汉学术考》，筑摩书房，1964 年。
（307）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研究》，风间书房，1968 年。
（308）安居香山《纬书》，明德出版社，1969 年。
（309）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纬书集成》，明德出版社，1971、1973 年。
（310）板野长八《中国古代人间观的展开》，岩波书店，1972 年。
（31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的基础研究》，国书刊行会，1976 年。
（312）顾颉刚、小仓芳彦等译《中国古代的学术与政治》，大修馆书店，1978 年。
（313）町田三郎《秦汉思想史研究》，创文社，1985 年。
（314）日原利国《汉代思想研究》，研文出版，1986 年。
（315）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平河出版社，1988 年。
（316）板野长八《儒教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95 年。

（317）马伯乐著、川胜义雄译《道教》，平凡社丛书，2000 年。
（318）户川芳郎《汉代的学术与文化》，研文出版，2002 年。

第八章

东汉史

（319）狩野直祯《后汉政治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 47，同朋舍出版，1993 年。
（320）东晋次《后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 年。
（321）渡边义浩《后汉国家的支配与儒教》，雄山阁出版，1995 年。

◆在众多有关秦汉时期研究著作中，对东汉时期的专题研究仅举出（319）、（320）、（321）三部。

后汉书

（322）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全 12 册，中华书局，1965 年。
（323）（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艺文印书馆。
（324）张舜徽主编《后汉书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年。
（325）吉川忠夫训注《后汉书》全 10 册，分册 1，岩波书店，2001 年～。
（326）渡边义浩主编《全译后汉书》全 18 册，分册 1，汲古书院，2001 年～。

◆（325）是《后汉书》全文的训读和注释，刊行中；（326）是《后汉书》全文的训读、注释和口语翻译，刊行中。

农民之乱

（327）谷川道雄、森正夫编《中国民众叛乱史 1 秦～唐》，东洋文库，平凡社，1978 年。
（328）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农民叛乱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 年。

洛阳

（329）洛阳市文物局《汉魏洛阳故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年。

东亚世界

（330）西嶋定生《倭国的出现 东亚世界中的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年。
（331）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

石刻金石资料

（332）（宋）洪适《隶释》，影印本，极东书店，1966 年。

（333）同上《隶续》影印本，极东书店，1969 年。

（334）（清）翁方纲《两汉金石志》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335）容庚《秦金文录·汉金文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五，1931 年。

（336）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全二册，同朋舍出版，1994 年。

人口

（337）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 年。

（338）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

画像石、画像砖

◆汉代墓室、祠堂、石棺的石或砖上描绘有丰富的画像，因其带有地域性特点，所以在此分地域予以列举。

四川

（339）闻宥撰《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65 年。

（340）高文编《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41）《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 年。

山东

（342）南京博物馆、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9 年。

（343）《徐州汉画像石》，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年。

（344）《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齐鲁书社，2001 年。

（345）《山东长清孝堂山汉祠画像》，齐鲁书社，2001 年。

（346）临沂博物馆编《临沂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 年。

（347）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

南阳

（348）《南阳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5 年。

（349）《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 年。

（350）南阳汉画馆编著《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 年。

陕北

（351）陕西博物馆编《陕北东汉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

（352）张鸿修编著《陕西汉画》，三秦出版社，1994 年。

（353）康兰英、赵力光编著《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54）韩伟主编，王炜林副主编《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重庆出版社，2000 年。

徐州

（355）《徐州汉画像石》，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年。

（356）高书林编著《淮北汉画像石》，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

◆关于画像石研究著作及一般性读物有以下几种：

（357）长广敏雄《汉代画像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65 年。

（358）土居淑子《古代中国的画像石》，同朋舍出版，1986 年。

（359）吴曾德《汉代画像石》，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7 年。

（360）《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 18 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

（361）渡部武《画像叙述的中国古代》，平凡社，1991 年。

（362）林巳奈夫《石头上刻画的世界》，东方书店，1992 年。

（363）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年。

（364）信立祥《中国汉代画像石研究》，同成社，1996 年。

（365）高文、高成刚著《中国画像石棺艺术》，1996 年。

（366）王明发《画像砖》，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 年。

（367）欧阳摩一《画像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 年。

（368）蒋英炬《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 年。

（369）罗二虎著、渡部武译《中国汉代的画像与画像墓》，庆友社，2002 年。

（370）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 年。

◆（357）、（358）、（359）、（364）、（369）是关于汉画像石研究的论著，其他是概况和各地画像石、画像砖的图录。

壁画墓

（371）《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 年。

（372）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 年。

（373）洛阳博物馆供稿《洛阳汉代彩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 年。

（37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 年。

（37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年。
（37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
（377）韦娜、李聚宝主编《洛阳古墓博物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78）贺西林《古墓丹青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379）苏珊娜、格莱夫、尹申平《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国东汉墓（邠王墓）壁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2 年。

◆汉代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壁画与画像石都是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文化。（377）介绍了保存壁画墓的博物馆。（378）是壁画墓的研究著作。

第九章

自然灾害、环境、历史地理

（380）《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 年。
（381）史念海《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382）佐藤武敏编《中国灾害史年表》，国书刊行会，1993 年。
（383）史念海《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二集，出版社同上；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 年；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384）谭其骧《长水集》上下续，人民出版社，1987、1994 年。
（385）袁清林著，久保卓哉译《中国的环境保护及其历史》研文出版，2004 年。

◆（380）是气象学者的论集，（381）概述了古代黄土高原丰富森林在资源开发之下丧失的历史。（382）以正史为主要资料归纳的灾害年表。（383）是涉及古代关中、长城、道路、黄土高原、森林的变迁，以及古都学、黄河、人口等广泛内容的历史地理学论集。（384）是关于秦都、西汉行政地理、黄河古道的论集。

宦官

（386）三田村泰助《宦官 亲信当政》，中公新书，1963 年，中公文库，1983 年。
（387）顾蓉、葛金芳著，尾鹫卓彦译《宦官 操纵中国四千年的异形集团》，德间书店，1995 年。

医学

（388）丸山敏秋《黄帝内经与中国古代医学》，东京美术，1988 年。

（389）坂出祥伸编《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综合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 年。

秦汉考古美术

（390）大阪市立明美术馆《汉代美术》，平凡社，1975 年。

（391）《世界美术大全集》第二卷，秦、汉，小学馆，1998 年。

（392）陕西省博物馆编《秦汉雄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年。

（393）陕西省博物馆编《秦汉文化》，学林出版社，2001 年。

◆在以图版形式介绍秦汉丰富的出土文物书籍中，（390）是日本所藏文物的介绍，（391）是对中国新出土文物的介绍，（392）、（393）是秦汉古都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编集的充实介绍。

汉代考古学

（394）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新华书店，1984 年。

（395）宋治民《战国秦汉代考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

（396）赵化成、高崇文等《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 年。

◆（394）是汉代考古学的概述，（395）是对战国秦汉代考古学详细概括。

秦汉墓

（39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 年。

（39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 年。

（39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 年。

（400）湖北省西汉古尸研究小组《江陵凤凰山 168 号墓西汉古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2 年。

（4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82 年。

（402）南京博物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40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

（40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

（40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尔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 年。

（406）陕西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 年。

（407）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408）黄冈市博物馆编著《罗州城与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 年。
（409）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 年。
（410）黄晓芬《中国古代葬制的传统与变革》，勉诚出版，2000 年。
（411）《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0 年。

◆（397）—（409）、（411）是有关秦汉墓葬的发掘报告，（410）是对墓葬形制变迁所作系统的研究专著。

文物

（41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 年。
（413）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 年。
（414）林剑鸣、吴永琪主编《秦汉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年。

明器

（415）《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 年。

漆器

（416）李正光编绘《汉代漆器艺术》，文物出版社，1987 年。
（417）湖北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湖北省博物馆，1994 年。
（418）《中国漆器全集 3 汉》，福建美术全集，1998 年。
（419）李正光编绘《汉代漆器图案集》，文物出版社，2002 年。

瓦当

（420）《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 年。
（42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 年。

货币

（422）陕西省钱币学会《秦汉钱范》，三秦出版社，1992 年。
（423）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 秦汉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年。
（424）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年。
（425）西安钱币学会、陕西省钱币学会编《新莽钱范》，三秦出版社，1996 年。

数学

（426）彭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 年。
（427）薮内清《中国数学》，岩波新书，1974 年。
（428）川原秀城《九章算术解说》（科学名著二），朝日出版社，1980 年。

历史年表

公元	年号		中国	东北亚、日本、朝鲜、其他
前 306	秦昭王元	年	《编年记》从此年记至始皇三十年	
288		一九	秦昭王称西帝，齐王称东帝	
262		四五	睡虎地秦墓墓主出生	
260		四七	秦白起长平之战大破赵	
259		四八	秦王政生于赵邯郸	
257		五〇	秦围困赵，楚魏救援	
255		五二	秦灭东周	
251		五六	昭王死	
250	秦孝文王	元	孝文王即位，旋即死	
249	秦庄襄王	元	吕不韦为秦相国	
247		三	庄襄王死，子政（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刘邦出生	
246	秦王政	元	开始营造骊山陵。秦始造郑国渠	
241		六	楚迁都寿春	
239		八	甘肃天水发现这一年的墓主年代记和木版地图（1986 年）	
238		九	嫪毐发难	
237		一〇	郑国间谍暴露。吕不韦官场失足	
235		一二	吕不韦自杀	
233		一四	韩非子、在秦被毒杀	
232		一五	项羽出生	
230		一七	秦灭韩	

前 227		二〇	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未遂	
225		二二	秦灭魏	
223		二四	秦灭楚	
222		二五	秦灭赵、燕	
221	秦始皇	二六	秦灭齐，统一天下。秦王政称皇帝（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轨、文字。实行郡县制，改称人民为黔首	
220		二七	秦始皇第一次巡行	
219		二八	秦始皇第二次巡行，封禅泰山。派遣徐市（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去东海寻求长生不老仙药	
218		二九	秦始皇第三次巡行	
217		三〇	《编年记》至此年终止。喜或许死于此年	
215		三二	秦始皇第四次巡行，至碣石，遣燕人卢生寻求仙人	
214		三三	秦攻打百越，设置南海等三郡	（北）蒙恬驱逐鄂尔多斯的匈奴，设置四十四县
213		三四	秦根据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发焚书令，烧毁民间《诗》、《书》及百家书籍	
212		三五	秦修直道。开始建造阿房宫。坑埋儒生 460 余人于咸阳，即所谓坑儒	
210		三七	秦始皇在第五次巡行途中，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九月太子胡亥即位（二世皇帝）。九月葬秦始皇于咸阳	
209	二世	元	七月陈胜、吴广之乱。九月刘邦、项羽反叛。十二月陈胜战死	（北）冒顿单于杀父头曼自立，统一匈奴
208		二	六月项羽立楚怀王。李斯被处刑	
207		三	丞相赵高杀胡亥。子婴杀赵高	
206	汉王	元	十月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十二月鸿门宴。项羽杀子婴、焚烧咸阳。秦灭亡。项羽自立，称西楚霸王。将刘邦等十八人封于各地为王	
205		二	十月项羽杀义帝。楚汉战争开始	

前 203		四	楚汉停战协议	
202	高祖	五	项羽败死于垓下之战。刘邦即位皇帝。汉王朝开始	
201		六	高祖刘邦与功臣之间缔结封爵之誓。高祖在白登山为匈奴所围困	
200		七	汉从洛阳迁都长安	
198		九	楚昭、屈、景、怀氏与齐田氏被迁往关中	
197		一〇	诸侯王至长安来朝	
195		一一	韩王信、梁王彭越被杀	
194		一二	黥布被杀。四月高祖死。惠帝即位	（朝）卫满建立卫氏朝鲜
194	惠帝	元	吕后毒杀赵王如意。着手建设长安城	
190		五	长安城完工	
188		七	惠帝死，太子即位皇帝（少帝恭）	
187	吕太后	元	吕太后临朝称制，掌握政治实权	
186		二	湖南省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墓主轪侯死。吕后二年律令（张家山汉简）被发现	
184		四	少帝弘即位	
180		八	吕太后死。周勃等灭吕氏一族。文帝即位	
179	文帝前	元	汉与匈奴呼唤简牍外交文书	
174		六		（北）冒顿单于死，老上单于即位
168		一二	田租减半。匈奴屡屡侵扰汉	
167		一三	废止肉刑（身体刑）。田租全免	
166		一四	月氏为匈奴所迫西迁	
157	后	七	吴氏长沙国被废。文帝死，景帝即位	
156	景帝前	元	恢复田租。定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154		三	吴楚七国之乱	
145		五	司马迁出生（一说为前 135 年）	
141	后	三	武帝即位	

前 140	武帝建元	元	年号追溯至此年，创始（建元元年）。董仲舒任江都相。此时司马谈任太史令。	
139		二	此时张骞作为汉使者被派往大月氏。设置茂陵邑	
136		五	一说五经博士设置于此年	
133	元光	二	汉欲在马邑伏击匈奴未遂	
132		三	濮阳瓠子段黄河决口	
129		六	卫青第一次远征匈奴	
128	元朔	元	卫青第二次远征匈奴。是年秋，卫子夫成为皇后	（朝）秽君南闾降汉，汉在其地（朝鲜半岛东海岸）设置苍海郡
127		二	卫青第三次远征匈奴。夺取鄂尔多斯，修秦长城	
126		三	张汤任廷尉。张骞从西域返回	（北）军臣单于死，伊稚斜单于即位
124		五	卫青第四次远征匈奴	
123		六	卫青、霍去病第五、六次远征匈奴。将军卫青打破匈奴	
122	元狩	元	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	
121		二	将军霍去病打破匈奴。匈奴浑邪王降汉。设置河西四郡	
119		四	张骞再次出发去西域。开始实施盐铁专卖制	
118		五	停止使用半两钱，发行五铢钱	
116	元鼎	元	张骞又一次出发去西域。	
115		二	桑弘羊任大农中丞，开始实行均输法	
113		四	武帝首次巡行	
111		六	南越灭亡，设置南海九郡	
110	元封	元	武帝在泰山封禅。司马谈死	
109		二	治理阻塞黄河瓠子段决口。攻西南夷，使滇国臣服	
108		三	司马迁任太史令	（朝）卫氏朝鲜为汉武帝所灭。汉在其地设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

前 107		四	发行五铢钱
106		五	全国设置十三州，由刺史管辖
104	太初	元	采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派李广利攻大宛
100	天汉	元	桑弘羊任大司农。苏武入匈奴，被捕
99		二	贰师将军李广利在祁连山攻打匈奴右贤王。李陵降匈奴
98		三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被捕入狱
95	太始	二	筑白渠
91	征和	二	巫蛊之祸，皇太子据与妻子被杀
90		三	李广利攻打匈奴战败，投降
89		四	《史记》撰成
88	后元	元	设置敦煌郡
87		二	武帝死去，末子弗陵即位（昭帝），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司马迁死去。
86	昭帝始元	元	实行代田法。燕王旦谋反
82		五	（朝）汉废真番、临屯二郡
81		六	召集贤良、文学开盐铁会议
80	元凤	元	燕王旦再次谋反。上官桀、桑弘羊被杀，霍光政权得以确立
75		六	（朝）玄菟郡从半岛移至苏子河流域
74	元平	元	昭帝死去。昌邑王刘贺即位，旋被废，宣帝即位
68	宣帝地节	二	霍光病死
66		四	霍氏谋反计划败露，一族被杀
60	神爵	二	郑吉任西域都护，设置乌垒城
59		三	《僮约》（奴隶买卖契约）
58		四	（北）呼韩邪单于即位
56	五凤	二	（北）匈奴五单于分裂，郅支单于自立

前 53		甘露	元	（北）匈奴郅至单于、呼韩邪单于送子为人质至汉朝罗马克拉苏军攻打安息
51			三	石渠阁会议
48		元帝初元	元	王氏成为汉元帝皇后
44			五	（北）郅至单于杀汉使者，西迁康居
43		永光	元	废止陵邑制
33		竟宁	元	汉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
31		成帝建始	二	匈奴呼韩邪单于死
30			三	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
28		河平	元	黄河金堤段决口，王延世筑堤
27			二	外戚王谭等五人封为王侯 罗马实行帝政
17		鸿嘉	四	黄河金堤段决口，王延世筑堤。黄河下游三郡决口
16		永始	元	王莽被封为新都侯
11		元延	二	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日记（尹湾汉墓简牍）
8		绥和	元	王莽任大司农。学者刘向死（约前 77—前 86）
7			二	成帝猝死。哀帝即位。发布限田法
3		哀帝建平	四	京师、地方狂热祭祀西王母
2		元寿	元	一说大月氏国王使者传来《浮屠经》
1			二	哀帝死去。王莽再任大司马。平帝即位，元后临朝称制
1		平帝元始	元	王莽称安汉公，辅佐平帝执掌政治 （日）倭人分为百余国，一部分国向西汉乐浪郡朝贡
2			二	这一年进行了户口调查，人口为 59,594,978 人（《汉书·地理志》）
5			五	王莽取代刘婴（孺子婴）为“摄皇帝”。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全国发布了《四时月令》

后 7	（孺子婴）居摄	二	王莽造错刀、契刀、大泉五十等新货币。第一次货币改革	
8		三	王莽称皇帝，定国号为“新”	
9	新始建国	元	王莽称天下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第二次货币改革	
10		二	第三次货币改革	（北）王莽将赐予匈奴的印玺降格为“章”
11		三	黄河在魏都元城段决口，第二次大改道	
12		四		（朝）改“高句丽侯”为“下句丽侯”，高句丽叛离
14	天凤	元	王莽造货布、货泉（第四次货币改革）	
17		四	吕母反乱	
18		五	樊崇反乱	
20	地皇	元	绿林起兵	
22		三	四月樊崇军称“赤眉”（赤眉之乱）。十月刘縯、刘秀举兵	
23	更始	元	二月刘玄即帝位（更始帝）。九月王莽被杀	
24		二	二月更始帝迁都长安。五月刘秀自立于河北	
25		三	三月赤眉军击败更始帝军	
25	光武建武	元	四月公孙述称天子。六月刘秀即帝位（东汉光武帝）。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九月赤眉入长安城。十月光武帝建都洛阳。十二月赤眉杀更始帝。赤眉火烧长安宫殿，盗掘陵墓	
27		三	一月赤眉投降光武帝	
29		五	在洛阳城外建立太学	
30		六	田租减轻为三十分之一税率。解放奴婢	
32		八		（朝）高句丽来朝贡，恢复王号

后 33		九	隗嚣病死	
34		一〇	隗嚣之子隗纯投降。隗嚣政权灭亡	
35		一一	诏令杀奴婢不予减刑。废除奴婢射伤一般人弃市律	
36		一二	公孙述败于成都，身亡。公孙述政权灭亡。光武帝完成统一	
37		一三	解放益州奴婢	
39		一五	全国耕地及户口调查	
40		一六	恢复使用五铢钱	（越）越南征侧、征贰姊妹叛乱
43		一九		（越）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氏姊妹叛乱
44		二〇		（朝）韩人廉斯国苏马諟与乐浪交往
48		二四		（北）匈奴分裂为南北。南匈奴朝贡东汉
49		二五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击破武陵蛮	
50		二六		（北）同意南匈奴居住云中
51		二七		（北）拒绝北匈奴的和亲请求
56	建武中元	元	举行泰山封禅仪式。向全国宣布图谶之书	
57		二	光武帝死去，明帝即位。当年倭奴国王朝贡汉，光武帝授予印绶	
58	明帝永平	元	刘荆（光武帝第九子）为广陵王	
60		三	于东汉南宫云台绘功臣二十八将	
67		一〇	于洛阳城西建白马寺，从西域传来佛典	
69		一二	王景治理黄河、汴渠，翌年完工。此后九百年黄河无大的改道	
70		一三	楚王刘英谋反，连坐数千人	
73		一六	派遣班超赴西域	
74		一七	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恢复对西域的统治	
75		一八	西域诸国叛乱	
79	章帝建初	四	诸王、儒者聚集洛阳白虎观，议论《五经》异同	

后 82		七	建初年间（76—84）的此时《汉书》基本完成	
85	元和	二	章帝于鲁祭祀孔子，向孔氏一族赐帛	（北）南匈奴击溃北匈奴
88	章和	二	废止盐铁专卖制	
89	和帝永元	元	窦宪击匈奴	
91		三	重新设置西域都护，班超赴任	
92		四	北匈奴为汉与南匈奴的联合军所败，逃遁。班固死于狱中	
94		六	西域都护班超击破焉善、尉犁，杀其王。西域五十余国内属东汉朝	
97		九	西域都护班超的部下甘英被派往大秦，由安息、条支赴大海	
100		一二	许慎完成《说文解字》	
105		一七	蔡伦献上所造纸张。汉和帝死，殇帝即位，邓太后临朝	（朝）春，高句丽攻打辽东郡
106	殇帝延平	元		（朝）玄菟郡迁至浑河流域
107	安帝永初	元	废止西域都护。西方羌人叛乱	（日）倭国王帅升向后汉朝献上生口
110		四	从这一年开始连续六年大蝗灾	
111		五		（朝）夫余王攻打乐浪郡
113		七	从这一年开始连续八年观测到日食	
118	元初	五		（朝）高句丽王宫攻打玄菟郡
119		六	会稽郡发生瘟疫	
120	永宁	元	《说文解字》献给朝廷	
125	延光	四	京师瘟疫大流行	
127	顺帝永建	二	班勇使西域十七国内属	
132	阳嘉	元	张衡制造浑天仪（天球仪）和地动仪（地震仪）	
138	永和	三	金城、陇西郡地震。张衡观测震源方向	
140		五	羌人叛乱持续十年。波及全国 105 个郡国，1180 个县（《后汉书·郡国志》）	
143	汉安	二	凉州发生大地震	

后 150	桓帝和平	元		（日）桓、灵帝时期倭国大乱
151	元嘉	元	正月京师瘟疫大流行	
153	永兴	元	黄河泛滥。于曲阜孔庙建《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	
157	永寿	三	鲁曲阜再建孔子墓	
158	延熹	元	桓帝延熹年间信奉黄帝、老子，排除其他祭祀	
159		二	羌人叛乱	（印）天竺使节抵日南
161		四		（印）天竺使节再次抵日南
164		七	建立孔子后裔的孔庙墓碑	
165		八	桓帝一年中三次祭祀老子。四月黄河水变清	
166		九	李膺等二百余“党人”下狱（党锢之狱）	
167	永康	元	“党人”被释放，终身禁锢	
168	灵帝建宁	元	陈蕃、窦武等被杀	
169		二	李膺等百余“党人”被杀	
175	熹平	四	蔡邕订正《五经》文字，在洛阳郊外太学门外建立石经碑（熹平石经）	
178	光和	元	在洛阳鸿都门设置学校，绘孔子及弟子像	
184	中平	元	张角称“黄天”，掀起黄巾反乱。终止党人的禁锢	（日）据说此时倭国内乱，相互攻伐。此后，卑弥呼被拥立为王
189	献帝永汉	元	灵帝死去，少帝即位，何太后临朝。袁绍尽杀宦官。董卓废皇帝，拥立献帝	
190	初平	元	董卓迁都长安。是年废五铢钱，铸造小钱	
192		三	吕布杀董卓	
194	兴平	元	张鲁统帅五斗米道，号“师君”	
196	建安	元	曹操迎献帝，建都许	
200		五	曹操于官渡击溃袁绍。郑玄死去	
204		九	公孙康在乐浪以南设置带方郡	

后 208		一三	赤壁之战（刘备与孙权军击溃曹操）
209		一四	（朝）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丸都城）
213		一八	曹操为魏公
214		一九	刘备为益州牧
215		二〇	张鲁降曹操
216		二一	曹操为魏王。南匈奴单于入朝魏
220	延康	元	曹操死去，子曹丕建国“魏”，东汉灭亡

注：因改元，一年之中存在复数年号时，原则上仅记新年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作者=（日）鹤间和幸著；马彪译
页数=519
SS号=13458783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广西大学出版社